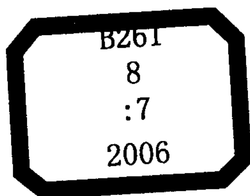
第七卷

# 艾思奇全書

人民出版社

第七卷

(1957—1961)




# 艾思奇全书



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1957） …… 1

一、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期 …… 3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15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25

四、抗日战争时期 …… 47

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些意见（1957） …… 77

哲学要为实际工作服务（1958.4） …… 82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1958.6） …… 87

**工人和哲学**（1958.7） …… 110

一、应不应该学哲学 …… 110

二、能不能学好哲学 …… 121

三、怎样才能学好哲学 …… 130

哪里找根据？（1958.7） …… 139

改革规章制度，充分解放劳动人民的创造力

（1958.8） …… 143

**关于民主与专政问题**（1958.9） …… 147

一、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 …… 147

二、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 …… 153

三、关于共产党的领导问题 …… 163

努力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规律（1958.11） …… 172

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1959.1）…………………………… 178
认识客观规律，鼓足革命干劲（1959.1）………………… 187
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1959.2）…………………………… 192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哲学问题**（1959.6）…………………… 196
一、关于目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的问题………… 196
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以及两个过渡的问题…… 202
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的问题………………… 204
四、关于否定之否定改变为肯定之否定的规律问题……… 206
五、关于五个并举是方针还是规律的问题………………… 207
关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问题（1959.7）……………… 210
纪念斯大林诞辰80周年（1959.12）……………………… 225
**关于否定之否定的规律**（1959.12、1964.6） ……………… 230
一、辩证法规律之间的联系问题…………………………… 230
二、辩证法意义上的否定问题……………………………… 235
三、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问题…………………………… 241
四、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问题………………………… 243
关于自然辩证法研究班“学习计划”的说明
（1960.2）……………………………………………… 254
学习列宁，保卫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
——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而作（1960.4）…………… 273
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1960.7）…………… 302
**党史引言报告**（1960）…………………………………… 321
一、学习党史的中心环节问题……………………………… 321
二、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的问题…………………………… 327
三、坚持彻底的辩证法的问题……………………………… 340
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347

**辩证逻辑**（1960.7）………………………………………… 358
一、辩证逻辑和认识论…………………………………………… 359
二、研究辩证逻辑的原则………………………………………… 361
三、辩证逻辑的概念……………………………………………… 370
四、辩证逻辑的判断……………………………………………… 380
五、辩证逻辑的推理……………………………………………… 386
**关于编写《自然辩证法提纲》的讲话**（1960.9）……………… 389
一、关于要不要编写《自然辩证法提纲》的问题………… 389
二、关于如何写“导论”的问题………………………………… 393
三、关于如何写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的问题………………… 418
四、关于如何写“分论”和工农医的问题………………… 437
**社会主义学院讲课提纲**（1960）……………………………… 446
一、哲学的任务是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446
二、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辩证的发展过程………………… 447
三、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 447
**进一步学习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
——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笔记（1961.3）……………… 449
一、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胜利…………………………………… 449
二、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精神的统一…………… 453
三、分析矛盾，分析阶级……………………………………… 465
四、把握社会的基本矛盾……………………………………… 471
五、人民观点，群众观点……………………………………… 480
**在“61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61.9）……………………… 488
一、关于举办“61班”的目的和任务 …………………………… 488
二、关于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进行教学的问题…………… 490
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 493

四、关于个人自学和集体学习的关系问题………………… 503
五、关于语文学习和作文的问题……………………………… 505
**社会发展史引言**（1961.11） …………………………… 512
一、前言………………………………………………………… 512
二、从猿到人…………………………………………………… 519
在布置“60班”历史教学计划时的讲话（1961.11） ……… 524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主编）（1961.11）………… 537
第一章 绪 论………………………………………………… 537
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538
二、哲学史上的两军对战……………………………………… 544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553
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和方法………………… 561
**上篇 辩证唯物主义**
第二章 世界的物质性………………………………………… 566
一、世界是物质的世界………………………………………… 566
二、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573
三、空间和时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 580
四、物质运动有它自己的规律性……………………………… 584
第三章 物质和意识…………………………………………… 588
一、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 588
二、意识是存在的反映………………………………………… 594
三、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 599
第四章 对立统一规律………………………………………… 603
一、唯物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 603
二、两种发展观………………………………………………… 610
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615

四、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621
五、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625
六、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632
第五章　质量互变规律……………………………………… 635
一、质和量………………………………………………… 635
二、量变和质变…………………………………………… 639
三、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644
四、飞跃形式的多样性…………………………………… 647
第六章　否定之否定规律…………………………………… 651
一、辩证的否定是发展的环节…………………………… 651
二、否定之否定，发展的螺旋式或波浪式运动………… 656
三、新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663
第七章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668
一、本质和现象…………………………………………… 669
二、形式和内容…………………………………………… 673
三、原因和结果…………………………………………… 678
四、必然性和偶然性……………………………………… 682
五、可能性和现实性……………………………………… 686
第八章　认识和实践………………………………………… 690
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690
二、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698
三、认识的辩证过程……………………………………… 706
第九章　真　　理…………………………………………… 716
一、客观真理……………………………………………… 716
二、真理发展的辩证过程………………………………… 720
三、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726

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729
下篇 历史唯物主义
第十章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 734
第十一章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748
一、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748
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752
三、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761
四、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768
第十二章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775
一、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 775
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778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783
四、家庭、民族…… 790
第十三章 阶级和国家…… 794
一、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795
二、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802
三、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810
四、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 815
第十四章 社会革命…… 818
一、社会形态的更替必须通过革命的变革…… 819
二、民主主义革命…… 823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834
四、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 847
第十五章 社会意识及其形式…… 851

一、社会意识的一般特点…………………………………… 852
二、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 858
第十六章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879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879
二、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886
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和党的
群众路线………………………………………………… 890

#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1957)

俄国十月革命把人类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在它的影响下，中国的历史也进入了自己的崭新的发展时期。这是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由资产阶级手里转到无产阶级手里的新时期，是革命性质由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紧接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迅速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变革的时期。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空前辉煌和伟大胜利的时期，这个时期所以能够出现，主要地是由于：一方面，1840 年以来中国社会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是非常缓慢地——有了发展，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较多的发展。在这中间，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就生长起来，并且逐渐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十月革

---

* 1957 年间，艾思奇同志为准备出国讲学，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写成此稿。原题是“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中国的哲学和社会思想的发展”，现在的题目是我们改的。全文尚未写完，只写到 1945 年党的“七大”时为止，按原计划尚有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两题，因忙于他事而中断。原有打印稿，艾思奇生前未公开发表过。1983 年《晋阳学刊》第 1、2 期，第一次发表，后又收入 1983 年 10 月宁夏出版社出版艾思奇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一书中。

命的炮声，唤起了中国先进人士的注意，他们鉴于过去学习用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方法来挽救中国的危亡的屡次失败，认识到这种旧的革命方法对于中国已经过时，已经失效，因而把眼光转向俄国，向俄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的命运，来指导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来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因此也可以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在中国出现的这个伟大时期，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日益广泛和深入地获得传播和发展的时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起来的时期。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中国人民中间高奏凯歌的时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步一步战胜各种唯心主义思潮（包括学术界和实际工作中的），并在人民群众的实际革命斗争中获得广泛的应用和发展的时期。开创这个时期的领导队伍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中国共产党，它的最伟大的舵手和代表者是毛泽东同志。

十月革命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它经过了以下的一些时期：一、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期；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四、抗日战争时期；五、解放战争时期；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时期。第一至第五个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最后一个时期，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任何一种哲学和社会思想都是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并成为它的一个不可分的部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过程，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哲学在战斗的中国人民中间的传播、应用和发展的过程，是和上述一系列的中国社会历史变革过程不可分地结合着的。因此，我们也必须按照这个历史发展的顺序，来叙述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中国的

哲学和社会思想的发展过程。

## 一、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期

### （一）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不久，中国爆发了一次有广大群众参加的政治运动——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以往的政治运动不同，它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它有着许多具有初步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先进人士作为自己的中坚；它第一次鲜明地高举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它在最初虽然只是知识分子中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运动，但不久就发展到六三运动，吸引了广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形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它已不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政治运动，而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同志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论》)这就是五四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运动的特征。

五四运动又是文化革命运动，作为文化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和以前的文化运动也有根本的不同。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它是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是处在帝国主义时代的软弱无力的阶级，它所领导的反对封建阶级的政治运动——戊戌改良运动和辛亥革命——都先后失败了。同样，五四运动以前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也反映了它的阶级的软弱无

力，它在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的进攻下面，打不上几个回合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了。五四文化革命运动以后的情形却不同，这个文化运动主要地已不是资产阶级文化对封建文化的斗争，而是以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主力和指导思想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运动。这个文化革命运动的结果，也和中途败退的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不同，它是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毛泽东同志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又说："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同上）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是在五四运动二十年之后说的，那时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社会思想作为指导的新文化运动已获得了如此规模巨大的胜利。现在，离毛泽东同志说这些话的时候又经过了近二十年。在这期间，中国既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获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但在经济方面，在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根本胜利，而且在政治和思想方面，在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和社会思想方面，社会

主义革命也获得了非常巨大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上和政治思想上的胜利，解放了千百年来在广大人民中间潜伏着的强大无比的生产力，它以雷霆万钧之势推动起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

（二）

在五四运动以前，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人士中间，已经陆续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最初曾是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左派，即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他们热烈地提倡“科学与民主”，对旧中国的封建文化特别是封建道德，以及它的主要的思想代表孔子主义，进行了最坚决最勇敢的批判和斗争。他们的世界观，一般地说，都是属于形而上学唯物论的范畴。他们相信世界的不断进步，相信社会的发展，但这种发展观基本上也是形而上学的、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发展观，还不是辩证法的发展观。例如当时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机关刊物《新青年》的编者陈独秀的哲学思想，就可以作为代表。他提倡“现实主义”，肯定“经验论”、“唯物论”、“无神论”的积极意义。(《今日之教育方针》)又说：“自宇宙之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敬告青年》)“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1916年》)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这些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中，就有一部分人先后转向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面来，有些在五四运动以前就转到无产阶级世界观方面来，有些则在五四以后稍迟的时期。例如鲁迅就是在五四以后才认识到“进化论的偏颇”，而转到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方面。其中最早在中国文化思想界鲜明地表示站到这个崭新的立场上来的人，就是李大钊同志。他在1918年7

月以后，陆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热烈地歌颂十月革命，歌颂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歌颂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胜利。他对于国际形势和中国发展的前途提出了在当时的中国来说是完全新的看法，他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指出这次战争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劳动人民的胜利。他提醒人们不应该为帝国主义集团“协约国”的胜利而欢呼，而“应该为……社会主义把军阀主义打倒而庆祝”，“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哪一部分人而庆祝，而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

李大钊同志在这些文章中也正确地指出了俄国革命的性质，说俄国革命“是阶级战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他赞扬布尔什维克主义，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这是 20 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李大钊同志还指出了俄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和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的道路的这一个正确的方向。“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布尔什维克这个名字，虽为俄国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20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号召中国人民，对这新的世界潮流，“不要恐怕，不要逃避”，“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去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

在哲学方面，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比较系统地宣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基本观点的最早的一个人。在 1918 年 6 月以前，他就发表过两篇具有若干辩证唯物论观点的哲学论文《青春》和《今》，里面说到物质的永恒存在和它的不断运动、流转的性质以及矛盾的性质：“大实在的爆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有盛即有衰，有阴即有阳，有青

春即有白首。”1919 年以后，他更连续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概括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阶级斗争学说和经济学说，并根据这些学说来说明旧中国的社会制度的必然崩溃，而与这些制度相联系的旧道德旧思想，特别是作为它的“结晶体”的“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里，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要晓得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大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他号召说：“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努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产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李大钊同志在另一些文章中，也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也由急进民主主义者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阵营方面来，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方面也起过很大的作用，他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就在这年的五月号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专号，以后《新青年》就成为经常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刊物。但陈独秀自始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理论斗争上常常不能够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划清界限，而在 1927 年又在政治上堕落到对资产阶级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泥坑里，一直到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

## （三）

应该特别提到毛泽东同志。1917 年他在湖南就组织了“新民

学会”，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宣传工作。1918 年他到北京与李大钊等先进人士接触，从此便开始倾向于马克思主义。1919 年他回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杂志，在那里开始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这个刊物是当时国内政治思想性最高、见解最深刻、战斗性最强的刊物之一。

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思想活动的最杰出的地方，就在于他一开始就充分地注意到广大人民的群众运动是根本改造社会的真正动力。在《湘江评论》发刊词上，就提出并回答了这样的问题：“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个刊物的二、三、四期，连载了毛泽东同志的一篇很受当时进步青年和知识界欢迎的论文《民众的大联合》。在这篇文章里，他根据历史上和当时国际上的许多无可辩驳的事实，特别是俄国革命的事实，论证了这样一个真理：“根本改造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他指出马克思就是世界上最坚决地主张用“民众的大联合”来根本改造旧社会的一派人们的领袖。他批评了中国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指出它的最大弱点就在于它只是比较少数人的斗争，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他发出了强烈的呼声：“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他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怀着最坚强的信念，对中国人民斗争的必然胜利的前途做出了十分坚定的预言：“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毛泽东同志对于人民群众力量的这种无限的信任心，这种最高度的群众观点，是使他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党的杰出领袖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毛泽东同志在 1920 年间对马克思主义作了进一步深入的钻

研。这一年回到湖南后，他一方面积极地从事当时地方的政治运动——自治运动，并根据俄国革命经验，坚决主张工人农民参加这些运动，在运动中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文化书社，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会，在知识界大量地推销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工作。这些组织，和当时全国其他许多省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一样，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前，毛泽东同志曾组织过一个推动“新文化运动”的组织——新民学会。为了引导新民学会会员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宣传马克思主义，曾由文化书社出版了《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在这个通讯集里，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特别是蔡和森同志以通讯的形式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根本问题。肯定了“中国应该走俄国革命的道路”，“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之良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肯定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必须打破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而为了要达到这目的，又必须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必须在全国各地着手进行工人中的宣传组织活动。这些讨论推动着当时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由理论变成行动，推动着他们开始从事工人运动。

五四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文化统一战线，在这个统一战线内部，自然不能没有各阶级之间的不同的思想和世界观的斗争。特别是运动中的右派——一些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联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快就显露出他们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敌对的本质。他们配合着新文化的敌人，在新文化战线内部来对马克思主义发动进攻。正如在一切其他国家的情形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与

各种资产阶级思潮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才能够在中国得到强有力的传播，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思想上的条件。这样，在五四文化运动中，就展开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思想的论战。这些论战中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二是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由美帝国主义所豢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挑起的。正值五四运动的前夜，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界为了对抗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曾从美国请了实用主义者杜威来中国各地演讲，散布这种美国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的毒素。胡适自己也写了《实验主义》等许多文章，从各方面贩卖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庸俗进化论的世界观。由于美帝国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旧中国统治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影响的增长，也由于实用主义这种反动哲学是披着巧妙的科学伪装出现的，因此胡适的思想活动在相当大的一部分知识界中找到了市场，并且长期以来一直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知识界中一种占主要地位的思潮。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哲学上是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发展观的斗争，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思想的斗争。胡适在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里挑起了这个论战。他从“世界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的成长”这个庸俗进化论观点出发，主张对于旧社会只应该采取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加以改良的办法，否认“根本解决”社会制度的必要和可能。他在反对“空谈主义”的借口下把攻击的锋芒指向马克思主义，指向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指向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用革命的阶级斗争方法来根本改造旧社会的思想。李大钊同志有力地回击了胡适的挑战。他依据历史

唯物论的理论，指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造腐朽的旧制度，那么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是没有希望的。他着重指出根本的问题是在经济制度方面，“就是经济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同时又批评了“各国社会党”的自发论思想，指出不应该坐着等待经济的自然变动，而应该通过无产阶级的自觉的斗争来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因此，“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他在论战中坚决表示了拥护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高度热情：“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真象，昭布在人类社会”。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是一个更广泛更重要的论战，这个论战是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方面是对右的方面的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1919 年到 1920 年间，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全国迅速扩大，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共产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办工人夜校等方式，加强了和工人的联系，工人阶级的觉悟和革命热情一天天高涨起来。这种影响的扩大使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感到恐慌。以清末君主立宪派首脑之一的梁启超为首的一批和封建势力、帝国主义有种种联系的资产阶级知识界代表，于 1920 年初就开始向马克思主义举行进攻。为着加强自己的阵地，他们承袭胡适的手法，从英国迎来了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让他在全国许多地方散布他的一套主观唯心主义哲学、阶级调和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按照这种思想，似乎资产阶级只要受到适当的教育，就有可能同意实行社会主义，而不必经过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梁启超及其门徒张东荪等人也写了许多文章和罗素相配合，直接把锋芒针对着马克思主义。

这些资产阶级知识界代表所提出的是一套违背客观事实的矛盾百出的谬论：他们捏造所谓中国的特殊国情论，硬说中国不存在阶级的分化，说“中国是劳动阶级不存在的国家”（梁），“工人与商人都不成为有力的阶级”（张），他们强词夺理地把中国工人农民贫困的原因归到工人农民的自身，厚着脸皮硬否认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导致工人农民生活困苦这个客观事实：“工人的受苦全在劳动界自身之制度”，“直接受资本家的很少很少”，“农业的不进实由于天灾兵祸”，而天灾“亦大半由于农民太无知识，不知道设法防卫”（张）。用上述的荒谬论点作为根据，他们便武断地认为在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只能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梁），“中国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必无好结果”。“世界的资本主义未消灭一天，则中国一天势必顺着此轨道而进。……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工厂必日增一日乃是不可抗的”。他们甚至公开表示欢迎帝国主义的侵略：“资本主义以外国势力的后盾与固有的基础加以经济学上的原理必定发展。”（张）

在回击这些资产阶级的反动谬论的斗争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进一步给予了有力的宣传和发挥，指出了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毛泽东同志在《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里指出，中国不但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化，而且“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多得若干倍”，由于他们生活的困苦，走向共产主义的要求已成为事实。李大钊同志指出了中国社会发展前途与国际发展形势的密切联系：“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条件之外。”他指出世界既已出现经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

势，那么要在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那是“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成”。陈独秀说：“各国资本主义都要崩溃，中国哪能够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它。”“中国断不能不发展实业，但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实业，未免太无谋了。”李大钊同志强调，中国只有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政权下面才能真正发展工业：“在今日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毛泽东同志在当时曾揭露了罗素所散布的阶级调和主义的欺骗性，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仅仅通过教育来实现社会主义“事实上做不到”。“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少教育之力推翻的”，“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反抗他才行”。俄国式的革命，乃是惟一的方法。(《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

像在很多国家的情形一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发展并与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相结合的初期，必须粉碎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在 20 世纪初即传入中国，它在一个时期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它的成员一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则是利用它的名义伪装“革命”招摇撞骗的流氓政客。他们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主张个人绝对自由，标榜反对一切强权，反对一切国家法律，反对一切组织和纪律，反对集中和领导，而实际上则是把反对的锋芒集中在俄国式的革命方面，集中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这种反动思想如果不被粉碎，就不能真正开展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

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无政府主义者的所谓个人绝对自由完全是主观的幻想，不论从经济上或政治上看，想实现绝对的个人自由都是荒谬的。毛泽东同志说："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事实上是做不到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无政府主义笼统地反对一切强权、国家和法律，反对阶级斗争，完全是非科学的武断。强权被少数剥削者利用来压迫劳动人民，自然是可恶的，但如果倒转过来，用它来反对剥削者压迫者，那就不见得可恶，而且还是被剥削被压迫者所需要的。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斗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而让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权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因此，要使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得到解放，就必须经过阶级斗争，经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要有自己的国家政权，用它来镇压被推翻的压迫者剥削者。"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监狱也要的，警察也要的，因为要对付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军队也要的，因为要对抗那资本主义的敌国。"（李达）而为了要实现这一切，又必须要有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能够集中领导的党，即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党，这些就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用以粉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主要观点。

这样，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两年中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思想与各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斗争，经过这些斗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想要破坏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企图失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知识界日益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并为中国共产党——列宁式的能够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变为实际行动，指导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胜利地进行翻

天覆地的革命斗争的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的条件。

##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一)

五四运动后掀起的社会主义问题大论战，在理论上解决了中国社会必须走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这一个总的方向问题，但未涉及当时革命实践斗争的具体的战略策略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这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起来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首先是要应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情况和阶级斗争情况；解决这个问题的一般原则，则有列宁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和有关的报告。列宁的主要思想是：(一)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基本任务和策略方针是：无产阶级必须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须与农民建立密切的联盟；可以而且应当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成立联盟反对共同敌人，但要无条件地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指出的这些原则，分析了中国的情况，解决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任务和动力等一系列的基本问题，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就一步步地变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加给中国人民最大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二大宣言》)因此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

第二步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做出这样的预言："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同上）我们已经看到，就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来说，这个预言确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得到应验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的革命运动立即出现了一个完全新的局面，以工人运动为首的广大人民群众斗争，迅速地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震动全国的"二七"大罢工，开始表现了无产阶级组织的强大威力。1923年至1924年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国共合作的关系，孙中山并且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把他们的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举起了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对"节制资本"的口号赋予了新的内容，而更主要的是规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三民主义由旧民主主义时期的纲领变成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纲领，成为能够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纲领。1925年遍及全国各地和各界的"五卅"反帝大运动，形成了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广泛的统一战线。随后革命运动又深入农村，爆发了湖南等地的农民群众运动。这些革命运动最后汇合为北伐战争，很快就打垮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广大人民民主革命的蓬勃高涨和革命战争的势如破竹的形势，第一次显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比的生命力，显示了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真正能够把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引向彻底胜利的领导力量。

## （二）

马克思列宁主义变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实际行动，

使资产阶级改良派大为恐慌，他们的知识界代表继社会主义问题论战失败之后，又企图从哲学世界观方面来破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1923年在资产阶级哲学界出现了一次所谓“科学和玄学的论战”。这次所谓“论战”，实际上是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内部关于如何反对唯物主义潮流的一次大争吵。发动这个论战的首先是一些与封建势力联系较多的资产阶级的知识界代表如张君劢、梁启超、梁漱溟等人。他们大叫“西方物质文明的破产”，“科学破产”，“唯物派的哲学家造成了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他们特别反对把人类社会历史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硬说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化完全决定于人的“自由意志”，不能在里面找到任何科学的规律。这在实际上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科学观点。他们高唱要复兴东方精神文明，甚至公开主张恢复在五四运动中已被搞臭了的孔子主义(梁漱溟)。这暴露了他们向封建势力投靠，并共同来反对人民的趋向。他们还搬运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最腐朽的、露骨地反科学反理性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如法国的柏格森等人的哲学——为自己装点门面，把这些哲学流派说成是所谓“东方精神文明”在西方的表现。

这种唯心论观点受到了另一些资产阶级知识界代表的批评。他们不同意这种露骨的公开的反科学反理性的宣传，他们宁愿在伪装的科学面貌下偷运唯心论的思想，为的是更利于引诱在五四文化运动中广泛地受到“科学与民主”思想影响的知识界青年走入迷途，更利于他们和唯物论进行斗争。这些资产阶级知识界代表的主要人物有实用主义者胡适和马赫主义者(皮耳生主义者)丁文江等人。他们批评张君劢等人的观点，说那是受了旧时代“玄学鬼”的迷惑的结果，说在当前的时代反科学是不对的，并且吹嘘自己的思想正是建立在达尔文进化论发现以来新的科学基础上

的新的哲学观点。当张君劢等人谴责他们，说他们如果不放弃科学的招牌就有和唯物论合流的危险时，他们就分辩说，用不着担心这种危险，他们在科学的招牌下面所宣传的决不是唯物论，而是“存疑的唯心论”——或不可知主义的唯心论。事实上他们所散布的一套伪科学的观点，正是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已经给予了粉碎性打击的那种经验主义的（感觉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

在“科学和玄学的论战”过程中，资产阶级反动的知识界代表为着给自己的观点找后盾，把欧美资产阶级国家在当时流行的各种反动唯心主义流派几乎全部都搬到中国来，就像作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经济上是许多帝国主义者互相争夺的市场一样，在思想上也被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动哲学思想的买办们看成竞争生意的市场，而这种大杂烩式的混乱情形之特别集中表现在1923年前后，又反映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已开始取得了不可动摇的胜利，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在中国人民的进步运动中已成为思想上和实践上的最坚强的指导力量，它也反映了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没落景象：它的代表者为着避免沉沦，已经开始手忙脚乱，企图抓着任何一片木板来使自己得到挽救。

（三）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是在国共合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以外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逆流，参加这次争吵的主要都是一些与北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买办势力有联系的资产阶级知识界代表。除了这一股逆流之外，在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内部，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思想斗争和世界观的斗争。

孙中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他的“平均地权”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要求，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他是中国国民党的领袖并代表了它的左派，在和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上，他的态度是坚定的。当时国民党的右派不赞成国共合作，他们分化出去了，孙中山带着左派和中派参加了两党的统一战线，这些中派甚至于左派中，随后又有些人分化为右派。正是他们，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内部，不断地挑起思想上、经济上、政治上以至于军事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一直发展到 1927 年 4 月 12 日，爆发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

孙中山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形而上学唯物论和进化论思想的混合物，其中又包含唯心主义的成分，特别是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解，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国民党的右派代表在思想上理论上对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就是利用和夸大孙中山思想中的唯心主义部分，并且通过附会和引申的方法制造出一套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反动思想系统。这是他们的一般规律。1925 年间，戴季陶代表了国民党的新的右派，在统一战线内部挑起理论上的阶级斗争。他把孙中山著作中已经过时的某些消极的唯心主义的东西和“科学与玄学”论战中张君劢一派的公开反科学反理性的半封建的反动观点杂凑起来，写成了《孙文主义哲学基础》等反动小册子，公开声明自己的目的是要对共产主义者进行理论斗争。他硬说有一种什么“超因果的、绝对的宇宙自身的‘信力’……支配宇宙”，他把孙中山的思想和封建思想传统拉到一起，硬说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仁慈忠孝”，是继承了孔孟的道统，并且厚颜无耻地把自己称为孙中山思想的继承人。他又拾起了梁启超等人在社会主义问题论战时已经被驳倒了的特别国情论，再加上自

己的唯心主义的附会，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他使用了这样一些荒谬的论据：阶级斗争学说不合“仁慈精神”，中国产业幼稚，没有明显的阶级区分等等。他提出所谓“纯粹三民主义”的口号，把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曲解成反动的纲领，如说民族主义的目的是在于争取孔孟道统和使中国民族的“血流”在世界种族大混合中“得到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时间”等等。这样，戴季陶就把孙中山所代表的、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素的国民党左派的思想，修改成适合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需要的反共反人民的思想体系。戴季陶的这些反动宣传和蒋介石当时的反共阴谋活动互相呼应，为1927年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作了思想的准备。

对于这些反动的阴谋活动和反动的思想进攻，中国共产党人曾给予了强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当时毛泽东同志所主编的《政治周报》，就指出这些右派已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指出帝国主义由利用军阀反革命到利用这些右派反革命，是从“窠外反”进到“窠里反”。也就是由堡垒外部的进攻进到堡垒内部的阴谋夺取。瞿秋白同志曾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这篇批判专文，指出他的唯心论的所谓“仁慈精神”和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的谬误，目的是要“愚弄民众”，反对工农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使革命“中途夭折”。指出工农的阶级斗争是反帝反封建胜利的保证，因为“工农的阶级斗争愈发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就愈加强”。

（四）

使一切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一切“窠外”和“窠里”的资产阶级反共反革命思想逆流——从根本上遭到彻底粉碎的，是毛泽东同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分析

和总结当时的革命斗争情况、斗争经验的理论著作。在1920年以后的几年中间，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深刻地钻研了当时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另一方面又积极参加了或领导了各方面的革命实践；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工作，领导了湖南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在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国共合作过程中又进行了出色的政治活动。他的丰富而全面的斗争经验使他在当时已成为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的杰出人物。他的著作以无可辩驳的力量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它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学说，完全适用于并且能够真正正确地解决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问题。这就使一切资产阶级的唯心论的争吵和所谓“国情论”与“东方精神文明”论之类的反动谬说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归于破产。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主要是矛盾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当时革命斗争有关的各阶级情况作了科学的生动的分析，精确地划清了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敌友关系，具体规定了这一整个革命时期的基本战略和策略。他的分析不但依据中国的具体实践证明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问题的普遍原理的正确性，而且进一步丰富了这些原理。例如，他不但证明了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条件下，“中产阶级”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同盟军，证明了列宁关于必须与资产阶级民主派成立联盟的原理，而且还进一步指出了中产阶级的两面性：“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揭露了“中产阶级”的两面性，也就正确地规定了对待中产阶级的两面策略:“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些分析和规定，又具体地发展了列宁指出的原理。

毛泽东同志还分析了当时中国无产阶级的具体情况，肯定地证明了它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他肯定了城乡的“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但对于小资产阶级内部的各部分，又作了细致的分析，指出他们由于经济条件有程度上的差异，而使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也有若干的不同。这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最早的和最正确的范例，它粉碎了资产阶级知识界代表的种种反科学反理性的胡说，证明科学研究方法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生活，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正是这种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

在北伐战争之前和北伐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农村,从事农民的组织工作，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在许多地区掀起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的反封建运动，使民主革命深入到最下层的数量最大的人民中间。由于有这样广泛、深入的群众革命运动做基础，北伐军就能势如破竹，胜利前进。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内注意农民运动的最早的领导人之一。1926年间他在广州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当时的农民运动训练了很多优秀骨干，他自己也亲身领导过湖南的农民运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关于农民斗争经验的一篇生动辉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他依据了当时活生生的实

践经验，证明农民问题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所占的极重要的地位，证明农民群众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的最大的主力军，有了农民运动的高涨，民主革命就能够进行到底，“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毛泽东同志的报告热情地歌颂了农民群众的创造能力，指出他们不但能打倒地主豪绅的政权，而且能在农会里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懂得“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报告详细描写他们在运动中的许多破天荒的创举，这些创举说明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以至于日常生活上，彻底摧毁了各种腐朽的制度，并建立了一系列崭新的制度。报告通过生动的事实，指明在对待农民运动问题上，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之间有着十分尖锐的斗争。不愿意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资产阶级，看见农民起来了，就表现惊惶失措。这些人对农民的态度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说他们是“糟得很”。代表着无产阶级革命者立场的毛泽东同志，则采取了和这完全相反的态度，欢呼农民运动的高涨，说这是“好得很”。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对农民的各部分又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称他们为“革命先锋”，把他们看做无产阶级领导农村革命的最主要的依靠。资产阶级的看法却相反，他们恶毒地把贫农的革命行动诬蔑为“痞子运动”。然而实践证明，真理在毛泽东同志方面，他的观点在以后中国农村革命运动中始终指示着正确的方向。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尖锐斗争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的思想常常影响无产阶级队伍里面一些立场不坚定的成员，在他们里面产生出投降主义的倾向。1927 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内所出现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

上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的表现。

陈独秀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没有树立起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胡适论战的过程中，陈独秀对于辩证唯物论和实用主义这两种根本相反的不可调和的哲学思想就没有分清界线，他甚至于希望这两种思想“合作一条联合战线”。陈独秀的笑脸并没有赢得坚决反共的胡适的青睐，他给陈独秀冷冷地碰了一个钉子，说：“这个希望是错误的。”（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在一系列的关于革命的根本问题上，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观点和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观点完全相反。还在1923年的时候，他就写文章否认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运动中应该争取领导权，说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不是独立的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他硬说资产阶级的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主张当时的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他尤其轻视农民，硬说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趋于保守”，“畏难苟安”，“难以加入革命运动”。陈独秀的这些观点都是主观主义的，片面的，他根本不了解当时中国工人农民的实际情形。他对资产阶级只看到他们可能参加民主革命的一面，而完全忽视了他们可能变为革命敌人的一面。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当时曾受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许多坚持无产阶级观点的同志们的反对和批评，但他利用他当时在党内的统治地位，压制工人农民的斗争，解除他们的武装，使党在资产阶级反动派的面前处于无戒备的状态，结果是1927年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把革命势力打败。而革命的失败，就完全暴露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但是中国共产党内既已产生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互结合起来的正

确思想，它就能够指导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使它由失败走向胜利，由胜利再走向胜利。

##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一）

1927 年革命的失败，使革命暂时进入低潮，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革命力量并没有被消灭。党转入农村，发动农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经过一年多曲折的、艰苦的战斗，在许多农村建立起小块的革命根据地，其中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井冈山地区的革命根据地，由于采取了适合于当时各方面情况的政策，更是比较稳定地逐步扩大和发展起来，并粉碎了反革命敌人的多次武装进攻。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的广大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就开始创造了一种崭新的革命斗争形式：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实行革命的武装割据，经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过程，逐步走向全国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在 1928 年到 1930 年间，毛泽东同志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有名的文章，科学地概括了这些新的经验。在这些文章中，他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全面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内外矛盾和它的主客观条件，明确地肯定了这一件新生事物——“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具有着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这些条件中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所包含着的各种矛盾的特殊性质：

它的“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使得白色政权间存在着长期的分裂和军阀战争，而这“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毛泽东同志指出，小块红色政权的存在，还必须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群众的民主革命运动，即土地斗争作为基础：“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 1926 和 1927 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全国革命形势正在继续发展，也是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下去的保证。除了这些客观条件之外，小块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两个主观的条件，即：“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和“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毛泽东同志在这些文章中，反复强调了军事斗争的重要，并提出“工农武装割据”这个新的概念，用来确切地指明当时出现的这种新的革命斗争形式的特点。“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毫无疑义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

并不是所有参加革命的同志，对于“小块红色政权”这种新

生事物的重要意义，都能够具有像毛泽东同志的那种高度的敏感和明确的认识，相反地，许多人对于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根据地的必要和可能是没有信心的，他们宁愿采用到处流动游击方法，而“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为着克服这些动摇倾向，毛泽东同志从理论上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一、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不但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然性；二、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是促进革命形势使之由低潮进到高潮的最好的方法。

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毛泽东同志全面指明了红色政权产生和发展的主客观条件，就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还进一步应用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即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因而就非常深入地和十分令人信服地解决了问题。他指出我们观察问题不应该只看到片面的现象，而要通过现象，进一步去看它的实质，新生的小块红色政权，表面上看来只是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做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这样，毛泽东同志在“工农武装割据”这个在当时还很弱小的新生事物的不可战胜性问题上，生动地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本质和现象的辩证法。

列宁曾根据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指出了一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并批判了否认这种可能

性的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列宁的这个原理的确立，不但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实践上为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首先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对于俄国革命的胜利及以后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红色政权的理论发现，对于中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胜利来说，也有类似列宁的情形。他依据半殖民地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情况，肯定了小块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驳倒了当时革命队伍中的动摇思想，因而给了革命以强大的鼓舞和正确的指导。

因此，很自然地，毛泽东同志在解决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就以苏联作为范例，来说明小块红色政权的建立具有着能够推动和促进全国革命高潮迅速来到的重大的作用。“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 （二）

毛泽东同志这个时期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更深入地结合起来，它的思想的正确性很快就在实践斗争中获得了辉煌的证明。1930 年到 1931 年很短的时间内，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在全世界许多主要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之下，对当时的革命根据地连续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围剿”。这些反动势力的进攻先后都被工农红军和根据地的人民彻底粉碎了。1932 年又来了更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由于周恩来、朱德同志

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方针，这次“围剿”也被粉碎了。这些胜利强烈地震撼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震动了全国和世界。

国民党反动统治者除了对工农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进行上述的军事“围剿”之外，又对它们统治的区域里——特别是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的进步文化界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宣传活动进行各种各样迫害，也就是所谓的文化“围剿”。被卷入这个文化“围剿”的反动进军的有大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机关的御用文人，也有陈独秀一派的共产主义的叛徒。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辩证唯物论哲学，攻击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革命运动，用一切谩骂的词汇来诋毁进步文化运动。他们攻击的武器有实用主义，有国民党宣传机关制造的法西斯思想，有无产阶级的叛徒们伪造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想等等。但他们的这些武器从根本上说来也并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实际上仍不外是已被驳倒过的臭名昭著的“国情论”。不同的是他们的队伍更加混乱，说法也就分歧错杂，甚至互相矛盾。例如：一些人直接配合着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意图，重复地弹起中国的“国情”是在于资本主义没有发展，不存在明显的阶级分化之类的老调，并以此为理由，硬说马克思主义不能适用于中国，适合中国的只有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而且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前的旧三民主义。另一些人（如陈独秀派）则说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不再需要民主革命，因此共产党领导工农进行民主革命是不适合情况的，是“流寇行动”，等等。进步的文化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百般迫害下对文化“围剿”给予了强有力的反击，鲁迅就是这一场战斗中的最英勇最明智的旗帜。正像军事“围剿”之被粉碎一样，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文化“围剿”也惨遭失败，因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能适用于中国，

不仅仅在理论上有充足的根据，而且在实践上已形成了不可动摇的事实。工农红军及新生的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已经高高地树立了“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逻辑混乱的谎言，即使有政治的压力作为后盾，也不能战胜被铁的事实支持着的科学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哲学的影响，在文化“围剿”的前面不是缩小了，而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空前迅速地扩大了。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论到当时的情形时这样说：“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又说：“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

（三）

中国革命人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粉碎两种“围剿”的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起来的正确指导思想的胜利，也是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工作中得到正确的应用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世界观——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胜利。

但是，这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之能够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贯彻，并不是顺利无阻，不需要经过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处在它的年轻时代，它的领导人和干部中能够善于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善于应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和解决各种实际工

作问题的人还很少。这就是为什么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能够在1927年前后取得统治地位的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克服了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广大革命人民继续前进，但在前进过程中，又遇到了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阻碍：第一次是1928年间的“盲动主义”错误；第二次是1930年上半年的立三路线错误；第三次是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教条主义者的错误。这些路线错误都在一系列的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违背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则，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指导思想，是在克服这些错误路线的过程中得到贯彻的。

第一次的“盲动主义”错误是由于忽视了当时的形势是处在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党的总任务不能是进攻的，而只能采取争取群众，积蓄力量的步骤。“盲动主义”的指导却采取了脱离群众的军事冒险主义的行动。党克服了“盲动主义”，然后在农村中建立起像井冈山那样的“小块的红色政权”，这些小块根据地打破了敌人的进攻，使自己发展和扩大起来。第二次的立三路线是在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有了初步发展的时候出现的，它否认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及与此相联系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它反对毛泽东同志在长时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正确思想，它误认为当时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并特别强调要首先在中心城市发动起来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党很快批判了立三路线的错误，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指导工农红军的战争中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使革命根据地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并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四次大规模“围剿”的伟大胜利。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比前两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的时间更长（从1931年到1934

年)，涉及的问题更广，对党对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害。特别是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一些教条主义者所组成的临时中央迁入江西根据地后，“左”倾路线的统治不但直接影响到根据地的经济和政治方面，而且扩大到军事方面，其恶果就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第五次“围剿”的失败，革命根据地的大部分的丧失。革命所遭受的这些挫折，在实践上再一次证明了教条主义领导的破产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正确性。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胜利地实现了伟大的军事行动——二万五千里长征，达到了红军北上抗日的目的，使受了挫折的革命力量又开始迅速发展起来。

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比立三路线更有系统和更发展了，它进一步顽固地否认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是否认由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南方发展而形成的北方落后于南方这个客观事实)，它仍然像立三路线一样错误地坚决否认经过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斗争来促进革命高潮这一个最正确的斗争方法，也就是不顾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情况，仍然死抱着把准备大城市武装起义作为中心任务的主观教条。除此而外，第三次“左”倾路线还表现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一系列的重大错误。而毛泽东同志则在与这些错误斗争中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思想。

在政治方面，主要问题是关于革命的性质和对待中间势力的政策即统一战线的问题。1927年陈独秀一派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把中国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误认为仅仅是一般的旧式的、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硬说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和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再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才能出现的事情。它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用一道万里长城隔开，

否认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应该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以便能够使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准备在民主革命获得胜利的时候，使革命立即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这个不断革命的原理。与此相反，“左”倾路线的观点却走到另一个极端：它虽然肯定了无产阶级应该争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肯定了在农村中应该依靠贫雇农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但却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混淆起来，主观地急于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整个地消灭资产阶级，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如果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只看见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一面，而看不见它的反动的与人民为敌的一面，对资产阶级只讲联合，否认斗争的必要；那么“左”倾路线的错误就在于只看见资产阶级的反动性方面，而看不见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里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对它只讲斗争，否认联合的可能。“左”倾路线的这些错误观点使他们忽视了统一战线即争取与各种中间势力建立联盟的政策。在农村土地革命运动中他们强调反对富农，不注意团结中农和保护富裕中农，在城市里则把民族资产阶级看做是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同样危险的敌人。他们不承认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和无产阶级、贫苦人民之间存在着可以争取和应该争取的中间派别，或第三派，甚至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最危险的敌人”。按照这种“左”的错误观点，无产阶级在领导革命斗争的行动中，就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争取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左”的错误，都使党和无产阶级脱离群众而便利了敌人。

毛泽东同志始终反对上述“左”倾路线错误。他在坚持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坚持发展工农武装的斗争中，同时依据对当时客观情况和实践经验的具体分析，明确地肯定了中国革命

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性质。他说:“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由于明确地认识了当时革命阶段的性质,因此在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中,就掌握了彻底民主革命的,同时又不超过这个革命阶段性质的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在依靠贫雇农来推翻地主阶级的时候,注意到“坚决地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待富农的多余土地所采取的原则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上)。实行了这样的方针,就使无产阶级在农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中,和最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建立起巩固的联盟,把他们团结到革命队伍方面来,少数富农也争取其采取中立的态度,这样就使革命的工农武装根据地在农村里获得了最广泛的群众支持,在与强大的反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过程中,不但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而且能够不断向前发展。

1927年国民党反革命政变后,不但原来暗藏在革命营垒内部的大资产阶级公开地露出了它的反动面目,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也在一个时期之内(主要是在1931年日本进攻东北即“九·一八”事变以前)附和着大资产阶级,幻想使蒋介石的政权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权。与他们有联系的军队也常常配合着蒋介石直系的军队向工农红军举行进攻。这个现象的存在,是使“左”倾路线的支持者把资产阶级整个地看做反动敌人的原因之一。但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会因为暂时的现象而忘记了把握事情的本

质，就在这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仍然明确地看到，并且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大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区别。他在论到1927年革命的失败时说道："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了打击。"（《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又说："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科学分析说明在最反动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和革命的工农民主力量之间，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这个中间的派别。这个中间派别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了革命，但在一定的时候又可以积极行动起来，和工农建立联盟。这种情形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就日益表现得明显：在民族危机前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城市小资产阶级纷纷卷入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反对卖国政府、挽救民族危亡的群众运动，甚至于反动的国民党营垒内部也逐渐发生分裂，部分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如马占山、蔡廷锴、冯玉祥先后举行了局部的抗日战争。

毛泽东同志在1935年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里，论到了这种情况，说："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表现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表现于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风头一时的抗日人物。这种情况，基本地说来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些情况的分析，指出为了克服民族危机，挽救中国的危亡，争取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有争取最大多数的中间势力和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

线的必要和可能。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之上，以后终于形成了包括蒋介石政权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这个统一战线，又成为保证八年抗日战争获得最后胜利的根本条件之一。

在军事方面，由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而这个武装斗争在很长的时期内，是在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之下进行的，并且经过了十分曲折和复杂的历程，因此军事问题曾是决定革命成败的一个问题，也是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之间形成尖锐斗争的一个中心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与各次错误路线斗争中，对这些问题给予了正确的解决，系统地树立起一整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与中国革命战争情况完全符合的军事路线，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以及其他有关著作。这些著作不只在军事方面，而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方面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在军事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观点与错误路线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

第一，在建军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观点是贯彻了历史唯物论的原则，即军队是一定社会阶级的政治工具，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建立一种与一切旧军队不同的、能够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的，为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和革命建设事业服务的崭新的军队。而错误路线则是违背了这些科学观点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红军开始建立的时期，就提出反对“单纯军事观点”。这个错误观点“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指导思想之一，也正是把红军的任务缩小为单纯的打仗一项。毛泽东同志指出红军的任务不应该只

限于打仗，而应该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等三项任务。所谓要做群众工作，就是要成为党和人民政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就是要帮助农村的人民群众分配土地（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减租减息），建立武装，建立人民政权以至于建立党的组织。军队担负起筹款的任务，就是要尽可能用军队自己的力量设法保证自己的供给，减轻群众的负担。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项任务发展为军队普遍进行生产，使得人民的军队和人民政权在敌人残酷“扫荡”的最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也在物质保证方面立于不败之地。在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些原则之下，工农红军就和农村广大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密切联系，并形成了与任何旧式军队都完全不同的真正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自己的军队。

第二，在作战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但是应用了，而且结合着军事问题直接地反复地阐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特别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这一个特点特别显著。在这本书里，毛泽东同志指出，正确的作战指挥首先必须依据于对战争的客观情况和战争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指挥员不但要了解战争的一般规律，而且要了解战争的特殊规律，特别是应该认识中国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别规律，又决定于中国革命的客观的特殊情况或特殊条件。战争的指挥员能够认识这些条件和规律，就有可能使作战获得胜利，这叫做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相符合。毛泽东同志强调要在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

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各次错误路线，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作战问题上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中国革命战争具有自己的特殊条件和由此而来的战争规律的特殊性。虽然工农红军是新生力量，它具有一定能够战胜内部矛盾重重、日趋没落的反动敌人的优越本质，但如果在实际作战问题上不善于运用具体的客观规律，也不能战胜敌人，相反地还要被敌人战败。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最重要的客观条件是敌强我弱，敌大我小，在这样的条件下，必须善于充分利用敌人的劣点和我的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因此在作战的时候，就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这个时期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必须把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正规军和游击队等民众武装结合起来，把武装的群众和非武装的群众结合起来，一句话，必须使战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在战略战术的应用上，由于敌人军力在总的方面居于优势，因此在战略上必须采取持久的防御的战略，采取“围剿”——反“围剿”不断反复的形式，必须遵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律，在反复打破“围剿”的过程中壮大工农红军的力量，而为要达到这一点，就不能把战略防御理解为单纯防御，而要在各个战役和战斗中善于回旋运动，诱敌深入，在敌人疲惫和分散的时候集中我方的优势兵力迅速对敌举行歼灭的进攻，把敌人各个击破。这叫做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的结合，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的结合，这是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在军事指挥上的最巧妙的发挥。由于在革命战争中正确应用了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同志就能够指导工农红军在

1930 年底到 1933 年间，前后粉碎了敌人四次由全世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兵力十倍于我的大规模“围剿”!

各次错误路线，都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第三次“左”倾路线尤为显著，它否认敌强我弱这个前提，否认革命战争必须是人民战争和必须以游击战争为主要形式等特点；它要求举行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它反对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要求战略上的速决战和战役上的持久战，反对诱敌深入的战术，要求“全线出击”等等。总之，它在作战问题上采取了主观主义的形式主义的非常笨拙的方法。这个“左”的路线在反动派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时候掌握了军事领导，结果是反“围剿”的失败，丧失了大部分的革命根据地。在 1935 年的遵义会议上，党对这个错误的军事路线给予了系统的批判，革命的军事领导权又回到毛泽东同志方面，其结果是：红军胜利地实现了以北上抗日为目的的长征任务，中国人民的革命武装力量在新的基础上又迅速发展起来。

（四）

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丰富的具体实践经验，这些丰富的实践经验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证明革命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指导就能够获得胜利，而一切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论右的或“左”的——都会把革命引向失败。在革命的指导问题上存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路线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军事方面，也表现在党的组织的领导方面，归根结底，这是反映在革命营垒内的阶级斗争和不同阶级的世界观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资产阶级影响之间的斗

争，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世界观之间的斗争。

中国是小资产阶级像汪洋大海一样大量存在的农业国家，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运动中比民族资产阶级具有更强的革命要求，但也有他们的弱点，那就是他们的动摇性和急躁性。他们的急躁性表现在过分急切地要求改变自己的地位，希望革命马上胜利，没有持久斗争的忍耐心，因而对于“左”的革命词句抱有很大兴趣。但是，在一定情况下，他们又会表现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因而倾向于追随在资产阶级后面，这就表现为右倾情绪。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后一种动摇性在党内思想上的反映，而三次“左”倾路线，则是小资产阶级的急躁情绪在党内的反映。

不论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错误路线，就哲学世界观方面来说，就其思想方法的特征来说，都是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都违反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原理。因此，为着要彻底克服这些错误倾向，不但要在政治上、军事上给予批判，而且还应该从哲学上来进行斗争，在方法论方面来把它从根子上加以摧毁。这样，不同政治路线的斗争，终于要引向哲学世界观方面的斗争。

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开始，毛泽东同志就不断地在他的文章中批判了党内的各种主观主义倾向，并针对着这些主观主义者，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马克思主义口号。1937年夏，毛泽东同志对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党内路线斗争的经验进行了哲学上的总结工作，写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重大贡献的著作。这两篇著作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列宁所奠定了的许多普遍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经验，系统地、细密地、深刻地阐发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并且从认识过程的规律性上，从思想方法上揭露了各种错误的根源。

《实践论》以鲜明的语言、生动的实例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认识不能离开实践，认识是在人类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首先是在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实践过程中“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发展的原理。《实践论》指出，人们在实践过程中第一步是获得外界的一些感觉经验的知识，即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只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它只能使人们认识事物的片面的、表面的现象。要认识事物的全面，事物的内部联系和本质，就必须在实践过程中使认识推移到高一级的阶段，就必须把感性认识阶段所获得的知识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上的改造制作工夫，形成一系列的概念、判断、推理的活动，也就是必须推移到理性认识阶段，才有可能达到目的，才有可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

《实践论》指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中间具有辩证的相互依赖关系：“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它批判了不懂得这个辩证关系，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互相割裂开来的错误倾向。首先是认识必须从经验开始，理性认识必须从感性认识发展而来。“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在这里，《实践论》从两方面揭露批判了这种唯心论者，一方面是学术上的哲学史上出现过的这种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

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在批判了学术上的这种唯心论者之后，《实践论》又从人们的实际生活方面揭露了这种唯心论者的错误：“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这一方面的揭露和批判在当时中国革命斗争中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为各次错误路线的有些代表者，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王明、博古等人，就是在认识论上犯了这样一种唯心论错误的。他们不研究中国的具体情况，不注意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尤其轻视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工农红军的成功经验；他们闭目塞听，不让自己接受这些宝贵的感性认识，只凭着在书本上断章取义地取得的某些个别原理，只凭自己主观上“想当然”就对革命的实际问题妄下判断，发号施令，这就不能不在实际工作中犯严重的错误。

《实践论》又指出认识虽然必须从感觉经验开始，但决不能停止于经验，还必须把认识加以深化，这就是要使感性认识发展为理性认识。违背了这个认识规律，就要犯另一方面的错误：“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在这里，《实践论》同样是不仅仅批判了哲学史上的、理论上的“经验论”，而且也揭露批判了实际生活、实际工作中的经验论者的错误，把这些人叫做“庸俗的事务主义家”。这些人的缺点就在于“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一方面的批判在中国革命运动中也有极大的实际意义，因为在各次错误路线出现的时候，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因为固执自己的经验，眼界狭小，不重视理论的思考，看不清事变的发展

规律和正确的行动方向，因而陷于主观主义的迷途，附和了错误路线。

《实践论》强调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达到思维，但同时又反复申述认识的过程并不是到思维为止。认识之所以必须达到思维，是因为要用思维去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对思维的正确性加以检验，从而使认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实践论》充分具体地展开了列宁关于“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一个认识辩证法的公式，并把它发展为这样一个公式：“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个公式指明了人的认识应该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永远无穷无尽地向前发展，因而任何停顿于已有的经验和现成的原理的观点都是狭隘的、片面的和荒谬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地广大的旧中国，集中着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复杂的阶级矛盾和其他矛盾。不但敌我之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和广大人民之间有着复杂的矛盾，敌人内部和人民内部也各有着复杂的矛盾。此外，人们和自然条件之间有各种矛盾，此一地区与彼一地区之间，也有着矛盾。这些复杂的矛盾在长期的人民斗争过程中，又发生多种多样的变化，要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必须善于观察、分析和采取正确的斗争形式来解决这种变化多端、错综复杂的矛盾。这种情况很自然地要求我们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时候，必须对唯物辩证法的规律，进行深入的钻研。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两次国内战争之后，毛泽东同志写成了《矛盾论》，回答了这一个历史的课题。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遗著。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里把对立统一学说称作辩证法的核心，并说到这必须

加以说明和发挥。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正是实现了列宁的这个遗志，把对立统一学说当做辩证法的核心，并从各方面详细地给予了说明和发挥。列宁说："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谈谈辩证法问题》)《矛盾论》从这个"实质"出发，指明了辩证法的主要任务所在："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矛盾论》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为我们系统地、深刻地阐明如何学会在科学研究和革命行动中善于把握辩证法，善于把握对事物的矛盾运动加以观察、分析和解决的方法。

《矛盾论》首先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并用特别多的篇幅来阐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它指出在我们观察和分析事物矛盾运动的时候，必须一方面注意到矛盾的普遍性或共性，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到每种矛盾自己的特殊性或个性，而对于矛盾的特殊性应给予更多的重视。它说："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矛盾论》从理论上也从实践上多方面地论证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的重要意义。在它论证到中国问题时就揭露了各种错误路线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根源，因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主导思想是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领导者的最明显的失足和他们之所以失足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只凭着书本上的某些一般原理就想来直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而丝毫也不注意中国革命运动中各种矛盾的具体特点。

《矛盾论》从以下几方面证明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第一，从科学本质上来看，"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认识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和认识之能否

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分不开的。第二，从人类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来看，“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因此，对本质的认识，也正是由特殊性的认识出发又回到特殊性的不断前进的过程，而特殊性的认识则是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的基础。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不懂得这个认识的辩证规律：“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第三，从解决矛盾的目的方面来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因此，要想对于一种矛盾找到正确解决的方法，如果不把握它的特殊性，而仅只是认识到它的普遍性，那是一定达不到目的的。解决矛盾的主要关键，在于把握矛盾的特殊性，这里就有着辩证法所要求的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原则。《矛盾论》批判教条主义者时，指出他们就是不懂得这个原则，说：“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

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能做得好的事弄得很坏。

前面说过，推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矛盾运动，是极其复杂和多变的，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的表现之一。对于这种复杂多变的矛盾，要怎样才能够正确地加以把握呢？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能够从那些复杂的矛盾运动中，把握主要矛盾的变化。《矛盾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经验，对于主要矛盾的问题作了相当详细的阐述，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上，显然有很重要的意义。《矛盾论》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事实上，在中国革命史上，能否把握主要矛盾的变化，也正是正确地指导路线和错误的指导路线的重要分歧点之一，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这一方面的错误更明显。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地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开始发生了变化。原来国内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从那时起，主要矛盾就逐步转化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民族矛盾。随着主要矛盾的转化，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民族资产阶级日益积极地行动起来，参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民族运动，国民党阵营发生了分裂，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从"九·一八"事变时期起，就进行了局部的抗日战争。国内外阶级关系的这种新的变化，要求革命的战略策略的指导也适应这个变化，要求争取和团结更广大的中间势力，把他们组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面。但是，"左"倾路线的代表者看不见这个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在1931—1934年他们掌握领导权期间，对

于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始终加以忽视或否认，形成了严重的关门主义，使自己远落于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之后。1935 年 1 月的遵义会议，在军事上批判了“左”倾路线。同年 12 月，毛泽东同志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对“九一八”以后中国国内外主要矛盾变化的情形作了系统的、精密的科学分析，彻底批判了“左”倾路线的错误，这样才使中国革命斗争完全走上了正确的轨道。这些历史的经验充分说明《矛盾论》关于主要矛盾的问题的提出，具有多么重大的实际意义。

《矛盾论》不仅在矛盾的特殊性和主要矛盾的问题上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而且在其他方面的问题上，如矛盾的主导方面的问题上，对立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上，都有精辟的发挥。《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结束和抗日战争将要开始的时候写成的，它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总结了以前的革命历史经验，从而又成为往后在思想方法上引导中国人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取得胜利的指路明灯。

## 四、抗日战争时期

### （一）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时期开始了。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早已进入了中国的长城。他们得意忘形地向南直侵，却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遇到了一座任何侵略军队也摧毁不了的“新的长城”，政治的长城，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从广大劳动群众一直到蒋介石国民党所代表的一

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包括在内的、范围广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正是这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穷凶极恶的敌人终于遭到了失败。这条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在民族危机前面各阶级力量发生了新的变化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观察和分析了国内外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关系的变化形势，并适应着这种形势而采取了恰当的解决矛盾的方法的结果。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敌，国内的某些矛盾，必须给予适当的解决，其原则是应当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增强和扩大，而不是使其削弱和缩小。在民主革命阶段内，国内阶级间、党派间、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可以而且应该停止那些不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国内战争，党派敌对，地方割据，一方面封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一方面暴动政策和不利于抗日的过高的经济要求等等），而保存那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批评的自由，党派的独立性，人民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的改善等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这些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赖以建立和巩固的根本原则。为着贯彻这些原则，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适合于新形势的仍然是民主革命性质的政策，如：改变了红军的名称；在根据地内停止没收地主土地，采取减租减息政策；在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同时，保留了自己批评的自由和党的组织的独立性；等等。

抗日战争开始了，参加抗战的每一个中国人民都渴望胜利。但是，前途怎样呢？中国人民能不能得到最后胜利？怎样才能争取最后胜利？这是迫切地需要得到回答的问题。各阶级人民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回答是不同的，因而在抗战营垒内就有各种不同的甚至于互相矛盾的意见。在这样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斗争中，不

容许长久存在纷歧错杂的看法。必须反驳各种错误意见，提出强有力的正确的回答，才能使全国人民在抗战中不致于因迷失方向而遭受失败，这是亿万人民胜败的关键问题，需要迅速给予解决。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将近一周年的时候所写的《论持久战》，就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时有些什么不同的看法呢？《论持久战》里清楚地说到了这一点："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得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们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乎费大气力。这些议论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说的，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现在好了，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

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用理论上的和实际生活上的无可辩驳的充足根据，既粉碎了"亡国论"，又对"速胜论"给予了说服性的批评，系统阐明了通过持久战和达到最后胜利的必然规律。

毛泽东同志的论证，是从中国矛盾的特殊性开始的。这个特殊性决定于中日两国的四种具体条件的对比：第一是，敌强我弱。这使我们不可能要求速胜。第二是，敌人进行的是"退步的和野

蛮的”能促进它的国内外矛盾日益增长的非正义战争，而我们所进行的则是进步的“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的正义战争。这是敌人必败的主要根据。第三是，敌是小国，我是大国。这使我能在强敌前面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是，敌人的非正义战争不可能得到国际上多数国家的援助，而我们的正义战争却必然能争取到国际上多数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援助。毛泽东同志从这四个决定中国矛盾特点的基本条件出发，做出了逻辑上的一系列的精确的结论。它首先证明了只有“持久战”是惟一正确的道路，如果坚持持久战，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得到最后胜利；而这最后胜利之一定可能得到，其“主要根据”就在于敌人的战争行动是非正义的、退步的、野蛮的，而我方的抗战则是正义的。

不但如此，《论持久战》还依据敌我矛盾的基本特点的分析，进一步估计了这个矛盾运动的发展趋势，预见到这个持久战过程中必须经过三个阶段中国才能得到最后胜利：第一个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第二个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时期”，或可以名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三个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或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毛泽东同志详细地描绘了在这三个阶段中敌我力量的变化情况，估计到敌人的力量必定要由优势转为劣势，我方的力量必然要由劣势转为优势，而最后终于使我取得反攻敌人实现胜利的条件。这些预见具有高度的科学准确性，它在后来八年抗战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说全部得到了证明。而在抗日战争初期这样明确地指出了胜利的道路，就大大地坚定了参加抗战的广大人民的信心，高度地鼓舞了他们的斗志。

《论持久战》还预见到抗日战争在战争形态上将要在“人类战

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即“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这个形态包含着错综复杂的各种形态的对立的统一性：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有后方作战和无后方作战，敌人的包围和我的反包围，敌人在形式上占领大块土地，我在敌后又占领许多小块土地，等等。在这里《论持久战》又根据抗日战争的新特点，进一步从各方面阐发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所曾经阐发过的军事的辩证规律。它论述到如何巧妙地应用“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的作战方法，论述到消耗战和歼灭战的对立和联系，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的联系和互相转化。它再一次强调指挥战争的人必须善于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通过人的自觉的努力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它指出在军事行动中必须力争自己的主动和使敌人陷入被动，才能避免失败和争取胜利，并指明什么是取得主动权的条件。此外，《论持久战》还论述了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兵民是胜利之本”，有关军事和政治的辩证关系的问题等。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的军事问题上，特别强调了游击战争的重要性，指出它在中国的战斗情形下不能仅只是一种补助的战术，而是要在战略上大规模使用的战争形式。他说：“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犬牙交错的抗日战争中必须在敌人后方广泛发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论持久战》之外，毛泽东同志还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阐明了游击战争的理论。一句话，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贯彻应用到

军事问题上，全面地揭示了抗日战争的规律性，因而就在空前错综复杂的战争形势中，为中国人民清楚地指出了争取最后胜利的道路。

（二）

在抗日战争时期，不但敌我之间的矛盾有其特殊性，就是在我方内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也有着特殊的、复杂的矛盾运动。如果不能够正确地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来正确地观察、分析和解决这方面的矛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巩固和发展，而对敌抗战也就难以制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虽然在基本上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性质，但是，由于中日矛盾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不但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抗日战争，就是一部分原来是反革命势力的地主买办阶级也进入了统一战线之内，这就使抗战营垒内的阶级关系显得较其他时期更为复杂，在抗战的过程中，这些阶级的矛盾运动使统一战线形成为三种势力的总合。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对这三种势力作了具体的分析：第一，顽固势力，即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他们中间的亲日派在抗战过程中先后投降了敌人，其余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一部分还能继续抗日，但其妥协性始终存在。“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还要团结国民党以外的各派势力对付日本，一面却极力摧残各派势力，尤其尽力摧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他们对共产党采取所谓“反共、限共、溶共”的政策，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曾发动过几次反共高潮。第二是中间派，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及地方实力派。这一派的各部分之间又有差别，中等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不但要求抗日，也要向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权力，因此他们可以参加民主运动；开明绅士指的是地主阶级的左翼，他们带有资产阶级色彩，政治态度和中等资产阶级大略相同，这两部分中间派都有可能和共产党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但害怕土地革命，地方实力派实际上是曾经割据一定地区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和国民党的中央势力有矛盾，他们在与顽固派斗争时能暂时采取中立，但不愿意建立民主政权。中间势力动摇于进步势力和顽固派之间，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第三是进步势力，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等势力在内。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内既然存在着这些复杂的矛盾关系，因此为着保证抗日阵线的巩固和发展，以利于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就必须找出适当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方法必须服从于解决主要矛盾的需要，即抗日战争胜利的需要，这样的方法，就其总的原则来说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里所说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进步势力是民主革命运动的主力，必须发展进步势力，才能够有力量防止妥协投降倾向，坚持抗战到底。争取中间势力也是很重要的，只有把动摇的中间势力争取靠拢到进步方面来，使顽固势力陷入孤立，才能使他们的倒退阴谋活动受到很大的阻力。争取中间势力，就是要对他们的抗日民主的进步要求给予鼓励，而对他们的动摇倾向和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幻想给予必要的批评教育。同时为着争取中间势力，又必须与顽固势力进行斗争，只有对顽固势力进行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斗争，对它的反共反进步的政策给予坚决的打击，才能使中间势力不至于向顽固势力的方向动摇。并保证进步势力的发展，保证革

命的基本力量巩固和壮大。同时又要注意到，对顽固势力的斗争，终归是统一战线内的斗争，因此对他们又不能只有斗争的一面，还应有团结合作的一面。尽管他们时时刻刻在准备向敌人妥协投降，但只要他们还没有成为事实上的投降派，就要尽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内，时间越长久越好。顽固派有两面政策，对顽固派也采取两面政策："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方面，顽固派又有两面性，我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结日寇和不积极反汪反汉奸等）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顽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因此我们的政策也有两面性，即在他们尚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在他们对我党和对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论政策》)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复杂矛盾运动的观察、分析和解决的问题上，是把列宁所说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这个辩证法的实质在实际工作和斗争中多方面地加以应用和发展了。

这个应用和发展特别显著地表现在对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揭露和针对着这个两面性而采取的正确的又团结又斗争的两面政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由于只看见资产阶级的进步一面，对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进行斗争，因而陷入右倾投降主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路线只看到资产阶级反动性一面，而看不见他们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对资产阶级只讲斗争不讲联合，又犯了另一方面的错误。抗战开始不久，曾经是"左"倾路线代表的王明，又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抗日积极性估计过高，忽视了它的反共反人民的一面，因

而又重演了一次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这些错误在阶级意识方面是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左右摇摆，在思想方法上反映着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反映着对于矛盾失去了全面分析的能力。由于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应用了辩证法，就先后克服了这些错误。

那么，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在政治上应该坚持什么方向呢？要建立怎样的政治制度才能够使中国向前进步呢？这也是当时中国广大的抗日人民要求回答的，同战争问题一样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范畴，把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一个阶段的革命性质和发展方向集中地作了科学的概括。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毛泽东同志指出，当前中国的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也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一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构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部分。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首先在于：旧式的民主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它的发展结果是资产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分子幻想中国革命的结果实现资产阶级专政。《新民主主义论》根据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帝国主义时期的客观规律，批驳了这种幻想，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新民主主义论》)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所建立起来的国家，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同上)以这样的阶级专政为内容的共和国，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所要求的“国体”，这样的“国体”，乃是广大人民共同享有的民主政权，和欧

美的那种“少数人可得而私”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根本不同的。这样的国体，要求与它相适合的“政体”——政权构成形式，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权形式，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同上)毛泽东同志说:“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同上)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还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仅仅只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它的结果仅仅是向资本主义发展，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必须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它的当前阶段还是属于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阶段，因此决不能把它和社会主义革命相混淆。《新民主主义论》批驳了那些“左倾空谈主义者”，指出他们想抹杀两个革命阶段的不同，妄谈什么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在实际上是想借此取消社会主义革命也取消新民主主义革命，来为顽固派的反人民的阴谋服务。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却也并没有隔着万里长城，它的胜利必然要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样，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就结合成为连续不断的两个革命步骤:“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同上)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在于抹杀了这两个革命阶段的连续发展关系，不在第一个革命阶段进行向第二个阶段发展的准备。为着要使民主革命有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就要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从思想方面来说，就必须要坚持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新民主主义论》驳斥了那些顽固派的狡辩。他们说共产党既然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到后一阶段，就应该把共产主义也暂时收起。《新民主主义论》指

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应该是中国革命的一贯的指导思想。"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同上)只有在民主革命阶段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导，革命才不会停顿下来，才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论》不仅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方面，还阐明了这个革命的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它在阐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关系时具体应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存在和意识的"能动的反映论"的基本观点："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正如新民主主义政治是在民主主义中包含着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因素——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一样，作为它的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虽然还不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还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度之下的发展，还容许在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之后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甚至富农经济也容许其存在，但在这里面已开始有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因素，这些因素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等。至于反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并为后者服务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则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而不应该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那种资本主义文化，这样的文化虽然不完全就是社会主义的文化，但它不能离开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指导，因此也就包含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因素。而且，这个社会主义的因素，

和在政治、经济的领域一样，还“不是普遍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党用自己的政治路线和作为政治路线的重要部分的武装斗争路线来指导革命的政治斗争（主要表现在统一战线上）和武装斗争。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不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都不可能获得胜利，所以，党的建设问题，是革命运动的根本问题之一。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毛泽东同志说：“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自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毛泽东同志在其一系列的政治方面的著作中就正确地解决了统一战线问题。即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之上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问题。在武装斗争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也贡献了一系列关于军事科学的理论著作。同样，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理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卓有成效地加以应用和发展了，而其集中的表现，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第一次在全党范围内举行的整风运动。

旧中国是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的农业大国，中国的革命运动又是长期地以农村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因此，党员的成分，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也有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在这样的情形下，要建立起一个全国范围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否有可能呢？如果可能，要采取什么方法才能够实现呢？有一些“唯成分论”者，认为要建立

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依靠绝大多数党员是出自无产阶级成分。这样，在事实上他们就否认了在中国，特别是在长期农村武装斗争环境中有建立全国范围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可能。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也就不可能了，因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是通过它的党来实现的。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肯定了在中国这样的革命斗争条件下建立全国范围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可能性，而且开辟了建立这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明确的道路。这条道路的中心环节就是从思想上建党，就是在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对党内存在着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不断地加以揭露和批判。使党员们经过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以求得党内思想的一致，并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实现政治上、组织上的一致。

早在工农红军创立的初期，毛泽东同志就应用思想建党的方法卓有成效地在红军中组织起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伍，形成了它的领导核心，使红军成为广大工农自己的无敌的武装力量。他在 1929 年为红军第四军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那时所创造的整党建党的纲领。这篇文章分析了当时党内存在着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其中包括“极端民主化”思想，“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指出这些错误思想的根源是由于在农村革命环境中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所构成，而这些思想正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各方面的反映。文章还指出了由旧军队成分带来的单纯军事观点和反映流氓成分的流寇思想等，并详细规定了如何经过批评教育及其他措施来纠正上述种种错误思想的方法。

在思想建党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的突出的贡献，就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教育，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教育，放在思想建党的首要地位。他在 1937 年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把党内思想斗争的经验提到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来加以总结，指出一切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就在于不能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辩证唯物论，而是离开了辩证唯物论。这两篇著作不仅仅是哲学著作，而且也是后来全党整风的理论基础。在 1942 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为了指导这个运动，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报告，这些报告继续发展了《实践论》、《矛盾论》的一些基本思想。《改造我们的学习》第一次指出了党的发展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历史，而一切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就其思想的根本特征来说，都表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脱节，也就是不能够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来正确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就是在实际工作中陷入了唯心主义，陷入了主观主义。毛泽东同志对党内的这种主观主义错误提出了最尖锐的批判，深刻地指出，能否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能否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辩证唯物论观点的问题乃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问题。他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该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整顿党的作风》把建党的问题集中为三个方面。学风、党风和文风。这个报告强调要建立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首先就要建立正确的学风，也就是要建立正确的党的思想作风，这个正确的作风就是理论与实际联系，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互相结合。为着这个目的，就要反对主观主义的错误作风，这个报告第一次概括了历史上的错误作风的两种形式，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并分析了这两种错误思想在认识论上的片面性：教条主义是由于只有一些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而脱离了实际，经验主义是由于有了一些经验和局部的感性知识但缺乏理论知识或普遍知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因此，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克服这两种片面性：“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除了正确的思想作风之外，为要建立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还必须树立正确的党风，也就是党在组织关系上的正确的作风。这个正确的作风，包括党内和党外两方面。就党内来说，就是要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就是要巩固“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就党外来说，就是要善于团结全国人民，就是要使党成为密切联系广大群众的党。为着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反对各种宗派主义。因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毛泽东同志指出宗派主义的思想基础也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主

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如果不要主观主义，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

《反对党八股》专门论述了党的文风的问题，这就是党的工作表现形式问题。正确的形式就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中国特点的形式，就是民族化的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党八股是与这种正确的作风和气派相反的，它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是一种空洞无物的形式主义作风。“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所以必须反对党八股，才能使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整风运动就是通过党员群众的学习运动，通过党内批评的运动，来提高和巩固党的强有力的建党方法。在整风运动中，首先学习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和参考文件，然后展开群众性的讨论。在讨论中，即以所学的理论作为武器，对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进行检查和批判，指出错误的根源和克服错误的方法。这样经过党内的批评和斗争，就使全党在正确的思想基础上达到团结一致。整风运动中对错误的批评是遵循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循着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团结的辩证法原则。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使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它的伟大的成效就在于使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在以后短短几年的时间之内，克服了无比的艰苦和困难，既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又取得了人民解放

战争的全国性胜利。

整风运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思想在中国具体实践中的发展，它的特点就是把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原则（也就是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根本原则）当做了改造党员思想和整顿党的最根本的原则。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不只在整顿党的学风的问题上应用了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原理，并且在整顿党风的问题上，在贯彻领导与群众联系的问题上，也应用并进一步发展了《实践论》里所阐明的认识论原理。在整风期间，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就是从认识论上深刻地解决了领导联系群众的问题。这个原则的内容是：凡属正确的领导，其用以领导群众的政策、方针、计划等等，都不应该是纯凭少数领导者主观的想法任意决定的，不是单凭书本上引用来的片言只字或领导者个人的经验来决定的，而应该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之下，反复不断地从广大群众的意见中集中起来的。这个反复不断地集中的过程，也就是通过实践不断地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论认识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论到这个过程时说：“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里还提出了正确的领导必使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结合起来的辩证法原则。“任何工作任务，如

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

上面所说的一切告诉我们，整风运动之所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思想的发展，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把建党的根本深深地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础之上。

**（四）**

在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在解决当时文艺界存在的根本性的问题中，天才地阐明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和美学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中一篇杰出的作品。它把党的整风运动推广到文艺界，在文艺界推动起一次最深刻的思想革命运动，使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同时，在党的整风运动中，这篇著作也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文艺运动，就其主流来说，始终是处于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党的指引和影响之下，坚决地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条重要战线。这个运动是有显著成绩的，是和中国革命的总的方向相一致的。然而这个运动还存在着历史性的弱点，一些根本性问题，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集中到一个根本问题上，即革命文艺和劳动群众结合问题。

中国的进步作家大半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口头上也赞成文艺应该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服务，但是他们

熟悉的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写作的内容是他们，写作的对象也是他们。他们的头脑里有许多个人主义思想，以及抽象的“人性”、“人类爱”之类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客观现实缺乏阶级分析的能力。当他们有时在自己的作品里描写工农的时候，常常是衣服像工农，而面孔和头脑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抗日战争以前，革命文艺主要在城市中发展，那时这个问题已经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界代表如鲁迅、郭沫若、周扬，已对这种矛盾现象进行过一些揭露和批判的工作，但由于当时反动统治下的各种条件的限制，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的进步文艺工作者进入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接触了广大工农群众和工农干部，这个矛盾就显得特别尖锐，迫切地需要彻底解决了。

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广大文艺工作者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和延安的文艺界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进行了几天的座谈会之后，就发表了这篇总结性的讲话。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口头上也抽象地讲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但是什么是我们应该为之服务的人民大众，这在实际上他们是不清楚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大众就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首先是工人，第二是农民，第三是作为革命战争主力的武装了的工农，即兵士，第四是城市小资产阶级。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

“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

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了一个了解和熟悉他们的问题，就需要作家们的感情来一个变化。毛泽东同志说：“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又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同志把这叫做感情的“由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变化。他指出，这种立场问题、感情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甚至痛苦的磨炼过程，但是他认为，必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为了使文艺作品能够很好地为工农兵服务，深刻地真实地反映生活，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因为，在他看来，生活是文化艺术的惟一源泉。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深刻地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论反映论的观点。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指出了文艺和生活的关系的问题，并严格地按照历史唯物论和“能动的反映论”的原则来加以解决：“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

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但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生活虽然是文学艺术的源泉，还不是文学艺术本身，还必须有作家的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天才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他指出，生活和艺术“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遍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往往把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摆得不恰当，往往强调艺术而忽略政治。因此，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对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是没有的。正确的关系应该是“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

不仅在整个革命事业中存在着政治和艺术的关系问题，而且在文艺作品中也存在着这种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而任何阶级总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

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当然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作品，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而又愈带艺术性的作品，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该排斥。他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毛泽东同志在对一系列文艺工作中的问题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决以后，把问题归结到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的根本问题上。他指出文艺界需要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来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为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规定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给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中国的文艺工作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经过整风运动，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的面貌，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讲话对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艺工作也起了强有力的指导作用。

（五）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长期的、分散的游击战争，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处的情况尤其艰苦，一方面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空前残酷的反复"扫荡"，另一方面还要对付蒋介石国民党所挑起的几次反共高潮和军事进攻；经济上受到长期的封锁，得不到外部的物质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要想支持这样长期的分散的游击战，使革命势力由劣势转为优势，一直到取得胜利，是绝对不可能的。在这里，

又必须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观察和分析在这种困难条件下的经济矛盾运动，把握它的发展规律，用来指导实际工作，才能使革命人民立于不败之地，逐步战胜敌人。

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非常注意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他批判了有些同志的片面观点，他们在一切应服从于战争这个正确口号下面，忽视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说："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如何进行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这个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展生产的群众运动中获得了全面的解决。指导这个生产运动的，首先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基础，是经济决定财政这个客观的规律。毛泽东同志批评了某些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的错误，说："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这些经费，都是由人民的赋税及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自己的生产来解决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由于根据地的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人民政权，而不是像国民党统治区的那种寄生者的腐败政权，因此就是在最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也能开展强有力的群众性的生产运动。首先

是军队，机关干部和学校自己动手进行自给性的生产运动，在这方面的生产运动的基础上，建立了公营经济，减轻了人民的赋税负担，增强了军队、政府和人民的联系和团结。曾经有人反对这种生产运动，说它违背了军队、政府和人民的分工，是落后的方法。实际上这种反对者恰恰是不懂得生活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说："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我们就用这些办法战胜了困难。"（同上）又说："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在形式上，我们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但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国家贫困、国家分裂（这些都是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所造成的罪恶结果）以及分散的长期的人民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是进步的了。"（《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在根据地人民群众中开展生产运动，也具有它的优越条件，这就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封建生产关系已发生了变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实行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因为要团结一部分地主阶级共同抗日，改成了改良性质的减租减息政策，但就是这样的政策，在根据地人民政府认真地执行的情况下（当时国民党政府虽然也在形式上提出过减租政策，但根本没有见诸实行），也大大提高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生产运动的发展。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再组织农民实行合作互助，就能够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多。毛泽东同志说："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和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们就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减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提高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已得了华北华中各地的材料，这些材料都说：减

租之后，农民生产兴趣大增，愿意组织如同我们这里的变工队一样的互助团体，三个人的劳动效果抵过四个人。如果是这样，九千万人就可以抵过一亿二千万人。还有两个人抵过三个人的。”（《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是当时各项政策的中心环节，前者使我们在思想上立于不败之地，后者使我们在物质上立于不败之地。“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论军队自给生产，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所以，抗日战争时期的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分别地成为当时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的决定性环节，它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不仅仅支持了当时的艰苦斗争，而且也为后来的全国胜利奠定了强有力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基础。

（六）

作为顽固派代表的蒋介石国民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除了最初的几个月内对日本帝国主义多少有所抵抗之外，一直对抗战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消极态度。他们把主要力量用来进行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妄想通过军事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压力，在抗日战争过程中，逐步消灭共产党，实现国民党的法西斯一党专政。国民党的这种反动政策使得日本帝国主义者有可能把自己的和汉奸的军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数量集中起来，进攻抗日人民的根据地，而中国共产党就不能不领导全国人民，在两面夹攻中斗争：一方面，要粉碎敌人的残酷“扫荡”，另一方面，还要不断

地对统一战线阵营内的蒋介石国民党，不断地进行各方面的尖锐斗争，其中也包括思想方面的尖锐斗争。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就经过戴季陶之手为自己制造了一套反共反人民的思想体系，这是以前就论述过的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国民党反动派已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掌握了政权，他们在政权组织上开始学习德意法西斯国家，建立特务统治机构，而在思想方面逐步试图制造一种适合于自己的统治需要的封建买办性的法西斯思想体系。他们所用的手法，仍然是把孙中山思想中的消极的反动的成分加以利用夸大，并使它和统治过旧封建中国的孔孟的学说，特别是所谓“中庸”的思想结合起来。

国民党法西斯谬论的制造机关有两个中心：一个中心是在国民党党部组织系统的特务机关里，其代表是陈立夫，他学习了帝国主义国家反动哲学家假装站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之上的狡猾伎俩，使用了一个叫做“唯生论”的招牌，利用孙中山著作中的“生元”这个名词，牵强附会地硬说这就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孙中山使用生元这个名词，只是想用它来代替“细胞”这个名词，根本没有把它当做宇宙本原的意思）。这样的说教在实质上仍然是一种唯心论，即物活论。他把这种唯心论和“中庸”的思想相结合，并把中庸解释成“安分守位”的意思，于是做出一系列荒谬的推论：宇宙万物似乎都是在各自的地位上永远保持一种“安分守位”的情况，而一个国家里的人民也就应该遵守他所臆造出来的这个宇宙大法，在自己的地位上“安分守位”，而不应有改变地位的非分妄想。这样就有了一套为法西斯统治辩护的说教。

另一个中心是在军事系统的特务机关里，这里是直接在蒋介石的名义下标榜一套所谓的“力行哲学”。这一套法西斯说教的中

心思想是在于要求人们对蒋介石这个“领袖”采取迷信和盲从态度。它首先利用和曲解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的弱点，强调由于“知难”的缘故，似乎只有少数领袖人物才能成为“先知先觉”者，而一般人则只是“不知不觉的阿斗”，对于后者知是很难的事情，而行则是容易的事情，因此他们好像就不必一定要去求知，只要盲目地跟着“领袖”去“力行”就够了！“力行哲学”还利用了“中庸”里孟子的“不诚无物”的唯心论观点，要求人们诚心诚意地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者贡献一切，牺牲一切！这是公开宣传迷信和盲从的极端反动的愚民哲学。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一方面积极从事反共反人民的政治和军事的阴谋活动，一方面在它的统治区里通过各种宣传措施极力散布这些御制的法西斯胡说，由于所谓“力行哲学”是和蒋介石的名字直接相联系的，因此它终于被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当做了更为正式的御用哲学。1943年，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包括对解放区根据地的军事大进攻）的前夜，国民党出版的由蒋介石自己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集中了国民党反动派历年来所宣传的一切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买办法西斯观点，其中也包含了所谓“力行哲学”的唯心论胡说。这本书被当时国民党统治者当做圣经，强迫它统治下的军政机关学校人员以及其他群众普遍阅读，在报纸杂志上大事宣扬，企图以此在思想上来配合军事政治方面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进攻。这样就造成了一次全面的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不能不领导抗日根据地及其他地区的革命人民，对他们的这些反动行为从各方面给予坚决的回击，一方面有力地粉碎了他们的军事和政治的进攻，一方面对《中国之命运》里的反动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参加这次斗争的其中有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范文澜、吕振羽等许多

人。他们在所写的许多批判论文中，指出了《中国之命运》的这些极端反动的观点：1. 它的民族投降主义的观点。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而它的主要内容不是谈论如何准备反攻民族敌人，配合盟国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而是强调要在国内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这就暴露了它的对敌妥协投降，对内反共反人民的阴谋企图；2. 它用法西斯种族主义的观点歪曲中国的历史，把中国的一切民族都说成是只有由一个“宗族”所构成，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它还对旧中国的封建时代的统治秩序大肆宣传，把它称作“黄金时代”，露骨地表现了它的复古的观点；3. 它反对近代中国的一切进步思潮，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反对“自由主义”，而所谓“自由主义”就是指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就露骨地表明它赞成法西斯思想；4. 它把攻击的主要锋芒指向领导广大人民坚决进行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共产党，并且狂妄地声言要决心“二年决定命运”，也就是在二年之内妄想消灭共产党；5. 它的哲学思想是宣扬迷信和盲从的，极端荒谬绝伦的唯心主义的愚民哲学。

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反共反人民的阴谋全部破产了，不但军事政治上的三次反共高潮都先后被人民所粉碎，思想上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哲学上的反动宣传也完全垮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人民的力量在反对民族敌人和反动派的进攻中不断成长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无产阶级世界观也在战争中间日益广泛地深入人心。反动派要想按照自己的意图来解决“中国之命运”，想把中国拖向后退，退回黑暗专制的时日，中国广大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坚决反对这样来解决“中国之命运”，他们要求的是与此完全相反的另外一种“中国之命运”。

1945 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广大人民的愿望。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

报告，并且以《两个中国之命运》的题目作为开幕词。他说："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又说："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希望是要求实现前一种的"中国之命运"，这个希望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这个可能性的客观条件已经在抗日战争中相当完备地形成了，这就是：

"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

第三，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

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

毛泽东同志又指出，为要实现中国人民的希望，在有了上述有利的客观条件之外，还要在主观上有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就是与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针锋相对的另一本关于中国之命运的书，它对抗战胜利前夜的形势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对前者的一切反动思想最后给予了毁灭性的批判，明确指示了中国的光明的前途，并全

面规定了走向这个前途的正确的纲领和政策。在这些正确的纲领、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利用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立即领导中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经过四年短短的时间，就推翻了美帝国主义者所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取得全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所希望的光明的“中国之命运”。

# 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些意见

(1957)

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想通过百家争鸣、自由争辩的方式来解决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向问题。会上提出的具体问题是很多的，在我的短短发言中要把所有的具体问题都一一谈到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只想对其中的一个问题发表些个人的意见。这问题就是：“研究中国哲学史总的方向是什么？”

我们大家都会同意，研究中国哲学史，也必须像研究中国其他问题一样，应该遵照毛主席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针。运用这一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能把丰富多彩的我国哲学特点鲜明地表述出来，另一方面在表现我国哲学特点的同时又不能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在许多人的发言中都表示承认，至少在主观上都愿意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去研究、整理中国哲学史。但在工作中如何正确地贯彻这一原则就不是那样容易的了。这里，往往发生两种偏向：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简单化，教条主义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演绎出中国哲学史，用抽象的公式硬套；二、过分地夸大中国哲学史的特点，忘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前者的错误，其结果就是不能充分地表述出中国哲学史的特点，后者的错误则是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现在，我想就中国哲学史的继承性问题来谈谈我的意见。

怎样了解哲学史的继承性问题？我想大家可以把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说到文化遗产的继承性的观点作为参考。他指出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过去文化遗产的态度是取其精华，除其糟粕。什么是精华？精华就是过去遗产中有民主性、科学性与大众性（人民性）的东西。什么是糟粕？糟粕是那些反民主的、反科学与反人民（贵族性）的东西。我们要建立的文化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和大众性的文化，因此我们所要继承的就是旧文化中那些有民主性、科学性与大众性的东西，而要抛弃那些反民主、反科学、反人民的东西，这应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所有文化遗产的一般态度。这是一个普遍原理，对待中国哲学史也需要注意这个原理。

冯友兰先生提出的关于继承中国哲学遗产问题的意见是违背这个原理的。照他的看法我们要继承的是过去哲学的各项命题中的一般意义、抽象意义，好像只有命题的这一方面才是精华，而过去哲学命题中的特殊意义、具体意义则是糟粕，我们如把精华与糟粕作这样的规定是错误的。这错误就在于他把抽象的东西看做具有实在性的、永久性的东西，而具体的东西则是暂时的、不实在的东西。如果有人从相反的方向提出意见，说真正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只是具体的东西，而不是抽象的东西，并且用这个意见和冯先生争论起来，那么这样的争论就恰恰和西欧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很相像，而冯先生的意见倒是和实在论的唯心主义观点一致的了。因此有人指出冯先生今天还没有完全摆脱他往日“新理学”时期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我看是有道理的。

所以，关于继承哲学遗产的问题，我们不能同意冯先生的主张。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所说的那些原则，正确地分清精华与糟

粕，分清什么应该肯定和继承，什么应该加以否定和抛弃。就一般的文化问题来说，我们要肯定的是有民主性、科学性与大众性的东西，而不是冯先生所说的具有一般性与抽象性的东西；我们要否定的是反民主、非科学、反大众化的东西，也不是冯先生所说的什么特殊的具体的东西。精华与糟粕之分有一个标准：就是毛主席提出的那个标准，而不是以抽象性和具体性的区别作为标准。

现在更具体地就对待哲学遗产的问题来说一说。我们继承哲学遗产是有自己的立场的，这就是要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辩证唯物主义指明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萌芽、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全部哲学发展的总的趋向，我们必须从这一观点出发来看待继承问题。不论是对过去的唯心论，还是唯物论都必须这样看待。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在过去全部哲学遗产中所要肯定的东西就是其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我们所要否定的就是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凡是历史上的哲学家，不论他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只要在他的思想中有些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因素，那就和辩证唯物主义具有继承关系，而其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面，就是我们要通过批判加以抛弃的。例如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而否定了他的唯心论。他从费尔巴哈那里吸取来的是唯物主义而抛弃了其形而上学与宗教伦理的唯心主义杂质。

如果像冯先生所说凡是哲学命题的一般的意义都可以继承了，这是不对的。并且，我们应该注意到，凡是哲学的命题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最一般的命题，都是对世界的一切具体事物的最高概括，如果从这方面来看，那么照冯先生的标准来说，任何哲学命题都可以加以肯定和继承了，其结果就会完全抹煞和掩

盖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

为了说明我在上面所说的观点，我想举个例子来解释一下。

就用冯先生所谈到过的“学而时习之”这句话来说吧，冯先生认为这句话有可以继承的东西，我也同意这句话有可以肯定的东西。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之所以有值得肯定的东西，并不是因为它具有抽象意义，而是因为它具有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因素。因为它指明人的认识要通过学习才能获得，不是直接由人的头脑里凭空自生的，也不是由神的启示或对于宇宙精神的神秘的直觉产生的，这个命题的意义和孔子的另一个命题——“生而知之”的命题正相反对。很明显，我们应该肯定“学而时习之”的命题，否定“生而知之”的命题。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并不是由于前者的抽象意义和后者的具体意义，而是由于前者具有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因素，后者是一个纯粹唯心主义的命题。

我们还应该注意：抽象和具体是不能够机械分开的，一个命题的抽象的一般的意义如果是值得肯定的，那么，它的具体应用或具体意义，以某一方面来说，也是值得肯定的。冯先生说孔子的“学而时习之”的命题的具体意义是要人学习封建道德，所以我们不能加以继承。当然，我们是反对封建道德的，因此也不会同意孔子所说的学习的内容，从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对于“学而时习之”这个命题的具体意义要加以否定，但是，如果我们是从哲学上，从认识论方面来看问题，那么，我们又应该肯定，即使是封建道德的知识，也要通过学习的过程才能够获得的。“生而知之”封建伦理学家是任何时代也不存在的。所以，由于“学习”这个认识论的范畴在一般的、“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所以它的具体应用任何时候也是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固然要通过学习，封建道德也同样要通过学习。冯先生的提法把哲学命题的一般意

义和具体意义机械地加以分割，这是违反辩证法原则的。

所以我们对于哲学遗产的肯定与继承的标准，并不在于命题的抽象与具体之分，而是要看它的内容是否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待过去的哲学家，不论他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只要在他们的思想中有某些合理的因素即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因素，我们都对他们的思想的这个方面采取肯定的态度，但对于他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面则一定要坚决地加以否定。这就是批判地继承过去哲学遗产的基本原则。

不过这里应提到一点：我们对唯物主义者的批判继承和对唯心主义的批判继承是有区别的，不能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我们首先是继承了过去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的传统，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对于过去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某个认识的合理因素批判地加以肯定。我们认为过去唯物主义哲学，尽管有它的幼稚的（古代）或片面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毛病，它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而唯心主义哲学，不管它的形式多么精巧，内容多么丰富（如黑格尔哲学），但它对于世界的理解，根本上是颠倒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任何时候也不能加以抹煞，对于唯心主义哲学的任何合理的内容，都必须首先对它的颠倒的理解加以批判之后，才能说得到继承、改造和发展。

（原载《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 哲学要为实际工作服务

（1958.4）

去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里曾指出："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这里讲的虽然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任务，但是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哲学工作者的最根本的任务。我们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人，无论他们的具体分工是在哪一部门，无论他们是研究辩证唯物论本身还是研究哲学史、逻辑学等等，都应该把"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这个"迫切问题"的解决当做自己一切研究工作的终极目标，把这个目标作为我们向前跃进的灯塔。哲学研究工作要"厚今薄古"。在"厚今"方面，就是特别要"厚"当前社会各方面的实际工作这个"今"，"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今"。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曾提到哲学应该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提到理论掌握群众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论哲学不是为着任何其他目的，而只是为着正确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各种实际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不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就会产生片面性和主观主义，就会使思想僵化和脱离实际，不善于对事物作恰当的分析，就会犯修正主义或者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以来一百多年

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无产阶级和它的党，需要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应用辩证唯物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技术革命过程中轰轰烈烈地不断地向前跃进着的广大人民，需要在自己的实际斗争中应用辩证唯物论。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人，如果不能帮助无产阶级和它的党满足这个迫切需要、不能帮助广大人民满足这个迫切需要，那么他们就会严重地失职，因为他们使自己的研究脱离了实际工作，使自己的研究成为完全没有意义的活动。从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双反运动的观点来说，这就是最大的浪费，包括人在精神上的浪费和出版界在物质上的浪费。

只有把哲学研究经常指向实际工作的需要这一目标，这样的研究工作才有真正的生命，才能使辩证唯物论哲学得到生动的解释和发挥。辩证唯物论哲学本身的发展，从来都是在它的实际应用过程中获得的。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到一个新阶段，就因为这部著作解决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反对修正主义（它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这一个当时迫切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应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和总结几十年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正确解决了由于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所产生的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实际问题，这就在哲学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它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得到了新的发挥。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之下，各地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中，已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不但有很多实际工作经验，而且也能够很好地应用辩证唯物论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因此他们就能够和广大工农群众一起，共同在工作中创造出卓越的成绩来。目前中国工农业以及各

方面工作所表现的突飞猛进的形势，不但说明中央领导的正确，也说明我们已经有很多干部能够在工作中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报纸上已发表过的一些地方工作的总结，如湖北省委会关于光化县和均县兴修水利的报告，湖北省委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天津地委书记赵克同志关于改造洼地的报告，等等，就不难看出，这些报告正是辩证唯物论哲学原理和实际工作互相结合的生动范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许多哲学的“外行”，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能力，比起那长期地只是在书房里做研究工作的“专家”、“内行”来，不知要强过多少倍。

这样的情形说明，我们专门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人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向前跃进，才能担负起自己的工作任务。哲学研究工作者的总的任务，应该是帮助实际工作中的干部更好地应用辩证唯物论，是在广大人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但是，在目前，我们许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人们，首先还要向那些在实际工作中的干部学习，要在广大人民的轰轰烈烈的斗争中去学习，然后才有可能对上述的任务做出真正有益的贡献。

研究哲学史的人是否也应该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辩证唯物论的问题呢？答复是完全肯定的。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并不是要使我们的思想沉没在过去的时代，而只是为着要从过去的哲学思想斗争中、从过去唯物论和唯心论的长期的历史斗争中吸取某些经验教训，以便帮助我们在今天更好地掌握辩证唯物论和更善于和唯心论进行斗争。不能让过去拖住现在，而应该让过去为现在服务。因此，研究哲学史的人，也仍然要注意和研究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辩证唯物论的问题。并且，也只有经常注意和研究这个“今”的问题，对于哲学史的许多“古”的问题才容易获得正确的

理解。举例来说，我们有些哲学家不肯承认哲学史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敌对党派斗争的历史，他们硬要说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关系是兄弟、朋友和师生的关系。如果他们认真研究一下中国最近几十年来革命的实际斗争中间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曾进行过如何激烈的斗争，那么他们那一套观点就根本拿不出来了。在实际工作中的唯心论——主观主义，曾经在我们革命的历史上造成非常大的损失。为了克服主观主义，把唯物论的观点应用到革命的实际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曾经付出了很多人的生命作为代价的。所以，唯心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这是毛泽东同志的结论。马克思有这样的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在下等动物身上所透露的高等动物的征象，反而只有在已经认识了高等动物之后才能理解。”要正确地理解过去哲学史上的斗争经验，就必须认真研究今天的哲学思想斗争，特别是研究实际工作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

关于逻辑研究工作的问题，我以为，逻辑的研究也必须注意到和实际工作的联系。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曾论到概念、判断和推理在人们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过程。目前，逻辑的研究工作中有一种离开实践过程专门研究纯粹的逻辑形式的倾向，这是必须克服的唯心主义路线。中国人民需要我们的逻辑学家能够帮助解决这样的问题：如何对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所提出的问题做出明确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我认为，解决这样的问题，是逻辑研究工作跃进的关键。

根据以上的理由，可以肯定，我们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人，应该毫无例外地把“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辩证唯物论”这个问题的解

决，当做我们努力的总的方向。为要能够沿着这个正确的方向向前跃进，我们必须注意哪些问题呢？

首先是，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要向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学习，要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中学习。在这一方面，每天报纸上的许多重要的报告和新闻，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间接的学习材料，值得我们经常地认真研究。除此而外，我们还应该争取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们建立联系，直接从他们中间取得帮助。只有首先向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们学习，然后才有可能对于所学到的东西进行理论上的加工，在哲学上提出某些有益的意见，反过来对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们给予帮助。

要学游泳必须下水。哲学研究工作者应该在自己规划中，争取安排一定的时间去直接接触实际，并且对其中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具体的研究，这样才能真正锻炼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辩证唯物论的本领。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要认真地研究党的各方面的政策，认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者在这一方面的学习是不是注意得很够了呢？决不能说是已经很够了。并且，在有些人中间甚至有忽视这方面的学习的严重情形。党的政策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互结合的体现，是辩证唯物论在中国各方面实际工作中应用的卓越范例，哲学研究工作者有责任加以深刻的学习研究，并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忽视这个任务的情形是不能容忍的。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4月11日；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中）

#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

（1958.6）

## 一

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已发表一周年了。这一年来，全国人民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和整风运动，然后又以排山倒海、无限猛烈的声势，在各方面工作中掀起了一个大跃进的高潮。首先是生产大跃进的高潮，随着生产的大跃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已开始了。社会变化之激烈，进步之迅速，真到了马克思所说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程度。六亿人民中蕴藏着的无限丰富的智慧和创造力，得到了普遍的解放，到处涌现出敢说、敢做、敢想，勇于革新的人物，人们充满高度的希望和决心，相信在较短的时期内，经过辛勤劳动，就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最先进的、具有高度现代化工业、农业和高度文化的国家。人民这样歌颂自己的光明前途："几年辛苦，万年幸福！"

当前我国社会这种空前迅猛的发展形势，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的生命力，说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具有着多么高度的科学正确性。这个理论在一年来掌握了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它

变成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强大无比的物质力量。

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贯彻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它指出我们当前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即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矛盾性质不同，它的解决方法也不同，前者是对抗性的，要用专政的方法解决，后者是非对抗性的，应该用民主的方法即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毛泽东同志肯定了社会主义内部仍然存在着矛盾，因而澄清了某些人不敢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那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以及这种观点所造成的思想混乱。毛泽东同志发展了列宁的观点，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是没有对抗性的，是和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矛盾有着根本区别的，这就在事实上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和某些修正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国家所散布的那种颠倒黑白的谰言，他们，就像修正主义者一样，硬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它的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说成是“对抗性矛盾”。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需要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专政的方法来解决，并且把民主的方法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这样一个科学的公式，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对于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提出了难以计量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基础的矛盾仍然是基本矛盾。这是在社会主义时代，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贯彻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原理。历史唯物论指明生产是决定一切社会的面貌和性质的物质条件，因此，生产本身的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也就是推动每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基本的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各方面的矛盾的时候，就是把

它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社会的生产和资本家的私有的矛盾——当做它的基本矛盾来看待。所以，研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是分析每一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各方面复杂矛盾的关键。毛泽东同志指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也就为我们找到了如何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间去揭露和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或者可以这样说，一切人民内部矛盾，归根结底，无非是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各方面的表现。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理论的正确性：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首先通过了 1955 年末的生产关系方面的三大改造，然后又通过了 1957 年的上层建筑方面的反右斗争和整风运动，才在基本上获得全面胜利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对历史唯物论所给予的重要贡献，就在于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两个基本矛盾，并且相当具体地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所具有着的某些独自特点，因而也就指明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正确的途径。

下面我想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问题，讲一讲我自己学习毛泽东同志这篇著作时所想到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 二

在论到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肯定，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性质相适合的，是比过去时代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更为适合的。判断一种生产关系是否和生产力的发展性质相适合，其标准就在于这种生产关系是否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最广阔的地盘，能否对生产力的发展给予强大的推动力量。人们都知道，旧

中国的生产力是长期处在极度衰靡落后的状态，1949 年以前，这种落后状态没有任何改善的可能性，这就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的生产关系不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的缘故。1949 年以后，我们打破了旧生产关系，建立了以社会主义经济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情况就起了根本的变化，在短短三四年间，就把受到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基本上恢复起来,并且开始进行了一些建设。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生产更进一步向前发展，使中国经济面貌迅速地改观。但是，前几年的进步，比起过去的旧中国来，固然是空前的迅速,但是和去冬今春以来几个月的飞跃形势相较,又只能算是很缓慢的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全国农业水利建设，在几个月以来所扩大的灌溉耕地面积，既超过了旧中国几千年的积累面积的总和,也超过了全国解放后八年来所扩大的面积的总和。这是由于 1955 年底到 1956 年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的胜利，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使社会主义的新的生产关系成为统治的生产关系，使新的经济基础基本上建立起来的结果，这也是由于 1957 年的整风及反右斗争在政治和思想上对资本主义势力给予了决定性的打击，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适应着新的基础，并更加完善起来，还进一步在某些环节上改善了新的生产关系，巩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结果。所以，目前生产的大跃进形势，在实践上充分证明了我国的新的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性质最为适合的，是比以往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远为优越的。毛泽东同志说：“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得到逐渐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而这种情况，目前正是在中国广大人民的实践中表现出来了。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所以比一切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最主要的，是因为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劳动人民得到了解放。劳动人民是主要的生产力，生产必须通过他们的活动才能实现。从根本上来说，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着决定的意义。在旧时代的阶级社会里，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剥削阶级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劳动者由于缺乏生产资料，在生产中不能不受到剥削者的奴役，他们不是生产的主人，因此，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极大的压抑。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由于大工业的发展，使生产力的前进速度远远超过它以前的时代，但在这里，劳动人民仍然是被剥削被奴役的，他们在生产上的创造力仍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面，由于劳动人民得到了解放，他们无穷无尽的生产潜力才有可能像原子能一样地被揭发出来。所以，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按照事情的本质来说，它们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总是要远远地超过任何旧时代的社会，这是客观的规律。苏联在短短的四十年间由农业国一跃而变成为极强大的先进工业国，并且发射了第三颗重量巨大的人造卫星，在科学技术的成就方面把美国这个资本主义世界最先进的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就是这个客观规律的作用。我们当前社会生产飞跃前进的形势，正是由于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劳动人民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得到解放的必然表现。相信我们今后的生产能够不断地飞跃前进，相信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够在十五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赶上英国，这就是相信客观规律、相信唯物主义、相信广大劳动人民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把跃进说成“冒进”，说成好像是一种“不合实际”的主观做法，把某些客观物质条件方面的困难不适当地夸大，而忽视了获得解放的广大劳动人民这一个无比伟大的力量。这种观点本身

才正是和今天中国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保守观点。

当然，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个情况：由于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到生产力发展的大跃进形势的出现，并不是没有曲折的。紧接着1956年初三大改造的胜利，工农业生产力曾一度蓬勃发展，但这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由于出现了“反冒进”的思想阻力，生产发展速度就减慢了。经过反右和整风运动，才又出现了目前的大跃进形势。这因为生产的发展规律虽然是不依赖人的意志而客观地存在着，但生产规律本身能否充分发挥作用，在一定情形下又决定于人的认识。发展生产是人民群众的行动，人民群众和它的领导者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应用这个规律，就可以使它充分发挥作用，否则，它的作用就会受到限制。所以，并不是生产关系的革命一旦实现以后，生产力就会立即顺利地以极高的速度向前跃进。整风和反右以前，生产关系虽然改变了，但人们的认识还没有普遍地跟着发生根本的改变。两种旧的思想障碍着人们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第一是资本主义思想，第二是保守思想。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号召下推动起来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又克服了人民内部的“三风”、“五气”。这个运动首先就是为着灭资本主义的思想和兴社会主义的思想而进行的政治上和思想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同时又是反对保守主义，在建设上提倡多快好省，反对少慢差费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党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互相适应的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应用，是得到了解放的全国人民空前未有的积极性的反映。由于贯彻了这条路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性质的客观规律就变成了广大人民自觉的行动，就出现了当前各方面工作大跃进的形势。

## 三

在肯定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比旧时代的生产关系更能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再来谈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问题。

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同时又指出这种矛盾和阶级社会的矛盾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它不是对抗性的，不象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那样，会把人分裂为敌对的集团。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情形下也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的。但是这种转化只是一种“个别”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生产中的本质的东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对抗“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列宁也曾经提到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个别集团与工人国家的个别机关间发生摩擦与冲突”的问题，这种冲突通常是在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处理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的情形下才可能发生。所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在本质上不是对抗性的。列宁曾说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将要消灭，矛盾还会存在。”毛泽东同志具体地发展了列宁的原理，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矛盾的基础，是在于生产关系一方面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而另一方面又在某些环节上有不适合的地方。

就中国的情形来说，从1955年底起，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但是还没有建立得很完善，没有完全巩固。这里就存在着它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同志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我国当前生产关系和

生产力的矛盾的特点之一，就是资产阶级还未完全消灭，“定息”这一种剥削制度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矛盾，它本来是对抗性的，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由于我国建立了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政权，由于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了正确的和平改造的政策，由于资产阶级经过我们的教育也了解到什么是大势所趋，多数都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在我国的条件下大部分都转化为非对抗性的，只在小量的情形下仍然存在着对抗性的敌我斗争，如像去年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肯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像新中国这样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由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同时又指明如果我们处理不当，或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政策，它仍然还会变为敌我矛盾。这是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上一个重要的发展，它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给予工人阶级一个正确而有力的指导，它使我们在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既掌握了最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和平改造的政策，又保证对资产阶级最反动部分的可能的反抗行为不失去丝毫的警惕性。

在社会主义革命获得基本胜利后的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有哪些需要解决和正在解决的矛盾呢？这些矛盾表现在生产关系的哪些环节上呢？这里需要作一些较具体的分析。

我们知道，生产关系包含着三个方面：1.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2. 由所有制形式决定的社会各个集团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3. 以上述两者为转移的生产品的分配形式。我想我们应该就这三个大的环节来分析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方面，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改

造运动已基本上消灭了资本家的私有制和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体私有制，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国有制）和农民、手工业者集体所有制的形式。劳动人民和生产资料的分离状态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根本的改变，他们已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成了社会和大自然的主人，不至于再受别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剥削者的支配了——应该特别指出，他们是以强大的集体作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而不是像个体小生产者那样，虽然多少占有一些生产资料，但由于他们相互间是分散、孤立的，因此在实际上对于自然和社会仍然是处在被奴役的状态，——这是他们所以能够发挥出任何旧时代所没有的生产上的高度积极性的根本原因。但我们社会主义所有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这些不完善的地方，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里已基本上指明了："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公私合营的"定息"制度，是根据工人阶级国家对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所规定的制度，它使工人阶级通过和平改造的形式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必要的。但它又是剥削制度的残余，又是资本家私有制的残余，因此，到一定时期必须加以废除。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现在是日愈减少了，在这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部分地还属于农民，特别是富裕农民，几年来合作化运动的实践证明，富裕中农有着较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这和贫农、下中农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强烈愿望根本有矛盾的。富裕中农手里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他们有可能利用这种所有权来妨碍合作社的集体生产的发展。为着发展合作社的生产，贫农、下

中农和富裕中农之间必须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就是在高级合作社里也还会继续存在着，在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当然更不可免。这个斗争虽然应该采取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而不是敌我斗争的形式，但并不是不尖锐的；1955 年底以来的事实经过就是很好的证明。在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里，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还需要继续解决，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例如社员个人自留地的数量问题，个人经营的经济问题。个人经济的收入过大，会助长农民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妨碍合作社集体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实践证明了的。

如果说 1955——1956 年的三大改造主要是在所有制方面改变了我国社会的生产关系，那么 1957 年整风反右以来的上层建筑方面的革命则是附带地进一步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生产关系另外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问题。生产关系的这个方面，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的。在阶级社会里，生产资料是属于少数人私有。在这种所有制形式下，社会各集团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首先而且主要的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占有一切生产资料的人（如奴隶主和资本家）或占有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的人（如地主），在生产过程中就成为经济上的统治者。丧失了生产资料或主要生产资料的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就不能不是被统治者，就不能不忍受前者的奴役和剥削。除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而外，在劳动人民之间，生产者之间，在生产的各部门和各个企业之间，由于私有制和剥削者的影响，由于小生产的狭隘利益和狭隘眼界的限制，也存在着互相分离，互相对立而不能很好地互相协作的现象。手工业者，小生产者中的行会主义的限制，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是最重要的表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基

本胜利之后，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也随之而发生根本的改变。这种改变首先是使生产过程中剥削者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消灭了。资本家在公私合营企业里虽然还取得定息，一小部分资本家在企业里还保留着管理生产的职位，但他们必须在工人阶级和公方代表的领导下工作，并且接受改造，逐渐转化为靠劳动生活的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统治者的资格来对待工人。在农村里，凡是办得较好的合作社，生产中的优势地位已转到贫农下中农方面，而不是在富裕中农方面，地主富农统治农民的现象更没有存在的余地了。因此，在生产过程中一些人对另外一些人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基本上消灭了，代替这种旧关系的，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这是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必然产生的人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的新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一旦建立起来，劳动人民的主人翁感觉就要大大高涨，他们的革命干劲就能够充分得到发挥，在他们中间就要涌现出无穷无尽的像奇迹一般的创造力量。就像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的人民的军队和广大人民之间曾建立了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就能克服一切困难，粉碎最强大的敌人，取得革命胜利。同样，在生产建设过程中，由于劳动人民之间建立起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就能克服自然界所给予的任何困难，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使社会生产力出现了最近几个月来的那种空前未有的跃进形势。

在生产过程中人们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并不是随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的改变就立刻建立得很完善的。1955 年底到 1956 年初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消灭了剥削者对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也基本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生产者之间的难于相互协作的缺点。但这

并不是说，旧的生产关系所长期养成的那种思想习惯一下子就会完全失去作用。相反地，这种思想习惯的影响还相当有力量，它使我们的新的生产关系——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不能建立得很完善，使它保留着许多和生产力的发展性质互相矛盾的缺点。这些缺点（除资本家和富裕农民的存在所造成的某些缺点之外），主要还表现在这两个方面，第一，在一定生产单位的管理者和直接生产者之间，如厂长、合作社主任和工人农民之间，他们的关系本来已不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更不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而只是分工合作的关系。但是由于过去某些思想习惯的影响，前者对后者不是以完全平等的态度相待，而是保持着某种“官气”，或官僚主义的态度。在生活上，工作上脱离群众，对劳动人民的生活不关心，对他们的创造发明不加注意，这就有了领导和群众之间，管理者和直接生产者之间，技术人员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阶级的对抗矛盾，但如果不解决，对于工农业的生产发展就会形成一定的阻碍。第二，在生产者相互间，特别是在生产的各单位、各部门之间，由于旧的思想习惯的影响，存在着重视局部利益，本位主义，不能互相照顾，不注意互相协作的缺点，这些缺点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也显然是不相容的。

生产过程中各社会集团相互关系方面所存在的这些缺点，特别是官僚主义的缺点，不是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不是由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产生的，而是旧制度旧思想习惯的残余影响所造成的。因此它们不可能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而自然地消失，要克服这些缺点，需要人们的思想上的自觉，需要通过批评、辩论，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旧的思想习惯的危害性和坚决建立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的必要。也就是，需要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基本胜利之后，再来一个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

革命，来帮助进一步解决生产关系这个环节上的矛盾问题。去年以来，我国轰轰烈烈地开展整风反右运动，就包含了这样一个目的。这个运动不但对当时资产阶级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进攻给予一粉碎性的回击，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更加完善，更加适应于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且帮助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进一步的变革，使它建立得更加完善，更加适应于我们生产发展的需要，适应于向自然界斗争中的劳动人民的需要。而在这里，主要是帮助了生产过程中人们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的建立，使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应该指出，自从反右整风运动以后，这种新型的人和人的相互关系——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已不只是在生产部门中，而是在一切工作部门中都较普遍地建立起来了，因此在各方面的工作中都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在工农业生产中，在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方面，首先是领导者打掉了“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劳动人民的前面。干部在工厂企业里，和工人们一起生活，拜师父，跟班生产，在农村里和农民一起种试验田。这就使领导密切联系了群众，既能及时地反映和解决群众中所提出的要求和问题，又能直接学会掌握技术，做到“又红又专”，更具体地领导生产。这就使工人农民真正感觉到领导干部是自己的同志，是“自家人”，而自己和他们一样，都是生产的主人，国家的主人，不是像在旧社会那样的被压迫者。劳动人民有了这种主人翁的感觉，他们的共产主义觉悟就能够迅速提高，就能把集体的事，国家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就能坚决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影响，使个人的利益服从整体的利益，就能用战斗的精神去钻研和克服生产中的一切困难问题，就能主动地照顾和帮助别人，为着共同的事业，不顾一切困难与其他部门在劳动中进行协作。在这样的情形下面，

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就能发挥到顶点，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举个典型的但并不是很少的例子：今年5月8日《人民日报》有一篇关于地方国营本溪合金厂的通讯，这个厂最初只有四个工人，从沈阳借来一口锅，两把勺子和三个模子，真是又穷又白。由于领导者始终和工人一起劳动，经过几年的辛勤努力，摸索试验，竟能用任何教科书上也找不到的中国旧式落后的土炉子“八卦炉”炼出许多贵重的合金来。这个厂现在已发展成拥有六百名职工，能生产许多国内独一无二的合金，遍销全国一千二百多个企业，同时还是向东南亚出口的本溪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这个厂的作风，就是“以社会主义协作思想为基础”的。当合金厂知道其他工厂需要技术复杂的合金时，就不辞艰苦，一定要试制出来，常常赔本也在所不惜。“由于他们有这种自我牺牲的协作精神，使得他们在别的厂中建立了很高的信誉，因此别的厂也乐于协助他们。”“合金厂遇到本厂不能解决的困难，常常只要挂一个长途电话，其他单位就会以人力、物力支援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同志式的互助协作关系的一个好例。类似的例子在目前全国各行业里都可以找到，每个例子都足以说明为什么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社会生产力必然要出现空前的飞跃形势，为什么我们必须更普遍更巩固地建立人们之间的这种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

现在谈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的产品分配形式问题。关于生产品分配形式，首先应该注意的是积累和消费的分配形式。这就是说，应该注意到分配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发展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要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不能把分配问题仅仅看做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消费手段的分配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曾批判了拉萨尔派对于分配的一种“褊狭”的观点，“即只注意被分配在合作社底个别生产者之间的消费手段

的部分。”产品分配的形式，决定于所有制形式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在资本家私有制基础上和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情形下，劳动生产品绝大部分以剩余价值及利润的形式为资本家所占有，劳动者通过工资的形式取得维持最低生活的消费手段。生产积累采取资本积累的形式，为资本家所占有。资本主义的分配形式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资本家追求利润的贪欲，而把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压到最低限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属于劳动人民所共有——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生产品的分配，照恩格斯《住宅问题》里的说法，是这样进行的："总产物的一部分，分配到社会成员中去消费，一部分拿去补充并增加社会的生产手段，还有一部留下来当做生产和消费的储备来源。”和资本主义的分配相反，社会主义的分配，必须保证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并以此为基础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在中国，由于所有制形式的根本改变，社会主义的产品分配形式，也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不论工业农业中，积累是为着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以逐步提高劳动人民生活福利为目的的公共积累，不再存在以剥削劳动者为目的的资本积累了。人们的劳动所得，是符合于“按劳取酬”的原则的。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是不存在了。当然，由于公私合营企业里还存在定息这种剥削制度残余，由于少数半社会主义合作社里占有生产资料的富裕农民还有较多的分红的权利，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产品分配形式还是不完善的，这在以后将逐步求得改善。不但如此，就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形式，在具体的处理过程中也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在工厂企业中，有时我们过多地强调提高工人们的生活福利，也就是过多地强调消费方面，而多少影响了积累，也就是影响了生产的发

展。另一方面，有时也会由于过多强调积累，而忽视了消费，多少忽视了工人们的生活福利的改善。在积累和消费两者之间的比例，要掌握得完全恰当，是不容易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比例常常还要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和生产发展的需要而有所改变。例如在农业合作化开始实现不久的时候，我们曾经为着使农民的90%增加收入，提出少留多分的原则，以鼓励他们在合作社方面的积极性。但是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在使农民经过社会主义教育提高觉悟以后，又必须增加积累的方面，改变少留多分的原则，在一定时候提出多留少分。如果领导者不能够随着情况的变化和生产发展的需要，适当地改变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这就是不能正确应用和掌握社会主义的产品分配原则，就必然要发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某些矛盾。毛泽东同志说："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因此，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的合理的掌握，是在社会主义分配形式上需要经常注意的问题。

单就积累方面来说，也包含着复杂的分配问题。例如在全国的生产范围内，积累方面的分配就必须保证"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工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原则，才能够最迅速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曾有一个时期过多地重视工业的发展而较少地注意农业的发展，过多地重视中央工业和大型工业而较忽视地方和中小型工业的发展，这就说明积累方面的分配形式曾有过不完善的地方。这个方面在党中央的指导下现在已大大改善，并且还会更加完善。这个改善将保证工农业生产力更迅速地跃进。

消费方面的分配也有其复杂的情形。由于社会主义的分配是以“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为原则的，因此在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门间（例如农业和工业，乡村和城市之间，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在同一生产部门的不同的职工之间（例如熟练劳动者和不熟练劳动者之间，管理人员和直接生产者之间，技术人员和劳动者之间），甚至于不同的地区之间，人们的劳动收入，生活水平就不能没有一定的差别，在社会没有进入高级的共产主义时代以前，这种差别是必要的。否认这种差别的必要，用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的观点来对待社会主义的分配问题，企图取消这个差别或使得几乎没有差别，这是错误的。例如，人们都知道，如果徒工的工资太高，和熟练工人的工资距离太小，对于生产的发展就是不利的。另一方面，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和不同的工种之间，如果工资和生活水平的差别太大了，超出了“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个原则所许可的范围，也是不对的。有了这样的偏差，就可能不利于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的巩固。因此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总之，为着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必须经常和平均主义或生活差距过大的两种偏差斗争，必须注意解决由于这两种偏差的出现所产生的人民内部矛盾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 四

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形式，它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这就是说，它或者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它和生产力的发展性质相适合的时候，或者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它和生产力的发展性质不相适合的时候。因此，要发展生产力，就需要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使生产关系

由不适合生产发展性质的变为适合的。

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从生产关系获得推动力，另一方面，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的矛盾运动，这就是先进生产者和普通生产者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在任何时代的生产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的。刘少奇同志1956年对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祝词中论到了这个矛盾规律："在任何时代，任何生产部门中，总是有少数比较先进的生产者，他们采用着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创造着比较先进的生产定额。随后，就愈来愈多的生产者学会了他们的技术，达到了他们的定额，直至最后，原来是少数先进分子的生产水平就成全社会的生产水平，社会生产就提高了。"这就是说，先进和落后的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解决，是生产力本身任何时代都具备着的一个内在的发展动力。自然，必须指出：生产力本身的这个矛盾的产生和解决，是受着它的历史形式——生产关系的制约的，并非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情形。封建社会的先进技术是产生于个体小生产者的积极性，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以及小生产者的狭隘利益的限制和行会制度的障碍，使新的生产技术常常在很长时期里都是少数人的"家传秘方"，不易为一般普通生产者所学到，因此先进与落后矛盾的解决很缓慢，生产力的发展很缓慢。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技术主要是在资本家追求利润的需要之下出现的，技术上的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要通过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剥削的斗争过程来克服。由于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利润，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如果对于他们的利润的获得没有很大帮助，就不可能在他们的企业里采用和推广。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先进和落后的矛盾的揭露和解决是受到很大的限制的，近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生命力不能在资本主义制度里面得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先进技术的产

生，是来自集体生产者在生产上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他们已从私有制和剥削制下面解放出来，成了生产上和社会上的真正的主人翁，他们清楚地看到，今天的辛勤劳动，可以为自己创造幸福的美妙的明天。在这样的情形下，先进技术的发明创造者，就在广大的劳动人民中间以任何旧时代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到处涌现出来。一个工厂在一个短时期里可以收集到成千上万件的合理化建议，农村里在几个月间出现几千种的改良农具。劳动者的集体的力量，常常能解决科学技术专家们所不能解决的某些困难问题。由于没有私人利益和行会制度的限制，由于人们中间建立了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下面来解决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它的过程就比任何旧时代更为迅速。

通过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来解决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其具体的形式就是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竞赛。在竞赛里当然有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但这里的斗争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对抗性的你死我活的竞争。这里的斗争所遵守的原则是："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是"先进者帮助落后者达到先进水平，落后者努力向先进者学习，先进者争取更加先进"（赖若愚：《团结全国人民，勤劳节俭，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样在斗争里就贯穿着同志式的互相合作关系。由于先进生产者的出现是通过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中的主人翁的自觉性，先进与落后的矛盾的解决方式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竞赛方式，因此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空前地迅速，而生产力的发展也远远地比旧时代迅速。

这样，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使我国生产力有可能空前迅速地向前发展，这是客观的规律。但这并不是说，只要有了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就自然而然地达到最高点了。社会生活的进步，除了首先需要有一定的客观条件之外，还要依

赖人们主观的努力。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之下，同样具备着新的生产关系的情形之下，1956 年上半年，尤其是去冬今春，就有了生产上的迅速跃进，而 1956 年下半年和 1957 年上半年，生产虽然也在发展，却比较缓慢得多。这里的不同，主要地就在于人的主观方面的认识不同。人们如果能够正确认识上述的客观规律，并且把这认识作为生产中的指导思想来加以利用，生产的发展就可能达到极大的速度，相反地，如果人的认识不能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对生产给予错误的指导，生产的发展速度就要减慢。1956 年下半年以后生产发展的速度所以减慢，就是由于许多干部产生一种违背生产发展客观规律的右倾保守思想，即所谓“反冒进”思想，使主观的指导发生错误的缘故，而去冬今春生产上出现大跃进，就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思想指导帮助人们认清了中国当前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依据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所提出的，正确反映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被广大的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学先进，赶先进”，“抓两头，带中间”，表扬先进，帮助落后等等指导社会主义竞赛的正确思想方法得到贯彻，把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高度发挥的结果。

如果我们把当前生产关系中的许多不适应于生产力发展性质的缺点都改正了，是不是两者之间以后就不再有矛盾了呢？当然不是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就和宇宙间任何事物的矛盾一样，是会不断地产生，又需要不断地加以解决的。生产力是生产中最革命最活动的因素，而生产关系则是相对地稳定的东西。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它就给生产力的发展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而当生产力一旦向前发展以后，生产关系就开始在某些环节某些方面显得落后了。这就不断地发生矛盾和不断地需要解

决，也就是不断地要求生产关系的改变，使之适合经常前进着的生产力发展的性质。最初是要求某些环节和部分的改变，最后就要求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

这种情形在任何历史时代都存在着。例如，封建社会，在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引起封建生产关系的根本破坏之前，就有过地租形式方面的几次变革，即由劳役地租到实物地租再到货币地租。在资本主义制度里，由手工业时期到机器工业时期，由绝对剩余价值形式到相对剩余价值形式的变革，由自由竞争到垄断，都是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之前的各个部分或各个环节上的变革。在社会主义制度里，生产关系也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地在某些环节某些方面进行变革。例如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生产力就要迅速跃进，这种跃进必然包含着生产力本身的性质的变化，例如由使用古老的木犁进到使用铁犁——双轮双铧犁，由铁犁到农业机械，这些生产力性质的变化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变化，例如要求合作社组织范围的扩大，小社合并为大社，就包含着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变革的意义。又如为着扩大耕地和适应新的技术需要而进行土地平整，把某些私人的坟地加以改变或迁移，这也可以说是所有制方面的一定的变革。这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也是不断地要出现新的矛盾和不断地需要加以解决的。解决这些矛盾的目的，都是为着改变生产关系使之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在一定的时期之内，这些改变都是部分的，而到将来，当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时，就要引起生产关系的较根本的改变，即由社会主义进到共产主义。

毛泽东同志在论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一段话里，这样说："在解决矛盾之后，又会出现新的矛盾，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生产的矛盾也正是这样。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地

认识和利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这个不断矛盾的规律，就是要善于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及时地组织和鼓舞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力尽可能迅速地向前发展（如像1955年底农业合作化运动实现之后，毛泽东同志紧接着就向全国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同时又要善于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及时地发现和解决新的矛盾（如像1956年间及时地提出农村中的分配问题，提出必须使90%的农民增加收入的原则等），也就是及时发现和改变生产关系中某些不适应于生产力发展性质的环节，使劳动人民经常保持高度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力不断地以很高速度向前跃进。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思想可以说就是，或首先就是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不断的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作为根据的。中国共产党过去曾经以“不断革命”的精神指导中国革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及时地把革命引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获得了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基本胜利的今天，又提出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口号，作为今后全国人民的目标。技术革命，这就是要使我们由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具有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工业的先进国家，这主要是要使我国的生产力性质发生根本的变革，但在生产力变革的过程中，也免不了要使生产关系发生某些方面的变革。这些变革的实现，当然必须通过人民内部的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应该不会像阶级社会的矛盾斗争那样表现为激烈的冲突和对抗，也就是应该通过人民之间的广泛的民主方式，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或者说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而求得解决。应该肯定，人民中间有领导的广泛的民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它的最好的形式之一，就是去年以来经过考验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自然，要使矛盾的斗争不表现为对抗，还

需要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客观规律，并依靠正确的认识来对矛盾做出正确的处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会发生对抗，尤其是在我国，由于资产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这种可能性就更有注意的必要，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经常取得主动。而要保证正确地认识上述客观的矛盾规律，保证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经常取得主动，经常做出正确的处理，就应该认真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应该经常把毛泽东同志著作中的那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导。

（原载《哲学研究》1958 年第 3 期，1958 年 6 月 15 日）

# 工人和哲学*

(1958.7)

从上海求新造船厂开始，天津、北京以及许多其他城市的工人们都起来学哲学了，许多农村的农民，也有开始学哲学的了。工人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学习哲学，这是一件新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是和我们各方面工作的大跃进分不开的。应该说，工人农民学习哲学是我们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如果很多的工人农民都懂得哲学，并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做工作，我们的工作就会进步得更快，就会跃进得更快。

现在让我们来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工人和哲学的关系问题。这里包括三个问题：工人应不应该学哲学，工人能不能学好哲学，和怎样才能学好哲学。在讲这三个问题时，也就要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内容。

## 一、应不应该学哲学

工人应不应该学哲学？这对于许多工人同志来说已经不成问题了，因为他们已经组织起来学习了。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些人认为，工人是只管搞生产的，是“老粗”，不需要学哲学。哲学是那些大学教授、专家学习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现在许多人已

---

* 本文系艾思奇于1958年7月13日在天津工人学习会上的讲话，白大方同志曾帮助整理。

不会这样想了。

## 学会正确的思想方法

工人为什么应当学哲学，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做工作需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任何人做工作，都有一种思想方法在作指导。同样做一种工作，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或不正确的思想方法去指导，效果会根本不同。思想方法对头，工作中就能少犯或不犯错误，收效大，进步快；思想方法不对头，就会犯错误，或甚至是收效不大，进步不快。

去冬今春以来，我国各方面的工作都大大地向前跃进。首先是农业方面兴修水利的跃进，几个月间扩大灌溉面积的成绩超过了几千年的总和。接着工业方面以及文化方面都有了空前迅速的进步。这是为什么呢？这原因，除了1956年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都获得了根本性的胜利之外，就是由于我们各方面工作所采取的方法，更符合于正确的思想方法，符合于唯物辩证法。

举例来说吧，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应用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发动群众，依靠大家提问题，找困难，想办法，依靠群众来共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和正确的思想方法分不开的。其基本的内容，就是发动大家来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这就是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了辩证法。一年来大家都在这样做，不过很多人并没有注意这里面就有哲学罢了。

## 从“两参一改”谈起

天津市工人学哲学，是从“两参一改”后就有了迫切的需要的。“两参一改”这件事，也可以说是唯物辩证法在实际工作中的

一种应用。它的发展，也经过了一个辩证的过程。最初，天津的一些工厂领导干部为了把生产管理搞得更好，实行“跟班劳动”。即领导干部参加一定的工序，拜工人为师傅，学习生产技术，从而了解生产中的问题，以便改善生产管理方法。这种方法解决了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克服了官僚主义，但还有不够全面的地方，因为应用这种方法，只能使少数干部熟悉一定范围内的工序，而不能熟悉全部的生产过程。后来湖北省搞“一条龙”的办法，就是由党、政负责干部和职工，每一个人参加全部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工序。这样，经过一定的时期，可以集体地总结经验，以便改善生产管理。这比“跟班劳动”就前进了一步，全面地掌握了整个的生产过程。后来，黑龙江省的某些工厂，更进一步地创造了“两参一改”的办法。所谓“两参一改”，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加上改革不适合生产需要的规章制度。“两参一改”可以说是较全面地改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发扬民主集中制，贯彻群众路线的好方法。它使干部工人化；也使工人干部化，这样领导和群众就能充分密切地结合起来，共同地及时地解决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它使唯物辩证法在工作中应用得更全面了。

这里只说一下“两参一改”是怎样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大家知道，在没有实行“两参一改”以前，许多工厂中领导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是有很多缺点的。例如领导者中有点官僚主义，不能很好地了解生产和工作的情况，部分工人也有些思想问题（个人主义，觉悟不高）。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的关系。所谓社会主义的关系，最主要的就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在领导和被领导、厂长和工人的关系上，也应当反映这种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在实行“两参”以前，工厂领导

和工人中间的这种社会主义关系是建立得不够完满的。当然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这种关系，我们的新社会和旧社会是根本不同的。在我们的社会里，领导和工人中的关系是平等的，因为领导不是资本家。但是领导有了官僚主义，不了解下面情况，领导得就不够好，同志式的合作关系不够好。这样就有了矛盾。这样的矛盾不解决，工人同志的积极性就不可能提高，也就是说干劲不可能鼓足，生产当然就发展得不够快。这样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谓生产关系，就是在生产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工厂、农村的生产过程中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建立得正确了，充分表现为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了，这样的生产关系就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了，这样，就能使大家干劲十足，生产跃进，技术革新普遍开展，生产力飞速发展，这就叫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得到了解决。自从毛主席提出了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年来，全国各地就在按着他的指示，发动工人农民广大群众大家来发现和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其中就包括上面说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我们生产上能实现大跃进，就是由于应用了辩证法，解决了工作中的各种矛盾的结果。

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工人必须学习哲学。这个哲学，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得好，我们的工作就会做得好些、快些，如果不学或者学得不好，我们的工作就会做得慢些、差些。过去我们许多工人同志没有学习哲学，只是由于领导我们的党应用辩证法来指导我们，就使我们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那么，如果今后工人同志们努力的来学习哲学，都懂得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完全可以相信，我们今后的工作一定会更加迅速地跃进。

最近几个月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有些工厂组织了哲学学习班、学习组，有些工人同志刚开始学习，就已经学会把哲学原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使工作取得了进步。如天津仁立毛织厂的李长茂同志，他领导的车间里，有两个工人闹意见，没有学哲学前，他认为，有意见嘛，把两人调开就解决了，结果调开以后，工人更有意见，情绪更不好，干劲也更差了。学习哲学以后，他知道，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应当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他就运用这个办法，即用辩证法把这两个工人团结起来。他先了解两人有什么矛盾，原来是有误会，他就分别找他们谈一谈，又让他们在一起谈了谈，这样就解除了误会。矛盾解决以后，两人很高兴，关系变得像亲兄弟一样，在工作上干劲也大了，生产力也就提高了。

这个例子说明，工人学习了哲学，这对生产、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工人不学哲学，光靠领导、厂长、党委书记来运用辩证法指导工作，当然也可能把工作做好。但是他们每人只有两只眼睛，看东西有限，而要解决厂子里的全部矛盾，靠一二个人是很困难的。我们现在生产中还有很大潜力，如果工人都学习哲学，都掌握哲学，都能运用辩证法来指导工作，我们的生产力就会比现在发展得更快。

##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神秘的东西，它就是工人阶级的思想方法。有些人听人一提起学哲学，好像很奇怪似的，哲学两字，讲都讲不顺嘴，还要学习？其实，哲学并不神秘，哲学就是关于思想方法，研究思想方法的一种学问；哲学思想又是人们的世界观，也就是人们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总的看法。

你对世界上一切事物是怎样看的呢？你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物质的表现，这就是唯物的世界观；你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矛盾的，这就是辩证的世界观。认为世界是物质的表现，不承认有鬼、有神，不承认精神的东西支配一切，这就是唯物论。现在农村中有一首歌谣："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这是唯物论的诗。因为他不承认有玉皇、有龙王，不承认神操纵一切，而承认劳动创造一切，承认世界的一切都是物质的，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能改造世界，可以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这就是唯物论。从前农民是唯心论者，天不下雨，就去求神，在他们看来，雨不是自然物质，而是受龙王的神秘力量支配的东西；而现在，农民画了一条龙，被人用绳子牵着走，龙在传说中是很了不起的，现在劳动的人竟然能牵着它走，这就是唯物论思想的一种表现。

哲学思想就是人们的世界观，也就是人们对世界一切事物的总的看法。世界观就是思想方法。你的世界观是有神论的世界观，你认为世界上有神，那么，你的思想方法一定也是疑神疑鬼的思想方法，碰到困难，就去求神、拜菩萨。这是错误的世界观，也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我们的思想觉悟了的工人农民是不承认有神的，我们应当具有唯物论的世界观。我们有了唯物论的世界观，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也就会用唯物的思想方法，不是疑神疑鬼，求神拜佛，而是去研究客观事物本身的矛盾，研究清楚了再来设法用自己的主观努力加以解决，结果就能把这个事物加以改变，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

### 解决问题的两种态度

最近以来，到处都在展开技术革新，发明创造这样多，为什

么?因为工人同志已经不自觉地在用唯物辩证法来解决问题了。碰到困难或任务，不是害怕、犹豫，不去迷信鬼神，而是去仔细研究，把物质加以分析，把矛盾闹清楚，这样就能想出办法来克服困难，完成任务。比如天津恒大烟厂，去年烟叶收成不好，有影响纸烟质量的危险。工厂方面提出如何保证质量的问题，要大家想办法。工程师提出的办法是要提高成本，但有一个老工人马其昌同志不同意这样做，因为提高成本，就要提高价格，或者降低利润减少国家收入。既要保证纸烟质量，又要不提高成本，这是一个矛盾。马其昌同志凭着他几十年的经验，经过一番钻研，找到了加强烟叶发酵、改进配方的办法，这样，就克服了困难，可以既不提高成本，又保证了纸烟质量。

在解决这一个矛盾的时候，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疑神疑鬼，迷信旧有规章制度以及书本上的老一套，有一小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就是这样。书本上说得对，是应当相信的，但不能一切问题都靠现成的书本来解决，如果想一切靠书本解决，这就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态度。一切依靠书本就不能解决实际工作中的新问题。迷信书本，就会不相信实际生活中的新东西，结果还是唯心主义。只迷信书本上的一套的工程技术人员，实际上是唯心主义者。而老工人马其昌同志为保证纸烟质量所采取的办法，却是不自觉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工人不自觉地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对付工作，就能得到很大成绩，可见，如果工人同志学习了唯物辩证法，并且能够自觉地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那么，他们的积极性就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就能更好地来解决生产中、工作中的问题，跃进得更快更好。跃进的前途是无限的，问题只是要更多的工人能像那位老工人一样，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解决问题。

## 知识来源于实践

我们从天津造纸厂玻璃纸创造者郭景文同志的事迹中，看到了知识来源于实践的道理。他是贫农出身，后来当工人，解放后才学文化。他喜欢化学，天天去钻研，请教老师傅，又请教大学生，他觉得实际经验一定要和技术理论知识相结合。他省吃俭用，买些代用品做化学实验工具。人家讥笑他，他不去管这些事。他看到苏联一本化学书上说稻草可以做人造纤维，受到了启发。他又知道我国还没有生产玻璃纸，于是搞试验，摸条件，创条件。以煤炉代电炉，以压豆腐的杠子代替压力机，挖了个小地洞以控制温度，用自行车的汽管子把皮钱倒过来抽真空，用玻璃代白金。搞了多次实验，搞出了一点玻璃纤维的样品。党重视他的创造精神，把他从印染厂调到科学研究机关。那里有化学家做指导，有化学实验设备，又调了两个大学毕业生帮助他。可是化学家不支持，两位大学生也不愿意合作，实验设备也不准用，他只好仍用土法搞实验。试制的样品最后被否定了，认为没有必要再继续搞。可是天津市轻工业局肯定了他的实验的成果，把他调到天津造纸厂，厂长支持他，调了 3 个工人帮助他。没添新的设备，只有半年功夫，玻璃纸已经搞出并投入大量生产，产品的质量标准已超过英国，现在正筹建新厂，并为许多省市培养了 150 个徒工，从生产实践中学习科学技术。

在党的领导下，郭景文同志一步步地实验、探索，百折不挠，把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又反复地去实验，终于摸到了造玻璃纸的规律，又找到了造玻璃丝的方法。也许他不会讲一大套哲学名词，可是他走的道路合于唯物辩证法的道理。

唯物论的根本原则之一，就是知识来源于实践，在生产或阶

级斗争的实践中，努力研究客观事物矛盾，就有可能正确认识这些矛盾，就能够获得解决这些矛盾的知识。

## 英雄事迹是活教材

天津钢铁厂的田祯祥同志，用转炉代替电炉，炼出了全国电气化所急需的矽钢。仁立食品厂的马国荣同志，创造出消灭蛋品中的沙门氏细菌的方法，为祖国争光（帝国主义造谣说我们蛋品中有沙门氏细菌，其实他们的蛋品中沙门氏菌比我们的多。但是他们还没想出办法，反过来却倒咬一口）。19岁的学徒工赵桂荣同志，成为印染制版技术的发明家。他们的创造，都是书本上所没有的，外国没有试验过的，可是他们在生产实践中努力钻研，终于实现了卓越的创造。

任何一位技术革新者，他的每一个发明创造，都是自觉或不自觉的遵循着唯物辩证法的道路走的。所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天下无敌的，它是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又是我们搞技术革命的思想武器。

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思想解放了的千百万工农劳动人民创造的奇迹真是太多了。我们把这些技术革新者的创造历程，如实地、仔细地加以整理、总结和分析，加以理论的概括、提炼和加工，都可以成为我们学习哲学的活的教材。就在每个工厂、每个农村，都可以就地取材，在党的领导下，集体讨论，加以总结和推广，它将有普遍的实践的意义。我们学了哲学，就可以拿它作万能的思想工具，去进行各种工作上的加工。

工人学了哲学，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牡丹江水泥厂化验室的工人小组学完“矛盾论”以后，认识到一切事物里都充满着矛盾，只有不断地解决矛盾才能前进。在党委领导下，他们讨

论有哪些矛盾妨碍生产？经过辩论，他们抓到了矛盾。原来水泥的生产，是把自然的原石、粘土配上料，经过人掌握机器加工生产成为水泥。他们发现配料和原石、粘土有矛盾，因为石和土是随着四季气候变化的，而配料是死的，以死的配方对付千变万化的石、土，这就是矛盾。他们认为配料必须打破死方案。党委、工程师都赞成试验，经过苦战，试验成功了。通过集体的努力，立波尔窑的水泥每小时的产量已经达到35吨，超过了世界公称能力的70%，超过英国生产指标的202%，居世界首位。

由于化验室的创举，水泥厂各车间都展开了找矛盾运动，找到全厂性的19个生产关键问题，一个个地都解决了。

他们的学习经验是：边学习、边辩论、边检查、边贯彻执行，使学习与生产结合，学习与宣传结合，学习与提高思想结合。

##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老老实实的道理

从上面举的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哲学并不神秘，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不神秘。唯心主义哲学的确有点神秘，过去大学里的教授讲唯心论哲学讲得很玄乎，使听的人莫名其妙。当然仔细听也可以听得懂，不过比较费力，听得懂什么呢？懂得他是在胡说八道。他们讲得好像有道理，其实是胡说八道。也许有人会问，这样说是不是过分了呢？大学教授读了那么多的书，讲起话来那么头头是道，怎么会是胡说八道？其实，这是对他们的迷信的看法。打破了迷信，就可以看穿他们是在胡说八道。为什么呢？因为世界是物质的，他们偏说是精神的，世界是有矛盾的，他们偏说没有矛盾，事物是发展的，例如我们到了社会主义，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他们偏偏认为世界是不发展的。所以，尽管这些讲唯心论的教授讲得再巧妙，还是胡说八道，同信神信鬼、宗教迷信在

根本上没有什么不同。宗教是说鬼神支配世界，而他们是说精神支配世界，实质上是一样的。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很平常的道理，是老老实实的科学的道理，就是工人、农民在日常生产中和阶级斗争中的道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一切事物的发展都要通过矛盾的斗争和解决才能进步，这个道理在我们生活中天天可以找得到，例如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消灭了资产阶级，就解决了矛盾，使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了。又例如，在生产中发生了问题、困难，这也就是有了矛盾，这就要想办法来和困难斗争，也就是要研究解决这里面的矛盾。正因为生产中、工作中就有辩证法，所以我们工人天天做的就是唯物辩证法的事。为什么我们工人同志过去没有能很好的运用唯物辩证法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不自觉，不知道生活里就有哲学；再一方面，因为出身关系，如有些出身于手工业、农民等小资产阶级，或者受到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有些宗教迷信思想或唯心主义思想。

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哲学（指辩证唯物论哲学）是工人阶级的精神武器。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希望工人能懂得并运用哲学。但是在旧社会，工人受到统治阶级和资本家的残酷的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要普遍学习哲学有困难，也没有机会学。现在是新社会，工人是我们社会的主人，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生产跃进就要靠我们的力量来推动，工人的生活也安定了、提高了，这样我们工人就完全有条件来学习哲学。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希望，应当由我们这一代工人阶级来充分加以实现。

归结起来，工人必须学习哲学的主要原因就是：它是工人阶级的思想武器，是工人阶级的思想方法，学习了哲学，就能使我

们的生产更快地跃进，就能把我们的技术革新工作搞得更快更好。但是工人所以要学习哲学，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工人还可能受点唯心主义的影响。在旧社会，资产阶级不仅从物质上剥削我们，而且也在精神上压迫我们，用有神论、用鬼神迷信、用唯心论的思想来欺骗我们，说什么生活不好这是命里注定的，世界是不会变的，资本主义是万世长存的；资产阶级也会用个人主义来影响我们，通过小恩小惠来进行利诱、挑拨我们工人阶级的团结。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有时闹不团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然我们中国工人不受资产阶级的这种利诱，我们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都对资产阶级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并且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我们的工人中的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不能说已经完全消灭了。比如有些工人主观急躁，碰到困难，不是仔细研究矛盾，而是粗枝大叶地对待问题。这就是主观主义的表现。

所以，学习哲学，一方面是为了掌握辩证唯物论，一方面是为了克服旧社会的影响：主观主义、不研究矛盾、个人主义、急躁、迷信、相信鬼神等等，学了哲学就可以批判并且清除这些旧的、错误的思想影响。

## 二、能不能学好哲学

工人能不能学好哲学？我们先举下面一个工厂的学习情况来谈谈。

### 天津第一食品加工厂学习哲学的经验

第一食品加工厂老工人魏长庚同志的实例就说明工人是能够学好哲学的。魏长庚同志现年五十岁，高小文化水平，共产党员。从十二岁起做工，已经有三十七年工龄。从前做车间副主任，下

放后当组长。他在学哲学前，看问题主观、片面，解决问题时方式方法生硬简单。双反时，同志们给他贴了许多大字报，叫他“魏官僚”。他自己觉得没本领，遇到困难没办法，越没办法就越着急。怕问题，怕矛盾，干一天背着几个问题回家去，心里很恼火。他常常想：宁愿做工人，不愿做领导。他在技术问题上，又有保守思想，工作上常常碰钉子。

党号召学哲学，他最初胆怯，后来参加了，上了几次课，结合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一讨论，尝到了学哲学的好处，学习就有兴趣了。

食品一厂学习哲学也走过一段小弯路，最初两次讲课是从书本讲起的，不结合实际，不受欢迎。后来党总支研究了情况，召开党政工团的准备会，又吸收一些老工人参加讨论。领导和群众在一起，提问题，摆困难，大伙分析研究。从实际出发，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大家动脑筋找出十八个课题。又分出轻重缓急，抓住生产中的主要矛盾。以哲学做为武器，再分析研究，指出解决问题的方向。以后由党总支书记、厂长、宣教委员分头去讲课，分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群众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智慧，自动地把问题分头包干，行动起来了。

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学习方法，生动活泼，密切地结合实际。把备课、讲课、学习、讨论、运用、行动，一下子贯穿起来了。自始至终贯彻着政治挂帅的精神，大家越学越有劲。我们觉得食品一厂这种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学习方法是很好的经验，它提高了工人，也提高了领导干部。这种方法应当大大地推广。

还有，天津第一食品加工厂，最近几个月的生产指标，连续提高五、六次，各个工序，常常出现不平衡，打蛋跃进了，制桶跟不上。制桶跃进了，切铁机又切不出来，必须改进切铁机。总之，一个工序生产力提高后，另一个工序必须跟上。跟不多久，别

的一个工序又提高了，还得再跟上。学了哲学以后，知道了一个道理：生产是永远向前发展的、生产上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生产的发展过程，就是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再到不平衡的无限延续。有了矛盾，想办法解决了，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再去解决，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这就是哲学。

天津第一食品加工厂，原来的老底子是英国资本家在中国开设的，设备陈旧、落后。洗蛋、照蛋、打蛋、冻蛋、运转和包装，主要的是手工操作，生产效率低，劳动强度大，大家提出合并工序，试制水洗、照蛋联合机。

这个课题的先决条件是需要几十个技术工人去搞试制工作，因为制造机器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技术工人大部分都在制桶部，要把人抽出来，制桶任务就不能完成，这就有了矛盾，经过大家研究，把焊桶改为用特制胶水粘桶，可以节省五十名技工，解决了全厂的一个大矛盾。水洗、照蛋联合机试制成功，搞了五台，投入生产，又节省了二百个劳动力。新问题又来了，节省了二百个劳动力怎么办呢？于是又下决心改变工厂面貌，大搞副业，来一个正副业相结合，改修理车间为制造车间，自己搞了小高炉炼钢，于是食品加工厂变成了兼制食品加工机器的制造厂了。现在已经有几十部新车床投入生产，以适应全厂进一步机械化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原来该厂预计在二年内完成机械化，后来一再跃进，改为本年国庆节实现机械化，最后改为八月底基本完成机械化。

工人学了哲学，领导被领导的关系更密切了。学了哲学以后，领导的意图，容易贯彻。群众的积极性继续提高。从前做车间主任，好不容易，你刚一坐下，马上有人找你解决问题，简直是应接不暇。现在大家学了哲学，人人都会动脑筋，自己想问题、分析、解决问题。所以说工人学哲学是有的放矢，以马克思主义哲

学做工具，用它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根据魏长庚同志的经验，他学了哲学以后，首先学会了分析问题的方法。知道了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思想是第二性的。要求实现机械化、要制造水洗照蛋联合机是主观要求，怎样去实现？就得分析客观条件，依靠党依靠群众，多想办法，就能解决问题。魏长庚同志学了哲学，工作方法改进了，工作作风也转变了。当然这是整风的效果，但通过学习哲学从道理上明白了，就更彻底地解决了思想问题。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收获，也是大家的共同的经验。

## 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听说开始工厂组织哲学班时，有些人动摇，怕学不好，说我们这些老粗怎么能学好哲学？这说明对能不能学好的问题，还是有怀疑的。

我们说：工人同志学习哲学，会有一定困难，但一定能学好，困难一定能克服。上面所举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有些什么困难呢？困难不是主要的，就是读书上有些困难，或者说读经典著作，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困难，但这个困难也不是很难克服的，至于读毛主席的著作就不困难，或者困难很小。所以会有这个困难，原因只是因为过去念书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上讲的是外国的地理、历史、人物、文化，这些不懂，读起来就有困难；而对中国的地理、历史，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就比较容易。

所以说，工人学哲学中的困难不是主要问题。能不能学好哲学，根本问题不是你懂不懂得外国的历史、地理、文化知识，最主要的还是在能够掌握辩证唯物论的精神。文化低好解决，努力

学习文化就行了；不懂历史、地理，读一些历史地理书也就行了。这些书暂时不读、不懂也不要紧，可以先不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首先读毛主席的著作，能够把精神了解、掌握，也就很好了。即使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不必要都读，例如认真读一本《共产党宣言》，能较深刻地了解就很好了。

学习哲学，不在多读书，而在于掌握它的主要思想，在于能把唯物论、辩证法运用到工作中去。能不能领会、了解、应用，这是学习得好坏的惟一标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工人阶级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定能学好的。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有学问，看不起工人，但是，如果他们的资产阶级观点不变，要他们来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倒是一定学不好的。不要看他们文化高，可以把马克思到毛主席的著作都读遍，但是读虽读了，仍然可以一点也不了解。例如右派分子里的费孝通、吴景超等人，全国一解放就假装靠拢党，也读马列主义书，还吹牛皮说马列主义书全读得比我们干部好。自然，我们的干部进了北京后忙得很，有很多工作要做，读书时间的确比较少。而他们就有很多时间看书，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于是，这些人就翘起尾巴了，好像真是学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似的。结果在 1957 年大鸣大放时，原形毕露了，原来他们的思想原封未动，都是些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他们放出了一大堆右派言论。从解放以来，他们读了那么七八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结果读懂没有呢，一点也不懂，相反地他们只是把它当做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假面具。

在这里，这些资产阶级的教授和学者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是有阶级性和实践性的。没有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不彻底地改变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是无论如何都学

不会、都不能了解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一定要消灭，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已基本消灭了，他们却还妄想保留资本主义或者使资本主义复辟！马克思主义认为：要走社会主义的路，就要有党的领导，而他们却不喜欢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我们认为党领导八年来的成绩是很大的，当然也有缺点，但成绩是主要的。比如天津现在在改造海河，上流在修水库，下流水少，沟渠就暂时发臭了，我们对这缺点有没有意见，有，但没有大意见，因为成绩是主要的，这缺点是很快会被克服的。这是客观事实。而资产阶级的教授学者则认为我们工作中缺点是主要的，他们的这种看法，是和客观事实完全相反的。这样的看法算是什么哲学观点呢？这就是主观主义，就是唯心主义哲学观点。

## 立场问题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承认这一切：中国社会必然要发展到共产主义，中国的发展需要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必然要有这种唯心论观点。因此他们虽然读了七八年马克思主义的书，结果仍然一点马克思主义也不懂，他们自以为读通了辩证法的书，却一点辩证法也没有。

所以，能不能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主要的是立场问题。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永远也学不好，因为这个立场首先决定了你是唯心论者。工人中也有少数人有个人主义思想，这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思想，而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的结果。但如果工人也有个人主义思想，他也不可能学好哲学，因为个人主义一定会造成主观主义。但个人主义既然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思想，所以在工人中间是比较容易克服的，因此工人要学好马列主义哲学，比有些知识分子容易得多。

这样我们可以断定，工人阶级一定能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是这样，马克思为什么要说哲学是工人阶级的精神武器呢？工人阶级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一定能学好。工人阶级天天进行生产，要生产得好，需要懂得机器的脾气，也就是要懂得这种客观物质的规律。如果你对机器的活动规律不熟悉，就不要想生产得好。工人们天天进行生产斗争，自然而然地对生产中的物质规律看得清清楚楚，辩证唯物论的任务就是要我们善于认识客观物质规律，工人的这种生活条件决定了他们有可能把辩证唯物论学得好。学辩证法也是一样，辩证法和唯物论是分不开的，辩证法要求我们认识和解决客观事物的矛盾。在旧社会里，唯物辩证法主要是要求我们认识和解决阶级的矛盾，要求进行阶级斗争。在新社会里，除了继续阶级斗争之外，还要着重地来认识和解决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也要求认识和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即改变自然的斗争）。工人的生活本来就是天天要解决这些矛盾的，所以他们学辩证法当然就可能学好。特别重要的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同，他们不需要留恋旧社会，没有保守思想，他们喜欢新的社会，向往未来的世界。而资产阶级则不然，他们在旧社会靠剥削生活，社会一改变，他们就不能剥削人，所以在他的立场没有改变以前，他总是留恋旧社会。换句话说，工人是希望社会、事物向前发展的，而资产阶级则希望社会停滞不变。发展的思想是辩证法的根本思想，辩证法的观点认为世界一切事物是通过矛盾的不断揭露，通过对立面的不断斗争和矛盾的不断解决而不断前进的。矛盾也推动社会的进步。工人的阶级地位规定了他们希望事物发展，规定了他们容易接受和掌握辩证法。他们不怕发展，不怕矛盾，而是要去主动地找矛盾，暴露矛盾并加以分析，然后解决矛盾，使事物前进，使社会前进。资产阶级则不然，他们怕社

会进步，所以总是力图把矛盾掩盖起来，以便阻挠事物的发展。所以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容易接受辩证法，而是常常要反对辩证法。

去年大鸣大放的时候，右派分子发表了一系列向党进攻的言论。我们不但不怕，而且让这些言论发表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怕矛盾，我们认为：只有让矛盾暴露出来，大家看得清楚了，再来解决就容易了。矛盾是永远存在的，如果把矛盾掩盖起来，这样反而不容易解决。比如葛佩琦叫嚣要杀共产党，我们也把他的话登出来，工人农民一看，就非常愤怒，“这是什么话？”大家都去找他，质问他，或者写信到报馆去批评他。因为矛盾暴露得很清楚了，大家都起来斗争，这矛盾就很快得到解决，反右斗争很快就得到胜利。对工人阶级来说，不但用不着怕矛盾，而且要主动的去揭露矛盾。对反动派来说，最好是把矛盾掩饰起来，偷偷的去散布他们的反动阴谋，这样对他们才有利。同样的，要使生产跃进，也就要主动的找矛盾，找困难，找问题。矛盾揭露得越清楚，困难摆得愈明白，问题提得愈准确，也就解决得愈快愈好。

主动地来揭露、暴露矛盾，然后加以解决，这就是工人阶级所需要的立场，因为有了这个立场，学习辩证唯物论就比较容易了。这里说的容易，不是简单地指读书来说的，工人们目前读书可能有些困难，以后应该逐步在这方面提高，但要他们了解辩证唯物论的基本精神，即使在读书不多的现在，也不一定是太困难的。

## 学哲学要“粗”“细”结合

工人们有的自己怀疑：“老粗”能不能学好哲学？其实一点也不用怀疑。“老粗”不能学，谁能学？难道还有一个什么老细能学得更好。工人同志说自己是“老粗”，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看，一

方面，这是讲的缺点，就是说，文化少一点，读书有点困难。但这是暂时的。还有另一方面，这恰恰是优点。说“老粗”，是指的革命干劲很大，说干就干，要干就干，不怕困难，不怕吃苦。如果这样来理解“老粗”，那么“老粗”学哲学，就一定能学好。而如果有什么“老细”的话，他要来学习哲学，首先还得根本改造自己，学习“老粗”的干劲，学会了“老粗”的干劲，才能把哲学学好。“老细”是什么意思呢？我看，就是干劲不足，前怕龙，后怕虎，像小脚女人走路那样，走起路来也是细细巧巧，劲头不足的，这种人，我看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党中央提倡共产主义风格，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这就是“老粗”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能学好辩证唯物论。当然，人们还需要“粗”中有“细”，首先要有冲天的革命干劲，就是要有“粗”，然后还要再有“细”，这个“细”，不是指某些知识分子小脚走路的那种“细”，而是另外的一种“细”，是指对待问题能够实事求是具体地加以分析。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使我们善于“粗”“细”相结合，“粗”，就是要不怕任何困难，要敢于提新问题，敢于主动地找工作中的矛盾，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于现有的成绩，要不断地努力把事物推向前进。“细”，就是对矛盾、困难要进行具体的、仔细的分析，在解决矛盾克服困难的时候要尽可能周密地考虑办法，不要主观地蛮干一通。《水浒传》里的李逵，是一个好人，穷人出身，敢说敢作，一个人杀死四只老虎，打仗赤膊上阵，干劲的确很大。但也有缺点，就是有时候不会分析，发起脾气来，挥动两把板斧，往往不分敌人、友人，乱砍一顿。不会仔细分析问题，即使革命热情很高，也常常会把事情弄坏，所以必须注意。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中，要

我们具体地分析矛盾，要学会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二类矛盾的性质是不同的，解决方法也不同，不能混淆在一起。如果用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会破坏人民之间的团结，反过来说，如果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解决敌我矛盾，就会在事实上放纵敌人来破坏自己的事业。去年右派分子进攻的时候，有些人还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对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些人犯了右倾的错误。这就是不会具体分析矛盾，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混淆起来。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的根本精神，就是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永远保持高度的革命干劲，另一方面又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来分析客观事物的矛盾，使我们有可能正确地解决矛盾。换一句话说，就是一方面要有“老粗”的精神，另一方面要有细致科学头脑。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决定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们一定能学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 三、怎样才能学好哲学

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学习好辩证唯物论哲学呢？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上，有着两种根本相反的，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方法。

### 教条主义要不得

学习哲学的一种不正确的方法，就是只注意读书，只注意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其他都不管。这种学习方法，只能使人学会在嘴上讲一套原理原则，不能把所学的拿到实际工作中来运用。这种方法，是资产阶级学校里一贯采用的方法。在这些学校里，把读书看做是学生的惟一任务，把一切学习的问题看成只是读书的

问题，只要从书本学会讲一套原理，至于怎样运用，却管不着。这是教条主义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我们的有些学校也用了，效果很不好，受到了批判。

我们工人同志中有没有用这样的方法来学习哲学的呢？没有很明显的例子，但是接近或类似这种错误的看法也还是有的。如有些人认为自己学不了哲学，是因为文化低，不能多读书。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是受了教条主义者的影响，认为要学好哲学的主要方法就只有靠多读书。再如有些人说，我现在搞工作不会讲一套，学好了哲学将来可以比别人能讲。如果把这种想法当做学哲学的主要目的，那也就有些类似教条主义了。因为学习的结果虽然可以比别人能讲一套，但学习的主要目的却不是仅为了口上讲一讲。所有这些想法，都是不正确的。学习哲学的主要任务不应该放在读书多少的问题上、能不能讲一套的问题上。学习哲学固然一定要读书，并且也应该争取能多读书，但文化较低，不能马上读许多书的人，不一定就不可能学懂。学哲学可以帮助我们讲清道理，但主要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在嘴上能讲一些漂亮的词句。你们中间如果谁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把它打消。因为抱有这种想法，就学不好哲学。

那么学习哲学的正确方法是什么呢？我看，用不着我来多讲，工人同志们自己的有些哲学学习班、组已经开始创造出了很好的学习方法。上海求新造船厂、天津的有些工厂已经摸索到了一些好的方法。我所想到的，基本上也只是和大家创造的差不多。事实上，学习的正确方法，主要还是要靠大家在学习中摸索、创造。我这里只是把大家已经摸索、创造出来的方法加以概括地介绍出来，把学习方法的主要方向讲一讲。

## 最主要的方法是结合实际

上海求新造船厂在学习哲学时，也曾经有过两种不同的方法。最初，有些学习组织采取了讲课、听课为主的方法，不着重联系实际。就是请个教员，按照某些讲义提纲来讲，而且在讲的时候，讲了许多外国的历史、外国的事情，而不注意结合今天中国的实际、结合工厂中、工人中和生产中的问题。这样学习的结果收效很小。后来他们改变了这种只讲抽象理论的方法，主要是结合生产、工作中的问题来学。学习文件也不是一般的讲义，而是学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三篇著作。在学习过程中，随时结合生产中的问题并加以解决。比如学习"矛盾论"时，懂得了事物发展过程中有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而内部矛盾是发展的第一性的、根本的原因。他们就结合本厂的情况，结果找到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厂有两个车间，设备、技术力量、劳动力等都差不多，但是生产的成绩却相差很远。他们运用所学习的理论来分析这二个车间的问题，找出了它的原因。生产成绩好的车间，是因为内部矛盾解决得好，生产成绩不好的车间主要是由于自己内部矛盾没有很好解决。所以内部矛盾的解决不解决，从根本上决定了事物的发展，决定了这两个车间生产成绩的好坏。他们这样一联系，既对原理原则得到了较深的了解，对改进实际工作也就有了用处。像这样的例子，不仅他们厂有，到处都可以找得到。比如：每个工厂都需要外面供应材料，如纺织厂要外面供应机器和零件，在大跃进中，各方面都在发展，生产设备和各种零件的需要很大，外面的制造厂来不及供应。怎么办？不解决这问题就不能更好地跃进。有些厂就自己办副业，搞些机器修理厂或零件制造厂，也就是由自己内部来

解决矛盾，不去死等外来供应，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有些人却批评这种做法，说这是不务正业。按照他们的这种思想，要怎么务正业呢？那就是对这些问题自己不去组织力量解决，死死地专等外厂供应，结果外厂供应不上，就妨碍了跃进。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二个相同的纺织厂，在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一个厂采取了不怕“不务正业”的方法，从自己内部来解决自己的这个矛盾，一个则等着外厂来供应，专门希望从外部来解决矛盾，那么哪一个厂跃进得快呢？显然是前面一个厂。我在这里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内因和外因的关系，为的是说明联系这样的问题来学哲学，可以使我们一方面了解哲学的原理，又可以对工作有帮助，解决了工作中的问题。并不是说一个工厂可以完全不务正业。对于一个工厂来说，正业还是主要的，问题是不能单纯地只搞正业，而不搞任何副业。正确的提法是正副业结合，在一定的可能条件下，尽可能地搞一些必要的副业，这样就可以在自己内部解决许多矛盾，便利于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

天津在学习方法方面有很多创造，如刚才所说的仁立毛织厂的李长茂同志，学习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的原理，就运用到他车间里，解决两个工人的不和。再如，有的同志说：我们工厂车间里每个月的中心任务不一样，经常有不同的主要矛盾，一个主要矛盾解决了，又会有新的主要矛盾出现，因此就又要不断地主动地去找主要矛盾。矛盾是永远有的，他不断地主动去找、去发现，去想办法解决，这样，生产工作的发展就快得多了。有些人怕矛盾，不去主动地找矛盾和解决矛盾，这样，就不能使困难、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工作也就不能很快进步。

## 认真钻研毛主席著作

上面这些，就是工人同志在学习中自己创造出来的方法，这就是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对今天的工人们来说，理论结合实际，主要地就是要结合生产的实际，也就是要在学习辩证法唯物论的过程中，直接运用所学到的原理原则，分析研究和想办法解决生产中的困难问题。学习的成绩好不好，标准就在于你是否能应用哲学原理来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来提高生产效率。我们把这种学习方法作为学习的主要方向提出来，希望大家都能这样来做。

学习理论，首先要读毛主席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可以随着文化的提高，逐步地读一些。应该读毛主席的哪些著作呢？首先就应该读《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践论》，主要是讲的唯物论的；《矛盾论》，主要是讲的辩证法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又讲了辩证法唯物论、又讲了历史唯物论，如关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所以，只要我们把毛主席的这三本著作仔细地认真地学习，逐段逐段地钻研，结合实际、结合工作，把毛主席说的话运用来联系和解决我们生产中、工作中的问题，这样既学懂了理论，又解决了实际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努力这样做，那我们一定能够学好哲学。

党中央提出了厚今薄古的口号。就是说，对今天的东西要重视，也就是说，要重视今天的斗争——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学习理论，就是为了要解决今天的斗争问题，过去历史上的老问题，同今天的关系不大的，就不要花费很多工夫去钻。上海求新造船厂开始讲哲学时，讲了许多康德、黑格尔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过去的，又是外国的，暂时不了解，并不太要紧，不必急于去钻

它。目前我们首先应当多读些毛主席的著作，多结合当前的实际、结合今天的斗争。

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又叫有的放矢的方法。学习毛主席的著作，除了上面三篇外，还可以学《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有的放矢”的方针，就是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的。所谓“有的放矢”，就是学习要有目的。“的”就是实际，就是我们生产和工作中的问题。“矢”就是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有的放矢”，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去解决我们工作中、生产中的问题。我们学习任何一个理论原则，都应该“有的放矢”，都应该结合实际。例如学到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原理时，就要想想我们的车间、厂子里，有没有内部矛盾，领导和被领导、工人和工人之间有没有矛盾，这些矛盾有没有揭露出来、摆出来，矛盾解决了没有，如果没有解决，我们就要想办法去解决。再如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要研究客观事物的规律，根据这些规律来做工作，而不要只凭主观的想法来做工作，我们学习以后，就要想一想，我们在车间工作中是否有这样的问题：不了解情况，凭主观想法办事。如果有，就应当做自我批评，加以改正。应当学习把毛主席的理论当做武器、当做箭，射到我们的工作、生产实际中去。这也叫做边学边用，这也是大家已经创造了的正确的学习方法。

## 提 高 一 步

用这种方法学习，有没有缺点呢？开始可能有，结合得琐碎、片面一些。毛主席的著作是很系统完整的，我们最初只会拿出一二条原则来结合，这样的结合多少可能是片面的，可能解决问题不会很透彻，了解理论原则也不很透彻。开始学习时候，有这样的缺点是

不是可怕呢?没有什么可怕,因为结合实际这个方向是基本上正确的,所以缺点也可以逐步克服。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需要一步一步地来学习的。有些人主张:要先学好理论,再来结合实际,即先读一整套书,学好了一整套有系统的理论,然后才说得上应用,这种说法并不妥当,因为要等完全学通了理论再来结合实际,这事情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不结合实际,怎么可能把理论真正学通呢?右派分子读了七八年马克思主义的书,结果一点也不通,就是一个明证。所以开始时不要怕片面、零碎,最怕的倒是不结合实际。只要我们不是得到了一点东西就自满自足,而是不断地积极地学习下去,只要我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方向,那么开始即使零碎片面一些,最后一定会逐步系统、完整起来的。

我们学习哲学,应该不断地使自己提高,读书方面也一定要努力,一天比一天读得更多一些。但是在开始的时候,应该首先把前面提出的毛主席的几本著作读好。如果能在一年之内结合实际认真地读完它,这也就不错了。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应当读,并且应该随着我们文化的逐步提高,读书能力增强了,争取继续多读一些。如有困难,暂时不读这些著作也可以。读毛主席著作,一定能帮助我们学好哲学。当然,读毛主席著作,也要有一定的文化条件,但毛主席的著作是最接近我们,因此也是我们最容易领会的,所以应该先从它开始着手学习,有困难,再一步步地克服。学习的过程,和生产、阶级斗争一样,也是一个克服矛盾的过程。

毛主席指出: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又曾指出我们中国人民是勇敢勤劳的。因此我们要革命,要苦战三年改变落后面貌,一切工作要政治挂帅。而学哲学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是政治挂帅。我们已经找到了学哲学的道路和方法:以政治斗争

和生产斗争的实际为目的，去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哲学是有的放矢，以唯物辩证法作为工具和方法，用它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关于学习方法，就只能讲这一点。这个方法也就是大家已经在学习中创造了的。

## 工人要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人

工人学哲学，不是为学习而学习，是为搞好生产、搞好管理工作而学习，所以很容易掌握哲学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大家知道，我们的生产大跃进，不是单靠增加劳动强度，而主要地要靠钻研问题，要搞技术革新。“两参一改”实行后，工人参加了管理，光管技术不行，还要学会做行政管理，学会做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从工人学哲学到农民学哲学，这是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这不是简单地学习的问题，又是学习，又是革命，又是提高思想，又是提高生产，工人学哲学是文化革命，同时它本身又和技术革命密切联系着。从工农学哲学发展到某些地区的全民学哲学，这是伟大的革命，它意味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界限逐渐消除的开端，是思想上的共产主义的萌芽。它将发挥难以估计的物质力量。

新的时代给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我们要进一步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工人同志多么英雄气概地说：“外国人没什么稀奇的，外国人不算什么。书本上没有的，我们可以搞。外国没有的，我们可以有。”是的，我们有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六亿人民，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有苏联老大哥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无私帮助，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我们什么都可以做。我们的人口等于四个美国，十个英国，生产也应当相等。

工人参加管理，业务不熟办法少，学学就会了。车间主任可以当工人，工人也可以当厂长，中国将来需要几万几十万工厂，就需要几万几十万厂长。工人不仅管理企业，也要学会管理国家。国家是大家的，应该大家管。工人可以当管理国家的人，管理国家的人也可以当工人。这两者的界限也是要逐渐消除的。

农村也办小小工厂，将来办大大的工厂，农民也步步向工人看齐，事实上由于有去年冬天的农业的大跃进，才推动了今年春天工业大跃进。工农的界限逐渐消除着，向着亦工亦农的方向前进着。工农学哲学也应该互相学习。

全国各地许多工厂正在搞“插拔运动”——就是拔白旗，插红旗。这个运动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着。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割奴隶尾巴，辨别风向，敢想敢说敢做，树立共产主义风格。我们只有掌握哲学武器，才可以更深刻地体会这些真理，成为自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会有大智大勇，有力量把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唯心主义白旗统统拔掉，插上我们的红旗。我们的任务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及其残余，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我们有鲜明的立场，高度的阶级觉悟，也学会了在暴风雨中立定脚根。我们越想越觉得前途无限光明，世界是属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我们将要看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插起红旗，看到条条道路走向共产主义。“从来的哲学家只是这样那样的说明世界，而我们的哲学要改造世界。”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预言：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应当在我们这一代工人阶级手中彻底实现！

（曾收入《破除迷信大家学哲学》一书中，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 年 9 月版）

# 哪里找根据?

(1958.7)

天津仁立食品厂青年技术员马国荣，发明用真空充氮处理方法消灭了蛋品中的沙门氏菌。当他的这项试验在进行的时候，一个全国有名的大夫责难他说:"这事恐怕不可靠，因为文献上还找不到根据。"马国荣没有被这一番威胁所压倒，他回答说："根据还不是人创造出来的，没有根据的终有一天会有根据。"结果是，马国荣胜利了，用文献来吓人的人失败了。

这一件事情，不能仅看做个别的例子，类似的情形在目前中国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一方面，我们的国家正在大跃进，各项工作中都出现了许多敢想、敢说、敢做的人物。他们不甘心保持现状，藐视一切陈规，努力为创造新的成绩而奋斗。他们多数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士兵，是被一些名人、教授们认为学识浅薄，不在话下的年轻人。但是，正由于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斗争，就在落后的旧事物前面出现了许多鲜明的对立面，因而产生一种强大的动力，把各方面的工作迅速地推向前进。另一方面，我们的周围还存在着这样一些人，他们不相信新中国能够飞快地跃进，把旧时代的落后和迂缓看做是不能改变的事情。一遇到群众中有了新的创造，就连忙摇头表示怀疑，或者站起来加以指责。这类人中间有一部分是名人、教授。他们的主要资本就是比较多读了两本书，因此，书本、文献就成为他们反对新事物的主要武器。照他们看来，似乎书本、文献规定了事物发展的极限。人们的思想、

行动都只能以它作为最后的根据，谁如果在书本、文献里找不到根据，谁就不应该前进一步。

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是否应该有根据？当然应该有。根据就好比立脚点，好比建筑物的基础，没有根据，人就站不牢，建筑就要垮。思想没有充足的根据，无论怎样，都不能达到正确的结论。就由于这个原因，一些名人、教授们才要用根据的名义来作战：首先把对方的思想、行动说成是没有根据的，这就好像可以压倒对方了。但在实际上，这里所要争的，并不是要不要根据的问题，而是如何找根据的问题。有些人以为，只要给自己的立论随便找到任何一种理由，都可以算做找到了根据，不管这种理由是哪里找来的都好。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随着人们的观点的不同，对于根据的看法也有不同。把书本、文献作为最大法宝的有些名人、教授们认为，马国荣的试验是没有根据的，李始美治白蚁的创造也是没有根据的。但是，照千千万万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们的看法，这些名人、教授的所谓根据，并不见得就是真正的根据。这里有着关于找根据的两条根本相反的路线之间的斗争。一条是，认为根据都在书本、文献中，在人的主观领域中，这是教条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路线。另一条是，认为根据存在于发展着的客观事物中，存在于能够认识和利用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进行创造性劳动的广大人民的实践中，这是唯物主义的路线。

我们反对某些名人、教授们的唯心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根据论。如果这种根据论是正确的话，那么事物就不会向前发展，中国革命就不会胜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就不可能完成了。因为新的事物的出现，在旧有的现成书本、文献里常常是找不到根据的。中国革命所走的道路，就其具体的方法和形式来说，原先也没有从现成的书本、文献里找到过根据。

中国的民主革命曾经通过乡村包围城市的长期战争过程而得到胜利。在初期，这个发展过程是在任何书本、文献里找不到根据的，因此，曾遭到教条主义者的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反右斗争的政策，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整风形式，在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出版以前，并没有现成的书本、文献作根据，然而反右斗争和整风运动给全国工作带来了大跃进的形势。“依靠群众，小型为主，以蓄为主”的治水方针，“长藤结瓜”，“白马分鬃”，“葡萄串”，“满天星”，都是群众的创造，没有任何书本、文献作为现成的根据。因为有了这些创造，并且采取了其他许多办法，只在去冬今春的短时期里就给我国扩大了灌溉面积四亿多亩，超过了历史上几千年来的成绩，也超过了解放后八年来的成绩。事实驳倒了唯心主义、教条主义。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真正根据，不能只是在书本、文献里去找，而应该到发展着的客观世界里，到火热的人民群众斗争里去找。

还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断定这个战争是持久战，而战争的最后胜利必然是在中国方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论持久战》里曾提出过这个问题。他并没有从任何论战争的书本、文献里去找这个根据。在当时的任何书本、文献中都找不到他那样的论断。毛泽东同志是这样回答问题的：“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① 这就是说，抗日战争之所以是持久战，而最后胜利又必然属于中国方面，这个论断的根据，就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9页。

是互相斗争着的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双方在当时的矛盾的具体特点和具体情况。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里详细分析了这些矛盾的具体特点和具体情况，就做出了上述的论断，而这样的论断，正是惟一正确的科学论断，八年抗日战争的全部过程完全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应当向迷信书本、文献的人指出：归根结底，行动在先；先有人们的创造行动和斗争，然后才有记录和总结这些斗争经验的书本和文献。

在科学的书本文献中，正确地记录了前人的有益的经验，或者是总结了前人的经验而形成了正确的理论。这些书本和文献当然是需要的，是能够帮助我们的。但我们必须参考前人的经验而做到后来居上，不能停止在前人的经验上面；我们必须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使得理论的内容更加丰富起来，而不能只是背诵理论的原则。

因此，我们虽然必须善于从有价值的科学的书本文献中找到帮助，但是决不应该用任何现成的书本文献来束缚自己的手脚。并且，有许多书本文献的内容是错误的，对我们的事业不是有益，而是有害的。因此不但不能把它们作为根据，而且要加以严格的批判。

迷信现成的书本、文献，不敢在发展着的客观事物中和火热的人民群众的斗争中去找我们思想行动的根据，这是束缚人民群众的创造的积极性，阻碍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一种右倾保守思想。要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必须坚决反对这种右倾保守思想。

（原载《红旗》第4期，1958年7月16日）

# 改革规章制度，充分解放劳动人民的创造力

(1958.8)

今年是我国工农业发明创造空前高涨的第一年。工人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舞之下，在生产上进行了最勇敢的革命活动，短时期内，出现了许多赶上或超过英美的新产品。我们曾到工厂里去询问：为什么在工人群众中间目前会表现出这样巨大的积极性？回答差不多都是一致的："因为实行了'两参一改！'"

"两参"就是干部参加生产和工人参加管理，"两参"改善了干部和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也就是改善了生产关系，使之成为完全符合于社会主义生产发展需要的关系。"一改"就是把一些不适合需要的或过时了的规章制度加以修改或废除，解决了一部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便利了生产力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工矿企业中，"两参一改"正是在企业内部解决了这两个基本矛盾，使生产力能够飞跃前进。

我们在这里只想就规章制度的问题谈一谈。本期发表了吴文彬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一个企业部门的规章制度的问题做了详细的分析。从他的分析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的情形下面，作为上层建筑的规章制度，是怎样和经济基础发生矛盾的。这些规章制度中，有47.2%可以保留不变，有29%需要修改，需

要废除的占 23.8%。这就是说，我们原有的规章制度，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发展的需要的，需要根本废除的只占一小部分。但如果加上必须修改的部分，那就应该承认有相当大的分量是和生产的发展相矛盾的。如果不认真地加以改变，生产的发展就要受到很大阻碍。吴文彬同志的文章中所分析的情形，大体上可以看做是全国各种企业中的规章制度问题的一种典型。作为上层建筑的规章制度的作用，就在于它对一定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赋予法律的强制性。当它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时，这种法律的强制性就能帮助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形成，就能便利生产力的发展。例如以前的工商业税收制度，曾经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已经获得基本胜利的今年，我们又依据新的经济基础的需要，公布了一个新的农业税条例。这个条例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生产力的发展同样会有重大的作用。反之，如果规章制度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合，它所规定的某些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对于生产发展的需要来说是互相矛盾的，由于它的法律的强制性，对于经济基础的巩固，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就特别有害。例如吴文彬同志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些繁琐的办公手续，过多、过细、过死的规定，严重地妨碍了社会主义生产中人们的相互协作，限制了工人职员们的创造性，不必要地过多地消耗了人力物力。因此也就妨害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阶级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剥削制度下面得到了解放的劳动人民，在生产方面必然要表现出空前未有的高度的积极性。因此，1949 年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社会生产发展的速度，就是旧社会所不能比拟的。

1956 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立即就出现了一次生产的大跃进。这些都是最明显的例证。问题是，我们不能满足于一般地比旧社会较快的速度，我们应该把劳动人民可能发挥的积极性充分地、最大限度地鼓舞起来，使生产力尽快地向前发展，使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高度文化水平的国家。为此目的，就必须打破一切妨碍劳动人民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消极因素。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妨害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的最根本的阻力——剥削制度——基本上被打破了，但这并不等于说障碍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消极因素都完全消灭了。为要把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起来，以便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还需要克服其他的矛盾，打破许多的障碍。生产关系有建立得不够完善的地方，领导生产的干部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毛病，就是一种障碍。这个矛盾，通过“两参”的方法克服了。不适合的或过时了的规章制度，也正是一种消极因素，这些规章制度，从吴文彬同志的文章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它们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束缚劳动人民的手脚。“创造就是违法”，这就是劳动人民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正确批评。我们改革了规章制度，就使创造力从这种不正确的清规方面解放出来了。

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上层建筑要能够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就必须正确反映经济基础和生产的情形。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之所以不合理，就是由于它不能反映经济基础和生产发展的情况。例如吴文彬同志的文章中关于“控制、约束、监督过多”的一类规章制度，在旧社会里，表面上也许是适用的，因为旧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剥削制度，在生产中需要较多的控制、约

束和监督。但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方面，过分的控制、约束和监督显然是不必要的，有了这样的规章制度，反而成为生产的障碍。有些过细、过死的规定，例如机车锅炉水管座只能用铜的，不许用铁的，而铜的总是漏水。北京铁路局旧的规章规定货客运机车运行四十万或五十万公里以上，一定要进行大修，实际上不需要，工人把这种“大修”叫做“强迫患小病的人住院开刀”，这就是规章制度不能反映经济基础和生产情况的例子。为什么规章制度会发生这种不合理的情形？这就是由于：或者在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人们就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没有认真调查实际情况，没有通过群众路线，因此一开始制定出来就是不合理的。或者是，原来的规章制度是能反映实际情况的，但经过一定的时期，客观事物发生了变化，由原来合理的规章制度变为不合理的了。

因此，改革规章制度，就是要按照唯物主义的原则，首先检查这些规章制度是否能正确反映经济基础的情况和生产的情况，这样来辨别哪些是应该保留的，哪些是应该废除或应该修改的。工农群众是在生产过程直接受到规章制度的约束的，只有他们才能深刻地体验到一种规章制度的是否符合情况，是否合理，是否过时。目前全国各种企业和工作单位里改革规章制度的方法，包括吴文彬同志的文章所谈到的企业在内，首先都是通过群众的鸣放，这是完全正确的。“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是推动一切工作的根本方法，也是改革规章制度的根本方法。目前全国各种企业和工作机关在改变规章制度方面已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后还需要常常这样做，以便随时把一些过时了的规章制度改变得适合于当前的情况，使人民的创造力经常得到充分的发挥。

（原载《哲学研究》1958年第4期，1958年8月）

# 关于民主与专政问题*

(1958.9)

各民主党派在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些问题。我将这些问题归纳成四个：一、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二、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三、关于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其中主要是民主与专政的问题。

## 一、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

建设社会主义，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对这个问题如何答复，是区别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准之一。去年资产阶级右派攻击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他们的谬论已受到了反驳。但这问题在许多人中间并不是完全解决了。现在还有说明的必要。

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原理之一，是在任何时候也不可动摇的。凡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一定要坚持这个观点。

---

* 这是艾思奇同志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整风报告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可能是在1958年9月间，因为他说是在去天津参观之后，而10月他已下放到河南。本文略有删节，删去了“四、关于阶级分析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的最早的政治宣言——《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宣言说："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那时还没有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词，但这句话就是指无产阶级专政的意思。过了几十年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更明确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着一个前者转入后者之革命的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底国家除了无产阶级底革命的专政以外，不能是别的任何东西。"（《哥达纲领批判》，1950年解放社版，第33页）最近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中又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这个宣言是共产党一百多年以来基本经验的总结，它指出了一切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九条共同规律，其中第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说，在任何国家里如果要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就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遵守这一条规律，一切都无从谈起。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经之路，是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不过是正确反映了这个客观规律，它并不是任何人在脑子里的主观设想。这不是谁愿意或喜欢的问题。不管你愿不愿意，喜不喜欢，只要你真正想实现社会主义，就得走这条道路，就必须遵守这条规律。因为这是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所以正确，其根本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是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的，它是反映了客观规律的。

由此可见，要区别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可以找出一个根本标准，就是看他们是否肯定无产阶级专政，是否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坚持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观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或者口头上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之间不管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都有一个共同之点，那就是都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

大家知道，直到现在，讲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的派别很多。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就有过空想社会主义，如英国的欧文，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后来有无政府主义者，也自称为工人阶级思想，自称为一种社会主义者。这些所谓社会主义思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有曾经被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过的封建社会主义，那是一些没落的地主阶级的思想，他们假借社会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名义，来宣传企图使封建统治复辟的观点。某些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者，也讲社会主义，说在他们国内也是搞的社会主义的，实质上他们搞的是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了一些修正主义者，他们假借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实际上是要企图取消马克思主义。这许许多多“社会主义”的派别，他们在口头上都是讲社会主义的，我们用什么标准可以把他们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加以区别呢？最好的标准，就是上面已经说过的，看它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学说和假马克思主义思想检查一下，就会发现，不论是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修正主义或者假马克思主义等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即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不同意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在我国，曾经有康有为这个人，写了一本《大同书》，那里面的理想在当时看来算是很惊人的，那里面主张消灭阶级、消灭私有财产制度、消灭国家以至于家庭等。这可以算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的理想。但是不论他的理想有多高，他还是逃不了一个最根本的缺点，就是不知道应该有无产阶级专政，甚至还不知有无产阶级。因此他所讲的大同共产主义的理想，归根结底仍然只是空想。总之，一切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社会主义学说，因为它们否认了或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必经的道路，因此他们或者只是流为空想，或者只是对人民的欺骗（如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统治者所谓的“社会主义”）。他们思想上都具有唯心主义的特征，这就是说，这些思想都不能反映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客观规律，或是简直就是反对这种规律。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一切所谓“社会主义”的共同点，也可以说是它们的共同的错误。这不是仅仅逻辑的错误，而是和一定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互相联系着的错误。

长期历史的事实证明了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社会主义思想的错误。所有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好心的实验，没有不是以失败告终的；资产阶级国家有些统治者的所谓“社会主义”，根本上就是资本主义。就以修正主义来说，它的虚伪面貌现在也很清楚地被暴露了。修正主义有新的和老的。老修正主义以伯恩斯坦为代表，新修正主义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不管是新修正主义还是老修正主义，他们在政治上都反对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客观规律。老修正主义者是很露骨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他们公然宣布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根本观点是过时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到社会主义，用不着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这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是完全相反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早已指出，旧的制度和旧的阶级决不会毫无抵抗地退出历史舞台，资本主义也决不能和平地长入到社会主义，要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力，才能达到目的。老修正主义者欺骗工人说，工人阶

级可以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通过各种和平改良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他们这些观点，并未得到事实上的任何证实。如众所周知，修正主义的政党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曾经成为执政党，例如英国的工党有过几次成为执政党，但工党的几次执政，并没有使英国多多少少变成有半点社会主义的气味的国家。这就是因为英国工党在执政期间，始终是替资本家当代理人，根本没有代表无产阶级来执政。法国的社会党也曾经执过政，在 1935 年间法国社会党领袖莱翁勃伦曾经组成了人民阵线政府，但结果法国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些事实都可以说明：资本主义不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修正主义者硬说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只用改良的办法就可以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实现社会主义，这完全是一种欺骗。

南斯拉夫的新修正主义的表现形式虽然多少比较复杂些，但它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实质和老修正主义是一样的。关于资本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的转化的问题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和老修正主义的观点是根本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思想的实质上是支持了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在南共纲领里面，公然宣称帝国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开始。根据这种完全错误的观点，就做出了根本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按照它的说法，似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并不需要为自己夺取政权，而只要作些运动，给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加上一点压力，就可以使这个国家来实行社会主义。这样的观点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有什么区别呢？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只不过说法上、表现形式上稍有不同吧了。南共纲领在这里宣传了一种错误的超阶级的国家论，它硬说国家对不同阶级是一视同仁的，它可以为互相敌对的阶级同样服务，因此无产阶级不

需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只要对资产阶级国家加上一点压力，这同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似乎就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了。就这样，他们利用这种超阶级的荒谬的国家观点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否定了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科学规律，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地达到了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如果老修正主义已经在历史事实前面破了产，那么新修正主义当然也在事实面前站不住脚的。

为什么实现社会主义一定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理由很明白，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只要人们高兴就会出现的，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阶级斗争，因为世界上存在着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不会一点都不勉强地、自愿地让社会主义实现。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希望资本家拿出钱或依靠伟大人物的力量来实现社会主义，傅立叶以为只要说服拿破仑，实现社会主义就有可能。这些空想终于只是空想而已。实现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要消灭阶级剥削制度，就要剥夺某些剥削阶级的财产所有权，首先就要消灭资产阶级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将资本家掌握的生产资料改变成为国家（全民）所有。不但如此，要实现社会主义，不仅要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且还要改造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能够产生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也就是要改造农民以及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使之变为集体经济。总而言之，要实现社会主义，首先要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兴无灭资”。但问题还不仅仅是要在经济上“兴无灭资”，问题是还要在思想上政治上战胜资本主义，在思想上政治上“兴无灭资”。只有做到这样，才能保证资本主义没有复辟可能，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否则，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改变了，而没有在思想上政治上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仍然有复辟的

可能。总之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进行各方面的、广泛的、深刻的阶级斗争；要保证这样的斗争的胜利，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是显然不行的。我国这几年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事实上是经过了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在农业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中也是存在着斗争的。在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以后，又经过了去年政治上思想上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经过了反右整风运动，才有今年工农业生产上的大跃进。就是在生产跃进的过程中，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也继续存在。例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相信工人农民有巨大的创造力量，这里就要有思想斗争。有些富裕中农不相信合作社的优越性，在发展生产方面要和合作社较量较量，这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当然在生产发展过程中，有一部分斗争是劳动人民中的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斗争，而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随着生产的大跃进，工农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日愈充分显示出来。

刘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们内部的主要矛盾。"由于在整个过渡时期要解决国内的这个主要矛盾，也由于对国外还要长期地和帝国主义者的阴谋破坏进行斗争，所以，如果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得到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任务，就是为了要对付国内不愿接受改造的剥削阶级的反抗和国外帝国主义者的破坏，这就是实现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理由。

## 二、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

应该首先指出，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国家制度也是一种民主制

度，它是广大人民的民主制度，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它比起来，就显得十分地狭隘和虚伪。世界上在出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为广大人民所享受的民主制度。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早已讲得很清楚，我们的政权对敌人来说，是实行专政的，但对广大人民则是民主的制度。在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里他又告诉我们，我们采用专政的方法，是为了解决敌我矛盾，至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就要采用民主的方法。

我们首先应该用阶级观点来分析问题：专政有阶级性，民主也有阶级性。两者是同一阶级政权的不可分的两方面，有什么样阶级的民主就有什么样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且实行民主制的资产阶级国家只是资产阶级国家中的一部分，法西斯化的资产阶级国家是一点民主也没有的。一些资产阶级国家自称是民主的国家，并且吹嘘自己是惟一的民主国家，这完全是欺骗。因为他们的民主只是资产阶级范围内的狭小的民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是另外一种民主，是广大人民的民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这就是说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时，同时就有了无产阶级的民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指出，由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不只一种量的变化，而且是质的根本变化，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广泛得多，同时它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而资产阶级民主仅仅是资产阶级少数人的民主。美国的民主制，就是只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民主制，无产阶级在那里是没有真正民主权利的。无产阶级民主就不是这样，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享受民主权利的不限于无产阶级，农民也同时有真正的民主权利，在中

国的特殊情况下，连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也有民主权利。所以资产阶级国家的所谓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在范围和性质上根本不同。

有人说，“民主是手段”，因此它应该为各阶级服务。这话的意思是说，人们似乎可以拿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度来为无产阶级服务，似乎中国就不一定要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了，不要民主集中制了。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这是抹煞了议会民主制的阶级性，把它看做超阶级的手段了。民主是手段，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能因此做出结论，说某一种具体的民主制度可以为任何阶级服务，对任何阶级都一视同仁。因为民主制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它由一定的经济基础一定的阶级所决定的，并且为这一经济基础和这一阶级服务的。因此它不像自然界的物质，可以为任何阶级服务。同一种机器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中国地大物博的自然条件，曾经为中国的封建经济服务，以后又为官僚资本主义所利用，甚至于又成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对象；在新中国条件下，它是更好地为无产阶级为全国人民服务。但是，民主制就不能这样，它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有怎样的经济基础，就有怎样的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也就有什么样的民主制度。不同的民主制度，只能为不同的阶级服务。议会民主制是在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并且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民民主制度必须是民主集中制度，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为广大人民服务。

我们必须从实质上而不要从形式上来看民主制的问题。仅仅从形式上看，资产阶级民主制好像是对各阶级一视同仁的，它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平等权利来决定国家制

度和管理国家。因此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的人，就可以找到一些表面的理由来为资产阶级民主制辩护。例如他们可以说，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共产党还可以公开存在，议会里可以有共产党的议员，还可以出共产党的报纸，这不是说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也可以为无产阶级共享吗？英国海德公园里面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演说，这不是也为各阶级服务吗？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如此，但问题是在于实质如何。如果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广大人民立场上，仔细研究一下它的实质，就会看到资产阶级民主制是极狭隘的，而无产阶级民主才是广大人民的民主制度。当然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允许共产党出报纸，但是共产党在这些国家出报纸要受到很大的限制，他们的出版机关甚至于读报的人要常常会受迫害，报纸的发行数量，和资产阶级报纸比起来，是微小得不足道的。因此它的作用和构成国内大多数人口的无产阶级的需要是极不相称的。资产阶级统治者，仅仅是为着给自己的民主制装点门面，才勉强允许无产阶级有这样的出版权。只要这种出版物多少有些影响到资产阶级统治，资产阶级统治者就立刻对它施行迫害。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实吗？只有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看问题的人，才会对这种虚假的出版自由进行歌颂。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有共产党的存在以及议会中有共产党的席位等等又怎样呢？这是不是就能说明工人阶级在那里真正有了民主权利呢？从形式上看，特别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好像是有民主权利了，但从实质上来讲，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情。所谓民主权利，就是参加决定政府的制度、政策和管理国家的权利。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有没有这种权利呢？显然是没有的。不必说英国、美国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得不到这种权利，就是在议会里占有相当多的席位的法国共产党，也得不到这种权利。为什

么呢？道理很简单，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是议会和行政分立的，尽管工人阶级的党在议会里有相当的多数，而政府方面的行政方针仍可以完全由资产阶级控制。资产阶级就是这样利用议会民主制来为自己的政权装点门面，而议会民主制也就这样来为资产阶级服务；议会民主制的阶级性，在这里暴露得再明白没有了。修正主义者把资产阶级国家看成超阶级的，硬说工人阶级只要能够对它施加一定的压力，就可以使同一个国家也为工人阶级服务，这完全找不到一点事实根据。当然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不能在一定条件一定限度之内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在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进行合法斗争，例如利用议会讲坛来宣传自己的政策，通过游行、罢工等形式来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某些措施和欺骗等。但任何一种民主形式的利用，只要超过一定限度，就要受到资产阶级政府的暴力镇压。因此决不能说这种国家是能够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但正因为资产阶级民主形式有可以利用的地方，因此资产阶级中的最反动的阶层，连议会民主制也要反对。在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统治者日愈走向反动没落的道路，因此他们的国家就日愈从民主制转向法西斯制度。法西斯制度表现得最露骨的国家，也就是资产阶级统治者最为反动而它的统治也最不稳定的国家。总之，工人阶级只能一定限度内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来对资产阶级进行合法斗争，而不能希望这一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制度直接转变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制度，不能依靠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实现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民主集中制是根本不同的。美国的两党制，两个政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在朝党与在野党轮流执政，也就是资产阶级不同集团轮流执政。不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英国也是如此，在这些国家里，虽然共产党存在着，但资产阶级

决不容许他们成为执政党。去年右派分子主张把资产阶级国家的这种制度搬到中国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企图让资产阶级政党有一天成为执政党，要共产党下野，这样就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取消社会主义，让资本主义复辟。这是非常凶险的阴谋！我们的国家、人民决不能容许采取这种制度，我们只需要人民民主制度，它的形式是民主集中制，也就是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在1940年时，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了民主集中制的优越性，他说："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新民主主义论》）这话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仍然完全适用。民主集中制是议行合一的制度，它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从下而上地集中广大人民的意见，来制定国家政策，并选出人民的政权机关，来执行政策，为人民服务。在这种制度里，资产阶级国家里的那种表面的自由，在朝在野党的走马灯式的自由，为资产阶级专政装点门面的自由是没有的。但只有这种制度，才能保证真正的人民自由，因为只有这样的政府，才有可能保证在自己的政策和行动里反映最大多数人民——工农的需要和意志，只有在这样的政府下面，劳动人民才能够真正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

我们国家的人民享有宪法上所规定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且只有我们这样的国家，才能使劳动人民真正享有这样的自由。去年右派曾经挑拨说，我们的这些自由都是空的。是的，对于站在反动立场的人来说，对于右派来说，这些自由不但是空的，而且根本就没有。因为我们对反动派就只有专政，根本就没有准备给他们民主自由。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就说过我们不许反动派乱说乱动。但对于人民来说，言论自由是充分存在的，在我们这里不仅有共产党办的《人民日

报》，而且有各民主党派办的《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着亿万人民都能使用的言论机关——大字报。这是最广泛的人民言论自由的体现。试问，世界上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有这样广大的言论自由？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敢于给人民开放这样广泛的言论自由？没有！绝对不会有的。集会自由，对反动派来说当然是没有的。但人民的集会是完全自由的。例如，一个北京大学最近就组织了几百个学习会。结社自由，如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合作社等，也是再广泛没有了。至于游行示威，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广泛地被人民所应用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动辄就是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万万人。当然，由于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一个人如果他的资产阶级立场不改变，如果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很严重，在人民中间是会感到某些不自由的。因为在我们国家里，既然广大人民都有了民主权利，觉悟都提高了，如果有人企图损人利己，追求名利，把个人的利益放在人民头上，他是一定要碰钉子的。如果他发表反动言论，就一定要受到人民的批判。这是很自然的，而且是很好的事情。如果有人以为这不好，如果他认为一定要让反动言论任意散布，而不应该让它受到人民的批判，这是什么观点？这样的观点，无非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资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如果允许有这样的自由，那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自由，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自由，有些知识分子吹嘘英国海德公园式的自由，他们说在海德公园里什么人都可以上台讲演，不受任何限制，好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言论自由是非常理想的。这是一种吹嘘，只能欺骗不懂真实情况的人。到过英国并了解内幕的人告诉我，在海德公园里经常上台演讲的实际上都是和统治阶级有联系的人。如果有局外的人在那里发表了代表人民真正尖锐地批评资产阶级统治

的意见，他很快就会遭到警察的“访问”。在这里，人民有什么言论自由呢？现在看我们的大字报，许多工厂的大字报里，工人们对领导同志常常提出非常尖锐的批评，大家知道，这些批评只要是符合事实的，都会被领导者所采纳，出大字报的人决不会遭到打击。当然，过去大字报上出现过右派分子反动的进攻，这种进攻受到了反击。但这种反击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反击恰恰是人民民主的表现。只有在我们人民民主的国家，才能让人民起来对反动派给与这种坚决的打击。在资产阶级国家，决不可能让人民这样扬眉吐气的。应该指出，我国经过反右整风以后，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这就是广大人民民主力量的表现。为什么会有大跃进呢？这就是因为整风反右后，在我们国家里，人民民主已得到充分发扬，工人农民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工厂里实行了“两参一改”：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于是加强了工人的主人翁感，思想解放了，到处涌现着惊人的创造发明，这样就在生产上出现了大跃进的新形势，在很短的期间，有些产品已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如果我们的民主制度，不是最优越的民主制度，决不可能有这样辉煌成就。

总之，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享受着最高度的民主自由，这样的民主自由应该说是空前的。但是，有些人在这里还觉得不自由。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这里也涉及到哲学上的问题。首先要讲一下自由的含义。什么是自由？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解释，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自由不是绝对无拘无束，不是和必然性绝对对立的。真正的自由，只能是在认识了客观的必然规律之后，人们认识了必然，然后依照必然规律来安排自己的工作、行动，这样就有可能顺利地前进，这就是自由。人们为什么会感到不自由呢?就是因为在行动上违背了辩证唯物论这个原则，

就是没有按照客观事物的必然规律的认识来安排自己的行动和工作，他们的行动不符合于客观事物的必然性，因此就要碰钉子，就要感到不如意，不自由。在我国目前，有两种人是不自由的，一种是反动派，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既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到实现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性，所以反动派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违反着必然性。他们要抗拒历史的铁的规律，当然要碰得头破血流，当然是不自由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广大人民也不允许他们有自由。

另外一种人，他们虽然不是反动派，但有某些错误的思想和行动，当他们没有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时候，他们也是不自由的。例如有的人有个人主义思想，或者留恋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在广大人民日愈获得彻底解放和社会主义日愈走向完成的情形下，在社会生活中已出现了共产主义萌芽的情形下，不抛弃个人主义思想，不割断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留恋心情，必然要和人民的意志发生矛盾。这样的人当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个必然性，不能坚决放弃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想法，他总要觉得不自由的。这样的人是思想立场上有了错误；也有的人不一定立场上有根本错误，只是对客观规律认识不够，对先进事物发展情况估计不足，例如不相信我国工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不相信工农群众在生产中有无限的创造力量，不相信我们能够多快好省地建成社会主义，像那些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一流的人们，他们由于对客观规律认识不足，在一定时期也要感到不自由。这两种人都不是反动派，只是由于认识上有问题，在认识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也是不自由的。如果他们下定决心，改变立场，去掉个人主义，或者认真地研究客观规律，改正错误的认识，就可以变不自由为自由了。所以，问题在于要下决心改造立场，改正错误的认识。坚持错误的立场和

思想，不但不能自由，而且往往还有走到反动派一路的危险。反过来说，反动派如果真正投降了人民，真正下决心改造，也不是不可能争取得人民的宽容，这样，他们也算认识了必然性，也能从不自由转到自由。

要讲民主，就一定有争论，争论就一定有胜负，具有正确认识的人，终归会得到胜利，他们认识了必然，因此是自由的。认识上有错误的人，是终归要失败的，是不可能自由的。如果能承认失败，接受正确的意见，就会由不自由达到自由。理屈词穷，事实已经证明他们错误，而仍然要坚持错误的人，不会有真正自由的感觉的。例如在整风时，群众对一些干部的三风五气批评得很尖锐，有的干部马上就改了，与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干部就感到很自由，因为群众很欢迎他们的行动，他们自己也很愉快地继续工作。红安县的县委副书记张景田同志，起初下乡检查工作时，曾听到下乡工作的干部说，农民骂他们“摇摇摆摆，像个相公”。他很虚心地考虑了农民的话，号召干部与农民一起搞试验田，后来农民很欢迎他们，他们就充分自由地领导群众前进了。天津食品加工厂魏长庚同志，是一个车间副主任，有一个时候不大会研究生产的规律，自己工作不安心，群众叫他“魏官僚”，这真是不自由了，后来学了一些哲学原理，懂得了分析矛盾的方法，就经常和群众一起，寻找生产中的关键问题，用哲学原理来加以分析，因此，就经常能正确地掌握生产规律，完成了许多发明创造，大大提高了生产。这就充分地有了自由了。所以，自由不自由的问题，是立场站到什么地方的问题，也就是是否尊重辩证唯物论的问题，是否能按客观真理安排工作指导行动的问题，能这样做就经常感到自由，否则永远也不会得到自由的。尽管在我们国家民主是广泛的，但还可能有些人感到不自由，这决不能归罪于我们

的制度，而应该从这些人的政治立场上或者认识上来看问题。这就是说，他们需要根本改造其政治立场或者在辩证唯物论方面下些功夫，努力按客观事物的必然性来处理自己的工作和行动问题。1955年底，资产阶级敲锣打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那时他们一般地都是自由的。因为那时工商界的人们按照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主动地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按照客观事物的必然性，来主动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是自由。后来当右派进攻时，有些人又忘记了事物的必然性，跟着右派分子来反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结果就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又不自由了。

无产阶级专政有各种形式，它依靠广大人民的联盟来进行工作。我国的专政形式包含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工农联盟，一个是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但作为基础的是工农联盟。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也参加这个专政下的联盟，原因是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愿意改造自己，愿意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面。它的知识分子也有同样的情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一面改造，一面为社会主义服务。当然，改造得越好，也就服务得越好。有人说，无产阶级的统治，比任何时期更严密，更厉害。这话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的，因为我们的统治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上的。它是大多数人民对反动派的统治，不是像资产阶级国家那种少数剥削者对大多数人民的统治。在这里，反动派是极少数，他们完全陷在人民的大海中，他们的阴谋很难得逞。为着保证实现社会主义，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破坏，无产阶级正应该有这样严密的统治和强有力的国家！

## 三、关于共产党的领导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通

过党的领导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国家形式。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党的领导呢？因为一个阶级本身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别，只有这个阶级的先进部分或阶级觉悟最高的部分才能代表这个阶级，进行政治斗争。政治斗争是最集中最尖锐的阶级斗争，要在政治斗争取得胜利，需要阶级意识最坚强、阶级觉悟最高的人来领导。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中需要挑选自己最先进的、最觉悟的、最能坚持自己阶级利益的那一部分人来领导，才能保证斗争的胜利。工人阶级中最先进、觉悟最高、最能坚持自己阶级利益的那部分人是谁呢？那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同时是它的最先进的部分。它之所以是无产阶级的最先进、觉悟最高的部分，是因为它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指导。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科学武器，它使工人阶级能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善于结合无产阶级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来正确规定自己阶级斗争的战略策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才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它创造性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主席的著作就是创造性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中国工人阶级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阶级斗争中就经常掌握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因此中国革命才能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无产阶级要善于运用自己的政权来进行阶级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让自己的先进部队——共产党来领导这个政权，或者说是让共产党代表自己的阶级来领导政权。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如果党的领导有了动摇，无产阶级专政也就要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就会失去明确的方向，工人阶级就会在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受到挫折。对于无产阶级专政

来说，党的领导权是不能动摇的，也是不可分割的，因为领导权只能有一个。我国工人阶级让民主党派参加政权，这决不是分割党的领导权，而是要使各党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去年有些右派分子硬说民主党派也应该来领导政权，是想取消党的领导和篡夺党的领导，归根结底就是要搞垮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资产阶级如果取得了领导地位，那么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就要削弱和丧失了，这样一来无产阶级专政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修正主义者在共产党对政权的领导问题上也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他们主张党在政权中只能起参谋的作用。这也就是否认了党对政权的领导地位。这样一来，就使政权机关中的工作干部受不到党的监督，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行动就不可能受到制裁，这在实质上就给资本主义的复辟留下了空隙。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政策措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由参加政权的广大人民的代表共同来讨论执行的，因此它又是人民的政权。在这里，共产党对于政权是起了核心作用。既然共产党是我们人民政权的领导核心，因此政权中的许多重大工作就不能不由党出面来进行号召。我们国家的许多政策由共产党中央和国务院同时出面公布，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这样的做法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国家的一切工作的好坏，决定的因素之一就是党领导得好不好，党抓得紧不紧。在党委抓得紧的地方，党领导坚强的地方，工作就做得好，否则就做得不好。在农村和基层的工作里，这种情形特别看得明显。因此，在我们的各项工作中，我们强调共产党党委和党委书记要直接出面来抓工作，来加强领导。因此，在许多报纸消息上报导各种工作时，常常首先提到党委和党委书记的指导。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把党作为各种工作的领导核心来看，完全符合客观事实，而我们的报纸就是要反映客观的真实情况的。这

和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一点也没有矛盾。因为如果没有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也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

现在顺便谈一下如何接受党的领导问题。有的人说：接受党的领导和接受党的政策分不开。这样了解一般说是正确的，因为党的领导是通过政策来实现的。我在这里只补充一点，就是真正接受党的政策的人，首先是要很好地学习理解党的政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党的政策的正确性，才能了解必须接受的原因。这也是一个认识必然的问题。党的政策之所以是正确的，就是因为它是按照着客观规律制定的，并且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的真理。当我们接受它的时候，首先要学习了解它是怎样符合客观规律、怎样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如果不认真去学习它，不认真体会它是怎样地符合于客观必然性，就不可能从心里真正接受它，说接受也是形式的。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按其原来的思想来说，和无产阶级的政策总是有抵触的。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是个人主义者，无产阶级是集体主义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是要兴集体主义、灭个人主义，它和资产阶级的意识是根本对立的。换句话说，当前我们的许多政策，就是把锋芒对着资产阶级（自然也对着其他一切反动的阶级）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如果不认真学习，认识事物的必然性，决心改造自己，那是很难真正接受党的领导、党的政策的。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一般地都知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但由于无产阶级的政策和自己身上的旧东西的根本矛盾，在实际上接受党的政策的时候就必然要有所抵触，问题的关键就在自己努力学习，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根本解决问题。归根结底说来，不外就是一个政治思想立场的根本改造问题，和是否能够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认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根

据这种认识来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能努力按照这个原则去做，就可能比较自然地接受党的政策，党的领导，否则就会觉得勉强，就会有各种抵触。

有的人说，接受共产党的政策不容易，按照他们的理由，似乎是因为共产党的政策朝令夕改，变化无常，很难把握。这是一种片面的、错误的看法。我们的基本政策，在一定的时期内，是不会变的，例如我们的总路线，就是在一定时期内始终要坚持不变的，怎能说“朝令夕改”呢？自然，政策的变化是有的，因为政策是客观情况的反映，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客观事物是要变化的，经济基础也是要变化的，政策是上层建筑，必须反映经济基础的变化，因此它本身也要变化。例如税收政策，在工商业改造以前是一样，工商业改造以后的今天，我们又制定了新的税收法令，这种变化是完全必要的，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利的。这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规律的一种具体实例。如果人们是愿意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站在社会主义事业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话，就应该努力学习应用唯物辩证法的眼光，来对待这种改变，明确地认识这种改变的正确性、必要性，积极地接受这种改变。

和政策问题有些联系的，是关于法制问题，这里也顺便谈谈：以前有人说，我们的新中国好像是“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这完全是错误的。有些人由于立场、思想、方法、观点不对，往往也受这种谬论的影响。所谓“无法可依”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首先我们就有国家的根本法——宪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八九年间，又陆续制定了各项法律，如婚姻法、工会法等等。有些法律，制定后经过一个时期又有了改变，如上面说过的税收法令。这些事实，完全可以粉碎“无法可依”的谰言。“有法不依”更是胡说。难道今天我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

就，不是依据宪法做的吗？自然，从革命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上来说，在一定的问题、一定的情形下，我们的行动也可以是“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的。革命是要破旧立新，要创造从来没有过的事物。新的事物的出现，总是没有现成的法可以依据的，难道我们以前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行动，可以从国民党的六法全书里找到依据的么？旧社会只有六法全书这一种法律，难道我们可以因为害怕人家批评我们“有法不依”，害怕人家批评我们为什么有“六法全书”也不依，因此就停止我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动么？问题是在于，法律是上层建筑，它是有阶级性的。“六法全书”的法，是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法，是反动派的法。对于这种反动的法，我们的行动正是应该“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有自己的革命的法，人民的法，对于我们自己所制定的革命的法律来说，我们的态度却相反，在这里我们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右派完全是站在反动派的立场上说话，他们故意抹煞了我们人民的法和革命的法的存在，硬说我们“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无非就是想要把早已被打倒了的六法全书又搬回来压在人民头上，让它来帮助资本主义复辟罢了。对于这些反动派的“批评”，我们尽可以理直气壮地给与这样一个回击：我们就是要无法可依，就是要有法不依！

总之，我们是在进行不断地改造世界的革命，我们制定法律，是为了使它来帮助革命，而不是要它来限制革命。因此，即使是在今后，我们还可能有许多新的创造是不以现有法律为依据的，即使是我们自己定的法律，当客观情况已发生了变化而人民群众都认为这项法律已过时了的时候，我们就要毅然决然地加以废除或者加以改变。最近半年来许多机关、厂矿里展开了改革规章制度的群众运动，使各项工作大大地得到推进，生产力迅速发展起来，

就是一个证明。这说明我们对待法制问题，和对待其他任何问题一样，都要应用革命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去年右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时，制造了这样一个借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一种谬论，也影响了许多立场、观点、方法有问题的人。外行真的不能领导内行吗？完全不是这一回事！恰恰相反，按照事情的一般规律来说，正是外行领导内行。大家对于中国的历史是熟悉的，我举历史上的一个例子来说说：汉高祖做了皇帝以后，曾有一次和他的群臣讨论自己得到天下的原因。群臣发表了意见之后，他自己做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正是说明外行领导了内行。他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史记·高祖本记》）意思就是说，讲谋划，我不如张良内行；讲经济政治，我不如萧何内行；讲作战，我不如韩信内行。但我却能领导他们三人，这就是我取得了胜利的原因。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孔明不能直接上战场上打仗，张飞曾经很不服他，但对于战争是外行的孔明，却是指挥战争的统帅，张飞终于是受他的领导。有些搞自然科学的人，在右派的挑拨之下，对党的领导不服气，硬说党对于自然科学是外行，不能领导科学技术。最近几月来工农业的大跃进和工业技术上的许多惊人的创造发明，证明这完全是错误的看法。我最近去天津看了一转，那里工厂中工人们的多数新创造，都是依靠党委书记或党员厂长的支持，和某些技术专家的保守观点作了坚决的斗争，才得成功的。在这里，外行的党员正确地领导了创造发明，而自称内行的某些工程技术人员，不但没有领导了这些创造发明，反而成为新创造的阻碍。当然，这并不是说领导工业

生产的人，不需要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我们党中央就经常号召老干部学习自己所不懂的生产技术知识，号召大家努力做到又红又专。做领导工作的人，必须又红又专，才能领导得很好。但是，学习技术知识，虽然是领导得好的一个条件，但领导的作用，主要在于政治。一个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即使他在自然科学本身很为“内行”，如果政治思想有错误，他就不可能把生产领导好，相反地他会成为生产上新的创造发明的障碍。只有政治思想坚强而正确的人，才能把一个工厂生产很好的领导起来。因此我们在一切工作中要求政治挂帅，要求以红带专。什么是政治？在阶级社会里，政治首先是阶级斗争。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政治，无产阶级的政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它的任务，除了进行敌我的阶级斗争之外，还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并通过群众路线来推动一切工作。在我们的生产、技术工作中，以及其他任何工作中，只有善于根据人民的利益来解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善于走群众路线的人，才能够把工作领导好。单靠“内行”，并不能领导内行。科学技术专家是内行，如果他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不相信群众的创造力量，不懂得群众路线，他就不能领导今天的科学技术，不能领导社会主义时代的科学技术。天津恒大烟厂去年因为烟叶收成不够好，提出了要保证烟支的质量的任务，工程师认为必须提高成本。一个老工人反对这样做，他凭着自己几十年的经验，认为只要改善烟叶发酵的方法和适当改变配方，就可以不提高成本，而能保证质量。厂的领导人在技术上没有工程师“内行”，但他们懂得群众路线，相信有多年实践经验的人的认识的正确性，采纳了老工人的意见，使恒大烟终于在不提高成本的条件下保证了质量。这就是依靠正确的政治，外行就能领导内行的例子。我们并不是说一切科学技术专家都不能领导工作，问题是科

学技术专家如果能够领导工作,那首先因为他在政治上是正确的,首先是因为他有了这一个“外行”,他才能很好地领导内行。我们的工业学校里有些专家当校长当得不错,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要强调,正是外行领导了内行。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中科学技术专家是很少的,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八九年间,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科学事业以及工农业生产都有了空前的发展,难道这还不够证明外行领导内行的确是一条客观规律么?

(原载《争鸣》1958年第10期,1958年10月)

# 努力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规律*

(1958.11)

实践产生理论。去冬今春以来的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出现，不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要求人们突破某些现成书本教条的限制，重新依据实践的发展情况来加以考虑。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形。新的事物提出了许多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的新问题。从事理论工作的人们的任务，就是要用最大的努力，去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并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对这些新的问题做出正确的解答。

我想举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来谈一谈。目前的实践发展的情况，使我们对这问题得到许多新鲜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者肯定一切事物都有矛盾，因此从来都肯定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矛盾。“无矛盾论”或“无冲突论”是完全错误的。如果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它为什么还要前进呢？为什么还要向更高的共产主义形式过渡呢？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明确地指出我们当前还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篇著作不但坚决贯彻了而且具体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些观点在

* 本文整理时略有删节。

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出现之后就得到了进一步具体而鲜明的证实。

单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来说，曾经有一个时候，人们说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时候，常常认为这种矛盾的存在仅只是由于旧社会制度的某些残余还没有消灭的结果，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身，似乎是和生产力完全适合的，因此很难说有什么矛盾的因素。现在，生活的实践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正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许多方面也是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矛盾着的。而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过程，正是逐步克服这些矛盾的过程。

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废除了生产资料的个人私有，消灭了剥削和穷困的根源，就这一方面来说，它是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的制度，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总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要快得多，我国解放后九年的情形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直到现在还存在着两种所有制，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集体所有制是适合于把农民及其他个体生产者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经济制度，它比个体私有制远为优越，它能大大地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但人民公社的出现，已使我们开始看出这种所有制的某些狭隘性，它和全民所有制是有矛盾的，同时对生产力的更快发展的要求也是有某些阻碍的。我们知道，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农村的生产力发展得更快了，这里的原因当然不是一个，但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合作社发展成为人民公社后，开始出现了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转化的某些因素。在有些县的公社里，为着发展全县的经济，向各公社提起一定的积累，这是合作社时期所不能做到的，这里就有着向全民所有制上升的因素。我们很容易看出，人民公社里

的这些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很为有利的条件。如果我们的农村长久地停顿在完全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阶段，它的生产虽然也可以比个体经营时期发展得快些，但它将得不到上述有利的条件，它将由于资金的分散和规模比较狭小而不能得到更为迅速的发展。所以，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要求由合作社发展到人民公社，要求经过人民公社，使集体所有制逐步地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这样的过渡，就能够愈来愈有力地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如果集体所有长久地停顿在它原来的地位上，生产的发展就要受到一定的阻碍。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人和人中间的相互关系，通常都认为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这当然是不错的。但仅仅指出这一点来还是不够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灭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阶级差别，消灭了生产过程中人们之间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的地方，它使劳动人民在生产中能够发挥高度的创造积极性,使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几十、几百倍地超过资本主义世界。我国工业中的“两参一改”，农业中的“种试验田”制度，说明在生产中一旦完善地建立起人们之间的同志式的互相合作关系之后，生产的发展就会出现了怎样惊人的巨大的推动力。但是，社会主义生产中人和人的关系还有它的另一个方面：在这里，人们之间虽然没有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阶级差别，但还存在着其他的本质的差别：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工人与农民的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这些互相间有着一定的本质差别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但同时又是在实际上并不完全平等的。能不能说，前者是它的积极的方面，后者是它的消极方面。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以为是可以这样

说的。因为，这些差别的存在，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着矛盾的。

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清楚地说明了这个矛盾的存在。生产的大跃进形势，是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导下形成起来的。党的总路线的基本点之一，就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应该指出，这三个并举的方针，不但是具体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路线，把城市和乡村的一切积极力量都调动起来，造成了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高潮；而且，它还有着这样一个重大意义：由于它的实施，中国人民就开始向着突破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方向前进，使农村逐渐地生长起工业建设，使农民同时干工人的工作。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和这些差别的开始突破是分不开的。试设想一下，如果不是按照三个并举的方针，提倡在农村里大量地举办以土法为主的小型工业，不提倡农民同时来干工人的事情，让工业的城市和农业的乡村、工人和农民这些本质的差别长久地继续下去，那么农业技术改革所需要的新式的或改良工具、滚珠轴承和化肥之类，就只能依靠城市的有限的工业生产给予供应；如果城市工业来不及供应，那就只有消极地等待，而不能及时地依靠农村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把自己武装起来。单就这样一点来说，不是就可能延缓农业技术改革的速度么？难道这不是对于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障碍么？难道这不能说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么？难道我国生产迅速跃进的原因之一，不正是由于党的路线政策能够指导全国人民来及时地逐步地解决这个矛盾的缘故么？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人和人之间劳动交换按照等价交换

的原则，按照“不劳者不得食”，和按劳付酬的原则来进行。在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还存在的时候，在产品还不够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还没有大大地提高起来的时候，这样的分配形式是不可免的，也是生产发展过程上所必要的。对于懒汉和剥削者，这样的分配形式也能起一定的斗争武器的作用。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承认等价交换形式的存在，承认不同的劳动可以取得不同报酬的权利，究竟是一种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形式。资本主义社会就存在着这种法权，虽然内容形式都有所不同。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法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在工人阶级遭受剥削，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从而劳动力的价值降到最低限度的情形上。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不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是不劳而食。资产阶级实际上是依靠剥削而不是依靠自己劳动力的等价交换来获得收入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和剥削制的消灭，等价交换的原理和实际生活中的上述矛盾已不存在。一切人都取得了依据自己的劳动取得相应的报酬的权利。这样，劳动人民从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自然会得到很大的鼓舞，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就比资本主义制度下迅速得多。但是，按照自己所供给的劳动来取得相应的报酬的这种等价交换权利，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因为这里虽然没有生产资料的私有，但个人的劳动力在实际上仍被承认为私有。由于这样的私有权利，人们才可能按照自己的劳动向社会要求相应的报酬。这样的权利的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可免的，甚至在一定时期是有相当的积极意义的。然而它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是有矛盾的。因为，这种法权的作用仅仅是在于依靠物质利益的刺激来推动劳动人民的

生产积极性，而不是依靠提高他们的共产主义觉悟，加强他们的主人翁的感觉。这种法权的作用是很狭隘的，从某一方面来说，甚至是有害的。正如列宁所说："它会迫使人们像赛洛克那样吝啬地斤斤计较什么我不要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也不要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显然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规律，现在已是暴露得比较明显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实践的材料，更深刻更具体地来阐明这些规律，使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和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中更清楚地看出自己的道路。以上只是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任务。为着实现这些任务，我们必须加紧努力，和全国人民一起向前跃进。

（原载《哲学研究》1958年第7期，1958年11月）

# 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

(1959.1)

## 一

1958年中国人民的许多破天荒的创举中间，工农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也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工人方面从上海求新造船厂开始，农民方面从河南登封县三官庙乡等地方开始，迅速地普遍到全国很多城乡。一向被人们认为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哲学堡垒，被数量巨大的觉悟的工农群众用自己的力量攻破了。工人农民所学习的哲学，当然是无产阶级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哲学，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工人农民的心目中决不会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地位。资产阶级的哲学永远都是少数人圈子里的东西，永远也不会成为人民群众的东西。中国工人、农民的这一个创举，用直接的事实证明辩证唯物论哲学是真正广大人民的哲学。

马克思早就说过，辩证唯物论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是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他又指出，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自有中国共产党以来，马克思主义哲

---

* 这篇文章在1959年初曾在河南《郑州日报》发表过，《河南日报》、《中州评论》又转载。1960年中央高级党校内部刊物《练笔》登载时，由作者根据一年多来的运动发展情况，作了一些增改。

学就一直不断地，日益深入广泛地发挥了它的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精神武器的作用。中国革命之所以能迅速胜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能高速度地跃进，从思想方面的原因来说，不能不说是由于辩证唯物论哲学这个精神武器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的结果。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要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他们充分注意到这个精神武器的强大作用，并善于使这个作用发挥出来。但在以前，这个精神武器在群众中的作用是间接地，通过党的政策、路线的指导而发挥出来的。这就是说，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党根据辩证唯物论哲学的根本原理，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原理，制定出正确的、适合于中国具体情况的、各个革命时期的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政策，然后以此来指导群众进行斗争，把他们引向胜利的境地。这样，由于人民群众接受了和执行了党的正确政策，就间接地在自己的手里掌握了辩证唯物论哲学这个精神武器。

1958 年工农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开始努力直接来掌握自己的哲学武器，开始努力把辩证唯物论哲学直接应用于自己的生产、工作和斗争中。掌握了辩证唯物论哲学武器的工农群众，在执行党的政策的时候，就表现出比以往时候更为高度的自觉性、主动性，更能准确地依据客观的实际情况来贯彻自己所担负的工作任务，更善于在行动中体现冲天干劲与科学的实事求是原则相结合的精神，因此也就能够更有力地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跃进，这在一年来工农学习哲学的运动中，不是已经有许多事实清楚地证明了吗？

1958 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跃进的一年。这一年的经验，说明任何工作只要通过群众路线、群众运动的方法，就能够高速度地向前发展。不但农业、水利事业通过群众运动迅速跃

进了，钢铁工业通过群众运动也迅速跃进了。同样，科学文教事业也通过群众运动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工农学习哲学的运动，就是哲学方面的文教事业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不但使千万个工人、农民学习了辩证唯物论，而且对大学哲学专业及其教师学生们的改造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应该承认，这是哲学这一项文教事业通过群众运动在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的巨大跃进。

中国工农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的出现，不应该看做是偶然的事情。它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必然的产物，是全国各方面大跃进这个客观条件加上工人、农民思想解放这个主观条件集中的产物。在旧社会有工人、农民学习哲学的个别事实，但不会有工农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因为那时工农群众是处在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处在极端穷困和无文化的黑暗状态中。新中国使工农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使他们在经济上翻了身，并从而在文化上也翻了身，这就造成了广大工农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仅仅只有经济翻身的客观条件，即使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如像 1956 年的“三大改造”的胜利那样的条件，也只是奠定了工人、农民群众学习哲学的可能性，并没有直接就使这可能成为现实。要使这个可能转化为直接的现实，还需要工农群众在思想意识领域方面也能战胜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影响，使他们在精神上充分自觉到真正是社会的主人。这是一个主观的必要条件，这个主观方面的条件是在 1957 年反右、整风运动之后，在中国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战斗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创设出来的。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工农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是在 1958 年初才必然地开始出现，因为通过 1957 年的斗争，在相当广泛的工人、农民群众中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迫切要求。首先是由于他们在对

右派，对敌人的思想、政治斗争中自觉到有掌握哲学武器的必要；其次是由于“两参一改”，由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社会组织的变革，工农业的迅速发展，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号召，使他们自觉到作为生产的主人和国家的主人，有主动地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正确地解决生产中、工作中的一切问题的责任。

这些就是工农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必然出现的原因。

## 二

学和用的一致，是工人、农民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工人、农民只能接受与他们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际事物密切联系着的理论，而不能容忍那些完全脱离实际生活的，纯粹抽象的哲学空话。资产阶级大学里的那种为学习而学习的教条主义空气，在他们的学习运动中找不到任何存在的地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能够发生兴趣并且也不难领会的一个根本原因。凡是给工人、农民讲过哲学课的人，无例外地都得到这样的经验：如果不注意工人、农民的生产、生活和斗争，采用无的放矢、简单地照本宣科的方法，立即会遭到听众们出自阶级本能的排斥，并一定要完全失败。反之，如果用心准备，针对着工人、农民的实际生活和生产斗争中存在的问题来进行讲解，一定会得到很好的成果。正确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讲解方法，很容易打破工人、农民对于哲学所抱的神秘观点。辩证唯物论哲学的原理，本来是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经验和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本来就贯穿在他们天天经历着的实际生活中。对工人、农民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无非就是要用他们自己的实际生活材料，来启发他们了解那些本来存在于自己实际生活中的根本道理。因此，要使

他们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不是虚无缥缈、难于捉摸的东西，要使他们了解到，学习辩证唯物论，无非是把这些实际生活中客观地存在着的道理，变成自己主观上的自觉意识，这只需要一种“画龙点睛”的工夫。

工人农民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说明普通的、即使是文化程度很低的劳动人民，也有可能领会辩证唯物论哲学的基本原理；并且，既然辩证唯物论的原理也就是他们的生活斗争中的根本原理，因此，他们不但可能领会，还能把所领会到的这些原理迅速变为行动，把它们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和斗争中去。在工龄较老的工人中和经验较多的农民干部中，这个特点尤其看得明显。这个特点的本质，就是理论和实际结合。这个特点表现在许多方面：1. 他们能够把辩证唯物论作为政治、思想斗争的武器来使用。三官庙乡群众听了无神论课后，掀起了全乡大捣神像，平整坟墓，破除迷信的运动。2. 他们能应用辩证唯物论的原理作为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来解决生产和工作中存在着的各种问题，使生产和工作迅速得到进步。例如郑州、天津、上海工厂的工人们学习了关于主要矛盾的原理之后，就开始在生产劳动中自觉地去寻找主要矛盾或主要的关键问题，并主动地加以解决，结果就推动了技术改革，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三官庙乡农民干部依据具体矛盾必须具体分析的原理，对工作中的某些问题的特点，进行比较耐心的分析，并使之顺利地得到解决。3. 他们能把辩证唯物论的某些基本原理当做工作方法来加以应用，并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工作作风。一般工农干部在工作中容易犯的急躁情绪和强迫命令的毛病，在学习哲学之后，能够发生显著的改变，因为辩证唯物论使他们了解到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原则。

在一些有保守思想的哲学教师中间，曾经流行过这样的清规

戒律：1. 哲学不能进工厂，也就是不能直接应用于生产事业中，如果有人要从工农业生产的成绩或错误中引出某些哲学的结论，就被认为是“庸俗化”、“简单化”；2. 辩证唯物论不能应用于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只是形式逻辑的应用范围，如果通过日常生活的事例来讲辩证唯物论，例如三官庙乡、农民通过一块石头的例子来打开哲学学习的门，也要被斥为“庸俗化”、“简单化”；3. 哲学不能用来解决思想问题，如果有人要通过哲学来解决思想问题，那就被认为是“用大炮打麻雀”，空费力气。这些清规戒律，在工农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中，很自然地全部都被打垮了。与这些清规戒律相反，工人、农民很有成效地把辩证唯物论的原理直接应用在生产中，使之成为提高生产展开新的创造发明的一个思想动力；工人、农民把哲学原理用来解决某些日常生活的问题，如应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理来解决自己中间某些人互不团结的问题，也做得很好；工人、农民从哲学学习中找到了解决自己思想问题的武器，应用它来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改造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哲学的学习还能帮助工人农民更好的了解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路线、方针、政策，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在他们中间进行得更加深入。事实证明，那些清规戒律的作用只在于使学习哲学的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就和辩证唯物论哲学本身的原则根本不相符合。因此，人们必须坚决打破那些保守主义的清规戒律，也就是必须坚决肯定哲学原理能够直接应用于生产建设中，应用于日常生活和思想改造的问题上，并且在学习哲学的时候不怕这样来做，把这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的一个方面，才能正确地理解和掌握辩证唯物论哲学的各项原理。自然，“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是应该防止的，那就是在联系实际问题的时候，不能够采取具体问题具体解

决的方法，而采取乱贴标签的方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名词不加思考和分析地任意加到某些实际问题上去。例如把一切实际工作中的错误都看做是世界观的错误，看做是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这就是简单化的一种表现。因为错误是各种各样的，有些较大的错误，如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确是具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性质，而在实际工作实际生活中，主观认识和客观情况的某些暂时的局部的不符合，并不能一概认为是主观主义或唯心主义的表现。因此，把任何错误都归结为世界观的错误，是不正确的。但是，这仍然不妨碍我们对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给予哲学的说明。因为，事实告诉我们，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是在工作中主观认识和客观情况相符合的结果，一切错误的产生，都是主观认识和客观情况不符合的结果，虽然我们不能说主观认识和客观情况的任何一种不符合的情形，都是出自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而具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就绝对不会在实际工作中犯任何一点错误。所以，那种认为从工农业生产或实际生活中引出哲学结论来就是“庸俗化”、“简单化”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在哲学学习运动中不受保守主义的那些清规戒律的拘束，是工农群众极大的优点，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优点，工农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才能够很好地迅速地开展起来。

## 三

工人、农民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是主要依靠了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干部自己的力量搞起来的，不是主要依靠学校的哲学教师们搞起来的。学校教师和哲学专业系的学生在以后才参加了这个运动，从运动中学习了新的教学方法，并对这运动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如果没有成千万群众的自觉努力，只

有少数教师和学生的活动，那就只能有冷冷清清的课堂教学，没有轰轰烈烈与生产、劳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密切结合的哲学学习的群众运动，这是很明显的。

和一切群众运动一样，工农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的开展，也有赖于党的领导和支持。各地的运动的情况都很清楚地说明：凡是开展得很好的地方，都是由于得到了当地党的重视和认真的领导。河南郑州国棉三厂是郑州工人学习哲学的一面红旗。这里的党委、党总支和支部都把这个学习运动列入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听取汇报，及时解决学习中的思想问题和具体问题，在党的领导下，党政工团的负责同志亲自当教员给工人上课，这些都是运动开展得好的原因。登封县卢店乡三官庙乡是农民学习哲学的先锋，这里学习得比较好，乡党委书记亲自主持和亲自当教员，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地的情形也是如此。因此，在工人农民希望学习而运动不能很好搞起来的地方，党的组织应该尽力给予帮助。

在千万人参加的学习运动中，教课人员的缺乏是很自然地遇到的问题，工农群众在运动中很正确地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从群众中选拔和训练自己的教学队伍。出现了工农群众自己的“讲师团”，“能者为师”，“边学边教”，自力更生，就地取材，这里存在着和工农业生产中“小土群”、“小洋群”运动基本上相同的规律。如果迷信专家、教授，迷信“只有内行才能领导内行”的资产阶级的公式，运动就一定搞不起来。党、政、工、团的负责干部，对于哲学可能算是外行，但他们就是很好的师资的来源。从工农群众中也可以产生自己的教员。他们不但能用口头讲哲学，讲理论，而且也在努力编讲义，写哲学讲义和其他理论文章。我们不但看到了工农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我们还看到，与这个学习运动分不开

的还有一个工人农民写作理论文章的群众运动。这也是非常新鲜的、生气勃勃的运动，这个运动中已经产生了许多生动活泼的，理论和实际联系的，一般的知识分子很难写出来的好文章。他们甚至常常用诗歌的形式来表现自己学习的心得。

自然，我们强调工农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主要靠工农自己的努力，并不是说知识分子对于这运动就不起作用。学校的教授，哲学专业的学生参加这运动，一面向群众学习，一面给予群众以帮助，对学习运动也会有很大的好处，如像上海复旦大学所曾做的那样。

的确，目前工农学习哲学的运动，在某些方面带有生产运动中的“小土群”、“小洋群”的性质，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也就是带有普及为主的性质。它包含着上面说过的许多优点，但也很自然地会有某些困难和缺点。由于群众的文化条件和学习时间的限制，直到现在学习的成果，一般来说，都只限于辩证唯物论的某几个最基本的观点的初步了解和应用，如果说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其丰富和深刻的内容，并多方面地应用于实际工作中，那么目前的学习运动还有着相当远的距离。虽然现在的成果在群众的生产和斗争中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我们究竟不能以此为满足。自然，我们不能对工农群众的学习提出太高的要求，只有保守主义者才会轻视群众学习的这些成果，他们强调一套主观主义的什么“系统性、科学性、完整性、逻辑性”之类的公式，反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生动的学习方法，看不见工农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的重大意义。我们则要充分重视这个哲学的普及运动的每一点宝贵成果，但同时还希望工农群众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向上提高。

（原载《练笔》1960 年第 5 期）

# 认识客观规律，鼓足革命干劲

（1959.1）

我们是唯物论者，必须坚持客观第一性，主观第二性。一个唯物认识论的最根本的原则，在我们的一切工作和行动中，必须通过对周围情况的调查研究，使我们的思想能够符合于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使我们所规定的任务、方针、计划、办法能够在周围事物中找到现实可靠的根据。

但是，我们又是辩证唯物论者，是革命的、战斗的唯物论者，我们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并不是为了消极地、机械地承认它的必然性，并不是要用偶像崇拜的态度，在它的必然性面前表示屈服。对于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在于利用客观事物的必然规律性的知识，来改变自然，改造社会，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来尽可能迅速地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福利。

论先后，一定要先客观，后主观，先物质，后意识。论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尽可能高度地发挥人民群众利用客观规律来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我们不是要为认识而认识，认识客观规律这事的本身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所以要认识客观规律，只是为要服从于改造世界的目的。这就是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对立的统一。

去年，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决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号召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树立敢想、敢说、敢干的共

产主义作风。这些决议和号召，对于发挥中国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这个目的，起了巨大无比的鼓舞和推动作用。一年中间，在全国各方面的生活和工作中，掀起了空前未有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使我国各方面的工作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使我国人民在工农业生产事业方面以及文化教育方面都获得了许多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用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的正确性，证明人民群众在党的总路线和党的号召之下所发挥起来的主观能动作用具有如何重大的意义。

为着贯彻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以推动各方面工作的跃进，去年一年间，我们曾不断地对右倾保守思想进行过斗争。右倾保守主义的思想方法的特点，就是用形而上学的，机械的，甚至于近似宿命论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客观规律，看待物质条件的作用，把某些事情的一般常规看做是不能改变的东西。人们很正确地指出这种思想错误的根源是在于“见物不见人”，“唯条件论”。它片面地不适当地夸大了客观物质的作用，以为人们似乎只能奴隶一般地服从于事物的客观规律，服从于现成的物质条件，服从于事情的普通常规。在这种思想里面，人们的意识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和利用事物的客观规律，创设必要的条件，打破普通常规，改变世界，来为自己谋福利的这个主观能动性，是找不到地位的。按照这种错误的观点，人们的一切行动就只能采取蜗牛式的爬行方式，而不能采取革命的跃进方式，一切工作都只能以少慢差费为原则，而不能希望多快好省。很明显，如果不批判这种右倾保守主义的思想方法，不克服这种错误思想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要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高度地发挥他们的自觉性、积极性，促成全国各方面工作的跃进，是不可能的。在这样

的意义上，也可以说去年一年中国人民的成就，是表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右倾保守主义的胜利，是多快好省的革命方法对少慢差费的爬行思想的胜利，是辩证唯物论对形而上学、机械论的胜利。

说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说到要批判“见物不见人”、“唯条件论”等等的错误观点，这决不等于说，人们的行动可以任意违背客观事物的规律，可以不顾任何物质条件的约束。不是的！我们所要批判的，只是这些错误观点对于客观规律和物质条件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了解，而不是要否定认识客观规律和掌握物质条件的必要性。应该肯定，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基础。愈是正确地深刻地认识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性，就愈善于为推进各种工作创设必要的物质条件，也就更有可能高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反对“见物不见人”，并不等于可以容许“见人不见物”。一年来全国工作中的许多重大成就，许多破天荒的发明和创举，都是在我国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奇迹，但这种奇迹，都不是凭空出现的东西，而是人民群众正确地掌握了客观事物规律性之后必然产生的逻辑结果。亩产几千斤的小麦试验田，是严格地遵照“八字宪法”进行了充分地精耕细作的结果；钢铁年产量翻一番，是在实际工作中应用了“大洋群”和“小土群”两条腿走路的辩证规律的结果；人民公社这一种崭新制度的出现，是大跃进过程中工农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天津工人发明了用转炉炼矽钢的方法，打破了电炉炼矽钢的常规，个别工程师不肯相信，说是没有科学的根据。然而事实证明缺乏科学根据的恰恰是某些人的死背书本、墨守成规的头脑。因为真正的科学的任务，并不是要人永远背诵一些现成的书本知识，死守着各种陈旧的规章，而是要求人们通过实践，不断地钻研客观事物的新的规律知识，并应用这些知识来不断地提高生产，改进工

作。那些勇于创造的人们，他们的成就，就是由于摸索到了新的客观规律知识，为工作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是建立在稳固的客观物质基础上的，因此也是有充分科学的根据的。

再说一遍，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方针，坚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于在必要时打破常规的方针，并不等于不需要认识客观规律，不需要重视物质条件的作用。问题在于如何对待客观规律，如何对待物质条件。右倾机会主义者，形而上学、机械论者用消极静观的态度来看待客观规律，夸大物质条件的困难，用各种关于常规的清谈来束缚人的思想，限制人的行动，阻止人们的前进，并为他们自己的退缩不前寻找搪塞的借口。战斗的、革命的辩证唯物论者，则强调要善于利用客观规律，并且不断地钻研新的规律知识，把它们当做战斗武器，利用它们来创设各种必要条件，以利于不断地提高生产，推进工作，改造世界，提高人民的福利。

把正确地认识客观规律和高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这是贯穿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号召我们树立敢想敢说敢做的风格的时候，就曾经指出，我们的敢想、敢说、敢做的风格必须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之上的。1958 年各方面工作之所以能够获得许多重大的成就，其原因之一，不能不说就是由于党在全国工作的领导上坚持了这个辩证唯物论的原则，既充分地发挥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又使群众的这种主观能动性同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正确地结合起来。

我们强调把上述两方面正确地结合起来，这就是说，无论哪一方面都是不可偏废的。既然客观规律的认识和一定的物质条件

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基础，所以我们做任何工作，决不能离开前者，而单纯强调后者；离开了前者，后者就没有依据，而人的努力必然落空。因此，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象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求，对于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制定和实现我们的计划”。但也应该理解到，党中央指示我们对事情的判断要力求接近实际，这丝毫也不意味着限制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削弱人民的冲天干劲，使我们在战斗面前踌躇不进；而正是为着指导全国人民更强有力地来实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是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坚定基础上面把人民的冲天干劲更强有力地发挥出来。我们要求对于客观规律和物质条件有正确的认识，并不是说要减少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于在必要时打破常规的勇气，而恰恰相反，这正是要求我们的思想经常保持科学的正确性，便于更有把握地去钻研新的真理，更有充分的根据去破除各种迷信，更有信心地去打破应该打破的常规，更有勇气去进行新的发明创造完成更加艰巨的任务。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向我们提出了1959年的更加宏伟的跃进指标。我们应当进一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同时，更进一步地去注意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以便在一切工作中更善于领导人民群众发挥他们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圆满地实现这些巨大的计划指标，从而更雄健地向着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新中国的目标跃进！

（原载《人民日报》1959年1月31日）

# 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

(1959.2)

宇宙是无限的，宇宙中的每一件事物却是有限的。无限的宇宙，由一件件有限的事物所构成。无限和有限的相互联系，两者之间对立的统一，这是辩证法的普遍规律之一。

人类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过去人们在神话中梦想的月宫旅行，现在竟接近事实了。行星际的飞行既然已离我们不远，太阳系以外的无限太空的遨游也就会有现实的可能性。但是，为着走向这些远大而美妙的目标，人们只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一步步地前进。从开始打制石器到火的发现，经过了多少万年，又几十万年才发明铁器。认识地圆，发现美洲，发明蒸汽机、电动机，直到最近人造地球卫星和人造行星的出现，又经过了几千年。人们征服自然的远景是无限的，但是到今天为止的成就终归是有限的。今天有限的成就不断地发展下去，就表现为将来征服自然的无限的能力。

我们常说，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依靠群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了多少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国民党反动集团逃到了台湾。抗美援朝一战，迫使美帝国主义者不能不坐下来讲和。中国人民在掌握政权之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消灭了地主阶级，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战胜了资产阶级，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去

年一年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号召下，人民群众发挥了冲天干劲，创造了许多奇迹。的确，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是无限的。

但是，这个无限，仍然和有限联系着。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一定条件下，人民群众的力量的发挥，总有其一定的最大限度，而不是无穷无尽的。一个人用两脚走路，一点钟只能走十里左右，你不能希望他一点钟走一百里。用旧式农具种地，一个农民只能种几亩，不能希望他一个人耕种百亩千亩。组织起来，力量比单干大得多，但在一定技术条件下仍有其最高限度。

既要深信人民群众力量的无穷无尽，又要注意到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方面。能够这样，就是对辩证法的客观规律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因此也就掌握了一种正确的思想方法，正确的工作方法，正确地指导斗争、走向胜利的方法。

在战略上深信敌人的有穷有尽和人民力量的无穷无尽，在战役、战斗上又认真注意到人民力量有穷有尽的方面，并巧于应用这有限的力量，帮助它发挥出可能发挥的最大作用，来一个一个地攻取敌人的堡垒，一次一次地战胜敌人，如此积累下去，一直达到对敌人的全胜。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曾经用以指导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来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进行战斗的一个基本方法。

对自然界的战斗，也有类似的情形。自然界总的说来是无限的。但是，人们在和自然界斗争的一定过程中，在为实现工农业建设的一定任务而进行的斗争过程中，自然界所能给予人们的障碍和困难，一般来说总是有限的。与此相对说来，不断生长着的人民的力量却是无限的。因此人民能克服一切困难，并有理由藐视一切困难。大地上有数不清的山，但障碍着愚公的只是王屋山太行山，肯定地认识到山不会加高，愚公就有充分的信心，要利

用自己子子孙孙无限生长的力量，来担走这不会生长的山。古代的人民中间，尚且有愚公移山的故事里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凌厉无前的气魄，在合作化、公社化以后大规模地组织起来的工农群众中间，在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的英雄人民中间，难道还会有什么自然界的困难值得害怕的么？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旦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号召之后，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强烈的响应，并出现了1958年轰轰烈烈的全面跃进的局面。

从总的方面来说，人民群众在对自然界的斗争中完全应该藐视一切困难，应该充分相信自己能克服一切困难，能完成任何艰巨的任务。但是还必须注意事情的另一面，即人民力量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一定条件下的有穷有尽方面。在这里，需要善于估计在一定的生产和建设任务中战斗着的人们所能发挥的最大的力量，善于根据这些估计来规定斗争任务和指标，善于把人民力量充分地组织起来和鼓舞起来，以便尽可能多快好省地来完成所规定的任务和指标。

右倾保守主义者的思想方法是片面的。问题不仅在于他们只看到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的方面，而看不到它的无穷无尽的方面，而且在于他们对于那有穷有尽的方面，也不是从它可能发挥的最大潜力方面来加以估计的。这样的人，只要一遇到比平常较大一些的困难，精神上就被压倒了。因此就不能鼓起最大的干劲，来争取完成可能完成的最大限度的任务。右倾保守主义者的思想方法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完全相反的。大跃进的思想动力之一，就是深信人民力量的无穷无尽，深信人民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没有不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必须继续巩固和提高这种信心，反对右倾保守主义，使

我们在1959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斗争中获得更大的胜利。但在这里，又必须同时防止陷入另一个片面的观点：仅仅一般地相信人民力量的无穷无尽，而看不见在一定的具体工作中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的方面，或者把这些有穷有尽的力量误认为无穷无尽。这种片面观点也会造成工作中的错误或缺点：在规定任务时主观地提出超过现实可能性的过高的指标，在使用人民力量的时候不注意精打细算，合理分配，适当安排，改进技术，改善操作，一句话，不会节约劳力，不会使有限的劳动发挥它可能发挥的最大潜力。

必须认真学会掌握辩证法，把有限和无限的对立统一规律应用到我们的生产和一切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一方面要有藐视一切困难的冲天干劲，一方面又要有实事求是地根据客观现实可能性来正确地规定工作任务，正确地组织和应用人民力量的科学精神。任何一种片面思想都会使我们的工作陷入少慢差费的泥泞，只有辩证法的全面观点才能指导我们多快好省地向前跃进。

（原载《红旗》1959年第4期，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中）

#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哲学问题*

(1959.6)

同志们：

赵院长叫我来和大家见见面，我很高兴，因为我是当教员的，当教员的来学校里看一看总是高兴的。叫我讲，我讲不了什么，我来河南住了几个月，是来学习的。是向河南的干部和群众学习的，是作学生的。几个月来我没什么研究，连书也没带一本，只是到处看看，所以讲什么也没有准备。今天讲的就是根据以前大家学习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即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哲学问题，发表一些自己的感想。我也没有认真研究，只能供大家参考。

## 一、关于目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的问题

目前中国是什么性质？当然是社会主义性质，这个问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时有人也会感觉到有问题，为什么会有问题呢？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还没有完全脱离过渡时期，还不能说我们现在社会主义就建成了。就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有人怀疑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在座的有没有这种怀疑我不知道，可能大家不

---

* 这是艾思奇在从河南下放结束回京途中，到开封参观，应邀于1959年6月14日在开封师范学院所作的报告，未经本人审阅。这里是报告的节录，整理中只作了个别文字的改动。

怀疑了。可是，我经过一些地区，听到有一些人说，现在好像还不能算社会主义，好像社会主义建成时才算是社会主义。这种看法，我认为是不对的。现在虽然还没有完全结束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没有完全建成，但应该说，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

社会主义社会从什么时候算起？从什么时候算进入社会主义，有不同的意见，还有争论。有的人说，1956 年就进入社会主义了；也有的人说，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算是社会主义了。哪个看法好，叫我看，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看用什么标准。如果把标准提的很高，认为在社会基础、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各方面完全社会主义化了，充分建成社会主义了，才叫社会主义社会。以这个标准来看，现在还不是社会主义。实际不能这样看，这不是从发展中看问题，不是辩证的看问题，所以不能采用这个标准。可以考虑的说法有两种：一是 1956 年，一是 1949 年。1956 年的说法是类似苏联的提法，1930 年、1931 年的时候，苏联中央作了结论，斯大林同志报告说："从现在起，苏联进入社会主义了。"意思是在经济基础方面社会主义的制度已占绝对优势，城市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已成为全民所有制，农村在 1930 年、1931 年也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决战，战胜了资本主义，基本上消灭了富农。1930 年、1931 年之后，经济基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占绝对优势。斯大林也说："进入社会主义不等于资本主义一点也没有了。"这种说法是类似 1956 年我国的情形。我们和苏联还有所不同，苏联是先消灭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是 1955 年合作化运动后，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手工业才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从此，生产资料所有制由资本主义制度变成社会主义制度，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资本家所有制变成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公私合营实质上已是全民所有制了。因为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已交给了国

家，资本家没有掌握生产资料，只是还有一些定息，这是赎买政策，这是作为他们把生产资料交给国家的一些代价。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占了绝对优势。农村合作化以后，个体经济基本上消灭了，也可以说可能还会有一点，如个别偏僻地方就有这种情形。仅就所有制方面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占绝对优势。但，人与人之间的某些资本主义残余还存在，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政治上、思想上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分配上也还有资本主义残余，例如定息还存在。所以在经济上社会主义占压倒的绝对优势，故这是类似苏联 1931 年的情形。所以也只能说，我们 1956 年是基本上进入社会主义了。按经济标准来说，以 1956 年为界限，我看来比较彻底。但，按发展的观点来看，这种结论就不一定十分确切，因为，苏联是 1931 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在这以前，也没有说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讲中国问题还是根据中国的情况来研究、分析。1949 年新中国建立也可以说我国基本上就是社会主义了。从 1949 年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掌握了全国经济命脉和最主要的企业。1949 年以后，我们把官僚资本、帝国主义经济都收为国有。决定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企业、银行、对外贸易都掌握在国家手里。社会主义制度已占领导地位，虽不是绝对的，但它起领导作用，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工人阶级从 1949 年掌握了国家的政权，已把全国的经济命脉，最主要的经济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并开始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结束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对资产阶级开始使用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成为全国的主要矛盾。这是 1949 年开始的，1949 年以前就没有这个问题。那时我们没有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我们当时还提出鼓励资本主义发展，没有提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要求，当时社会有资

本主义的性质，但是，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解放区是新民主主义经济。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变了；经济发展方向也变了，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经济方向变了，政权性质也就变了，政权性质开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了。有了这三件，就可以说社会进入社会主义了。你说它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它是什么呢？说它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行的，在形式上可以这样说，实际上是不可以的。因为这时基本上已是社会主义社会了。1949 年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列。从发展的方向来看，1949 年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了，因为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的，领导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一个社会总的性质可以由政权来决定，当然政权又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政权可以代表一个社会的性质。有些人这样说：说我们可以叫社会主义国家，但不可叫社会主义社会。这都是名词的问题，依我看，不管怎样，都可以叫做社会主义社会。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可以叫做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可以代表社会，虽然国家是上层建筑，但它是基础的反映，既然它反映这个基础，它就可以代表这个基础的性质，基础没有这种性质，上层建筑也就没有这种性质。我们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下面，不管怎样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但不是完全的。因为是处在过渡时期。由过渡时期开始，到过渡时期结束，还需要很长时间，要作许多工作；生产关系要改变，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手工业、农村个体小农经济都需要改造。过渡时期第一件大事，就是改变生产关系，这是关键性的问题。另外国家工业化也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1956 年生产关系的改变是基本上胜利了。但人与人的关系，生产资料的分配，资本主义的残余还有一些。从政治思想上消灭资产阶级影响还没有根本解决。在经济上来说，1956 年也还没有完全结束，定息还没有废除，还

要保留一个时期。思想上1957年有一个大斗争，经过了这一斗争，问题得到了解决，但还没有完全解决。还要继续斗争下去。工业化的时间更需要长一些。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工业化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再加上1957年、1958年，实际上都是为工业化打下基础。在中国建设了很多大型工厂，和高度现代化的厂矿，河南也建立了不少，有不少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但是，对我们这样大的国家来说还是很少的。这离基本上工业化还有一段时间。过渡时期是解决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问题；消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影响的问题；工业化的问题。这三个问题解决了，过渡时期就结束了。大体可以说社会主义建成了。

再具体的标准我们现在不好说，将来的问题不能说得太死。将来的趋势不好估计，现在硬要估计是白费力气的。有些人对将来的问题很有兴趣，对现在却不大有兴趣，想的高，争的多。有的问题争论不出个结果。就是估计对了，将来也不一定按你的结论去办，可能参考你的办法，估计的太具体了，将来作起来就没有一点意思了，所以，对将来作估计不必太详细。生产关系变了，政治上、思想上资产阶级影响消灭了，高度工业化了，这三点实现了，特别是高度工业化实现了，不但有现代化的工业，也还要有现代化的农业，产品分配上也相当富裕了，这就可以说社会主义建成了。这只是个大概标准，是个基本原则，如果估计的太具体了，就有争论，你可以这样说，他可以那样说。例如像吃饭，到社会主义有人认为每月要吃50元的伙食，有人认为30元就够了。不管怎样说都可以，但这不是主要的，都不起决定作用。

在整个过渡时期里面，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主要矛盾，贯彻到底，影响到各个方面，在各个方面起作用。工业化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要不断地发展生产力就必须不断地克服资产阶级思

想影响。资产阶级进攻有时是强烈的，有时稍弱一点，有时进攻会停下来。资产阶级影响也是起伏的。总的说来，在过渡时期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是主要的问题。1956 年实现了三大改造，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1957 年与资产阶级右派在政治上、思想上进行了斗争，人民内部进行了社会主义大辩论，形成了 1957 年底、1958 年的大跃进，这与反对资产阶级影响有联系，这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斗争一取得胜利，生产力就向前跃进一步，资产阶级影响消灭了，才会来更大的跃进。有人说，过渡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和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是主要的矛盾，为什么现在又要把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的任务提的这样高？这个问题，是需要解释一下。首先是贯穿过渡时期的整个过程的矛盾和某个阶段的矛盾应该加以区别，我们说两个阶级和两个道路的矛盾斗争是支配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这十年的斗争是波浪式的，有时这两个阶级的斗争处于低潮，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表现主要的作用，而主要矛盾表现在别的方面。如 1956 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解决后，基本告一段落。其技术和文化的落后就突出出来，成为主要的矛盾，但不是支配过渡时期整个过程的矛盾。而是暂时的，只是一个时期的。1956 年、1957 年思想和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基本上告一段落。为了克服文化和技术上的落后，这个矛盾就成为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我们从 1921 年到 1945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全国人民与封建势力的矛盾。中国人民站在一边，封建势力站在一边。但新民主主义革命又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每个阶段中又有每个阶段的主要矛盾，矛盾是变化的，但不影响总的矛盾，只是某个方面突出一点。

## 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以及两个过渡的问题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在一般理论上没有什么问题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有两种形式：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只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这是主要的区别。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两种所有制就要变为一种所有制。其他还有三个差别的区别：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些差别就消灭了。如果综合一下说，大体是生产关系三方面的差别，两种所有制与一种所有制的区别，人与人关系的某些差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没有阶级。所以，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也就是三个方面的过渡，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过渡，即所有制和分配制的过渡，再加上三个差别的消灭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发生变化。基本上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生产力要高度发展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也就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生产关系方面三个差别逐渐过渡，首先是两种所有制变成一种所有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差别消灭了，三个差别逐渐过渡到没有区别，然后，由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所有制的过渡问题我不准备多讲。按中国的具体情况，农村比较复杂，它经过不同的阶段，由个体经济到互助组，由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由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等阶段才由个体所有制过渡到集体所有制，在去年又出现了人民公社。这是由单一的农业经营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多种经营的、范围更大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里有了全民所有制的因素。这比较复杂一些。人民公社是将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现在人民公社存在三级所有制，生产队、作业队、社三级所有制。将来由三

级所有制过渡到一级所有制，一级所有制实现后，才能实现全民所有制。三个差别将来要消灭，但不是分工的绝对消灭，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要是绝对消灭是不可能的。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也不是专搞脑力劳动就不搞体力劳动了，一些人比较多的搞体力劳动不是就没有了。有一些人是专门搞脑力劳动的，如搞文艺工作，写小说的人，就是比较专门的脑力劳动，在写小说的同时也搞体力劳动是不可想象的。有些人脑力劳动可以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在搞脑力劳动的同时也搞一些体力劳动，例如工业中某些人员就可以这样。但是，像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终生不变的绝对分工不存在了。资本主义社会是终生由小到老把人限制在单一的不能转换也不能兼职的工作中，工人永远作工，搞脑力劳动的永远搞脑力劳动。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已经不存在了。将来更不会有了。这种社会绝对分工是没有了，将来可能写小说的人一年内也抽出一定的时间去参加体力劳动，到工厂劳动一下，到乡村劳动一下；并把劳动规定为他们正当的工作，不是附带的，这和一般下乡下厂参加一些劳动是不同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消灭，特别是工农差别的绝对消灭是不可能的，工农业的差别总会有。工业与农业的差别就包括有工人与农民的差别，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工农有差别，工人与农民就有差别，这主要是职业的差别，工人主要是从事工业劳动，但是在工人搞工业劳动的同时也可以搞一些农业。农民主要是搞农业劳动，但是在搞农业的同时，也可以附带搞一些工业劳动。现在还不能实现亦工亦农。我们现在与过去旧社会不同了，旧社会这两者是对立的关系，因为那时阶级是对立的，城乡也是对立的。现在是互相帮助，协作的关系。虽然现在工人基本上还是工人，农民还是农民，职业上的分工还存在，不过二者的关系不是对立的。

到共产主义农民也可以转变为工人，工人也可以转变成农民。但是还有些差别，根本消灭这种差别是不可能的。

## 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的问题

资产阶级法权最近有些人叫资产阶级权利。这是名词问题。名词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是不重要的，叫资产阶级权利或叫资产阶级法权都可以，叫资产阶级权利是想把名词的内容范围缩小一些，把它单纯的限制在经济权利上，不涉及到法律问题。实际上经济权利也涉及到法律问题，但它基本上是经济的权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单指等价交换。但权利也包括法律，经济权利也包括人与人的不平等，法律要反映经济权利，资产阶级立法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在阶级社会里，没有法律就不能有私有财产权。苏联一些同志翻译为资产阶级法权是有理由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讲过："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有资产阶级权利的残余，我们国家就要保护这种权利，因此，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出现了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还要在法律上保护资产阶级权利，例如按劳分配、同工同酬、在法律上保护等价交换等，这是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残余，这种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在思想上应当批评，但对我们现在还有用，所以我们也要在法律上保护。有人说，按劳分配是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这绝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是以剥削剩余价值为转移的，服从于资本主义的利润，这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是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一种形式。等价交换、同工同酬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能实行的，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有这样的规定。现在一般叫资产阶级权利就可以了，叫资产阶级法权也不是原则的错误，权利与法权是有联系的，这种权利的特点是：形式上劳

动价值是平等的，以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来作交换，交换的结果，不同劳动的人，所得的结果也就不同，人口多的要吃些亏，人少的就占些便宜，从这方面来说，跟资本主义的平等是有共同点的，资产阶级的平等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表现在按劳分配中，就有资产阶级残余。但比起过去的社会，它却是最公平合理的制度，这种等价交换制度和资产阶级残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消灭呢？当然要到共产主义才能消灭，要消灭这种制度，首先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物质充分的供应、所有制发生变化，集体所有制完全变成全民所有制。但，集体所有制即使说完全变成了全民所有制，也不能说就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了，因为这不是决定因素，它只不过是便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实现了全民所有制，三个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不一定全部消灭。农村实现了全民所有制，生产力有高度的发展，但城市与农村的生产力仍有差别，农村可能还赶不上城市发展，由于农村生产力比城市低一些，农村与城市对国家的贡献是有区别的。农村交税7%，城市利润全部上交，鞍钢的一个工人每年的产值是18000元，交给国家10000元。农村一个劳动力每年最大限度只能生产五六千斤粮食，合五六百元，平均起来只不过300元，按7%的上交标准计算，每人只能上交21元。所以工人工资比农民的工资高一些是有理由的，10000元与21元比较要差几百倍，工人每月拿五六十元或六七十元，农民每月拿十几元，相差不过几倍，生产的贡献却相差几百倍，因此，工人的工资高一点是应该的。将来农村的生产发展了，也可能实行全部利润上交，那时一个农民也可能上交几百元或一千元，就是这样，工农的差别还要有10倍左右，这就是工农、城乡的差别。工农差别的实质，根本上还是生产力的差别。所有制也有很大的差别，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在根本

上没有差别，在数量上还有很大差别，这就决定了分配上的差别，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差别。相差十倍还不能说是基本上平衡。公社之所以实行三级所有制，就是因为下边各生产队的生产和收入不平衡。三级所有制，就是要三级核算，如果全民所有制实现了，城乡还有差别，按劳分配制度就不能消灭，工人的工资与农民的工资的差别可以逐渐缩小，逐渐向共产主义靠拢，但不能取消，消灭了就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六中全会决议里说："资产阶级法权反映了三个差别。"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存在，还要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劳动的贡献不同，分配也就不同。分配是生产力的反映，当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时候，由于所有制还有差别，故城市与乡村的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决定了分配的性质，资产阶级权利不能消灭，法律上就要肯定，国家立法也就要肯定这种权利，也就有这种权利的存在。

## 四、关于否定之否定改变为肯定之否定的规律问题

由否定之否定改变为肯定之否定的规律不是什么改变，不是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不能用了，也不是恩格斯的话不对了，这只是提法的不同，这两种提法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否定之否定是三段的关系，肯定之否定是矛盾关系，单从提法上来说并没有新的发展，所谓发展只是规律的具体化。这个问题还没有具体研究，小的问题可以说，大的问题不好说。几年来，有些文件和社论上说，事物的发展是波浪式的，起伏的，这是否定之否定的具体化，列宁提出发展是螺旋的，是曲折的发展。毛主席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就指出革命是波浪式发展的。劳动休息要有节奏，时紧时松。这些都可以叫否定之

否定规律的发展，这是哲学原则上的具体化。根本理论的问题还是一样的。

## 五、关于五个并举是方针还是规律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从本质上看，原来只有三个并举：工业、农业并举，中央和地方并举，大中小并举，其他还有土洋结合一些并举等，我们党提出这五个并举，在哲学上是个发展。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就是对立统一的规律。一切事物都有矛盾；矛盾的解决是通过对立面的斗争；对立面有斗争性又有统一性。看问题不要从一方面去看，要从两方面来看，这就是两点论。

在工作中要树立对立面，使矛盾的对立面暴露出来，这样就便于展开斗争，解决矛盾，我们是革命者，我们要使革命不断发展，就要使对立面不断斗争，事物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斗争，事物的发展和斗争是绝对的，要发展就要解决矛盾，解决的方法是通过对立面的斗争。有些对立面有时是不清楚的，常常是在现象中表现出来，这就要看领导人在工作中对立面树立的如何，往往领导者看得比较清楚，群众不易发现这种矛盾，领导人为便于发动群众，开展斗争，解决矛盾，要有意识的作一些树立对立面的工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反右斗争，表面看来右派不像敌我矛盾，有些人在政府有重要的地位，章乃器就是部长，群众看起来好像跟我们没有敌我矛盾，经过 1957 年的大鸣大放，大字报，让右派鸣放，右派向我们进攻，骂我们，还让他们登报，这样对立面就树立起来了。葛佩琦要杀共产党的主张在报上一发表，马上工人农民就去找他们辩论，这样矛盾就清楚了，斗争开展了，矛盾解决了。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也是一样，在整风中，人民也在大字报上

揭发了缺点，又树立了对立面，解决了矛盾。两点论就是要我们在观察事物中全面的看矛盾，使对立面在群众中展开，就便于解决矛盾，推动事物向前发展。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立面有斗争性，也有统一性。斗争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一定的条件下，统一性对事物的发展也起一定的作用。对立的统一就是对立面互相依赖，这种依赖对于事物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必要的，没有互相依赖对发展是不很有利的。最明显的例子如：工作休息，这是对立面，工作就不能休息，休息就不能工作，不工作也就没有资格休息，没有休息也就不能很好的工作。这既有统一性，又是互相依赖，互相排斥。我们要利用对立面互相依赖进行工作，把工作休息安排好，工作时工作，休息时休息。五个并举的问题就是利用对立面互相依赖，来推动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工业农业互相依赖这是很明显的，但又是互相排斥的，抽出人大办钢铁就会影响农业。因此要正确的安排工农业的比例，让两个方面都顺利发展。同时还要有重点，要优先发展重工业，抓这也要抓那，去年中央在上半年比较多的抓了农业，下半年主要的是抓了工业，所以，这两方面也可以互相转化。五个并举，工农业同时抓，又有先后，轮流安排，这就叫两条腿走路。两条腿走路是方针，但它的基础是规律，是对立面统一的规律。所以我们要按一定条件，适当的把对立面联合起来，使它们认真的发挥一定条件下互相依赖的作用，使它们共同发展。在工农业问题上，主要抓工业，附带抓农业，或者是主要抓农业，附带抓工业，总的说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要工农业并举。要看情况、时间、条件具体安排，这是具体工作问题、实际政策问题。

讲理论，只能讲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和五个并举的理论基础，这个方针的基础就是对立统一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就

是对立统一的规律。我们对这个规律有了发展，有了具体化；两条腿走路，两点论，树立对立面，这三句话既是理论，又是实际，理论的实际概括，这是发展，这不能不是发展，这是很好的发展。因为，概括这三点，的确在我们实践中将起很大的作用。

# 关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问题*

(1959.7)

讲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问题。

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可以说就是一个问题。我们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就是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工作方法，就是把辩证唯物论这个哲学原则运用到工作里面去，运用来观察问题，运用来解决问题。

这里所讲的工作方法不是讲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是讲搞农业八字宪法，那是搞农业的具体方法。搞工业也有工业本身的自己的具体方法。我们是讲一般的工作方法，就是如何在工作中间运用辩证法，运用唯物辩证法这样一种工作方法。在“大跃进”过程里面，所产生的问题，所产生的缺点，一部分是由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不正确所引起来的，就是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处理问题的时候，违背了唯物论辩证法的原则。如果说我们党的总路线、党的领导的方针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是符合于辩证唯物主义的，那么我们在工作里面产生缺点的时候，那就是因为我们在具体工作的执行中间没有能够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原则，首先是违背了唯物论。所谓我们工作里面有些主观，就是违背了唯物论的原

---

* 艾思奇和中央高级党校一批同志从河南下放结束回京，到大同市参观。1959 年 7 月 9 日，应晋北地委邀请，给地市机关干部作了一次报告。这是报告的节录，整理时略有删节。

则。主观主义，或者是有些主观性片面性，这就是跟实事求是、跟唯物论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是相反的。

在违背唯物论的原则这方面，主要表现在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没有能够结合起来。干劲很大，但是对于具体工作的处理没有能够注意到实事求是的原则。干劲就是主观能动性。什么叫做干劲？什么叫做主观能动性？大家如果要了解这个问题，可以看一看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持久战》里面有一段叫做“能动性在战争中”，还有一段是叫做“主动性”的问题。能动性和主动性是两件事情，毛主席是分开来讲的。关于能动性，就是讲干劲的问题，在《论持久战》里面，毛主席没有把它叫做干劲，把主观能动性叫做自觉的努力，自觉的有意识的努力。对于事情自觉的努力，就是努力要把它搞好，努力要搞成功，自觉地努力要达到这个目的。为了一定的目的，自觉地加以努力。凡是有自觉的努力这种作用，就叫做有了主观能动性。有一定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很自觉地、积极地努力，要去完成它，都可以叫做主观能动性。

所以，正确的东西有主观能动性，错误的东西也有主观能动性。有时候，一个人为了一个错误的目的，也自觉地努力，比如，制定了一个错误路线，努力去为那个错误路线工作，那就是错误的能动性。有了正确的目的，那么这个能动性就是有了正确的方向。毛主席在“能动性在战争中”这一段里边特别讲到，我们要注意争取使我们的能动性有正确的基础，有正确的认识做基础。这个能动性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基础，就可能把我们的能动性引导到错误的方面去，主观上想做好，实际上会做坏的。冲天的干劲，犯错误的人有时候他也会有干劲的，他有错误的干劲。甚至于反动派它也有它的干劲。你看那个杜勒斯，不是也很有干劲

吗？杜勒斯为了他那个反动目的，七八十岁他还到处旅行，由美国到欧洲，由欧洲到日本，又到台湾，连蒋介石还要拜访一下，你说他没有干劲？所以单有干劲不能解决问题，哪怕是单有冲天的干劲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仅仅只有能动性，而没有正确的思想做能动性的基础，那还是要发生错误的。能动性和主动性不同，能动性就是有干劲，对于事情有了自觉的努力，就叫做能动性。可是能动性并不一定能够得到主动，有了能动性不一定能够有主动性。你如果犯了错误，虽然是有能动性了，积极努力，冲天干劲虽然有了，但是结果还是会被动的。犯了错误了嘛，结果还是要被动的。主动性和被动性是对立的。虽然有冲天干劲并不能够避免被动。如果你只有冲天干劲，只有热情，没有一个正确思想做基础，最后搞下来的结果，还要犯错误，还要被动。就是说，冲天干劲不能正确发挥，不能有效发挥。有效的发挥这个干劲，就是使干劲发挥到能够取得主动，能够在工作上取得主动。《论持久战》是讲战争的问题，关于主动性这一段里面，毛主席就讲到，有了能动性并不等于就有主动性，有了自觉的努力，积极的努力，并不见得就能够争取主动。因为所谓主动，在战争里面就是讲战争的自由权，就是要得到自由，就是要能够在战争里面取得主动，能够支配敌人，而不是被敌人支配。被敌人支配就是被动了。在战争里面如果处于被动，你再努力也是要吃亏的，战争的积极性最高，也还是要打败仗的。因为你处于被动了嘛！没有主动性了。

要把这个冲天干劲发挥到工作上能够取得主动，那就需要有正确的思想做基础，正确的认识做基础。就是说，对于工作中间的问题，还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要实事求是的分析。一方面要有干劲，一方面还要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也就是要能够认

识这个规律，要能认识客观规律。科学分析、科学精神的目的就是要认识客观规律，实事求是也就是为了要认识客观规律。要实事求是，认识客观规律，根据规律来做工作。

所谓正确的思想，要有正确的思想做基础，也就是要认识客观规律。战争里面要得到主动性，得到自由权，也就是要使战争的指导符合客观规律。《论持久战》里面讲了一条基本的规律，就是你要使在战争中取得主动性，最主要的就是要设法在战斗的时候，使自己的力量占优势。自己的力量不是随时都能够占优势的，有时候敌人比我们强，敌强我弱。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是敌强我弱的，抗日战争以前的国内战争，那时候蒋介石的军队也比我们那时的工农红军强。在敌强我弱这种情况下面，就不可能随时都是主动的。所以在战略上要采取防御战略。可是在那种情形下，也还要想办法指挥战争，在战斗的时候，自己总是处于优势。总的形势自己是劣势，可是在一个具体战斗里面，你可以想办法，利用有利的地形、利用有利的客观条件、利用敌人的各种不利条件，敌人分散，我们集中兵力，种种条件，使得我们可以占优势。所谓不打无准备的仗，就是要打就得有准备。怎么样准备？就是要准备到符合一个客观规律，准备到我们自己占优势。自己有了优势了，然后就可以进行战斗了。如果自己没有优势，那还是要采取防御，还是要退却，要转移，要等待有利的条件，创造有利的条件。总之不管怎么样，你总得要符合一条规律，就是要符合一条客观规律，使自己取得优势。取得优势就取得自由，取得主动。

所以这也是说明，在战争里面，一方面是要有自觉的努力，但是单单自觉的努力是不够的，单单有战斗热情、主观能动性是不够的，还要认识客观规律，根据客观规律来指导这个斗争，使自己能够取得主动，取得自由权。这个道理在哲学上，就叫做认识

必然，然后得到自由。在建设工作中间，在生产工作里面，也同样要运用这个原则。就是要认识这个客观规律，根据客观规律来指导生产，指导建设，使得在建设里面能够取得主动，取得自由权，也是认识必然来取得自由。所以我们做工作不能够仅仅靠冲天干劲来解决问题。有了冲天干劲是很可贵的，像去年那一种冲天干劲，那是空前的，那是非常好的，非常宝贵的。可是，这种冲天干劲之所以宝贵，是因为我们有了这种冲天干劲，我们可以更好地、更有力量地来做工作。力量更大，可是这个力量需要正确地使用，正确地发挥，使它能够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要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就必须使干劲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有干劲，另方面工作的指导要符合客观规律。不符合客观规律结果怎么样？结果我们的干劲就要浪费啦。

在干劲高涨的时候，有许多口号是正确的，有一些口号是不正确的。比如说像这样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口号是不正确的，这样的口号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是不是人希望麦子亩产一百万斤，它一定可以亩产一百万斤？事实上不可能嘛！没有这个规律嘛！哲学的规律是思想反映物质，人的主观要反映客观，不是客观反映主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就是说，客观要反映主观了，人想怎么样就要怎么样，这种口号是不正确的。在工业上也有这一类的口号，比如搞地质的人也学了农业上这样的说法，他说是"人有多大胆，矿有多大产"，并且要加上两句："要哪里产矿，矿就在哪里产。"前两句已经很不对了，再加后两句就更不对了。想要矿在哪里产，矿就在哪里产，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实际上也不能这样做嘛！所以那个时候动不动就是亩产几十万斤，亩产几万斤，或者几千斤，那种口号随便提出来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今年就要讲落实了，这就是要在客

观规律的基础上指导工作了。

落实下来，是不是干劲会受影响？也不见得干劲就会受到影响，也不一定受到影响。落实下来，干劲就更踏实一些。指标提得太高了，干劲反而是空虚的。当然，指标过低了也要影响干劲。我们在下面这几个月就看得很清楚了。指标提的太高，太不近情理，那么，那个干劲也是假的，干劲是口头上的。你说亩产一万斤，好！亩产一万斤，开会的时候可以立刻举手，毫不考虑就可以赞成，而且赞成的声音很大，可是就是在会上干劲很大，一回去就没有干劲了，反正完不成嘛！就随随便便搞一搞。所以，群众对于这种口号有一个对付的办法，他有一个针锋相对的口号："不怕万只怕千，不怕千只怕百。"你提一万斤的指标，那我就一点也不怕，提了我就可以赞成。提千斤我也不怕，你提亩产几千斤那我也可以赞成，反正就是赞成而已。但是提增产几百呢？我就要考虑，那就认真干了。所以指标落实，干劲反而很踏实。最主要的问题是，如果冲天干劲不和科学分析结合的话，那么这个干劲是会浪费的。"留有余地"这个原则毛主席在五六年、五七年就提出来了。指标要多少留点余地，这个原则也跟战争上一样，你有了余地就主动了。你这个指标比较落实，落实了而且还有一点余地，你干起来就主动了，自由了。你甚至还可以超过嘛，如果情况不好，留有余地，碰到意外的困难也可以保证完成；如果没有碰到意外的困难，那就可以超额完成。这就是主动了，这就是自由了。落实了以后，就符合客观规律，就自由了。群众干起来也就心情愉快，也就能够踏踏实实地来干。

在生产上，在指标方面多少留一点余地，留得余地太多也不好，变成保守的指标也不好。指标应该是尽可能地提高，但是，高到还要有点余地。这样子力量就充足，也就等于在力量上占了优

势。对于自然界我们自己的力量占了优势，然后在战斗中间，才能有自由权，才能够主动。

大跃进里面所以产生的缺点，首先就是违背了唯物论的原则，冲天干劲没有跟具体的分析、科学的精神结合起来。所以这个干劲有些地方用到不恰当的地方，没有能够很有效地发挥。这些缺点当然使得我们工作上发生了一些损失，那很可惜啦。但是这种缺点，经过研究，中央就提出了这个原则，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逐渐克服了。

除了唯物论，还有个辩证法的问题。辩证法的问题，主要就是，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关于两点论和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两点论就是看问题要看正反两面。思想方法，一定要经常注意到正反两面。两条腿走路，主要是工作方法。在处理工作的时候，要照顾到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面要照顾对立方面。比如工作和休息是对立面。但是要抓工作，也要抓休息，就是在工作上要注意在一定条件下面，需要兼顾对立面，就是对立面要相互照顾。对立面不要把它看成绝对对立，抓这一面就绝对不要那一面，抓那一面就绝对不要这一面。违背这个原则就发生缺点，去年有许多工作之所以发生缺点，是违背这个原则的，就是违背辩证法这个原则。

两点论和两条腿走路的原则，可以说是辩证法方面的一些发展，我们中国这几年来在辩证法方面很重要的发展，毛主席把这个发展概括成两点论和两条腿走路的原则。毛主席对于辩证法，特别在运用到实际工作里面的时候，有了很重要的发展。辩证法的根本原则是没有什么改变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不会改变的，不会变化的，把根本原则变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但是这个根本原则运用到具体工作里面来，就有了许多新的具体的发

挥，这就是发展。

辩证法的根本原则，就是要肯定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有矛盾，一切事情都有矛盾。辩证法的根本原则就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即矛盾法则。它的内容，首先肯定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有矛盾，也就是都有对立面，任何东西的内部都包含对立面。矛盾和内部的对立面，是一切东西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发展是怎么样发展的？发展就是矛盾的暴露，和通过对立面的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这样，事情就进一步发展。所以，也可以这样子说，发展的过程，就是矛盾的不断暴露和矛盾不断解决的过程；矛盾不断暴露，通过对立面的斗争，不断解决的过程。辩证法的根本原则就是这样子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这样一些原则。我们怎么样发展了这个原则，就是把这些原则变成了我们的具体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运用这些原则，使它成为我们的很具体的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这些原则就是两点论，两条腿走路，还可以加上一条，就是树立对立面，都是毛主席讲的。

所谓两点论，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讲看问题一定要照顾正反面。看工作要看成绩和缺点，只看成绩不看缺点是不对的，只看缺点不看成绩更不对。因为事情本有两面，所以你一定要看正反两面。两点论就是指正反两点，不是一般的两点，你如果单讲缺点也可以讲两点，甚至于可以讲四点缺点，五点缺点，可是你如果单讲缺点，不管你讲多少点，实际上还是只有一点，实际上只是讲缺点。要讲两点论，不是普通的两点，是又看正面又看反面，又看这一面又看那一面，照顾这一面照顾那一面，眼光总要经常注意到两方面。我们一般同志有时候说两点论，嘴上说的也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实际在做工作的时候，常常就有了问题。搞工业生产，一定要照顾到这两点，又抓质量又抓数量；你一定要

又看质量又看数量。可是有时候，因为数量任务多了以后，就不注意质量，就看不到质量。

讲政治挂帅，政治挂帅和物质利益是正反两面。去年有一个时候，讲政治挂帅的时候，物质利益就不管了，好像单纯政治挂帅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看不到物质利益也起作用。按劳分配也不要了，什么事情好像只要政治上一谈就可以解决。所谓政治，如果离开了物质条件，有时候也是空的。有一个时期，好像做政治工作、政治挂帅，就是单讲共产主义远景，就是政治挂帅。眼前问题怎么样具体解决，好像就不是政治挂帅了。其实，今年我们六中全会以后，以及后来的六级干部会议以后，毛主席提出来，要强调算账，要注意反对平均主义。这些，是要解决现在的一些问题，没有谈到共产主义远景。这些算不算政治挂帅呢？因为它这里面有思想政治工作嘛！有一个反对平均主义的问题，有一个要按照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来坚持基本上按劳分配这个原则，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对群众对干部说通这些问题，那这也是政治挂帅。所以，政治挂帅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物质利益也要注意，单纯政治挂帅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当然政治挂帅是主要的。政治挂帅为主，有物质利益做基础，主要要政治挂帅。因为你没有政治挂帅，就没有了方向，思想上就不清楚了。你单讲物质利益，单算一算账，单搞按劳分配，只是在制度上搞一些多劳多得，那么，结果群众思想就不能提高，他就只看眼前利益，那也不很好。搞了按劳分配，还要做一些政治工作，说明这个按劳分配是很好的制度，是我们过去经过多年斗争得来的——从前是受剥削的，现在呢？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现在不受剥削了。这样子思想就提高了，群众接受按劳分配制度以后，就不会只顾眼前利益，就能够看到大局了，而且也就可以由此看到将来。我们过去受压迫，经

过斗争，现在能够争取多劳多得，不受压迫，将来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能够争取到共产主义。这样子就使人的思想提高，有了明确的方向，就不致于只顾眼前利益了。因为政治是指导方向，指导人的思想，使人头脑清楚，所以始终是主要的东西。所以叫做要挂帅，就是因为它是主要的，他是指导性的东西，但是并不是惟一的。是不是挂帅就解决一切，什么都不要了，只有一个帅就行了？没有这样一种战争，只要一个统帅，把旗子打起来，兵也不要了，就可以打胜仗。没有这种事情。统帅是主要的，战争指挥是主要的，可是士兵的战斗也是不可少的，而且是基础。一个是基础，一个是指导的东西。指导的东西是主要的，基础是它的立足点。物质利益是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在制度上要实行按劳分配，使群众在物质利益方面得到一些鼓励。但是，又要注意思想清楚，认识明确，就是要有政治指导，就是要有政治挂帅。这也是两点论嘛！两方面是对立的统一。

我们看问题要两方面都看到。我们工作里面发生缺点，就是看不到两方面，只看到一方面。两点论，就是要告诉我们，在思想方法上经常自觉地注意到正反两面。无论碰到什么问题，自己有了一个意见的时候，首先要检查一遍，你这个意见是不是只看到一方面。如果只看到一方面，你主动地看一看另外一方面。我们有一些干部，我们有一些同志，到乡下去做工作的时候，开始下去的时候，有一个时期头脑很热，什么都觉得好，那个时候就没有考虑到，还可能会有缺点，这就不是两点论。后来到了乡下以后，跟干部接触了，跟一些基层干部接触以后，在去年就发生了许多缺点啦，去年八九月十月那个时候，虚夸的问题，干部作风的问题，到了基层去，就看得很明显。一看到这些缺点以后，有的人又发生问题了，又只看到干部的缺点。所以，我们在下面碰

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跟那个同志讲：你现在感觉到干部好像都是缺点，这个有点不妥。你主动地想一想，干部是不是更主要的还有优点，你现在暂时看不到优点，那么你主动地去研究一下，自觉地去找一找这个优点。后来根据这个原则，他们又去看了，研究以后，果然这个干部虽然有缺点，但是还有很多优点，而且有些优点是我们没有在基层做过工作的人所没有的，比我们高明，有些优点我们做不到的。比如说是情况熟悉呀，对于具体工作拿得出办法来，而且很快拿得出办法来，我们脱离实际工作比较久的人就没有这个优点。做工作敢干呀，服从上面的指示很坚决，这些地方都是优点了，你主动地一看就看出来了，所以两点论不在于嘴上说一说，而在于在实际工作里面观察问题的时候，要自觉地主动去看反面，找事情的正反两面，看到正面的时候，主动的想一想反面，看到反面的时候，要主动地想一想是不是还有正面。经常运用辩证法来观察问题。

还有一个树立对立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解释一下。树立对立面的意思，可以这样子了解，就是要求具体工作里面，采取一些办法，来暴露矛盾，使对立面的斗争容易展开，容易解决矛盾。发展是要暴露矛盾，并且通过对立面的斗争解决矛盾。我们根据这个原则，在做实际工作的时候，主动地想一些办法来暴露矛盾。矛盾暴露了以后，对立面的斗争就容易展开了，然后解决矛盾也就比较快了，事情也就发展得快。

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和树立对立面的问题又不同一些。树立对立面，是要暴露矛盾，展开对立面的斗争，推动工作发展。对立面的斗争是推动发展的最主要的力量。斗争是绝对的，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注意通过对立面的斗争来克服矛盾，揭露矛盾，暴露矛盾。我们去年年底有了一些问题，工作里面发生了一些缺点，

中央就把这个矛盾指出来了。缺点有的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性质的不了解，比如：现在的制度本来是社会主义制度，公社是集体所有制。但是我们搞成共产主义了，发生了矛盾，指出来就暴露了。暴露了以后，经过一些讨论，讨论也就是批评，就是一种斗争，人民内部的斗争，经过讨论就解决了。从六中全会以来到现在，许多问题的解决，都是矛盾的暴露，通过批评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在工作里面要善于暴露矛盾，展开斗争，解决矛盾，使工作得到发展。要及时地能够暴露矛盾，来解决矛盾。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立面的斗争虽然是发展的主要力量，可是对立面的同一性（所谓对立面的同一性就是对立面的联系），在一定条件下面对于工作的发展也有帮助，也需要利用对立面的同一性来帮助工作的发展。有些研究哲学的同志对同一性搞不清楚，好像两个对立面同时存在就叫做同一性。这种了解是不够的，没有了解了主要的东西。对立面的同一性，主要是讲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面它需要互相依赖，因此它就互相联系。这个互相依赖，对于事情的发展也是必要的。比如，我们举这样的例子：工作和休息，这是对立面。可是工作和休息，是不是也互相依赖呢？很清楚，工作和休息是互相依赖的，是在一定条件下面互相依赖的。就是说，适当的工作和适当的休息是互相依赖的。比如你不适当的休息，或者休息的太少，或者休息的太多，对于工作都没有帮助。可是适当的休息，对于工作会有帮助。所以工作就依赖休息。因为它相互依赖，所以必然要有联系。这是规律，这是辩证法的规律，对立面有同一性，有一定条件下面的同一性。这个一定条件下面的同一性，是事情的发展所必要的，因为这是一个规律，所以我们做工作也就得按规律来工作。因此我们做工作的时候，比如说处理工作和休息的问题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

到，在安排上要适当地兼顾工作和休息，不要只照顾一方面而不照顾另外一方面。去年就有这种问题嘛，干部要强调苦战，不准休息，不准睡觉，结果呢，并不好嘛，因此也就发生缺点了。按照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面互相依赖这种原则来处理工作，这种方法，就是两条腿走路的方法。

各种各样的对立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面都互相依赖的。一切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面都有互相依赖的关系。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对立方面相互依赖的情形更清楚。工业和农业相互依赖，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相互依赖，这些用不着很多解释。质量和数量，互相依赖，你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结果那个数量也是空的，因为数量要报废嘛！不讲数量只讲质量呢，也不行。因为数量太少，也不能完成任务。所以质量和数量也有互相依赖。物质利益、政治挂帅是互相依赖的，教育和生产劳动是互相依赖的，都是在一定条件下面互相依赖的，你安排的不适当，它就没有互相依赖了，就互相排斥了。你搞生产劳动搞的太多，学习时间太少，结果把教育排斥了。因此，我们今年就来一个纠正嘛，不要让学生劳动的太多，弄得不能够学习。学生主要应该是学习，学习和生产必须适当地安排。两条腿走路就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对立面相互依赖。这主要是讲我们自己内部的对立面，至于敌我中间是没有什么两条腿走路的。比如说，是蒋介石统治，就不能又说是建立新中国。没有这样的事情，敌我中间不能有两条腿走路。

两条腿走路的问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就是不是力量平均使用，不是平均地照顾两方面，而是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面有一方面是重点。比如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在学校里面教育是主要的，劳动生产结合是次要的；在工厂里面，工厂和教

育结合，工厂办学校，工厂里面的工作是主要的，劳动是主要的，学习是业余的。两条腿走路，它不是在每一个时候两方面同时平均用力量的。人走路也是很清楚嘛，两条腿走路这个形象就很清楚，总是有一个时候一只足向前，一只足在后的。总是有一个时候，一方面为主，另外一方面为次。主要次要的关系是可以在一定情形下面可以轮流变化的。有些情形是不一定变化的，比如说工农业并举中间，重工业始终要占优先地位的。不过一个领导人抓工作的时候，可以一个时候多抓一点工业，一个时候多抓一点农业；一个时候多注意工业问题，一个时候多注意农业问题。但是总的来说，重工业始终是占优先地位的。

按比例发展的原则，也是两条腿走路的原则。工农业并举，中间有一个比例，比例中间有重点。我们的总路线是表现两条腿走路，体现了两条腿走路的原则。两条腿走路，有时候是两方面同时兼顾，一方面为重点；有时候是一个时候只能抓一方面，轮流地向对立面转化。比如工作和休息，白天工作，晚上休息，不能白天同时主要抓工作，附带睡觉，没有这种事情的，或者是晚上主要睡觉附带工作。这要看情形，两条腿走路的安排要实事求是，看具体情形，看事情本身的性质，根据事情本身的性质来具体安排。大体上，两条腿走路是表现一种事情是有点波浪式前进的，在发展过程里面，两条腿走路表现一种波浪式的前进。一个时候这一方面比较重要，另外一个时候那一方面比较重要。一个时候左足走在前面，一个时候右足走在前面。比如说是工作的发展和整顿，去年大发展，今年就来一个整顿。整顿到一个时期，将来又可以有发展。因为要整顿要发展，所以中间就有一些波浪了。

事情都可以这样子波浪式地前进。如果我们对于客观规律认识的清楚，那我们就可以主动地按照波浪式前进的规律来指导工

作。这样子工作的发展就可以比较健康，比较正常。如果不认识这个规律，一股劲地往上跑，没有一点起伏，有时候就会陷于被动。我们想一想去年的工作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形，可能也有这种情形的。这些问题我想不举很多例子了，大家都是搞实际工作的人，也有搞理论工作的人，只要把原则提出来，大家可以自己考虑一些例子，自己来理解。

# 纪念斯大林诞辰 80 周年

(1959.12)

今天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的杰出人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强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诞生 80 周年。斯大林从 15 岁参加革命运动到 74 岁逝世，整整 60 年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在列宁逝世之后，他曾经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30 年之久。今天，当纪念斯大林的时候，我们看到：共产主义事业，不但在苏联，而且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取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预见。为了实现这个人类最崇高的理想，不朽的列宁领导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包括斯大林在内，积极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使俄国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发展成为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统一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在这个党的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在 1917 年胜利地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始从理想变为现实。苏联人民在粉碎了 14 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完成了经济恢复工作以后，就坚决地执行列宁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总路线。这条社会主义改造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的实现，使苏联摆脱了经济落后的状态而变成先进的强大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辉煌的成就，不仅吸引了全世界劳动人民，使他们向往社会主义，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法西斯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使苏联在打败希特勒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苏联为主力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以及在这个胜利中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成为十月革命后人类历史的重大的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已越出了一国范围并发展成为世界体系。全世界革命的工人运动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也有了新的高涨。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首脑的苏联，在战后也更加发展，更加强大了。现在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开始全面的共产主义建设，并且在大踏步发展国民经济的宏伟的七年计划的第一年中，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1959 年苏联工业产值同 1913 年比较将增加 35 倍。最近五年来农牧业产量有了巨大的增长。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和宇宙火箭的成功，开始了征服宇宙的壮举，标志着苏联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方面已经登上了世界的最高峰。苏联在十月革命后 42 年中所获得的这一切伟大的胜利和成就，都应当归功于伟大的苏联人民，归功于领导他们进行光荣的斗争的、久经考验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在这个集体中曾经担任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生前作了重大的贡献。

在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为了维护列宁的路线，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进行了严重的斗争。他在这些斗争中，保卫了并且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在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捍卫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

和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首先胜利的理论，并且用这个理论鼓舞了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他捍卫了列宁的关于党的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建设等等方面的理论。斯大林根据列宁的遗训，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方针和任务，击破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党的总路线的联合进攻。斯大林遗留下不少著作。他的最后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一本探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文献。斯大林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贡献，对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斯大林的著作中虽然包括个别错误的论点和公式，但是整个说来，他的著作仍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遗产。

无限忠实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斯大林，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对于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对于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全世界劳动人民、被压迫民族、爱好和平的人们在自己的斗争中得到了来自苏联的深切的同情和巨大的支持。苏联从建国以来一贯执行列宁的和平外交政策。在争取持久和平的斗争中，斯大林根据苏联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斗争的丰富经验，强调必须对帝国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强调必须在人民群众面前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并曾经动员人民群众为保卫和平进行不懈的斗争。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都记得1951年2月间斯大林所说的一段话：“如果各国人民把维护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并且把这一事业坚持到底，和平就能够保持和巩固。如果战争贩子得以用谎言的罗网陷害人民群众，欺骗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拖入另一次世界大战中去，那么战争就可能变为不可避免。”

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的功勋相较，只是第二位的。现在，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得出来的严重教训，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项重要的财产，它和苏联共产党的一系列成功的经验一样起着积极的作用，可以而且应该用来提高一切共产主义者的觉悟，从而防止重犯这种错误，并且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

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最近几年来有了重大的发展，并且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1957 年 11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不但在空前的规模上表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强的团结，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会议总结了近一百年来特别是十月革命以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莫斯科会议宣言，是各国人民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最鲜明的旗帜，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为共产主义事业最后胜利而进行革命斗争的最锐利的武器，也是它们的国际主义团结的思想政治基础。帝国主义者及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曾经乘着苏联共产党批判斯大林的一些错误的时候大肆攻击了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了全世界规模的反共高潮。这恰恰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反革命的丑恶的面目。在一场激烈的斗争中，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阴谋破产了。共产主义事业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当然，共产主义的敌人只要存在一天，就一天不会停止它们的破坏活动。因此，我们必须对帝国主义者的阴谋和对作为共产主义的叛徒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提高警惕。我们必须高举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这个伟大的旗帜，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在反对战争势力和侵略势力的斗争

中，使世界和平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胜利走向胜利。

（原载《人民日报》1959 年 12 月 21 日）

# 关于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1959.12、1964.6)

大家要求讲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今天讲一下这个规律中的一些问题。

## 一、辩证法规律之间的联系问题

讲否定之否定的规律，顺便可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辩证法三条规律的联系。

列宁说：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和量变到质变的规律，这也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但是，因为对立统一的规律是核心，所以，要了解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就要把对立统一的规律作为基础加以说明。因此，也可以说，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某一方面最普遍的表现形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辩证法”部分讲到：在这里不能详细地考察这些规律的相互关系，这个笔记里暂时只能引用一些例子来证明三个规律是自然界普遍的规律。恩格斯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三个规律是

* 这篇讲稿是两份讲课稿的综合，一份是 1959 年 12 月 1 日给 59 班学员讲的，一份是 1964 年 6 月 15 日给 59 班、60 班哲学专业讲课中的一部分。讲稿中的一、二两个问题是 59 年讲的，第三、四个问题是 64 年讲的。在对速记稿整理时，删去了两段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例子，删去了“论否定”一文的点名批评，在文字上作了一些加工，未增加任何内容。

有互相关系的，是有密切联系的。这个相互关系就是以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基础，其他两个规律就跟着以对立统一的规律作为基础来加以说明。对立统一规律是一个核心，因此讲辩证法的时候，如果讲的很简单，往往就是主要把对立统一的规律来加以说明，这样就差不多了。毛主席的《矛盾论》里也说：只要把矛盾的规律、矛盾的问题从各方面认识清楚，就基本上懂得辩证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这个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着的由于对立而产生的运动的反映而已。"简单的来说，辩证法不过是由对立而产生的反映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以其最后的互相转变或转变到较高形态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这就是辩证法最根本的东西。

要简单地把握辩证法，就可以撇开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撇开量变、质变的规律，单独把对立统一的规律加以说明也就够了。当然这样做是不够的，但是如果是简单的说明，就只能这样来说明。如果把辩证法的内容加以发挥，就要在对立统一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来说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两个规律都是对立统一的规律某一个不同方面的表现形态。我们讲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都是这样来说明，这样来把握它们的相互关系。

有的人不同意这样来说明。他的理由就是：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应该看做是三个孤立的规律，如果对立统一的规律作基础，就是要把量变质变的规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归结为对立统一的规律。如果这样来归结就错了，就用不着三条规律了。

我们觉得这种意见不一定对。对立统一的规律是可以作为其他两条规律的基础的。从某一方面来说，要把两条规律归结为对立统一的规律也是可以的。列宁在辩证法十六条里也讲到量和质

相互转变的规律。讲这一条时，列宁加了一个注：这一条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实例，是向对立面转化规律的实例。这样就很清楚了，量变和质变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例子，当然可以归结为对立统一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也可以这样归结，实际上就是对立面转化的规律一种更展开的形式，更展开的说明。

有人问：毛主席曾经把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写成肯定和否定的规律。为什么这样提？这是不是说恩格斯的讲法是错误的？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否定之否定这样的提法就不对了。我看解释为肯定和否定的规律也有它很重要的意义，这样就使得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密切地联系起来。毛主席这种提法就是说：否定之否定无非是肯定和否定互相转化的规律，把这个核心指出来了。我这样的解释不一定对，但我自己现在的水平就只能作这样的解释。毛主席的提法不是反对恩格斯的提法，不是要取消恩格斯的提法，而是有所发展，是把否定之否定规律更深刻地表现出来，把否定之否定跟对立统一的联系更明确地指出来了。这样对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就有所补充，有所发展。这个提法是非常高明的。

辩证法的三个规律：（一）对立统一的规律；（二）量变质变规律；（三）否定之否定规律。三条规律是密切联系的。所以，量变和质变的规律，肯定和否定的规律是可以归结为对立统一规律。量变和质变的规律，事实上就是量和质的互换，互相转化。由于内部矛盾斗争，经过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发生质变，经过质变之后，又进一步发展量变。新的质表现为相对的稳定性，就在这个基础上发生新的量变。量变和质变的内容，毛主席也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说明。量变为什么会引起质变呢？质变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量变的过程中，在量增加或减少的过程中

间，内部矛盾发生变化，主要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发生了变化。在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发生变化以前，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但是量变到一定程度，到了顶点的时候，主导方面发生很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在形式上就是质变，在内容上来说，是矛盾的主导方面起了根本的变化。

在量变的过程里，事物的各个方面还可以有质变。比如，在社会主义没有变化成共产主义的时候，总的来说没有质的变化。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里，它的各个方面还是有质的变化的。所谓整个社会主义没有变化，是因为分配上仍然是按劳分配，这一点没有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主要是分配制度不同。分配制度没有变化，整个社会主义也就没有变化。另外还有所有制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种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因此，按劳分配的制度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两种所有制的存在，就使得社会主义在总的方面，始终是量的变化，不是质的变化。但是从各个方面来说，某一方面有质的变化。质和量的变化不能混淆起来，是量变就不是质变，是质变就不是量变，不能说各个方面质变的本身，也就是量的变化。各个方面是有质变的。

由量变到质变，就是对立统一的规律在量和质互相转变问题上的具体表现。因此，量变和质变的规律可以成为向对立面转化的一个例子。

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内容有两点：一种是事物的发展是内部对立斗争的结果，第二点，发展过程是不断向对立面转化的过程，也就是向更高级形式转化的过程，就是向对立面的发展。

人的思想意识的质变是怎么变化的呢？

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要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起了质变，是不是真的进步了，就要看矛盾的主要方面

是不是变化了。有些人做自我批评，但他是以个人主义批评个人主义，结果个人主义还是占优势，这样就没有办法进步。所以，我们常说：有了个人主义的人，想要进步，就首先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就会跟自己的个人主义进行斗争。有些人个人主义思想很严重，人家一提意见，他马上说：你这个人很好，谢谢你，完全接受你的意见。对别人的意见根本不通过脑子，这是用个人主义来对待个人主义。当然，对待批评坚决抵抗的，这也是个人主义。党内问题不是讲应酬，讲个人感情。有些人为了保护自己，就多磕几个头，少受一些批评。遇到这种现象，不要以为他是真正的转变，那是一种保护个人主义的方法。真正的质变不是那样。顽固抵抗是不对，但是痛哭流涕也并不能说明真正的转变。真正的转变是老实检讨自己，把自己当做客观对象来分析、批判，毫不留情地揭发自己的缺点，摆事实，讲道理。能够做到这点，那么就可以看出来真正有质的转变，因为他主导的方面不同了，能够把个人主义当做客观对象来斗争。

由于内部对立的斗争，到主导方面的转化，使得事情的质发生根本的改变。这个问题在毛主席的《矛盾论》里面讲得很清楚。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比较更明确地表现出了向对立面转化的过程和转化当中各个阶段的互相联系。对立统一的规律还没有能够使我们充分了解向对立面转化时各个阶段之间有什么内部联系。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使我们了解到了这一点。

在这个规律里，首先是讲肯定和否定的矛盾，然后是肯定和否定的相互转化，由一个阶段转化为另一个阶段。在转化为另一个阶段中间发生什么关系？为什么一定要叫否定之否定？用这个规律来说明三大规律之间的关系，讲对立面的两次转化。

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就只有两次转化？当然不是。问

题是把两次转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之后，就能够了解无数次的转化，就能够了解无限多地向对立面转化的过程。所以，只要把三个阶段的相互关系弄清楚了，无限转化过程的内容也可以清楚了。所以，这个规律就不必叫做无限否定的规律，我们了解三个阶段就够了。就像是解剖一个麻雀，我们就能了解一切麻雀一样。

看一个转变过程够不够呢？

单单看一个阶段还不够。研究两个阶段就能够说明肯定阶段和否定阶段的关系。再一个转变过程，第三个阶段和第一个阶段有一些特殊情况并不能够说明。

## 二、辩证法意义上的否定问题

我们了解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总是分两方面来了解：一部分是先了解肯定和否定的关系，然后再进一步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整个联系。

要了解否定之规律，首先要了解否定为什么的问题。

简单来说，否定就是向对立面的转化。第一个阶段叫肯定阶段，第二阶段叫否定阶段。向对立面的转化叫做否定。为什么叫否定呢？就是因为它要向对立面转化。这个转化是事物根本的变化，是变化到反面去了。原来是肯定的，现在就要把它否定掉。所以，凡是根本的转化，都是向反面的转化，向对立面的转化。所以，单看否定这个名词就说明辩证的发展。

辩证的转化跟庸俗的进化论根本不同。

庸俗进化论认为，世界的发展是渐变的，是没有根本的变化的，是一点点变化的。19 世纪以来，经验派哲学，又叫做实验主义哲学，都是宣传庸俗进化论。恩格斯批判了耐格里。耐格里就是宣传庸俗进化论，否认我们能够认识质的差异，甚至说质的差

异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一切质的差异都应该归结为量的差异，所以本质上只有量的发展，没有质的发展。19 世纪以来，因为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了，取得了政权，所以，资产阶级的哲学和世界观就走到了庸俗进化论方面来。一方面，他们不能不承认进化论，因为生物学上的进化论已经出现了，因此他们就把变化归结为量的发展，归结为庸俗进化论。17、18 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已经包含有庸俗进化论的因素。但那时的机械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他在根本上不承认世界的发展。所以，机械唯物主义虽然已经有把质归结为量的因素，但那个时候没有庸俗进化论的问题。因为那时在自然科学界看起来不是问题，因为他根本不承认发展，所以没有庸俗进化论问题。

庸俗进化论，是在 19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取得根本胜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而自然科学又揭露了自然界的发展过程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歪曲事物的发展过程，因此经过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来宣传庸俗进化论。

庸俗进化论是经验派主观唯心主义的主流，跟不可知论是密切结合的。在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问题上，他们是主观唯心主义，在认识来源问题上，他们是经验主义，在解释世界发展问题上，他们是庸俗进化论。这几点，在胡适的实用主义里全都有了。胡适跟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次斗争，就是李大钊和胡适的斗争，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科学和庸俗进化论的斗争。庸俗进化论把质变归结为量变，不承认有质变，因此就不承认有什么否定的过程，不承认有根本的变化，更不承认有对立面的转化。

辩证法关于否定的概念运用在发展学说上，跟庸俗进化论是根本针锋相对的。辩证法承认有根本的变化，承认有对立面的转化，承认对旧事物的否定。量的发展不是无限的，整个发展过程

是无限的。但是每一个具体发展过程不是无限的，而是连续的。不是一加一加一……无限的加一。

黑格尔的学说中，也有庸俗进化论的因素。他认为发展是连续性的中断，连续性中断的质变。

单用量变质变的规律来说明辩证法是不够的。要更深刻地说明质变的内容，还要有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质变是一种否定。对旧事物的否定，向对立的方面转化。

有一个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论否定”。这篇文章有很多错误，他的方法就是曲解否定的概念。已经有很多杂志开始批判这个文章，有些文章写得非常好。

“论否定”这篇文章就是曲解否定的概念，完全曲解为庸俗进化论。形式上好像是在使用辩证法，实际上是在宣传庸俗进化论。在开始，他也肯定了，否定旧的事物是向对立面的转化。但是，解释事物向对立面转化时说：这个转化由于旧事物里面有积极因素，有消极因素。那么转化的原因就是消极因素的逐渐消灭，积极因素逐渐出现。这里他使用了“逐渐”两个字，没有提到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经过斗争，主导方面发展变化。所以，这是口头上承认否定这个概念，但实际上是只承认量变，不承认质变，不承认矛盾的主导方面，根本方面的转化。这实际上是庸俗进化论，曲解否定的规律。

这个错误不是全国性的，但是很值得注意。我们在讲否定之否定规律时，可以把它作为典型提出来。既然陕西有人这样作，那么，别的地方也可能有人这样作。他进一步说：否定主要是继承旧的东西。旧东西里面本来有积极的因素，它逐渐发展起来，就得到否定。所以，否定旧事物主要是把旧事物里面的积极因素继承下来。因此，他就不提根本的否定旧事物这一点。本来，我们

对旧事物的继承，要有批判的继承。新事物跟旧事物不同，主要是说它有根本的不同。比如，社会主义社会跟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优越的地方是什么呢？主要是有了新的生产关系。而这个新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没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的积极因素要不要继承呢？当然要继承。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在社会主义社会要继承。但是社会主义所以比资本主义优越，是不是就是因为继承和发展了这些东西呢？那不是。而那篇文章认为：新事物所以比旧事物优越，主要是因为继承了和发展了旧事物里面的积极因素。能不能这样说呢？好像能够这样说，但实际上不能这样说。新事物所以比旧事物优越，当然是有一个因素，就是能够把旧事物中的积极因素发展起来。但是，这只是一个因素，不是主要的东西。主要是因为有了跟旧事物根本不同的新事物。因为主导方面变化了，有了新的质。这个根本新的东西在旧事物里不一定有。资本主义社会里不会产生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新事物所以能够把旧事物的积极因素继承下来，并且加以发展，主要也是因为它有新的东西，有了新的发展形式。主要不是继承了和发展了旧的东西。

修正主义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名词，取消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实质。凡是不妨碍他宣传庸俗进化论的名词，他都可以使用，凡是不接触到革命变革的名词，他也都可以利用。使用的时候，尽量把一切革命的内容取消。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有这个共同点。从伯恩施坦起到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都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名词，而宣传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所谓修正主义，就是修正革命的内容。

所以，我们讲否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要保护“否定”这个概念的革命内容，一定要坚持“否定”首先是根本的变

化，而且是向对立面的转化，是对旧事物的根本否定。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谈到继承的问题。

不谈继承也不对。认为什么都否定了，否定一切，这样的了解也不对，这样的了解是片面的。但是，借口不能否定一切，因此就根本取消否定，利用不能否定一切这个因素来反对根本否定，否认根本否定，这是一种修正主义，是首先要根本反对的。我们现在应该主要是反对这种修正主义。

否定，首先是对旧事物的否定，是质的根本变化，是新事物的创造。同时在创造新事物中间，又批判地继承旧事物中间某些积极的因素。这就是否定阶段跟肯定阶段的相互关系。讲否定问题，首先应讲清否定和肯定阶段的关系。这个规律的第一点是根本否定，是向对立面的转化；第二点是对旧事物的内容加以继承和发展。这个继承和发展是批判的继承和发展。

“论否定”的文章里还有一个很错误的观点。他说：否定最主要的就是能够把旧事物加以利用、改造、发展。这是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政策当做一个普遍的方法，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加以利用、限制、改造。而他连限制也没有提，这就是说，新东西就是简单把旧东西加以利用、改造和发展。这是非常荒谬的言论，也是一种非常笑话的诡辩，是把消灭资产阶级的具体政策变成哲学规律，扩大成为世界观，而且对具体政策也是片面的曲解了。我们说是利用、限制、改造，他不提限制，只讲利用、改造、发展，主要是消灭资本主义，这一点不提。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利用、限制、改造是暂时的，主要目的是要消灭它。

所以，否定阶段和肯定阶段的关系基本上是两点：1. 根本否定旧事物，要向对立面转化；2. 在根本否定的基础上，有批判地把旧东西里面有价值的因素加以继承，经过批判加以发展。所以，

否定有两方面：一方面，首先是否定，然后是有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所以，不是否定一切，不是形而上学的否定。

我们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是必要的。按劳分配制度本身绝不是资产阶级法权。对这个问题，有的人有错误看法，把按劳分配简单看做是资产阶级法权。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这种社会主义原则，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实现了。以前有人说，按劳分配是资本主义原则，这是完全错误的。列宁说：这完全是社会主义原则。为什么说，按劳分配原则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呢？那是讲按劳分配某一方面的形式还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这是指等价交换这一点来说。付多少劳动，就一定要多少报酬，因此就有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这是交换的形式问题，不是按劳分配原则本身。资本主义社会里还没有什么按劳分配。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首先是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利润。资产阶级法权并不能是按劳分配。我们实行按劳分配，并不等于保存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制度本身已经在根本上否定了资产阶级法权。劳动者能够真正按照自己的劳动得到报酬。从这一点来说，按劳分配的制度对过去的制度还是根本的否定，问题是有一些资产阶级残余。对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我们要逐步加以消灭，因为它是一种旧东西。旧东西跟社会主义制度总是有矛盾。现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我们不能要求马上消灭，但是我们也绝不能说：搞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要保存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残余，首先是在所有制方面，然后是在分配制度上逐步消灭。不能因为我们还是按劳分配制度，就说我们不应该否定资产阶级法权。因为按劳分配是我们必要的制度，因此把资产阶级法权根本否定掉就不对了。对于资产阶级法权，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掉，因为现在不可避免地要

有一些残余。但是我们的方向还是要否定，能够否定的，我就要否定。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买东西排队只要排的不是太厉害，适当的排队还是必要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老百姓一样也要去排队，这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否定。

我们不主张工资等级差别太多。我们象牙雕刻工厂的老工人，每月工资六七十元。资本主义国家来参观的人，有的挑拨说：你这样高的技术可以住别墅了。我们就不这样做，我们不采取这种办法。技术特别高的工程师比起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应当高一些，也不能差很多。不然的话，就等于是维护资产阶级法权。要有差别，要有适当的物质刺激，但是不能相差太多。我们鼓励劳动的积极性，主要依靠政治挂帅，适当的配合物质刺激，这样对劳动积极性提高的更有力量。这才是革命，才是否定，才叫做真正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

## 三、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问题

否定之否定的问题，在讲辩证法“十六要素”时也有一些涉及，这里只是比较简单的说明一下。否定之否定，对肯定阶段来说，也是根本的否定。

为什么还要提否定之否定的阶段问题呢？

主要是说明在否定这个阶段上有些东西好像是重复肯定阶段的某些特征，这也是一个必然规律。因为一个根本否定，再接着另外一个根本否定，在某些方面，好像形式上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一般的解释，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两次向对立面转化，就不避免的在形式上看起来，好像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了。不然就不叫向对立面的转化。既然是向对立面转化，转化两次总是有些东西回到出发点了。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用

不着很多的解释。向对立面转化这个规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回到出发点去，但这并不是循环，因为每一次否定都是向更高一级发展，所以，不可能是循环。总是螺旋式的发展。所以，发展是不断向对立面转化。毛主席曾经说：发展是走“之”字路。黑格尔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发展好像是圆形的，不是一条无限量变化的连续的渐进线，不是直线发展，是“之”字形式发展。发展是曲折的，有时前进，有时是倒退的。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在普通日常生活里，工作里以及自然界社会发展里到处看得见这种普遍过程，没有什么更神秘的东西。客观世界本身的发展是曲折的，它按照“之”字形式走了两个转折后，好像回到出发点来，但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回到出发点，而是向更高阶段的上升。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有的同志问：工作，休息，休息，工作，这算不算否定之否定？

我们说这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就是向对立面的转化。休息之后又工作，就是向对立面的转化。第二天的工作好像又回到了第一天的情况。但这并不是重复。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到最早的反“围剿”，他也是当做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来说明的。

现在有些人把这个规律搞神秘了，以为举工作、睡觉的例子就是把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庸俗化了。这种人可能说我是庸俗化了，但是我说他神秘化了。认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不能用在日常生活上，这就是教条主义观点。其实，到处都有辩证法。今天工作，晚上睡觉，明天又工作，这就是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好像后来又回到出发点了，但实际上永远也没有重复，而前进是曲折的。在工作中间做到一定的时候，要使它向自己所需要的对立面转化。工作一天疲劳了，就需要转化为休息。我们要善于调理

工作和学习，要有节奏地来指导工作。如果说，为了搞大跃进，就不允许人家睡觉，那就错了。个别的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早就纠正了。如果一直是工作，而不休息，这样就不符合辩证法了。毛主席曾经用过孔子的一段话来说明。孔子的弟子子贡，有一次在赶庙会时问孔子：庙会这样热闹，我们圣人讲仁义道德，应不应该让人民搞庙会？孔子说：庙会还是应该搞的，生活应该有紧张，有松弛，一张一弛，他说：圣人应该指导人民一张一弛。有的时候要讲仁义道德，使他紧张一下，有时也可以让他们松一下。孔子说：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这是中国古典哲学里面的辩证法。

## 四、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问题

关于这个规律，曾经有过能不能存在的问题，就更能不能算做一个基本规律的问题，能不能算做普遍规律的问题？这个问题曾发生过。斯大林的哲学著作里就不提否定之否定规律。说明他对这个规律的普遍性有怀疑。

我们学习时，曾经也有一些人有过这种疑问。究竟否定之否定规律算不算最普遍的规律？算不算最普遍的对立统一规律？是不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表现？苏联曾经有过这种提法。苏联在斯大林的著作出现以前，有些人有过这种解释，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是黑格尔的术语的残余（术语就是名词）。这个话列宁本来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里面也讲过，他批评米哈洛夫斯基的时候就说过这个话。马克思、恩格斯利用了黑格尔的那些哲学著作批判了黑格尔。德波林有的时候表述形式也采用黑格尔的术语。大概苏联有一个时候以此为根据，就认为否定之否定规律也是黑格尔的残余，这是两个问题。列

宁讲的是黑格尔的术语的残余，表达这个规律使用了黑格尔的术语。列宁的意思并不是没有这个规律，后来混淆了，因为它是黑格尔术语的残余。因而也就是黑格尔的思想残余，因此可以取消了。我们在苏联哲学家的解释里看到有这些解释，否定之否定规律就不成为一个基本规律了。从前亚历山大洛夫的一本关于辩证唯物论的教科书（1952、1953年翻译到中国来），那本教科书是按照斯大林的意见来写的，就是没有否定之否定规律。

这个解释是站不住脚的。黑格尔术语的残余并不等于唯心主义，并不等于无批判地接受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公式，黑格尔的哲学把否定之否定当做一个公式，当成唯心主义的典型，当然是错误的。这是神秘主义。但是在神秘主义里面并不是一点合理的东西也没有。

这个问题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讲得很清楚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肯定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到处都可以看到，在日常生活里也有，这是一种最普遍的规律。我看恩格斯的观点并不错，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它的缺点是利用黑格尔的术语。但是，术语究竟是术语，也用惯了。既然用惯了，就不会引起什么误会，也没有什么关系。所谓黑格尔的术语是什么意思？就是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比较起来，他的这个术语带有一点唯心主义的色彩。

矛盾、对立、统一这些名词，都可以看做是直接反映客观事物内容的。客观事物有矛盾，所以我们说有矛盾，客观事物是对立统一，我们的思想上就有对立统一。质和量是客观事物一些本质的概括。至于否定、肯定这个概念，就好像不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似乎只是人的主观的东西。要否定什么东西，肯定什么东西，这是一个逻辑的问题。

以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为例。我们现在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否定了自己？如果研究资本主义本身，可以不可以说资本主义像一个人一样，从思想上把自己否定了呢？它不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是因为自己的矛盾把自己推翻了，不是像人的思想一样，自己把自己否定了。否定之否定概念是一个纯逻辑的概念。

黑格尔哲学把逻辑概念看成是客观事物的本质。所以，他认为一个社会变为那个社会，就像一个人在思考，自己把自己否定了。自然界出现的时候，好像自然界就是精神，它感到要否定自己，于是就出现了自然界。

所以，黑格尔对否定之否定的表述方法有唯心主义的色彩，把逻辑的概念看成是客观事物的本质。把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这种客观过程看成是一种逻辑的过程，看成是人的思想否定了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从这种意义来说，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确也有黑格尔术语的残余，使用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所使用的术语。而量变质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不是这样反映客观规律，不要用逻辑规律来代替客观规律。本来，逻辑概念是客观规律的反映，黑格尔拿逻辑概念代替了客观规律，把逻辑规律看成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认为逻辑规律就是客观规律，这是黑格尔的思想。

所以否定之否定这个名词本身也是有缺点的，带有唯心主义体系表述方法的残余。但是这个名词我们已经使用惯了，现在还是这样使用，只要理解的正确，也不会发生什么误解，否定之否定如改成肯定、否定也是这样，因为肯定、否定还是逻辑的概念，还是不能解决用逻辑的形式来表现客观规律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要我们如何来正确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问题，而不是因为它有一个黑格尔式的缺点，就取消这个规律。我们要正确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包含的客观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恩格斯说它在

日常生活里面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规律?我们要理解它的内容,主要是这个问题。我们讲否定之否定规律主要也就是解释它的客观内容。不去纠缠它的名词,因为名词已经是用惯了。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作过解释。列宁并不取消否定之否定规律。他的解释就是说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说明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一切发展过程都是螺旋式的,不是直线式的。用这样一个说明就可以表达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内容。

毛主席对这个规律也作了一些新的解释。这个解释他讲的最多的,就是波浪式的发展。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的时候,井冈山前后,毛主席就开始作这种解释。那个时候讲到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应该怎么发展?毛主席提出的意见就是波浪式的发展。就是发展一点,巩固一点,巩固了以后再发展,发展、巩固、再发展。你搞一个根据地,经过一个革命,开辟了一个根据地,接着找机会把它巩固起来,巩固的方法就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搞好了,根据地真正被党掌握了,贫雇农站起来了,就能够保卫根据地。巩固了以后,然后把军队组织起来,发展武装,然后可以进一步发展扩大。扩大了以后,就可以又巩固。所以很早的时候毛主席就把这个规律用到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过程里边。以后在战争问题上,在战略问题上,毛主席也经常是这样。这就是把战争和休整联系起来。战争、休整,又战争,这样,战争才有胜利的把握。你如果一天也不休整,打得筋疲力尽,不恢复精力,那就没有办法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懂得这一点。"左"倾机会主义就是一直打下去。有了根据地就有休整的基地,在两次战役之间要抓紧时间进行休整。这样,也可以使战争曲折的发展。

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里的公式,是"围剿"——反"围剿"。这也是否定之否定的规律。革命战争是很艰

苦的，又是持久的。怎么能够持久？就是要能够在战略上准备好不断反复，“围剿”、反“围剿”，再“围剿”、再反“围剿”。你要准备这样的不断的反复，不要希望一个反“围剿”就天下太平。反“围剿”要一直反下去，反了以后还要准备让它再“围剿”，以后再反“围剿”。在革命战争里边，还有一个要以正规化对游击主义否定的问题。那个时候，有些“左”倾冒险主义者想要以正规化反对游击主义，用正规战否定了游击战。毛主席当时是坚持游击战争。他认为将来正规化否定游击主义也可能，但是不能完全否定。“左”倾冒险主义就是完全否定它，那是不对的。有些可以否定，但有些基本原则不能完全否定。说是否定，也不能把游击战完全否定，某些游击战的原则要肯定，练兵要正规化，要正经地练，不能老是满山跑，所以要把“十六个字”的原则进一步发展。

在战争问题上，毛主席也应用了这个规律。这也是波浪式的发展。这个理论要举例子，《毛泽东选集》里是很多的。比如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也是否定之否定。第一个阶段是敌进我退，是有进有退；第二个阶段是敌我相持，无进无退；第三个阶段是敌退我进，有进有退。但这与第一个阶段的有进有退不同。这也是否定之否定。

在以前，毛主席著作里没有直接应用否定之否定这个名词，实际上是充分应用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这个客观规律不但应用在客观事物上，而且用在这主观方面。在认识上也要充分应用否定之否定规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也是一个波浪式的发展。从这些例子也可以说明毛主席把否定之否定规律充分地展开了。从一切的具体工作里，从指导战争一直到建立根据地，一直到掌握思想，掌握认识，到处把否定之否定规律广泛应用了。所以，根本的原则还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原则，但是毛主席把它

展开了，展开到社会主义科学各部门，把这个原则从各方面推进了，从各方面展开了。这就是发展。这个发展不是哪一点，哪一条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原理在各种重大的具体问题上展开了。在建设革命根据地，指导战争，指导思想，这些重大的问题上，他都应用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着重讲了对立统一的规律，没有直接应用否定之否定这个名词。根据我们知道的，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大家的劲头很高，有时候容易过分，有时候只搞工作，休息也不顾了。那时候毛主席讲，工作要有节奏。1958年底，郑州会议以前，毛主席着重提出工作要有节奏。劳逸结合就是要有节奏。劳逸结合的观点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的表现。工作了以后要休息，休息了以后要工作。在那个时候有的领导干部不懂得劳逸结合，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强迫人家不睡觉。这当然是农村的一些青年干部搞得多，他们没有经验。上面也有一些人头脑不清醒也支持了。毛主席讲：工作要有节奏，节奏也是否定之否定，节奏也是波浪式的运动，波浪就是节奏。不过是用音乐的名词来代替波浪这个名词。音乐是有节奏的，有高有低，钟摆有节奏，摆来摆去，这叫做周期性，循环往复。那时候毛主席曾经讲过，应当举出几百个例子来说明生活也是应该有节奏的，这是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最近，我们听说毛主席讲否定之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修正主义，也是否定之否定。社会主义胜利了，又出现修正主义，以后修正主义被打倒，还是否定之否定。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是波浪式的，曲折的。当然，这个否定之否定是不是每一个国家都一定要出现，是否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修正主义？不一定。但是修正主义总是多少要出现一些。出现修正主义就是波浪的低潮。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十月社会革命是高潮；以后出了修正主义，这是低潮。这个低潮恢复到高潮，怎么样高起来？是个问题，能不能和平过渡到高潮，恐怕有点困难。有了高薪阶层，有了法西斯控制，恐怕要流点血，事实上苏联现在已经有点流血。有些地方罢工，对这些罢工就采取镇压。有的民族地区罢工，如哈萨克地区罢工，他们就采取镇压，还利用民族矛盾。反斯大林还不是利用死人！在格鲁吉亚那个地区不知杀了多少人。那个时候格鲁吉亚群众起来反对，游行示威，就开去军队镇压，开枪、开坦克。有些小孩子爬到树上去看热闹，机关枪一开，小孩子就像小鸟一样从树上落下去。早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恐怕有一个是不是可以和平回到社会主义的问题。现在是到处罢工，《参考消息》上也登了。这种情形要和平恢复到社会主义恐怕很困难。

根据波浪式的原理来看，有些很好的干部忽然被人家拉过去。经过教育又起来了。他得到了教训以后会更好的。教育不过来的，那是很少数的。不好的干部是变质了的。多数是可以教育过来的。自己再有了教训，在一次一次的斗争、教育以后，是可以更好的。经过这种波浪式，经过这种艰苦的斗争，下去搞四清的同志都有亲身的体验。所以，不是很容易的，还是很复杂的。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说过，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以为可以一帆风顺是很幼稚的，从前我们很幼稚，三大改造以后，认为至少不像以前那样复杂了。其实，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波浪式的，这就不是一个劳逸结合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可以有赫鲁晓夫的形式，可以有别的什么形式。那是一种很残酷的一种形式。我们这种形式是因为

我们掌握了否定之否定规律。毛主席已经掌握了否定之否定规律。所以主动了，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很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因为主动了，所以才能够及时发现问题，经过斗争解决问题。经过斗争主要是经过社会主义教育，主要不是经过对抗性的斗争。这样，波浪就会小一点，但还是波浪式的。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举了这些例子。虽然没有一百多，但也不少了。我们大家再联想一些，要联想到一百多也可以。说明这个规律很普遍，而且必须要掌握这个规律，必须要应用这个规律。不掌握这个规律我们就不能主动。

斯大林在理论上就没有这个规律，他以为社会主义建成了，以后就是一条直线了，他取消了这个规律，所以他被动了。取消这个规律也就说明斯大林思想上的辩证法不够彻底，或者说后来辩证法削弱了，出现了片面性。这也是他的“罪名”之一。出现这种思想不仅是他个人错误的问题，还有一个社会背景的问题。就是因为已经有了一个高薪阶层。从1932年起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革命开始有点停顿。高薪阶层发展，富裕农民发展，有一部分人制造舆论。斯大林也就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现象。从社会主义建成一直到取消否定之否定规律。就斯大林的哲学著作本身来说还是好的红色教科书。但是也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缺点。不是偶然出现的一种理论，理论是反映时代的精神。斯大林的小册子反映了那时候的时代精神。虽然他大体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已经有许多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我们党，毛主席善于总结国际国内的经验而且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所以现在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民主革命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都应用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揭发了这个规律，每一个重大问题上暴

露了这个规律。因为有真正的科学的调查研究，所以暴露了这个规律，不是当做一个公式来应用。这是个规律，是用这种思想作为指导，用这个普遍原理作为指导。在革命建设的重大问题上揭发了这个规律，进一步证明这个规律肯定是普遍规律，是基本规律。在我们的工作里，在我们的思想里，也必须要掌握这个规律。这也就是发展这个规律的思想，发展否定之否定规律，进一步证明，进一步展开，进一步应用了，所以就发展了。

以前马、恩、列、斯没有这样展开过，没有这样广泛应用过。比如要搞一个根据地，以前也没有哪一本经典著作讲过根据地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个规律是列宁开始讲的，但是也没有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是曲折地、波浪式地发展的，以前都没有说过，所以说是发展了。

为什么发展总是波浪式的，要说明这个原因，仍然要回到对立统一规律，仍然要回到矛盾统一规律。因为发展是通过矛盾来发展的，是对立面的联系和斗争，对立面又联系又斗争才推动了事物的发展。对立面联系就是说统一的事物内部总是有对立面。社会主义社会里不是没有矛盾，是对立面的联系，对立面的统一。这个对立面是经过不断的斗争，使相互联系的对立面发生促进发展的作用。如果只有联系而没有斗争，那就没有发展。对立面的相互联系是有斗争的。所以，就有平衡的问题，就有一个你压倒我，或者我压倒你的问题，谁压倒谁的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这就会引起不断的发展。这个发展必然要有波浪式的形式，因为对立面的斗争，彼此对立，有胜有负，不会永远平衡。因为斗争是一个谁压倒谁的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经过斗争必然有反复，被压倒的经过一个反复又站起来了，又压倒了对方，这种情形也是有的。因此它必然是曲折的，是波浪式的。所以发展采取否定之

否定的形式，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就是螺旋式的，波浪式的，就是因为有对立面斗争的问题。这个波浪的形式说明对立面反复转化。所以否定之否定规律也可以解释成对立面反复转化的过程，不过也不很确切。如果说成对立面反复转化，说得不好就变成了循环。

古代解释辩证法往往解释成循环。几乎大多数古代的哲学家解释发展过程时，不论是有点辩证法思想的人，还是没有辩证法的人，最后都解释成循环论。所以也不好说是对立面不断转化，不好这样表达。不过在我们脑子里至少要把不断转化不了解为循环。因为不断转化不是重复，不是循环。所以，确切解释是波浪式前进比较好。转化过程是前进的，两次转化使得事物走向更高的阶段。所以恐怕取消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个名词，把黑格尔残余完全取消，得到代替他的方法是波浪式发展的规律，或者是螺旋式发展的规律。这个提法比较确切，比较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发展是波浪式的，或者是螺旋式的，这样表达比较确切。

波浪式是讲对立面反复转化的过程，经过对立面不断反复转化，不断前进。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循环往复，这就是循环的，但是毛主席说，每循环一次，认识就达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循环往复，每往复一次，认识就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所以，这几句话不能少一句，少一句就会发生错误。古代的辩证法就是说循环往复就完了。古代的辩证法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古代社会是停滞的，他们认为封建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由于时代背景的限制，不容许有彻底的辩证法思想。相反地把发展曲解为循环，最多只能说有点辩证法的因素，不能说已经很高地表达了辩证法的规律。而且主要是曲解为循环。古代最高明的辩证法差不多都是这样。赫

拉克利特的学说是希腊最杰出的辩证法，他认为宇宙开始是火，变成万物，万物又回到火。赫拉克利特是比较高明的，因为他讲，火是万物之源。

我们中国的老子一直到后世，讲辩证法还有哪一个是专门讲辩证法呢？我的知识很少，中国古代的知识很少，根本没有这个印象。哪一个讲辩证法的人明确地来讲辩证法的斗争，是强调斗争，没有这个印象。赫拉克利特之所以杰出，就是对斗争讲的相当明确，对立面斗争的思想相当明确，可是还有循环论。最高明的古代辩证法也只能说是有一些可贵的辩证法的因素。在古代来说，从历史观点来说，在历史上就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了。

历史观点有两种，一方面是对古人要按照古代条件来估计它，另一方面是从近代来看它还是很不够，这是采取历史观点的两个方面，缺少哪一方面都不行，对古人应该不要估计过高了。不和现代比较一下，也不是历史观点。

现代表达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容，用波浪式的发展或者螺旋式的发展，比较确切。其中，包括对立面的反复转化，经过对立面的反复转化，事物一步一步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容大体上是这样的。

这个规律就讲到这里为止。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上卷）

# 关于自然辩证法研究班“学习计划”的说明*

(1960.2)

今天我不是讲课，也不是做报告，是将这一学期的学习计划做一些说明。

大家来我们这里学习，已经一年多了。寒假以后开学，还有一个学期，是五个月，这五个月很重要。在寒假没有开始以前，学校党委会就考虑了我们班的教学计划问题。这个班如果搞的不好，大家学的很少，学校对大家交代不了，你们回去对本机关也不好交代。党委会上对自然辩证法班的教学计划做了研究，也做了一些检查。检查的结果，在校党委会上讨论了。我今天所要讲的，大体上是校党委会的意见，是对方针的意见，以及计划和学习方法的意见。

首先，对过去一年半的学习做了一下估计。根据我们讨论的结果，感到这一年半大家的学习是有成绩的。并不是空过了一年半。由于班上许多同志的努力和大家的学习积极性结合起来，还是得到一些成绩的，主要的是两点：

第一，在这一年半里，学到了一些对自然科学研究有很大好

---

* 1958 年下学期开始，中央高级党校举办了自然辩证法班。该班在学习了一年半之后，校党委开会检查和研究了该班的学习情况，对今后一个学期的计划作了调整。艾思奇受校党委的委托，于 1960 年 2 月 8 日，对自然辩证法班“学习计划”的调整，作了说明。这里是按速记稿整理。

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学了《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学了《矛盾论》、《实践论》以及其他经典著作。哲学方面的学习用了比较多的时间，在这方面大家所得的东西看来是比较多的。所谓多，是与大家来学校以前的情况比较来说的，有许多收获。以前有的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很清楚，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学过，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基本问题不是很清楚的。特别是联系到自然科学，我们往往以为研究自然科学的人，自然而然的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好像是自发天生的能够懂得辩证法唯物论。好像学习自然科学的人，不至于受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在学了哲学以后，才了解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学自然科学的人，并不是天生的辩证唯物论者，不是不会受唯心论的影响，相反地倒是可以这样说：搞自然科学，如果没有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倒是很容易自然而然的受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因为我们在旧社会里，占统治地位、最流行的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旧社会里，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是占统治地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过这样的话：过去的社会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因此资产阶级思想、剥削阶级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也是最流行的，一种是有神论、宗教思想，一种就是唯心论。唯心论是一种巧妙的、伪装的有神论。马赫主义、实用主义在我国知识分子中是很流行的。胡适的实用主义分开来说不是有神论，甚至是公开反对灵魂的存在，反对有神论，可是他的哲学实质是和有神论相同的。首先是因为他是唯心论，他认为世界是感觉的世界、精神的世界。实用主义者为宗教信仰留了后路。认为有用就是真理，如果宗教对我们有用，我们应该把它看做真理。这种思想在旧社会是很流行的。

我们中国过去长期流行柏格森的哲学。张君劢的哲学是法国的柏格森哲学，有一点接近客观唯心论，是讲直觉的，也是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认识真理，不能经过感觉理性，要经过另外一条道路叫做直觉，从这方面说是主观唯心论；可是，另一方面的看法，认为世界是生命的冲动，是伟大的生命或者叫做伟大的意志，客观存在的意志。这与柏格森是同类的思想，是客观唯心主义，按照他认识世界的道路来看，认识是直觉，那么是主观唯心主义。恩格斯曾经讲过：近代的哲学是大杂烩。梁漱溟哲学又讲直觉，又讲马赫主义，各种各样结合在一起。

不管怎么样，所有流行的统治的思想都是唯心论的思想。

从五四运动以来，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知识界流行的唯心主义，主要是主观唯心主义。影响最大的、最普遍的是实用主义，这个影响的时间是很长的，从五四到现在是四十多年，到解放是三十多年。我们解放至现在，不过十多年，从旧社会离开还不久，旧的唯心主义的影响一直总是在无形中起作用的。实用主义、马赫主义以及其他的唯心主义在知识界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前几年我们到处讲物质是客观存在，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前几年，有一种说法：不管哲学怎样讲，搞自然科学的人，认为凡是我们所感觉到的，能拿来试验的东西，都叫做物质。这种说法与唯物主义的定义是完全相反的。像这样的说法，在自然科学界会不会有影响？当然会有影响。对这种说法如果没有学过唯物主义哲学的人，是很难看出什么错误来的。看起来，自然科学家是把能够感觉到的物质拿到自己的实验室试验是对的，但是他说凡是感觉到的，我们拿来试验的就叫做物质。英国有灵魂学，如果灵魂拿来试验，灵魂就是物质吗？我们把物质拿来试验是可以的，可是话稍微转一转：物质就是我们感觉到的，我们能拿来试

验就是物质，这是错误的。

同志们学了《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也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并不是生来就是唯物主义。大家讨论了颜色是什么东西，说颜色就是感觉，这就有问题，当然这个意见不是有意识地宣传唯心论，但是有这种观点，碰到唯心主义者，就会站到他那一边去了。说：颜色就是物质，这种说法也稍微简单了一些。颜色是什么东西呢？按照费尔巴哈说的比较确切，他不是讲颜色，而是讲咸味，盐有咸味，咸的感觉是盐的客观本质在人的主观能动中的反映。第一肯定有盐这个物质，这种提法比较确切。客观物质的某种特性在人的主观里的反映，它首先是客观的，在人的主观能动里反映出来。颜色不能包括物质的全部，只是物质一个方面的特性，这个特性在主观感觉中的反映，就是颜色。说颜色就是感觉，这是唯心主义，至少是接近唯心主义；说颜色就是物质，就有些机械。颜色是客观的物质某一方面的特性在人的主观感觉中的反映，这就是唯物主义，客观在主观中的反映。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感觉到我们并不是天生的唯物主义者。能够有这样的认识，能够了解这一点，就是一个成绩。认识到应该掌握唯物主义，也就是说开始真正懂得了唯物主义，在这以前，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懂得唯物主义。一般地学了唯物主义是一回事，碰到具体问题能不能用是一回事。你究竟学习好没有，主要的问题是碰到具体问题，你能否解决，能够根据唯物主义的原则来解决，就是原则变成行动，理论已变成实际，因此我们可以说大家已经能够了解到：颜色是感觉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了了解，也就是开始真正的把握了唯物主义，这也就算是成绩。

大家开始真正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本原理，这不是

很容易的，当然也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方面的东西，比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都学了。是不是学得很好？也不是。我看《论共产主义社会》学的就很粗糙。后来结合参观，学习六中全会的决议，还是有成绩的，对于学自然科学的人来说是很难得的机会。

第二，经过这一年半，大家在思想方面锻炼有了提高。参加了全国的运动，参加大炼钢铁，大家参加劳动，最后加上整风，整风可以说是我们参加劳动以及参加各种运动的总结。在整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批判了个别同志比较严重的错误思想。在思想改造方面有相当大的成绩，这一点可以说在原来的机关里不能够做得这样好，因为我们党校做的多一些，在这里搞整风，成绩可以比较好一些，我看成绩是不错的。一个学自然科学的人，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及其他方面的知识，真正有一些了解，党性锻炼有一些提高，对进一步学自然科学是一个很好的条件，对大家将来出去工作也是一个很好的条件。

另外，了解一下缺点也不少，《自然辩证法》本身学的不是很好的，有许多缺点，学了半本书。在这一方面缺点比较多一些，这一方面的缺点如果不能够弥补起来，我们的任务不能够完成。尽管在思想上，马列主义知识上有了收获，也不能算是完成任务。因为我们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班，应该在这方面学好，得到更大的成绩。但是，要学的很好，是不容易的。我们没有经验，大家第一次来学习，要学得像恩格斯那样解决自然科学中的问题也不可能；但是我们应该在一个短时期内打一个基础，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打一个基础，应该能够基本上掌握这样一门学问，作为今后研究的基础。像我们现在学习的情况是有所得的，但是，仅仅这样学，要在今后为研究自然辩证法这一门学问打一个基础，是有困难的。

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我们以前首先没有能够很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向，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在两三个月以前，根本没有想这个问题，没有提这个问题，两个月以来，才逐渐想到这个问题，感觉到自然辩证法研究班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全校教学各方面都感觉到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别的班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这一班也应该提出。这是全国性的问题，全国到处学习毛主席著作，你们的机关里都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有的同志反映说：我们回去看到人家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很热烈，我们高级党校没有学。大家反映是很对的。以前我们没有注意这个问题，首先是我们学校本身的缺点。以前没有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指导的问题。

党校是中央领导的，一般还是重视毛主席著作，党校的教学方法都是在中央指导下搞的，也还是有成绩的。比如整风、思想改造，这些基本上是毛主席思想的体现，执行这样的方针还是有成绩的。我们一贯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这也是中央的方针，问题是过去没有深刻地集中地提出以毛主席思想为指导，这是一个缺点。实际上一年半以来，大家参加许多活动，都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活动，是自然而然地、不自觉地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因而才有成绩。但是，我们没有很直接地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个口号，因此就不能够全面地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对自然辩证法本身，因为这是一门新的课程，对这个问题更是想的很差。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这个问题，以前根本没有想，如何来指导辩证法是很难把握的。两个月来，经过了一些思考，现在把我们的教学计划作一些新的安排。究竟怎样以毛主席思想作指导，等一下还可以讲一讲。

我想我们的缺点，首先没有根据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学习辩证

法这样的方针。

另外，在我们学习过程中，讲《自然辩证法》本身的课程，还有一些教条主义的因素，即学习方法是就书本学书本，这也是我们校党委过去没有很好的注意的问题。最初办这个班的时候，有这种想法，有些大学里面，有些大教授，就是不肯接受马克思主义，要他接受，他说你是外行，用不着你来讲。一般的政治领导你可以，但是自然科学本身用不着马克思主义指导。因为有这样的问题，有些大学的同志要求我们办一个班，我们接受下来了，但怎样办？思想是不清楚的。有这样的想法：似乎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搞通，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好像把这一本书好好研究一下，把恩格斯逝世以来的七八十年来自然科学上的新成就补充一下，把它系统化，就可以在自然科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了。现在很多自然科学家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有些比较先进的自然科学家站在马克思主义方面，站在党的方面。解放以前几乎是没有的。但是问题还是有很多人不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些人口头上接受，涉及他的本行就不肯接受，认为自然科学本身不需要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本身当然也可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问题是谁来掌握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人掌握的，谁来掌握就有阶级性。自然科学的规律是受辩证法支配的，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家不肯承认这一点。因为有这种问题，有的大学的同志提出办这个班，我们就办了这个班，以为只要把《自然辩证法》搞好，就能解决问题，这个想法基本上是对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自然界，特别是研究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自然科学本身的规律。他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自然科学的阵地。我们要很好地学习这一本书，是有希望把它作为思想武器的。其实，我们宣传自然辩证法，至少会使自然科学界受马

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扩大马克思主义在自然科学界的影响，我们学习自然辩证法，学习《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就没有错。

我们最初开班的时候，中心是把《自然辩证法》学好，加上《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有很好的成果，这个想法基本上是对的，但是想的片面了一些。好像把这两本书读好了就解决问题了，没有更多地考虑怎么读；还有，过分集中注意这两本书，对怎样运用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这一点没有很好的考虑。在一年半中主要的力量学习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附带学习了《实践论》、《矛盾论》。对《矛盾论》、《实践论》有研究，但没有用主要的力量好好地研究它，运用它；还有，在其他方面，毛主席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看法，我们没有注意。《自然辩证法》学了半本，这本书怎么学，我们很少注意，因此多少有一点就书论书的学习方法，多少有一点教条主义的因素。虽然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但如何运用毛主席的哲学观点，就没有考虑，所以造成这样的缺点。学习书本本身是好的，可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掌握。

对《自然辩证法》，大家花很多的力量搞注释，这是对的，是好的。但是注释搞的太多了一点，力量花多了，不是不要，选比较重要的搞一搞，时间花少一些，这样就会好些。在这方面花的时间太多了，有一些是不必要的。

大概感到有这样两个缺点：没有注意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学习中有一些就书论书，有教条主义的因素。因此大家对学习有一点不很满足。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也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我们不善于利用校外的力量与我们合作搞教学，搞学习。中央宣传部有科学处，于光远同志搞科学的，对自然科学有研究，以前没有联系，最近和他联系了一下，这样取得了外面的帮助，对我们

新的一学期的学习有好处。中宣部很早就搞自然辩证法论文集，全国科学机关要这个东西，他们研究的结果，能够表现我们中国自然科学界的水平，特别是自然辩证法的水平，这也是应该利用的。还有一些自然科学工作的方针性的问题、政策性的问题，以及自然科学的路线问题，这些问题也应该请人来给我们讲一讲。搞自然辩证法要联系实际，要联系我们国家自然科学工作的方针，脱离方针，专门读书本当然是不够的，是有缺陷的，这在以前没有想到，所以现在学习有很多不够的地方。

如何讲课？以前没有很好注意。是陈康白同志负责管这个班，他要管政治领导，要管行政，要管思想，帮手少。管行政，管思想本身就很吃力，还要包讲全本书，对陈康白同志的任务太重了，要用很多的力量，他常常搞到夜里十二点以后，一个人的力量包办这样多的事情，当然是有困难的。因为自然科学有各种门类，康白同志自己是学化学的，不能够希望他一个人整本《自然辩证法》都讲，太困难了。恩格斯搞自然辩证法搞了几十年，全部是草稿，一部分是笔记，要一个人把这一门课完全包下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经过这次检查，校党委注意了这个问题，这一次想让陈康白同志解放一下，这样可以集中力量做教学方面的总的领导，领导大家讨论研究，注意大的问题。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是很大的缺点，这个方式要改变。根据这样的检查，确定把教学计划做一些调整。

这学期抓紧五个月，重新调整一下，大体上想这样做，过去的计划已经学了一年半，只是做一些修改。

《自然辩证法》这本书继续学下去，不是像以前那样由一个人从头到尾去讲，这本书主要靠大家自己研究、讨论，每一门都靠大家研究。我们研究班有各科自然科学专业小组，每个专业组多

花一些力量研究，大家讨论以后做报告，发言，自己教自己。首先掌握自然辩证法每一门的根本思想，然后考虑如何根据恩格斯的思想，结合新的成果。下班的同志帮助大家讨论，大家认为可以做结论的问题，就做结论。不能做结论的，大家讨论以后，可以互相帮助，大家共同讨论，总可以有一点收获。

《自然辩证法》一书大家自己研究，这样灵活一些。是不是这样研究就没有结果了呢？不是的。大家研究总可以得到一定的结果，是不是能达到恩格斯那样高的水平？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经过大家的研究，可以得到一定的成绩。我们将来出去工作，一方面工作，一方面要研究，在工作中来研究，不可能在学校的一、两年内就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另外，我们再从两方面来安排教学。

一方面，在五个月中，把学习《自然辩证法》的时间缩短一些，腾出一些时间来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在五个月里，用两个多月学习《自然辩证法》，将近三个月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现在是二月半，到七月半毕业是五个月。如果学不完可能延长几天，想把毛主席的著作全部学一下。以前没有很好考虑以毛主席思想做指导，所以从来没有考虑全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现在考虑到这个问题，认为全部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必要的，因为以毛主席思想作指导，如果不全部学习一下毛主席的著作，是不可能做全面指导的。《实践论》、《矛盾论》可以作为中心，但是只是了解《实践论》、《矛盾论》，如果不大体上学习一下毛主席的全部著作，不结合毛主席的著作，把党的历史大体上了解一下，要真正了解《实践论》、《矛盾论》是不可能的。我们以前学过《实践论》、《矛盾论》，可是在学了以后，还有这个问题，即《实践论》、《矛盾论》如何结合辩证法，还不明确。这就说明对《实践论》、《矛盾论》还

要研究。但是毛主席的全部著作不都是自然辩证法，都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是党史，他的基础是党史，他的背景是党史。是不是这样花一些时间，会妨碍我们了解自然辩证法呢？当然，看起来是会妨碍的。我们学习自然辩证法，实际上对党的历史背景大体上有一些了解，对毛主席著作大体上有一些了解，这对我们掌握《实践论》、《矛盾论》武器是有好处的。脱离毛主席的全部思想，单独用《实践论》、《矛盾论》是不可能的。当然，《实践论》、《矛盾论》是中心，是主要的东西，我们研究自然科学的工作，了解一下党的历史线索，了解毛主席的全部著作是有很大好处的。我们很可惜，大家来这里学习，一开始我们没有想到以毛主席思想作为指导方针这样一个原则，如果一开始就先读毛主席的著作，可能更好一些。

现在还有半年，再来学一下没有坏处，在我们党校学习，还可以得到党史教研室的帮助，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比较方便，条件比较好，在这里学习以后对我们将来自己研究是有好处的。这个学习可能跟我们的新班一起学。如果他们的学习时间与我们的安排差不多，就一起学，也可能他们的教学计划有改变，自然辩证法研究班与逻辑班一起学，这个学习要到二个月以后，开始还是先学《自然辩证法》。大体上是这样安排的。

《自然辩证法》本身，除了自学这一本书以外，争取到外面请一些同志来做一些报告。这个报告有几方面。一方面是自然科学的政策方针性的报告，理论结合实际的实际方面，比如我们准备请自然科学界的负责同志讲一讲自然科学工作的方针路线。如果我们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同志对党的方针、政策、路线不了解，就会脱离实际，这就会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以前也没有想到，最近才想到这一点。党的科学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也就是毛

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怎么指导？要用这个方针、政策、路线来指导。如果不懂得这些，空讲毛泽东思想指导，是一点结果也没有的。

科学的政策、方针还有一些具体的科学技术部分，除了学习一般的科学技术方面党的路线、政策、方针，我们还可以请一些农业部门的同志讲一讲，当然工业方面也准备请人来讲一讲有关工业方面的路线方针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要知道。恩格斯当时是没有无产阶级国家，但是他有自然辩证法“序论”，这是很重要的，除了有自然科学的细节以外，还可以从里面看出无产阶级的党对自然科学的态度，也是一种方针路线。“序论”是《自然辩证法》的总纲，对那个“序论”如果没有体会，对《自然辩证法》也是学不好的。用一些《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加上一些自然科学的公式，原则加例子这种方法，这是列宁所批判过的，是把辩证法当做事例的重复。原则加例子这种学法是很容易的，但这是没有很多用处。讲《自然辩证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是要解决人类如何认识自然、如何改变自然的问题。那些辩证法的例子都是贯穿在这里面，“序论”都是贯穿这种精神。这个问题现在不能详细谈。

《实践论》（包括《矛盾论》）的精神，就是人如何认识世界，如何改变世界。研究自然辩证法就是从这方面说明人类是如何认识世界，如何改变世界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自然科学本身的党的方针、路线，了解农业方面的八字宪法，了解工业中的创造发明，就可以与恩格斯的“序论”结合起来，对“序论”就会懂得更深刻一些。原则加例子是很浅薄的，所以首先要有一些方针、政策性的报告。

其次，是中央宣传部组织的自然辩证法论文集，他们规定了

很多题目，我们挑选一部分比较重要的与我们学习有关系的，请他们写这一部分的人到我们这里来做报告，这也可以说我们共同参加了讨论，我们教学组也写了一个题目。这对我们会不会吃亏呢？一点也不会吃亏。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学习。因为他们是全中国自然科学研究最高的水平，当然不一定都是最主要的专家来写，但是，是每一个单位集体搞的，有主要的负责人作指导。写出来的东西不一定达到恩格斯的水平，但是有比较高的水平，是中国的水平。这些东西到我们这里讨论，我们把这些研究的东西掌握起来，对我们是有很大收获的。这些报告在我们这里系统的讨论，结合自然辩证法学习，这样对自然辩证法各个章节，有一个比较充分的、新的了解。我们学完以后，就可以得到一个系统的东西。自然辩证法学习的任务就可以能够有一个好的交代，大家回到自己的机关，在科学争论上有发言权，可以开始进行一些工作，虽然还不能够那样有力的参加战斗，但是打下了一些基础，为以后进一步钻研，多少可以发展我们的理论，这是一个好机会。

中央宣传部组织这些论文，利用全国的力量，利用全国比较高的水平来做这个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件。一些论文中可以有争论的问题，这不要紧，科学争论是可以“百花齐放”的，但是有一些争论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一定的态度。比如对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有一定的态度，不能说摩尔根完全是唯心主义，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完全抹煞。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面来看，我们可以有一定的态度，可以比较相信那方面；思想方法论方面，哪方面比较正确一些，哪一方面有缺点，这方面我们从自然辩证法的角度看，可以有一定的态度。有些问题涉及专门问题来争论，我们不能够决定，也不要紧，问题没有解决也不要紧，不能是问题解决了才纳入自然科学的范围。

《自然辩证法》本身的研究，一个是书本中自己的研究，加上方针性、政策性的报告，再加上自然辩证法论文集的报告。各方面组织起来，可以得到一个系统的东西，但是要安排得好，也可能安排不能像我们主观所要求的那样，因为请外面的人帮助，多少要迁就人家一些。如果我们能够把各种论文经过讨论，帮助修改，我们自己能够写一些东西，将来集中起来，可以掌握一般的比较系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本知识。论文集有很多题目，我们不准备全部采用，如果个人有兴趣，以后个人可以与他人研究，我们现在学习，只能够选出主要的，因为时间有限。两个月的时间，各方面的报告合起来，有二十次到三十次，如果每次半天，有半个月的时间听报告，一个半月读书、研究的时间。

最后，简单讲一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问题。

什么叫做毛泽东思想指导？毛泽东思想指导，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不要误会，以为我们要毛泽东思想指导就不要马克思主义指导，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对立起来，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用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就是真正用马克思主义做指导。为什么特别提出毛泽东思想呢？因为毛泽东思想在现代来说，在我们中国来说，是马克思主义很高的发展。有许多中国革命的经验和许多当代革命的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不知道的，斯大林也不知道，是毛主席概括的。读了毛主席的著作，就可以看到有许多新的东西。比如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列宁当然也注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但是这样充分地分析资产阶级两面性，在列宁的著作里是没有过的。毛主席的著作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任何改变，毛泽东思想是百分之百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没有任何的改变，他是把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中国

革命里，运用到现代各种各样的问题上，因此把各种基本原理在各方面具体发展了，因此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有新的发挥和发展，所以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学习，比一般地说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更好一些，因为他有许多新的东西，使我们知道许多新的贡献，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不要了。

比如说哲学著作，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虽然不多，《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字数不多，但是比以前的哲学著作内容要丰富得多。又比如《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比《实践论》哪个丰富，看起来《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丰富，它的字数多三四十万字，可是实际研究一下，《实践论》涉及的问题比《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涉及的问题更多。《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反反复复地解决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问题，反映论的问题。当时唯物主义者还有其他问题没有解决。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一个什么过程，《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没有具体阐明，什么叫做感性认识？什么叫做理性认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这些东西在《实践论》里讲的更多、更具体。列宁讲认识的过程由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再到实践这样三个过程。毛主席把这个认识的过程概括的更广泛，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达到更高的程度，这种概括更完善，这样的阐述反映论是没有的，这样的概括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是没有的。因为中国革命非常曲折，非常复杂，加上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就，才能有这样的概括。文字看起来很简单，要能够做出概括不是简单的，是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来发展的成就。

我们还可以从别的方面来讲。《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只批判了一个东西，就是经验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就是马赫主义，但

是《实践论》(也包括《矛盾论》)，又批判经验主义，其中也包括经验主义的唯心主义，另方面还批判了教条主义。还有，《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只批判了学术上的唯心主义，它批判的对象都是一些学者，都是公开在理论上反对唯物主义及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是理论上、学术上的唯心主义。但是《实践论》不同，《实践论》也批判理论上的唯心主义，批判经验论，批判唯心论，同时又批判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即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个特点在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是没有的。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到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都是在学术上、理论上的批判，批判的对象是高级知识分子，当时经验批判主义也是社会民主党人，是党内的，同时是一些知识分子中的唯心主义者，当然对党有影响。列宁和恩格斯都没有批判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而毛主席是重点批判了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所以他的内容包括更全面。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有时代的原因的。因为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里的修正主义，公开提出在理论上修正辩证唯物主义。杜林也是工人运动中修正派的领袖，他公开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波格丹洛夫还要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以后，这种情况逐渐不同了，以后修正主义带有更巧妙的伪装，在口头上、理论上拥护马克思主义，不仅如此，而且拥护辩证唯物主义。正因为修正主义在口头上拥护辩证唯物主义，可以蒙蔽许多人，所以工人运动中和党内出现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

中国以前历史上那些错误路线的代表者，没有一个人不自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者。陈独秀那个时候还是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王明也自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者，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反对马克思主义。所以现代修正主义，现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有一个特点，是在

哲学理论上不敢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加以修正，在实际工作中反对它。所以毛主席的著作是反映时代特点，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恩格斯的著作、列宁的著作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要完全解决当前的问题，不依靠毛主席的著作是很难达到目的的，毛主席的著作之所以必须首先注意就是这个原因。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学习，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学习，不过要注意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代最新的东西来指导我们的学习。

我们用毛主席思想来指导我们学习自然辩证法，主要是依靠《实践论》、《矛盾论》来指导我们的学习。《实践论》、《矛盾论》指导我们什么东西呢？就是指导我们在自然科学的认识问题上，从哲学上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认识自然界，人类又如何去改造自然界。一切认识都是在实践中发展的，《实践论》中讲最基本的实践是生产，是阶级斗争。人类怎样认识自然，是在生产实践中认识自然界，首先要注意这一点。我们学习辩证法，要注意不要认为用辩证法的原则去分析自然界的结果就够了，这是不够的，首先要注意自然界是怎样发展的，是从哪里来的。这可以结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序论”。恩格斯的“序论”非常强调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决定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的，整个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是随着社会生产发展而发展的，社会向前发展，推动自然科学发展，这超过办十个大学。这个思想，对于我们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应当当做一个最根本的思想，加以保护，深刻地加以研究，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忘记。

自然科学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为生产服务？要不要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说要。我们的思想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序论”中已经有了基本萌芽思想，现在我们党对自然科学的方针是恩格斯基本思想的发展，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种发展，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家是反对这一点的，他有他另外的一条路线。所以从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来，《实践论》可以指导我们研究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是在生产中认识的，这个认识是由感性到理性不断发展的过程。我曾经讲的《自然辩证法》那一章，就是讲多个问题，通过实践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自然科学家怎样掌握自然界的真理，整个的情况是首先有感性认识，然后提出假设（这是理性认识的第一步，没有经过考验），以后经过考验——实践，假设变成了真理，这些都可以和自然辩证法结合起来。《矛盾论》也是一样，研究从特殊到一般，从一般到特殊。这个问题可以指导我们研究自然辩证法。

自然辩证法是有两个方面的辩证法。一方面是认识过程中的辩证法。由生产实践到科学规律，再指导生产实践。另方面是作为方法的辩证法。矛盾的规律，自然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我们研究自然辩证法，很容易只注意方法的辩证法，只注意分析矛盾，用一些例子，证明对立面统一的正确，不注意认识过程中的辩证法。运用《实践论》、《矛盾论》来指导我们的学习，我们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对恩格斯那本书的研究，应该把他的“序论”和书融合起来。总而言之，要把《矛盾论》、《实践论》与恩格斯的书结合起来。《矛盾论》、《实践论》没有讲和自然科学如何结合，可以和《自然辩证法》这一本书里有关认识过程有关方法问题结合起来；有些问题是《矛盾论》讲到，而《自然辩证法》没有讲。这样结合起来，加上和恩格斯逝世后自然科学中的新成就结合起来研究，这样，就可以取得更好的成果。

我们可以估计到一个问题，我们请外面写自然辩证法论文集

的同志来给我们做报告，他们也可能注意方法方面的辩证法，对认识方面注意少一些。有一些题目我们看到了，我们研究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我们要注意全面一点，在某种意义上说，认识过程中的辩证法更重要一些，因为它直接涉及我们党的政策方针问题，涉及科学要不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我们从认识过程中充分说明自然科学的发展来自生产而又服务于生产，来源于生产实践，又为生产实践服务。充分理解这样一个过程，充分明确以后，在这个问题上，就能够很好地保卫党对自然科学的政策路线，也就可以有力地打破资产阶级学者的那种成见，那种错误的思想。学习自然辩证法在这一方面容易忽视，需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前面事实证明，用毛泽东思想分析，往往提到《矛盾论》，忘记《实践论》，学习恩格斯的著作，往往注意学习辩证法，而忽视了“序论”。恩格斯各个部分的辩证法与“序论”是统一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统一的。

时间很短，毛泽东思想就讲这一点，讲多了不好，我也讲不了多少，以后学习中如果有一些什么问题，可以和大家共同讨论。

# 学习列宁，保卫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

## ——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而作

(1960.4)

一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它成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更加锐利的思想武器。

列宁亲自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实现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伟大革命胜利。在他的思想光辉的照耀下和他的学生们的领导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无产阶级又在一系列的国家获得了胜利，在中国，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帝国主义殖民地体系趋于瓦解，资本主义世界日益临近了末日。

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这个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非常尖锐、复杂的斗争而实现的。资本主义世界并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它用一切方法向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举行不断的疯狂进攻：经济的和政治的、武装的和“和平”的、公开的和隐

蔽的。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资产阶级动员了它的一切力量，不断地来抨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它的哲学基础，力图破坏它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中间日益扩大的影响。

列宁诞生在 90 年前。在他出生后的二三十年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一个所谓“和平”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获得了广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逐步取得了胜利，成为它的惟一的指导思想。但是，当工人运动中那些与马克思主义公开敌对的学说——巴枯宁、普鲁东、杜林等人的学说一个个都被工人抛到垃圾堆里以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采取了狡猾的、隐蔽的形式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于是就出现了伯恩斯坦以及后来考茨基等人所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在表面上伪装拥护马克思主义，借口要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某些“修正”，来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破坏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和它的哲学基础，以配合工人运动外部资产阶级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修正主义者散布“阶级调和主义”，“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等等的谬论，“宣扬‘社会和平’”（《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583 页），来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瓦解他们的斗志，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修正主义者用资产阶级教授们的最腐朽的唯心主义来偷换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来代替革命的辩证法。这就是说，修正主义者企图从世界观的基础上来解除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的思想武装。

列宁在 19 世纪 90 年代走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舞台，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转入帝国主义时期的开始，他面临着无产阶级要准备武装起义来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现实任务。为着完成这个任务，需要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组织力量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使他们能够对资产阶级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摧毁资产阶级的各种各样的，首先是暴力的抵抗。在这样的时候，无产阶级就愈是迫切地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指导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武装，一切离开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倾向，都会对无产阶级带来极大的损害。这时修正主义就成为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这就必须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种种进攻，就必须用主要力量揭破修正主义者从内部腐蚀工人阶级意识的阴谋，以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保卫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列宁一开始就面临着这些艰巨的任务，他始终一贯地而且成功地承担了这样的任务。

列宁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的进攻面前保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根据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的经验和科学发展的新成就，使它向前发展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各方面的根本原理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列宁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揭示了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在共产主义学说方面，列宁贡献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在哲学方面，列宁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都作了进一步的具体发挥。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切贡献，都对当时的修正主义给予了粉碎的打击，也为我们今天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其他反马克思主义思想遗留下一批极其锋利的武器。修正主义者借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的变化，硬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已经“落后于社会的发展”。他们在“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各义之下来实际上取消马克思主义，而列宁则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事实来粉碎修正主义者的胡言乱行。列宁的工作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确产生了一些新的情况，但这些新的情况一点也没有使马克思主义显得“过时”或“落后”，而只是推动它继续向前发展。在新的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确需要

作某些新的阐明，但这决不能导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根本原理的取消，而只是进一步证明这些根本原理（包括它的哲学基础）的“正确”和“万能”，证明它的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有无限的生命力的普遍真理。

## 二

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它的意识形态和它的经济制度一样，已经趋于彻底的腐朽。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早期，还在资产阶级哲学领域内出现过费尔巴哈那样的唯物论者；那么，在列宁的时代，那样的唯物论就已经完全绝迹，而极端的唯心主义和神秘论在资产阶级世界日益成为统治一切的思潮。从新康德主义到马赫主义，从实证论到实用主义，都纷纷地窜集到认识论的领域里来向唯物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大肆狂吠。这时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者出现了，他们不但不把这些反动的哲学流派当做敌对阶级的思想来加以批判，相反地却如影随形地跟了它们的尾巴走。资产阶级教授们叫嚷着提倡新康德主义，于是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等人就跟着宣传新康德主义，资产阶级哲学界流行马赫主义，于是俄国的一批修正主义者就把马赫主义奉为至宝。列宁曾经揭露过修正主义的这副丑脸，说：

“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教授们要‘回到康德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在新康德主义者后面蹒跚而行。教授们重复僧侣们已经说过一千遍的、反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滥调，修正主义者就傲慢地微笑着，嘟哝着（按最新出版的手册逐字逐句地嘟哝着），说唯物主义早已被‘驳倒’了。教授们蔑视黑格尔，把黑格尔当做一条‘死狗’来看待，而自己却在宣扬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

义，同时带着蔑视的意思对辩证法耸耸肩；修正主义者就跟着他们爬到从哲学上把科学庸俗化的泥潭里面去，用‘朴素的’（而且是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的’（而且是革命的）辩证法。”（《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页）

列宁在哲学上的时代任务，就是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这个世界性的反动哲学思潮，揭露修正主义者在哲学上的背叛行为。为着完成这个任务，列宁曾写了许多论文，并贡献了他在几年时间里写成的巨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巨著以批判马赫主义为中心，从认识论的最根本的问题上把帝国主义时期的一切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流派作了深刻的、全面的总清算，挖掘了马赫主义最早的根源，指出它在实质上只不过是18世纪英国神父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再版。

列宁的著作详细地展开了并进一步证明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所提出的著名的原理：在哲学认识论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在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客观与主观）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上，一切哲学都在基本上被划归到两个互相敌对的阵营里，肯定前者是第一性的东西，而后者则只是前者的反映并由前者所派生出来的，这就属于唯物主义的阵营；反之，认为后者是第一性的东西，前者只能算是后者的某种外表形式，而不是独立的客观存在，这就属于唯心主义的阵营。列宁根据这个原理，考察了当时哲学斗争上所涉及的一系列的重要范畴——物质、感觉、经验、真理、因果性、时间与空间、自由与必然等等的范畴，证明围绕着这一切范畴的哲学问题里都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的斗争：或者是从物质到意识（感觉、理性等）的唯物主义路线，或者是由意识（感觉、理性等）到物质的唯心主义路线的斗争。在考察每一个问题的时候，列宁都提出了

确凿不移的丰富论据，证明只有唯物主义的路线是走向正确的认识路线，而循着唯心主义的路线就要使人的思想走上荒谬绝伦的境地，例如：马赫主义把人的主观感觉看做第一性的东西，由“感觉的复合”出发来看世界，就达到了“唯我论”的结论，达到了没有人类以前就不可能有世界存在的胡说八道。

列宁还把恩格斯以后的自然科学新成就作了总结，批判了自然科学界的唯心主义倾向。他指出由于某些自然科学家不懂得认识的辩证法，不能够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概括这些成就，竟至于堕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泥坑，做出“物质消灭了”的谬论。列宁在这里进一步发挥了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的基本思想，即自然科学的每一项新发现都会更加有力地证明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性，想要利用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来否定唯物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是站不住脚的。

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腐朽性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不敢完全公开表露自己的本来面目，而总是在各种各样的掩盖下面来偷运唯心主义和反对唯物主义。他们否认哲学上存在着两个互相敌对的基本营垒，自命为“超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新路线”。这些所谓的“新路线”，在恩格斯的时代已经出现，而在帝国主义时代更普遍地流行起来，名目非常繁多，有“实证论”、“马赫主义”、“新实证论”、“实用主义”等等不同的称呼；色调各有差异，但本质上都是同样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魔鬼。修正主义者对资产阶级教授们的随声附和，在这一方面也不肯落后。他们把这些反动哲学流派称作“最新的哲学”、“现代认识论”、“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等等，借着各种好听的名义，来从事使马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互相“调和”的勾当。他们嚷着要用这类“最新的哲学”来代替所谓“过时了”的辩证唯物主义，以便在马克

思主义的幌子下散布唯心主义。

针对着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者的这些卑怯的欺骗手法，列宁提出了哲学的党派性原则，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大哲学党派之不可调和性进行了反复的论证，从而揭露了马赫主义之类所谓“最新的哲学”的虚伪性，指出这些哲学的代表们戴着“中间党派”的、“超越”的或“调和”的假面具，而在实际上却是唯物主义的死敌。列宁说：“这些先生们以无党性自夸；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死对头，那么只有一个，只有……唯物主义者。在一切马赫主义者的一切著作中，像一条红线那样贯穿着‘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超越它们之间‘陈旧的’对立的愚蠢愿望。而事实上这帮人每时每刻地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0—361页）修正主义者企图“调和”马克思主义与这些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其实质也仍是一样：考茨基曾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可以和康德主义相“融和”，甚至于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既可以叫做唯物论，也可以叫做“实在论”、“实证论”、“经验论”或“经验批判论”。俄国的一批修正主义者则率直地表示要完全投靠马赫主义。他们是一律都走上了唯心主义的路线。“他们相信反动的哲学教授，结果就沿着陡坡滚下去了。”（同上书，第362页）

列宁非常鄙弃那些“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派别混淆起来”的“中间党派”，把它们叫做“一种讨厌的烂泥”。列宁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上应该有最鲜明的、彻底唯物主义的党派立场，“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件可鄙的事情”（《共产党宣言》，第75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公开肯定自己的阶级性、党派性，和一切离开唯物主义和投降唯心主义的公开或隐秘的企图作不妥协的斗争，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区别于修正主义者的

标志之一。列宁多次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引为哲学唯物主义的党派性的模范，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背弃唯物主义以及纵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倾向。"（《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8页）"马克思、恩格斯的天才正是在于：他们在很长的差不多有半世纪的时期内，发展了唯物主义，向前推进了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别。他们不是踏步不前，只重复那些已经解决了的认识论问题，而是把同样的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而且表明了应当如何贯彻）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他们把胡言乱语、冠冕堂皇的谬论以及想在哲学上'发现''新'路线和提出'新'方向等等的无数企图当做垃圾清除掉。"（同上书，第355页）"如果把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的一些哲学言论考察一下，那么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始终不变的基本论点：坚持唯物主义，轻蔑地嘲笑一切模糊问题的伎俩、一切糊涂观念和一切向唯心主义的退却。"（同上书，第356页）"鄙弃这些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无聊的伎俩，正是沿着十分明确的哲学道路前进的马克思的最伟大的功绩。"（同上书，第357页）

资产阶级反动哲学的"新"流派用以迷惑人的东西，主要是从认识论上曲解了一些科学的词句。"一般实证论特别是马赫主义是在更多地从事对认识论的巧妙的伪造，冒充唯物主义，用似乎是唯物主义的术语来掩盖唯心主义。"（同上书，第348页）在这些流派的伪造伎俩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经验这个概念的歪曲入手。他们都谈论经验，把自己装得像科学思想家那样地重视经验，接着就对经验这个范畴进行唯心主义的曲解，硬说世界上似乎有什么"纯粹经验"，"没有掺入任何非经验的东西"的经验（同上书，第148页）之类，这就是说，把经验绝对化，使它脱离经验以外的事物的联系，把它看做和外界客观事物完全无关的纯粹人们

的主观自生的东西。列宁指出，他们在事实上只是重复了19世纪初德国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所说的一句话:“人除了经验以外什么也没有。”(同上书，第149页）这句话的意思不外是：人们除了自己的主观感觉、经验之外，什么也不能认识。感觉、经验就是人类认识的惟一的内容，在感觉、经验和感觉、经验中所呈现的那些表面的局部的现象的总合之外，人类不知道有任何其他的世界。感觉、现象，就是世界；局部的，枝枝节节的表面事实，就是事物本身。乍一看时，他们在强调要人们尊重经验、“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实用主义——马赫主义者美国的变种——胡适的话)，好像是在拥护科学，赞同唯物主义了。进一步仔细分析，却是完全相反，他们是在这些好听的名词下面来反对科学，反对唯物主义，偷贩唯心主义，否认客观物质世界和它的规律性的存在，否认科学知识是事物的客观规律的反映。他们对于自己的唯心主义观点，是“以侈谈‘经验’来掩饰它们的反动性”(同上书，第150页)。

对于“经验”的这种唯心主义的曲解，和反动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怎样联系着的呢？这种曲解的反动性就在于：它在思想方法方面为资产阶级提供这样的可能，即任意抓着某些局部的事实和生活中的某些表面现象，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来抹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这种手法在修正主义者那里也普遍地被使用着，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调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等等的谬论时，也就是把某些局部的表面现象，例如把资产阶级对于一小部分工人贵族施行的某些小恩小惠等等，当做立论的根据，而把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本身，资本主义的规律性完全撇弃不管的。

列宁在他的哲学著作里彻底揭破了这些所谓“新”学派的陈旧的唯心主义的反动面目，保卫了和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列宁反复地指出人的感觉、经验的来源是不依赖于人们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客观世界。决不能像唯心主义者的解释那样，把感觉、经验说成是人们主观自生的东西，感觉、经验只是人类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的一个环节。认识的过程是以实践为基础，“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181 页），这里说的“生动的直观”，就是对于外界世界的感觉、经验，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作了进一步阐明的“感性认识”、“抽象的思维”，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所说的理性认识，也就是对于事物本身、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进一步指出的：感觉、经验只是认识的开始，是认识的初级阶段，而认识的真正任务是要由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人们对于外界事物的认识是以实践为基础，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这样不断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割断了认识的客观基础和它的辩证过程，把感觉、经验看做一切，把个别的局部的事实看做事物本身，把表面的现象看做世界本质，把局部经验当做普遍真理，这是资产阶级反动的经验派唯心主义的共同特点，资产阶级利用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来抹煞它所不愿承认的科学的客观规律，制造各种欺骗劳动人民的谎言的罗网。修正主义者利用这种唯心论观点进行各种取消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诡辩。正是由于它对劳动人民有着这样大的危害性，所以列宁就不惜用极大的力量来对它进行坚决的斗争。

## 三

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流派的又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于辩证法的极端的仇视。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他们中间已经大

肆喧嚷着要把黑格尔当做“死狗”。这些叫嚣的锋芒当然不是针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只是针对他的辩证法。尽管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被唯心主义的体系所歪曲了的、不彻底的东西，他们还是要坚决地加以反对，目的是要倒退到17、18世纪，把生了锈的形而上学旧武器再舞弄起来，用以制造各式各样的“比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要浅薄鄙陋一千倍的唯心主义”。

但是，19世纪终归不是17、18世纪，形而上学耀武扬威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自从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科学上三大发现问世以后，17、18世纪的那样一种机械论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已失去了依据。同时，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总的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又在19世纪40年代诞生出来，并在工人阶级和进步的知识界中间日益获得广泛的影响。发展的观念已渐渐深入人心，形而上学要采取公开否认发展的露骨形态而出现，已是不可能了。于是在资产阶级哲学界就产生了庸俗的进化论，成为他们中间最流行的形而上学的隐蔽形态。毛泽东同志说：“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8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正确地概括了走向没落时代的资产阶级哲学界的世界性潮流。从新旧实证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到反理性的法国柏格森哲学，都宣扬庸俗进化论的观点，把点滴的增长或渐进运动看做事物发展的惟一的形式。这些思潮都力图利用和曲解自然科学上的进化论成就，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中国的

资产阶级文化的出现，一开始就是和庸俗进化论相联系的。自然科学的进化论思想，最初曾经是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以后到实用主义者胡适的手里，就被完全曲解成反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哲学基础。

修正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哲学家是亦步亦趋的，他们在哲学上也祭起了庸俗进化论的法宝，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们和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家一样，采取了一种十分可怜的攻击手法，他们既不了解黑格尔的唯心论辩证法，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把这两种完全相反的世界观混淆不清，硬说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黑格尔的“三段法”，于是拼了全身的力量，向着这个自己主观想像的魔鬼乱撞。从伯恩斯坦到杜林，都串演过这样的喜剧（中国的实用主义者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还在《介绍我的思想》一文中重演过这样的喜剧)。但是，这些愚笨的攻击手法只是说明他们在辩证法的革命真理面前陷入了张皇失措的境地。他们感到辩证法包含着在根本上对于资产阶级不利的东西，那就是肯定任何事物毫无例外地都有着内在的矛盾，而事物的发展，则是由于互相矛盾着的内部对立方面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这样的矛盾运动使事物的发展过程不仅仅表现为量变，而且更重要的是由量变不断地引起革命式的质变或飞跃。这些普遍真理启发人们认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之不可调和，认识资本主义制度之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之必然胜利，认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革命式的变革，而不可能采取“和平长入”的形式。这样一种革命的方法论自然就不能不成为他们仇视和攻击的中心。他们竭力想使人们相信这些真理似乎已经不再是真理，相信矛盾似乎已经不再存在或者已经被“调和”起来，相信世界的发展似乎只是循着渐进运动而不需要通过革命的飞跃。由此就得出结论，无

产阶级也不必再准备革命的斗争了。这就是他们用庸俗进化论的胡说来和唯物辩证法对抗的主旨。伯恩斯坦说："不断地前进对于永久的成功所给予的保证，必定比突变即将发生所给予的更来得大。"（《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主义民主党的任务》）这类好听的然而空洞的谎言就是修正主义者惯常用来麻痹工人阶级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

庸俗进化论是阶级调和主义和改良主义等资产阶级反动政治思想的方法论。很容易了解，如果不粉碎资产阶级和追随他们的修正主义者对唯物辩证法的进攻，任随他们把庸俗进化论的谬论扩大影响，使工人阶级的意识被阶级调和、和平改良的思想所麻痹，那么，要想正确地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使之获得胜利，那是很困难的。这样，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反对庸俗进化思想，就成为列宁时代在哲学战线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任务了。列宁为着完成这个任务，曾用很大的力量从事于辩证法的专门研究，并写出了有名的《哲学笔记》和其他创造性地阐发辩证法原理的文章。

正像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深刻地揭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党派之不可调和的对立性那样，在《哲学笔记》里，列宁又鲜明地指出了辩证法和庸俗进化论是两种根本相反的发展观："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见到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根据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泉源、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等那里去了）；根据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第一种观点是死板的、贫乏的、枯

竭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的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在这段话里把辩证法和庸俗进化论作了鲜明的对比，指出了庸俗进化论的根本错误，证明只有辩证法才是惟一正确的发展观。辩证法的发展观：就是把发展看做对立面的统一，就是要“承认（发展）自然界（精神和社会都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倾向”（同上）。而只有承认一切事物内部都存在着这些“倾向”，才能找到发展的泉源，才能把握事物“自己运动”的动力，才能真正理解发展本身。反之，如果按照庸俗进化论的看法，不把发展看做对立面的统一，不承认一切事物内部具有矛盾着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倾向，那就等于否认事物内部发展的泉源、否认事物具有着“自己运动”的动力，也就是在实质上否认事物发展的本身。这显然是荒谬而自相矛盾的。

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里更深刻地指出，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在辩证法里是居于核心的地位。“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着辩证法的核心。”和列宁所指出的这个原理相反，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修正主义者的哲学思想，其主要的特征就是要极力抹煞辩证法的这个核心，极力抹煞事物内部的对立面的统一的法则或矛盾法则。特别在接触到社会阶级矛盾的问题的时候，尤其是接触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时候，修正主义者的这个思想特征就特别明显。

列宁在说到辩证法要承认“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互

相排斥的、对立的倾向”的时候，特别在“一切”下面自己加了着重点。这是要强调矛盾对于任何事物都毫无例外，强调在任何过程中都是自始至终贯穿着矛盾运动，正像毛泽东同志后来在“矛盾论”里当做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而加以充分发展了的那样。修正主义者有时也谈论事物的矛盾，当阶级矛盾是那样明显，不容人任意加以抹煞的时候，你们也忸忸怩怩地承认阶级矛盾的存在。但是，在这样的时候，他们就努力使用各种诡辩的手法，把矛盾说成不是贯穿一切和贯彻始终的。他们想使人相信，在事物发展的某种情形下，它的内部就只存在着同一性，而不再有对立面的斗争性了；或者说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某种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矛盾将被他们之间的所谓“共同利益”和一致性所代替了，等等。

列宁分析了对立面之间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粉碎了修正主义者这一类诡辩论的根据。列宁肯定：事物内部相互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是相互依赖又相互转化的，因此是具有同一性的，但是他们又总是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因而是有斗争性的。对立面又同一又斗争，这就是矛盾，这就是推动事物“自己运动”的内部动力。但是，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中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完全相同，而是有根本差别的，对立面的同一性，只有着相对的意义，而对立面的斗争性，则有着绝对的意义。列宁说：

> “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同上）

斗争的绝对性和运动、发展的绝对性，被列宁看做是具有同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说，对立面的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最根

本的动力，是在一切发展过程中贯彻始终的现象，而对立面的同一性，则是随着现实条件的不同而常常变化的现象，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共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两个阶级的绝对的斗争性终归要使这样的同一性归于结束，而由另外的同一性来代替它，并由此把社会的发展推到更高的阶段。因此，像修正主义者那样，企图过分夸大对立面的同一性的意义，而抹煞对立面的斗争性，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硬说成是可以调和的，否认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斗争，这就根本违背了辩证法的发展观点，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本身的情况的。

列宁的《哲学笔记》还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一致性的思想，指出辩证法不但是自然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也是思维的规律，“认识的规律”（《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页）。作为认识的规律，辩证法的根本要求首先就是要具体地全面地分析和认识事物的矛盾。“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同上）既然对立面的统一是事物的普遍规律，而一切现象和过程内部都具有矛盾着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倾向，那么，要使我们的认识成为科学的正确的认识，就必须对于我们所研究的一切对象、现象和它的全部发展过程都充分地贯彻矛盾分析的方法，不允许在任何情形下模糊矛盾或掩盖矛盾，否则我们的认识就要发生错误。这是逻辑上必然要得出的结论。列宁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应用辩证法的认识规律的一个最好的典范，这样说：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在资

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为我们揭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中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同上书，第 409 页)

这里说的是分析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分析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其各个部分的总和中自始至终的发展”，而“各个部分的总和”在实质上也就是矛盾的总和，因此也就是分析了这个社会自始至终的矛盾的发展。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逻辑，正是这样彻底地辩证法的。

资产阶级哲学，特别是帝国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普遍地表现着害怕揭露矛盾,用各种方法模糊矛盾或掩盖矛盾的特征。还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就提出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口号，把他们所要建立和维护的资本主义制度贴上了这样抽象的无矛盾的标签。这类空洞的道德标签并没有反映客观事实，除了在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反封建斗争中它曾有过一定的动员意义之外，它的作用主要是在于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不自由，掩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以及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代表普遍地爱讲抽象的人道主义、人类爱和人性之类的空调。他们用自己的高谈阔论的叫嚣来淹没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的非人待遇下所发出的痛苦呻吟，来模糊现实的人性之被分裂为互相对立的阶级性，来粉饰资产阶级之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本质。资产阶级掩盖矛盾的一切说教，和他们的庸俗进化论是分不开的，这些说教的目的正是为着要制造一些借口来支持庸俗进化论，抹煞革命变革的必然性，抹煞辩证法的

客观规律。

修正主义者在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方面是资产阶级的忠实的帮手，从伯恩斯坦开始，就大谈其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化”，抹煞资产阶级国家对劳动人民的政治压迫，抹煞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必要。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里说：“现代各国的政治组织越是民主化，政治大灾变的必要和机会便越是减少。”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是那样同心同德，他们用“大灾变”这样的字眼，来表述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害怕和仇视的心情。在帮助帝国主义掩盖矛盾的效劳上，考茨基也是一个不比伯恩斯坦更差的典型。列宁曾经揭露过他的投降主义，说：“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理论批评，其所以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点，其所以只能用来进行同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平统一的宣传，就是因为这种批评回避和掩饰了帝国主义最深刻的根本矛盾。”（《列宁全集》，第22卷，第286页）列宁针对修正主义的破坏阴谋，用彻底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方法，坚决保卫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辩证法。列宁把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做的工作继续向前推进：在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里，对这个社会制度在新的阶段上的矛盾运动又作了自始至终贯彻到底的科学分析，并证明这些矛盾运动发展的结果，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导致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的转化，导致革命的飞跃。

列宁在论到人们如何认识事物的矛盾的时候，强调需要对事物的各部分、各方面作尽可能具体的、全面的分析，反对认识的片面性。他在《再论职工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中说道：“辩证逻辑要求我们更进一步。为真正地认识

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可能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又说：“辩证法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列宁全集》，第32卷，第83—84页）唯物论的认识论要求我们的认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都是充满着矛盾的、具体的东西，要正确地反映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就必须力求全面地具体地把握事物的矛盾着的一切方面，否则认识主观就不能反映客观，相反地却要和客观分裂，甚至于陷于主观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发展了列宁的上述思想，说：“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人的认识不能够一下子就把握客观事物的充满着矛盾的全部内容，要对于事物的全体获得全面的具体的认识，必须就它的各个矛盾方面，一步一步地进行分析和考察，这些考察逐步地综合起来，就成为全面的认识。同时，客观事物又是不断发展的，随着事物的发展，又要不断地出现新的方面和新的矛盾，而人的认识也就必须跟着前进，也就是要跟着不断地来揭露和分析新矛盾。所以，人对于事物的正确的逻辑思考，是一个由片面到全面，由矛盾的这一面转化到矛盾的那一面，由这一个矛盾过渡到另一个矛盾的不断循环往复的、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运动过程。列宁说：“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

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同上)认识“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转化”(《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所以，要想对于客观事物经常获得全面的具体的也就是正确的认识，要想避免陷于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人们就必须遵循这个不断反复思考的辩证逻辑规律，而不能违背这个规律。不论在任何时候，人的思考只要一旦停止了这个辩证的运动，使活生生的认识发展的曲线变成僵死的直线，就可能产生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列宁说：认识运动的“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的根源”(同上书，第412页)。这样，列宁通过对辩证逻辑的研究，就深深地挖掘到了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的老根子，就使我们深刻地了解到各种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是怎样违背了正确认识的规律性，使我们找到了克服这些错误认识的明确的道路，使马克思主义者在和资产阶级及修正主义者的唯心主义进行斗争中获得了锐利无比的批判武器。

列宁在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时候。不仅彻底揭露了他们向唯心主义投降的倾向，而且不断地揭发了他们的诡辩论。修正主义者要在政治上混淆是非，宣传对资产阶级调和和投降的思想，这在客观事实发展过程的本身是找不到真正根据的。因此就必须一方面散布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以便于抹煞马克思主义科学规律和事物矛盾运动规律的客观性，另一方面还要极力玩弄逻辑上的诡辩方法，任意拉来一些似是而非的表面例证，避

开事物的本质和根本矛盾的分析，以便于做出颠倒黑白的结论。例如用少数工人贵族的思想作为（根据），避开了整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矛盾不谈，而做出两个阶级之间利益可以调和的结论；又例如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少数工人代表可以参加议会作为“例证”，避开了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工人阶级的专政机构这个本质，而做出无产阶级不需要通过革命斗争、不需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谬论。列宁说：“一切诡辩家的手法向来是：引用一些分明与当前实际情况根本不符的例子来作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6页）又说：“在用诡辩论偷换辩证法的这一崇高事业中，普列汉诺夫真是创了新纪录。诡辩家抓住‘论据’之中的一个，但是黑格尔说得很对，人们完全可以替宇宙万物找出‘论据’。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的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即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同上书，第194页）

列宁在他研究辩证法逻辑的《哲学笔记》里，深刻地指出了辩证法和诡辩论的根本区别。唯物辩证法要求人的认识成为活生生的不断地向对立面转化的反复思考的运动，但同时坚持这样的运动必须反映客观事物本身的矛盾和本质，反对认识上的任何一种主观随意性，诡辩论的手法的秘密就在于使主观认识的运动脱离了客观事物的本身，成为主观随意性的活动。列宁说：“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2页）

## 四

列宁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保卫和发展辩证唯物论进行了辉煌的战斗，这些战斗对于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仍然有着巨大的意义，仍然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模范。

帝国主义者并没有放松它垂死的挣扎。它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不但始终进行着政治的、经济的进攻，而且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公开的或隐秘的军事的进攻。在思想战线上，它仍然不断地向社会散布着主观唯心主义和庸俗进化论的毒素，虽然又出了一些所谓的"新学派"，如"语义学"、"逻辑实证论"之类，但正如列宁所说的，不论蓝鬼、白鬼或红鬼，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鬼，而且旧的颜色的鬼也还在继续作祟。例如实用主义，就是现在也还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修正主义者中间起着不小的作用。因此，列宁在哲学上的贡献，即使在今天来说，也仍然是强有力的打鬼的武器。

帝国主义者为了延缓自己的灭亡，不但继续在工人阶级外部来进行对抗，而且也没有忘记向工人阶级队伍内部去找自己的内应。过去他们曾在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内部找到了修正主义者作为内应，今天他们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内应，那就是现代的修正主义者。

现代修正主义者继承了伯恩斯坦等旧修正主义者的衣钵，继续为资产阶级服务，他们仿效着旧修正主义者的伎俩，以马克思主义需要新的阐明作为借口，来在根本上取消马克思主义。南斯拉夫共产党纲领草案这样写着："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落后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对现代社会问题特别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规律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阐明方面出现了空白。"这些话特别强

调“近几十年”，这就告诉我们现代修正主义者想干些什么：如果说旧修正主义者是要破坏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思想，那么现代修正主义者所特别要努力加以毁坏的，就是列宁的学说，特别是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而毁坏列宁的学说，也就是毁坏马克思主义；因为列宁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东西，列宁的学说是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往往在口头上表示拥护列宁，而在实际上却更直接地反对列宁。因此我们在现代修正主义者面前又面临着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列宁的哲学遗产的任务。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哲学上一般都不能再像旧修正主义者那样，完全露骨地表示要用某些资产阶级教授的唯心主义来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因为在当代说来，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性在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心目中已树立起更加巩固的威信，修正主义者已不容易再用什么“新学派”来迷惑他们了。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旧修正主义的偷梁换柱的手法，只是多少做得更为隐蔽一些，这就是在口头上有时也把自己说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拥护者，而在实际上解决各种哲学问题、理论问题、实际问题的时候，却彻头彻尾使用着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庸俗进化论的思想工具。他们不但仍然继续宣传着“阶级调和”思想，抹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矛盾，并且进一步抹煞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抗矛盾，他们扬言说：“现今的世界，现今的人类社会，总的来说已经深深地‘长入’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了。”（马雅尔可·托多罗维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宣言》，原载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1956年7、8期）又说：“社会主义思想不再主要围绕着摧毁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转圈子了。”（《南共纲领草案》）在散布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

学方面，南斯拉夫的一些哲学者已经在公开进行用美国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来混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伪造勾当，并继续效法旧修正主义哲学者，以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论来反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然而他们的政治家却更狡猾些，他们采用了最卑劣的贼喊捉贼的办法：在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时候，硬说后者对马克思主义做了“实用主义的修正”，而在自己的实际言论和行动中，却到处抹煞客观真理，并把凡是对我有用的都当做真理，这就是说，他们正是全心全意地奉行着不折不扣的美国的实用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出卖给谁，在哲学上也就不能不向同一个主子做交易。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诡辩论方面，也比旧修正主义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说成是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这两个世界体系的对立，说成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改造的统一过程”，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说成是友好的行动等等。他们在这一切问题上，都是玩弄着许多片面的、表面的、似是而非的“论据”，来制造种种颠倒黑白的、极端唯心主义的谬论。在这儿他们所表演的诡辩技巧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

1957年春，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曾总结了国内国际的政治和思想斗争经验，指出修正主义是当前更大的危险。他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

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帮手。”同年 11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指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共产党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它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要求保存或者恢复资本主义。”这些文件说明，反对修正主义，在目前仍是我们在政治和思想斗争方面的主要任务。由于现代修正主义者继续在“反对或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因此在哲学上，我们就需要像列宁那样，在对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坚持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的辩证唯物论。在这方面，我们还应该特别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因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在当代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最辉煌的范例。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在与党内各种错误路线斗争的过程中，科学地总结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经验而写成的。其中不但包含着许多专门阐述辩证唯物论的著作，就是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方面的著作，也具体地贯彻了和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列宁的哲学遗产。在他的著作中，首先保卫和发展了列宁的哲学党派性的原则，把它锻炼成贯穿一切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实际工作中以及科学研究工作中，如果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如果“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800 页)。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和错误路线斗争的经验，写成了《实

践论》和《矛盾论》以及其他哲学著作，继列宁之后，更全面、更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规律和辩证法规律，毛泽东同志指出人的认识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循环往复和一次比一次更高的发展的过程，是由个别的特殊事物的认识到一般的事物的认识，再由一般回到特殊，然后再到一般，这样不断向对立方面转化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把这个认识论原理贯彻到党的“群众路线”中来，指出上述的认识过程同时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不断反复的过程，也就是领导者不断地总结群众经验，把群众中创造出来的好的经验和意见不断地“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过程。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充分地显示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作为“行动的指南”这一个重大的特点。它使我们认识到，政治上思想上的各种错误路线，从认识的根源上来说，就是由于违背了上述认识的对立统一的发展规律，把认识与实践、特殊与一般、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领导思想与群众经验互相割裂的结果。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全面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它也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锐利的武器。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学说是辩证法的核心的思想，指出：“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2页）在教导人们分析矛盾的时候，强调一方面要注意到矛盾的普遍性，这就是说，要肯定一切过程和每一过程自始至终都是矛盾运动，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善于揭露矛盾，而不要模糊或掩盖矛盾；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到矛盾的特殊性，要认识清楚不同矛盾的不同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能找到适合于这些特殊性的不同的方法来加以正确的解决。毛泽东同志在几十年来指导中国革命的

许多著作中，自始至终都贯彻了精密的阶级分析方法，并根据革命每一个阶段阶级矛盾的变化的特殊情况，提出不同的策略方针。中国革命的胜利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的正确性。在中国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里面也充满着矛盾运动，而且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继续贯彻到底，并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澄清了一个时候由于有些人不肯承认或不肯明确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而产生的某些思想混乱状态。在贯彻矛盾的普遍性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又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特殊性：和剥削阶级统治的，对抗矛盾占居主导地位的旧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是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只有小量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因此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和旧社会不同：对于仍然存在着的小量的敌我之间的对抗矛盾，无产阶级的国家仍然要用专政的方法或镇压的方法来解决，但对于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则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深刻地概括了无产阶级国家的实质和任务，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的学说，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仍然是社会本身内部矛盾的不断产生和通过对立面的斗争而不断地获得解决的过程，仍然是不断地由量变到质变，由渐进运动到革命的飞跃的过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就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来说，由互助组到初级社，由初

级社到高级社，更进入人民公社，就是由不断出现的各个方面的质变一步步地形成大的革命的飞跃，而每一次质变都要通过内部矛盾势力的斗争，通过先进势力和右倾保守势力的斗争。通过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通过反对右倾思想或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修正主义者和庸俗进化论者所想像的那种不包含矛盾和对立面的斗争，不包含质变和革命飞跃的纯粹渐进性的发展形式，不但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找不到，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是不存在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辩证法思想既然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就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在它的指导下，展开了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这个斗争解决了当时暴露出来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因而大大地解放了社会的生产力，激发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冲天干劲，促进了空前未有过的大跃进，产生了人民公社这种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1959年的八届八中全会后又展开了反对党内少数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斗争，彻底粉碎了这种思想，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出现了更大的跃进，这个跃进的形势在进入1960年以后又可以看到明显的更大的高涨。

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出现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形势和人民公社制度，使帝国主义和世界的反动派不能不大感恐惧。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忙着配合帝国主义者的叫嚣，对我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各种各样的造谣诬蔑，妄想破坏它在世界广大劳动人民中间日益扩大的影响。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年比一年更大地跃进，人民公社制度是迅速地巩固成长起来，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妄想则日益走向彻底的破灭。

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的著作，是反对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强有力的号角，是列宁的事业在当代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这些著作问世以来，许多事实证明，坚持和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之类的资产阶级思潮进行斗争，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起着多么强大的推进作用。我们一定要高举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

（原载 1960 年 4 月《哲学研究》第 4、5 期；曾收入《艾思奇选集》第二卷）

# 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1960.7）

## 一

旧社会有这样一种迷信：某些人有鬼附在身上，他们使用过的东西，也被认为是“不洁”的。这些东西就成为禁忌之物，如果你接触它们，那么，你的身上也就要染上鬼气了。

哲学界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有时使我联想到上述的迷信。在这次争论中，以于世诚同志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坚决否认思维与存在之间有任何的同一性。他们中间有些人提出了所谓的理由：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在历史上被唯心主义者所使用的术语，它已经沾上了唯心主义的不洁之气，因此人

---

* 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论争，源起于1955年。当时，在中央高级党校的内部教学中，学员提问：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说到了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时，究竟是肯定的呢，还是否定的？艾思奇认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杨献珍认为，恩格斯是否定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因为这从来是唯心主义的命题。并批评说，在党校课堂上宣传唯心主义是不能允许的。后来，在反右派运动中，康生将艾思奇的观点，上纲为“反党”、“反马列主义”。1958年以后，这个问题在社会上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于世诚的文章实际上反映了杨献珍的观点。艾思奇于1960年写了《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文。1962年，于世诚又发表了一篇不同意艾思奇观点的文章，为了回答批评，艾思奇又写了《再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文，进一步阐述了自己所坚持的观点。

们就绝对不能在唯心主义的意义之外来应用它；谁要想这样来应用它，谁就是在事实上宣传了唯心主义。因此，唯物主义者就必须坚决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我们不能同意世诚同志等人的这种看法。我们认为，尽管唯心主义者在历史上曾使用过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术语，但并不妨害我们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肯定它。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并不就等于直接肯定了唯心主义的原则。因为唯心主义之为唯心主义，首先在于肯定思维是第一性的东西，存在是第二性的东西。难道说只要一谈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等于直接肯定了思维的第一性和存在的第二性吗？显然这是两件事情。虽然两者可以有联系，但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因此，许多同志反对世诚同志等人的看法，并提出了批评，我认为他们的批评是对的。

关键在于对“同一性”如何理解。这里有两种根本相反的理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理解，恩格斯叫做抽象的同一性，即把同一性理解为事物与自身的绝对的同一，这就是说，同一的东西决不包含任何内在的差别、对立或矛盾，反过来说，凡是有差别、对立或矛盾的东西也决不能成为同一。同一就是简单的等同。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时，就可能得到两种荒谬结果：或者是得到恩格斯所批判过的那种庸俗唯物主义，如果把思维简单地等同于某种特殊的物质，例如等同于肝脏分泌出来的胆汁的话；或者是得到唯心主义，如果把存在简单地等同于思维的话。一般的唯心主义者，特别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在处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时，实际上是这样来了解同一性的。按照这样的看法，世界上就没有真正物质的客观存在，一切在我们周围作为物质而存在的东西，都只能归结为人的思维、意识、感觉等精神内

部的存在。当然，我们是应该坚决反对这些看法的。如果有人这样来解释同一性，并且把这样的理解应用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说："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那我们就要针锋相对地向他提出反对的意见，说："你完全错了，思维与存在没有这样的同一性！"

对同一性还有另一种理解，即辩证法的理解。按照这样的理解，同一是差别的同一，对立的同一，或矛盾的同一。或者说，同一事物内部都包含着差别，对立或矛盾；差别、对立在一定条件下都有其同一性。这样的同一性，主要是指的对立面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联系和互相转化这一个意义。例如，没有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有资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也就不存在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互相联系，两者就有了同一性。再例如，战争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和平，和平在一定条件下又转化为战争，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就有了同一性。这里应该指出，根据辩证法的理解，"同一"这个范畴，和"统一"、"一致"等的意义是相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同一性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是片面的，不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而同一性的辩证法的理解，则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最普遍的规律性。世界上不存在与自身绝对同一而不包含任何内在的差别和矛盾的事物；任何统一的东西都在自己内部包含着差别和对立，另一方面，一切差别和对立的东西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联系和互相转化，因而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是有同一性。对立的同一性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源，事物内部相互矛盾的对立方面又同一又斗争，推动着事物向前发展。这样的意义上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与差别、对立不可分地联系着的同一性，就是辩证法的同一性，或矛盾的同一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彻底辩证论者，相信辩证规律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因此，辩证法意义上的同一性，应该毫无例外地运用于任何

事物，包括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内。思维是存在的反映，思维在一定条件下又能成为人们改造世界、推动客观存在的变化和发展的指导力量，两者之间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关系是很明显地存在着的。因此，如果有人问：思维与存在之间有没有辩证意义上的同一性？一个彻底的辩证法拥护者，一定会毫不迟疑地答复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肯定地存在着的！

对思维与存在之间的任何同一性一概加以否定的同志们，例如世诚同志，并不是完全没有接触到同一性如何理解的问题。他自己在实际上已经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之所以成为唯心主义的命题，正是由于唯心主义者对这个术语作了存在等同于思维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他在今年《光明日报》3 月 4、5 两日的一篇文章里就说：“唯心主义的同一性，它是说的‘这个即那个、那个即这个、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用贝克莱的话说，是指的‘对象和感觉是同一个东西’。”这些话说明什么呢？它说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不是生来就是有着唯心主义的绝对性质，它之所以带有这样的性质，只是由于唯心主义者用“这个即那个，那个即这个”的观点，用对象等同于感觉的观点，来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缘故。这样的观点正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如果世诚同志从他自己所说的话出发，按照正常的合理的逻辑进一步这样提出问题说，倘若人们不是用形而上学的“这个即那个，那个即这个”的观点来看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而是把两者看做矛盾的同一，对立的同一，并且指明这个矛盾和对立是以物质、存在作为基础的，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在这样的意义上，难道还能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命题吗？难道还能否认思维与存在之间有着一定的同一性吗？很明白，在这样的意义上，就不能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还

是唯心主义的命题，就不能简单地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 二

我们在上面从原则上指出了世诚同志等人的错误。世诚同志以及和他有同样看法的人可能认为，他们的看法并不是出自凭空的设想，它还有着强有力的根据；这个根据首先就是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难道列宁在批判波格达诺夫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性的理论”时，不是曾经充满着愤怒的情绪，斥之为“十足的胡言乱语”、“绝对反动的理论”（《列宁全集》，第 14 卷，第 342—343 页）吗？难道列宁不是曾经引用过拉法格的这样一段话——“当拉波波特硬说马克思认为‘存在着观念和实在的同一性’的时候，他是错误的”（同上书，第 209 页）——吗？难道列宁不曾严格地指出过：在感性表象和我们之外的现实之间的关系上使用俄文 совладать（一致）这个词时应该解释作“符合”、“协调”的意义，而不应该解释作“同一”（同上书，第 111 页）的意义吗？不错，列宁的著作里的确有着这样一些“根据”，而世诚同志等人正是依靠这些“根据”来论证自己的看法的。因此我们就必须研究一下，列宁书中的这些“根据”，是不是能够证明世诚同志等人的看法的正确性呢？

如果我们对经典著作不作断章取义的引用，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一下问题的实质，那就可以看到，列宁的思想和世诚同志等人的看法并不是一样的。

关键问题仍然是在于对同一性的概念如何理解。列宁为什么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自始至终批判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呢？原因是列宁在当时面对着一大批主观唯心主义者，其中有些人想用主观唯心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

主观唯心主义者普遍地祭起了“意识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法宝，并对它赋予形而上学的解释：“这个即那个，那个即这个。”列宁为了捍卫辩证唯物论，必须粉碎他们的这个法宝，对他们所理解的“意识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命题进行毫不容情的斗争。不难看出，列宁在他的著作里批判“意识和存在的同一性”时，都是针对着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一性，列宁从没有在批判“意识和存在的同一性”时，把它的意义片面地加以夸大，以至对形而上学意义以外的任何意识和存在之间的同一性，也一概加以否认。不是的，列宁在批判主观唯心主义者用形而上学同一性的观点来曲解意识和存在的关系时，同时又注意到要防止把思想引到另一个形而上学的极端，即把意识和存在之间的关系看做绝对的对立，看做不包含在任何同一性中的绝对的差别。下面这些话就是很好的证据：

“当然，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是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同上书，第148页）又说：——

“狄慈根没有正确地表达出来的思想是：物质和精神的差别是相对的，不是无限的。”（同上书，第257页）

列宁在这里告诉我们，意识和物质仅仅是在什么是第一性和什么是第二性这个问题上，也就是在恩格斯所说的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的范围内，才是没有任何同一性的，在这个问题的范围之外，它们之间只有着相对的对立或差别，这也就是说，它们之间有着差别的同一性或对立的同一性。

列宁为什么要愤怒地斥责波格达诺夫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

识的同一性的理论”呢？难道说是因为波格达诺夫主张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有着历史唯物主义所肯定的那种对立的同一性，即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而社会意识反过来又能动地推动着社会存在的发展？当然不是的。问题在于波格达诺夫所说到的“同一性”是十足地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同一性，丝毫也没有半点辩证法的气味。使得列宁不能不愤怒的，是他的这样一套谬论：“所有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都是意识——心理的生活……社会性和意识性是不可分离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按这两个词的确切的含义来说，是同一的。”（同上书，第340页）试问，面对着这样的胡说，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轻易加以容忍，而不起来给予严厉的斥责吗？列宁之所以要加以斥责，是因为波格达诺夫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简单地等同起来。列宁在这里决不是要否认意识和存在之间的辩证的同一性。

列宁所引用的拉法格的话是不是帮助了我们的世诚同志呢？也不。如果仔细看一看那一句引话的前后文，就不难发现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首先应该注意，拉法格否认“拉波波特硬说马克思认为‘存在着观念与实在的同一性’”的时候，他所提出的理由是：“我们从来也不使用这样的形而上学用语。”这就是说，因为拉波波特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他本人是把观念和实在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把观念看做虚构，看做没有任何实在性的东西；在他看来，一说到观念和实在的同一性，就等于把观念和实在完全等同起来，并意味着“观念就等于一切实在”，“除观念以外，不再有其他的实在”了。在这样的意义上来了解同一性，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自然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除了人的主观观念之外，还存在着物质的客体，不能说只有观念才是实在的。物质客体也是实在的，而且是更根本的实在。应该注意，拉法格在

说了上面的话以后，紧接着有这样一段下文："观念像客体一样，也是实在的，它是客体在头脑中的反映。"（同上书，第 209 页）这里说得很清楚，"实在的"的东西不仅仅包括观念，还有观念之外的客体，因此，拉法格的话实际上是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第一，观念和客体，是有差别的两个东西，不能形而上学地把它们等同起来。第二，观念和客体之间有辩证的同一性，差别的同一性，因为它们都是"实在的"，不能形而上学地把它们对立起来。

如果世诚同志认为拉法格的话还不够清楚，那就可以再看一看也是列宁所引用的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另一段话："……对唯物主义者说来，把 a priori（先天的）认识和'自在之物'区别开来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唯物主义者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把自然界中的经常联系割断，都没有把物质和精神看做彼此根本不同的东西，而是认为它们不过是同一东西的两个方面。"（同上书，第 208 页）说这段话的唯物主义者，是费尔巴哈的信徒，还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但他的这段话是列宁所赞同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自然不能在认识论上应用辩证法，但他们的著作中也不是不可能有个别的（也是极不完全的）辩证法因素的。例如这段话就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差别的同一性，肯定它们是"**同一**"东西的**两个方面**。

世诚同志在去年 10 月 11 日《光明日报》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坚决否认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矛盾的同一性，否认两者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否认"思维和存在这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互为条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硬说这样的看法是"原则同格论"的"唯心主义理论"。世诚同志自认为是一个拥护辩证唯物主义的人，而其实这种说法比费尔巴哈主义者——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还落后得多！因为列宁所引用的这个费尔巴哈信徒就明确肯定思维与存在的不可分的"经常联系"，肯定"这两个方面"是

"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当然，费尔巴哈在他的《未来哲学原理》里曾批判过唯心主义者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提法，但他之所以批判它，是因为它把存在看做"一种与思维没有分别的存在，一种只作为理性的属性的存在"（《未来哲学原理》，第42页），是因为它把同一看做"思维与自身的同一"。费尔巴哈在同一本书里又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同上书，第74页），并给予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是消极的反映论，它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有根本的区别，它的重大缺点已经有一些同志作了详细的批判，他们的批判很对，我不再重复他们的意见。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点：由于费尔巴哈不懂辩证法，因此他自己并不知道，当他讲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的时候，他在事实上已经承认了两者之间的差别的同一性。而这就足以说明，即使就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也是在一般的反映论的基础上肯定思维与存在的不可分的联系，肯定它们之间的差别的同一性的，否则它就不成其为唯物主义，就要变成二元论或不可知论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很容易了解关于俄文 совладать 的问题了：列宁为什么要坚持在"符合"、"协调"的意义上来使用它，而反对在"同一"的意义上来使用它呢？要知道列宁的分析是有的放矢地针对着经验批判论者巴札罗夫的诡辩的，巴札罗夫利用这个俄文词的双关意义——"一致"和"同一"两重意义，把"关于物及其特性的表象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是一致的"这句话，曲解成"感性表象也就是（着重点是巴札罗夫加的）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列宁全集》，第14卷，第110页）。列宁在这里所反对的，是巴札罗夫把"一致"曲解为形而上学的"同一"，而并没有否认"关于物及其特性的表象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之间的辩证的

同一性——辩证的“同一”和“一致”是没有区别的——，这是非常清楚的。

## 三

否认思维与存在之间存在任何同一性的同志们，认为他们的观点还可以在恩格斯那里找到根据。他们的理由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里讲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时，他的话是从黑格尔那里借用来的，是把它仅仅当做唯心主义的提法来处理的，也就是说，他是以否定的态度来对待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这些同志还说：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引用恩格斯有关的这一段话时，特别把“用哲学的语言说来，这个问题就叫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一句删掉，好像这就足以证明，列宁也认为恩格斯是否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

这些说法都是非常牵强的。

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从黑格尔的著作里借用过来的，这能不能成为充分的理由，来证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仅仅只能有唯心主义的意义呢？马克思主义者从黑格尔的著作里借来的语言不只这一个，例如“否定之否定”，就是黑格尔的术语，这个术语有它的缺点，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借用了，谁也不能说它仅仅是唯心主义的术语。黑格尔的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唯心主义的，另一方面还有辩证法——被唯心主义体系闷坏了的，极不彻底的，但比起黑格尔以前的哲学来说是最自觉的辩证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而对于它的辩证方面则继承了它的合理的核心，并加以改造和发展。就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来说，也有这样的情

形。黑格尔哲学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也有两个方面，就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来说，黑格尔把思维看做第一位的东西，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解释成“存在即思维”意义，把存在解释成“与思维没有分别的存在”，因此它就被赋予了唯心主义的意义。就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方面来说，黑格尔和其他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所有的唯物主义者和彻底的唯心主义者）肯定地解答了“思维是否能够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并在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的时候，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辩证法的说明，在这一方面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就有其合理的、即辩证法的成分，而不仅仅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

应该注意，恩格斯的著作里不是就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来谈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而是在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提出这问题的。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不是要解决划分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问题，而是要解决现实世界对于人的思维是否有可知性的问题。在问题的这个方面，肯定现实世界的可知性，也就是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虽然唯物主义者的肯定和唯心主义者的肯定有根本方向的不同，但就反对不可知论这一点来说，都是肯定了世界的可知性，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则是很清楚的。恩格斯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所要批判的直接对象并不是唯心主义，而是不可知论。引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时，也是为着批判不承认思维和存在之间有任何同一性的康德主义思想。因此，就斗争的任务来说，恩格斯必须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给予肯定的解决，是一目了然的。而且即使单就语法的顺序看，《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提出“我们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否在我们的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构成对现实的正确反映？”的问题后，紧接着就指出，

“用哲学的语言说来，这个问题就叫做思维与存在之同一性的问题”；并且随即答复说：“绝大多数的哲学家都肯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的文字顺序也说明，恩格斯是明明认为唯物主义者（包括在“绝大多数”哲学家之内）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也给与了肯定的答复，而对这一点要做出相反的解释，则是很牵强的。

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引用恩格斯的这段话时，也指出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方面，不是直接解决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划分问题的。列宁说：“恩格斯根据这个基本问题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接着他又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列宁全集》，第14卷，第94页）这里很明白地说到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所要解决的，是“两大阵营”划分之后的另外的问题，而在这个方面，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肯定或否定的解决，是不会直接涉及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分界问题的。

世诚同志说，列宁在这一段引文里删掉了“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就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一句话，就足以证明列宁也认为恩格斯否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其实，事情的逻辑和世诚同志的主观估计恰恰相反。如果列宁认定恩格斯否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那他就不但不会删掉这一句话，而且一定要把它引用出来。因为列宁正在和一大批主观唯心主义者进行战斗，这些反动思想都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作为自己的武器，列宁正在用全力对付他们的这个武器。如果恩格斯的著作早已否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那么，列宁正需要把他的话引用出来，作为帮助解除唯心主义武装的强有力的根据。

列宁删掉了这句话，正足以说明恩格斯谈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时，不是为着批判唯心主义，而是为着解决另外的问题，对于列宁的斗争任务来说，没有引用的必要。

人们也许要问：恩格斯和列宁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观点当然是一致的，他们怎能够在同一个问题上有不同的态度呢？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人，是由于不注意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科学，必须依据历史情况来研究问题。恩格斯和列宁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他们的具体斗争任务也有所不同。他们虽然在形式上好像是接触到同一个问题，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却是不同的问题。在恩格斯生前的时期，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思潮的主要口号是“回到康德去”，是要把黑格尔当做“死狗”看待。它的目的是要散布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散布思维与存在之间绝对没有同一性的谬论，散布人的思想、概念不能认识客观现实，而仅仅是主观的虚构之类的谬论，来贬低理性，贬低科学，反对科学。这时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修正主义者，如伯恩斯坦、施米特之流，也就跟在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尾巴后面，妄想用康德的不可知论来“修正”马克思主义，来贬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面对着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包括修正主义思潮，恩格斯必须着重解决认识的辩证法问题，解决现实世界的可知与不可知的问题。由于当时的康德主义者（包括修正主义者），对黑格尔的疯狂的攻击，主要是针对着他的辩证法，而不是针对他的唯心主义，因此不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在自己的著作里，屡次强调过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虽然他们也同时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他们的辩证法有根本的不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论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时，就是为着要批判康德主义的、否认思维与存在之间有着任何同一性的、不可知论的

谬论。为着粉碎这样的论敌，很自然地，他必须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肯定黑格尔在解答这个问题方面的合理的辩证法的因素，但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的论证。

列宁是处在另一个时期——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这时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思潮的主流发展成为更加腐朽百倍的主观唯心主义，而修正主义者也就胁肩谄笑地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尾巴后面，用各种色调的主观唯心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散布意识和存在绝对同一的胡说，通过“意识即存在”、“存在即意识”的诡辩，来否认外界世界的客观存在，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性，否认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的现实性。面对这个到处泛滥的反动哲学思潮，列宁必须着重解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严格分界的问题，解决唯物主义哲学的党派性问题，必须对于唯心主义的主要武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形而上学的胡说坚决加以粉碎，不给它留下丝毫存在的余地。但是，如果把列宁对于意识和存在的形而上学同一性谬论的这种坚决斗争精神，解释成列宁否认意识和存在之间的任何同一性，解释成列宁把意识和存在看做绝对对立的东西，那就大错特错了。

恩格斯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肯定态度，还可以从他致施米特的信中得到显著的证明。这也就是世诚同志提到的1895年的那一封信，但世诚同志把那信的意思完全读成它的反面了，他以为恩格斯的信帮了他的忙，其实恰恰相反。恩格斯在那封信里所批评的，是施米特把“价值规律贬低为一种必需的虚构”的错误观点。这正是康德主义的否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人们关于价值规律的思想反映着客观世界的经济规律的谬论。如果设想恩格斯在对康德主义者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的时候，自己却又和康德主义者站在一道来反对黑格尔，并

“明确地指出了‘思维和存在不是同一的’”（去年10月11日《光明日报》所载世诚同志文章中的话）那不是太奇怪了吗？

让我们把世诚同志所谓“明确地指出了‘思维和存在不是同一的’”那一段恩格斯的文字再仔细读一读吧！它的意思究竟是不是像他所设想的一样？恩格斯说：“你对价值规律的责难，适用于从实在的观点来看的一切概念。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完全切合于你所举出的圆形和多角形的例子。换句话说，事物的概念和事物的现实是同时运动的，就像两根渐近线一样，不断地互相接近，但永远不会相遇。二者间的这种差异，就正是使得概念不直接成为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成为其本身的概念的那种差异。概念具有概念的本性，因而和现实并不直接吻合，尽管它最初必须从现实中抽象得出；由于这个原因，概念毕竟不是虚构，除非你把思维的一切结果都说成虚构，因为现实之符合思维的结果，只是以非常间接迂回的方式甚至只是渐近线式的接近。”

这里按照世诚同志所引用的一字不少地再抄出来。世诚同志断定这段引文是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但他一点理由也没说出来。现在让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恩格斯的这段话的内容和世诚同志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先从多角形和圆形的关系的例子开始说起，几何学的规律告诉我们，等边多角形的边无限增大的结果就会接近圆形：这个规律说明多角形可以转化为圆形，两者之间有着辩证的同一性。康德主义者施米特否认这个同一性，并企图以此作为比喻，来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他的理由是：多角形尽管能接近圆形，终究不是圆形，思维、概念尽管能接近存在、现实，但终究不是存在、现实，而只是虚构。恩格斯的这段话正是针锋相对地驳斥了施米特把思维和存在、概念和现实形而上学地绝对对立起来的不可知论观点，他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

性原则不是不适用于施米特的圆形和多角形的例子（如施米特所想的那样），而是“完全切合”于这个例子，圆形和多角形的辩证的同一性，也正好用作比喻来说明思维与存在、概念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概念和现实的同一性首先在于两者是同时运动的，像渐近线一样不断地互相接近的，并且概念“最初必须从现实中抽象得出”。但这个同一性并不是形而上学的绝对等同，两者任何时候都是有差异的；概念决不会“直接”成为现实，思维和存在决不会“直接”吻合。应该指出：说概念、思维不能“直接”成为现实存在，这并没有否定了，而正是肯定了它们能间接地，在一定条件下经过某种媒介转化为现实、转化为存在。马克思说的“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由于贯彻总路线和政治挂帅的原则，在现实生活中推动起的高速度发展，这些例子活生生地说明概念、思维通过某些环节间接地转化为现实存在，说明“概念毕竟不是虚构”，思维和存在毕竟是有同一性的，因而也就粉碎了把概念看做虚构、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康德主义的形而上学观点（附带说一下：恩格斯这段话的原文的重心，是放在肯定“概念毕竟不是虚构”这句话上，译文没有把他的意思充分确切地传达出来）。自然，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辩证的同一性，两者的接近、符合是间接迂回的，甚至只是渐近线式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不懂这个辩证法的过程，他们认为思维应该一次就完全正确地反映现实存在，这也是不正确的。

## 四

总之，世诚同志等人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忘记了同一性有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两种不同的理解，

而辩证法的同一性是普遍地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也存在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中。

当唯心主义者，特别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解释同一性，把“意识和存在的同一性”曲解成“存在等同于意识”，把存在曲解成“与思维没有分别的存在”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着批判唯心主义，驳斥他们的这种形而上学的曲解，就要与他们针锋相对地坚决否认意识和存在的这种同一性，但在批判不可知论的时候，就要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因为不可知论者企图否认它们之间的辩证的同一性。

否认思维与存在之间有任何同一性，否认两者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否认它们“在一定条件下，互为条件，共处于统一体中”，像世诚同志那样，就会接近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观点，或者即使没有完全成为不可知论，但由于不承认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的联系和相互转化关系，由于在认识论上不能够应用辩证法，仍然会陷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片面性。

过去，普列汉诺夫就是由于不了解认识的辩证法，不懂得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的同一性，因而在和康德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陷于自相矛盾和混乱的境地。普列汉诺夫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是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当伯恩斯坦、施米特之流施用诡辩的手法，把唯物主义者所理解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唯心主义者的理解混淆起来，硬说“纯粹唯物主义终究要归宿于唯心主义”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在这个反动思想的进攻前面，不但不敢从正面加以驳斥，并像恩格斯那样明确承认唯物主义在不同于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相反地，却矢口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甚至于说“只有唯心主义才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彻底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是不会做出这样片面的论断来的。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从头到尾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唯心主义的“意识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谬论，但在他的这部著作里始终也找不到“只有唯心主义者才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样片面绝对的论断。但是，尽管普列哈诺夫的文章里出现了这样片面绝对的论断，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他却不能不在逻辑上打了自己的耳光，肯定在“观念的东西”有可能正确符合于“物质的东西”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说观念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的同一性”（《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第 156 页）。虽然他所说的这个意义，还是片面的，还不是指观念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这一辩证法的意义。

列宁在《哲学笔记》里曾指出普列汉诺夫不懂认识论的辩证法，因而他的唯物主义常常表现为形而上学的、庸俗的唯物主义。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又批判了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论”观点，揭露了它的不可知论的错误性质。普列汉诺夫的这些错误，都不是偶然的，它说明如果不能在认识论上应用辩证法，不理解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的同一性，就有可能使人们走上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历史上曾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斗争中所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斗争中恩格斯和列宁保卫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保卫了辩证法。今天，我们研究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不仅有巨大的理论意义，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正是在思想方法的领域内到处破坏着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正确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有利于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为了正确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

设的规律，也必须很好研究这个问题。两年来在中国出现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形势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说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是如何正确地反映了亿万人民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客观规律，而这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又如何通过广大人民的群众运动转化为排山倒海的物质力量，这正是充分体现了思维与存在互为条件互相转化的规律，充分体现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同一性规律的空前辉煌的典型。不了解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的同一性，也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就可能在认识上行动上犯错误。右倾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世界观主要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们在实际上正是形而上学地看待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把存在看做和自己的主观意识没有分别的存在；但否认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性的人，看不见两者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看不见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看不见反映客观规律的指导思想可以通过群众运动的环节转化为惊天动地的强大物质力量，也同样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原载《人民日报》1960年7月21日；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 党史引言报告*

(1960)

同志们！今天大家开始学习党史，党委要我来开一个头。

关于学习计划问题，昨天李践为同志已经讲了，我现在是要讲引言。

我先声明一点：我对于党史和大家一样，也是开始学习，我是专门研究哲学的，研究哲学也要涉及党史，但对党史本身没有什么系统的研究。今天讲引言，仅仅是发表一点意见。大家对我的意见可以展开讨论、批评，这样就算使学习开了头了。所以我讲的引言只是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 一、学习党史的中心环节问题

学习计划是六个月，在六个月内，以两个革命阶段、三条总路线为纲来进行学习。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学习党史，使我们大家初步奠定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使我们以后学习各种专业，学习马克思主义其他各部分有一个思想准备。这就是说，我们学习党史，就是要使我们在思想上打下一个基础，作为我们以后学习的一个比较好的开端。

---

* 这是艾思奇同志在中央高级党校1960年理论班所作的报告。按报告的速记稿整理，个别地方有所删节，大标题和二、三、四小标题为原有，第一个小标题是我们加的。

我讲引言主要是想讲一讲如何来实现这个任务，也可以说是，如何通过党史学习，初步了解毛泽东思想。

我们党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党。除了苏共以外，我们党的经验是最丰富了，或者就某些方面来说，我们党的经验可以说比苏共更丰富一些。比如民主革命时候，我们的斗争的曲折性、复杂性超过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样。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这个经验我们更全面一些；我们对国家资本主义方式的运用比苏联更成熟些。现在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又有许多新的经验。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个丰富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并且是正确地指导了我们的斗争的科学思想。我们学习党史，就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怎样观察历史并怎样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使它变成系统的理论，并用此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新的贡献。

我们党经历了将近四十年的斗争历史，这四十年中，大的阶段有两个，前一个是民主革命阶段，有四个时期，如果加上“五四”到党的成立这一在干部和思想上准备了党的成立的时期，那就有五个时期。党成立以后进入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个时期我们党是陈独秀领导的。从1921年—1927年这六年，因为没有正确思想的领导，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领导，结果失败了。以后进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1927年—1937年这十年中间，前七年毛泽东思想尚在形成和发展中，它还没有成为党的中心领导思想，这七年就遭受了很大的失败，遭受了损失。1935年以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思想开始成为我们党的中心领导思想。以后是抗日战争，有八年的时间，在这八年里基本上是毛泽东思想指导的，所以这八年的战争终于得到了胜利。抗日战争以后是人民解放战争，也就是第三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从1945年—1949年，这四年中得到一个全国性的胜利，按时间来说，比以前每一个时期都短，按照得到的胜利来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大，这就是因为我们党经过1942年、1943年的整风，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思想，全党空前一致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所以在短时期内就得到了伟大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十年了，这十年比较顺利，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完成了，又进入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速度，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里相比，也是比较快的。

四十年来党的整个历史很清楚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和作用，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我们党就要犯错误，革命就遭受失败；党如果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来进行工作，革命事业就会得到发展和胜利。把整个历史回想一下，就能很清楚的看出这一点。所以我们把学习毛泽东思想作为学习党史的中心任务，是不应该有任何怀疑的。

我现在要讲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通过学习党史来初步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任务怎么样才能达到？我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主要的方法就是，一开始就要努力用毛泽东同志的方法来学习党史，也就是说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学习党史，或者说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学习党史。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首先应该了解一下：毛主席是怎样看待党史的？我们就是要根据他的看法来学习党史，只有根据这个观点来学才能学得好。

毛主席是怎样看待党史的呢？毛主席自己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到，我们党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毛主席是这样给党史下了定义，这就提供了我们学习党史的方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毛主席又说到，在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的先进人物学习马克思主

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观察中国的命运。这些话也说明毛主席对党史的看法，这个看法和上述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这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分不开的。东北有一个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只是一种社会学。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可分的部分，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这句话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讲过的。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叫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如果单讲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哲学也讲的，古代有自发的辩证唯物主义，俄国的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赫尔岑这些人也是有辩证唯物主义的。但都不是彻底科学的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所有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观点都没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讲到无产阶级世界观，主要是讲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我们党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历史，这个历史开端于五四运动以后，一些先进人物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中国的命运。毛主席是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中国命运的伟大代表、伟大典范。除了毛主席以外，还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毛主席是主要的代表，所以我们常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互相结合起来的思想，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就不能不发展，因为一种普遍真理和新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它就不仅仅是一个运用问题，一结合就必然在各方面有新的发挥、新的展开，就必然有新的发展。

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不仅仅在中国有意义，而且要肯定是有国际意义的，原因是中国革命是有典型性、代表性的。中国革命的经验不能够说仅仅是特殊的。有没有人认为中国革命经验仅仅是特殊经验呢？是有人这样看的。一直到现在也有人这样看。比如有人认为只有俄国的革命经验才有国际意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经验，虽然对马克思主义有所贡献，但是都是特殊经验。我们学习党史应该反对这种看法，否定这种看法。我们应该肯定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有普遍意义，1957 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里也论证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的普遍意义。但是必须认识到中国经验也有普遍意义，从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经验都有很多普遍意义的东西。现在世界上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要起来革命，甚至于有些所谓已经独立起来的国家，像印度、印尼，由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人民还要起来革命。这些国家的革命首先是要学中国的经验，还是学过去俄国的革命经验？当然俄国的革命经验也要学，但是中国的革命经验对他们更亲切一些。因为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国家，与现在殖民地国家有共同点。更重要的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经验更全面，特别是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经验比俄国革命的经验更全面，这些经验对现在处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人民来说更直接一些，所以，毛泽东思想就必然具有一定国际意义的思想。当然这个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和中国革命的具

体实践结合的结果,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中国命运的结果。但这个思想为其他正在进行革命斗争的世界各国人民提供的典范，就是告诉他们如何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他们自己国家的命运。我们学习党史的时候应该充分估计到毛泽东思想在国际上的重要意义。

党史既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因此我们学习党史就是要学习毛主席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学习毛主席如何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的命运。这就是我们学习党史必须采取的观点和方法。这就是说，我们经常要注意到：我们的党史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历史。我们这样来了解党史，这样来学习党史，努力自觉地这样做，就可能对毛泽东思想更容易掌握一些。

这里要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不是平静无事，不是完全顺利的，而是充满矛盾的，是曲折的，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因此学习党史的时候，我们的中心任务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在中国得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如何形成和发展，同时要注意到，在形成和发展中经过一些什么斗争。在我们党和毛主席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中国命运的时候，在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过程中，不能不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同各种错误思想斗争，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党史看做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几十年来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它的最根本的东西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学习党史的中心环节是哲学问

题、世界观问题、是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结合的问题，是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中国命运的问题，所以学习党史要抓住哲学环节，抓住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在中国被运用，被发展，如何进行斗争这样一个环节，这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我们党在历史上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大的胜利，是因为我们掌握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哲学思想。

因此，我们学习党史，要着重抓住无产阶级世界观，抓住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环节，多研究在革命发展的每一个时期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是怎样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中国问题，分析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从这样的角度来学习，就会使我们理解更深刻一些。

今天我就要讲一讲在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毛主席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来解决革命问题。主要分为三个问题：(一)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的问题；(二)坚持彻底的辩证法问题；(三)坚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问题。

我认为学习党史要抓住这三个问题：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中，如何坚持彻底唯物主义，如何坚持彻底辩证法，如何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具体问题是很多的，党史的具体问题是包罗万象，有经济问题、文化问题、文艺问题等等，在六个月的时间内，不能把每一个问题都当做重点，我们学习是以两个阶段、三条总路线为纲，在这个学习方向下，主要是抓住彻底唯物主义问题，彻底辩证法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几个问题。

## 二、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的问题

彻底唯物主义，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

义为什么是彻底的？因为它一方面和辩证法结合，是辩证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推广到社会历史方面，又是历史唯物主义。不和辩证法结合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不讲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彻底，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如果不是唯物主义的，怎能算彻底的唯物主义呢？

毛主席在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问题上，一方面反对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又反对了机械唯物主义，首先当然是反对唯心主义。我们学习党史也应该看到这一点：毛主席在理论工作、实际工作上，在观察问题、分析形势、解决问题、指导工作这些过程中，努力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原则，反对任何唯心主义偏向。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恩格斯当时讲的时候，主要是讲到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方面，运用到社会历史方面，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对自然界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对人类历史也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关于哲学的党性这一章里也讲到这个问题。

应该指出，所谓要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方面，不仅仅是指用唯物主义来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作理论上的说明，而且还在于要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使它成为指导行动和斗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唯物论也应该是行动的指南。这一点特别重要，但人们往往不很注意。从党史来看，从毛泽东思想来看，这一点是尤其清楚的。

毛主席非常注重把唯物主义原则当做行动的指南，在行动中贯彻唯物主义。1957 年的莫斯科会议宣言指出，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是当前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迫切任务。这个思想

是毛主席的思想，在一个国际文件中特别提出来要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是有重要意义的，值得我们很好研究。如果马克思主义仅仅贯彻在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论研究上，是不够的，因为只停止在理论上，没有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没有变成行动中的唯物主义，还不能够说最彻底。毛泽东思想可以说是充分地贯彻了这样的思想：把唯物主义体现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行动中，作为行动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是用唯物主义原则来指导行动的。在分析形势，制定政策，指导行动的时候，都是坚持唯物主义原则。但毛主席在这个方面作了许多重要的新的阐发。把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原则，当做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百多年来的经验加以总结，写在国际文件上，这也是第一次。

在思想斗争方面，毛主席经常不断地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以前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唯心主义，多半着重在理论方面，学术方面。毛主席在学术理论方面对唯心主义也有批判，但是更多的是批判在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也就是主观主义。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党史从头到尾贯穿着一条红线，就是自始至终对种种唯心主义，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毛主席对这个斗争作了系统的总结，指出主观主义是人民的大敌，民族的大敌，共产党的大敌。这不能不说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新贡献。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毛主席就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文章是第一次在理论上提出来的反对主观主义。

对我们中国革命来说，对中国的无产阶级来说，40多年来，危害最大的唯心主义是哪一种呢？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学术上的唯

心主义当然有危险，这方面的批判是不少的，但是更大的危险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工作的成败。所以毛主席用很大的力量，甚至用主要力量来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对这种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加以分析，加以研究，从理论上加以分析批判。

毛主席曾指出主观主义——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有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有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在《实践论》里所反对的经验主义是带有唯物主义性质的，这种经验主义相信经验是能够反映客观事实，它的经验，它的实践是客观的，问题是它反映的是狭隘的经验，它满足于个人的经验，不把它提高到理论上认识，这种狭隘的经验到处搬家，最后变成为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主义，因为它否认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它轻视实践，轻视感性认识。

毛主席在整个党的历史中一贯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发展唯物主义。他不但在一般原则上提出坚持唯物主义，而且对如何坚持唯物主义，也提出了一些具体原则，这些原则在他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里就讲到了，这篇文章虽然很简单，但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他说，主观主义就是指的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的时候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反过来说，坚持唯物主义就是要在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的时候要坚持唯物主义。毛主席提出许多行动的唯物主义的口号，比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有的放矢"、"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等等，这是实际工作中的唯物主义原则。

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里，毛主席对实际工作中坚持唯物主义的原则已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这篇文章规定了

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唯物主义原则的两个方面：

首先是分析形势，指导工作方面。分析形势是分析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分析阶级斗争形势、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方法是对社会政治和经济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国际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以及阶级斗争的形势加以分析。这是认识客观情况、分析形势，包括分析经济形势政治形势、阶级力量的对比的问题。政治形势主要是阶级形势，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根据分析的结果规定我们指导工作的原则，也就是规定路线、政策、计划等等。指导工作的原则是要根据对形势的分析来规定的。在革命时期，指导工作原则的主要内容就是要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用毛主席最初一篇文章的说法就是分清敌友的问题，肯定我们把谁当做敌人，把谁当做朋友，集中哪一些力量，反对哪一些力量的问题。这些原则要根据唯物主义的原则，首先要正确分析客观形势，然后根据这个分析来规定我们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再集中哪些力量来反对哪些力量。在我们党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自始至终运用了这个方法。

我们的党史可以说是这样的过程：以毛主席为代表，我们的党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对国内国际的经济、政治形势、阶级斗争形势进行不断的分析，根据这种分析的结果，制定我们的斗争路线，来指导我们的工作，使我们由胜利走向胜利。

主观主义的错误就是不能够正确地估计形势，不能够正确地估计阶级斗争的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因此，也就不能够正确地规定指导工作和斗争的方针、路线。在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等战略策略上犯了错误，因此使革命遭受了损失。

我们学习党史，是不是可以按照这样的原则学，就是学习我

们党在几十年来的革命过程中，如何不断的分析复杂的形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原则来不断的分析政治形势和阶级斗争的形势，并且根据分析的结果，制定指导工作的方针政策，运用适合不同形势的战略策略，来胜利地指导我们的斗争。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的战略策略是怎样规定的呢？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有一条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大体上在《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已经有了。找到这条总路线的方法是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从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到无产阶级，一个一个加以分析，根据分析的结果，提出一个总的原则：在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动摇性。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民主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个总的战略策略路线是怎么来的呢？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分析形势的结果而制定出来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二十几年过程中，这一条总路线是贯彻到底的。但是在二十几年中分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阶级力量对比有变化，在具体政策上也有变化，比如对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有时联合，有时分裂，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都是根据形势的不同，阶级斗争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总路线对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是普遍的，但是，具体政策随着不同时期的变化也有所不同。

因此，我们学习党史，要经常注意到我们党在每个时期当政治形势、阶级斗争形势变化以后，我们如何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而在策略上工作指导上做出不同的布置。同时也要注意从

反面来看，违背了上述原则，如何产生主观主义的错误。主观主义者是我们的反面教员，研究他们怎样在估计形势，估计阶级斗争的力量，在规定指导工作方针的时候，如何违背了唯物主义原则，如何走向了主观主义，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是正确的。总之，我们学习党史，在思想方法上首先就是要注意研究在党的历史上，毛主席和我们党如何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在行动中如何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如何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首先是要坚决反对唯心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的特点之一，是除了在理论方面反对唯心主义之外，还特别着重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除了反对唯心主义以外，也要反对机械唯物主义，或者说要跟机械唯物主义划清界限。唯心主义是第一个敌人，机械唯物主义也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必须反对的错误思想。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到，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分裂，都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为特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讲两条战线的斗争，第一条是反对唯心主义，第二条是反对机械唯物主义。首先是反对唯心主义，为了反对唯心主义，为了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也要反对机械唯物主义。

我们以前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有一个缺点，反对唯心主义比较彻底，但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就很不够。我们从最近的哲学教科书讨论中，所得到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更深入地看清楚了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反对唯心主义以外，也要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并且发现我们以前在反对机械唯物主义这一方面的斗争注意得很不够，甚至有时候不注意，有时候对辩证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界限划不清楚，有时候把辩证唯物主义讲成机械唯物主义，或者把机械唯物主义当成辩证唯物主义来讲。所以我们现在感觉到

应该在这一方面加以注意。实际上毛主席在《实践论》里提的很明显，毛泽东思想也包含反对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所以在研究党史的时候，也要注意反对机械唯物主义的问题。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没有共同点的，两者的根本观点是完全相反的。但是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有共同点的。以前对这个问题之所以划不清，就是因为有共同点，有时就混淆起来。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共同点是：肯定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客观是第一性，主观是第二性，肯定人的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也就是肯定了反映论的基本原则，这是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共同点，所以我们在过去讲哲学的时候，认为只要把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讲清楚了，只要把认识论反映论的最根本原则讲清楚了，把主观必须反映客观的原则弄清楚了，这就够了，更多的东西就不讲了，或者讲得很少，因此有时就把辩证唯物主义讲成机械唯物主义，或者是停止在唯物主义最起码的原则上，不能进一步展开。事实上，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即坚持彻底唯物主义，不能够仅仅停止在唯物主义的基本的最起码的原则上。也就是说，不能仅仅满足于解释清楚认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应该反映客观的这个原则，这样还是不够的。对于彻底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反映的问题，而不是应不应该反映，一切唯物主义都肯定主观应该反映客观，但问题是如何才能正确反映。机械唯物主义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真正解决。机械唯物主义只肯定主观应该反映客观，但如何反映的问题，它不能正确解决，它不能最后解决反映论的问题，所以它是不彻底的。

为什么机械唯物主义不能够最后解决反映论的问题呢？因为机械唯物主义对主观反映客观的看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看法是相

反的，机械唯物主义把主观反映客观看成是个人对客观世界观察的结果。机械唯物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是个人主义思想。个人主义看问题，个人主义世界观看世界是从个人出发。机械唯物主义把人看做是孤立的单纯生物的个人，人的认识也就是个人观察的结果。因此在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上所理解的认识，并不是社会实践行动获得的认识，而是一种纯粹个人的观察。就像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所说的：过去的唯物主义不知道主体的作用，只是纯客观的观察，一个人坐在这里以旁观的态度来看世界，人就像镜子一样，把外界世界的事物消极地反映到镜子里面来，这是旧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根本的特点和缺点。这种特点就是机械的、消极的反映论。旧的唯物主义就是这样看待主观和客观的问题的。因此它不能够真正解决反映论的问题。因为个人的感觉是有限的，他不能够全面地认识世界，而且一个旁观者看世界只能够看到世界的表面，而不能看到世界的本质，不能看到世界的规律。你要认识世界的本质，认识世界的规律，你就要改变世界，在改变的过程中，你才能够知道它的规律和本质是什么。因为个人接触只能够看到表面的局部现象，不是通过广大群众的斗争，不能够发现它的本质。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是经验主义，是离开社会实践来看问题的错误方法。

所以说，机械唯物主义虽然相信经验是从客观来的，可是他们把经验看做静观的结果、个人观察的结果，因此也就不可能认识事物的全面，认识事物的本质。《实践论》里就批判了这种经验论。经验主义就是机械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的一种表现。

机械唯物主义在解决主观如何反映客观问题上，是不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跟机械唯物主义完全相反，辩证唯物主义首先把实践当做认识的基础。实践是辩证唯物主义认

识论的第一个观点，也是最根本的观点。人类认识依赖于实践。所谓实践是讲社会生产实践、革命实践——阶级斗争以及各种政治斗争，主要是讲人民群众的斗争。当然反动派的斗争也是实践。但是，社会历史上大量的实践，是生产实践，人民群众阶级斗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以生产实践、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实践为基础。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是认识的基础、认识的无穷无尽的来源。有了人民群众的实践作基础，那么人的认识就不会陷于表面性、片面性的缺点，就可以避免这种缺点。马克思主义者是强调认识总是从直接实践中来的。但是，所谓直接实践不是限于个人实践。认识最初的根源是实践，马克思主义者要把群众的实践当做自己智慧的根本来源，把群众斗争当做自己认识的最根本的来源，不是单纯依靠个人的经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仅仅依靠个人的经验，依靠个人的知识或者是少数人的知识，少数人的经验，观察问题、解决问题。

这里就有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区别。毛泽东思想是以彻底革命的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在认识论上不是消极的反映论，而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讲到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就是在改变世界的斗争中去认识世界，认识的结果，也是为实践服务，为斗争服务。首先是改变世界的斗争，在斗争中积累经验，把经验加以总结，就提高了认识，又用这个认识去指导斗争，开展斗争，然后再总结经验，这样不断地反复，就使思想进一步地提高，认识一步一步地发展。所以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认识发展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一刻也不能离开实践。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实践，我们不要解释为个人的实践，要看做是社会实践，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实践，主要是广大劳动

群众斗争的实践。

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面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把认识论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认识论和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群众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或者说群众路线的核心就是能动的反映论。怎么样走群众路线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讲得很清楚。要想走群众路线，根本的方法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群众路线有几条原则，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但贯穿一切的最根本的一条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就是《实践论》里讲的那些思想。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然后把经验总结起来变成理论，用理论去指导实践，然后又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又总结经验，又指导实践，是这样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运用这样的认识规律来领导群众，然后才能够把群众发动起来，把群众的高度积极性发挥出来。如果没有这一条，那群众路线的灵魂就没有了。你虽然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可是在工作中不会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没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种方法，你那一套为人民服务的好心是会落空的，是没有效果的，是起不了作用的。

人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首先是从群众中来的。当然，群众的知识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因此，领导者就很重要，要领导者善于把群众最初创造的经验知识加以总结，变成指导思想，使群众得到正确的领导。

群众路线的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是否相信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与群众路线分不开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思想自始至终贯穿着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相信群众是伟大的创造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我们不但可以得到克服一切困难的无穷力量，而且可以得到解决一切问

题的无穷智慧。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可能对群众运动有这样片面的看法：我们把群众发动起来，主要是为了集中强大的力量打倒敌人。而忽略了另外一方面，即把群众发动起来，使我们获得克服任何困难问题的无穷智慧的泉源。群众不仅仅是人类力量的无穷无尽的泉源，而且也是人类智慧的无限丰富的泉源。前一点人们比较容易认识，后一点很多人却不注意。毛主席对一切工作采取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目的不仅是能够集中最强大的力量打倒敌人，而且是能够集中最丰富智慧的泉源，使我们党的认识能够提高，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它从开始到最后，是不断发展的，在革命的每个时期，都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原则。这些原则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但都是新鲜的。我们大家在党内生活这么多年，自己也可以体会到，在革命运动或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都会发现一些新问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提出新的阐明，使我们的思想得到一个新的进展，使我们在认识上更上一层楼。我自己是有这样体会的。

我们如果有意识地这样来读《毛泽东选集》，从毛主席最初的文章到最后的文章，仔细读一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体会，革命每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原则和党的战略策略总是提出些新的观点，使我们的思想进一步丰富起来，使我们的认识能够提高一步。这些新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呢？都是从群众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在认识上不断丰富和发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表现。我们学习“毛选”要学习每个时期的革命实践、人民群众的斗争如何在毛泽东思想里做出新的反映、在党的思想上做出新的反映，如何使认识提高，使马克思主义常常得到新的发展。认识不能跟群众实践密切联系起来，认识就会

有片面性、主观性，就会犯错误，就不可能使认识向前发展，就会停顿于老一套，因为人的智慧要想发展，要使自己的认识提高，一定使自己的思想跟自己的泉源不要割断，要经常和这泉源相联系，否则人的思想就会停滞和贫乏起来。如果我们用正确的方法学习党史，仔细研究毛主席的著作，我们就会深刻地体会到这种情形。

研究党史要注意到我们党首先是毛主席如何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特别是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反对把认识当做个人消极的反映。不了解人的认识是在群众斗争中实践的过程、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在群众实践中去取得认识，就会犯错误。从党史学习中应该充分吸取这种教训，使我们深刻地理解到在任何时候都不要使我们的认识离开群众，离开认识最根本的来源，离开我们智慧最根本的来源。这个问题跟主观能动性有关系。机械唯物主义不重视主观能动作用，也就是不大重视人民群众高度积极性的发挥、人民群众自觉的努力，不了解广大群众主观的能动性充分发挥的结果，可以解决各式各样平常不能解决的问题。机械唯物主义者只能够认识这一点：人的主观应该反映客观事物，但不了解人首先应该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去认识世界。他们只能了解到客观第一、主观第二，不了解主观对客观的反作用——主观能动作用，不了解这个反作用的高度重要性，不了解它在一定时候起主导作用。关于这个问题，《矛盾论》里讲得很清楚。《矛盾论》里“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一节中，讲到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区别。机械唯物主义只知道客观物质是主要的，不懂得主观精神在一定条件下也起主要的作用，当然物质条件是一个客观基础，起最后决定作用，是第一性的东西。但主观力量在某种条件下也能起主导作用。

如政治思想工作对人的行动就能起主导作用，这也正是人的主观力量起主导作用。

## 三、坚持彻底的辩证法的问题

我们要从党史里，学习毛主席以及党中央如何坚持彻底的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

辩证法和唯物论是分不开的。我们为了说明的便利，分成两个问题来讲，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我们在前面讲坚持彻底唯物论问题，讲到毛主席提出的一些根本原则，就是要经常注意分析经济形势、政治形势、阶级斗争形势，估计阶级对比的状况，然后制定指导工作的方针。这是唯物论，同时也是辩证法。坚持正确分析经济形势、政治形势、阶级斗争的形势的发展，就是坚持唯物主义。至于如何坚持，如何分析，就是辩证法的问题。

所谓分析，主要就是阶级的分析，就是对各种各样矛盾的分析。而分析阶级、分析矛盾的方法，就是辩证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里也讲到这个问题，他说要对社会经济作一些调查研究，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也是辩证法的方法。因为阶级斗争就是社会历史矛盾的表现，阶级分析就是分析矛盾的方法。所以毛泽东思想的方法也不是什么神秘难懂的，他的思想方法就是坚决贯彻矛盾分析、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形势变化的时候，对形势的矛盾分析也跟着发生变化。在每一个新的时期，要对阶级力量的对比和矛盾的关系作重新的分析。政治形势每变化一次，对矛盾的分析也要重新来一次。这个方法，在《毛泽东选集》里是非常明显的，大家如果有意识地注意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中国的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农民阶级作了分析，分清了富农、中农、贫民，指出了谁是革命的先锋，这些都是矛盾的分析法。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对阶级斗争重新分析了一次。进行土地革命时，毛主席又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在抗日战争前夜，这时的形势又有了变化，毛主席又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对国内外的敌我矛盾又分析了一次。一直到最后的人民解放战争，到全国胜利后，又有了新的分析。在全国胜利以前和以后，矛盾的分析有很大不同。在以前，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四个朋友三个敌人"，在1949年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限制和反限制的矛盾。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指导工作、制定政策的基础，还是根据矛盾的分析。毛主席又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矛盾，作了具体分析，并明确地提出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指出这些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彻底贯彻辩证法的方法，彻底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是贯穿我们整个党史的指导思想的特点。我们学习党史，就是要学习毛主席如何自始至终坚持辩证法。从中国革命开始一直到现在，对一切问题一贯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不掩盖矛盾，不回避矛盾，而是要敢于正视矛盾，并充分揭开矛盾。有时矛盾是隐蔽的，这就要采取一定措施来揭露矛盾，以便解决

矛盾。分析矛盾，揭露矛盾，展开斗争，解决矛盾，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方法，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方法。是不是也是斯大林的方法呢？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这个方法，但不够彻底。

在辩证法的彻底性上来说，毛主席的思想是表现得最突出的。在以前，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勇气敢说一万年还有人民内部矛盾，还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说到。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以前，世界上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当然，马克思、列宁活到今天，他们也会这样讲的，问题是他们不在了。现在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讲，毛主席讲出来了，这一点也就可以说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了辩证法，而只有彻底坚持辩证法，才能发展辩证法。

关于坚持彻底的辩证法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是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从思想方法到工作作风始终贯彻辩证法或矛盾分析法的问题。

首先，是坚决贯彻矛盾的普遍性的原则。所谓矛盾普遍性的原则，用毛主席的话来讲，就是一切事物都有矛盾，每一事物的发展自始至终都有矛盾。因此，对任何事物的研究，都要贯彻自始至终的矛盾的分析。对一个事物发展的过程也好，对一个革命运动也好，自始至终都要贯彻对矛盾的分析。揭露、展开、最后解决矛盾的原则，不管是民主革命时期也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好，不管是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也好，只要客观情况有变化，就要把矛盾重新全面地分析一下，我们从毛主席著作中可以看到这个特点。这样的分析使我们的认识任何时

候也不是呆板的，而是非常灵活的，工作指导也是非常灵活的。民主革命时期分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矛盾运动的具体情况不同，分析也就有所不同，而根据这种分析的结果所提出来的策略方针，工作指导也各有差异。当然，这是在同一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所作分析的结果，具体的战略、策略，尽管有所改变，根本的革命性质不能够改变。革命的总路线基本上也是一致的。例如抗日战争以后，到了解放战争阶段，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没有了，可是仍然有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关于矛盾的普遍性问题，过去我们党跟教条主义斗争的时候，矛盾的普遍性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还不很突出。毛主席在写《矛盾论》的时候特别指出要注意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因为那时的教条主义忽视中国革命的矛盾的特殊性。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教条主义者都不重视中国的特点，所以毛主席的《矛盾论》在论述矛盾的普遍性之后，特别强调了矛盾的特殊性的重要意义。

矛盾特殊性的原则，就是一方面要自始至终肯定矛盾、分析矛盾，但在每个情况变化时，都要注意矛盾的特点。矛盾的特殊性和矛盾的普遍性是分不开的，是矛盾分析方法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贯彻自始至终的矛盾分析，另方面情况每有变化就要重新对矛盾再作全面的分析，每次分析都要指出一些矛盾的新的特点。贯彻矛盾的普遍性跟坚持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这是密切联系的、不可分的。不注意矛盾的特殊性，也就不可能真正作到自始至终的矛盾分析。我们学习党史，应该注意这样的情形：整个党史的过程，是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不断变化的过程，毛主席和我们党在认识上，总是随着这种变化不断地对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做出新的分析，不断指出矛盾新的特点，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来规定如

何展开斗争，提出如何解决具体矛盾的方法。

认识矛盾的特殊性为什么重要呢？重要就在于矛盾特殊性直接涉及我们解决矛盾的斗争方法问题，不同的矛盾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对矛盾特殊性认识错了，斗争的方法搞错了，矛盾就不能够解决。比如把对抗性矛盾看成非对抗性矛盾，把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看成是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就一心一意想用非对抗的方法来解决，总是希望在桌子面上解决问题。暂时妥协是可以的，彻底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党内的同志犯了错误，在群众的批评下作个检讨，检讨了矛盾也就解决了。如果不检讨那就成问题了，就有可能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这就是说，不同的矛盾只有用不同的方法解决，而不能够混淆，所以矛盾的特殊性是很重要的，是直接涉及我们解决矛盾的方法，也直接涉及到工作方法，涉及行动的成败。如何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毛主席讲得很清楚，我们还可以从党史和毛主席著作里充分学习到，这里用不着解释了。

这里顺便讲一下，毛主席对矛盾的特殊性的分析，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对矛盾的特殊性不仅仅从质的方面来分析，而且还从量的方面来分析。毛主席在分析矛盾时，经常注意到多数和少数的问题。土地改革时注意这个问题，“三反”、“五反”时注意这个问题，农村合作化时注意这个问题。分析矛盾，不仅是要分析有这样的阶级，那样的阶级，不仅仅分析当前运动中包含哪些阶级，这些阶级的趋向有什么不同，这个阶级与那个阶级有什么质的不同，而且要具体分析这个阶级的人数占多少，那个阶层的人数占多少，哪些阶级是多数，哪些阶级是少数，哪些阶层是多数，哪些阶层是少数。毛主席是一贯地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这样就把社会矛盾的分析提高到科学的精密程度。因为科学是要计算数量

的，科学规律知识不但在质的方面区别事物，而且在量的方面能够加以计算。毛主席经常讲“胸中有数”，就是对矛盾有量的方面的估计。这样才能够掌握每个时期矛盾的特殊性。

量的掌握重要在什么地方呢？重要就在于我们掌握矛盾的量的对比之后，就可以使我们政策的规定能够得到精密的科学基础。我们的政策、战略、策略，怎样规定才能够正确呢？凡是正确的政策、战略、策略，都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在于实行这种战略、策略和政策能够保证我们集中最大的力量，把敌人的力量最大地孤立起来，这样，我们就能够比较容易地战胜敌人。社会主义建设是对自然斗争。但是，对自然斗争也要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把反对势力缩到最小，把它孤立起来，然后才能用最大的力量向自然进行斗争，使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达到多快好省的标准。所以战略、策略的原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为了规定这个原则，是不是需要对矛盾的数量方面作正确的估计呢？那是完全需要的。如果数量方面没有正确的估计，有时把多数估计为少数，把少数估计为多数，就可能对战略、策略做出错误的决定。

右倾机会主义为什么产生？原因之一就是在思想上对矛盾各方面的数量估计颠倒了。右倾机会主义往往对自己可能团结的力量估计过低了，而对敌人这方面估计过高，因此产生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左”倾机会主义则相反，他们根本不考虑团结大多数人民和孤立敌人的问题的，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过低估计了敌人的力量。错误的战略、策略、政策的来源之一，在思想上有这么一方面，就是对矛盾各方面的数量估计不准确。

所以，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工作的时候，要经常分析多数和少数问题，经常注意把打击面缩小到最低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根据矛盾总的量的分析的结果，这是非常精密的分

析，把辩证法真正提高到科学的水平。所以在学党史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一方面的思想。

关于坚持彻底辩证法的第二个问题，辩证法的矛盾分析的方法不但贯彻在思想方法方面，而且贯彻在工作方法方面。所谓思想方法，就是矛盾分析的方法，就是要求对事物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把统一的东西分裂为二。也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认识矛盾的各个方面。毛主席把这种方法用更加简单明了的、形象化地加以表达，叫做“两点论”。不论研究什么问题，首先分作正反两点，正反两点各自又可以再分为正反两点。我们要在思想方法方面贯彻辩证法、贯彻“两点论”。上面讲矛盾的普遍性时已讲到这个问题，现在要特别解释的是关于工作方法问题。

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是密切联系的，思想方法要贯彻辩证法，工作方法也要贯彻彻底辩证的、科学的方法，也要贯彻“两点论”，贯彻统一物分裂为二的方法。客观事物有矛盾，有两点论。因此处理矛盾的工作方法也应该掌握两点，也要全面地来对待问题。比如对资产阶级用两面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对反动的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也是两面政策，有联合、有分裂，在一定的条件下还要联合。哲学斗争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唯心主义，也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帝国主义有两手，我们也有两手，有尖锐的斗争，也有谈判。要把辩证法用到工作方法上，自觉地使用两手。

为什么一定要用两手呢？因为事物有两面性，我们的斗争对象有两面性。当然最后目的只有一个：消灭敌人。但在没有消灭以前，他对待我们有两手，他要战争也装要和平，我们和他针锋相对，既不怕战争，也力争和平。工作方法之所以有两面，是因为客观事物有两面，片面的工作方法不能解决矛盾。我们对民族

资产阶级为什么有两面？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本身有反动性又有进步性两面，我们对它也有两面，你反动时，我就斗争，你进步时，我就联合。对敌人也要有两手，因为敌人有两手，我们也有两手，如果不自觉地运用两手，也会被迫运用两手。辩证法要求我们自觉地运用两手，又斗争又谈判；这里斗争，那里谈判；一个时候斗争，那个时候谈判。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合乎客观规律，就能够取得主动。

也有这种情况，原来只有一手，但到了情况发生变化，就要被迫搞另一手，就不是辩证法，那是从一个片面到另外一个片面。过去的教条主义者王明，他有时“左”得很，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完全右了。这是由形而上学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那不是辩证法，那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片面方法是不能长期坚持的，到一定时候就不能不被迫走到另一片面。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形而上学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是掌握了辩证法。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掌握辩证法，根据客观事物的两重性，主观的工作方法也适时地掌握两点，两条腿走路就是工作方法上的两点论，这是自觉的彻底的辩证法。

自觉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一个片面被迫走到另一片面，这是两回事，不能混淆，要加以区别。自觉的辩证法是主动地、灵活地掌握全面的方法，形而上学由一个片面到另一片面，始终仍是片面的方法。

## 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学习方法问题。为什么要特别说一下呢？因为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心问题。学习党史，学习毛主席著作除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学习之外，还应当

特别注意一下毛泽东思想如何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区别，首先集中在革命问题上，在国家学说的问题上。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跟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它的中心问题也都集中在革命和国家学说的问题上。

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学说，资产阶级也讲，它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资产阶级学者也有人运用阶级观点（自然是不完全的）来分析社会，分析历史。所以，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区别的集中点，不在于是不是讲阶级的问题。当然，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是否认阶级斗争的。比如，实用主义者就否认阶级斗争的真实性，把阶级斗争看做是人为的现象，好像是因为人们在理论上创造了阶级斗争学说，因此才会在事实上挑起阶级斗争，如果人们在理论上不讲阶级斗争，在理论上否认阶级斗争，就不会有阶级斗争了。但是，资产阶级在进步时期，它的历史家们也讲过阶级斗争的问题，所以，单单说阶级斗争的问题，不能区别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区别的中心点是：阶级斗争是不是要引导到革命，又经过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中心问题。

列宁主义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斯大林在《列宁主义基础》里讲得好：列宁主义学说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里面贡献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就像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有了新的贡献一样，毛泽东同志也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上有了新的贡献。所以，学习党史，学习毛泽东思想，除了注意到毛主席怎么样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来解决中国的具体实

践问题之外，还应该特别注意一下毛主席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方面有什么新的贡献。我想注意一下这个方面，从这一方面进行研究，是有好处的。

首先谈无产阶级革命问题。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提出了如何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个思想的主要特点是：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就应该抓紧领导，应该向资产阶级夺取领导权，要把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和广大农民建立联盟，这样就能保证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使革命进一步发展，使它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

毛主席的思想是继承了列宁的不断革命思想，又对它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在革命方面，毛主席坚持了列宁的原则，坚持民主革命一定要由无产阶级领导，要和农民建立最广泛的联盟，同时又发展和资产阶级建立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思想。统一战线方面，毛主席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在这里谈到中国革命的三个法宝，这就是党的建设，革命军队和统一战线。统一战线，这是一个新的贡献。在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问题上和资产阶级联合，但领导权一定要坚决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又要和资产阶级斗争。

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如果不和农民建立联盟，那么，在现代帝国主义时期，就不能实现革命的胜利，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能实现。如果革命是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也可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资产阶级不能真正实现革命的任务。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讲到这个问题。在帝国主义时期，如果无产阶级不领导革命，而由资产阶级领导，并由此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最后结果还是走向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会真正建立独立的国家，不

会使真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得到胜利。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提出了这个规律。

有一个时期，有一些人怀疑毛主席的这个思想好像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某种条件下，资产阶级领导革命，实现了资产阶级专政，也能够使一个国家走向独立自由的道路上去。这个怀疑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个时期内出现的。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这些国家，它们跟帝国主义斗争，斗争的结果资产阶级得到一定的胜利，掌握了政权，帝国主义让步了。这些国家看起来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好像民族革命的任务真正实现了，从这里就产生了怀疑的思想，觉得毛主席的上述观点好像仅仅有中国的意义。但是，目前历史的发展证明毛主席的观点仍然是正确的。

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结果怎么样呢？这些国家的生产发展了吗？社会进步了吗？独立的问题真正解决了吗？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没有解决，所以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要利用反共的办法来压制人民，来解决统治者自己跟人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它走向反共之后，他们的国家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怎么样呢？虽然已经不是从前那种殖民地的关系，但还是一种依赖关系，这是很清楚的。当然，和从前直接作殖民地情况有些不同，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仍有一定的矛盾，因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和帝国主义有一定的矛盾，有些民族独立国家里搞得比较好的，是没有把革命停顿下来，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斗争还保持着，还组织了武装。因此我们对这些国家还是采取又斗争又联合的方针，还是把它和帝国主义加以区别，跟过去的殖民地政府加以区别。

问题是我们要在思想上清楚地了解这些国家因为是资产阶级

掌握政权，它就没有解决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广大人民所要求解决的革命问题。连民族独立的任务也没有解决，民主问题更谈不上，印度的农民还是受地主的剥削，并没有搞土地改革。有些国家，革命任务并没有真正实现，只是一些大资产阶级占了便宜，广大人民所要求的民主革命并没有实现。

根据上面这些例子可以证明：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是正确的，是有普遍意义的，不仅是对中国适用，而且在当代，在国际上也是适用的，对当前正在进行革命斗争的国家是有现实意义的。这就是说，在帝国主义时代，如果无产阶级不坚决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就不但没有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没有民主革命。如果否认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就是否认革命。

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不要革命的，它就是通过反对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来断送革命。我们党的历史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不要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事实上，列宁在20世纪初已经初步提出了这种思想：那个时候俄国的资产阶级是反动的，但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在那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如果不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让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当然不会有真正的革命，二月革命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它的方向是反动的。所以，要革命，就要无产阶级坚决领导革命，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结果，就使革命能够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及时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能实现不断革命的原则。这里有着右倾机会主义者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点，是右倾机会主义跟毛泽东思想分歧的中心点之一。这个问题不仅是在1927年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时候存在，抗日战争初期也存在。

党的历史上反对过“左”倾机会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和正

确路线的分歧，在如何领导革命，如何进行革命，这个分歧涉及革命阶段论的问题。“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特点之一是不注意革命是有阶段性的。民主革命时期是应该集中力量来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企图过早超过民主革命阶段，过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危险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民主革命阶段急于想搞社会主义革命，就会脱离群众。就在事实上放弃了对群众的领导权。

对农民关系来说，主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对农民的联盟问题。右倾机会主义根本不要农民，不要工农联盟。“左”倾机会主义也不懂得与农民建立联盟，在民主革命阶段提出某些超过这个阶段的任务，把自己孤立起来，得不到农民的同情，这就从事实上放弃了对农民的领导，放弃了对农民的联盟。

另外是政权问题，这个问题和革命领导权问题分不开，要革命就要无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结果，就是要使革命在胜利以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掌握国家领导权。不要革命，不要无产阶级领导，当然也就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资产阶级专政。陈独秀就不要无产阶级领导革命，他不要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而是要无产阶级给资产阶级抬轿子。正确的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在革命问题上，则一定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肯定了的思想。

无产阶级要建设社会主义，要走向共产主义，一定要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在政治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列宁对这一思想有了发展，这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中可以看到，他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下，可以首先经过工农民主专政，然后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不一定要立刻实现，在它之前，还可以有一个过

渡。这个思想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来，在列宁时代就有了这个经验。列宁写《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的时候，已经是帝国主义时代，是20世纪初了，这个时期的客观情况很明显，在这时期某些国家如果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能够胜利的。列宁提出的这个问题，毛主席进一步发展了，他提到在帝国主义时期，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就不能够胜利，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专政是根本不能使一个国家真正独立起来的。

列宁的思想在毛主席思想里有进一步的发展。这方面的发展是很多的，在俄国革命时期，工农民主专政思想实现的时间很短，那就是在二月革命以后两种政权时期，那时的苏维埃政权是带有工农民主专政性质的。在列宁的学说里，没有指出过新民主主义政权这样的问题。列宁只提到了工农民主专政。如果我们仅仅采用列宁的思想来指导中国革命就不够了，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有反帝国主义的问题，反帝就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如果在政权问题上仅仅提出工农民主专政，就不能完成，所以这个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情况下，就不能不有很大发展。1931年和1934年的教条主义，想简单地在中国运用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思想，他们采用了现成的书本原理，但没有注意到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因此和毛主席的思想有了分歧。毛主席的思想和“左”倾机会主义不同，基本上采用了工农民主专政思想，工农民主专政的原则，但是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个结合表现为一些新的提法，这个提法就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毛主席是非常辩证的，既采用普遍真理，又结合中国情况采取工农联盟，使工人和农民结合成为政权的基础，这样他

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这个思想是我们在1949年以前解放区能够稳固、能够发展的很重要的指导思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就不能正确地建立当时的解放区的政权。

解放区的政权形式也是变化的，如果解放区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算起，当时的苏维埃政府比较接近工农民主专政，因为那个时候的农村革命，在其初期，民族资产阶级完全脱离了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积极起来，是1931年抗日战争以后的事情。从1927年到1931年，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跟蒋介石走，到1931年“九一八”以后基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况。有一些资产阶级代表的行动改变得很明显，蔡元培是资产阶级代表，在“九一八”以前是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部长，参加国民党政权，“九一八”时挨了打，当时北方学生到南京请愿，没有找到陈立夫、陈果夫，找到了教育部，把蔡元培打了一顿。以后蔡元培竟转变了，不当教育部长了，搞了抗日救国运动，和宋庆龄一起搞民权保障大同盟，有许多人逐渐走到革命方面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仅仅采取工农民主专政的思想，就没有办法团结愿意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

1935年，我们党和毛主席，提出民主共和国的问题，这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抗日战争以后，政权的内容就更广泛一些。在《新民主主义论》里也讲了抗日阶级的联合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切抗日人民的联合政权。大家可以明白看到，毛主席的思想在政权问题上，是没有一点公式主义，也没有一点教条主义的。不像教条主义简单地采用工农民主政权的思想来解决一切问题。

毛主席关于政权的思想，在民主革命阶段是有一贯的线索，但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提法，这些都很值得我们作为思想方法来学习。抗日战争以前有一个提法，抗日战争时期有一种新的提法，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有新的提法。在这些提法中，有一个总的东西是共同的，就是无产阶级一定要领导，政权的基础一定是工农联盟。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另外参加一些革命的阶级，这些革命阶级是什么阶级，要看情况。在抗日战争初期，这些阶级包括一部分开明士绅，抗日战争以后就发生了变化，1949 年搞土地改革，国共谈判已经破裂了，对蒋介石政权由“洗脸”政策改变为“杀头”政策，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在后方要土改，这个时期毛主席最后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这个总路线，也就是少奇同志在庆祝国庆十周年文章里所提到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下建立起来的政权，具体内容可以有变化，时期不同，政权的内容、阶级力量的内容也有所不同。

政权问题，是社会阶级斗争的集中问题，社会阶级斗争集中在政权问题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权问题又是政治问题的集中点。阶级斗争形势，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阶级关系，规定政权的内容，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可以使政权也发生变化。毛主席非常重视政权在解决阶级矛盾问题中的巨大作用，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和取得政权后，就把政权作为解决阶级矛盾的武器。政权的内容是跟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

在民主革命阶段，政权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人民是有变化的，但无产阶级领导不变，工农联盟为基础也不变，在工农联盟以外，还有一些什么阶级参加政权就要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阶级力量对比而发生变化。因

此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政权的问题，不是简单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里很复杂、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思想里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怎样运用政权工具作为武器来解决阶级矛盾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毛主席根据中国十分复杂的情况，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的所没有解决的。在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怎样灵活运用政权工具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充分解决，马克思只是提出无产阶级应该建立自己的政权，列宁提出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有一个工农民主专政可以作为过渡，列宁没有谈到在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以前，可以采取像中国这样复杂的经常变化的情况。无产阶级专政是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才实现。在民主革命阶段，政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由民主革命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政权才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

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毛主席也有很重要的发展，这个发展主要是这样一点：毛主席提出了政权的两方面的任务，一是对待反动阶级的镇压的任务，一是对待人民，国家用民主的方法教育他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是解决敌我矛盾，一方面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一般地说政权是解决阶级矛盾的工具，资产阶级也有政权，他用来解决资产阶级要解决的矛盾，无产阶级是用来解决无产阶级要解决的矛盾。但在阶级社会里，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时期，专政所要解决的问题差不多就是一个敌我矛盾问题。资产阶级政权，是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政权就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镇压敌人，一方面教育人民、组织人民。无产阶级专政，既是专政的工具，又是民主的工具。这就是人民民

主专政。这个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新的发展，这个发展把国家的理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这也是非常伟大的创造。

无产阶级国家是解决敌我矛盾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工具，两种矛盾都是集中在国家问题上来解决，这个思想的境界是非常高的，国家问题不简单是政权问题，而提到哲学高度上来理解，这个思想很值得我们深刻的加以研究，这些问题都是有关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新的贡献，值得提出来，大家共同研究。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上卷）

# 辩证逻辑*

(1960.7)

今天我跟大家讲一讲辩证逻辑。过去怎么样了解辩证逻辑?辩证逻辑包括一些什么内容? 今天想初步对这些问题作一个说明。

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研究好，因为它本身还是一个新问题，现在我也找不到一本新参考书来参考，因此，我只能够讲几点意见，把我自己的一些还不能说很成熟的见解讲一讲，目的是给大家作参考，因为大家学习逻辑，也要学习辩证逻辑。形式逻辑是很容易研究的，辩证逻辑就比较难研究。我把我的意思讲一讲，如果讲好了，如果我的见解不错了，也许可以帮助大家对如何来研究辩证逻辑开一个头，如果能够指一条路就更好了，我还不敢说是不是能够指出一条正确的路来。开一个头我想是可以的，只要有了头绪，后面就比较好研究了。这是今天讲这个课的一个原因和理由。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要写哲学教科书，想把辩证逻辑这部分也写上去。旧的哲学教科书不写辩证逻辑，或者只写一点辩证逻辑的原则、基本原理，辩证逻辑究竟有些什么内容是不写的。现在我们编哲学教科书要写上去，不管写好写不好，我们

---

* 中央高级党校在1960年举办逻辑专业班，艾思奇在7月13日为该班讲了《辩证逻辑》一课。当时我们国内对这一门学问尚没有开展系统的研究，在中央高级党校也是一门新课。艾思奇按照自己的体会，作了比较系统的讲授，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这里是按速记整理，只作了一些文字加工。

把它写上去。为了做这个准备，所以我今天讲一讲。哲学教研室写教科书有逻辑班几个同志帮忙，这几个帮忙的同志可以多写一些，其他同志也可以多读多研究一些。我今天讲课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在写教科书这个问题上提供一些意见，将来要怎样写，还是需要大家的努力。

逻辑班也准备写教科书或者是提纲，主要是写形式逻辑提纲。但是，辩证逻辑大家也要研究，所以，讲辩证逻辑这个部分，一方面帮助哲学教研室写教科书；另一方面，作为逻辑班的同志们将来回去讲课时的参考。写逻辑教科书，不必要把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写在一起，形式逻辑单独写，辩证逻辑应该归在辩证唯物主义范围里面。将来逻辑班同志如果写教科书，能够写两本：一本写形式逻辑提纲（或教科书）；另一本，辩证逻辑单独写一个小册子。我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现在就开始讲辩证逻辑问题。

## 一、辩证逻辑和认识论

辩证逻辑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是分不开的，形式逻辑可以离开认识论来讲，纯粹讲思维的形式，当然更不必要讲辩证法。但是辩证逻辑与认识论和辩证法是分不开的，不了解认识论和辩证法，就没有办法讲辩证逻辑。所以，列宁讲过：唯物论的认识论、辩证法、逻辑是一个东西，甚至于用不着三个名词。用不着三个名词的意思并不是就不要三个名词了，实际上，列宁也用了三个名词，他是说，这完全是一门学问，这三部分是分不开的学问。讲认识论的时候，必然要讲到逻辑学，讲逻辑学必然要讲到认识论，也必然讲到辩证法，讲辩证法不但要讲客观辩证法，而且要讲主观辩证法，讲主观辩证法就要讲逻辑。所以，三

个方面是同一的，是同一门学问里面不可分开的。

在辩证法教科书里面，当然要一个一个分开来讲。我们有时候先讲实践和认识的关系，然后讲辩证法，然后再讲辩证逻辑。这是为了说明方便，还是要分开来讲，因为各有不同，各有不同的侧面，各有不同的侧重点。认识论的着重点是《实践论》里面所讲的：认识不能离开实践，认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它必须着重在这些方面。但是这些方面也就是辩证法，本身和辩证逻辑分不开，讲辩证法本身也就是讲辩证逻辑，讲对立统一的规律，讲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这些规律本身也就是辩证逻辑。因为它涉及概念的对立统一、范畴的对立统一，涉及量变质变的逻辑关系，肯定否定的逻辑关系，涉及对立统一的逻辑关系。但是辩证法着重在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或者再加上辩证法的范畴。讲辩证逻辑是着重讲思维方面的辩证联系，着重讲人在思维方面，在理性认识方面，不要只着重在感性认识，而要着重在辩证法的客观规律，人的思维形式，应着重在理性认识的内部的辩证联系上。因此，必须着重在思维的形式，也就是必须着重研究概念、判断、推理，这些思维形式的辩证联系。所以，讲辩证逻辑就是着重主观思维形式方面的辩证法，形式逻辑也讲思维形式的关系，但是不讲思维的辩证关系。

辩证逻辑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分开来讲，主要是讲概念、判断、推理的问题。总的来讲，辩证逻辑要讲些什么东西呢？辩证逻辑主要研究的问题，就是要研究如何用逻辑形式去反映客观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主要是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以实践为基础。辩证逻辑着重研究我们理性认识的形式，是用什么形式去把握客观世界的变化、发展规律，怎样反映到自己的主观认识方面来，或者说我们的主观认识怎么样运用

思维形式来把握客观事物的变化和发展。

这种问题，形式逻辑是没有的，形式逻辑只研究思维的形式怎么样才是比较妥当的，至于这种思维形式如何去把握客观，反映客观的变化、发展、客观世界的联系，这个问题，形式逻辑不管。形式逻辑可以说是纯粹研究思维方面的科学，它的对象比较窄。但是，辩证逻辑一方面是思维的科学（研究人类思维的各种联系），同时也是认识客观世界的科学。因为辩证逻辑要注意到人类的思维，怎么样才能正确的反映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有一些什么规律?思维本身在反映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间，要遵守一些什么规律？所以列宁说，逻辑不仅仅是人的主观认识的科学，辩证逻辑同时也是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个普遍规律的科学。辩证逻辑着重研究的对象是思维形式的辩证联系，但是研究思维形式的辩证联系时，同时也就研究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所以，研究的对象，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有根本的区别。形式逻辑只研究思维本身的形式如何才是妥当的，辩证逻辑研究怎么样运用我们的思维形式去反映客观世界变化发展的规律。

## 二、研究辩证逻辑的原则

研究辩证逻辑主要的应该注意两点，两个总的原则。

（一）辩证逻辑在研究人的思维形式的时候，研究概念、判断、推理的时候，要注意到认识的发展过程，要根据认识的发展过程来研究自己的思维形式。比如研究概念的时候，要注意概念如何随着人的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研究判断时，也要研究各种判断如何反映认识过程发展的不同阶段。形式逻辑研究概念、判断，很简单。研究判断，大体有四种判断：全称判断、特称判断、肯定判断、否定判断，研究这四种判断的关系。对这四种判断的关系，

也是从形式上来研究，离开认识的发展来研究。辩证逻辑不能离开认识的发展，就是还研究这些判断在人类认识发展过程里占什么位置，是属于认识发展的哪一个环节，在认识发展的哪一个环节起作用。形式逻辑不研究这些问题，它只研究这几种判断怎样发生关系。

形式逻辑里面有判断的对当关系，只研究这个对当关系。画一个☒，研究这个关系，研究什么全称肯定，全称否定，特称肯定，特称否定。对这四种判断不是根据认识发展来研究，是把这四种都放在一个方块块里，这四种判断放在四个角落上。然后研究四个角落互相有什么关系。上面是全称肯定，全称否定，下面是特称肯定，特称否定，就画四个对角线，划成一个☒，把两个角落联起来，这样来研究有什么关系。全称肯定，全称否定这两种判断关系叫做大反对，就是完全相反。比如“凡人都要死”，“一切人都不死”，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研究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完全是形式关系，跟思维发展关系没有联系。

辩证逻辑就要研究各种判断在认识发展过程里面起什么作用，每一种判断在认识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上起什么作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面写了单一判断、特殊判断、必然判断这三种判断的关系，恩格斯写了这样的例子，说明这三种判断在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起不同的作用，三种判断反映认识发展的三个阶段：在认识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只认识个别事物中间的偶然关系。这是认识的开始，只能够对个别事物的关系下判断。因此，只能够做出个别的判断。比如“摩擦生热”，这只能够对“摩擦”和“发生热”单独的两种关系做出判断。摩擦是一种具体的事情，摩擦只能有火，一个单独的两种现象联系起来。后来又经过几千年，科学发展了，到了19世纪发生了机械功能可以产生热，这样产生

了机械和热的对当关系，这样就得到一个判断：“机械运动经过摩擦变成热。”这个判断就有一些特称判断的性质了，它不只是把摩擦和生热这两种单独的现象联系起来，而是把握了一种特殊运动形态：机械运动经过摩擦环节变成热，热的机械运动是一种特殊的运动形态，不是单独的、个别的运动现象，是一种特殊的运动形态。因此，它的判断是特称判断。后来，科学又进一步发展了，就发展成任何运动形态都能够互相转化，在一定的条件下都能够互相转化，这样就把一切运动形态都包括在里面了，就变成一种普遍判断。所以，三种判断反映了人的认识过程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认识环节。

这种思想在黑格尔的著作里也是有的，在《小逻辑》里讲反映，照黑格尔本来的意思是反省，就是比较深入的判断，这种判断里面包含单一判断、特称判断和普遍判断。恩格斯讲的这种东西就是从黑格尔这部分思想发展起来的，经过改造，黑格尔把这三种判断用更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单一判断就是：“这种植物可以治病”，这就是单一判断，只认识到这种植物能治病。再进一步有特殊判断，“这一些植物可以治病”，不是这一种而是这一些了，这样就比单一判断进一步了，范围扩大了，不但是一种植物可以治病，而且看到一些植物可以治病。什么叫做全称判断、普遍判断呢？像“一切人都会死”，“凡是金属都会产生电”。这不仅是一种或一些的问题，而且是一切问题，这是普遍判断。黑格尔讲这些问题的时候，没有像恩格斯那样明白地用科学发展的例子加以说明，讲的很抽象很神秘，因为他是唯心论，所以搞的很不清楚。恩格斯这样一讲就很清楚了。人类在思维中所使用一切判断形式都跟人的认识发展过程分不开的，不同种类的判断，在认识过程的不同环节起作用。或者说，不同种类的范畴反映人的认识的不同

阶段、不同环节。所以，在辩证逻辑里面对思维各种的形式分类方法，跟形式逻辑里面不同。形式逻辑就是在形式上来分类，把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对立起来，把全称判断和特称判断对立起来，按照它的形式来分作四种判断。辩证逻辑研究判断的时候，按照认识的发展过程来区别判断的不同种类，这是辩证逻辑的一个基本原则。

这些不同的判断在认识过程中有不同的地位，这也就说明它们相互之间有变化，可以转化，随着认识的发展，个别判断变成特殊判断，特殊判断转化成为普遍判断，各种判断中间可以发展转化，这种转化反映了认识的发展过程。这种转化是服从辩证规律的，这种转化也是思维形式向对立面的转化。

这个思想在毛主席著作里面有很好的发展。我们研究辩证逻辑的原则时，应着重研究毛主席思想。这个思想主要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面的第三十六条："概念形成的过程，判断形成的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概念的逐步形成，判断的逐步形成，推理的进行，都跟调查研究的过程分不开，一面调查研究，一面形成概念、判断，就对事情下判断，就根据判断进行推理。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间，我们的思维形式在不断地变化，一直到形成正确的概念、正确的判断，形成了正确的推理。这个形成的过程还要经过实践反复的观察、考验。第一步形成之后，拿到实际工作里考验一下，如果不对就要纠正。纠正之后，概念的内容要有改变。判断也要加以改变，因此推理也要改变。比如说，我们首先根据一些材料形成一个概念："和平是有保证的，和平只要经过谈判就可以保证得到"，这样就形成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对不对呢？要拿到实践里面去考察一下。结果怎么样呢？应不应该把判断改一改呢？应该改正一下，如果不改

正，那样的判断就是错误的。在没有经过考验以前，判断中提出来一些假设不要紧，假设也是一种判断，经过考验之后，如果不改假设，那样的判断就要犯错误，因此判断就要改变。所以，随着认识的发展过程，要把判断加以纠正，加以改变和发展，认识到什么程度就作什么判断，判断有很多种。

所以，研究辩证逻辑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在人的认识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来研究各种思维形式的相互关系，研究各种思维形式如何在变化中间来反映客观世界。

（二）研究辩证逻辑的第二个原则。研究辩证逻辑的任务，就是要学会运用逻辑的结构，运用各种思维形式反映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和它们的相互联系。就是说如何能够把我们的思维形式安排得妥当，使它能够把客观世界发展的主要内容反映在我们的主观认识里面来，要用思维形式来概括发展过程。所谓概括，并不是把客观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反映出来，而是把主要的东西，最本质的东西概括起来。列宁经常说：《资本论》不仅仅是经济学，而且是逻辑学。因为《资本论》非常准确地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把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以及消灭的基本过程详细地概括起来。不是概括那些细节，而是把基本过程，也就是基本规律概括起来了。由商品到货币，由货币到剩余价值的产生，到阶级斗争，最后到资产阶级被剥夺，这个基本过程概括起来，这就叫做理论和历史的一致。马克思的理论总是把历史的本质、要点概括起来了，理论的本身也是历史，把历史的最重要的东西概括起来（历史包括实践的历史还包括一个时期事物相互联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特点，所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方面可以从它里面学会许多理论原则，另一方面还可以从里面找到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我们大家随便拿一

本书来研究，比如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有四章，它又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第一章他把黑格尔哲学的产生到费尔巴哈理论产生的过程都概括了，但是同时也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理论要点也概括起来了。第二章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主要是讲唯物论和唯心论，还讲可知论和不可知论。恩格斯也在理论上加以对比，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如何不同，可知论和不可知论有什么不同，可是在这一章里面，讲到唯物主义的发展，由机械唯物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批判了唯心主义。理论结构经常和历史的发展过程相适应。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有时理论原则的排列也是适应历史发展过程。比如《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概括了俄国革命的基本经验，由第一条到第六条，就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张略图，一幅素描。我们自然辩证法班读了《自然辩证法》，可以知道在“导言”里面，就是讲历史，通过历史的发展，来证明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影响哲学的发展，推动哲学的发展的，然后哲学的发展又反过来指导自然科学的发展，最后归结到现代自然科学必须要用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才能得到迅速的进步，这是理论原则。但是这个理论原则是通过历史的概括加以证明的，又有观点，又有材料，材料是历史的，观点也是历史的。

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面讲到逻辑问题，他这里讲的逻辑问题也是讲辩证逻辑问题。他说：要求我们写文章和文件要有准确性，所谓准确性就是概念、判断、推理的问题。怎样要求呢？第一就是概念要明确；第二判断要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要看逻辑性。概念要明确，就是说概念一定要反映当前的任务，反映我们当前所研究的任务的本质，抓住这个本质，这就不是形式逻辑所要研究的，形式逻辑不研究概念怎

样才能明确这个问题。周谷城的主张有的是错误的，有一点是对的，他说：形式逻辑不大管逻辑内容真不真的问题。他有一定的道理，怎样把概念搞的准确、明确，在形式逻辑里面它不负责任。判断是不是恰当地反映了当前的任务，这个问题，形式逻辑也不研究，形式逻辑只能够告诉我们判断有几种，至于如何去运用这几种判断，我们当前对某一件事情采取否定判断是不是对，这个问题形式逻辑不研究。研究辩证逻辑的时候就要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辩证逻辑要注意到判断的恰当运用和进行推理的逻辑性。这里所讲的是在逻辑性上反映事物的联系。我们说一篇文章没有逻辑性有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说，某一篇文章没有逻辑性，是从形式逻辑方面来看，文章前后有矛盾。如果前后没有矛盾，那就算没有违背逻辑了，至于这篇文章是不是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联系，它就不管了。有没有逻辑性，还有另一种意思，从辩证逻辑来看，讲文章有逻辑性，就是说文章反映了事物的联系，反映了它要说明的事物的内在联系，把规律性、把本质抓住了。所以，逻辑性有两种意思，不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联系，就是辩证逻辑上没有逻辑性。

毛主席在这里着重讲辩证逻辑，要求我们的概念、判断能够做到明确、恰当，推理要有逻辑性，要把事物的联系反映出来。事物的联系有两种：一种是历史联系；一种是相互联系，或者叫做时间的联系，空间的联系，都可以叫做历史的联系，事物的相互联系，也就是指当前的历史条件。辩证逻辑的任务就是要求我们学会运用我们的思维形式，运用我们的逻辑结构来把握事物的联系，包括空间联系、时间联系和历史联系。我们研究辩证逻辑之后，就可以根据这个观点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就可以对它的逻辑结构有很好的了解。历史的联系和相互联系中间都有矛盾，

所以历史联系有历史的斗争，相互联系有相互中间的斗争，要反映这些东西。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不是反映事物的历史联系，就是反映事物的相互联系。比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本书一开始就讲：当前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着重分析了这两种矛盾中间的相互联系，分析历史的联系比较少。有些著作是从历史联系讲起，比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把一般战争的原则、方法论的原则讲了一下之后，就概括了游击战争从 1927 年起的历史，“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十六个字，发展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第三次反“围剿”一直到批判教条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概括了这一段的历史。在概括历史联系的同时也分析了事物的相互联系，如中国是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半殖民地等各种条件。通过研究相互联系说明历史发展的过程。在分析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分析事物的相互联系。在分析当中运用各种判断，运用推理，所有这些都服务于历史的联系。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了中日的相互关系，从相互联系分析起，重点写四个方面的对立，由此出发说明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的历史的基本规律，预见到三个阶段的问题，预见到持久战的必要性。在这些分析当中都运用了恰当的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判断是要恰当的，比如我们研究毛主席的著作里面经常有这样的例子：可能和必要的时候就怎么怎么样，做一件事情要注意到概念、判断。不懂得辩证逻辑的人，有时单单根据可能就提出要求，或者单单根据必要就提出要求。只注意必要不注意可能，或者有的只注意可能，不注意必要，都有片面性。现在的和平主义，就是只注意必要，没有注意可能。和平共处当然是必要的。世界人民都要求和平，但是，是不是可

能呢？当然如果现在不是阶级社会，阶级已消灭了，那样就既必要也可能。但是，按照辩证逻辑判断必须恰当地反映当前的情况，如果只根据必要提出任务，规定政策，这样的判断是不是恰当呢？世界人民根据人道主义的要求，目前就应该消灭战争的，就判断现在就消灭战争，这样的判断就不恰当了。按照形式逻辑来讲，那就无所谓恰当不恰当，它只要提出判断就算了。按照辩证逻辑的要求来看，就是任何一个判断应该根据当前的情况来提出，也要反映认识的情况，认识到什么程度就下什么判断，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也就下什么判断。现在和平的可能性，可以下一个特称判断："在某种情况下，全世界人民坚持斗争，美帝国主义处于最大限度的孤立，那么战争可能制止。"当前，和平主义者能不能下这样的判断呢？"我们已经到了根除战争的时代，现在已经有可能消灭一切战争了。"这是全称判断。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用这样的全称判断呢？我看是不能采取这种全称判断的。他们这些理论是不符合事实的，也不合乎逻辑，这不仅仅是不合乎形式逻辑问题。形式逻辑有时候前后不一致，如不久以前说：艾森豪威尔是和平使者，现在又变成万恶的头子，前后矛盾，这是形式逻辑问题。判断不恰当，是辩证逻辑问题。现在客观形势发展了，还没有能够对和平问题做出全称判断来，那就是不合乎逻辑，没有把这个事物的联系搞清楚，一点也没有反映这个联系。帝国主义还存在，不仅仅是存在的问题，而且它现在还相当有力量，三分之二的人口在资本主义统治下面，资本主义当然不可能完全是帝国主义，但在资本主义世界，帝国主义还相当有力量，而且调兵遣将，并不是坐在那里没有事情干。现在美国的行动情况虽然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积极准备包围社会主义，跟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对解放区所采取的办法有类似的地方，就是积极调

兵遣将，把军队放在解放区周围。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说：没有战争的时代已经可以实现了，这跟客观事物的联系，没有任何一致的地方，不能反映这个联系，所以它是不合乎逻辑的，没有逻辑性。研究辩证逻辑要注意这些问题。

总起来说，辩证逻辑有两个主要原则，对辩证逻辑的研究，对各种思维的研究，以认识发展为基础，研究这些逻辑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了解这些作用处在什么情况下，应下什么判断，做什么推论。再一个问题就是逻辑结构，逻辑结构必须反映事物的历史联系。

下面就分开来讲概念、判断、推理问题。

## 三、辩证逻辑的概念

概念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了解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们讲形式逻辑要用辩证的方法来解释。我们讲以前的逻辑，至少是黑格尔以前的形式逻辑，黑格尔所批判的形式逻辑对概念的了解跟辩证逻辑是不同的。主要的不同是这样一点：形式逻辑的概念主要的是把概念当做简单的同类事物的共同点。这种形式逻辑的概念，我们现在还有，比如，抽象的人道主义，就是一种对人性的形式逻辑的概念，这种概念仅仅把人的某种共同点归纳起来，有的时候仅仅是人的自然方面的共同点，比如说，人都有人道主义，小孩哭都要难过，说列宁很有人情味，跟一切人都一样，写信给他的妹妹那样亲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有没有共同点呢？当然有共同点，人都会说话，而且使用一种语言，资产阶级会关心自己的兄弟姊妹，无产阶级也会关心自己的兄弟姊妹，资产阶级的小孩生下来要吃奶，无产阶级的小孩生下来也要吃奶，共同点是同类事物都有的，但是共同点能不能成为事物真

正的概念？归纳一下共同点能不能成为明确的概念？那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黑格尔有批判。对黑格尔的东西要有批判的继承。对古代的东西我们和修正主义有区别，修正主义要根本推翻古典的东西，我们是首先要批判，但是，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也要继承。当然继承下来的东西也要进行改造。黑格尔讲的概念这一部分，贺麟先生把概念翻译成总念，这个意思不很确切，因为他把概念看成世界总的基础。我们说概念就是概念。共同点和共相有区别，概念的本质就是讲共相。黑格尔讲概念的内容，就是讲共相，但共相不是共同点。我们不用这个名词，我们只说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根本内容。辩证逻辑的概念是要求把握事物的本质，把握全面性，不要把握表面的东西。共同点就是表面的东西，人性论里面所讲的人性，纯粹是表面的东西，从这种表面性提出来问题，就站不住脚。列宁对他的妹妹写信那样亲切，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如果假设列宁的妹妹是反革命，他会不会写那样亲切的信呢？所以把写信看做人情味，是非常片面的，仅仅从这一点来判断列宁有人情味是不妥当的。列宁之所以能够给他妹妹写那样亲切的信，不简单的是兄妹关系，表面上是和资产阶级一样的，但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因为他的妹妹是革命者。如果说她是反革命，他连信都不会写。所以抽象地讲，列宁那么关心自己的妹妹，是有人情味的，这是非常表面的。列宁的人情是阶级的人情，列宁关心他妹妹跟资产阶级关心妹妹不是一件事。所以，要了解列宁的本质，要知道他和工人阶级的共相，要归结到他是工人阶级的领袖这一点，才能把握真正的概念。要从阶级基础上来把握，不能从表面的人情去把握。传统的形式逻辑对概念的看法是这样，所以我们对形式逻辑要修改。真正的概念是要把握事物的本质。要区别革命的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这个名词被资产

阶级滥用了，我们甚至就不能用人道主义这个名词了。关于人道主义也可以在很个别的情况下看到，但是要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来看），现在讲人道主义不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豺狼也讲人道主义，对资产阶级敌人也讲人道主义，实际上就是把脚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

对概念的了解，我们根据毛主席的《实践论》，强调概念是要把握事物的本质，但是把握的程度有深有浅。比如人是什么？富兰克林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就把握了人的本质。资产阶级讲，人都有人性，这就没有把握本质。所有的人都爱和平，所有的人都反对战争，这就没有把握本质的东西，这种概念就是没有把握本质，没有形成什么概念。人都要吃饭，人有两手两脚，这只把握了共同的特点，没有形成概念，真正形成概念要把握本质。富兰克林说：人能够制造工具，这是把握了本质，但是很不够。因为没有提到人的阶级性。对形式逻辑教科书应该对它作一些修改，当然不是修改成辩证逻辑，可以修改的地方应该修改。

这是第一点，关于辩证逻辑的概念是要把握事物的本质。

过去康德和黑格尔把概念分成两个阶段，这种分法是没有必要的。他把人的理性认识分成两种，一种叫做理智，一种叫做理性，理智是比较浅的理性认识，黑格尔认为，理智是比较片面，比较抽象的理性认识。用在概念上能够简单的把握共同点，就是理智形成的概念。理性概念就要把握本质，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理性概念就是把握概念自身。这种说法完全是唯心论。这种分法没有什么很大必要，我们用不着这样分，现在这样提一下，供大家参考。

把理智和理性严格地区别开来，有点形而上学的味道。理智是讲分析的，理性就讲综合，只有理性才能把握辩证法，理智不

能把握辩证法，这是德国古典哲学里面的基本思想。我们就用不着这样分了。我们说两种思想方法，一种是形而上学，一种是辩证法。我们反对形而上学，我们要掌握辩证法，按照辩证法的要求去把握概念的本质，撇开现象和表面的东西。

概念除了简单的共同点外，还有一个特点，一切概念都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概念都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形式逻辑的概念，只有普遍的一方面，把普遍概念和特殊概念分开，不看做是统一的东西。形式逻辑有时把概念分成三种：即单称概念、特殊概念、普遍概念。普遍概念是很广泛的。形式逻辑不注意概念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对立统一，辩证逻辑把握概念注意到特殊性和普遍性，又对立，又统一。比如“战争”这个概念，有一个普遍的意义，战争都是阶级社会里面产生的，是阶级社会里面的特殊产物，这个概念，我们要把握它的本质，是阶级社会一种人和人的冲突，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这样来把握战争的概念。“战争”的概念首先有普遍意义，只要有阶级的地方，我们就肯定有战争的可能性。就是说，不仅奴隶社会有，而且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都有战争，所以它有普遍的意义。但是，它又是特殊的，就是只限于阶级社会这个条件。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就没有战争，所以，它又是特殊的。任何概念都是又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最普遍的概念它在具体生活里也有特殊性。

还有，概念跟个别事物也有联系，概念都是无数事物的概括，概念是从无数个别事物中概括出来的。概念本身又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同时，它是从许多个别事物里概括出来的，它是实际存在的。概念在实际生活里仅仅是通过个别事物存在，实际生活里没有赤裸裸的概念，没有离开个别事物的概念。毛主席说：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也寓于个别事物当中。离开个别事物，在

实际生活里就没有什么概念，概念的内容就不存在了。黑格尔有一句话，叫做共相都是具体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普遍的东西、普遍的本质都是有条件的，纯粹普遍的本质只有在脑子里才有，实际生活里的普遍概念都是寄住在个别事物里的。

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时，去看德国古典哲学著作时，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黑格尔经常讲：普遍的、个别的、特殊的联系统一。他讲这个问题时，把普遍的作为最根本的东西，把个别性、特殊性都作为普遍的表现，个别事物都是在概念中产生。贺麟翻译的《小逻辑》第338页里讲到：个体事物与实在事物是相同的。所不同者只在于前者是从总念里产生出来的，然后才有概念表现为个体事物。我们认识概念是从许多个体事物里概括来的，而且这个概念总是人头脑里的反映。我们研究概念的时候不要忘记，概念是从个体事物里概括出来的，同时概念里有普遍性。如果我们正确地掌握概念，应当把概念写作既有普遍性，同时也有特殊性。

关于辩证逻辑的概念有两点：一点是，概念并不仅仅是同类事物的共同点，而是要把握本质，各种概念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另一点是，概念的来源是从许多个别事物中间概括出来的。这是对概念的两种了解。

第三点，讲概念的特殊性，概念有条件性，就使得概念可以互相转化，可以向对立面转化。辩证逻辑要求我们研究概念如何互相转化。形式逻辑就不研究这个问题，形式逻辑就是把概念加以分析，把各种不同的概念分析一下，至于它们相互的关系，相互转化是不研究的。辩证逻辑要研究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概念就不能够反映客观事物的互相转化。客观事物能够向对立面转化，因此，我们的概念为了要能够明确地反映客观事物，概念也会互相转化，也要使它有互相转化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就在辩证逻辑的概念本身，辩证逻辑所肯定的概念内容本身，就包含有向对立面转化的可能性。因为我们首先肯定概念有条件，有特殊性。每一种概念的普遍使用范围都有条件，因此，如果条件变了，它自然就要转化了。“战争”是阶级社会里面的现象，我们说“战争”的本质，它是阶级社会里面的一种特殊现象，我们不把“战争”了解为简单的冲突，如果把“战争”了解为简单的冲突，那么，人类的战争跟蚂蚁和蜜蜂的战争就分不开了，仅仅从表面上来把握，那么，“战争”的概念就没有互相转化的问题了，就是因为我们所说的“战争”本质，它普遍适用于阶级社会，可是又受阶级社会的限制，在阶级社会里面也还有条件的限制。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因此，我们就可以肯定战争可能向和平转化。首先是阶级社会消灭了，就有了永久的和平世界。就是在阶级社会里面，如果政治斗争没有发展到最高的形式，没有采取斗争最高形式的必要，也可以不发生战争。因此战争可以转化为和平，和平可以转化为战争。但是必须首先消灭阶级社会。

什么是和平呢？在阶级社会里面，和平就是阶级斗争还仅仅限于经济形式和一般政治形式的斗争，政治斗争还没有发展到最高点，那就是和平。所以和平是可以转化为战争的，和平的概念可以转化为战争，战争的概念可以转化为和平。为什么会有和平呢？因为政治斗争还没有发展到最高点，所以就有和平，政治斗争还没有发展到战争的形式，就是和平。什么叫做战争？战争就是政治斗争发展到最高形式，就是战争。所以，战争与和平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是有同一性的。这个同一性就是发生战争以前，政治斗争没有发展到最高形式以前，那就是和平，这个和平中间包含战争的因素，和平发展到最高形式就转化为战争，战争本身是从和平斗争发展起来的，是和平斗争发展的结果。战争并不是与

和平完全相对立的东西，这两个概念是互相联系着的，互相转化的。这两个概念在形式上是互相对立的，而本质上是互相联系的。所以，要研究客观事物会互相转化，在逻辑上就要研究概念如何互相转化，目的是为了反映客观事物向对立面转化。辩证逻辑一定要研究对立的概念的互相转化，这种问题中国古代有人已经研究了，如“失败为成功之母”，“相反相成”，“困难转化为顺利、顺利转化为困难”。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很多概念互相转化的情况。毛主席讲“坏事变好事”，坏事可以转化为好事。这个转化是有条件的，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方能够转化。坏事也可以不成为成功之母，革命者的失败，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就能够成为成功之母。但是，反动派的失败，就不一定能成为成功之母。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研究概念的具体内容，失败是谁的失败，是革命的失败，还是反革命的失败，这个问题是辩证逻辑要研究的。形式逻辑仅仅把失败和成功对立起来，所以它不能研究“失败为成功之母”这种问题。形式逻辑不研究这种问题，有没有一本形式逻辑教科书研究失败的概念，如何成为成功之母的概念呢？当然是没有。形式逻辑教科书能不能增加一点，概念可以互相转化的问题呢？可以适当增加一些，但是不一定要增加很多，加的太多就变成辩证逻辑，形式逻辑的书就讲不了这么多。

对立面的互相转化是有条件的，这一点一定要注意。辩证逻辑研究概念的互相转化是有现实条件的，离开这个条件抽象地讲概念的互相转化，就会变成诡辩论。诡辩论产生的原因有几种，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离开客观现实的条件来谈概念向对立面互相转化，诡辩的特点就在这里。这个问题，列宁在《哲学笔记》里前面一部分强调辩证逻辑要注意概念的伸缩性，概念是有伸缩性的，伸缩性如此之大，可以大到向对立面转化，可是要注意一点，就

是概念向对立面转化，这种伸缩性如果主观地去运用，就是诡辩论，或者说是折衷主义。这种伸缩性如果客观地运用，客观这就是条件，注意这一点，就是辩证法。我们也可以讲没有战争的世界，我们也讲和平，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在阶级消灭的时候，只要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消灭了阶级，消灭了阶级剥削，消灭了帝国主义，那个时候可以谈到没有战争的世界。现在帝国主义还有力量的时候，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时候，你就说没有战争的世界，没有武器的世界，从何说起呢？这种诡辩论有的时候很滑头，他现在就是一般地讲没有战争的世界可以出现了，等过几年之后，比如说美国若干年后，导弹赶上苏联，导弹准备好了，也许它一下就发动战争，或者发动一场局部地区的战争。那个时候诡辩论者怎么讲呢？我们会说：你说没有战争，为什么又有战争了呢？他还可以诡辩说：我说总归会出现没有战争的世界。他还可以说：谈判的时代到了，现在是和平时代。所以，对概念的互相转化一定要注意它的性质，不存在条件的时候，就不能说转化问题。现在我们可以讲战争转化为和平，我们可以说战争已经转化为和平，那是经过人民战争以后，譬如中国的解放。但是我们也可以讲和平可以转化为战争，我们这样说就很合乎逻辑。防止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两个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如果不提两个可能性，不提高警惕性的话，就不能说了。修正主义或半修正主义说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和平的道路，没有第二条道路，根除战争的可能完全存在了，可是另方面又要讲提高警惕。如果根除战争的可能有了，只有一条道路了，那么还有什么提高警惕的必要，所以在讲到概念的时候，首先要强调概念可以互相转化为对立面，但是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又要注意还有诡辩论。诡辩论和折衷主义是有区别的，但都是

把概念相互转化建立在主观思想上面，而没有建立在客观的条件基础上。诡辩论就是在没有客观条件的情况下空谈向对立面的转化。“失败是成功之母”，反动派也可以说这个话，蒋介石还梦想回到大陆上来，这就是诡辩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折衷主义讲对立面是同时存在的。我们说对立面的转化有条件，对立面的同时存在也是有条件的。比如，“和平共处”的思想里就有折衷主义，就是你活我也活的思想。和平共处是积极共处，就是你也活下去，我也活下去。在资产阶级方面来说是有条件的，就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可能这样。在一定的条件下，对立面同时存在，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这是对立面概念的同一性，这个同一性一方面是有历史条件的，是有一定时间性的，另一方面在同时存在的时候，任何时候总是有一方面是中心，一方面是主体，或者说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或者是资产阶级压迫下的统一战线（资产阶级压迫下就没有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总是无产阶级来领导的，资产阶级压迫下还有统一战线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当然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无产阶级也可以在一定问题上跟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比如，在印尼这些国家，有一个时期资产阶级是统治者，在反对荷兰和美帝国主义的时候，可以建立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只有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条件下才能够建立。如果不谈条件，如果资产阶级不反对帝国主义，而反对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也讲统一战线就不对了，那就是折衷主义了。所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讲统一战线要有条件：一个是谁领导，一个是在什么问题上的统一战线，这两个都是现实条件问题。离开现实条件，要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团结统一，这里面就有折衷主义，要求无产阶级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跟资产阶级合作，不管什么条件，都搞阶级合作，这就是折衷主义。

另外还有一点，概念的认识是有发展的，是跟认识发展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概念深刻的程度，随着人的认识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比如，“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是富兰克林的发现。这是一个概念，它的确是把握了本质，但是不深刻。因为富兰克林是资产阶级，尽管他是最优秀的思想家，但是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所以他的认识只能达到那样的程度，他只能认识到人和动物的不同，是人能够制造使用工具，他不能进一步认识到阶级的关系、社会关系，资产阶级的立场使他不能认识到这点。把人的概念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人是在一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生活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活，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这样的概念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认识，这是认识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所以，对概念的认识是可以发展的，而发展是跟认识程度，跟发展程度有联系的。物质概念认识的发展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对物质认识到它最高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认为物质是离开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它又为主观所反映。这样的概念以前的唯物主义者是没有达到的。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都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程度来规定他们的物质概念。我们古代的物质概念就是金木水火土，用具体的物质作为物质概念的根本东西，用某几种具体物质的形态当做原始物质，这样来规定物质概念。物质是有原始东西的，原始物质就是金木水火土。以后发展到机械唯物论时代，认为物质不是什么金木水火土，物质有某种共同的、普遍的特点。这种认识就进一步了，但是他们的物质概念是根据力学来规定的。物质的本质就是力学的本质，就是质量的不可入性、占据空间性。这个认识比古代的认识有进步，但还是很低级的，它比起辩证唯物主义概念是低级的。同样是物质概念，但古代资产阶级时代和我们现在的时

代不同，古代是有错误的，机械唯物论也有错误，但是有一点共同点，就是都承认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以前的哲学没有这样明确，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明确地规定物质是客观存在，离开人的主观意识，又为主观意识所反映这些最根本的特点。

关于概念就讲上面这些问题。

## 四、辩证逻辑的判断

下面讲判断。

黑格尔对判断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一切事物都是判断。这是唯心论的观点。他认为一切客观事物都是概念自己对自己下判断的表现，他认为概念就是绝对精神，这是一个大概念，这个大概念为了表现自己，发展自己，它就把自己外化为一切事物，每一件事物都表明绝对精神对自己下具体判断.这是黑格尔的看法。

这种看法用唯物论把它倒转过来，就有它的真理性。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把这种思想倒转过来，就没有什么神秘的了。“一切事物都是判断”，好像一切事物都自己在作判断，这非常神秘，有些不近情理。把黑格尔的思想倒转过来，我们就这样了解：我们思维活动里的每一个判断都反映事物发展过程里的每一个环节，我们的主观判断就是对客观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做出恰当的论断，我们要对客观事物的发展，对每一件事都可以做出恰当的判断。

我们为什么在逻辑问题上研究判断问题呢？

研究判断问题，就是要学会如何在客观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上，做出恰当的判断来。这是辩证逻辑对判断所要提出的任务。研究判断问题，就是为了做出恰当的判断来，就是研究怎么样下判断才是恰当的。为什么用另外一种办法下判断就不正确？这一

点跟形式逻辑不同。形式逻辑只告诉我们有几种判断，然后再把这几种判断排列起来，至于如何才能做出恰当的判断来，形式逻辑认为这不是它的任务。所以，周谷城说：逻辑不管真问题。就是因为他坚决站在形式逻辑的地位上，他否认形式逻辑之外还有别的逻辑。周谷城有一些话是对的，但是有一点就很不对，就是他认为只有形式逻辑，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逻辑，辩证法就不是逻辑，因此逻辑就不管真问题。我们就要反对他这一点。我们说除了形式逻辑之外，还有辩证逻辑，形式逻辑不一定去研究怎么样才能得到恰当的判断，但是辩证逻辑要求我们研究怎么样才能做出恰当的判断来。什么是恰当的判断？什么是不恰当的判断？辩证逻辑一定要研究这个问题，所以辩证逻辑的任务和形式逻辑不同。当然，这并不是说形式逻辑对真的问题一点也不研究，这种说法也不对。问题是形式逻辑没有把这个当做主要问题来研究，辩证逻辑把研究恰当的判断当做主要问题研究。形式逻辑仅仅是把主要任务放在排列各种判断上，并把各种判断在形式上的相互关系加以说明，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恰当判断的问题还是要研究。比如，我们说判断的对立关系，要涉及恰当的判断问题。比如，一个全称肯定判断跟一个全称否定判断有一个关系，如果全称肯定判断是对的，那么全称否定判断一定是不对的。比如，“一切人都要死”，又说“一切人都不死”，那么如果我们知道全称肯定判断是对的，全称否定判断是不对的。你已经做出第一个判断是对的，那你一定要否定第二个判断，这样才恰当。恰当的问题，形式逻辑也研究，但是研究的不系统，没有作为主要问题研究，特别是没有把判断的恰当性和客观事物联系起来研究。事物发展到什么程度就要作什么判断，这个问题形式逻辑不研究。辩证逻辑主要研究认识发展到什么环节，要作什么判断才恰当。在存在阶级斗

争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出判断说：“防止战争的可能性有了”，但是我们绝不做出这样的判断：“根除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出现了”。因为根除不是防止的意思，防止不是根除的意思。仅仅是防止，但是还可能有战争。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这样认识是对的。形式逻辑就不联系客观情况来研究这个问题。

在这个总的看法下，辩证逻辑也有关于判断的分类问题。形式逻辑主要有四大分类，辩证逻辑的分类比较多。在这个问题上研究一下黑格尔的逻辑学有好处。黑格尔的判断分类方法是根据人的认识过程来分类，他这方面的理论是把康德的理论加以改造的结果。

康德对判断的理论就比过去的形式逻辑更丰富些。康德曾经把判断分成四类十二种。四类大概是这样：量、质、伦、程。每一类里又有三种。

在量的里面有：单一判断、特殊判断、普遍判断。这是就量的方面来分类，涉及单一的东西、普遍的东西，量的方面有大、小。“这一种植物能够治病”，这是单一判断。“某一种植物可以治病”，这是特殊判断。“一切植物都能制造氧气”，这是普遍判断。这里面也可以这样来改一改：“这种植物对人有益处”，“某一种植物对人有益处”，“一切植物因为它都能够产生氧，都对人有益处”，这些判断叫做量的判断。

质的判断也分三种：肯定判断（要肯定一件事物，如“某人是革命的”）、否定判断（“某人是反革命”）、无限判断（“人不是骆驼”）。人不是骆驼这是无条件的。这种无限判断是没有意义的判断。有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做出判断，否定了他，那就用这种无限判断。另外，有的人做出来很荒谬的判断。比如，“资产阶级也爱和平”，“资产阶级也讲人道主义”，或者说，“资产阶级和

我们一样是讲人道的”。做出这样的判断我们认为是非常荒谬的，我们就用一个无限判断来回答他：“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总归是资产阶级。”这是一个无限判断，这个判断是无条件的。

“伦”就是质的关系，“伦”是关系判断，也有三种：假言判断、直言判断、选言判断，这是关系判断。主词和宾词之间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战争可以防止，肯定可以消灭”，这就是直言判断。假言判断是有一个假设的条件，“如果全世界革命人民把帝国主义反动派消灭了，战争就可能制止”，这就是假言判断。选言判断是：如果这样，就是那样，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战争或者可以防止，或者不可以防止。”“世界人民把制止战争的祸首消灭了，就可以防止战争；世界人民如果受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谎言所欺骗，战争就不能制止。”

“程”是判断的程度，主词和宾词的关系，联系的程度。这种判断有三种：实然判断、或然判断、必然判断。实然判断就是一般肯定一件事情。比如，“这个房子是好房子”，“这个房子对开会很适用”，这就是实然判断。或然判断有一点不定，你说这个房子很适用，有一个人怀疑一下，他说：“也许对开会不适用吧？”当你说不出理由的时候，你只好说：“这个房子对开会可能是适用的。”再一个是必然判断，就是对实然判断能提出充分的理由，这个时候可以做出必然判断：“因为这个房子很大，空气很好，所以开会非常适用。”这种有充分理由的、明确的论断，是一种必然判断。

康德把判断分成十二种，这是很大的贡献。黑格尔把康德的十二类接受过来了，多少改造一下，把量、质、伦、程的次序调了一下，把质的判断放在第一，量放在第二，下面还是按照原来的顺序。这是《小逻辑》里面都有的，大家可以看一看。

质的判断，黑格尔认为是认识的初级阶段的一种判断，这个判断把握到表面现象的关系，没有进入本质。他这里举的例子是："玫瑰花是红的"、"玫瑰花是有颜色的"。这些判断只是对一些表面现象、对一些感觉到的现象，做出一些初步的判断，这种判断没有进入本质，只是涉及一些表面的、个别事物的关系。所以，质的判断是最初级的判断，对理论来说，对逻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判断。我们搞理论的，不是要大量地讲"玫瑰花是红的"，"人的脸是白的"，"非洲人的脸是黑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些判断可能是不错的，可是没有把握到事情的本质。"拿破仑生于某月某日"，"北京在地球上的某一度"。这些都只是现象，没有揭发事物的规律和本质，没有揭发事物深刻的内部联系。所以理论上的用处不大，是很初级的判断，是认识发展最初级的判断阶段，没有完全脱离感性认识阶段。

量的判断就涉及事物内部的关系，这里面就包含有个别判断、全称判断、特称判断。所以，恩格斯就举了三种判断来说明认识的发展过程。这种判断比质的判断深入一步，这种判断比较能对事物的内部关系下论断，不是对表面现象下论断。"摩擦生火"，这是比较内部的关系，比较深的关系。"运动能够产生热"，这是更深的关系。"一切运动形态能够互相转化"，这是一种比较全面的规律。特称判断更能把握规律性，全称判断更能把握全面规律。这种判断在理论上的用处比较多。所以恩格斯说到判断问题时，就特别举这个例子不是偶然的，因为这种判断更深入一步。人的认识发展到更高阶段，就适用于这些判断。至于关系判断，这种判断在认识上更深入一步，就是要认识到不仅仅是认识关系，而且要把事物的联系、条件弄清楚。比如，假言判断是假如怎么样，就只有怎么样。"摩擦生火"，是不是摩擦后就一定生火呢？比如手

在书上摩擦就不一定生火。所以，仅仅是量的判断就不够深刻，还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假如用一个干燥的木头来摩擦，那么就可以生火。

假言判断和选言判断还没有涉及必然性，程度判断就涉及是不是必然的问题，这就更高一些。到了必然判断，就是对事物的认识已经到了最深的程度，做出的判断是确定无疑的，有充分的信心。“帝国主义必然要垮台”，这就是必然判断。“无产阶级一定要胜利”，这是必然判断。要做出这种判断是不容易的。说出这句话很容易，但是在说出这句话以前要作很多科学研究，必然判断后面要有很多科学研究来支持它，不能够凭空说这句话。

黑格尔就是根据人的认识过程，来排列判断的关系，把判断由低级到高级加以排列，由比较浅的认识作为基础的判断，到最深刻的认识作为基础的判断，一直到科学的认识，用科学研究作基础来分类。

判断还有一个互相转化的问题，不仅是互相转化，而且相反的判断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同时存在。比如，马克思说：“公社消灭了，公社万岁。”一个判断说公社消灭了，另一个判断说公社万岁，这两个判断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在一个地方提出来。

为什么两个相反的判断能够同时存在呢？

辩证逻辑就要研究这个问题。有时相反的判断可以同时提出，从这方面看可以下肯定判断，从另一方面来看，可以下否定判断。“我现在在开会，但是我们就要散会了。”这两个判断可以在时间上连续出现，但是是互相转化的。我们现在开会，过一段时间就不开会了。为什么能够把这两个判断联系起来呢？因为我们研究判断和客观事物的发展联系起来。以巴黎公社这件事情来说，公社失败了，但是创造的公社这个普遍原则是万岁的。为什么能够

下两个判断呢？就是因为事物有矛盾，巴黎公社有矛盾，它的具体存在是失败了，但是它创造的普遍原则是永恒的。它有具体的存在，也有普遍的原则，这两个东西是矛盾的，但是同时存在的，这是客观情况。根据客观情况，我们在理论上做出两个相反的判断来，一个是它失败了，一个是它万岁，它永远不会失败。辩证逻辑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做出这种判断。1957年资产阶级进攻的时候，有人挑起群众进攻，毛主席在上海向柯庆施同志说：资产阶级闹起来你怕不怕？柯庆施同志说：也怕，也不怕。这就是把两个相反的判断结合起来。这个对不对呢？完全对。因为资产阶级闹事有两方面：闹事是坏事情，坏事情有些使人怕，如果搞不好，像匈牙利那样就可怕了。可是这个事情教育了广大人民，章乃器这些人一闹，报纸上把他的言论一发表，工人就睡不着觉，就要抗议，大家纷纷质问他，就变成好事情了，所以又不可怕。判断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辩证逻辑要研究这个问题。

## 五、辩证逻辑的推理

关于推理，简单讲一点。

黑格尔把推理分成三种：质的推理、反省的推理（这是唯心论的说法，就是绝对精神自己反省了，就是说推理开始进入本质。唯物论的说法是我们的主观认识深入本质。“反省”这个名词我们不用。把“反省”翻译成为“反映”是不确切的）、必然推理。

所谓质的推理，就是指形式逻辑最初级的三段论法。比如说，“玫瑰花是红色的”，“红是颜色”，因此“玫瑰花是有颜色的”。这个三段论法是质的推理，这些都是比较表面的推理。他认为这种推理是不深入的，是很表面的，因此这种推理在科学上的用处很少。

黑格尔顺便批判了形式逻辑，他说形式逻辑里面只是讲三段论法，实际上人的科学研究主要并不是用三段论法。三段论法不用学习，人都会用，但是科学思维常常超出了三段论法。他说：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有系统地讲三段论法的，可是他自己的哲学研究主要不是依靠三段论法。黑格尔有思想不正确的地方，但是有一点真理性的核心，就是他把三段论法，特别是演绎法看做是最糟的逻辑。

他认为比较高的是反省推理，反省推理有三种：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

演绎推理基本上是三段论法，不过它是反省推理里面比较高一些的三段论法，就是从最可靠的大前提出发，然后做出结论，就是由最可靠的普遍真理出发，做出最个别的结论，这样的推理比较妥当。比如说，“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现在帝国主义还存在，因此战争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这样的推理是演绎推理。这个推理比“玫瑰花是红色的”，“红色是颜色”，“因此玫瑰花有颜色”，这样的推理要高。这种推理涉及本质问题。但是，黑格尔说，演绎推理本身还要有基础才行。最初的普遍真理是哪里来的呢？你用演绎推理推出来一些结论之后，人家要追问你的大前提，一追的结果，就过渡到归纳推理。用归纳推理来证明就更进一步了，但是归纳推理有缺点，就是排列事物归纳它的共同点，有的时候排列的结果不一定可靠，排列的东西不完全，结果归纳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可靠，因此，又要依靠类比推理。类比推理虽然没有排列出来，但是可以大胆的估计，这就叫做反省推理，比质的推理进一步，可是这种推理还是不完全可靠，可靠性不高。

所以，辩证逻辑要求我们的推理进入必然推理，就是推理要有充分的可靠性。辩证逻辑主要是运用必然推理，主要是依靠矛

盾的分析方法，抓住矛盾加以分析，然后把矛盾的相互关系弄清楚，根据矛盾的关系来推测这个矛盾斗争的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根据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特点，然后推测到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这种推理是必然的，因为它是根据事物内部的本质、内部矛盾的关系，把矛盾分析清楚了，得出来的结论一定是必然的。这种推理的根本点是对矛盾的分析，矛盾的揭露和矛盾的解决，就是揭露概念内部的关系，然后根据揭露出来的矛盾来推测它的相互关系，产生什么结果。这种推理要采用分析的和综合的方法。分析就是把整个的东西分别为矛盾的对立面。综合分析就是研究对立面的相互关系、它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资本论》首先研究商品，研究它的两重性，然后到价值问题，一直到剩余价值，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由一个概念分析为对立面的概念，对概念又进行综合，又产生对立面的概念，这样不断分析，不断综合，并以实际材料和历史材料为基础，所以，又要有归纳，又要有演绎。这种必然推理把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统统包括在内，所谓必然推理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辩证推理。毛主席的著作里可以找到这种推理。中日战争分列为中、日两方面，然后又弄清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都是什么，这些条件都是矛盾的，根据这些矛盾分析得出来的结论，是速胜，还是不速胜，还是亡国，把这些对立面提出来认真加以分析，最后分析的结果是速胜不对，亡国也不对，持久战是对的。所以对上面这些问题可以根据毛主席著作来深入研究。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上卷）

# 关于编写《自然辩证法提纲》的讲话*

(1960.9)

今天跟大家讲一次课，现在主要解决一下怎么写提纲，这个问题很需要解决了。大家离毕业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正在写提纲，看起来怎么写的方法没有很好解决，我觉得很需要解决一下。本来应该早一点来跟大家讲的，因为事情太多了。这个问题我也不能说百分之百地解决了，把我的一些想法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 一、关于要不要编写《自然辩证法提纲》的问题

首先谈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要不要比较有系统地来写教科书。

我看是需要的。我们在这里学了两年多，毕业以后回到工作岗位上，人家要我们来讲一讲这方面的课，如果没有比较系统的东西是交不了差的。多少要有一套，我们要有一些比较有系统的

* 1960年9月，中央高级党校自然辩证法研究班即将毕业，按照学校的布置，要求该班在毕业前集体编写出一本《自然辩证法提纲》，但是，遇到了这本提纲究竟如何写法的问题，哲学教研室和学员要求艾思奇讲一讲，艾思奇于1960年9月24、25日比较详细地讲了自己的意见。这里是按速记稿整理的。当时参加自然辩证法研究班学习的吴义生教授，对这个速记稿作过审阅。

材料，也就是比较有逻辑性的提纲，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比较系统地写东西，主要是把握住思想方法就行了，我们已经学了哲学《实践论》、《矛盾论》，现在又学了党史，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比较理解一些，应该有可能对我们所要研究的东西，比较有系统地加以把握。我们承认，的确我们的水平有限，要写一本比较系统的教科书有困难。我自己过去想过是不是随便抓几个题目写一些论文就行了，班上的同志也有这个想法，现在看起来是不行的，如果写不出比较系统的提纲，就是论文也不能写好，如果我们有能力写出比较好的，立场、观点、方法没有什么问题的论文，提纲也就应该写好，不是能力高低的问题，如果系统的教科书写不出来，论文也不可能写好，与其写零零碎碎的论文，不如写比较系统的提纲好一些。提纲或教科书也可能写得不深，系统性不够，那没什么大关系，多少有一套比较好一些，所以我们还是主张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比较系统地写一本自然辩证法的提纲，或者叫做简单的教科书也可以。教科书需要比较完备一些，我们几个月写出来也可能不很完备，暂时可以不叫教科书而叫提纲，将来回到工作岗位上，对提纲分头研究，如果有条件再集中起来把它修改一下，经过反复修改，写出比较好的自然辩证法的书，尽可能早打一些基础。

第二，关于如何运用毛主席思想来写我们这一本书的问题。

怎样贯彻毛主席思想？这个问题先原则地讲一下。现在有些地方出现了不很正确的倾向，也就是说把毛主席的思想有一点庸俗化，即用贴标签的方法，什么问题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写一下，贴上一个标签说这是毛主席思想的结果。前两次我说过，乒乓球打胜了也是毛主席思想的胜利。有一次我听中央同志也说过这个意见。前一些时候报上登了一篇中西医结合医疗法问题，这个问

题本来很好，中西医结合本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举，事情很好，文章做的也很好，但是这里运用毛主席思想这个名词多了一些。比如打太极拳、做气功，也说是运用毛主席思想，这就不大恰当了，这些主要是技术问题。毛主席思想是鼓励中西医结合的，反对门户之见，重视民族遗产，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有中西医结合，如果在结合的方法上每一个地方都加上毛主席思想，就庸俗化了，用这个方法来搞，会糟蹋毛主席思想的旗帜。所以，用毛主席思想来指导我们做工作，实际上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解决我们当前所碰到的问题。

毛主席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两件事情，完全是一个东西，贯彻毛主席思想，就是要真正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解决我们所碰到的问题，能够这样做，就是贯彻毛主席思想，如果不能这样做，口头上再叫的多，实际上也没有贯彻。写自然辩证法的书也是这样，我们要分析自然辩证法各个方面的时候，要处处注意到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个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同志有了发展。单就哲学著作来讲，《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些哲学著作里有了发展。所以，贯彻毛主席思想来写自然辩证法，就是要善于运用《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观点，来解决我们所要研究的自然辩证法里面的问题。

我们要想系统地解决这些问题，也要根据《实践论》、《矛盾论》的思想，这个思想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毛主席在这几篇著作里有了新的发展，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来阐明自然辩证法这门科学里面各方面的问题。

我今天想试图根据《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一些观点，来提出一个怎么样比较系统地写我们这本书的意见。当然，原则上是比较容易讲，我只是脑子里有一个体系，想跟大家讲一讲。大家原来的提纲也有一个体系，有的地方有些乱，逻辑联系有些乱，有些重要补充，特别是“导论”部分。如果“导论”写好了基本上就解决了。

大体上，我们的提纲应该有三部分：一个是导论；一个是关于自然界规律方面辩证法的研究；一个是科学技术方面辩证法的研究。自然界的规律，就是数、理、化的规律，就是自然界各种形态的规律的研究，还有工、农、医。关于自然辩证法分这样三个部分来写是恰当的。按照这三个部分来研究，就可以发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有它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他只写了关于自然界规律的辩证法的研究，关于科学技术方面的辩证法研究没有写，当时不是迫切的问题，不像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这样迫切。当时是怎样在自然科学界占领阵地的问题，他着重解决自然科学的研究运用辩证法的问题，要反对形而上学，提高辩证法的地位。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只是写了前一个方面。他的“导论”也是总结自然科学历史发展的过程，根据现在历史发展的过程，科学界的思想应该很自然地走向辩证法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我们的思想由形而上学走向辩证法，恩格斯是这样提问题的，所以他的“导论”是着重讲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恩格斯所研究的方面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展开一些。所以我们现在写这样一本书，不一定仅仅叫“自然辩证法”，甚至可以叫“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因为我们搞科学技术问题，要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人的认识论问题，我们可以搞的更全面一些。现在就是要运用毛泽东思想，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毛主席的著

作直接讲自然科学的地方很广，所以我们要直接从毛主席的著作里找到解决自然科学的地方是很少有希望的，主要是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对我们指导写书是有重要作用的。我们找到毛主席的一些话，搜集一些材料、资料很少，但是不要限于这些材料，要把握整个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实践论》、《矛盾论》思想来解决这些问题。

## 二、关于如何写“导论”的问题

现在就讲正题。今天我着重讲“导论”这部分应该包含什么内容，我看大体上可以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着重运用《实践论》中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这个思想来说明一下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从古到今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导论”的第一部分，首先根据认识的规律，认识的原理来说明自然科学是怎样发展的，说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是怎样的。研究这个问题是为了便利我们今天如何掌握自然科学，如何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认识过去自然科学的规律，来努力推动我们今天的自然科学，使它发展的更快。这部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是整个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问题。

第二部分，着重根据《矛盾论》的思想，就是根据辩证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科学。要把自然科学研究的好，就要采取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方法。这部分的内容就相当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导论”，但是我们还可以扩大一点，恩格斯根据近代历史来说明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终归是辩证法。

第三部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这部分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里也有，主要是根据自然科学的成就来证明辩证法是自然界最普遍的规律，也就是进一步证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应该是自

然辩证法。

“导论”可以写这三部分。

辩证法的自然规律就包含在这三部分里。从星云到人类，整个宇宙的发展就是辩证法的过程。

下面第二个大部分就可以按照大家原来的提纲分类，基本上按照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内容来写。关于第二部分基本上相当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导论”以外的其他各个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自己加上的工农业、科学技术方面辩证法的研究。

在我们的这个提纲里面，争取把“导论”写得好一些，分类内容太多，写的不一定完备，我们能写多少就写多少，如果有缺少的，我们可以补充，恩格斯的这个笔记，写了好几年，我们要准备长期做这个工作，现在先有一个这样的轮廓，将来分散到各地，互相取得联系，准备材料，搞他三五年拿出一点像样的东西来，必要时我们还可以集中到北京来集体修改，这样做，我想是可以拿出好的东西来的。

我们对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自然辩证法问题很注意，不仅仅青年人注意，老的专家也知道重视毛主席思想。我们有走群众路线的方法，群众的力量大，一个人的力量很薄弱，我们相信我们在这一门科学上搞几年是会有很重要的创造的，在国际上拿得出去的东西是会有的，我们应该担起这个任务，恩格斯著作没有完成的这个任务，我们要担当起来。担起这个任务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写这本书，目的是使我们研究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帮助，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速度及科学技术发展速度有帮助。

现在就把这些题目分开来说一下，总的这三个方面，大体上

应该怎样写？包含什么内容？

（一）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问题

主要用《实践论》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来说明自然科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有一些什么规律？要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走什么路线？这一部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实践论》的观点简单地重复一下：《实践论》的观点主要的是什么观点？包含什么内容？大家写时可以讲一讲。

一般的来说，《实践论》告诉我们，人的认识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是不能离开实践的，是在实践中发展的。到底什么叫实践，马克思主义讲实践，资产阶级哲学家讲实践，唯心主义也讲实践。究竟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跟唯心主义的实践观有什么区别？这是很重要的。

资产阶级哲学所讲的实践是抽象的概念，它把实践当成一种行动；一般的就是把个人的活动就叫做实践。至于实践的主要内容包含什么东西，在资产阶级哲学中没有具体规定。马克思主义说唯心主义所讲的实践是抽象的，没有具体内容，最多是把实践讲成个人的行动，个人的冒险。因为资产阶级是个人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就不同，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者，讲实践的时候，主要是要我们把握实践的客观内容，具体内容，物质内容。照费尔巴哈的说法，就是有对象性的活动，对象就是有客观物质的社会活动。马克思的《费尔巴哈提纲》讲得很抽象，因为它是一个提纲。毛主席在《实践论》里说得很清楚，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就是生产，然后就是阶级斗争，生产和阶级斗争是实践的最根本的内容。所以，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呢？认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得来的，是从阶级斗争中得来的。毛主席关于《整顿党的作风》中

有一段话说的很好，他说：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自然科学的知识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也可以说是生产斗争的知识和阶级斗争的知识。自然科学的知识是从以前的生产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社会科学的知识是从以前的阶级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就是这两种认识，这两种认识是从最基本的实践中得来的。要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的认识，我们要着重发挥这个思想。所以，我们总论的第一个题目，就是要着重在这个问题上好好做文章。为了比较有系统地发挥这个思想，我们这个题目可以写下面一些问题。

1. 要说明自然科学是人类生产斗争的总结，从猿变成人以后，几十万年人类在生产斗争中积累了很多经验。自然科学就是这种生产斗争的总结。我们写这个题目的时候要概括一下社会生产斗争的历史，不妨从石器时代开始，人类第一次制造工具开始，能够把握自然界的东西，能够把石头打破，利用石头的碎片某一方面的属性为工具。后来有了火，就能够掌握自然界变化的规律，运用自然界中的某种属性到生活中来。所以生产斗争中的一些创造发明使人类逐步掌握自然界，对自然界逐步有所认识。从原始时代起，人类由狩猎到畜牧到农业时代，人类真正能够把许多生产经验总结起来成为科学规律，这是在阶级社会开始出现的时候才有的。有了奴隶，有一些人专门分工从事脑力劳动，不仅仅一般地把握自然界规律，而且能够把这种规律总结起来，由感性到理性。一般地讲，原始时代的人能够把握一些自然界的规律是感性的，还不能成为理性的东西，不能当成规律把它肯定下来。没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没有一些人专门从事概括研究，规律知识的形成是不可能的。所以，真正带理性认识的自然规律知识是在人类古代产生的，至少是在有奴隶主的时候产生的。所以，

这个题目根据历史的概括，说明人类生产逐渐发展，自然规律知识逐渐增加。15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发展了，有了工场手工业以后，出现了近代工业，自然科学知识突飞猛进。恩格斯讲，生产出现了某种需要对生产的推动比办十个大学还要大一些。从历史上概括一下，生产发展了，工业发展了，自然科学就突飞猛进了。没有生产经验，自然科学家就无从概括，无从建立自然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说明任何问题的时候，是从历史上说明。恩格斯的“导论”是把历史概括起来，证明人的思想方法是由形而上学到辩证法的，这种说明问题是驳不倒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没有办法推翻的，就是因为他根据历史的确凿事实概括出来的知识。我们就是要说明生产的发展，使自然界的知识也逐步发展。现代自然科学也是跟生产分不开的。这样就证明了毛主席讲的：自然界的知识是生产经验的总结。要发挥毛主席思想，就要找充分的材料对毛主席指出的规律给予充分的证明。所谓毛主席思想指导，就不是说毛主席已经现现成成指出问题，我们就像编书一样，说明一下就行了，我们是根据毛主席的原理再加以研究，把历史上的丰富知识概括起来，使得毛主席所指出的原理进一步得到证明，使人们更深刻地相信毛主席所指出的原理是对的。

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还要说明一点，为什么生产力的发展使我们的认识逐步发展呢？原因就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自然规律知识对生产的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是反作用。人们认识自然，并不是为了认识自然而认识自然，认识自然是为了服务于生产，是生产的需要。生产的需要产生了自然规律知识，而自然规律的知识又帮我们推动生产的发展，从来都是这样的。生产需要就有更大的推动力，来找到这种丰富知识。近代自然科学对发展生产有很

大的意义，现代科学的发展对生产更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2. 自然科学是生产经验的总结，同时它又是为生产服务的，从来都是这样。把这些问题说清楚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些道理来解决当前的一些思想问题。首先就是自然科学既然是生产经验的总结，那就要使我们的自然科学家懂得我们现在要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我们的科学研究就必须与生产相结合，要重视劳动人民的经验，生产者的经验。以前自然科学家怎么概括，还不是从劳动者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许多自然科学的认识都是广大群众的创造，然后自然科学专家才能根据这些经验概括成为知识，成为理论。如果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不注意结合生产，不认识广大人民群众在生产中的创造，我们科学的发展就会比较迟缓。当然，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试验是十分必要的，也很重要，但只靠个人在实验室中试验，要想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开辟广阔的前途那是很困难的。所以，自然科学家首先应该跟生产结合，要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充分注意生产者群众的创造。生产经验要根据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证明自然科学理论，这是规律，这是最后的基础，都是生产经验，哪怕有时是间接的，不一定是直接的，但是最根本的基础是生产经验。有些问题是可以用坐在房子里研究出来，但是最后来源是生产。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每个科学家都离开自己的实验室，一天到晚去参加生产，那当然也不好。现在没有到共产主义社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有区别，没有相当的分工是不行的，脑力劳动者还应该有一定的时间作研究工作。比如一个科学家完全脱离生产，脱离群众，他的发展也会有限度，也可能在个别的工作上有一点成绩，但是要想创造出大量的东西，要有规模更大的更迅速的发展那是不可能的。

因此，要反对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的研究方法。我们一定要站

稳立场，树立我们的观点，根据历史事实证明自然科学是来源于生产的。我们站稳脚根就可以避免科学研究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观点。我们的研究一定要为生产服务，在当前来说是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服务。

我们党的社会主义科学技术路线内容主要有三条：①党的领导；②为社会主义服务；③群众路线。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说不是为研究自然科学而研究自然科学，我们所研究的结果能为社会主义发展解决什么问题，我们所研究的选题应该从社会主义生活中去找，不能只根据个人的兴趣找题目。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找，我们的题目就会多的不得了。我前两天看到华罗庚同志的一篇讲话，他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从前是冷冷清清的，现在他的数学研究所有一百多人，忙得不得了。原因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生产提出许多重要问题，都是很有价值的问题，一百多人感到非常忙。如北京的公共汽车，有很复杂的数学问题，如何把车开得经济，利用率如何能提高，空车率往常是50%，有时人挤，有时人松，怎样提高利用率到80%，甚至到90%，不浪费车辆，这里就有很复杂的数学问题。他们数学所的人参加研究这个问题，帮助厂里找一些办法。如何更合理的利用车辆，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旧社会就没有这个问题，那时没有几辆车。现在车多了，人多了，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搞自然科学工作，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科学选题，应该在报纸上找一些很动人的问题，才值得研究。有人认为研究生活问题是庸俗的，这是一种很错误的观点。比如研究一个汽车是几百万人的问题，北京几百万人的解决了，上海几百万人的也可以解决。这不是很随便的生活问题，而是很重要的理论问题。

关于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首先谈这个问题。自然科学的发

展规律，自然科学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是生产经验的总结，是为生产服务的。生产越发展，自然科学也更能够发展。自然科学家能够主动为生产服务，他的发展前途也会更大一些。这也叫主观能动性。认识客观的规律就是认识自然科学规律的知识，为了改造自然的目的来研究自然规律，掌握自然规律，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所以，自然科学的任务就是为了我们在生活中认识自然规律，并且自然规律在生活里面发挥人的高度主观能动性。自然科学家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把这些道理说明了，就是把自然科学的发展、提高问题解决了。

3. 关于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第二点要说明的，就是阶级斗争对自然科学的影响。自然科学主要是生产经验的总结，但是不要把自然科学看成仅仅是生产经验的总结，不要认为阶级斗争对自然科学就没有影响了。自然科学本身是生产经验的总结，不是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因此，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可是在阶级社会里面掌握自然科学的人总是有阶级目的的，谁来掌握自然科学，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自然科学受阶级影响，因为它是被阶级所掌握，因此，自然科学的应用方向就受阶级因素制约。

①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②自然科学被一定的阶级所掌握。按照毛主席的《实践论》的说法，就是“打上了阶级烙印”，自然科学是不是例外呢？自然科学不能例外，自然科学本身必然有阶级的烙印。简单地认为自然科学有阶级性是错误的，特别是认为自然科学本身有阶级性更是错误的。认为物理学有阶级性，有资产阶级的化学，这是错误的，一定要反对这种简单化、庸俗化；但是如果认为自然科学不受阶级影响，没有阶级烙印也是不对的。所以第一个问题是要肯定自然科学是生产经验的总结，不是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但第二点又要肯定，在阶级社会里面，自然科

学总是被一定的阶级所掌握，因此它起阶级的作用，它在发展或运用方面就起阶级作用。比如飞机本身有什么阶级性？但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它就起为哪个阶级服务的作用。或者是为资产阶级赚钱，或者作为资产阶级的杀人武器。要说明了生产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接着要说明阶级斗争对自然科学的影响，这才是全面的。

这也可以从历史作一下概括。比如说，剥削阶级掌握自然科学，不仅仅是为了发展生产，还是为了赚钱。古代的自然科学是处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有一些奴隶主要赚钱，一方面是为了发展生产，发展生产也是为了赚钱。农业发达的地方，自然科学是地主知识分子掌握。我们中国有皇帝的时候，有钦天监，这种官是专门管天文的，是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地主阶级为什么要掌握这些东西？是为了关心农业，同时为了他的剥削利益。近代资产阶级社会里面更清楚了，创造发明如果违背资产阶级利益是不能发展的，资产阶级能够赚钱的东西就能发展，资产阶级创造的杀人武器，它有用就能够发展，对资产阶级没有利益的就不能发展。

恩格斯也讲到15世纪以后，文艺复兴时代，自然科学起革命的作用，因为资产阶级要自然科学，封建地主不要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对它没有用处，同时自然科学的观点和它的宗教观点冲突，所以自然科学起了革命作用。并不是自然科学本身有革命性，而是自然科学的作用当时有利于资产阶级发展生产，有利于资产阶级赚钱的目的。所以，任何时候一定的阶级对自然科学总要有影响的，总要被阶级所掌握。这个影响包括这样几方面，包括思想方面，包括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方面。在思想方面的影响就是立场、观点、方法的影响；对自然科学发展方面的影响，对自然科

学规律的解释，资产阶级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对规律本身任何阶级是不能影响的。比如，牛顿三大定律，资产阶级不能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否定，无产阶级也要认识这个规律。在“大跃进”的时候，有些人头脑太热，说牛顿三大定律要取消了。牛顿三大定律是不能取消的，不能推翻的，只能补充，发展，它是客观事物规律的总结，不可能有阶级性。但是，对规律的体系加以解释，如何解释规律的来源，种种哲学上的解释，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承认牛顿三大定律，但是可以用唯心主义、用机械唯物论来解释这个规律，它认为这个规律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方面，凡是规律都是有普遍性的，但是也是有条件的，这是辩证的看法。又是有条件的，又是普遍的，看起来好像是有矛盾，但是一点也不矛盾。牛顿的三大定律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有效定律，所以说是有条件的，但是只要在这个范围内就是有效的，所以说是普遍的，一切自然科学都是这样。

不管宇宙里哪一个星球上，只要有生命，就有新陈代谢，但新陈代谢只是在有生命的条件下才有。只有物质发展到由化学变成有生物的性质，才有新陈代谢，也是历史的，是发展到某种程度，才有的某种现象，这是它的历史性。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自然规律表示了一种历史规律，不但社会科学是历史的，自然科学也是历史的，某种规律就是物质发展到某种情况才产生的。自然科学内，看起来好像没有历史性，实际上，任何一个规律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地球上，水到了一百度才沸腾，为什么在太阳上没有这个规律，可见规律是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条件没有了，它就退出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可以用唯心论、形而上学来解释规律，无产阶级则用另外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释这个规律。所以，对自

然科学本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什么争论。但是，如何解释这个规律就有争论，就有立场、观点、方法方面的斗争，这个思想方面，资产阶级有阶级烙印。另方面，有关自然科学发展方面，科学技术的运用方向问题，自然科学发展速度受阶级限制。科学技术的运用和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和发展方向是受阶级影响的。为什么中世纪地主阶级不允许天文学有新的发展，为什么资产阶级才能允许发展？为什么我们中国从前自然科学只是医学比较发展，天文学比较发展，农学比较发展？为什么机械学不能发展？这是有原因的，原因是中国过去统治阶级需要这方面的，就发展这方面。中国的医学就很发达，因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为了和疾病进行斗争就要发展。我们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是世界上最完全的，国家大，农业规模大，所以就完全。按照地球绕太阳的规律，规定了二十四个节气，但是计算月份按照月盈月亏，年份按照地球绕太阳，是太阳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比较简单，因此月亮运行就计算不了。西藏是完全按照月亮运行来计算，因为他们是畜牧业，太阳的作用不大，计算方法纯粹按照月亮的运行，有时他们过年是在夏天牧羊年。中国是用干支①来计算，它是用金木水火土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是土酉年，土巳年这样配。中国的农业很发达，地主阶级统治人民对农业有很大需要，所以自然科学发展方向、发展速度也受阶级的影响。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对农业起决定作用。医学也有民间医学，也有统治阶级的医学，在官方医学中补药很发达，如人参、鹿茸之类非常多。民间由于争斗很多，打拳的人也学医，研究跌打药，民间接骨头也接得比较好，西医接骨头要用石膏，得几个月。统治

① 天干和地支的合称。——编者

阶级发展补药,民间发展跌打药,这不是医学本身有什么阶级性。

所以，自然科学的发展，除了首先受生产发展规定外，又受阶级的影响，这也是它的规律，它为一定的阶级所掌握，它的发展方向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所限制。对它的规律解释，有不同的阶级观点，同时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甚至在一定的意义上，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阶级斗争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影响，这也是一种规律，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方向、速度有影响。自然科学在一定的条件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服务于一定的阶级。根据这个规律，我们就得到这样的结论，今天的自然科学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因此对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我们都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对待它，对自然科学规律要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加以解释。自然科学的发展，运用方向，应该使它能够服从无产阶级的需要，服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服从人类的需要。我们的路线是要自然科学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就可以证明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这是一条规律，你不这样做也行。

导论第一大部分主要讲这两个问题，根据这两个问题还可以再讲一下下面一个问题，即自然科学的发展与时代的问题。

历史时代是怎么区分的？现在有人宣传这种观点：现在已经是氢弹时代，原子时代，不是列宁时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创造发明能不能成为人类历史时代区别的标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应该做否定的答复的。自然科学的创造发明不能作为人类社会历史时代的区别标志，区别人类社会历史时代的标志主要是社会制度，阶级关系，哪一个阶级在当前时代起主要作用就是区别时代的主要标志。当前我们的时代中主要对立的阶级是什么？一

个是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从列宁时代起到现在,在全世界起主要作用的是这个阶级,中间还有许多别的阶级,全世界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广大人民与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派的斗争,这是20世纪以来列宁时代的基本内容。我们的时代,在《列宁主义万岁》中说的很清楚,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的时代,这个历史时代的定义是根据阶级关系来确定的。

不能说我们现在的时代,与列宁的时代不同,当然现在有了原子弹,列宁活着的时候没有。这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区别是科学技术时代的不同,科学方面巨大的创造发明只能区别技术时代,不能区别整个人类的历史时代。我们可以区别:蒸汽时代,电子时代,原子时代,这是区别技术的发展,不是整个人类的历史时代。我们说原子时代,是说我们生产力方面,技术方面可以使用原子能,可是生产力不能决定历史时代。生产力要通过生产关系反映的折光,如果直接用生产力区别时代,那美国的时代比苏联高,美国的钢产量差不多是苏联的一倍,苏联还提出15年赶上美国,除了导弹苏联超过了美国,一般的社会生产力苏联没有超过美国,如果超过了,还赶做什么?按照这种观点,我们中国就处在一个更低的时代了,是不能这样说的。我们的生产力比美国低,可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比美国高一个阶段,我们是社会主义,它是资本主义。因为我们的统治阶级是工人阶级,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

4. 最后,可以讲一讲我们科学技术发展的路线,理论联系实际。因为讲了自然科学发展规律,讲到它跟生产力、跟阶级关系,讲了自然科学的创造发明与时代的关系,然后要证明一下我们科学技术发展的路线为什么是对的。

我们的路线完全符合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我们的路线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要运用这个规律来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因此也能够充分发挥科学家和劳动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使科学掌握在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手里。

一个是群众运动。所谓群众运动，不是不要专家，只要群众，而是专家与群众相结合。这样专家便于吸收群众的经验和生产经验。

群众运动里还包含一个“百花齐放”，放手让群众搞创造发明，专家也应该搞“百花齐放”。自然科学界的“百花齐放”比社会科学的“百花齐放”的尺度要广一些。原因是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社会科学的“百花齐放”有六条标准，“百花齐放”是香花、毒草都可以放，放出来要辨别一下，是毒草就要去掉。自然科学方面的情况就不同一点，涉及自然科学本身的争论，不能完全用六条标准来解决，这一点要更广一些。比如说生物学，摩尔根与李森科的争论，不能说摩尔根学派在政治上是反社会主义的，他所研究的内容与六条标准不是直接有关系，我们中国对这两派是让他们从长讨论下去。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两派的世界观，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可以说摩尔根学派对某些问题的解释有形而上学的观点，但是他研究的本身不能给他一个形而上学的帽子，就把他反下去了。因为有一些研究他是经过试验的，试验是有价值的，问题是他的一些解释可能有片面的地方，不研究内因和外因的相互关系。也可能还没有研究到这个程度，目前在内因、外因问题上不能作结论，但试验本身是有价值的，关于基因的思想是抽象的，然而很有意义，不能否定他研究的成果。反过来说，

李森科恐怕太着重讲环境的影响，环境影响怎样对神圣细胞起作用这方面没有研究，这个问题还是一个空白。所以对科学研究本身，不能偏袒那方面。李森科在苏联也犯错误。因此我们对这两派就让他们从长讨论，只是对某一派的思想方面，我们觉得有缺点，但不能以此为理由，说他完全错了，或者是我们的要求太高了。科学家是要以试验做根据的，科学家也可能在试验室里还没有找到环境对生物细胞的影响有什么作用，所以他不作结论，这是允许的。以前有的单位对摩尔根无情打击，这是不对的，现在好了。现在还是有一些大学专讲米丘林，有一些教科书不讲细胞、原形质，只讲嫁接、杂交，这样就不对，这就是一种门户之见，成为了宗派主义。所以，现在在自然科学方面坚持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这一党的原则，会使自然科学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中西医结合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从前是西医看不起中医，中医不能很好起作用，西医也不能很好发展，我们现在一结合，中西医发展的很快，这也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创造。有些西医不能治的病中医治好了，挽救了很多人。中西医结合，可以开拓一个新的学派。

无产阶级的作风，是相互学习、相互帮助。自然科学本身既然不是阶级问题，可以采取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方法，这可以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

这个问题最后要归结到我们自然科学的路线，证明我们的自然科学路线是正确的。这就是运用《实践论》的观点来说明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这是毛主席思想的指导，用这个方法说明问题，只要说明的好，关于毛主席思想一字不提也可以，不一定要挂招牌，贴标签，实质上掌握的好就行了。

为社会主义服务是要坚持的。为社会主义服务，促进自然科学跟生产结合，使自然科学吸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生产经验和

群众经验，这样能够推动自然科学更快地发展。同时，社会主义建设本身也需要自然科学，需要科学技术为它服务。如果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不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完全脱离实际的，不可能起重要作用，同时也不可能很快发展，这个问题如果在写的时候能够举一两个例子就很好了。我们有一些大学生能够结合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选题，《光明日报》上有一篇文章说地质部有一个人选一个钻探问题，有人就反对他。他不同意，他说，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选题：用一种办法钻一种很硬的岩石，有很多人不赞成，说你的选题很困难，并且又纯粹是技术性问题，没有什么科学价值。他选了这个题目后，亲身跑到钻探中去考察，最后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解决了如何钻一种很硬的岩石这个理论问题。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不纯粹是技术问题，有一些理论问题，对钻探有很大好处，这一类的例子可以举一两个，说明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运用这些例子有很大的困难，如果不是报纸上发表的，有保密性的问题，就不能公开讲，其他问题也这样，特别是工农医方面要注意保密问题。

群众路线问题，“百花齐放”上面已经讲过了，生产中要发展群众运动，专家之间要自由争论，不涉及反社会主义问题，不涉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问题和六条标准问题。纯粹是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应该充分展开自由争论，这一件事情要相当坚决。因为有一些人把政治问题和自然科学问题混淆起来，通常容易这样，简单地对自然科学的争论戴上什么“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用戴帽子解决问题是不好的，如果一个自然科学家不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不反对社会主义，他在政治上没有这些问题，就是在自然科学方面坚持自己一派的意见，那可以允许发表他的意见。我们做领导的人，或者是我们共产党的领导者，思想

领导者，政治领导者，就不能反对他坚持自己的意见，领导人要允许各派坚持自己的意见，让各派自由展开争论，这样才能互相学习。互相学习要通过争论，不通过争论不能互相学习。有时各派有一种成见，有成见要通过争论，才能够打破。互相争论不一定等于门户之见，站在一派方面压制另外一派，就是门户之见。一个研究机关里，如果只允许李森科派发表意见，不允许摩尔根派发表意见就是门户之见；或者相反，只允许摩尔根派发表意见，不允许李森科派发表意见，那也是门户之见。我们反对一派压制另一派，要允许各派坚持自己的意见，互相争论。有些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世界观问题，比如我们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看到某一派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看法表示我们的意见，但是如果他不接受，也还是要长期等待。至于世界观问题，唯心主义问题，唯物主义问题，形而上学和辩证法问题要等待，我们可以表示意见，但是，接受不接受，要等科学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结论，使他真正认识。至于科学本身问题，比如细胞问题、原形质问题、嫁接问题、中西医结合问题等等，最后解决问题，是以实践为标准，不能完全用政治标准来解决问题，也不能简单地用世界观、方法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来解决问题。有一些纯粹科学的问题，只能根据生产实践来解决，根据试验来解决，试验没有最后证明，就不能最后解决。社会科学里也有这种情况，比如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国的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起，现在有很多争论，我们就让它自由争论，因为这个问题最后解决要根据实践，将来地下的东西慢慢挖出来以后，越来越多有文物证明某一个时期是封建社会真正开始，争论就最后解决了。现在各派的意见可以自由发表，但是我们写教科书，可以采取一派意见。我们是采取郭沫若的意见，这并不是说郭沫若的意见绝

对正确，在中学采取这个意见，到了大学就要讲解各派的意见。在自然科学中这种问题更多一些，比如遗传能不能通过嫁接来改变，是通过生殖细胞，还是通过嫁接来改变，定向嫁接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还要更多的实践来解决，李森科不是最后解决问题的。所以自然科学问题要长期讨论，这些问题都值得在我们的提纲或教科书里，好好地阐述一下。

现在“导论”还没人写，我希望组织几个同志写一下这个问题，我自己没有时间来写，如果有时间也可以自己写，只是个人写没有集体写的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这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里面基本上没有的，但是我们需要有这个问题，恩格斯关于辩证逻辑和认识论那一部分有一些暗示。有一些毛主席认识论的观点，这是需要我们补充的。

（二）关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主要是根据《矛盾论》，按照辩证法来说明一下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上面讲的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现在是讲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这里就用得到《实践论》和《矛盾论》了。

方法论的问题，首先要交代认识规律问题。自然科学的产生，是生产经验的概括，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在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活动中通过大量关于自然界的经验知识，从原始时代起，从原始人类第一次制造工具起，就开始得到了关于自然界的经验，首先是把石头打成工具，然后又摩擦生火，这些都提供了大量的生产经验。关于自然科学知识是大量经验的总结，经验本身还不是科学规律知识，科学规律知识是经过总结长期的经验，成为比较多少有一点条理的，掌握了规律性的知识，这就是理性认识。这是从大量的、长期的生产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首先要把这个问题

说清楚。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自然科学规律知识，是通过这样一个认识规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经过不断的反复才得到的。

自然科学规律知识本身是反映自然界的规律的比较有系统的知识，或者说多少有系统的知识，是一种理性知识。自然科学规律知识，自然科学理论，是普遍的知识，是普遍真理，但是又是有历史性的，每一种自然科学的规律都有普遍性，但又是有条件的。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起作用，这是有条件的，可是只要有了这些条件，它就可以起作用，所以它又是普遍的。因为它有普遍性，所以自然科学规律就可以帮助我们指导生产实践，生产中只要有某种条件就可以运用某种规律知识，因此可以帮助我们提高生产，推动生产的发展。

其次，要说明我们总结经验的时候需要运用思维的力量，运用理性认识活动，需要思维上的加工。《实践论》中说，把经验加工制作，这就是一种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需要一定的方法，凡是自然科学知识提高到理论程度，就要很好地运用思维的方法。比如，进化论就是一种理论自然科学，因为它把许多具体的科学规律综合起来，来说明整个生物学的发展规律，把自然科学理论化了。现在自然科学的每一个部分都有理论性。如果是 15 世纪，17、18 世纪，有些自然科学没有理论性，生物学没有理论性，就是力学的理论性也不高，稍微有一点系统。现代科学不论哪一个部分都有它的理论方面，有它的技术方面，但是都离不开理论方面。

尖端科学尤其是这样，比如原子、电子、中子、介子这些东西根本看不见，试验记录是间接的，通过一些示波器来看，通过这些来观察一下表面现象。由于通过一些照片把一些现象加以总结，就要运用思维的方法进行思考，来设想这种现象是怎样来的，

是中子活动的结果，是原子活动的结果，或者是介子活动的结果，都要用思维的方法来解决，道理是复杂的。

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说：化学可以运用试剂的方法来解决，自然科学也可以用试验的方法来解决。现在看起来，自然科学问题不完全可以用试验的方法来解决，试验的方法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可以提供很多经验，可以提供一些感性认识，一些问题要靠脑子来解决，把许多试验材料连贯起来，才能解释。

在化学上有很多理论问题，比如原子价的问题，是这个学说的创造，对化学的飞跃发展起着决定作用，是化学发展的里程碑。有了原子价的学说，对化学元素的相互关系，才有了说明。到现在原子价的学说还是正确的，最复杂的化学现象都用原子价来说明。原子有价，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要知道用眼睛去看那是没有办法看的，完全是依靠许多试验材料综合的结果，每一种原子的相互关系，其中有原子价问题。提出了原子价的学说，就把所有的化学现象贯穿起来。门捷列夫形成了元素表，这是理论自然科学，他把所有的化学元素的关系，用一个周期表贯穿起来，既说明了已经有的化学现象，又能够预见到还没有发现的化学现象。过去化学上这些学说，理论上新的创造，都是外国人发现的，这些科学家实际上是掌握了唯物辩证法，他们在自然科学的领域里也掌握了认识论，因为他不满足于经验的知识，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找到了说明这些经验的最根本的理论。这些理论的说明，不用思维是不行的。

思维活动有它自己的规律，它与经验不同，经验可以从表面上来观察问题，思维活动不是表面看得到的，是事物本质的关系。周期表的关系不是表面看得到的，但是，通过经验可以找到这种关系，找到这种本质。所以，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里，很

多地方反对经验的方法，他的着重点，就是自然科学发展的现阶段，应该注重运用思维的方法。思维活动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重大作用。

恩格斯写《自然辩证法》是19世纪末，正是科学发展到新的阶段，是现代最尖端科学发展的前夜。恩格斯提出理性方法重要，指出纯粹自然科学的经验是不可靠的。而那个时候比较偏向于经验的方法，特别是哲学界，利用自然科学的经验方法，反对理论的真实性，反对理论能够反映客观规律性。所以，恩格斯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是有它的重要历史意义的。我们现在讲这个问题比较好，因为现在自然科学界不能不运用思维的方法来研究，但是运用思维方法就要注意思维的规律性。

人的思维有规律性，要掌握这个规律。如果不能够正确地掌握思维的规律，那么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就不可能有很好的结果。要有很好的结果，不管自觉不自觉，你的思想方法必须服从于正确的思维规律。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理论科学上有很大贡献，为什么有这种贡献呢？就是因为他在生物学中的思维方法，思考问题是符合思维规律的。当然达尔文没有学过辩证法，他没有自觉的辩证法，可是他的研究使他不自觉地按照辩证法的规律来思考问题，所以他在科学上得到了很大成绩。

我们为什么对摩尔根学派总是有一点批评，总是有一点不满意，就是因为他应用思维方法有时违背辩证法，有点经验的方法，摩尔根派在他的试验的小范围内，看不出生殖细胞有变化的因素，比如关于兔子的试验，一个白兔子和黑兔子交配，传下去的比例总是固定的，四分之一是白兔，四分之一是黑兔，还有两个四分之一是混杂种。根据这个试验，好像兔的特性总是永远遗传下去，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这种小范围的试验，时间不太长，要看它的

变化是很困难的，生物学家根据这个小范围试验得出来结论说，遗传的因素是永远不变的，要发展除非是偶然性的原因。这种思想方法就是经验方法，就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根据小范围试验的结果，做出永远的结论，因此他的解释与进化论是矛盾的。如果说变化是偶然的，那就不能说明为什么单细胞能够变成高等动物，经过几万万年变成人，这个规律就不能够说明了。地球上的进化论就很难理解。摩尔根学派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不久就出现了，到现在一百年了，一百年来他的学说发展得很有限，也许到某个时候会有突破。我不是专家，也可能批评有错误，但是有意见总是要表示的。他有这个错误，就是根据试验室的经验来做结论，不是结合大量的生产实际，不是结合农业，畜牧业大量的现象来研究，思想方法不是很正确的。

所以，由感性到理性，自然科学理论方面需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这些正确的思想方法是什么方法呢？当然是辩证法。

所以这个题目的第二个问题是谈一谈辩证法。

辩证法是怎么来的？是长期科学发展的结果。现代辩证法，是人类几千年以来摸索的结果，所以辩证法是最可靠的。几千年来，我们人类在不断摸索，在正确思维方法这方面走过一些曲折的道路，最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历史上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应该收集一些比较重要的材料来说明一下，要详细说明这个问题可以写一本专著，我们在这样一本简单的教科书的序论里说明这个问题，可以说的比较困难一些，但有现成的原理可以供我们简单说明的便利。只要简单的概括这几点：古代思想方法，近代思想方法和现代思想方法，大体在理论上做一下概括就够了。

这个问题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里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里，都在原则上解决了。他在书里说：人类的思想

方法经过三个阶段，就是古代自发的唯物辩证法阶段，近代形而上学的阶段和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阶段。这三个阶段都跟人类认识自然发展的程度分不开的。

在古代生产不很发达，基本上是以农业为主，有一些手工业，也有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处在低级阶段，但是比原始时代高级。在原始时代，人基本只有经验，思维活动很不发展。在古代开始有了思维活动，对自然界开始有了一些比较系统的理性认识。在这个阶段，对自然界没有精密的科学研究，没有精密的试验，没有什么试验仪器，这个时候对自然科学的知识，是靠直接总结生产的经验得来的，不是靠精密的试验。医学方面是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所以这时开始有了一些关于自然科学比较带规律性的知识，有了一些理论知识，可是这个知识是零碎的，不是很有系统的。当时古代的人根据这种比较零碎的知识，在思想方法、世界观方面做总结，这样总结的结果就有了一种自发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和世界观。这种方法，就是一般地看到了自然界的变化，看到了一些现象，肯定自然界的现象是互相联系的，不断发展的，甚至于看到了自然界的矛盾，看到了矛盾是发展的原因，一般地看到了这种情况。用生产经验，自然界的一些现象，以及他们分析这种现象所得来的知识，给他们的印象，一切是有联系的、变化的、有矛盾的。这就是他们当时自发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同时，他们观察自然界的时候也是用它去观察的。

这种方法在中国，集中表现是阴阳五行学说。阴阳就是正负，就是矛盾。我们讲阴电、阳电，就有一些不赞成，他说天文学只讲正负不讲阴阳，这是咬文嚼字，不懂辩证法。古代讲阴阳就是矛盾，阴阳五行肯定物质，物质通过矛盾发生变化，物质是金木

水火土。我们写教科书可以多讲一些中国的东西，我们古代中国的哲学没有发展到原子能，但是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最高形式，它概括了很多自然现象，在医学上，天文学上都加以概括了，而且都用这种方法加以说明，这个说明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效的。有一个中医告诉我说，胃是土，土是万物，胃吃下了东西就可以产生全身的精力，所以用土象征胃，如果胃健康了，就等于土很肥，就可以使东西生长得很旺盛。这样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是不是对呢？也不一定对，因为胃不是土，但是有理由，是借土的意思来说明胃对全身的关系，它是一种比较合乎情理的猜想，所以这种思想方法总的还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够解决很具体的问题，在细节上不合乎事实。所以，这种思想方法到了科学更发展的时候，就被否定了。生产发展了，对自然的研究深入到了自然界细节问题上去了，这时古代唯物辩证法就站不住脚，因此在一个很短时期出现了近代形而上学方法，机械的方法。

机械唯物主义在许多方面是进步的，但它的机械、形而上学是消极的。那种认为17、18世纪形而上学是进步的，只是到了19世纪才是反动的说法是不对的。17、18世纪形而上学就有消极的方面，但是因为它在当时发展阶段，是必然不可免的，因此有进步的方面。它的进步方面主要表现在唯物论方面，虽然它是形而上学的，但是它深入到细节里实事求是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它是进步的，但是有消极的方面，不能够满足对自然界进一步认识的要求。自然界的研究只要稍微进一步，只涉及自然规律相互关系的时候，形而上学马上就表现了它的局限性。所以19世纪以后形而上学被否定了，出现了现代辩证唯物主义。

把这个问题从历史上说明，概括一下非常必要，这样就可以

补充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不足，因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从近代说起的，我们把古代部分加以补充，这个补充是必要的，我们根据恩格斯自己的思想来补充。

这个历史的概括说清楚以后，那就自然而然证明我们现在研究自然科学惟一正确的思想方法是辩证法，自然科学高级方法是辩证法，自然科学家应该自觉地运用辩证法。古代的阴阳五行是低级的方法，在古代曾经起过历史作用，用阴阳五行概括了古代医学、农业、天文学的经验，概括以后能够为这些服务，用这一套来说明它的进步方面。形而上学在一个短时期里也起过它的积极历史作用，在具体分门别类研究自然界细节的时候，暂时把它孤立地来研究是必须的，也曾经是积极的，但是这是一个很短时期，所以它不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方法。自然科学惟一的高级的方法，惟一正确的、没有缺点的方法，就是现代的唯物辩证法。古代的有缺点，形而上学本身就是保守的，只能够暂时运用。

再一个问题要说明一下唯物辩证法本身就是自然界规律知识的总结，当然也包括社会科学，但是我们讲自然辩证法，着重讲唯物辩证法就是一切自然科学规律最高的总结，它本身就是最普遍的自然界的规律，对任何一种自然现象，这些规律都是适用的。为什么我们的辩证法是最正确的方法论呢？因为辩证法本身是最普遍的规律，对任何自然现象都起作用，所以我们把这种规律当做方法指导我们研究，那么这种方法当然是最普遍适用的方法。

这是第二个大问题里面的三点。第一点，是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自然科学的理论是经验的概括；第二点，自然科学理论的方法论从历史上来说明，是经过古代自发的辩证法到形而上学，又到现代唯物辩证法，经过曲折的道路，因此现代唯物辩证法是最高的思想方法；第三点，说明为什么唯物

辩证法是最高的思想方法，因为唯物辩证法本身就是最普遍的自然规律，就是在自然界任何一种现象里都起作用的规律。

“总论”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

## 三、关于如何写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的问题

在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这个大部分里，主要是把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分别作一些说明。说明的方法主要是根据自然科学的成就，以自然科学的成就作为例子，来分别证明自然界中到处都有辩证法的规律在起作用。

我看恩格斯的书中关于“辩证法”这一章的意图也是这样。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有两段讲到辩证法，前一段是写成的文章，后一段是零碎的笔记。从前一段写文章的方式来看，大体上是要用全部自然科学的例子，来证明辩证法这些基本规律到处都在起作用，因此也就说明这些规律可以作为我们分析自然界各种现象的普遍方法，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恩格斯写了量变质变的规律，但是他在前面有一段举例说明这一篇文章本来是想在下面接着写对立统一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他在前面已经把三个规律都作了归纳。这个文章没有写成，只写了一半就停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写这个文章，就是要完成恩格斯所没有完成的工作。一方面应该补充一下，应该把量变质变的规律这一部分，用一些新的自然科学成就来加以补充；另一方面，对于对立统一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要重新加以说明，单独地作一些研究和阐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面没有写这两部分，但是也可以找到参考材料，在《反杜林论》里，对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讲了很多，对立统一的规律讲的少一些，我们也可以作一些研究。

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在没有分别讲三个规律以前，要对自然界的宇宙观，辩证宇宙观，或者叫做辩证自然观说明一下。不过，辩证自然观也可以在前一个题目，就是昨天已经讲了的第二个题目里写。第二个题目是从历史上说明我们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就使得我们人的思想由形而上学必然走到辩证法。或者从古代算起，全部人类历史随着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当然也包括阶级斗争，社会制度，但是我们着重讲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唯物主义发生了历史的变化（唯物主义有古代辩证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说：自然科学上有了重大的发现，就能够使唯物主义出现新的面貌。人类历史上思想方法的三个大阶段就证明这一点，证明在自然科学发展的不同时期，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就有不同的形式。世界上最高的形式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是辩证的方法论，是现代辩证法。现代辩证法是最高的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因此，我们在现代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应该自觉地运用辩证法。这是前一次讲的主要内容。讲完了这些题目之后，接着就可以讲辩证的自然观。恩格斯的“导论”也是这样，就是用整个自然界的发展历史来证明自然界自始至终是一直按照辩证法的规律发展的，由星云到地球上的生物、人类，整个自然界的发展是由低级到高级，经过量变到质变，逐渐发展到现在。自然界永远是向前发展的，自然界的发展，自然界本身就是辩证法规律的表现。

辩证法的自然观，可以在前一次所讲的题目的末尾来讲，也可以在今天讲的这个题目的开始来讲。如果前一次写的东西分量少了，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摆在前面来讲，作为它的引申或者证明。如果上面这个问题的分量已经太重了，那么就可以摆在下面写。今天讲这个问题就是从这里开始。

我们讲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首先讲一下辩证自然观，讲自然界的辩证的发展历史。用恩格斯那样写法，很简要地概括整个宇宙，整个自然界的发展历史。恩格斯在辩证的自然观中最后归结到驳斥“热寂说”。他的全部文章是讲自然界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发展。科学家有这样的观点：片面地用机械力学的原理来证明宇宙最后要消灭，最后由热到冷，全宇宙都要灭亡。这就跟辩证法的规律有矛盾了。我们眼睛里看到的宇宙是愈来愈复杂，愈来愈高级，不断发展，不是倒退到灭亡，而是愈来愈生气勃勃，因此对“热寂说”不能不加以反驳。恩格斯根据当时辩证法的原理，根据能量转化的法则，根据自然界发展形态的多样性，来说明“热寂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个理论是片面的，是用最简单的机械热学来说明一切。可是，自然界不是这么简单，自然界的发展非常复杂，用一种形态、一种规律想说明一切，这是错误的。恩格斯的意思大体上是这样。

当然，自然科学本身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明，但迟早是可以找到证明的，宇宙物质、热量不是不断分散，而是开始在某种情况下热量要集中起来，这种规律是可以找到的。这种“热寂说”是不符合辩证法的普遍规律的。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不仅仅是一般地叙述自然科学的成就，而是根据自然科学的成就加上辩证的现实方法、研究方法，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前途有很多预见，对原子学说，就像列宁一样，认为原子不是最后的东西。列宁说：电子也不是最后的东西，这些都是对科学发展的预见。比如说，生物最基本的特点是新陈代谢，这就概括了生物最根本的特点，同时也为生物学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可以预见的原则。苏联的勒伯辛斯卡娅发明返老还童的方法，其中有一点是对的，她认为生物的衰老是新陈代谢作用的衰退，要

想返老还童，就要使新陈代谢的作用旺盛。她的方法太简单了，什么用小苏打洗澡，以后证明这种方法不一定对。可是，这个原理是有道理的。恩格斯关于新陈代谢的说法为返老还童，保证年轻，防止衰老的这种生物研究，提出了一种原则，也可以说是一种预见。

关于“热寂说”的问题就是这样，恩格斯反驳这种学说，就为自然科学指出一条道路，就是自然科学家不要迷信片面的机械论，要相信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可能找到热量不是简单地、片面地分散，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会集中起来。前一个时期有一个错误的消息，说半导体的作用可以使热量由分散到集中，这是误传。这虽然是误传，但是说明自然科学家也在努力走这条道路。

我们讲辩证自然观，对“热寂说”要不要涉及呢？当然也可以涉及，不过不必要当做主要问题。主要问题应该是证明自然界是向上发展的，自然界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向前发展。

向下的发展有没有呢？也有。有前进，有后退，但是总的趋势是向上的，自然界发展的总趋势是由低级到高级。向下的发展也不断发生。地球有没有毁灭的一天呢？也可能，但是整个宇宙是不断向上发展的。辩证自然观提供这样一种乐观的世界观，就是世界是前进的，永远是向上的。

宗教的自然观跟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相反，宗教就是宣传世界的末日，讲宇宙的灭亡，用这些来吓唬人。

辩证的自然观这一部分叙述完了之后，还可以讲一下研究自然科学总的方法是辩证的。恩格斯写的《关于自然辩证法》这一章也是这样，他一开始说明跟形而上学的对立。在这里我们可以讲一讲辩证法是研究自然科学的总的方法，它完全跟形而上学相

反。就是研究自然界的现象，要把它看做是不断运动的、相互联系的东西。不断发展，不断运动，相互联系，任何一种自然现象都是这样，它本身有发展的历史，它跟周围自然界有复杂的联系。

还有自然科学的分类，究竟分为几个部门，也是按照辩证法的规律来分。研究自然辩证法，究竟研究哪些方面，自然科学应该分为多少部门，这是根据辩证法的发展规律来分的。辩证的发展规律，指出自然界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因此，自然科学的分类，排列方法，也大体上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比如说，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最后才能是心理学。这样的排列方法，叫做由低级到高级。

每一学科都有它自己的特点，都有自然界变化的形态，在低级与高级之间有不同的特点。自然科学的分类，按照自然界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特点来分，这种特点的产生是由于自然界矛盾的特殊性。

凯特洛夫的关于自然科学的分类学，我们可以参考。我们搞自然辩证法，不用搞自然科学的分类学，但是讲一般的方法论的时候，可以涉及。自然科学的分类本身符合辩证法的规律，符合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每一门科学都是研究自然界形态某一种矛盾的特殊性。列宁讲到这一点时说：数学中有正和负，微分和积分的特点。物理学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有光学、声学、力学，力学中有作用和反作用，离心力和向心力。物理学中的光学，有很多内容。光学当中又有波动性、离子性，这些都是矛盾的。电学当中又有阴电、阳电、正电、负电。列宁在《谈谈辩证法》中的表，可以作为我们的基础。

所以，总的来说，自然科学的分类是符合辩证法的，很自然的。自然科学的分类就是由低级到高级，自然科学发展的过程差

不多也是这样。研究自然科学必须研究最早的也是比较简单的自然科学。数学，力学比较早一些，以后出现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直到现在还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心理学中的问题就更困难了。自然科学发展的过程是由低级到高级，跟自然发展的过程差不多是相适应的，所以，人的认识过程跟客观世界发展的过程有某种符合的东西，这也是一种辩证法，认识的辩证法。

每一门科学整个的发展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同样对每一门科学的研究也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表面到本质，不断深入。过去的物理学只有一般的力学、电学、光学、声学，现在深入到电子物理学、核子物理学。它也是物理学，但是更深入，更复杂了。整个宇宙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人的认识规律也是如此。因此，科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也是如此，不断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所以，科学的发展是无限的，科学发展的本身就是辩证法，就带有辩证法的性质。

这些问题可以作为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的总论来说明。把这些一般的东西说明之后，然后可以分别来研究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

三个基本规律怎么样来安排呢？

按照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写法，就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开始写，然后是对立统一的规律，最后是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如果按照恩格斯的体系可以这样来写，顺序问题不是大问题。如果把对立统一的规律写在前面也可以。因为对立统一的规律是最根本的东西，是辩证法的核心。甚至像毛主席的《矛盾论》一样，在讲这个规律的时候，就把量变质变的规律也包括进去。由量变质变的规律开始写，也有它的理由，恩格斯的写法也有一定的理由。

理由是：

恩格斯的辩证法是从黑格尔的逻辑学里概括出来的。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包括三个基本规律，这三个基本规律就贯穿在黑格尔逻辑学的三个大部分中。黑格尔的逻辑学也是分成三个部分：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黑格尔的逻辑学有很多神秘的东西，荒谬的东西，唯心论的东西。但是，他的逻辑学的三大部分里合理的核心就是三条规律。大体上说，他的存在论，第一部分主要是讲量变质变的规律；第二部分本质论主要是研究对立统一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现在有的叫做肯定否定的规律，它在黑格尔的逻辑学里包括在第三部分——概念论里面。根据黑格尔的逻辑学的结构，恩格斯抽出来比较合理的三个规律来。黑格尔自己并没有明确地这样规定，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替他总结出来的。黑格尔的哲学里，如果把坏的东西抛弃，那么比较有价值的东西有三条规律。排列的方法是量变质变的规律是第一，对立统一的规律是第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摆在第三。这种排列方法有一定的理由。这种排列的方法大体上是符合辩证法的，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现象到本质，这是一种认识的顺序。因为人认识世界总是先把表面的东西认识了，先认识现象，从现象里区别不同的质和量。人的认识第一步是认识质和量，一般地区别事物的质和量，人的认识都是这样。

科学的发展，数学和天文学在先，基本原因是生产和阶级的需要。但从认识规律和认识过程来讲，人的认识开始深入到量和质的区别问题，这也是一个原因。认识的过程是根据这样一个规律：先一般地区别量和质，在没有深入内部本质以前，先区别一般的量和质，所以从量变质变的规律来叙述，这也是有它的理由的。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认识论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学和

认识论也是一致的，逻辑是从质和量开始的，认识也是从比较低级、比较表面的量和质的区别开始，然后进一步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本质就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更深刻的联系。内部联系里最主要的环节是对立的统一，对立和统一的联系，又对立，又统一，一切事物内部联系最本质的东西是对立的统一。所以，在研究量变和质变规律之后，再来进一步说明对立统一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是对立统一的规律进一步展开的表现。

所以，恩格斯的叙述是有理由的，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上继承和改造了黑格尔的哲学的结果。现在苏联的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就是这样来安排的。

三个规律从量变质变开始，其实用不着一定很死板地这样来做，不一定非这样做不可。我们先从对立统一的规律讲起也是可以的。比如，我们先讲一切自然科学都是研究对立的统一，然后从自然界，从自然科学里引出来大量的例子，说明每一门科学都要研究矛盾，研究自然界的某些基本矛盾。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特殊的矛盾要解决，没有哪一门科学不解决矛盾问题。

如果自然科学家把他所研究的对象看做是没有矛盾的，那么，这种思想就会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妨碍。比如，自然科学家认为原子就没有矛盾了，是最后的了，如果这个科学家的思想永远是这样，那么电子就没有办法发现了。如果发现电子之后，自然科学家又认为电子是最后的，认为电子内部没有矛盾了，那么最新自然科学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自然科学所以能够发展，就是因为科学不断地打破了形而上学。

拿光学作例子就很清楚。一个时期认为，光是一种粒子放射现象，看不到矛盾；一个时期又认为，光是波动现象。最后发现实际情况跟上面两种片面观点都不一致，而是两种情况都有。光

的特点既有粒子放射，又有波动，光本身就有矛盾。有一个时期认为，光不是一种有物体性质的东西，比如电子运动就应该是一种直线放射，但是，最新科学成就又告诉我们：电子运动也是波动，电子本身是粒子性质，但是它本身的运动带有光的性质。这些都是把大量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概括起来，来说明自然科学的每一步的发展都是跟形而上学观点对立的，都会打破没有矛盾的学说。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消息：科学研究发现电子本身也有复杂的结构。原来说电子就是最微小的单位，以后知道电子也有核心，周围还围绕着什么东西，它还有矛盾，矛盾是无穷无尽的。

科学上有一些学说，有些理论假设，还是有毛病，仔细研究一下，往往是违背对立统一学说的。比如，在生物学上，细胞是生物最后的单位这种看法，如果把它绝对化，那是错误的。当前的科学材料，还没有能够最后证明细胞以外还有什么东西是生命的特点。苏联有些生物学家曾经在这一方面作了研究，非细胞形态的蛋白质有生命的活动。但是，如果把这一学说绝对化了就有毛病。可以这样说：有生命的东西最后完全是带有细胞性的。因为一个事物由一个阶段发展到另外一个阶段，总是有一些基本形态，由这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是一个细胞形态。无生物到有生物总是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有生命的东西多多少少总是有细胞的形态。它作为一个新陈代谢的单位，它不能不是一种细胞形态，所以完全的生命最后的单位带有细胞的形态。但是，如果认为无生物细胞形态和没有细胞形态的东西之间，可以截然分开，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过渡的形态，恐怕这不一定正确。由没有生命，没有为完全生命的物质到有生命的物质之间，应该可能有一种带有生命的某些特点的过渡状态的物质。你说它已经是完全有生命形态，那也不能说，但是你说它完全不是

生命，那也不能说，这种情况在自然界发展的各方面都有。

比如，从猿到人，有一个基本的界限，就是制造工具。但是在制造工具以前有一种过渡状态，这个过渡状态是猿发展到接近人能够使用工具，有接近制造工具的状态，所以猿的最高形态叫做人猿，他不完全是人，但是在猿字上面加一个人，因为他已经接近人了。最高的人叫做猿人，他已经是人，能够制造工具，但是还有猿的性质。“北京人”已经是正式的人了，但是还叫做猿人。人和猿有一个基本界限，但是把人和猿的区别过分绝对化，也是不合事实的。如果说最高等的猿一点接近人的性质都没有，就是突然一个时期会制造工具了，这样也不可能。

特别是在认识方面，恩格斯在辩证法的“札记”里面说：高等动物也能够认识，接近认识的规律，有这种能力。但是，人的认识和动物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因为人有理性认识。理性认识的特点，就是他能够认识客观规律性。动物就不能认识这一点，动物是没有理性的，不能认识事物的规律性。但是，如果说，高等动物对客观事物的规律一点也不能认识，一点也不能把握，那也不合乎事实，至少它有一些接近规律的认识，接近认识事物的规律性。所以，恩格斯说：“但是，不用说，我们并不想否认：动物是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的。”（《自然辩证法》，第145页）下面还说：“动物之从事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和神经系统的发展相适应地发展起来了。”（同上）

这些问题都说明了：人和动物有基本的界限，在认识上有基本的界限，可是这个界限不能太绝对化，太绝对化了就找不到过渡的桥梁，过渡就成为突然的了，就没有过渡了。在人和动物之间有过渡的东西，这些东西积累起来到一定程度，才能够转变成为人。高等动物已经有一些思考的能力，那种思考是形象的思考，

不是用语言。用抽象的理论思考，是用表象来思考。比如，狐狸装着睡觉，装死，等到乌鸦由树上飞下来的时候把它吃掉。这是有计划的行动，但不是一种理性思维，而是动物的思考。这种能力是一种过渡状态，不能说这与人的思考能力有根本的区别，而是一种过渡状态。但是这种过渡状态是很重要的，这种能力积累起来，发展起来，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能够达到制造工具的能力，就发生突变。所以说，在质变以前，它有很多量的准备，在准备的过程中，有许多部分的质变，成为总的质变的一个准备阶段。

所以，根据辩证法由低级到高级两个不同的阶段中间，不要把对立统一性绝对化了。由低级到高级的转化有过渡条件，这些原理不能违背，违背了这些原理，有的时候就会阻碍科学的发展。比如，如果说在细胞形态之外不可能找到任何接近生命的因素，如果有了这种观点，那么生物学的进一步研究就要受到阻碍，因为生物学不但要研究细胞，还可以进一步去探讨有没有比细胞更高一些的、过渡状态的东西。研究这些问题有什么好处呢？有这样的好处：使得我们人类在自然科学上能够把握由无生物到生物的全部规律，甚至于把握人工来制造生命的规律。用人工制造生命的第一步是制造蛋白质，蛋白质已经制造出来了，但是要它变成生命，这一点还没做到。而要用人工制造生命，就要探讨由细胞到非细胞的中间状态，或者说是由细胞到非细胞的中间过渡规律。如果明确地找到了这个规律，我们就有把握用人工制造生命。如果能制造有生命的东西，那么对各种化学的发展就会有很大的贡献。

应当举例子来说明：我们自然科学家如果有了形而上学的观点，就会阻碍科学的发展。科学家应该任何时候都自觉地注意到研究大量的矛盾，任何时候都要去揭露矛盾，不要只看一方面。

在生物学上，摩尔根学派的思想可能有些片面的东西，他只看到遗传这一方面的因素，把它片面地绝对化了，他把遗传和变异之间的矛盾看做变异是没有规律的、偶然的。虽然他的研究本身是有发展，有进步，有价值的，但是现实问题有些片面。米丘林这一派克服了这个片面，看到了遗传和变异的矛盾，看到了遗传和变异的斗争性和统一性。变异和遗传是统一的，两方面都有规律性。李森科学派相信能找到变异的规律性。不过这一部分规律现在掌握的不一定够，但是坚决相信能找到这一点是对的，所以在观点和思想方法方面，总是觉得这一派比较全面一些。但是，也有缺点，就是对生殖细胞、细胞核这些问题研究的不注意，或者说注意的很少，有些著作强调外因太多了一些，变成外因是第一位的了。当然，外因也是重要的，但是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生物的发展和它的环境的不可分的联系，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如果只谈到外部联系，或者是对外部联系强调的多了一些，那也是不恰当的。这些问题都说明自然科学的研究不能违背辩证法。

上一次讲到，有些教科书，是李森科学派的人编的，他把这些问题绝对化了，因此在教科书上关于细胞、原形质的问题都不谈了，中学教科书上应该有这些基本知识。光讲嫁接、杂交这些问题，这样也不正确，如果生物学只研究这一方面，那么对生物学的发展就会有障碍。内因和外因也是一种对立的统一，没有全面地注意对立和统一，外因强调的多了一些，也是不恰当的，这样对科学研究就有阻碍。我们想一想，如果所有研究生物学的人，不研究细胞了，显微镜也不看了，只搞嫁接、杂交这些东西，那是不是能够很好地发展，当然是不能很好地发展。

在讲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时，可以阐明这些问题：

要用科学研究的大量成果来证明对立统一的规律是普遍的、

正确的。然后引申出结论：就是科学研究的方法应该注意自然界的矛盾，应该相信自然界处处都有矛盾。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分析矛盾、揭露矛盾。不能把研究对象看做是没有矛盾的，任何时候也不能这样做。然后再讲量变质变的规律；再讲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量变质变的规律，基本上可以参考恩格斯的写法。但是，在恩格斯的时代，门捷列夫的规律还不很完备，不像现在这样发展，我们可以根据新的成就来证明规律的正确性，证明我们如何运用这些规律研究自然界的现象，我们可以在理论科学上得到很重大的成就。凯特洛夫的著作主要是化学方面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研究的比较多，我们可以利用他的材料。

门捷列夫的周期表对量变质变规律是很好的证明。门捷列夫自己不是自觉地运用辩证法，但他在实际上运用了量变质变的规律来总结化学研究的成果。他自己在试验方面不一定有什么创造，他就把以前许多化学家研究的成果用量变质变的规律加以总结和排列，就找出规律，就把元素相互关系的规律找出来了，这在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上就有划时代的作用，对化学的进步起了很大的推动。

原子价的学说也是对量变质变规律很好的说明。今天不只是用周期表，用原子价来说明，而是要用原子、电子来作深刻的说明。在原子里面，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说明，而且这个说明可以得到实践的证明，这个实践就是核分裂。现在还可以制造人工元素，这一点也可以说明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讲量变质变的规律，可以比恩格斯讲的丰富得多。不只是讲化学方面的东西，物理学、化学都可以联系起来说明。

在生物学方面能不能找到很好的例子呢?

生物学方面也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生物学的发展，生物的生长，跟量变质变规律有密切的联系。某一种植物，某一种生物，一年需要多少阳光才能够长成什么样，这就是量变质变规律很好的证明，这一方面的材料很多。比如菊花，它本来是秋天开的，但是现在说它提前到夏天就开。因为秋天白日的长短适合菊花开放，而夏天白日太长，它不能开，我们找到这个规律之后，就能让它提前开。在其他季节时，就有一定的时间把菊花放在暗室里，让它见阳光的时间和秋天一样，结果它就提前开了。当然还有一系列的处理，要早一点把花苗弄好，不能让它受冷。这就说明菊花的开放对阳光的关系，有一定量的限度。每一种质都有量的限度，超过这个量就没有这个质了，或者是不够这个量，就没有这种质。生物学的研究也可以按照这个规律。这就说明自然科学的研究应该运用这个规律。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的成就来证明这个规律，另一方面根据这些证明得出结论，就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应该遵守这种规律。关于量变质变的规律就讲这些。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基本上可以参考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讲的一些问题。他运用了最普通的例子来说明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是普遍的规律。我们现在可以换一种说法，把它叫做肯定否定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原来是黑格尔的提法，我们改一改也好。改一下有好处，可以说明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本身也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现。对立统一规律是最根本的规律，量变质变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量变质变规律本身有量变和质变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也是这样，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基本上就是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说明一切事物本身是一个肯定的东西，但

是肯定中间包含有否定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就转化为否定。比如，猿猴肯定是猿，绝对不是人，一定要划分界限。但是，猿的生活里面总是包含有否定猿的因素，这是一个对立的统一。这种否定的因素发展到一定程度，具备了一定的条件的时候，那么肯定就转化为否定，就是从猿变成人。

一切自然界的现象都是这样的。由量变到质变，实际上就是由肯定转化为否定，量变中间就有质变的因素，一边是肯定量变，但是它包含有部分质变，或者说不显著的质变，不是总的质变。这些不显著的质变，也就是否定的量变因素积累起来，到一定程度，有了适当的条件，马上就会实现质变，由肯定转化为否定。否定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自然界也是经常出现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但是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不是突然而来的。革命性的变化就是否定。否定这两个字就带有革命性的意思。要根本变革，这样才叫否定。但是这个否定不是突然而来的，不是偶然的，不是没有规律的。否定是在肯定的过程里，准备起来的。因为在肯定中间包含有否定。一个非党员在进步的环境里，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包含着有进步的因素，可以有许多否定他是非党员的因素，到了一定条件下，他就可以发生根本的变化，由非党员到党员。否定之否定重要是说明否定、肯定的关系。

《反杜林论》中，着重讲了三个阶段：由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肯定。在谈这个问题时，恐怕主要谈这一方面。

自然界是怎么样发生革命的变化的呢？自然界肯定的过程怎么样引起否定的转变呢？从这方面来说明，我们就可以找到更多的例子，这就是把量变质变的规律更深入一步地作了说明。量变质变的规律，就是说明事物的量变，经过一定的积累，达到质变。关于量变为什么会引起质变？这个问题量变质变规律本身不能得

到解释，只有对立统一的规律才能解决。对立统一的规律又着重表现在肯定、否定这个规律方面。量变为什么会引起质变，就是因为量变的过程是一个肯定的过程,这个过程里有否定的因素,产生了否定自己的东西,这些否定自己的因素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发生否定性的转变，就引起质变。质变就是否定，否定也就是质变，也就是革命性的变化。

这个问题在以前写提纲时没有讲清楚，有些毛病。提纲中说：否定了某些方面、某些特征。实际上，否定的不是事物的某些方面，而是根本的改变，根本的变化。某些方面的变化，在量变的过程里也有，量变的过程里有部分的质变。但是，讲否定，是指根本的变化，是革命的变革。在这里，必须要搞清楚：量变过程里的部分的质变和整个东西的根本否定的区别。否定，是讲根本的变化，是整个的质变。当然，部分的质变本身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否定，就部分来说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否定，所以问题不能讲的太绝对，辩证法是非常错综复杂的。

总的来讲，凡是否定，都是讲一种事物的根本变化，根本的、带革命性的变化，不是指的部分的变化。如果要把部分的质变当做否定来看，就是把部分的质变当做独立的东西来看，就部分来说，也是一种否定。如果这样来阐述肯定否定的规律，我们就可以找到更多的例子。

按照恩格斯的写法，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在日常生活里到处都有，例子是很丰富的。但是，有些事物不一定恰恰是三个阶段，有的时候三个阶段中断了，有的时候有第一段和第二段，第三段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表现出来，在科学研究上不能马上发现。恩格斯举例说：地球以前是一种热的气体，带有向四方分散的性质，这是肯定的。经过很长时间它凝固起来

了，变成固体，向内部凝固，在地球这个固体上慢慢发展出现了生物，这些生物又有向周围离心的倾向，向四周放射。所以，由低级的气体的放射状态会变成固体，这是一个否定，固体上有了生物，有了向外放射的倾向，这就是否定之否定。

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是普遍的规律，是到处可以找到的，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或长或短的时期内都能得到证明。问题是有的过程中，三个阶段并不能够马上看出来，有时中断了。比如，鸡生蛋，蛋生鸡，鸡又生蛋，这是三个阶段，但是如果把鸡杀了，这个过程就中断了。有时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把三个阶段看出来。所以，有时看起来有些事情不一定是符合否定之否定，好像这个规律不是那么普遍。曾经发生过这个争论，有些人认为这个规律不一定是普遍的。但是，恩格斯认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是普遍的，三个阶段也是普遍的，我们从他的叙述里可以看出来，他从各方面找例子，从日常生活，到人类社会，到政治观点，一直到世界观。他为什么举出这么多的例子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证明三段的发展是普遍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在发展过程上来说，是一直不断的，是曲折的发展过程，是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不是说世界上的发展只有三段，不是三段的发展不断反复，而是形成螺旋形的，不断曲折的发展。没有哪一种事物是纯粹直线的发展，看起来是很直的东西，仔细观察它还是曲折的。比如一枝笔，我们看起来是直的，可是放在显微镜下面一看便不是直的。完全直的是没有的，或者在显微镜下看不出来的东西，按照电子学的标准来看，它还是曲折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从总的发展过程来看，无非讲一切发展过程都是曲折的，都是绕圈子的。这是平常人都可以知道的，是常识上可以理解的规律，并没有什么神秘。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发展是通过矛盾才能发展，不是没有矛盾。发展要

通过解决矛盾，所以不能不是曲折的。发展是两种对立斗争的表现，不断出现矛盾，不断解决矛盾，这就使得事物的发展出现曲折的过程。电子运动为什么有波动性，光的运动为什么是波动的，这些东西在自然科学上可以找到说明，运动本身的矛盾，使它发生这种曲折性。

人类社会历史中可以找到比较明显的例子，因为有阶级斗争。但是自然界有些问题没有研究清楚，往往看不出。生物的发展就是遗传和变异的矛盾，这是基本矛盾之一，遗传和变异这两种东西互相斗争，这种斗争是曲折的，有时变化得跟原来不同了，有的时候又倒退回来。有这种情况，如古代白人之后，突然有一代出现黑人，以后又变成白人。这就是遗传和变异的矛盾产生的问题。孟德尔的试验也表明这种曲折性。他用白兔、黑兔交配的结果，出现四分之一的白兔、四分之一的黑兔、四分之二的花兔。这里面看出它的曲折性。

社会的发展，比如一个新社会出现之后，它也有前进、倒退，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经过多次反复。法国革命是彻底的革命，革命之后来一个合并，合并之后又共和，共和之后又合并，有第三共和国。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已经胜利了，还可能出现倒退。无产阶级的国家可以出现革命斗志经常高涨的情况，也可以出现革命斗志忽然低落的现象，低落之后，也可能由于其他的原因，很快地再低落下去，也许受到刺激可以又高涨起来。所以，在搞社会主义社会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不是简单的事情。现在年轻的同志可能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得比较简单，认为只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天下就太平，就是直线上升了。我们过去搞革命的时候也有这种想法，认为只要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就行了，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

我们国家革命胜利十多年了，有过许多曲折，还有许多问题。所以，建设共产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艰苦的努力是不行的。现在我们还需要刻苦，不过现在的情况已经比战争时期好多了，那简直是不能比。在延安困难的时候，只能吃小米饭和盐水。我们今天不会有这种情况。尽管如此，但是我们现在有困难，将来也还会有困难，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仍然是曲折的。

为什么会产生曲折呢？

就是因为有斗争，社会上仍然有斗争，又有对自然界的斗争。矛盾也就是对立的统一，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统一，有人和自然的对立统一，这种对立统一的斗争是免不了的，因此发展是曲折的。

现在讲辩证法时，讲了这么多社会科学，这就不是自然辩证法了，但是自然辩证法也是这样。我们讲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也可以根据自然界内部的矛盾来说明自然界发展过程的曲折性。

所以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基本上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肯定和否定的关系，肯定包含否定，到一定时候转化为否定；另一个问题是由肯定到否定，到再否定，这是一个不断曲折发展的过程。我们讲自然辩证法就要着重搜集一些新的科学发展的材料来说明这些问题。因此，从这里也就使我们引申出结论：观察自然界现象要按照规律来观察，要根据自然界发展的曲折性做出思想方法的结论来。

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就讲这些。

关于总论部分就讲上面这些，你们组织几个同志写一下。分论部分大家已经写了，就按照现在的写法搞下去，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很多意见。

## 四、关于如何写“分论”和工农医的问题

下面讲一下分论和工农医的问题。

分论无非是把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这一部分思想，运用到自然科学的各部分中去作一些说明，就自然科学各部门来进一步作一些证明。因为讲基本规律的时候，不能每一个部门都涉及，只能从各部门引证一些例子来作解释。现在写各部门的问题时，就要对自然科学各部门作一些具体分析，来说明自然科学各部门怎么样研究矛盾，分析矛盾，这里面对各部门所研究的自然现象，要研究它怎么样符合于量变质变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和对立统一的规律，就各个部门本身的系统来作一些分析。

关于这部分，听说已经有人写出来了，能写出来就好，就有底子了，就可以修改。我们毕业的时候，不能拿出价值很高的东西，只要把稍微详细的提纲拿出来也好。只要大体上方向对了，有一个条理，自己回去也有一套可以讲的了，这些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基础。我希望这一次我们能搞出像样的东西来。

分论中的每一个部门，大家可以就自己所了解的知识拿来分析，研究。我听说，有些同志好像用写论文的形式，这个形式有一个缺点，就是很多论文集中之后，联系不起来。现在初步写，有这个缺点也用不着害怕，写出来就是好的。

分论是按照自然科学的分类来排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在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这一部分开始讲到过分类问题，这一部分是不是可以移到部门分论这一部分来写。摆在分论前面也有好处，就是先把自然科学的分类符合辩证法，符合人的认识规律这些道理讲一下，说明我们的分论这样排列是对的。数、理、化、生物，这样的排列是符合辩证法的，符合认识的发展规律，使认识的发展

和自然界的发展统一。把这个道理一说，好像对分论也是一个小的证明，然后再按照数理化排列下去，这样的写法是适当的。

提纲的系统是可以考虑的，我所讲的系统，不一定是死的。我所讲的问题，有些是可以肯定的，像第一个大部分，可以肯定那种写法，第一部分讲一讲自然科学的发展历史和方法论的关系，也是肯定的。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可以从对立的统一讲到量变质变，再讲到否定之否定，这也是可以肯定的。小的总论摆在什么地方可以讨论一下。辩证的自然观可以摆在第二个问题，也可以摆在第三个问题里。科学分类问题好像还是放在分论部分好一些，这样逻辑上比较自然一些。在自然科学各部门分论前面有一个帽子，科学为什么这样分类，分类为什么这样排列，都可以按照辩证法说明一下，然后再一门一门地作说明。至于分类的内容，由大家创造，究竟那一门怎么写，我也没有这个本领来讲，因为自然科学的知识很少，所以具体内容我就不讲了。

关于工农医的问题怎么样写法，恐怕也是要有一个总的帽子。这个总的帽子大家没有写，以后可以补，写完之后可以当做序论加上去。

总的帽子要说明这样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研究自然科学的目的，是要认识世界，要改造世界。就是说，不仅仅要认识世界，自然科学各部门的分论这一部分，大体上的认识世界为主，用辩证的方法来认识自然界，认识自然界各部门，证明自然界各部门的规律都是符合辩证法的。分论的前面这一部分主要是告诉我们认识自然界用什么方法；而工农医这一部分主要是解决改造自然的问题。我们不但要认识自然，而且要改造自然。改造自然用什么方法呢？认识自然要用辩证法，那么改造自然同样也要用辩证法。总的是要说明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认识自然，应该运用辩证的方

法作为我们总的方法论来改造自然。我们改造自然的活动，凡是成功的活动，工业也好，农业也好，医学也好，凡是有成就的，就其方法论来说，都是符合辩证法的，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里所说的唯物辩证法是广义的，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是结合着的，就是说认识论、逻辑学也包含在内。我们整个这本书是把认识论、逻辑学、辩证法结合起来的，这一点大家务必要注意。第一个大题目——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中，认识论占很大部分。认识论就是辩证法。

改造自然，我们主要是通过工农医来改造，通过工业、农业技术和医学来改造。技术和理论是分不开的，直接改造自然是通过技术，那么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创造发明是要遵守唯物辩证法的规律的，在认识上要遵守认识的规律，在分析问题的方法上要遵守辩证法的规律。

技术的创造发明要遵守什么规律呢？

过去的自然科学家通过实验找到一些创造发明。通过实验和思考，无非是观察，假设，试验，然后去找到规律，运用到自然界去，然后根据规律制定一些技术运用到工农医方面去。但是，不管工业也好，农业也好，医学也好，最重要的是要根据大量的生产经验，找到技术创造发明的根源。工人、农民在技术上可以有很多新创造。要说明一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工人、农民积极性的提高，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从他们中间产生了很多创造发明。有些创造发明往往是工程技术人员所不能解决的，往往是专家的试验室里所不能解决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工人、农民有长期实践的经验，技术人员解决不了的问题，工人、农民可以解决。像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来说明，有些例子不一定是保密的，我们运用材料时要进行考核，材料一定要真实。

大跃进时为了鼓舞工人、农民的干劲，有时把技术人员挖苦一下。我们现在用这些材料要实事求是，注意不要太片面了，不要把技术人员的作用完全抹杀了。在有些生产部门里，有些老工人，他有长期生产经验，能够解决生产中的困难问题，这不是在1958年是这样，就是在1958年以前也有很多创造，像张明山的反围盘，这种创造是有国际意义的，日本人没有解决的问题，他解决了。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是认识规律在起作用，要有长期的感性认识，然后才能解决问题。因此，在技术上，在工业、农业、医学上，技术人员要跟工人、农民相结合，要讲“三结合”的问题。

有人说：“三结合”的问题包括在群众路线里，这种说法也对。不过在第一部分总论里面，要一般地讲到群众路线。

在专家方面要展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科学技术本身研究问题，不要随便戴政治的、阶级的帽子。李森科和摩尔根的争论，在科学本身不应该戴修正主义或资产阶级的帽子，不能说摩尔根的研究都是资产阶级的，只能说摩尔根学派科学家的某些解释有唯心主义观点。在这一点上，一定要非常实事求是。这是掌握科学的问题，不是科学本身的问题，科学本身的争论不能戴阶级的帽子。科学理论、科学的解释可能有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争论，这也要有阶级分析，很实事求是地提出我们的观点。也不能说某一种解释有一点唯心主义观点，就已经成为资产阶级，那也还要研究。比如，李森科这个人，可能就是搞宗派主义，他的宗派主义有资产阶级观点，压制批评，搞权威主义。可是又说：李森科的学说是无产阶级的，摩尔根的学说是资产阶级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呢？就是我们要把科学本身的问题和什么人来掌握科学的问题分开。李森科所研究的科学本身，无所谓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嫁接、杂交这些东西没有什么阶级性，摩尔根的

基因也没有阶级性，不是一讲基因就是资产阶级，基因不过是假设，这个假设还不明确，以后可以改进。基因的问题也不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问题，而是一个科学假设。对基因的解释片面了，把它看做是绝对不变的，那就有形而上学观点。所以有形而上学观点，也可能是受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也还不是因为基因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这些问题比较复杂，要分析清楚。李森科的学说本身没有什么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问题，而是这个人的做法有些是资产阶级的，他的学说本身有些观点符合进化论，不违背进化论，因此不违背辩证法，所以它是正确的。在科学上不能太偏袒哪一方面而抹煞另一方面，这是科学研究中群众路线的一个方面。

科学技术人员要和劳动人民结合，也是群众路线的一个方面。这一方面放在第三部分讲，就是在工农医的总论部分来讲。这里群众路线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

工农医分开来讲，也是要把总论里的一些思想分别在各方面讲一下，也要说明必须要和群众结合，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不要有形而上学的成见，保守主义思想，因为那种思想就是否认矛盾，否认技术内部有矛盾。这种保守主义阻碍技术的迅速发展。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以能够发展得很快，就是坚持了辩证法，批判了一些不合理的因素。

这里附带讲一下批判和继承的问题。

批判和继承这是分不开的，继承就是要批判，批判就是为了继承，继承也要有发展，批判就是为了继承和发展。总的来说，对过去的遗产，是又要批判，又要继承，批判就是为了正确地加以继承，并且能加以发展。如果没有批判，那就是保守主义的继承，也没有什么发展。

上面讲的是对待继承遗产的总的方向。至于遗产的某一部分，是不是可以全部继承下来，这要具体分析。就整个遗产来说，是又要批判，又要继承。批判什么东西呢？就要批判它的糟粕，批判没有价值的、错误的东西。继承什么呢？继承比较合理的东西。所谓正确的东西，就是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东西。正确的东西，总的来说是主观和客观一致的东西。所谓一致，也不会是绝对一致，而是在某些方面的一致。批判时，一方面是批判错误的东西，另一方面也要指出来正确的东西也是有限度的，正确的东西也是不够的。批判的结果就使得我们把正确的东西接受过来，又把不够的东西加以补充，因此就把它发展了。

可不可以有些东西原封原样的继承下来呢？

就遗产个别的因素来说，如果它已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因素原封原样地继承下来是可以的。但是，任何东西都不是孤立的。所谓原封原样地继承某一部分，这是抽象地来讲，只是把这一部分暂时孤立起来讲，实际上把它原封原样继承下来以后，它还是要和别的东西结合起来，还是要被发展。比如，牛顿的三大定律我们原封原样地继承下来，但是我们现在讲整个力学的体系，就要把三大定律摆在适当的地位讲。就是说，三大定律适用的范围是有条件的，要把这一点搞清楚。因此，实际上三大定律是被批判、被发展了。就三大定律本身来说，它跟牛顿时代没有区别，但是理解不同了，我们对它的看法不同了，在力学上摆的地位不同了。牛顿说的只有三大定律，而现在我们说三大定律是整个力学体系里面的一个部分。因此，实际上它是被发展了，就是它所处的地位和以前不同了，我们对它的看法和以前不同了。从它本身孤立地看，是原封地接受下来了。在遗产里有许多东西，一个一个地因素来看，好像是原封接受下来了，问题是我们接受下来

后，又成为一个新的体系，就不是完全原样的东西了。

我们讲科学技术在认识论上要跟群众结合，在方法论上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支持新的，批判旧的。不管是技术员，还是很有名的工程师，如果你是保守的，我就要批判。哪怕是一字不识的工人，他提出的意见的确是有充分的经验作根据，那我就要支持他。这些思想在总论里也可以讲一下。

在分论中要讲工农医。

在工业方面，一方面要讲一讲创造发明。许多创造发明都是打破保守主义，依靠工人阶级而成功的。在工程技术人员中，也有先进的，也有不同的意见，那就要展开争论，百花齐放，不能让保守主义者的一种意见支配一切，要让各种意见展开争论。工程技术人员能够得到进步，依靠不同意见的争论，起很大作用。

两条腿走路也是一种群众路线，也是百花齐放。一条腿走路就是大的、洋的东西，就是单独的一枝花。那么两条腿走路就是土的、洋的、大的、小的各种各样的结合。所谓洋，就是机械化的程度比较高；机械化程度比较低，甚至于没有什么机械化，基本上是手工业的，这就是土。土与洋的对比，将来会改变，也可能将来各种行业机械化的程度都高了，所以各个部门土洋的分法是相对的。土洋结合就是两条腿走路，就使得工业里能够得到百花齐放，使得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这样就加快我们改造自然的速度，壮大我们改造自然的力量。

毛主席在1945年讲到愚公移山的问题。他说：我们革命要用愚公移山的办法。愚公下决心世世代代要把太行山挑掉，他的决心感动了天神，用神的力量把太行分开了。毛主席说：神是没有的，不过只要我们有决心，我们的决心就会感动群众，群众就会像天神一样帮助我们。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如果我们没有

群众，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胜利，因为感动了群众，1945——1949年，四年中就把蒋介石打垮了，把美帝国主义吓跑了，原子弹也不敢丢了。科学技术中也有这个问题，有了群众运动，力量就大得很，就可以使我们的建设速度加快，可以把建设速度发挥到最高度。方法就是发动群众，就是要发挥群众的力量。

这些问题也涉及到经济学的问题，技术和经济是分不开的，我们也可以讲一点。在技术上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我们的经济制度，也说明我们的政治。农村里有这样的说法：从前是愚公移山，我们现在是二郎担山。这种说法是很聪明的，群众自己把自己当做神，有了群众，我们就等于是二郎担山。二郎担山就比愚公移山快得多了。我们在科学技术上的研究方法，就是二郎担山的方法，通过群众来解决问题。

还有打破神秘观点，有些很困难的问题，保守主义者认为是不能解决的，英、美的书上没解决的问题，我们是不可能解决的，可是我们依靠工人还是想办法解决了。

农业方面，大家着重讲"八字宪法"，重点应该是讲全面观点，应该看具体条件来运用。比如，密植问题，这不是一个死公式，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必须密植多少，有的土地可以密植的多，有的土地可以密植的少，不同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密植规格。深耕要耕到什么程度，要有一定的量和质的控制。现在看起来，深耕七尺，一方面是人力来不及，另一方面也不恰当，挖的这样深，结果土太松，不好浇水。深耕是好的，但是有一定的量的控制。量变质变的规律在这里有很广泛的适用范围。运用"八字宪法"一定要根据客观条件。过去苏联有过问题，搞轮种制是好的，但是不根据客观条件，到处搬用，结果就搞不好。密植、深耕问题也是一样。在讲工业问题时也要注意这一点。

在工业问题里，除了讲群众运动之外，就要再涉及一个问题，就是群众的创造发明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之后，就要把这些创造发明作科学研究，研究它的量和质的规律。科学规律差不多都是量和质的结合。水到一百度才沸腾，不到一百度时就不沸腾，这就是量和质的结合。超声波到处运用的结果，规律研究何在？多少频率的声波起多大作用，震动五千次起什么作用，震动一万次起什么作用，震动的次数不同，它的质就不同。专家要和群众结合，专家要把群众的经验加以总结，把创造出来的经验变成规律，变成条理，然后才可以正确地运用到技术上去。群众运动往往是“乱来”，“乱搞”（不是坏的意义上的乱搞，而是大胆创造试验），在试验中间，没有经验，没有规律，可以有很多很好的成就。这些试验的结果要综合起来，找出比较重要的规律，然后再进一步运用。在群众运动中，开始的时候有一点浪费是免不了的，但是过一个时期，经过研究，就可以找出规律，这样就可以运用的更正确，减少浪费。这些问题在工业、农业里面都可以加以说明。这就是所谓总结经验，找出规律，使得我们知道如何按照条件、地点来运用技术。

在医学上，中西医结合是一个重点问题，大家着重讲这一点是可以的。这里面有百花齐放的问题，也有总结经验，找出规律的问题，也有辩证法认识论的问题。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精神来写，还是要大家创造。我们也要搞群众运动，大家来搞，“乱搞”一下，乱一点不要紧，文章写的差一点也不要紧，以后可以慢慢再修改。

今天讲到这里，有问题以后再谈。

# 社会主义学院讲课提纲*

(1960)

## 一、哲学的任务是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古代哲学是要求真理。辩证唯物主义是要求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一思想正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世界观是对世界的总的看法；方法论是一切方法的总纲领。有了总则，就可以指导多方面的具体方法。

要改造世界，必须正确认识世界，先要求得正确的认识。

学哲学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认识从哪里来？先天的或后知的、精神第一或物质第一、主观自生或客观反映。

二是什么是正确的认识？自明的、良知的，符合于客观情况的、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能得到证明的，唯物主义坚持后者。

但辩证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不同。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一次认识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是过程。世界是发展的，不能一次完结；

---

* 这是艾思奇留下的一份手稿。不知道什么时候讲的课，也没有讲课记录。这份手稿没有写明时间，估计在1960年前后。整理时只作了少许文字、标点的加工。

认识也是发展，不能一次穷尽世界。

发展观两种：本质不变的世界，发展是对立统一。每一种事物是对立的统一，发展是向对立面的转化。

## 二、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辩证的发展过程

就整个人类认识来说是如此，就个人来说也是如此。

实践是历史的、阶级的，生产发展的不同，阶级不同，认识也不同。

实践提出认识的要求，实践规定认识的历史限度，对自然界的认识如此，古代只能有天文学，近代才有力学及多门科学。

社会科学亦如此，每一时代阶级的认识都有局限性。资产阶级的愚蠢。

认识的任务在于把握事物及其规律。

每一事物的认识都要经过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

每一次实践和认识都是由感性到理性、由个别到一般。

认识是无限深入的过程，但过去剥削阶级的立场限制深入的过程，因为认识要解决一点人的问题，要满足阶级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认识不受绝对限制。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认识过程中贯彻群众路线。

正确与错误。

真理，绝对和相对。

## 三、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

辩证法是研究世界事物的最普遍的规律。规律即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所以，辩证法是普遍联系的科学。

各种规律中，对立统一是最根本的规律。

把普遍规律作为方法的是辩证法。

辩证法是二分法，和形而上学的一点论是对立的。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要求自觉地承认两分法。

坚持片面，迟早要走到反面。形而上学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辩证法是自觉地观察两极的联系，自觉地注意到它的转化。

辩证法研究对立面在什么条件下，怎样联系起来。

由各个片面的研究到总体。

同一性和斗争性。

# 进一步学习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

## ——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笔记

(1961.3)

### 一、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短短的四年中间，几亿中国人民突然站立起来，打倒了一百多年来压在自己身上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几千年来压在自己身上的封建势力，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独立的大国。这一个震动世界的历史奇迹，为什么能够出现，而且必然地出现？仔细学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就能够了如指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文章，深刻地分析了这个时期国际和国内的复杂情况，全面地揭露了当时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矛盾，在每一个发展环节上及时地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来指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使中国人民终于能够那样迅速地，势如破竹地和有条不紊地夺得了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的彻底胜利。

学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不能不亲切地感受到一种锐不可当的改造世界的力量。这是什么力量？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力量。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并使它成为掌握在中国人民群众手中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一旦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就变成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的物质力量，哪怕在当时是不可

一世的美帝国主义者，哪怕是受这个帝国主义者全力支持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在这个力量的打击下面，毕竟不能不归于“一败涂地”。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五四运动时期来到中国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先进的人们曾经努力从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中寻找救中国的武器，但多次的尝试都失败了。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先进的人们就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6页）。“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这就是说：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重新加以分析研究；通过这样的分析研究，来揭露中国社会的矛盾运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性，并以此为根据，制订改造中国的革命纲领和政策；在这些纲领和政策的指导下，组织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使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指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是经过不断的学习、摸索和斗争的过程而日益发展、日益达到更完善的境地的。我们的党有着像毛泽东同志这样杰出的代表，他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面，针对革命发展的每一个时期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正确的分析，制定了正确的理论、政策、路线，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地获得创造性的发展。但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正确的理论、政策、路线，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经过了许多曲折而艰苦的斗争，才

逐步为广大的党员、干部所领会所掌握。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党在缺乏经验的幼年时期，犯了陈独秀所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接着又犯了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这些错误使革命遭受暂时的失败和挫折，同时也使广大的党员、干部获得了宝贵的教训。1942 年到 1945 年的整风运动，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总结了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清算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党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学习到如何应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52 页）这样就把全党紧密地团结到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面来，并且通过党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路线，贯彻到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中间，这样就开辟了中国革命空前地迅速高涨和迅速取得胜利的时期，这就是紧接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又获得人民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的时期，这就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所包括的时期。

如果说，在《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所包括的几个时期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同志是怎样通过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经验，领导和教育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一步步地粉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起来，学会正确地应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和解决国家命运的问题；那么，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我们又看到，当这个发展过程达到了成熟的境地时，当全党都团结到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当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为广大干部和党员所掌握，并从而成为人民群众革命行动的指

南时，就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上迅速地开放出非常灿烂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

这是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的果实，这个果实的结成，同时就是另一个新时期的发展过程的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开始。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智慧之光，不但把中国人民引向全胜的境地，而且还把这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基本方向，也为我们明朗地照耀出来。中国人民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向前战斗，又获得了多少辉煌的胜利！将近十一年的短短的时间里，就使社会主义革命任务逐步得到了实现，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旧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机关和广大干部和党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继续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结果。

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是非常远大和非常艰巨的。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照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说法，“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现在的成就，表现我们又走出了几步，但离开我们更高的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还有相当远的距离；并且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要不断地向前发展。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沉重负担，还需要我们很大的努力才能完全抛掉，我们还必须再接再厉地进行艰苦奋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严重障碍，包括尚未驯服的自然力量所造成的一切困难，继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在这个万里长征的行军中少走弯路，善于在一个革命胜利之后，很好地把它的成果巩固和发展起来，以此来准备另一个更大的胜利。为要做到这一点，对于广大的干部和党员来说，主要的条件就在于进一步学习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学习毛泽东同志在

我们这个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如何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获得创造性的发展，简单地说，就是要进一步学习毛泽东同志如何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们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也必须紧紧地把握住这个基本方向。

## 二、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精神的统一

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用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观点的体系，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世界观和任何其他阶级的世界观的不同，就在于它不但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阶级要求，而且全面地反映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想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些规律指明，一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都是通过内部矛盾的不断的斗争，通过由矛盾斗争引起的革命变革，由一个发展阶段进到另一个更高阶段的永无止境的过程。全部宇宙就是这样一个无穷无尽的革命变革和向上发展的总体，这些普遍的规律以无限多样的具体形式表现在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中。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是要善于把这些客观规律的认识，变成我们在工作和斗争中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指南，就是要敢于正视和敢于揭露客观事物中实际存在着的各种矛盾运动，并且善于找到适当的方法，适当的政策、路线、战略、策略，来发动、组织和指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来促进矛盾的解决，促进事物的发展和变革。这样的世界观，要求我们永远用发展和变革的观点来对待一切问题，所以是具备着高度的革命精神的，是和任何保守主义思想不相容的；同时它又要求我们对事物发展和变革的每一个时期的具体矛盾规律给与具体的认识

和把握，所以它又是具备着严格的科学精神的，是和任何主观臆想、唯心主义与宗教迷信的方法不相容的。任何其他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阶级的世界观，都不能像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样体现着高度的革命性和严格的科学性的完全统一。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总的特征。我们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学习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也是一样），应该把握这个特征，应该学习在对待一切问题和一切工作的时候把永不衰竭的革命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密切结合起来。

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里，我们首先可以学到无产阶级革命者所应有的那种无限坚强的革命意志。这个革命意志在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艰巨的困难前面，都不会表现一丝一毫的动摇。就用抗日战争刚刚得到胜利时候的情形来说吧：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者苦战八年之后，曾经把中国人民投入十年内战浩劫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又张牙舞爪地从峨嵋山上下来，再一次要用武力抢夺人民手中的胜利果实，站在它后面的，是当时最强大、手里拿着原子弹的惟一垄断权的美帝国主义者。全中国人民面临着严重的选择：或者要得到真正的解放和国内和平，那就要准备再来一次艰苦的战斗；或者是屈服于敌人的压力，那就要再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奴役地位上去。革命队伍中意志薄弱的人，或者受到资产阶级世界观影响的人，在这个来势汹汹的敌人前面，就不可能不发生——而且事实上已经发生了——恐惧和动摇。就在这样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毫不迟疑地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口号，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准备对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及时地使党和人民确定了敢于革命的决心，避免了类似1927年在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下的那种错误和失败。

在人民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还处在很

大的劣势地位，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外反动派正在目空一切、飞扬拔扈，原子弹正在成为他们到处进行政治讹诈、威胁人民的得意工具。毛泽东同志对这一切毅然决然地投以睥睨的冷眼，指出它们全都是“纸老虎”，指出“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同志指出了这个历史的真理，大大地增长了人民的志气，灭杀了敌人的威风；不但巩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斗争的决心，而且为他们树立了必胜的信心，这不能不是以后促成全国革命胜利实现的重大的精神因素。

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我们又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革命精神，还表现在敢于坚持革命的彻底胜利，敢于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一定要使胜利果实完全落在人民的手里。资产阶级的革命者，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具备这种彻底革命的坚决性的。举例来说吧：人民解放军经过三大战役，把敌人的主力根本粉碎了，革命的最后胜利已成为定局。这时敌人开始策划“和平”阴谋，妄图利用政治手段，拖延革命的进军，把反革命的残余武装力量保存下来，以便争取恢复的时间，伺机卷土重来，再把全国人民打倒在地下。毛泽东同志立即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向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革命的领导权是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手里，就完全有可能走向“半途而废”的危险。由于对人民的真正胜利怀有本能的畏惧，资产阶级在把一部分胜利果实夺到自己手中之后，会宁愿就此停止对敌人的革命斗争，而让人民仍然处在黑暗奴役的深渊。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党派中间有些人提出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口号，就是这种危险潜在的明证。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的坚定态度对上述问题作了积极的回答：“将革命进行到底！”这

样就粉碎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制止了它的动摇倾向，把当时的民主革命坚持到彻底的胜利。

和革命要求的彻底性不可分地联系着的，还有革命意志的永不衰退，这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革命意志走向衰退，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性的规律。这就是说，获得了某些胜利，某些利益，某些斗争果实之后，特别是挤上了统治地位之后，就骄傲自满，不愿再继续战斗，继续前进，甚至压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腐化堕落。我们的革命队伍里面有些思想改造不好，没有树立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受到了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也会表现革命意志的衰退。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则要永远保持革命的战斗精神，不允许它在任何时候走向衰退。毛泽东同志经常用这样的革命精神来教育广大干部和党员，指出共产党员不论有了任何巨大的成就，都不应该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人民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是中国人民的空前伟大的成就，但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说，这样的胜利，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来说，“只不过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预见到全国胜利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危险，及时地向全党提出应该警惕后者的“糖衣炮弹”的进攻。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仍然发挥着不断昂扬的革命战斗精神，领导全国人民继续进行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又取得了重大胜利。无产阶级的革命者担当着无限远大的历史使命——实现共产主义世界的使命。与这个远大的任务相比，眼前的任何巨大成就是丝毫也不值得自满自足。因此，必须保持那种永不衰竭的革命精神，才能够与自己的历史使命相适应。

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中的无限坚强的斗志，

敢于对任何敌人和困难战斗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彻底完成革命任务的坚决要求和永不衰退的革命意志，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的一些重要特征，我们应该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学习这样的革命精神，并在一切工作中加以贯彻。但是，如果我们只注意到这一个方面，而不注意到，这种高度的革命精神，任何时候都是以严格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为基础，并且经常和后者相结合，如果我们不同时注意到这两个方面的统一，就不可能真正学到无产阶级世界观。

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里，每一个鼓舞人民革命斗志的指示，同时也是综合了大量的历史经验、分析了当前情况的正确的科学论断。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经验，也根据当时敌人积极准备内战的动态，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阴险和极端残酷”的面貌，证明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决不会改变自己反人民的本性，决不会对人民“感恩”和“发善心”，然后才做出不可动摇的逻辑结论：必须对它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时候，他概括了近代曾经横行一时而又终于纷纷垮台的许多反动统治者活动的史实，生动地发挥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科学学说，并且具体地阐明了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走向灭亡的规律。毛泽东同志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0—1491页）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纸老虎”的论断，正是用鲜明的艺术形象概括了这个科学的定律。当毛泽东同志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指出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只是像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做出共产党人在全国胜利后必须警惕资

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进攻等等的指示时，他是严格地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科学理论，注意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且对敌人的阴谋诡计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发展，作了正确的客观分析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对于党和人民的革命指示，这些革命的指示里所体现的无产阶级的高度的革命精神，都是建立在事物的客观本性的正确认识之上，都是从事物发展的科学定律出发的，因此它就能够对革命运动给与正确的指导，就能够真正巩固党和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就能够把革命事业引导到胜利的地步。

当毛泽东同志说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时候，他指的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从全体上、战略上看问题时所应做出的结论。从这方面看问题，敌人终于是要被我们打倒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轻视它们，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同上书，第 1267 页）。但是，毛泽东同志同时又告诉我们还应该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同上）。如果说，毛泽东同志在战略上、在全体上所做出的鼓舞人心的论断本身，就是以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为根据的科学论断，那么，他的关于每个局部问题上和每一个具体斗争中必须重视敌人的指示，又正是告诉我们，在这样的问题上，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就更加需要对客观事物掌握正确的认识，更要以正确的科学的认识来指导我们的行动，丝毫也不能疏忽大意。

当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坚持革命的彻底胜利的时候，他是根据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互相结合的

原则来提出问题的。这就是说，他首先指的是要争取当前历史阶段所提出的革命任务彻底实现，而决不是在历史条件尚未具备时就要求同时实现更高阶段的革命任务，就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来说，就是要求彻底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毛泽东同志曾经坚决批判了所谓“一次革命论”的错误观点，也就是所谓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错误观点，指出这是实际上想要取消革命的“左”倾空谈。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是坚持了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科学原理。同时，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实现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就是为下一阶段的革命发展准备条件，这就是要“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80 页）这就是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结合。要掌握这个原则，就要求我们把彻底的革命精神建立在革命发展的每个具体阶段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

为着进行革命斗争，必须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推动他们在革命事业中积极表现自觉的活动和努力，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就是要发挥人民群众的“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52 年版，第 440 页），也就是有些同志常说的“主观能动性”。许多同志强调在一切工作中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当然是很对的。但当我们谈到主观能动性问题时，必须注意到，什么是我们所要发挥的主观能动性。“自觉的能动性”，是包括人们主观方面的一定的思想活动，和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的人们的行动来说的。而人的思想活动则有正确和不正确的区别。并不是任何一种“自觉的能动性”都为我们所需要。我们所需要的，是以正

确思想为基础的“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同志说：“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同上）这里告诉我们，有不同的“自觉的能动性”：有以正确的思想和行动为内容的，也有受到不正确的思想和行动影响的。不能说，只要发扬了人们的“自觉的能动性”，不管是怎样一种“自觉的能动性”，都能够把我们的革命斗争引向胜利。我们必须要发扬的，是以正确的思想和行动为内容的“这种自觉的能动性”，只有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才能够把我们的斗争引向胜利。为什么？因为要在斗争中取得胜利，不仅要依靠人们的自觉的活动和努力，而且更要依靠在斗争中能争取到主动的地位，依靠在斗争中能掌握行动的自由权；也就是说，要力求在敌人和困难的前面避免陷于被动。在敌人和困难的前面陷于被动，就有失败或被消灭的危险。这里要注意的是，有了自觉的能动性，并不就等于取得了主动地位，要保证我们在斗争中取得主动地位或行动的自由权，其决定条件，就是要有正确的思想指导。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里，曾把“自觉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加以区别，并特别论到在战争中争取主动性的重要。他说：

“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种人的特点，特别强烈地表现于战争中，这些是前面说过了的。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一个士兵被缴械，是这个士兵失了行动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一个军队的战败，也是一样。为此缘故，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

我们提出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进攻战的灵活性、计划性，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主动权，以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但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此外，也还有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来争取自己主动和逼敌处于被动的情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0页）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告诉我们，战争的胜利决定于在战争中的行动的自由权，决定于主动地位的取得，而这个主动地位和行动的自由权，又决定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性，决定于能利用敌人认识的错误。这里讲的虽是战争的问题，但它的基本原理是适用于我们的一切工作和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告诉我们，要认识必然才能够得到自由。要在一切工作和斗争中获得自由权，必须正确地认识周围事物的情况、性质和斗争发展的必然规律，然后根据这个正确的认识，提出正确的政策、路线、战略、战术，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在有了正确的战略战术，政策路线的指导的时候，还需要对每一个工作和战斗岗位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适当地安排这个岗位的具体工作方案、行动计划以及斗争方法等，以便于准确地贯彻总的战略、策略、政策、路线。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正确的主观指导。只有在正确的主观指导之下的人们的自觉的能动性，而不是在错误思想影响下的活动和努力，才能使我们在工作和斗争中掌握主动权并把它引向胜利，才能使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有效的发挥；不如此，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发挥，他们的活动和努力就有可能成为无效的劳动。我们要求把高度的革命精神建立在严格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正是为着有效地发挥革命人民的这种自觉的能动性。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学习到很多的东西，我

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是怎样把每一种工作和斗争的指导严格地建立在对周围情况的科学分析和正确认识上，因此，不论在军事斗争中或和平谈判中，不论在战争处于自卫阶段或转入进攻敌人的阶段，不论在土地改革和发展生产的问题上，在对待各个不同阶级的政策掌握上，都能够不失时机地提出科学的预见，做出正确的指示，使党和人民的力量处处取得主动的地位。这是当时的革命能够在短时期里获得伟大胜利的主要条件，也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认真学习的最宝贵的模范。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精神，坚持在我们的工作和斗争中，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认识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同党内领导方面的各种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指出这些错误路线，不论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好，后来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好，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思想根源，就是在认识上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就是不重视人的主观认识应该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规律性这个唯物主义原理，而是相反地使主观和客观分裂，使思想陷于主观主义或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毛泽东同志把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提到了哲学世界观的高度，尖锐地揭露了主观主义的危害性，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20页）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同志们，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在全党的领导方面打倒了主观主义这个思想的大敌，树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所反映的这个短时期内所获得的伟大的革命胜利，正是由

于树立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的结果，在这样的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些胜利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精神的胜利，是彻底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胜利。

人的认识过程，是在社会实践中，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要保证主观的认识正确反映客观世界，必须通过科学的调查研究，对实践经验不断地加以概括和总结。这是毛泽东同志在领导革命斗争的长期历史过程中，一贯坚持和一贯向全党同志提倡的作风。与这个正确的科学作风相反的是主观主义的作风，它或者表现为教条主义，或者表现为经验主义，它的总的特点是凭着一知半解——或者是书本、文件上断章取义地得来的一知半解，或者是某些局部的狭隘经验，——凭着自己的“想当然”，就要来决定一切，指挥一切。在人民解放战争以前的革命时期里，毛泽东同志对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和它的表现形式，作了系统的揭露和尖锐批评，并在整风运动的时期，领导全党同志来克服这种错误作风的影响，这样就在党内普遍树立起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正确作风。由于树立了这样一个正确的作风，不但党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领导机关能够通过调查研究，对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和斗争的发展情况获得正确的了解，并采取有力的具体方法和措施来贯彻党的政策，而且党的中央指导机关也能够依据各地区各部门所提供的正确的情况报告，及时地对全国的斗争经验加以总结，及时地做出正确的决定和指示。党的作风的这种新的发展，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显示了它的伟大的力量。这个时期的全部经验鲜明地证明了：普遍树立调查研究的科学作风，在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方面，在推动革命斗争胜利的迅速实现方面，是起着多么重大的决定作用。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第一篇文章，就提出了调查研究的问

题。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包括对当时敌人的活动情况的研究和过去历史的研究，在这个时期内，毛泽东同志揭穿了敌人的凶险意图，并针对着它的意图，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从事战斗的准备，使党和革命人民在新的斗争的出发点上就取得了有利的主动地位。以后四年革命斗争发展的全部过程中间，毛泽东同志依靠了各地的报告，在每一个具体环节上，都精确地概括了全国斗争的情况，仔细地计算了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及时地对经验做出全面的总结，并以此为根据，对各方面的问题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论断，指出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方针和办法，对各种错误或偏向随时提起党和人民的注意，并指示了纠正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在敌人举行全面的武装进攻之前就指示解放区军民作好自卫的准备，在敌人采用政治阴谋时就通过政治斗争予以彻底的揭露；在敌人强大而人民的革命力量还处在劣势的时候，指出了胜利的前景，制止了害怕敌人的右倾情绪；在人民的力量转入进攻的时候，反复地申述了各方面必须严格掌握的具体政策，防止了各种违背政策，脱离群众，能够使党和革命队伍陷于孤立危险的“左”的片面性；在战争接近胜利时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在民主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号召全党对下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作好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在经济方面，制定了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以巩固新老解放区的基础，在政治上坚持争取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方针，使敌人陷于极端的孤立；在军事上规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和十大军事原则，并在每一个战役和战斗中加以具体贯彻，使敌人在战争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这一切正确的理论、思想，正确的战略、策略，正确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都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都是依靠全党大规模地应用了调查研究

这个工具，不断地总结经验，充分地了解了周围事物发展情况的结果。这个科学的思想作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确的作风；不但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以至于在将来无限长远的共产主义事业中，都是惟一正确的思想作风。只有从地方到中央，普遍地提倡和大规模地树立起调查研究的作风，及时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保证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处处掌握主动权，实现恩格斯所说的“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才能避免在某些工作中陷于被动地位。严格地遵循这个科学作风，把它和高度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够无往而不胜。这是我们应该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学到的最主要的东西。

## 三、分析矛盾，分析阶级

要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需要有正确的研究方法。即使有大量的调查材料，即使有某些实践的经验，如果不善于分析研究，仍然不可能对问题找到正确的结论。许多有错误思想的人也会抓着某些表面的和片面的“事实”材料作为自己的“论据”，这就是明证。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方法问题上，首先是要严格地坚持唯物主义的原则，这就是说，要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性来加以分析研究，要力求研究的结果能反映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作任何主观随意的附加，不给与歪曲的反映。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本性是辩证法的，这就是说，任何事物在任何时候都是在矛盾中运动的。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辩证法或分析矛盾的方法作为研究一切事物的最根本的方法。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辩证法是宇宙观，同时也是科学的方法论。毛泽东同志说：“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

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所以我们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习把这个世界观作为科学方法来加以掌握，或者说，主要地就是要学会掌握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

在存在着阶级的人类社会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阶级矛盾，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研究社会历史问题和革命问题的基本方法是阶级矛盾的分析法。革命的领导者为了要在工作中有效地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首先必须善于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毛泽东同志说：

“要了解情况，惟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页）

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时，应该学习他如何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矛盾，特别应该注意他如何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在革命活动的最早的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把这个方法作为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最主要的工具。《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题的。这篇文章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动态作了细致、准确而又非常生动的分析，因此它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初期，就已经正确地规定了党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战略方针，指出了以后二十多年中国人民的斗争走向胜利的总的方向，为这个时期党的各方面政策确定了根本的原则。党的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一切重大的错误，不论是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都是离开了毛泽东同志当时所规定的那个总的方针，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胜利，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

直接领导下，正确贯彻了上述方针的结果。毛泽东同志《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所申述的“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也正是体现了这个方针。

为什么阶级分析方法具有这样重要的作用?这自然是因为，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社会各方面矛盾的集中表现，也是解决这些矛盾并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只有应用阶级分析方法，才能正确认识社会发展和革命变革的本质和规律性。同时，我们进行社会的调查研究，是为着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指导革命斗争；而要正确地了解情况，掌握政策，要对革命斗争给予正确的指导，要使人民的革命运动不至于迷失方向，首要的问题，就在于要能够在阶级斗争的错综复杂的情形中，正确地辨别什么是我们的打击方向，什么是我们团结的方向，也就是要善于分清敌友。如果我们不善于分清敌友，把敌人当做友人看待，就要有一天受到敌人的突然打击，而毫无准备；或者把朋友误认为敌人，就要使我们在斗争中陷于孤立，这一切都会使我们的事业遭到失败的危险，要避免这个危险，要能够在斗争中善于分清敌友，惟一的正确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方法。毛泽东同志说得好：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

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我们就不难看到，在人民解放战

争时期，革命人民的斗争之所以能够走在完全正确的道路上并迅速取得胜利，其根本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使党和广大人民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上保持了头脑清醒的认识。就谁是敌人的问题来说，在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敌人之后，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立刻就成了人民的主要敌人，这并不是一开始就为广大的人民所认识到的，因为在抗日统一战线中间，它们都曾经取得过同盟军的资格，而人民中间还受到一种反动的“正统”观点的影响，把蒋介石国民党误认为代表国家的正统的领导党。没有关于阶级斗争的明确的科学观点的人，就不能理解这个突然的变化。不仅一般的人民是这样，党内有的同志也是这样，1927 年的教训，就证明这一点。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同志在抗战胜利后及时地写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提出了“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的问题，尖锐地揭露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的反动本性和阴谋活动，就是非常必要的事；它给党和全国人民在形势变化一开始的时候，就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革命的政策路线问题，从根本上说来，也就是分清敌友的问题，是对哪些阶级应该攻击和哪些阶级应该团结的问题。就朋友来说，包括在革命同盟中的朋友，有各种各样的阶级，不同的阶级的朋友有不同的情形，需要分别用不同的方法去加以团结。有可靠的朋友，有动摇不定的朋友，有原来是敌人而部分地在一个时候可以作为间接的同盟军；同一阶级也还有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部分，它们对革命的态度也各有差别。在朋友关系中间又有着谁领导谁的问题，和资产阶级的左派结为盟友时并不能因此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这些复杂错综的情况只有通过具体的阶

级分析才能够认识清楚，只有具体的阶级分析方法才能解决如何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各种各样的朋友去攻击共同敌人的问题，而革命的政策路线就是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原则的规定。毛泽东同志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规定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人民大众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所要团结的朋友，其中包括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些阶级的特点的分析，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这个革命联盟应以无产阶级为领导者，以工农联盟为主体，而对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采取在经济上加以保护而对他们的某些错误政治观点加以批判的政策。为着巩固和农民的联盟，开展了土地改革的斗争，而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又规定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样一个总路线总政策。在农民这个盟友中，又把贫农和中农加以区别。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各阶级的活动反复不断地进行细致的分析，对各方面的政策三令五申地作了多次的指示。诚如他所说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党在当时认真地贯彻了党的政策，在人民解放战争过程中发挥了强大无比的生命力，把全国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给极端孤立的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因此，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以及毛泽东同志其他的著作里，我们都应该认真地注意学习如何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以达到正确了解情况，掌握政策的目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革命工作的领导者应该学会的本领。这个本领不但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使我们彻底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仍然为我们的一切工作

指导所不可缺少。毛泽东同志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除了对富农、中农和贫农的不同情况加以分析外，还把中农区别为下中农和上中农，这些分析对于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起了很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这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应用细致的阶级分析法的一个范例。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我们的国家虽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但阶级还没有消灭，不但资产阶级没有消灭，就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被打倒了的封建阶级残余，也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放弃了复辟的梦想。我们的各方面工作的进展，仍然不能不通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方向和资产阶级的方向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斗争，仍然是我们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这里的矛盾又有着许多错综复杂的情形：同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表现为敌我矛盾，也表现为朋友之间或联盟内部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又有互相转化的可能性。和以前不同，人民内部矛盾——非对抗性的矛盾，在国内矛盾中是大量的现象，敌我矛盾——对抗性的矛盾的存在是比较小量的。然而，后者虽然是比较小量，由于政权在人民手里，它采取着种种隐蔽的形式，敌人的复辟活动，常常穿着革命的伪装，在某些地区——例如一些革命运动进行得不彻底的地区、基层地区，也可能暂时地实现它们欺骗人民的企图。因此，要解决分清敌友的问题，仍然不是简单易举的事情，仍然需要我们应用细致的阶级分析方法，去向社会作调查研究，才有可能很好地加以解决。也就是说，即使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仍然需要认真地应用阶级分析方法，认识清楚各个阶级以及同一阶级中不同阶层的种种动态，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根据这个分析，制定各种具体的政策，采用各种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在这里如果不能掌握正确的阶级分析方

法，或者把人民内部矛盾误认为敌我矛盾，或者对某些敌对的阶级活动麻木不仁，都会导致政策的错误，都会造成工作的损失。在这样的意义上，毛泽东同志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以至于全部民主革命时期所使用的科学方法，仍值得我们好好地加以研究的。

## 四、把握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里，毛泽东同志论到当时革命的根本任务时，说："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又说："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53 页）

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里，毛泽东同志又从另一个方面阐明了当时的任务，说："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同上书，第 1380 页）

上面说的这些任务，就是指的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这些任务到 1949 年以后，就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如果从世界观的角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的角度上来看这些任务，那么，上面所引的毛泽东同志的话，就包含着以下的意义：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是为着达到两方面的目的：第一是，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所有制，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建立新的所有制，以便解除生产

力的束缚，使它能够得到顺利的发展，第二是，改变旧的国家制度、旧的政治统治关系、旧的社会上层建筑，建立新的人民的国家制度、新的政治统治关系、新的社会上层建筑，以保证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简单地说，革命的目的，阶级斗争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从来的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都是依着这样的规律进行的。不过，只有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够明确地认识到这个规律，才能够（也应该）自觉地在自己的行动中应用这个规律。

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这个真理：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在社会上的阶级没有消灭以前，这些基本矛盾又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人类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凭空产生的，阶级斗争的发展过程，不外就是这些基本矛盾的暴露和解决的过程；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目的，正是为着使这些矛盾得到解决。在这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是产生阶级矛盾的经济根源，不同的经济制度，不同的生产关系，决定着不同的阶级关系。反动阶级（例如地主、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依赖于旧的腐朽的生产关系（例如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力求保护旧的生产关系，这样就要使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阻碍；反之，革命的阶级（如无产阶级）的利益则要求破坏旧的生产关系，他们代表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形下，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表现。但是，当反动统治阶级力图利用国家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的权力来保护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经济制度的变革，而革命阶级为着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不得不努力起

来为破坏这个反动的国家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权力而斗争时，或者是，当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利用政治阴谋活动和旧思想残余的影响来破坏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企图使旧的政治制度以至于经济制度实现复辟，而革命阶级为着保护新的经济制度，保护生产力的发展而与这些政治的、思想的阴谋活动进行斗争时，在这样的情形下，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又主要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的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用阶级分析方法，制定革命工作的战略、策略、政策、路线、方针、计划等等，来指导工作和斗争，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盟友，孤立敌人并给与集中的打击，其根本目的也不外就是要解决当前存在着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时，应该注意到他在指导党和人民的斗争的时候，如何在具体实践中应用这些普遍真理。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是相互联系着的，这个相互关系，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变革时期，有着不同的情况。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就开始产生了，这就是说，在封建的政治上层建筑未被推翻以前，生产关系的变革已开始出现，旧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矛盾已经局部地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一些解决。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主要是在于改变旧的封建的政治上层建筑，使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或者是用革命的方法从封建统治者手里夺取统治地位，或者是用改良主义的方法与封建统治者妥协，分享部分统治权——资产阶级利用这个政治统治地位，就能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进一步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情形就有所不同，与一切私有制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内，是不可能产生的，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的国家机构，也不容许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出现。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只能是首先经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根本打碎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然后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下，创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形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样来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这里没有改良的道路，只有真正革命的道路，而最重要的关键是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或无产阶级的专政。要不要粉碎旧的国家机器，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就是要不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就是区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应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普遍真理，在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把革命的领导权——主要是对于农民的土地斗争的领导权以及广大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领导权，坚决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通过无产阶级坚强领导之下的广大农民群众的武装斗争，首先在某些乡村地区，粉碎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权，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的政权，在这个政权的推动和保护之下，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斗争，消灭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农村的生产力，使人民的政权获得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坚决支持，使这个政权在强大敌人的前面立于不败之地。这样就能够在反动势力四面包围之下，在一些农村地区突破反动势力的统治，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

以此为据点，逐步发展革命势力，由小块的根据地逐步扩大为大片的解放区，由反动势力包围农村根据地的形势逐步转化为农村革命运动对城市反动势力的包围形势，一直到最后把全国范围的胜利夺取到人民的手里。

这里存在着一种辩证的规律：一方面，上层建筑的根本改变，保证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并从而对生产力的发展给与强有力的推动。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产力的解放又反过来为人民政权这个上层建筑奠定巩固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并提供可靠的物质保证。如果不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推翻反动势力的统治，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政权这一种上层建筑，即使是想要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经济变革任务，彻底消灭农村的封建生产关系，也是不可能的。同时，反过来说，如果不坚决发动群众来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积极发展农村生产力，要使人民的政权获得稳固的基地，要保证真正彻底推翻反动势力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并形成不可动摇的革命根据地，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正确的革命指导必须把两个方面统一起来，既要解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又要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这样才能保证革命地区的生产力的发展和革命势力的巩固和发展。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原理。过去某些革命领导者之所以走上右倾机会主义或者“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并招致了革命运动的挫折或失败，其原因之一也就是不能认识和应用这个原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敢发动群众斗争粉碎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左”倾冒险主义者则不知道或不善于把农村武装斗争和改变农村生产关系的土地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不知道或不善于在农村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使革命的武装根据

地获得巩固的基础。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则正确地掌握了这个两方面并举的原理，在群众的武装斗争取得了胜利的地区，立即发动群众为实现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和保护工商业等等的政策而斗争，为正确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基础而斗争，因此不论在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反“围剿”斗争中，或在抗日战争中，都能够使革命人民站在不可动摇的阵地上，把敌人一步一步地打败。

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我们可以看到，在人民解放战争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对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是怎样全面地掌握了解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和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发动全面进攻的时期，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指导着全国人民和解放区军民，对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揭露了敌人的“和平谈判”的阴谋，粉碎了它的武装进攻，同时，又写了《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这个指示，号召“留在后方的领导同志，除了作直接援助前线的许多工作之外，一定要不失时机，布置减租和生产两件大工作。务使整个解放区，特别是广大的新解放区，在最近几个月内（冬春两季）发动一次大的减租运动，普遍地实行减租，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的革命热情。同时，在1946年内，全解放区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务使有一个新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9页）毛泽东同志指出，坚决地执行这些正确的经济政策，就能发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造成支持革命政权的无比强大的政治力量。他说：“告诉党员坚决同人民一道，关心人民的经济困难，而以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两件大事作为帮助人民解决困难的重要关键，我们就会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任何反动派的进攻是能够战胜的。”（同上书，第1170页）

减租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和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

在土地问题上采取的必要的政策，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发动了全国的内战，这个政策已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革命要求，1946年党中央发出了五四指示，肯定了农民群众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愿望，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土地改革政策。毛泽东同志在全部战争过程中，一面对这次规模巨大、曲折复杂的军事斗争，不断地总结经验，从头到尾亲自给予指挥和领导，一步步地把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它的主要的国家机器——打得粉碎，另一方面又始终紧紧不放地抓着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其他经济政策的指导，规定了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既反对了在土地改革初期不能坚决地执行这个总路线总政策的右的偏向，又纠正了在运动高涨起来以后出现的某些“左”的过火的偏向，使生产关系的变革正确地符合于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革命的军事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在解放区正确贯彻了土地改革，保护工商业和发展生产等等的政策，正确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就巩固了解放区的政权，保证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的彻底解决，并使之一步步向全国范围扩大，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结束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时由于胜利而建立起来的全国性的人民民主政权，就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新的国家政权以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基础，制定了一系列的关于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这样，上层建筑的改变推动了新的经济基础的形成，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和初步的经济建设与经济改造的过程，就出现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使全国的生产关系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实现全面的革命的飞跃，并强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新的经济基础的形

成，要求上层建筑进一步与之相适应，这个矛盾表现为1957年政治上与思想上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即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和整风运动。上层建筑方面的这个斗争的胜利大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大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于是就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

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基本矛盾，都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阶级矛盾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都是这些基本矛盾的表现，前者的斗争和发展，归根结底也是为了要解决这些基本矛盾。如果有人否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特别否认这些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那他的看法在实际上就会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就不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坚持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明确肯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个科学的论断是符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是又适应又矛盾的。而这种矛盾，正如一切其他矛盾一样，是在解决了之后又有新的矛盾出现，因此必须一次又一次地经过内部的斗争过程，——首先是要在人民内部经过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不断反复的过程，也要经过某些敌我斗争的过程——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或某些

环节加以调整，使之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正如十一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说明的那样，新中国的发展过程，就是通过这两种基本矛盾的一次又一次的解决而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逐步上升的过程，能够认识这个规律并自觉地应用这个规律，就有可能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生产实现高速度的发展。当然，中国的经验也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首先是这些矛盾不像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那样要表现为激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这种敌我性质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虽然也仍有存在——因为还有抗拒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他已被打倒而仍然梦想复辟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存在着——但只是比较小量的，而大量的矛盾，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这里面包括劳动人民之间（工人和农民之间，上中农和下中农、贫农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等等）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在基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之上的矛盾。因此，这些基本矛盾的解决，不像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那样，必须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才能实现，而不能经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则“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因此，这些基本矛盾不断地揭露和解决，不是使社会主义制度受到破坏，而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更加发展，更有利于为将来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准备条件。

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的论断，在理论上是维护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新的条件下贯彻了和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

而在实践上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发挥出强大的指导作用。它使我们在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指导工作等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中能够找到正确的基本的方向。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仍然应该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不断出现的新的矛盾情况，经常自觉地加以注意，加以揭露，并及时地找到适当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因此，必须把揭露和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作为我们经常应该注意到的根本问题，不论在过去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这样。调查研究，阶级分析，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归根结底都是为着认识和解决这些基本矛盾。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在今天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时候，仍然可以获得非常宝贵的教益，虽然它所解决的是属于民主革命阶段的具体实践问题，但在这个具体实践中它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全面地掌握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始终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范例。

## 五、人民观点，群众观点

前面说过，毛泽东同志批评那些害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人们时，曾指出他们的错误，就是在于不了解“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这个原理。毛泽东同志还指出，这些错误的产生，就是受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而忘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

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3—1134页）在这里，毛泽东同志阐明了属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这就是人民观点，群众观点；这就是要坚决相信，只有人民群众的斗争，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最后的决定力量。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违背了这个无产阶级的根本观点的。

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实际上也就是人民的事业，就是要争取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的事业，为什么我们必须努力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答复是：为着解放生产力。然而，无产阶级所要争取的生产力的解放，归根结底，也就是劳动群众的解放，广大人民的解放。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切工作和努力都必须是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目标。必须以此为出发点，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自己的政策方针和办法。凡是符合于人民群众利益的事，必须坚决努力去做，凡是违背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事，必须坚决起来反对。总之，要对人民负责。能不能对人民负责的问题，也就是能不能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里，论到必须对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时，就坚持了这个观点，他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上书，第1128页）毛泽东同志指出陈独秀之流的右倾机会主义不能“针锋相对”地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就是对人民不负责的表现。

人民群众的斗争，需要有正确的领导，没有正确的领导，人

民群众的斗争就会迷失方向，也就得不到胜利。因此就需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需要有共产党，需要有久经考验的，坚定地掌握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密切联系起来的党的领导人物，来给人民群众的斗争以正确领导。共产党人对人民负责，首先就是负正确领导之责。但是，另一方面，人民的事业，又必须通过广大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有可能实现。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努力，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的斗争的真正胜利，都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决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在一切工作和斗争中坚决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放手发动群众，并给予正确的领导，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的最根本的方法，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地倡导和实行的方法。这个方法在 1945 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确定为党的路线，这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曾说到那次大会做了三件大事，其中第一件，就是“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125 页)这个路线在全党得到贯彻，是后来中国革命迅速获得胜利的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已经说过，为着指导工作和斗争，必须掌握阶级分析方法，以便能够分清敌友，能够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朋友，使革命力量尽量壮大起来，并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集中力量给以致命的打击。因此，正确的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积极性的政策。不论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冒险主义，都是违背这个原则的。前者的错误在于不敢放手发动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后者的错误在于使革命的先锋队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我们可以看到，毛泽

东同志在全部人民解放战争过程中，是自始至终非常认真地按照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和依靠群众的原则来指导全国各方面的政策，既反对了某些右的思想倾向，又纠正了运动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左”的偏向。

在人民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对解放区各地，包括新建立的东北解放区所作的许多指示中，反复不断地阐明了发动群众的必要。这时着重批评了某些同志中不认识和不重视发动群众的倾向，或者是由于害怕群众斗争中出现某些缺点（如过火现象）而对发动群众表示缩步不前的倾向。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一指示里，毛泽东同志说：“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么，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7—1178页）

在《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一文里，毛泽东同志强调了当时通过减租运动发动群众的必要性，说：“留在后方的领导同志，除了作直接援助前线的许多工作之外，一定不失时机，布置减租和生产两件大工作。务使整个解放区，特别是广大新解放区，在最近几个月内（冬春两季）发动一次大的减租运动，普遍地实行减租，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同上书，第1169页）又说：“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减租成败的关键。减租斗争中发生过火现象是难免的。只

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同上书，第1170页）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关于发动群众的思想，和1926年他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有关思想是一贯的。那时他就指出，既然我们要发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就不能对群众运动中不可免地出现的某些暂时的缺点过分顾虑，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页）这就是说，毛泽东同志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起，就始终一贯地坚持着放手发动群众的革命思想。不同的是，在1926年，党在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下，没有能够贯彻这些思想，而在1946年，党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下，这些思想已成为党的根本路线。但不论是1927年革命的失败或1949年革命的胜利，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正确性，证明了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对革命事业胜败的决定意义。

在人民解放战争的中期，解放区的人民群众已广泛发动起来，人民解放军由自卫阶段开始转入反攻阶段，这时毛泽东同志的许多文章和指示，就着重于对群众斗争给予政策掌握上的具体指导，纠正运动中的某些“左”的偏差。这仍然是为着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为着巩固和发展党对广大人民的团结和联系。即使是在群众广泛发动起来而革命事业处在有利形势的情况下，政策掌握的错误，领导上的“左”的或其他原则性的偏差，也有可能使党脱离群众并导致革命的失败。所以，政策的正确掌握问题，在这时候，就具有决定革命事业成败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同志说：“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

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4页）又说：“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上书，第1296页）

群众观点、人民观点，和阶级观点是分不开的，我们在工作和斗争中要发动和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同时又要注意到，人民群众中有各种各样的阶级和阶层，其中有的是革命斗争和工作的主要依靠，有的是要坚决加以团结的，有的是要争取使之中立的，对这些不同的阶级和阶层，需要不同的政策，因此，为着正确地了解和掌握党的这个联系群众和发动群众的方针，我们还应该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进一步学习一下如何应用精密的阶级分析方法。这个方法在前面已论述过了，但这里只需要做一点补充：在进行阶级分析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不但仔细区别了各阶级不同的质，区别了他们对革命的不同的态度，而且同时也仔细地计算了他们的不同的量的分布。应用这样的方法，一方面分清了敌友，解决了应该团结谁和应该打击谁的问题，也就是规定了政策的质的界限，另一方面又解决了应该团结多少人和打击多少人的问题，也就是规定了政策的量的界限。前面说过，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曾使我们在革命斗争中经常掌握着这样一个量的比例的原则，即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而打击面则限制在百分之十以下。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量的比例原则，是根据了阶级力量对比的科学计算。例如就土地改革的斗争来说，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只能和必须是贫

农。这个贫农阶层，和雇农在一起，占了中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土地改革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就是满足贫雇农群众的要求。土地改革必须团结中农，贫雇农必须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农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同上书，第1312页)根据这样的计算，毛泽东同志做出了科学的论断说：“我们的土地改革所反对的对象，人数甚少，而乡村中能够参加和应当参加土地改革统一战线的人数(户数)，则有大约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样多。”(同上书，第1250页)由此可见，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和打击百分之十以下人口的原则，是用科学分析方法具体规定了的我们的政策和策略的量的界限。坚决在工作和斗争中掌握这个原则，就使我们能够真正团结以一切劳动人民为主力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把敌人孤立到最小的范围内，就能够集中人民的优势力量把它打败。

数量分析的方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一切真正科学的分析，都必须把事物的质的规定性的分析和量的规定性的分析结合起来，否则就不能算是精密的科学分析。毛泽东同志用一句中国人民熟悉的成语来概括数量分析方法，叫做“胸中有‘数’”，并加以详细的论证，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同上书，第1443—1444页)

这个分析数量的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在具体实践

中的发挥，它本身又成为解决群众运动问题的一个普遍真理：在任何群众运动中要想精确地掌握政策，都必须应用这个方法。不仅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它是我国人民取得彻底胜利的武器，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战胜一切困难，也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并在政策掌握上做到“胸中有‘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和斗争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仍然是坚持了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的方针，既反对了阻碍群众运动发展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对运动高潮起来以后的某些政策上的“左”的或其他的偏差也给予及时的纠正。在目前正在进行的整社整风运动中，如果我们全党同志都能够很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掌握毛泽东思想里所体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认真地应用毛泽东同志所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那些科学方法，我们将一定能够很快地战胜目前所遇到的那些由于天灾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所造成的暂时的困难，一定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更大的胜利。

（原载《哲学研究》1961年3月第2期；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 在"61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1961.9）

王从吾校长要我来讲一讲教学计划、方针和学习方法，作为开学以后大家学习的一个交代。

## 一、关于举办"61班"的目的和任务

我们这个班，是今年——1961年招考来的，所以叫"61班"。这个班是第三班，59年招的第一班，叫"59班"，60年招了第二班，叫"60班"。这三个班，叫做理论干部班，也叫"秀才"班。这个班，是在1959年以前，由中央决定成立的。那时全国都感觉到必须迅速地训练理论干部。我们学校，经过研究以后，提出了招生的意见，得到中央的批准，中央有一个决定，即"中央批转高级党校关于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首先提出了这个班的任务，要训练什么样的干部。我们的报告是根据毛主席在《关于工作方法六十条》里所讲的：我们需要一些"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的理论干部。那一条中提出我们党需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即"较多

---

* 1961年，中央高级党校在开办"59班"、"60班"的基础上，又招了"61班"。这三个班是培养全国理论干部的班，又称为"秀才"班。这是艾思奇在1961年9月2日"61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比较详细地讲述了开办"秀才"班的目的和任务、教学计划，讲述了有关教学的方针和方法。均按速记稿整理。

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的理论干部。所谓“词章修养”，就是能够写文章。我们办这个班（从“59”班一直到“61班”）的目的，就是要努力实现这个任务。这是同志们来学习的共同点。就是说，同志们在经过四年的学习以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方面，能够懂得的更多、更有系统，在文化方面、在科学知识方面，能够得到进一步地提高，能够写出比较好的文章。这是我们的目标。所谓“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这也是相对的。我们来这里学习的同志，都是有一点理论基础的，都是懂得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们来这里学习了四年以后，就应该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比较系统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大家都懂得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懂得的不一定很多，也不一定系统。在这里学习，就是要比较系统地学习一下，而且还能在文字上把我们的理论修养表达出来。

根据上述的这个任务，我们规定学习的时间是四年，短了不行，如果只学一年、两年，是比较难以达到这个目的的。“59班”的学习时间，就规定为四年，四年中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学基础课程的时间，以前规定学两年；另一部分的两年学专业（全班分专业）。根据“59班”、“60班”的教学经验，要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打好一个基础，要在其他各方面系统地掌握一些知识，那么仅仅学两年的基础课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所学的基础课程有七、八门，要在两年中学完，有很大的困难。所以今年决定基础课的学习时间延长半年，即学习两年半，“59班”、“60班”基础课都学习两年半。现在我们规定“61班”的基础课也要学两年半，然后学一年半的专业课。

两年半的基础课是：(1)党史，(2)世界史，(3)中国史，(4)哲学，(5)政治经济学，(6)语文，(7)时事政策。这七门课都是一定要

学的。另外，还有外国语，算是八门课了。外国语是愿意学就学，而且不规定正式学习时间，是利用空余时间来学习的。学外国语的同志，多半是自己有点基础、要继续进修的；或者是没有基础、愿意从头学起的，只要有志愿学习，就可以学。但我们不能开很多的外国语课，只有俄文、英语两门课，别的外国语课程，没有人教。此外还有一门课程，——党的建设，大体上是结合在党史里面学习，在党史的某一阶段里，就有党建的问题。在最后学习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最近中央可能要规定全国干部都要学习党的建设的问题，已经编了一些材料，全国的干部都要学，当然我们也要学。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以后，着重讲党的建设这一方面的问题，可能结合在党史学习的最后阶段来学习。

专业设置，现在大体上可以开这样几个专业：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世界史、国际关系，这是“59 班”决定要开的专业。原来我们给中央的报告上规定“59 班”要开更多的专业，如语言学、教育学、文学、心理学、法学、美学等。这一些专业，现在还不能马上都开起来。“59 班”的基础课程还没有学完，将来学完了以后，究竟开几个专业，也要到那时再定，现在估计可以开那样几门。专业课的学习时间是一年半，自己报名学哪一门专业以后，再重新编支部。

以上就是一个大体上的教学计划，基本上不会变，同志们就是在这四年里学这些内容。

现在讲一下教学方针、方法的问题。

## 二、关于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进行教学的问题

我们的教学方针和方法，从 1959 年以后，就提出要以毛泽东

思想作指导，现在还是这个方针。我们的教学工作，教的方针也好，学的方针也好，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我们学习的课程的次序，也是根据这一个方针安排的。比如我们的课程是首先学习党史，这与我们党校以前学习的课程次序是不同的。以前，我们党校一贯都是这样安排学习的：开始就学习社会发展史，然后再学习世界史、中国史，把一般的历史东西学完了以后，再学理论课——哲学、政治经济学，最后学党史。在1959年，我们学校研究了一下，感觉到应该特别强调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因此，把党史的学习摆在前面比较好一些。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党校以前不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我们以前的教学，也是注意到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不过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个口号。在1959年以前，我们的教学方针和方法一贯是坚持了这样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是说，一方面比较系统地掌握理论，另一方面，用理论来解决实际的问题。这就是毛主席所讲的“有的放矢”的原则。这还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做的，我们的这个方针，就是根据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所提出来的思想，是根据在延安那个时候干部学习的一些办法。我们当时提出的教学方针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并且用这个精神实质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我们党校一直是坚持这个方针的。事实上做得好不好，能不能做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方向是这样的。我们大体上是按照毛主席的方向进行教学的。

在1959年，在各方面的影响下，我们感觉到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一点上，更应该加强，体现在教学方法上，首先是把党史摆在前面来学习。这样学有一个好处，因为通过党史的学习，我们可以把毛主席的著作从头到尾学一遍。学习党史，主要是为了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现在把这一点提出来，希望大家注意一下，通

过学习党史，使我们能够把毛主席的著作读一遍，比较系统地、深刻地了解一下毛泽东思想。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以后，我们再进一步地学习其他课程，可能会有更大的好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党史摆在第一门课程来学习的原因。

另外，还要注意一点，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这个口号，我们需要加以正确地了解。因为在这两年来，有些同志对于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了解，往往很不确切，有些同志了解得不够好，甚至于把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变成了空话。到处都讲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但有些地方并不是真正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使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成为一句空话，当做一个标签到处乱贴，没有真正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这种实际情况，这两年来有些地方是有的。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搞清楚：怎样叫做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并不是把毛主席的任何一句话断章取义地随便乱夸，主要地是要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把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搞清楚。大家本来也都知道，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的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所以，毛泽东思想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并不是跟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不同的两个东西。在谈到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不能够把它跟马克思列宁主义分开。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实质上也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来进行学习。我们为什么特别提出毛泽东思想呢？就是说，我们要特别学习毛泽东同志怎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中国各方面的实际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里来。毛主席是我们的楷模，我们主要地是学习他怎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列

宁主义，怎样提出和解决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实际问题。所以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主要的意义就在于这一点。因此，我们一定要根据毛泽东思想中最主要的、最根本的东西来指导我们的学习。最主要、最根本的东西，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怎样来运用这个立场、观点、方法。关于这一方面，即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本来就在毛主席的著作里有很系统的指示，我们要根据毛主席著作里所讲的这些问题，来指导我们的教学。这就是毛主席关于方法论、关于哲学这一方面的主要著作，特别是在1942年整风的时候，毛主席在1941、42年作的那些报告，比如《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及有关调查研究等著作。这一次我们把调查研究的问题作为入学考试（作文）的题目。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规定了大家在学习之前，先学一下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有些是大家都学过了的，但是还需要结合我们的教学计划、方针和方法，再来研究一下。我们准备把这几个文件发给大家，希望大家在今后的两三天内，研究一下，讨论一下，以使把我们教学方面和同学学习方面的方针、方法明确一下。

关于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问题，只提到这一点。这就是说，我们要用毛泽东同志自己所提出来的那些关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到中国的实践中，解决中国问题的那些方法，来指导我们的学习。

## 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

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是我们在学习上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的学习方法，就是要

很好地来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刚才已经讲过这个方法，就是“有的放矢”的方法。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必须有系统地学习理论，另一方面，我们同时要把我们学到的东西拿来研究、解决中国当前的一切具体实际问题。我们党校在 1948 年成立的时候，一开始就提出这个任务。我们的提法是：系统地学习理论，但是要有头脑有目的的学习，就是说，不是关在屋子里单纯地读书、背诵原则。而是在学习理论原则的时候，同时要有一定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武器，用毛泽东同志很形象的话讲来，就是“有的放矢”它是一种矢，只有在运用中才能学好掌握这个武器。有没有这样的人：不到实际中去练武，只是在房子里专门研究怎样练法。就是说，专门在理论上研究怎样练，但没有去实际地练。这样练武，是一定练不好的。射箭，只有经常射靶子，才能够把箭射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也就是这样的武器只有不断地在实际的运用中，才能够学好。所以，我们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时，一贯地是坚持这样的原则。在学习的时候，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运用，要把理论用到一定的目的上去。所以，我们的学习应该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要系统地掌握理论武器。所谓有系统地掌握理论武器，不是说要背诵一些原则，而是要领会这些原则的精神实质。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地运用。

现在就掌握理论和联系实际这两个方面分别讲一下：

刚才已经讲过，掌握理论要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当然我们要系统地学习理论，同时要掌握它的精神实质，不是系统地照搬原则就够了。

怎样才能很好地了解理论原则的精神实质呢？这是首先要谈一谈的问题。

要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原则的精神实质，需要有一个不可少的条件，就是要懂得每一个理论原则是怎么来的，而不是就理论原则本身研究理论原则，它不是人们的脑子凭空想出来的，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闭着眼睛用脑子一想就想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以能够想出这些原则来，是根据历史的经验、实践的经验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历史经验、实践经验的总结。所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懂得它的精神实质，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结合实践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在学习每个原则的时候，要经常注意它是怎么来的。就是说，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是怎样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实践的经验总结成为原则的。

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与学习党史结合起来，就比较好学。因为我们懂得，毛泽东同志是根据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的斗争情况，怎么样提出这些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的。结合党史的学习来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容易学懂，如果脱离党史的学习，不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仅仅根据毛泽东同志著作里某一句话，随便去解释，这样往往容易把毛主席的话解释错了。

所以，在我们系统地学习理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理论原则的来源（即实践的来源、历史的来源），经常注意理论原则的历史背景。

因此，在我们的基础课程里，历史的课程——世界史、中国史，有相当的分量，党史有相当的分量。社会发展史这一门课，"59班"、"60班"没有学过，从"61班"起，我们准备要大家学习一下。解放以来，全国的干部都学习过社会发展史。为了掌握理论，我们感觉到还需要学习一下社会发展史。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问题，提出了

“有的放矢”，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同时，这篇文章规定了研究工作三方面的任务：即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研究理论。他认为这三个方面是不能够分开的，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研究这三个方面。所以，毛主席很早就提出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跟研究历史结合起来，不能够轻视历史。历史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科学里，占什么地位呢？它是等于基本知识的地位，就好像学自然科学、学工业技术，要有数、理、化的基本知识一样。没有数、理、化的基本知识，就想把科学技术的尖端突破，那是不可能的。这两年来，有些地方，有一个单位在搞科学技术攻关的时候，有过这样的缺点：就是忽视了基本训练。在科学技术里面的基本训练，就是学习数、理、化的基本知识。在艺术里面的基本训练，唱戏要练嗓子，练步子。写文章的基本训练，是文字的修养。没有基本训练，是不可能把这些东西搞好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科学这一方面来说，学习历史应该是基本训练。现在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大的缺点，就是历史知识很差（中国史的知识很差，世界史的知识很差，社会发展史的知识很差），还有经济地理知识很差（学习经济学时要有经济地理的知识），因此不能很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我们在学习基本课的时候，要用相当的时间来学习历史，主要地是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史、世界史、经济地理。经济地理的学习，可能在学经济学的时候附带地学习一下，而不是作为单独的课程来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学习，可能在学习世界史的时候学习一下。虽然我们有两年半基本课的学习时间，但把时间分配起来看，还很少。比如学习中国史，从原始时代到现代，就不可能比较详细地来讲，主要的时间只能是学习近代，因为没有这样多的时间读书，只有等到分专业的时候，才能够详细地学习。在学习基本课程的时候，社

会发展史就代替了古代中古、原始社会，所以主要是学习近代史，因为近代史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联系得比较直接。

这就是关于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领会它的精神实质的方法。没有别的方法，只有联系实际，联系阶级斗争的经验、实践的经验，才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

当然，联系历史，这是我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实质方法的一个方面，但仅仅只是联系实际也还是不够的。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除了讲到联系历史以外，还讲到研究现状。所以，我们除了讲历史课以外，我们还要经常想些办法来了解现状，这里面有关于时事政策的学习。所谓政策课，不是系统的课程，就是结合当前的各种问题，组织一些文件的学习，听一些报告，组织讨论，用这样的办法来帮助我们了解现状。另外还有调查研究，利用假期回家的时间，到工厂、农村里作一些调查研究。在学习期间，如果有可能，也可以组织一些参观，或者到附近的地方去调查研究，用这样一些办法来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

联系实际，联系现状，除了了解现状的情况以外，还要参加实际斗争。实际是包括了解现状和参加斗争的。如果只是单单了解历史，不了解现状，不参加现实的斗争，那么就不可能深刻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我们在学习时必须要注意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组织调查研究的时候，就要对实际问题经过考虑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我们在学校里学习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危险，只注意到读书，而脱离实际斗争，最多不过是读一点文件、听一听报告，而对实际的东西，自己不去注意思考，不参加斗争，那么就有这种脱离实际的危险。大家在实际斗争里感觉到有问题，需要学习理论，但学了理论，又忘记了实际。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要经常注意到与实际相联系，如果脱离实际斗

争，即使你读了书、学了历史，了解了一些情况，也不可能有深刻地领会。理论要在自己亲身的体验中才能够领会得深刻。有些原则，你在书上读了，自己以为领会了、了解了，但实际上并不了解，甚至自己也不相信是了解了。这种例子很多，比如稍微学一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价值法则的问题，都知道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那么在58年底59年初，毛主席反复地提出：我们搞社会主义的时候，要注意价值法则，注意按劳分配。毛主席的指示，全国干部都听过传达，但实际上怎么样呢？听是听了，但并没有按照这个原则去做，所以就出现了“五风”、“一平二调”的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一种理论原则，尽管你听进去了，但你没有实际经验，就不会深刻地了解它，必然会在实际中碰钉子。我们的干部，并不都是学过经济学的，但也听了毛主席的指示，但是，尽管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实质上并没有领会，是不相信这个原则。如果是领会了它，相信了它，那么他就会照这个原则去做了。没有照这个原则去做，就说明他还是不相信这个原则。这就是说，关于理论原则，仅仅背熟了它的词句，从书本上学到了一点，但还不能够真正理解它一定要到实际中去，甚至碰了钉子，才会真正领会原则的重要性。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讲道：当你违反了客观规律的时候，才感觉到它的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深刻领会这个规律，在实际工作中往往要经过一些曲折，甚至碰钉子，这时才深刻了解到它的确是存在着的客观规律。

所以，当我们学习理论的时候，注意不要脱离实际，要注意运用。我们不仅仅是从书本上系统地学习理论，不仅仅根据历史知识来掌握理论，同时要随时随地找机会来运用，根据我们学到的这些理论来思考当前的许多具体问题，如果有可能，我们要努

力来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所谓联系实际，就是要经常注意把理论运用到实际问题上去。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到学校里来，只能够是读书，是不是可能会脱离实际，住在学校里，怎样运用理论，怎样联系实际，怎样参加实际斗争。关于这个问题，需要讲一下。

关于实际的问题，准备分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实际，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一方面是个人的思想实际。把理论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就是解决这两个问题。学习理论，就要运用理论来解决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建设和个人思想的问题。实际就是现实的矛盾。理论联系实际，就是用我们所学的理论来解决现实的矛盾。解决现实的矛盾，就是改造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就要经过阶级斗争，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改造主观世界，就是解决个人的思想问题。所以主要的学习方法，就是要联系着这两方面的问题来学习，要注意在学习中想办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关于解决个人的思想问题，比较不算困难，因为思想是自己的，自己的思想容易结合；可能大家觉得困难的，是如何解决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我们在学校里读书，怎么能够联系实际呢？“59 班”、“60 班”来校以后，也曾经有过这种感想，就是说，我们四年的学习都是坐在房子里读书，等到毕业回去了，就完全脱离实际了。这种感想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如果我们不注意，是可能有这种危险的。但并不是说，在学校里学习就一定会脱离实际。不能够这样说。问题在于我们学习的时候的安排如何，是不是注意到联系实际这一点。比如像阶级斗争问题，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在学校里就不能像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进行阶级斗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像在

工作中那样处理许多日常的实际问题，如果我们要求同学们在学校里也来处理一些日常的实际问题,用这样的方法来联系实际,当然是做不到的，也不需要。因为党派我们来学习，就是要我们脱离日常的实际工作。脱离日常的实际问题，是不是就一定是脱离实际，那也不一定。脱离日常的实际问题，不一定就等于脱离实际。因为实际并不仅仅就是那些日常的实际问题。所谓实际，是讲的我们整个国家的各方面的阶级斗争和建设中提出来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够直接来处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接触这些问题。接触的方法，就是通过看文件、听报告和时事政策的学习，通过利用假期作调查研究，或者利用学习时间作必要的调查研究。我们在学校里的这种接触实际的方法，不能够像在工作岗位上接触的那样细微、那样直接、那样带有日常性。但我们这样接触的实际问题，我们可以对问题的看法提出意见，这样就可以运用我们的理论、我们的知识。如果我们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好的意见，就可以对工作岗位上的同志有新贡献。这一次“60班”的同志假期回去以后，据青海的同志回来反映，他们这次回去就感觉到他们学了一年多，还是很有好处。有什么好处呢？现在下边正在整风，他们对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比较准确的意见，他们用一年来学习的一些理论原则对地方工作的同志提出了好的意见，他们看了一些起草的文件，能准确地提出一些问题，使这些问题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这就说明，我们在学校里学习，只要很好地安排，可以参加全国的实际斗争，问题就是不能参加得那样多，不是单个人参加，是在比较集中大的问题上参加。如果我们注意了这些问题，就不至于脱离实际。

还有一点，我们在学习理论的时候，对联系实际的概念看得宽一点。联系实际，并不只限于联系具体工作里面的问题，或者

经济问题、政策问题，还有各方面的斗争实际问题，比如理论斗争——报纸杂志上的理论斗争，文化上的理论斗争。最近几个月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开展得比较好，在报纸杂志上的争论比较多。这些争论也是实际问题，也是矛盾，也是实际斗争，不过是上层建筑里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提出来的问题，我们要考虑，甚至于我们要参加这个斗争。这也是联系实际，比如我们可以写文章，来参加现在的理论斗争。“59班”的同志就参加了这个斗争。当然，刚入学，掌握的理论还不多，写的文章可能差一些。但是，参加了斗争也就是参加了联系实际。去年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的时候，“59班”、“60班”又写了论文，反对修正主义。我们作文，有时可以参加这些斗争（关于作文的任务，下面还要讲），但主要地是训练我们的词章修养，把文章写好，而不仅是为了直接参加斗争。我们同志之间的水平不一样，有的同志水平高一点，马上可以参加一些斗争的。

所以，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的问题，我们是可以联系的，只要我们经常注意，就可以找出问题来联系。有没有这样的成见呢？联系实际只能在工作岗位经常处理日常的工作。这种想法是狭隘的。如果这样要求，就没有办法学习，那就只能够去工作。如果我们不这样认为，从另一方面来看，把实际问题看得更宽一些，我们还可以找出很多的实际问题来联系，可以参加到实际斗争中去，可以找到锻炼我们的机会。

至于个人思想的实际，那就是自己的工作经验，自己的思想问题。在学习理论的时候，除了找机会参加全国的各种实际斗争问题来联系以外，还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哪一方面是最主要的呢？两方面都重要，参加全国性的实际斗争问题，恐怕更重要一点，因

为从这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界扩大一些，使我们的理论运用得更广泛一些。但是，个人实际也很重要。联系个人实际，就是联系自己的经验。在学习的时候，根据学到的理论原则，来检查过去的经验。比如，这几年来，我们参加了各方面的工作，工作中有成绩，有缺点，成绩是怎么来的，缺点是怎么产生的？违背了什么原则、什么样的社会规律？如何改正这些缺点？这就要根据我们的理论原则来检查。如果自己在思想上有错误、工作上有缺点，就要纠正这种错误和缺点，根据马列主义的原则，对我们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这一方面也是联系实际，这是自己思想的实际，自己思想的矛盾。学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武器，来解决自己的思想矛盾。不解决这个矛盾，我们马列主义的思想不能提高，就不能排除错误的思想，也接受不了正确的思想。人的脑子里只能占一个东西，错误的东西在我们脑子里，就不能接受马列主义。所以一定要跟错误的思想作斗争，这就要有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没有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我们就不可能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就叫做改造主观世界。学习马列主义，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这是我们马列学院一贯坚持的原则。学习马列主义的过程，就是改造思想的过程，学到哪一天，就要改造到哪一天，改造是无止境的，不会有尽头，我们学四年，就要改造四年，四年学完了，还要继续进行学习，还要继续改造，这是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一个根本方法。

所以，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一方面想办法把我们学到的东西与全国各种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要联系我们自己的思想。这就是说，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注意改造客观世界，同时要注意改造主观世界这个原则。

## 四、关于个人自学和集体学习的关系问题

我们的学习方针是：以个人自学为主，讲课为辅。个人与集体的学习关系，也是以个人自学为主，适当地结合进行一些集体讨论。这也是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的两个原则。在自学和辅导方面，我们以自学为主，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大家都是比较高的干部，这就是说，大家有一定的基础，有可能自学，而马列主义理论主要是靠自己钻研，科学是要靠个人钻研的。单靠教员讲，是不可能学好的。我们不是小学生，教小学生读书，就要多讲一点，主要靠讲。理论学习、科学研究，要靠自己钻研。而且我们都有一定的钻研的能力。这一点要大家注意。另外，学校里要有必要的辅导。没有辅导也不行，因为在个人钻研的时候，有些关键问题如果没有辅导，就太费力，有了辅导，可以帮助大家进步的快一点，教员的辅导可以帮助同志们在个人钻研的基础上，对马列主义的了解向前推进快一些，这是一种辅助作用。另外，我们学校的教学力量还比较薄弱，我们的教员不多，而我们的任务很大，所以主要靠教员讲课，也不可能。我们能够正式讲课的教员，没有几个人，一般的讲师可以作一些辅导。我们对“61班”，尽可能多组织一些教员、讲师参加辅导，过去“59班”、“60班”的课程，讲师讲的比较少，都是学校里的主要教员讲的。我们的主要教员不多，只有三、四个人。现在，主要地要组织教研室的讲师来讲，这样，我们的辅导就多一点，虽然以自学为主，辅导多一点也有好处，特别是请外边的人作时事政策的报告，另外还请一些专家来讲课，比如中国历史，我们自己没有专家，就请外边的同志来讲。但是，请外边的同志来讲课，是有限的，因为他

们都很忙，不能够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所以，学习的问题，主要还是靠自己努力钻研。

个人与集体的问题，是在个人学习的基础上进行集体讨论，但仅靠集体讨论也不可能。所以一定要在自学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集体讨论。集体讨论不能够太多，没有集体讨论也不行。科学没有讨论不行，讨论就要有争论，就要有矛盾，有不同意见的斗争。科学理论是要求全面地领会，单靠个人钻，个人的意见往往是片面的。克服片面意见的方法，就是集体讨论。不同意见的争论，才能达到比较全面的真理。理论学习、科学研究，一定要贯彻、坚持“百家争鸣”的原则，对于这个原则，有许多同志还不习惯，实际上就是不很赞成，碰到不同的意见，不能够虚心地、认真地考虑，对不同的意见，往往是很简单地戴上一个帽子压下去。这种办法，对科学研究有很大的妨碍。中央对这种不正确的办法是有批评的。前几个月，《红旗》上的文章批评过这个问题。科学研究，不是处理法律问题，不能用压的办法压服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要经过充分地争论，然后得出一个全面的意见。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方法，有不同的意见，要经过充分地争论，然后再作结论，或者由班里的小组作结论，或者由教员辅导时作结论。一个问题，不能无限地争论下去，可以讨论到一定的程度时做一个结论，做了结论，还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保留，不能在理论问题上简单地戴上政治帽子。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要加以区别。有时候区别起来很困难，因为马列主义理论常常跟政治是分不开的。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经常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分起来是很有困难的，但是一定要加以区别。每一个问题，都有某种的政治倾向性，经过研究，当然可以做出结论，但也不能够太急，理论问题可以多争论一些，特别是历史问题，马列主义里面研究历

史的问题，大部分可以跟政治明确地区别开来。比如中国历史分期的问题，封建社会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历史学家还有不同的意见。郭沫若与范文澜有不同的意见，在我们这里教书的吕振羽同志，他跟郭沫若、范文澜又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各有各的意见，谁也不能给谁戴上什么机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的帽子，谁这样做就是错误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错误，说某一个历史学家是反马列主义的，理由是：毛主席说过，自周秦以来的两三千年就是封建社会，因此就说，你不能够认为封建社会不是从周秦开始的，这是修正主义，修正了毛主席的说法，等等。这样说是错误的，毛主席是当做学术问题讲的，没有分出周是哪个时候，秦是哪个时候，周有好几个时期，有春秋、战国、西周，他提出这个问题，最后由历史学家来做结论。如果有人提出：如果反对封建社会从周开始，那就是修正主义。这当然是错误的，毛主席也不会赞成这种结论。所以，学术问题，政治问题，有许多是可以分开的，但是，也有一定的界限。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采取科学的作风，百家争鸣的作风，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

## 五、关于语文学习和作文的问题

我们把语文课当做正式必修的课程安排的，同志们应该重视。我们党校（过去叫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一开始就规定要作文，“59 班”开始，我们规定每月作文两次，一定要作，这一点先向同志们交代清楚，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规定，——每月两次，但文章不一定写得很多，一千字到两千字左右，但一定要作。是不是也可能有这样的人，原来写文章的基础比较好，那么就不一定只写一两千字，可以写五六千字、一万字。如果有这样的同志，可以作为例外，不一定每月一定要写两篇，可以交一篇，也可以两

个月交一篇。一般我们要求每月写两篇。中学是每个礼拜写一篇，我们不是中学生，我们是高级党校，两个星期写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大家要有精神准备，一定要努力做到这一点。因为作文很重要，写文章是学习理论的重要方法之一，写不好文章，理论也学不好。学习理论，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思想能力、思考能力。要提高思考能力，就要靠训练。训练思考能力的方法很多，讲话是一种方法，讲课也可以使我们的思考能力得到训练，开会讨论问题，发言也是一种训练。但是，讲话有一个缺点，可以马虎一些，在我的讲话里可能就有错误的地方。讲话有一个便利条件，头一句话讲的有缺点，等他讲第二句话时发现了这个缺点，他在第二句话里可以纠正一下，前后两句话有矛盾，第一句话有缺点可以不算，可以纠正。我在这里讲话，你们作记录，你记录了第一句话，没有记第二句话，我就说你记录了也不算，我讲的是第二句话。所以记录是不可靠的，它不是录音，录音可以把每句话都录下来。现在你把我的话记下来，没有经过我的修改，将来批评我，我不认账，我说这不是我的原话，我的原话可能有错误，但我纠正了，第二句话可能纠正了第一句话。所以，说话是训练思想的一种方法，但并不是最好的方法，但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我们说它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是跟写文章比较来说的，不是说这个方法不好，说话也能够训练思想，说多了，思想训练就更多一些，多找说话的机会，对思想的训练，对学习理论，也有好处。说话、写文章，也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这是指的在学校里来说的。在工作岗位上也是这样，在工作岗位上，你能把报告写好了，就证明你在工作上的问题解决得好，对工作上的问题，自己思想上清楚，那么你也会把报告写清楚一些。所以，写文章、说话，是我们理论学习的一种重要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学习成就的表现，你

是否学习得好，就表现在你在讨论会的发言里，表现在你写的文章中，而文章中的表现更直接、更明确一些。因为写文章是白纸上写黑字，错了不好不认账，错就错在那里；说话说错了，可以不认账。所以，一个人的思想认识准确不准确，最后表现在文章上。因此，我们一定要把写文章学好，学好善于把自己的思想更准确地概括在自己写的文字里。学理论如果不讲究写文章，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理论学好。所以一定要充分地重视写文章，不能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不能马马虎虎地对待，应当把语文课看做同党史、哲学、经济学同样重要，同样要学好这门课程。我们写文章的要求是：努力学好、写好、写得快。我们所以要一个月写两篇文章，就是因为要大家多找一些机会来锻炼。文章要写得好，写得快，没有别的办法，主要的方法就是多练习，除了按照规定每月写两篇文章以外，最好自己主动地找一些机会来训练自己的写作，比如给朋友写信，给自己家里写信，可以写得认真一点，把写信当做作文那样认真来写。我们中国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学者，有能力的政治家，他们都很重视写文章，他们对写一封信，也都很重视，是一丝不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都编成集子，那里面的一些文字也是很考究的。写信，做日记，读书写感想，都要认真思考。学习在写作问题上掌握各种各样的形式。我们的同志只会一种形式，就是写报告。报告本身也是多种形式的。但我们写报告，总是一点、二点、三点，成绩几点，缺点几点，然后自己的意见几点。这种形式太呆板了，我们要学会各种各样的形式，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我们语文中的近代范文，主要是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已经出了四卷，在这四卷里的文章，有没有两篇、三篇的形式是完全一样的呢？没有。每篇文章都是按照不同的内容写出不同的形式，我们要学会

把每一种思想用适当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我们一般地不能够要求得那么高。我们的同志写作水平不齐，有的人写得好，有的人写得差，我们初步的要求是，文章写得通顺，文理清楚，逻辑上没有矛盾。同学们的考试卷子，我没有完全看，看了几篇，听了大家一点汇报，一般说来，条理基本上清楚，所有同志的作文都及格了，但这并不是说条理都是清楚的，有些文章还是很混乱的，有的文章，一段一段看起来很混乱，有的开头很混乱，后面就有条理了，大体上比较清楚，所以就取了。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把条理搞清楚，文字清楚，逻辑上也清楚。我们努力按照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的两条标准来做，一条是要有观点、有材料，另一条是文章要准确、生动、鲜明。我们应该努力作到这样几点，就文章的内容来说，应该是既有观点，又有材料。大家的考卷上，大体上有这样一种情形：在观点上，大体上明确，但一般地都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材料，不能够用有说服力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是缺点，好处是，观点大体上正确。因为调查研究的问题，根据大家几年的经验，根据中央最近的指示，大家也学了毛主席的文章，所以大家在观点上一般说来是比较正确的，掌握了正确的观点，知道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它是我们工作的重要方法，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方法，但还不善于用有说服力的材料（不要说有丰富的材料了）或者一两个典型的材料，非常有说服力地把这种观点结合起来。毛主席的文章，都是把观点和材料密切结合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没有一篇是讲空文的，都是跟历史材料结合起来、跟实际材料结合起来的。经典作家的文章，无论哪一篇都是这样的，有历史材料，有实际材料，同时根据材料提出明确的观点。所以，要使文章有充分的说服力，别人看了你

的文章，感到你说的道理是没有人能驳倒的。我们要努力学习写这样的文章。

另外，在形式上要有准确性、生动性、鲜明性。准确地把一个观点说出来，准确地概括历史经验，把材料里面得到的结论用很简单明了的语言写出来，不是像我们讲话那样罗罗唆唆，重复很多，前后矛盾。写文章要尽可能避免重复，有时候有必要的重复，不必要的重复要完全避免，很干净、很简明地表述出来，同时还要鲜明生动。所谓鲜明，就是你说出的话是明确的，就是这样的解释，不会使人感到还有别的解释。所谓生动，使人读起来很愿意读，觉得说得形象，有文艺的味道，读起来音调好听，也很愉快，像文学作品一样，使人感觉到印象很深刻。毛主席的文章就是这样的，非常鲜明生动，使人很想读，比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面讲敌我矛盾，如果用教条主义的形式来写，就是：我们跟蒋介石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毛主席不是这样写的，毛主席说蒋介石是敌人，敌人手里拿着刀子，刀子是要杀人的。把理论用很形象很生动的话写出来，使人听起来不难懂，而且很生动。我们许多人写文章就不是这样的，我们写这样的话困难很大，常常是大段大段地抄书，抄书能抄生动的东西也好，生动的东西不抄，而是抄一些比较原则的东西。在经典著作里，原则与生动的东西结合起来，就不觉得枯燥。你单独抄下来是枯燥的，而你解释的又是原则，用原则解释原则，结果很枯燥。这种本领不是一天学到的，要锻炼，要学习汉语，要有一些词章修养。也就是说，要有文学修养。这是要经过努力才行的，我们不能一下子就要求做到这一点。我们希望大家经过四年学习以后，能够比较接近这个标准。我们一定要提出这个标准，这是我们在写给中央的报告里所规定的，是中央批准的，我们的标准，就是既要有观点、材料，

又要有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我们要努力接近这个标准。四年以后，每个同志写的文章，都比现在好得多，大多数文章有准确性、生动性、鲜明性，条理清楚，不至于混乱，错别字少一些，能够尽可能肃清不合语法的句子。那么要做到这一点，也是要靠个人努力。至于如何努力学好写文章，将来由专讲写文章的教员来帮助。要多读一些好的文章，但主要的还是靠自己的努力，要认真地写，不要马马虎虎。写的时候，可以个人写，也可以集体写，主要是个人努力，有些文章可以集体写，还有的是个人写了以后，集体帮助修改，找三两个人相互讨论一下。只靠个人也不行，也不好，跟学理论一样，要互相帮助。在我们写文章这一方面，要注意养成一种讲究词章的风气。我们中国人有一种传统，在知识分子中讲诗论文，大家谈论互相帮助。文章不要写得太长，我们所以每个月规定写两次，因为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不会太长，过去在所谓“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文章，现在有“下笔万言、离题万丈”的文章。现在看来，千言的文章不算长，旧文章下笔千言，就是长的了，都是写几百字的文章，万言书那少得很。我们要求大家每月写两篇千言的文章，如果你真是写不出来，把你写给朋友的信抄出来也可以，不过你的信得像个文章样。同志们交出来的文章，我们要挑选修改，有些文章大家可以互相修改。

为什么这个问题要多讲一点呢？因为在平时大家不大注意，因此这里多讲一点，以便提醒大家注意，理论学得好，能够写出来才算数。你说你的马列主义理论学得好，但你不能够用文字表达出来，那就不能算是真正学好了。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能够写出比较好的文章来。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能够写出相当好的文章。对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想讲的问题，主要的就是这样一些。

最后一点，希望大家下决心好好学下去。四年，这不是一个短的时间，要下决心才能够坚持下去。当然，同志们是有决心才来学习的。但是，可能有个别的人还没有决心。听说有个别的同志，来的时候根本没有思想准备。如果有这种情况，大家还可以再考虑一下，因为四年的时间不算短，如果精神准备不足，中途退学，那就不合算。如果决心不够，很可能学两年就坚持不下去了，到那时再退学，实在不合算。所以，现在是新学年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有没有决心。四年中要学好，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自己下决心，一个是身体问题，个别的同志还可以再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是不是能坚持四年，自己是不是有精神准备。如果实在没有决心，实在坚持不下去，还可以提出来。因为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直坚持到底，不要中途退学。所以在开学的时候把这一点提出来，希望大家考虑一下，愿意提出这个问题的，还可以提出来，如果不提出来，那么从今天起，就要坚持四年学下去。我们希望大家，最好利用这四年的时间，一定在现有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一步，能够掌握更多的马列主义知识，能够在写作方面，大大提高一步。

我要讲的，就是这样一些。这里面可能有不对的地方，不对的，请王（从吾）校长纠正。

# 社会发展史引言*

(1961.11)

## 第一次讲课

(1961.11.16)

今天我给60班讲社会发展史引言。这个课计划学两个星期，时间很短，我们只能讲一些要点。

### 一、前　　言

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一些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学习社会科学就像学习自然科学一样也要有基本知识。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是数理化自然科学发展史，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主要是社会发展史和经济地理。

我们这门课，"60班"开始才作这个计划。本来这个课应该在学习世界史以前学习，因为我们提出这个计划比较迟了，"60班"已经开始学习世界史，再回过头来学习也不好。本来应该先学习

* 这是艾思奇按照中央高级党校教学计划，为"60班"学习社会发展史所作的引言报告。我们这里只收入"前言"和"从猿到人"两节，后面所讲的"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四节，因与解放初期所讲的内容大致相同，故删去。这里是按速记稿整理，只作了一些文字加工。

社会发展史，再学习世界史，最后学习中国历史。因为社会发展史是历史中最一般的东西，它可以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纲领，或者可以说提供研究历史的方法论。所以，在学习历史以前学习社会发展史比较好，现在学习历史以后再学习社会发展史也好。“59班”现在就不去学习了，准备以后在学习哲学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的时候再学习。

我们学习社会发展史还有一个目的，我们的基础课世界史部分着重学习近代史，古代史、中古史就不学了，学历史专业的学习，不学历史专业的就可以不学习或者自学，不一定要专门研究，主要的是时间问题。一般基础课要把近代史多学习一些，因为这和马列主义的课有密切的关系。古代史和中古史这一部分怎么办呢？就用社会发展史来代替。社会发展史这门课时间虽然短，但是它要完成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掌握社会发展史这一门基本知识，另外还要多少代替古代史和中古史的历史知识，这是我们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目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现在的讲法跟以前讲的社会发展史也有些不同。刚解放以后，我们都学习过社会发展史，那个时候我讲得很多。当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社会发展史向群众介绍一些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观点，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更重要的就是介绍劳动观点、阶级斗争观点。当时这样做是有的放矢的。全国才解放，有很多群众，很多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对这些人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很宽广的一门科学，要想什么都宣传不可能，因此，就宣传他们最缺乏的东西，同时又是跟资产阶级思想针锋相对的东西，就是阶级观点和劳动观点。所以，那个时候讲历史唯物主义主要的就是讲这两个观点。知识分子轻视劳动者，因此我们就提出劳动创造社会，劳

动创造人类。那个时候，有许多人就是不相信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不相信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历史。我们当时讲社会发展史，主要的是讲这两个观点。当时的目的跟我们现在不同。以前我们也写了一些讲义，现在就不用了，因为不太适合现在的需要。现在的任务是讲社会发展史，实际上是讲理论，并不是介绍一些社会发展史的基本知识。当然我们现在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时还要注意掌握社会发展史的知识。从前我们讲社会发展史就不会介绍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这里面讲的东西很丰富，但一般的从来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人，让他学习这个东西很困难，当然水平比较高一点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学习这个东西。我们向一般的群众作宣传是用通俗的社会发展史的书。

我们现在要学习的材料着重是这几本书：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论国家》、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还有从《苏联大百科全书》中选了几篇文章，这部分材料字数很少也很简单，不读也不太要紧，将来印出来发给大家。我们主要的是读这几本书，不要贪多。恩格斯的书要精读，把这个知识很好地掌握一下。这些书里主要的是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材料，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东西近代史里有，所以就不必要读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史的材料了。时间也很短，集中读这几本书就可以了，特别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是研究历史的方法论，古代史和中古史都在这里面，同时，这本书不是太容易读的，大家多花些时间仔细研读一下。

恩格斯这些著作里面，有观点、有材料，材料很丰富。从他

的著作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写文章的方法，就是观点和材料结合得很密切，不讲抽象的东西。我们的教科书在理论上作了一些阐述，但是也有一个缺点，就是缺乏说服的材料，教科书的说服力不强。恩格斯的这本书说服力很强，每一个观点都有充分的材料证明。经典著作都有这样的特点，这就是观点和材料的密切结合。所以，读这些书的时候要注意两方面：一方面，要注意弄清楚他的观点。他对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些基本观点，是社会发展史最基本的线索。对这些线索要掌握，这是最一般的，最普遍的东西。“莫斯科会议宣言”中讲到俄国革命最基本的道路有九条，这九条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线索，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最基本的观点。我们读经典著作一定要注意到他讲了一些什么基本观点。关于社会发展过程要注意到它对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是怎么谈的，弄清楚从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这个基本过程是什么。另一方面，又要注意里面丰富的材料，对这些丰富的材料不一定要死记，读三遍也不能把这本书的每一点都记得，但是要注意这些材料是证明他的基本观点的正确，他怎样运用这些材料，怎样掌握这些材料。这些材料都是从大量的材料中，去粗取精地提炼出来的。

所以，材料和观点都要注意。要着重记住他的基本观点，同时也要注意一些材料，凡是材料都有特殊性，它是从具体的、典型的材料中抽出来的。基本观点是比较抽象的说理，材料就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选择出来的。恩格斯讲古代社会时，着重用了摩尔根的印第安人的材料，也综合了古希腊、罗马的材料。印第安人是活生生的还没有灭亡，希腊、罗马已经过去了。我们中国现在搞历史专业的人也可以找到活的材料，现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原始社会。他利用活的材料再加上一些死的，把它综合起来证明原始公社、奴隶

社会的发展。希望大家读书的时候注意这个问题。

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我的引言怎么讲呢？我感到很为难。引言要讲详细了就是讲社会发展史，要讲十几次，两个星期的时间就不够了，同时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准备，因为还要讲别的课，没有办法。所以，现在这个引言只能这样讲：还是把我们的学习目的说清楚（刚才已经说清楚了），然后再把社会发展史的线索说明一下。刚才讲有观点有材料，我在这里就没有办法讲材料，只能讲一些基本观点、一个基本线索，作为大家读书的参考。我讲的也不一定完全准确，准备的也不一定很充分，只是把自己熟悉的线索翻了一下。根据我讲的线索大家在读书的时候可以更清楚一些，如果我讲错了，也可以有个对照，也有好处。另外还有教研室的同志作一些辅导，比我讲的更详细一点。我不能多讲，引言讲得多了，后面没有办法讲，讲少了也不好。不多不少比较好一些。我只准备把基本线索讲一讲。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一段话可以提出来先说明一下，在这本书的第一章“有史以前的诸文化阶段”里，把原始公社的几个阶段说的很清楚，把原始公社的基本线索也说得很清楚。在第一章最后一段，他这样讲：“这幅图景跟我们研究终了时将展开在我们面前的那幅图景比较，那它就显得太暗澹和可怜了；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看见由野蛮到文明的过渡及它们两者之间的显著的对立的全景。”这段话大家注意一下，这是学习社会发展史的一个方法。我们一般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往往犯一个毛病，就是对问题只要了解几根骨头就满足了，只要把教科书的基本规律了解了就以为很懂得马克思主义，或者记住几个原则，几个规律，抓几个例子作证明就满足了，像这样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者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是作为自己的最后目的，学习马

克思主义的目的，是把这些观点运用到某些问题、某些丰富的材料中去，把这些材料贯穿起来，把这些问题加以解决。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某些典型的材料加以概括总结，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著作。列宁的《论国家》比较接近这种形式，因为当时列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作为通俗性的东西写的，没有把它看做一个科学著作，《论国家》也是作为独立的材料。所以，大家学习这些经典著作的时候，除了注意观点以外，也要注意材料。材料不一定要死记，但是注意它怎么运用。真正的历史发展过程都是具体的，有特性的，没有充分的具体材料作为基础，要想把历史著作写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恩格斯这本书有很丰富的材料值得我们学习，材料有具体性，有特殊性，因此也有它的时间性。恩格斯所用的材料在我们现在来说就不够了，我们现在对原始公社的具体材料多得很，就是中国的材料也比恩格斯知道的多，首先，恩格斯就不知道北京猿人、我们的甲骨文字，恩格斯也不知道。恩格斯的材料多数是西方、亚洲西部，伊朗、叙利亚这些地方的，有些材料也不一定都完全是事实，他的观点基本上是对的，但是他的材料也可能用错了，因为他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他讲的原始社会野蛮初期到中期，西半球和东半球就不同，西半球主要是开始于谷物的种植，东半球野蛮初期主要是搞畜牧。这个材料是不是就一定准确，现在看起来就值得怀疑。中国的野蛮初期是不是就完全靠搞畜牧？我们的谷物种植很早就有了，商朝奴隶社会农业很发展，古代没有一个很准确的材料，但是从传说来看，周朝的祖先后稷，就有皇帝教民稼穑。这说明不是从畜牧开始的。因此我们看材料不要认为它是绝对正确的，他运用当时所能掌握的材料来说明他的观点，而当时的材料不一定有我们现在丰富，是有缺点的，也可能有错误。提出这个问题作为大家学习的参考，研

究的时候注意一下。就是说，读经典著作的时候也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是不能动摇的，当然经典著作的个别原理以及它的观点、具体材料是可以补充发展的，在很少的情况下也可以做适当的修正。在观点问题方面，恩格斯的这本书的序里讲道："依据唯物主义的见解，历史上的决定要素，归根到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品、衣服、住所以及为此所必需的种种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属蕃衍。"（《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第170页）这个观点在苏联有一个时期的认识是有错误的，认为人类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关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所谓人的生产就是家庭的关系，人类要维持生命也要维持再生产。苏联有一个时期认为这是错误的，后来又有争论。恩格斯不一定错，因为恩格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主要的是讲原始公社，原始公社家庭的关系起很大的作用，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关于学习目的和学习方法问题，大体上就是这些。

下面就讲社会发展过程的线索。我讲的也是不很科学的，作为一个科学报告，就要用丰富的材料来证明这个观点。现在讲引言就只能讲线索。

我想分五段来讲，一、从猿到人；二、原始公社；三、奴隶社会；四、封建社会；五、资本主义的产生。

我们发的材料，除了资本主义的材料和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材料没有外，其他如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有了。恩格斯有一篇文章叫《封建社会的解体到资本主义的兴起》，这篇文章很好，最初我们作计划的时候没有找到，现在找到了，准备把这篇文章加到计划里面去。

## 二、从猿到人

这一段主要的是读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文章，它就解决了人类是怎么产生的这个基本观点，同时，恩格斯也用他当时的材料证明了这点。

根据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材料来说，恩格斯当时的材料很丰富，但是比起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还是很少的。比如，恩格斯所讲的猿猴将要过渡到人类的这个过渡时期，一般的生活在树上。这种猿猴现在地球上已经找不到了。但也可能找到，最近有一个消息，西双版纳又出现了野人，有人就清楚地看见了，全身有毛，下巴有胡子，这说明地球上还有野人存在。云南人从小的时候就听说有人熊，和人一样，就是全身有毛，很厉害。这种野人跟猿猴不一样的是两膝直立，跟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全身有毛，头也比人大得多，手像人。这个材料可能要比恩格斯当时知道的多一些。就基本观点来说，恩格斯在文章里首先肯定：人是劳动创造的。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里第一段就讲："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第80页）人类一开始就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而不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不是依靠自然的条件而转移。这个观点说明劳动是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这也是恩格斯第一段讲的，"劳动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这就是说，不仅是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才是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自有人类以来，劳动就是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才是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已经不单单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

为乐生的第一需要。没有劳动就不快乐，劳动是非常愉快的事情。是这样一种看法。在共产主义社会以前，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认为劳动是愉快的事情，共产党员认为没有劳动就不愉快，有些修养不好的共产党员也不一定这样认识。马克思根本没有讲过：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才是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如果讲到劳动是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这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社会如此，这是很清楚的，不劳动就根本不能活下去，没有劳动什么都没有。关于这点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说的很清楚。“每个小孩子都知道，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工作，——不用说是停止一年，就是只停止几个星期——就会饿死的。”（同上书，第 462 页）现在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就成为生活第一需要了。这种提法中国有，苏联也有。苏联有些哲学家也有这种提法，把劳动作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看成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事情，这个提法是错误的。

我们现在就要强调劳动是人类生活第一需要这个观点，向知识分子、群众宣传劳动观点，特别是劳动态度问题，不是都解决了的，许多人劳动观点也没有很好地建立。才解放的时候，我们大力宣传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多人都解决了，但是不一定全部解决了。学习“从猿到人”，第一就要学习劳动创造人类，劳动是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这个观点。

劳动是怎么创造人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这点恩格斯的著作里也作了回答。劳动创造人的过程是猿猴出现了手和脚的分工，猿猴最初还是生活在树上，树上的生活必然引起它的手和脚的分工，到了接近于人的时候，手和脚就出现了分化，真正的人出现了，手和脚就开始完全分化了，能够直立走路，手就摆脱了行走的负担。所以，恩格斯讲：手和脚的分工对从猿到人有决定意义。

从猿到人的过渡起决定作用的，是手和脚的分工。

这里我们要讲到，过去有些不很准确的看法，认为从猿到人的转化是从一把石刀开始，决定的一步是把石头能制造成石头工具，这个看法不清楚。恩格斯这里很清楚地讲，从猿转变到人决定的一步并不是制造石刀，而是手和脚的分化，这是起决定作用的第一步。当然制造工具也是起决定作用的，但是制造工具并不是第一步，第一步是手和脚发生分化，这一点要搞清楚。

有了手和脚的分化就开始向人类走出了第一步，为什么说手和脚的分化猿就能开始转变为人的第一步？因为手和脚的分化人类就有了经常的劳动，用手来进行劳动。这样手就能在长时期受到训练，能把石头制造成工具，最初是利用现成的工具，经常用手使用工具，然后才能制造工具。所以，在人类没有制造石头工具以前，还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的开始是手和脚的合作，使猿开始向人过渡，能制造石头工具就是更进一步成了人。以前我们不大注意这点，认为从猿到人就是从制造工具开始，没有注意到制造石头工具以前还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中间有相当长的时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章蒙昧时代这段讲：人们住在森林里，以采集果实为食物，开始能说话这个时间很长。这里没有讲到制造石头工具，而且他在这段最后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过渡阶段。所以，这个阶段是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它还不是人，但已经向人的转化走了第一步，它是人，但还不能制造工具，所以说它是过渡阶段。

所谓过渡阶段，就是已经开始可以算作人类历史了，但是还带有过渡性，还没有完全脱离猿类的性质，但是在人类历史里面不能不记录这一段。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往往要有过渡阶段，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不是还要有过渡阶段吗？现在有大过渡有小过

渡，小过渡就是由几种所有制变成一种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大过渡就是整个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每一种社会形式的转变过程中总有过渡阶段，但是过渡阶段的开始也就可以说是新的阶段的开始，新的历史时期不能不把过渡阶段算在一起。过渡阶段有时包含在旧的历史时期，有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蒙昧阶段的低级阶段，没有完全脱离猿类生活，但是已经应该算在人类历史的开始了。

我很希望云南野人的确是事实，那将对人类历史有很大的贡献。很可能是事实，按照恩格斯这本书来讲，人类的祖先最初是在印度洋，一百多万年前后那一带是陆地，人类的祖先就是在那个地方生活，后来那块地方沉下去了，就变成印度洋。所以，人类的祖先就会在印度的周围存在下来，很可能是最原始的人类遗留下来的。我们最近人类学和社会学有争论，是关于有没有旧石器的争论，肯定有旧石器的就是发现北京猿人的裴文中提的，所谓旧石器就是在整个石器以前还有旧石器，这种石器还不算人创造的，但是多少也创造了一些。贾兰坡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没有。两个人的争论涉及北京猿人时期是不是有旧石器。按照恩格斯的这种提法，旧石器这个阶段的存在应该肯定下来，比较恰当，就是说有一个过渡阶段，介于能制造和不能制造之间。那个时候也使用石器，但是比较没有规律。所谓石器时代是两个阶段：一个旧石器时代，一个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之间当然还有很小的阶段。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表面很不光滑，叫打击石器，是比较粗糙的东西；后来一个时期，就能把石器磨的比较光滑，这就是新石器时期。这要有一定的技术，要能掌握技术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在整个石器以前，还有一个长期使用石头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是不是就叫旧石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有过渡阶段恐

怕是要肯定的。

在这个过渡阶段，类人猿在生理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手和脚的分工，手越来越巧，脑子也就发达了，由于劳动需要互相交换意见，语言也发生了，由于直立行走，语言的器官就发达了。这些就是由猿到人发展的第一步，也就是由猿到人过渡阶段的一些基本变化。

# 在布置“60班”历史教学计划时的讲话*

(1961.11)

从今天开始，“60 班”学员开始学习中国历史。具体地布置教学计划是由教研室的同志来讲，我这里只是主持一下，作一个开场白。

我不是搞中国历史专业的，对中国历史可以说是“外行”。这一门课程，本来是吕振羽同志作我们的指导，“59 班”从头到尾都是他指导这门课学习的。现在他病了，住在医院，没有办法从头讲起了，等他病好了，再请他来讲。他在“59 班”讲课时，我们已经录音了，可以补救一点缺点。当然，如果他本人来讲，那就更好了，他会根据以前的经验，现在有什么新的发挥，讲得更好。这门课，我们主要是请他来讲，还请别的一些专家来讲。

计划已经发给大家了，教研室的同志要讲一讲计划里面的几个重要问题。这里我想对学习历史的目的、要求，简要地讲一下。

关于学习历史的目的、要求，计划草案中也有几条，头两条就是讲的目的、要求和方法，当然草案里讲得很简单，要求我们“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学习，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重大事件，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为进一步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

---

* 这是艾思奇 1961 年 11 月 30 日主持布置“60 班”历史教学计划时的讲话，这里是按速记稿整理，只作了文字的加工。

义、毛泽东著作准备必要的中国历史的基础知识”。这个要求不高，要求大家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学习，得到一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知识。基础知识有四门：西洋史的知识，中国史的知识，社会发展史的知识，还有经济地理。大家都学习了社会发展史，现在就要学习中国史。这些知识，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很重要，特别是中国历史的知识。马克思主义是要结合中国的实践才能够很好地了解，毛主席所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原则，也包括中国史在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首先是跟当前的实践相结合，跟中国的现状相结合。但也要跟中国历史的实践相结合。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讲过，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从三方面来学习，一方面是理论，一方面是历史，一方面是现状。理论是讲普遍真理，然后要了解现状，了解历史。这三方面，缺少一方面，都不是完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要联系现状，联系历史，那么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才算真正全面的，才比较真正能够有作用。所以，学习历史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学习中国历史，更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怎样结合现状，这个问题比较容易了解。大家都是作了实际工作的人，特别是学了毛主席的著作，学了党史，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是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这一点比较容易了解。可是马克思主义怎样跟中国的历史结合起来，有些同志对这一点恐怕不一定了解。所以，我想对这个问题稍微说几句。

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用来解决当前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且也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对中国历史传统里面的精华加以提炼，利用中国历史上好的经验帮

助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跟中国历史的结合就是这样的，一方面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的历史经验，整理，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从整理，总结中国历史的经验中找到中国历史上好的传统，并把它运用到现在，帮助我们解决现在的问题。我们读毛主席的著作，从中就可以看到主席运用了许多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比如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就是运用春秋时代鲁与齐战，鲁国打败齐国的经验。这是中国历史上好的经验，这些好的经验，在过去的历史书上都有记载，但是它的看法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主席把这些东西摆到自己的著作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加以解释，就成为现在帮助我们指导实践的很好经验，这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是正确的，不但现在能够用，过去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也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才能有很好的解释，并且把这样解释的经验就可以运用到现在的实践中去。这种例子很多。主席常常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些人的话，这些话都是过去的人们总结了当时的经验所得到的一些社会规律的知识，只是经过毛主席加以改造，就变成更宝贵的经验。比如“实事求是”这句话，这是中国《左传》上的话，是春秋战国时人家讲的话。那时讲的实事求是，不是今天的意思，那是讲的有点现实主义，事情是怎样就怎样办，没有毛主席现在讲的这样深刻，“实事求是”就是从事实里面找出它的规律来。这话在今天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变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变成了毛泽东思想中一个最根本的观点。所以我们对中国的历史就是要逐步学习，不可能把整个中国的历史经验都作全面的整理，作这种工作是专家的事情，我们作不了这样的工作。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材料非常丰富，现在的历史专家在好多问题上都有争论，好多历史问题

还没有解决。我们现在学习历史不是作专门研究，只是初步学习，主要是学习一些必要的知识，了解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知道一些重大事件，根据这些线索和重大事件，大体上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当然也有它一般的东西，跟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特殊的东西。我们学习中国历史，着重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发展比较特殊一点的规律，或者在研究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中找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那么我们掌握了这些知识以后，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毛泽东思想，也就是对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帮助。将来我们学习了几个月的中国历史以后，回头再来读毛主席的著作，那对毛主席思想的了解会更深刻一些。现在同志们对中国历史的知识比较少，读毛主席的著作时有些问题就不能够深刻地了解。

所以，学习中国历史的目的，是掌握一些中国历史的初步知识。这种直接目的，又帮助我们达到间接的目的，使我们能够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提高我们对毛泽东著作了解的水平。学完了中国史以后，再进一步学习政治经济学、哲学，就比较好学习。学习的目的是这样的。

这次对中国历史虽然是一个初步的学习，但还是需要比较系统地学，时间虽不多，我们要尽可能利用现有的时间把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弄清楚。从古到今究竟有些什么朝代，恐怕有些同志不一定能背下来。所以我们至少要把朝代搞清楚，把每个朝代的具体情况大致了解清楚。前一时期，翦伯赞同志说，有一种观点就是否认朝代的区分，要打破王朝系统。他不赞成这种观点，我觉得不赞成好，打破王朝系统不大好。中国历史就是有这种王朝，历史的发展过程是经过这些朝代一天一天发展过来的，每个朝代总是成为一定的段落，它是客观事实，你怎么好打破它呢？要打

破这个系统，那就把中国历史抽象化了。中国历史的特点就没有了，那就不像中国历史了，那讲一讲社会发展史就行了。我们上次讲了社会发展史，社会发展史只是一般地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不讲王朝系统。这种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当然也有。可是问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一般规律又采取了特殊的形式，这种特殊形式是通过王朝更替表现出来的，不注意王朝的变化，就不能掌握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所以，应该把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都经过一些什么朝代）搞清楚。因为要打破王朝系统，所以这两年有些学校里的历史学习搞得很糟，学习中国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学了四年中国历史，大学毕业了，连中国历史上经过多少朝代这点最起码的知识都不知道。

不打破王朝是不是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规律了呢？那些有打破王朝系统的观点的人认为，这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律，一定要打破王朝，才能够真正掌握这个规律。事实恰恰相反，因为社会发展的规律，在中国是通过王朝表现出来的。如果你不把王朝研究清楚，那么对基本规律的研究也搞不清楚。普遍性是寓于特殊性当中。毛主席在《矛盾论》里面讲过这话。在历史上还是可以用得着的。离开了特殊性找不到普遍性，普遍性不能单独存在于世界。这种东西不会真正存在于客观世界中，就好像神仙、鬼不会存在于世界上一样。神和鬼，都是人脑子里抽象出来的画像。实际上神的画像也各有特点。抽象的人不是张三、李四，这种人在世界上找不到。寺庙里的菩萨有类似抽象的人，特别是佛教的菩萨都是抽象的，不管是释迦牟尼也好，或者是文殊也好，它们的样子没有什么分别，男不男，女不女，你说它是男的，那么大年纪没有胡子，像个小孩子。佛教里为什么这样塑像呢？它有一个意思，像是菩萨的化身，肉体是各式各样的，作为

菩萨有抽象的本质，成为佛的人是非常纯洁的，世俗的一切都没有了，所以不能分男女，它堕落到红尘就是具体的人。它是一切皆空，非常淡泊，非常清贞，非常温和，非常慈祥，丝毫没有火气，一点战斗性都没有，你打它一个耳光子，它也不发脾气。所以它把各种各样的概念都集合起来，就设想出这样的化身。这样的人是抽象的人，只能在寺庙里塑菩萨可以。真正找到这样的人是没有的，庙里的和尚是男的，尼姑是女的，年纪老的和尚也长胡子跟庙里的菩萨不一样。所以，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人，只有具体的人。真正的社会发展史，都是具体的社会发展史。中国社会的发展史，特别是奴隶时代的历史和封建时代的历史，主要是封建时代的历史，是王朝变化的历史。

他们还有一个理由，不打破王朝系统，就不能用以农民战争为重点来讲中国的历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讲农民战争，人民群众创造世界，如果按照王朝系统来讲，就把历史看做是英雄的历史，帝王将相的历史，就不能看做是人民群众的历史。这种理由也没有什么真正站得住脚的地方，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当然杰出的人物也起作用，杰出人物往往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的集中表现。马克思主义不能只讲基础，不讲上层建筑；不能只讲群众，不讲杰出人物。就是群众也有一定的人物为代表。历史人物如秦朝是以秦始皇为代表，明朝是以朱元璋为代表。群众运动要汇合成一支强大的力量，也需要有人来组织，来领导，组织者，领导者是群众的领袖。在过去时代里，即在无产阶级出现以前的时代里，虽然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力量，但群众始终不能成为社会的主人，不能成为统治者，不管奴隶、农民都是一样，他没有条件成为统治者，没有条件成为统治阶级。因此，尽管他们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但是每个时代的代

表人物，往往还是一些剥削阶级。群众是主体，但在一个时候比较有名的皇帝也能够代表当时历史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讲历史还是要讲周武王、秦始皇、汉高祖这些人。当时的历史是向封建社会发展的，这些人是建立封建社会的领袖人物，历史虽然不是他个人创造的，但他们身上是集中表现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许多重大措施，许多办法，也不是他们个人想出来的，因为他们周围有一批人替他献计策出主意，这些人是代表一个时期的历史方向。所以对王朝的变化，各个时代重大人物的作用也不能够忽视。我们最近写哲学教科书时，关于人民群众那一章里，我们把中国历史上某些比较重要的人物都提了一下，从周公、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赵匡胤、朱元璋，一直到清朝的康熙皇帝，这些人是封建统治的代表，是压迫人民的，当然我们不赞成，他们在这一方面是不对的。但在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在当时是起了进步作用的。所谓进步作用，不是说他了不得，而是在当时来说他们是进步的。一个封建皇帝比较有能力，他能够把国家统一起来。而这个国家统一起来以后，就可以使内部矛盾在几十年内，百八十年内缓和下来，至少使内战大大减少。这样一来，就可以使生产发展起来，使农民的生活得到恢复。这样，社会就前进了。这些人物的作用就表现在这里。他们所以能把那种四分五裂，天天内战，农民不能生产的情况停止了，也不是由于他个人的力量，首先是由于农民暴动的结果，然后这一派人组成一个王朝，把四分五裂的内战局面停止了，统一了国家，推动了生产。毛主席讲过，每次农民暴动都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也就能多少有所发展。但是，这一个过程还要经过当时一些人物的活动才能够实现。首先是农民起来暴动。农民暴动的作用，就是把最腐朽的统治者打垮了。具体来说，就是把最反动最坏的一些

封建统治者、地主阶级的人物，经过暴动杀掉一批。农民暴动所杀的那些人，主要是杀那些最坏的土豪、劣绅，地主阶级，不杀掉一批，它的生产关系没有办法改革。因为有那么一大批人在那里拿着武器反对改革，农民非拿起武器把这些人杀掉不可，然后地主阶级里才有比较聪明一点的人感觉到农民不好惹，过分地压迫农民不好，他们研究了过去的历史，把经验总结了一下，觉得要想避免农民暴动，最好还是把统治的方法改变一下，减少一点剥削使农民能够恢复生产，这样做，才能够使封建统治维持下去。根据这样的思想，这一批人就出来利用农民暴动，提出一些比较缓和的政策，使农民能够接受这些政策。农民接受了这些人的政策以后，他们就可以做皇帝了。新的朝代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所以，每个朝代的变化，并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变化。每个朝代的变化，都是跟农民的暴动分不开的。农民暴动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能持久的。农民打垮了一批封建统治以后，你要他再打垮一批新的统治者，他是不干的。所以这时有了稍微比较满意的统治者，他心里就满意了。新的朝代就能够稳定下来。朝代的变化，粗糙的轮廓就是这样的。

我们学习中国历史，大体上看来是这样一个规律。一个朝代将要垮台的时候，总是有农民暴动。农民暴动，就是新朝代树立的前奏曲。农民暴动总是不会胜利的，农民暴动起来以后，杀了一批旧的统治者，就出现了新的人物来反对农民暴动。这种人物，一方面反对农民暴动，一方面对农民让步，因此他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朝代。比如曹操，郭老要替他翻案，有许多人不赞成，好像翻得过火了一点，把曹操说成跟农民暴动差不多了。恐怕是说得过火了一点。曹操起来之前，有张角这些人在山东搞农民暴动，他们杀了很多汉朝的腐败地主阶级分子。曹操把黄巾军打下去以后

才有力量，这是因为他收编了二三十万黄巾军。以后他又采取屯田的政策，把土地分给农民种。为什么他能够把土地分给农民呢？因为黄巾军起来以后杀了很多地主，土地没有主了，曹操才能把土地分给农民。如果那些人还在，曹操的政策就没有办法施行。实际上他还剥削农民，因为分给农民的土地要收很重的租税，他把收来的粮食在当地存起来。这样一来，曹操军队的粮食是很充足的。没有黄巾军给他扫清道路，他没有办法起来。但曹操决不是农民暴动的领袖。因为他是靠农民起义军起家的。他一方面打垮了农民军，另一方面采取了对农民让步的政策。一打一拉，这是反动派使用的两种手法。但他是起了进步作用，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比以前多多少少是有好转的。旧的统治者存在的时候，生产力受到阻碍。旧的统治者取消了，新的统治者来了，生产力就发展了。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第一个力量是农民暴动，第二个力量是像曹操这样一批人，他们起来组织新的封建统治，就不得不比较缓和一下他们的统治，这样就使得生产力能够适当地有所发展。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新的朝代，大体上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具体情况有各种不同，但它的规律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新的朝代的统治，多半是利用了农民暴动的果实建立起来的。新皇帝有两种人，一种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他打垮了农民的暴动，自己起来成为统治者；另一种是从农民暴动中分化出来的，原来是农民暴动的领袖，后来跟其他一些农民领袖分裂了，逐渐转变到封建统治上去了，他是帮助地主阶级把其他农民军打垮了，自己就起来了，像朱元璋就是这样的人。唐朝的统治，一方面是打垮了黄巢，另一方面向外来民族借兵，戏剧中的珠簾寨，就是唐朝向北方的李克用（沙陀族）借兵（也像吴三桂请清兵镇压李自成一样）。黄巢之所以垮台，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它内部有一个大将朱温叛变

了，投到唐朝方面来了。那时唐朝的军队不像样，它打不过黄巢军，但朱温叛变了，成为消灭黄巢的主力之一。后来朱温成为唐朝的重要人物，带领重兵。

我这些话可能有错的地方，因为我不是搞历史专业的人，只是凭记忆，偶然看到这样一些东西有感想，所以跟大家讲一讲。我讲这个问题的目的，无非是说明如果打破了王朝，不注意王朝的变化，那就把中国的历史搞成抽象的东西，就不可能联系中国历史的特点，因为研究阶级斗争要研究两方面，既要研究人民群众，又要研究剥削阶级。对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两个方面都要研究。中国过去的历史是剥削阶级统治的历史，而对剥削阶级统治的情况不了解，那就不能够真正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反对片面了解历史的。要求我们全面了解历史，既要了解农民暴动是每个时代旧王朝垮台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但另外也要研究一下统治阶级的变化。在过去每个旧的朝代垮台之后，仍然总是新的剥削者起来代替旧的剥削者而成为统治者，而不是被剥削阶级代替剥削阶级而成为统治者。它们是这样一种关系。中国的历史，总是由于农民暴动打垮了旧的封建统治，或者是新的封建统治利用农民暴动建立新的统治。我们仔细地研究了这样一些过程以后，我们才能够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就是说，为什么马克思说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够使劳动人民得到真正的解放。在过去，每个朝代每个时期都有广大的劳动人民起来斗争，可是都不能使劳动人民自己得到解放。我们了解了一些具体的历史知识，然后才能够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为什么劳动人民要得到解放只能够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为什么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不管任何劳动人民起来进行多么激烈的斗争，也不能够达到实际意义的解放。

归根到底，学习历史的目的是帮助我们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是为了了解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各种社会发展规律，根据中国历史事件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

此外，我们还可以根据对历史的学习，了解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以及在中国的一些历史传统根源。毛泽东思想当然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它主要是从西方、从俄国学来的，但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很重要的特点，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加以发展，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吸收了中国好的传统。这种好的传统，只有学了中国历史才能够了解。毛主席的著作里所利用的许多思想材料是从中国历史上吸收来的，吸收了中国过去一些思想家的传统。

学习中国历史，还可以从这一方面得到一些启发，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跟中国人民在历史上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创造出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是分不开的。我们中国不但在斗争中有丰富的历史传统，而且有丰富的哲学遗产，有辩证法的传统，有唯物主义的传统。封建时期的唯物主义传统，中国是最多的。欧洲封建时期的唯物主义很少。中国是二三千年的封建社会，有很多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所以我们这个传统很丰富，将来大家学哲学时就可以知道。辩证法的传统也很丰富。毛主席对中国过去的文化很熟悉。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是善于思考的，有很高的理性知识，理论传统。毛主席就是因为他能够集中这样的优秀传统，善于思考，善于发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所以中国人是容易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毛主席是最主要的代表。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思想根源之一，是中国的丰富文化传统。这些东西，我们要从历史的学习中学到。

归根结底，还是草案中的几句话："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学习，

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重大事件，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为进一步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准备必要的中国历史的基础知识。”

学习方法问题，这里也写了，我们开学时也讲了，还是那些方法：自学为主，结合重点讲授。我没有什么好讲的。

在自学当中，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我们要坚持这个方针。也许在历史问题上大家争鸣比较容易，顾虑少一些。现在的报纸、杂志上就有这样的情况，在历史问题上，百家争鸣得热闹一点，对现实的问题，当前的问题的争鸣，就不大热闹，恐怕是没有打破顾虑。大家在学习中国历史的时候，要进一步打破这个顾虑。你们这一班，在学习时事方面，有比较针锋相对的争论。这个情况很好。就是要两方面真正无所顾虑。这里面恐怕有少数派和多数派的问题。少数派不要因为有多数派就有点放弃自己的意见。这种情况是有的，因为人多就形成一种压力，少数就有点害怕了，这是怎么来的，是不是领导上组织的压力？如果有这样的疑心，希望你能解除。我们领导上决不组织多数派去压少数派，不会组织一些人来施加压力。我们没有这样的事。我们是贯彻毛主席的思想，我们是真正讲民主，不像修正主义那样讲假民主，嘴上讲“民主”，实际上一点不讲民主，就是搞突然袭击，谁也不知道，弄得目瞪口呆，莫名其妙。争论问题，有多数有少数，它会起变化，有时少数派经过一个时期变成多数。列宁那个时候，最初是少数派，后来才变成多数派，所以变成了布尔什维克，所谓“布尔什维克”就是多数派。我们要解除顾虑，当然不是说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如果觉得可以作结论了就作结论。作了结论，可能少数派胜利了，也可能多数派胜利了。教员作了结论，少数派不服气，还可以保留意见，不是绝对不可保留的，特别是学术问题，你认为

可以保留的那也可以。在课堂上，教员可以站在少数派这一边作结论，可能少数派会变成多数派，这都没有关系，反正我们要坚持真理，如果自己的意见要放弃，也要找出理由来，原来觉得是真理，后来觉得是谬论，不要因为放弃自己的意见而苦恼。你要放弃自己的意见，一定要把理由说出来，把自己原来的理由驳倒。如果你跟我的理由不一样，我讲了一套，你就觉得这是教员讲的，就有点害怕了，就要放弃自己的意见。我不同意这种做法，不要随便一点理由不讲就退兵了，那也不行，你还可以坚持，再来辩论，要勇于提意见，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当然也应该，真正觉得是错了，那就要修正。当然，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在学习中，要放弃自己的意见，就非自我批评，非来一个检讨不可！不要那样。一般地要想一想，如果真正觉得应该放弃，然后再放弃，这与我们党内思想检讨不是一回事。党内思想问题，指出你的错误，你要承认错误，写检讨，或者口头检讨。学术讨论不一定要这样搞。不要自己觉得还有一点对的，可是又有所顾虑，就糊里糊涂地放弃了自己的意见，这样作对学习没有好处，对研究问题没有好处。

# 辩证唯物主义
# 历史唯物主义*（主编）

（1961.11）

## 第一章　绪　　论

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工人阶级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学说中，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的哲学基础，是革命的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人类哲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发展的最高成果。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首先对哲学的一般问题，以及人类的

---

* 艾思奇主编的这本哲学教科书，是中央宣传部和高教部统一组织，为高等院校文科的哲学教学的需要编写的。1961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第1版，1962年8月出第2版。1978年4月又出了第3版。自初版以来，全国许多学校的教师和读者同志们对它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第2版和第3版中都作了小部分的修改。第2版是艾思奇亲自主持修改的，所以，我们选用是这一版。这本书是集体编写的，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马清健、王哲民、方文、艾力农、卢国英、邢贲思、李公天、李秀林、肖前、耿立、高宝钧、韩树英（按姓氏笔画排列）等。胡绳、关锋参加了审稿工作，特别是胡绳自始至终参加了集体边读边议。艾思奇作为主编，不仅提出了编写的指导原则，拟订了编写纲目，而且反复修改了编写的初稿，有些章节几乎重写。1961年夏，又趁暑假北戴河休养之机，邀胡绳、关锋、韩树英、邢贲思、王哲民等同志一起终审。最后，他又从头至尾仔细审改定稿。

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一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历史，作一初步的研究。

## 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人们生活在世界上，每时每刻都要跟周围世界的各种事物打交道，也就是要认识这些事物并且力求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变这些事物。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对于这些事物就得到一定的了解，形成一定的看法。起初是对个别的具体事物有了一定的看法，然后眼界逐渐扩大，终于对世界的本质、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等形成一个总的看法。这样，人们就有了一定的世界观。这种认识发展过程，在任何人的头脑里都会这样或那样地发生的，所以世界观是人人都会有的，不过一般人不是自觉地、系统地掌握着某种世界观罢了。各派的哲学，就是各种世界观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学说。

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哲学观点就是人们对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对于整个世界的最根本的观点。因此它和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它所研究和所涉及的问题，不是仅仅关于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有关整个世界，有关世界的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普遍的问题。下面这些问题，就是哲学所要回答的：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世界从来就是物质的世界，或者在物质世界之前已经有某种精神力量存在着？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是不是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是处在运动、变化、发展中，它们是怎样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人们的主观意识、精神生活同客观世界、同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有什么关系？人的意识是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凭空产生出来的，或者它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人们的意识能否

正确认识世界，如何认识世界，采取怎样的立场和方法才能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等等。

人们的世界观是多种多样的，从古到今，哲学家们对世界作了种种不同的解释，彼此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归根到底，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上。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最重大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3 页）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到底世界的实质是物质，还是精神；到底是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到底物质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是第二性的，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而物质是第二性的？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的思想对于周围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我们的感觉、表象和概念能否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如何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研究和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对于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哲学史上的两条根本相反的路线：唯物主义的路线和唯心主义的路线。一切唯物主义的哲学派别，不管它们的具体形态有何不同，在回答这个哲学的根本问题时，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观点，即把物质看做第一性的东西，把精神看做第二性的东西，认为物质是不依赖于主观意识的客观实在，是世界的本质。一切唯心主义的哲学派别对于这个哲学根本问题的回答都和唯物主义完全相反。唯心主义有两种基本的形式：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客观唯心主义认为，在人的主观意识之外，独立存在着所谓"世界精神"，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不过是"世界精神"的产物。不同形式的唯心主义的根本

观点是共同的，即主张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

哲学史上的哲学派别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都不能越出上述两条路线之外。一切哲学派别，归根到底，不是属于唯物主义营垒，就是属于唯心主义营垒。哲学史上的二元论，企图把物质和精神看做两种各自独立、互相平行的世界本质。它摇摆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因此在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独立的第三种派别。

唯心主义的萌芽，在蒙昧无知的原始社会的人们中间就产生了。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极度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的许多灾害几乎没有抵抗能力，由于知识极端贫乏，对这些灾害的来源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因而把它的原因归结为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的作用，这就是原始的宗教世界观，其中就有着唯心主义哲学的萌芽。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体系，作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是在阶级社会中形成的，其社会根源就是阶级剥削制度本身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被剥削阶级承担着全部沉重的体力劳动的担子，社会、国家的管理事业，科学、文艺的创造活动，通常都为剥削阶级中的人们所垄断。统治阶级的思想代表，由于日益远离生产实践活动，总是夸大精神活动的作用，把它绝对化。他们颠倒地考察现实生活，似乎不是劳动者为他们提供生活资料，而是他们为劳动者提供生活资料；似乎不是物质生活决定精神生活，而是精神生活决定物质生活，把精神、意识看做宇宙万物的根源。因此，在阶级社会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是唯心主义哲学产生的必要条件。

唯心主义能够在阶级社会发展的社会根源，主要还在于这种哲学反映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可以为他们的统治辩护，因此，一般说来，剥削阶级在掌握着政治统治权的时候，总是要把唯心主义哲学提到惟一合法的地位上，给这种哲学的传播和发展以各种

有利的条件。历史上的某些剥削阶级或其中的某些集团，当他们还能代表一定的历史进步的倾向而和反动没落阶级作斗争时，也可能支持和提倡唯物主义哲学。

唯物主义哲学的观点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和人们对于周围事物认识发展的产物。在生产发展过程中，人们作用于自然界，改变着自然界，逐渐意识到周围事物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东西。这种自发形成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后来在阶级社会中，经过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加以提高和理论化，就发展成为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一般地说，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社会发展中处于革命和进步地位的阶级、集团相联系的。这样的阶级、集团，不满足现状，要求改变社会和发展生产，因而要求认识社会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这样的地位使他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或迟或早会得出唯物主义的结论，肯定客观存在的事物是第一性的，而主观意识则是第二性的。

因此，一般说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阵营的对立和斗争，在阶级社会里，是革命阶级和反动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哲学总是具有阶级性、党性的，哲学思想的根本方向决定于它所从属的阶级的根本利益。一切哲学派别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为它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哲学中的一定的派别倾向的贯彻，是它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政策的哲学表现。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有社会的根源，也有认识论的根源。唯物主义是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而唯心主义则是不正确的。唯心主义之所以能够影响人们的思想并且能够长期和唯物主义竞长争高，除了因为有剥削阶级的支持以外，还由于人们的认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充满着矛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就有产生唯心主义的可能性。如果把认识过程的某一片断（感觉、表象或概念等等）加以夸大、绝对化，使它脱离物质现实，就会导致唯心主义。剥削阶级的思想代表们，正是出于阶级统治的需要，把在人类认识过程中产生唯心主义的可能性变成现实，建立了这种或那种唯心主义的体系。列宁指出："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界的、神化了的绝对。"（《谈谈辩证法问题》，载《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11页）"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性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同上书，第412页）人们的实践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活动。把这种意识的能动作用片面地加以夸大，以至于误认为人的主观意识可以任意地创造出周围的事物来，这就是在实际上把主观、意识摆到第一性的地位上，因而也就滑进了唯心主义的泥坑。

全部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在哲学史上还存在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和斗争的问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同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是交织在一起的。

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事物发展的原因在于它内部的矛盾性。相反，形而上学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把一切事物看成彼此孤立的和永久不变的，如果说到变化，也只是限于数量的增减和位置的变更，而不承认事物的实质的变化；并且硬说一切变动的原因在于事物外部的力量的推动。在哲学史上，辩证法或形而上学不是与唯物主义相结合，就是与唯心主义相结合。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不能把唯物主义路线贯彻到底。因为客观世界不仅在本质上是物质的，而且是永恒地变化、发展着的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源泉在物质自身。因

此，只有对世界作辩证的了解，才能如实地反映世界的本来面貌，才能把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到底。形而上学的观点，歪曲了世界的本来面貌，不能说明物质自我运动的源泉，就给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留下了地盘。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曾经严重地打击了唯心主义和宗教，但是由于它不能对世界做出完全合乎科学的解释，因而不能够彻底战胜唯心主义和宗教。另一方面，只有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人们才能正确地把握客观事物的辩证运动，才能使辩证法得到合理的发展。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由于受到唯心主义体系的束缚，总是不彻底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才能包含最彻底的唯物主义和最彻底的辩证法。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存在了几千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主要表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这一斗争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在帝国主义时代，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这些唯心主义曾在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发生过影响，在世界观方面腐蚀工人阶级的队伍。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在哲学上接受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影响。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代表伯恩斯坦等人，就公开地接受了当时在德国流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新康德主义。20世纪初期，俄国的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受到反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影响的代表，就是经验批判主义者。列宁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其他哲学著作，来同这种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流派极其繁多，如实用主义、新实在主

义、逻辑实证主义、语义哲学、存在主义、新托玛斯主义等等。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曾经在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有过很大的影响。这些哲学体系之间虽然有某些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毫无例外地都是唯心主义，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主观唯心主义流派。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进行各种诡辩，把世界说成是人的感觉、表象的总和；否认世界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的客观存在，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性，宣扬不可知论等等。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主要地就是批判了这个流派。

唯物主义哲学从来都是在同唯心主义哲学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通过了对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通过了对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而发展的，并且以后还要不断地在这样的斗争中继续向前发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同时学习如何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作斗争，如何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向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作斗争，还必须参考哲学史上几千年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的情况和经验。

## 二、哲学史上的两军对战

全部哲学的历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萌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也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营垒斗争的历史。

从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具体形式；各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式。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唯物主义所采取的一定形式，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经济制度、阶级斗争和科学发展的状况所决定的。

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产生在奴隶制社会。手工业、农业、商业和航海业的实际需要，引起了天文学、气象学、数学、力学、地理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使人们有可能摆脱氏族宗教观点的束缚，把包含在这些科学知识中的唯物主义观点的萌芽加以系统化，创立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一般反映奴隶主中的某些进步派别的利益，它遭到依靠传统宗教维持其地位的保守集团的极端仇视。代表奴隶主贵族的哲学家宣扬唯心主义，维护宗教迷信，反对先进的自然科学观点。哲学一产生，立即展开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基本路线的斗争。

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万物不是神所创造的，而是某些具体的原初物质变化发展的结果，一切事物又可以还原为这些原初物质。例如，中国古代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者认为，这些原初物质是金、木、水、火、土（五行）；古印度的斫婆伽派认为，是地、水、火、风（四大）；古希腊的唯物主义者认为是水、火、气、土，或其中的某一种，等等。中国西周末年的史伯说："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说："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人或任何神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列宁指出："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95页）

希腊古代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式，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学说。他认为，万物都是由微小不可分的原子构成的，不同形状和不同重量的原子构成不同的事物。唯心主义者柏拉图反对德谟克利特的学说，他认为，"理念世界"是现实世界的本质，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影子。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路线和柏拉图

的唯心主义路线的斗争，是古希腊社会中先进的奴隶主民主派和反动的奴隶主贵族之间的斗争的反映。

古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过渡时期。（对于这个看法，中国历史学界还有不同的意见）春秋时代的孔子，虽然在个别问题上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但是他的思想在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他宣扬宿命论，维护传统的宗教仪式，他的“仁”的思想为维护“周礼”辩护，这是孔子思想的保守的方面。他的“仁”的思想又主张把礼下到庶人，并提倡举贤，他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整理的工作，把原来局限于贵族“官府”的狭小范围内的教育事业推广到更多的人们中间，这些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某些进步的要求。（关于孔子的学说，目前中国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孔子死后，他的儒家学说被引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战国时代的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唯心主义，他主张“天命”，宣扬“万物皆备于我”的思想；和孟子学派对立的荀子学派，则对孔子的学说加以改造，提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篇》），实际上包含着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有其客观规律的唯物主义思想。当时，和儒家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的还有墨家的唯物主义学说和后来被称为法家的韩非的唯物主义学说。

古代的朴素的唯物主义，一般的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第一，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肯定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但是它具有感性直观的性质，把统一的世界归结为某一种或某一些具体的物质形态。第二，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具有初步的辩证法思想，它肯定世界是一个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其中万物皆变、皆动、皆生、皆灭。它并且初步估计到了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事物内部所包含的对立势力（冷和热、阴和阳、正和反等）的相互作用和斗争。

古代的某些唯心主义者也具有辩证法的思想，如中国春秋时代的老子（关于老子的思想，也有人主张是属于唯物主义性质的）和古希腊的柏拉图。老子关于世界上没有任何不变的东西，任何事物都包含有相互依存的、相互对立的两方面（“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物极必反（“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物壮则老”）等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猜测到了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古代辩证法的思想也是朴素的、直观的。它只描述整个世界的一般性质，不了解构成世界的各个个别部分，它对世界一般性质的了解，也不是完备的、清楚的。

在古代奴隶制社会，各门具体科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人们还不能把客观世界的个别部分，从世界的总的联系中抽取出来加以分别研究，因此，哲学也不能建立在对各门具体科学进行概括总结的基础上，而不得不带有直观的、朴素的性质。

中国自秦汉确立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以后，直到清朝，封建社会继续了两千多年。这个时期的统治思想，主要是宗教化了的儒家唯心主义学说。但是在这个长时期内，代表着反对大地主阶级专横统治、要求生产力发展和工商业发展的社会势力的唯物主义哲学，从未停止过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例如，汉朝时的王充彻底否认了有人格的上帝的存在，用天和地都是物质的实体，自然界的发展是万物本身的自然状态的观点，反对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政权神授”的唯心主义思想，并尖锐地批判了关于宗教迷信、人的灵魂不死的谎言。南北朝的范缜在反对佛教的斗争中发展了唯物主义。他用“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弘明集》）的思想，论证了精神是物质的作用，有力地打击了佛教的灵魂不灭和因果报应的宗教迷信。唐朝的柳宗元、刘禹锡反

对韩愈认为“天”能赏善罚恶的唯心主义观点，用唯物主义来解释“天”的含义，肯定客观事物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和必然趋势。（参阅《柳河东集》16卷《天说》，《梦得文集》12卷《天论》）宋朝以后，程（程颢、程颐）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和陆（象山）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逐渐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这就是宋明理学。这个时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中心，是“理”和“气”、“心”和“物”的关系问题。宋代的王安石、陈亮、叶适，明代的王廷相，明末清初的王船山、颜元，清朝的戴震，都是反对唯心主义“理学”的唯物主义者。历代的唯物主义者，在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向前推进了唯物主义哲学。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也存在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一方面，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长期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另一方面，运动发展、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思想，也在发展着。例如王船山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把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的代表，他从内部矛盾的观点出发，论证了物质世界运动的绝对性。有些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有一定程度的辩证法思想。

在欧洲中世纪，是天主教占绝对统治的封建主义时代，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但在直接为宗教和教会服务的经院哲学内部，仍然展开了唯名论反对唯实论的斗争。唯名论认为，个别事物先于一般概念而存在，这就是承认事物是第一性的，概念是第二性的，所以马克思说：“唯名论是英国唯物主义者理论的主要成分之一，而且一般说来它是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唯实论则相反，认为一般概念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并产生具体事物。唯名论和唯实论的斗争，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在

欧洲中世纪的一种表现形式。

15 世纪欧洲的意大利，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了资本主义关系。新兴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要求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在政治上反对封建的神权统治。反映到哲学思想上，形成了同封建的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直接对抗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工商业和科学文化的中心，从意大利移到了英国、尼德兰和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在英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培根、霍布斯和洛克。培根的主要功绩是第一次把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给以唯物主义的概括，肯定人类知识的真正来源是感觉经验，肯定物质的客观存在并且初步估计到运动是物质固有的属性。但是，培根和洛克把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带入了哲学领域，形成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

欧洲近代的自然科学是从 15 世纪后半期开始的。为着认识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的规律性，自然科学家首先是对自然界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对这些材料加以整理分析，对于有机体的研究，则采取解剖的方法，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来分别地加以研究。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是处于搜集材料的阶段；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 18 世纪。这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必经的阶段，它为以后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大发展准备了基础。“可是这种研究方法同时也传给我们一种习惯，去孤立地观察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把它们置于一般的大联系之外——因此不是从运动中去观察，而是从静止状态中去观察；不是看做本质地变化着的事物，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事物；不是作为活的事物，而是作为死的事物。这种思想方法，由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上，它造成了上世纪来（18 世纪——译者）特有的局限性——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

第 19 页）同时，在这个阶段，自然科学的各部门，除了力学、数学之外，都还是很不完善的，唯物主义哲学要依靠自然科学的成就来解释世界，也就不能不受到自然科学发展不足的限制。这就是 17、18 世纪以前的唯物主义之所以不能不带有形而上学和机械论性质的一个重要原因。

18 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在取得了政权以后，放弃了唯物主义哲学，宣扬唯心主义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者贝克莱大主教把一切事物都看做只是存在于人的感觉领域之内的幻影，宣称“存在就是被感知”。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法国。唯物主义成为当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是拉美特里、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人，他们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公开地提出了无神论的主张，反对灵魂不灭的迷信，向宗教世界观和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最坚决的思想斗争，他们发展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

欧洲 17、18 世纪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有以下一些局限性。它是机械的，它把一切运动都归结为机械运动，企图用纯粹力学的原因来解释一切现象。它是形而上学的，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历史上不断发展中的物质世界。它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人的意识、意见看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这些局限性，表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同时，也是由当时科学发展的状况所决定的。

17、18 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是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准备，在历史上起了进步的革命的作用。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在德国也酝酿着资产阶级革命。当时德国经济比较落后，资本主义经济还不发达，软弱的德国资产阶

级没有足够的勇气，像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对封建统治者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法国大革命所掀起的广大劳动群众的斗争风暴，也吓坏了德国资产阶级，他们害怕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会在革命中壮大起来，掉转枪头向资产阶级开火。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准备，在哲学上主要地不是表现为唯物主义，而是表现为具有不同程度的辩证法的唯心主义。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和当时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

康德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这时，经验的自然科学已经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形而上学不能依据这些资料的内在的联系加以整理。科学本身的发展，要求形成辩证的思维方法，从事物的整体联系和发展上进行研究。恩格斯指出：康德的天体演化的学说第一次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缺口。但是，辩证法只是在黑格尔那里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大代表。黑格尔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以前，就存在着所谓“绝对观念”，并且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由“绝对观念”派生出来的。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特点在于：从运动中，从辩证的发展中，考察“绝对观念”。黑格尔以一切都在运动发展的观点，反对形而上学。恩格斯说：“黑格尔的最大功绩是在于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都看做是一种过程——即永恒的运动、变化、转换和发展的过程，并且企图去揭示这些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2 页）黑格尔是在概念的辩证法中，猜到了事物的辩证法。他的辩证法是同他的唯心主义体系相矛盾的。黑格尔认为，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就是“绝对观念”的自我意识达到完成阶段的表现，这种观点违反了他自己

的辩证发展的观点。他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是在唯心主义体系内被窒息了的。

19 世纪 40 年代，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势日益成熟，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反映在哲学上，就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唯物主义的兴起。费尔巴哈是 19 世纪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中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他坚决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恢复了唯物主义应有的权威。在自然观方面，他坚决维护了物质是第一性的原理，彻底否认了在物质以外独立存在的精神。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不彻底的。他在社会观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它不能反映这时已经成为独立的力量而走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适应着这个要求而出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19 世纪中叶，在俄国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产生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人，吸收和发展了西欧先进哲学思想（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等），他们不仅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而且对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但由于当时俄国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的哲学思想终究没有、也不可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直到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才到来。由戊戌政变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到辛亥革命之间，出现了许多在当时代表资产阶级进步要求的先进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等等。他们极力利用他们所能学到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历史观点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来说明世界。他们的世界观中，包含着不同程度的唯物主义倾向，他们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顽固保守派思想，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斗争。但

是，由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特别软弱，而且它一出现就进入了迫切的政治斗争，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所以在中国没有能够出现比较成熟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思想。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杰出的代表，在他的思想中也混杂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因素。

在历史上，唯物主义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地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但是，只有到了出现了近代大工业和无产阶级的时候，才可能产生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产生在 19 世纪中叶。由于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技术都达到了过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作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产生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上的。

在欧洲，19 世纪初期，由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使机器大工业在各国发展起来，而无产阶级也就随之成长起来。从 19 世纪 30 年代起，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在政治上表现了独立的行动，如法国的里昂工人起义、英国的宪章运动、德国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等等。在这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愈益尖锐的历史时代，革命中心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在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德国的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发挥其创造历史的巨大作用。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德国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无产阶级的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创始人。

从19世纪初期开始，由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自然科学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时不只力学和数学，其他许多重要部门，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上以搜集材料为主的阶段已经结束，人们已经发现了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的许多重要规律，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个伟大的科学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些发现，使人们对自然界一切现象之间的辩证联系和对自然界的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了大踏步的前进，使宗教迷信、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而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产生提供了牢固的科学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了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总结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成果，特别是19世纪上半期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需要和科学发展的推动，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必然产生的两个根本条件。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作为人类思想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是综合以前人类的一切优秀思想成就并加以发展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和发展了哲学史上唯物主义的传统和辩证法的传统。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继承了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他们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批判地采取了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抛弃了费尔巴哈哲学中唯心主义的和宗教的伦理的杂质，批判地采取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革命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过去一切哲学中的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它和过去的哲学比较起来，在性质上也有根本的不同，它使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完全新的更高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前哲学的不同，首先在于它使哲学获得了真正科学的性质，使它成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前的哲学，是产生在科学发展比较低级的阶段。自然科学还不能阐明自然界现象各方面的相互联系，至于社会科学，最多也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因此，那时科学的全部成就，还远不能给世界发展的全貌提供出一幅完整的图画。以认识世界的总体作为自己的任务的哲学，即使是唯物主义哲学，在那时虽然也力图利用每一个时代科学的最大成就，但终究不能完全依靠科学的成果来完成它的任务。为着描绘世界的全体，那时哲学家就必须在许多方面，凭借自己的逻辑方法来进行推演，以补科学所提供的材料之不足。这些哲学家往往企图站在科学之上，独立地创造一套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他们中间有的人就把这种哲学叫做“科学的科学”，他们认为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应该、而且已经穷尽了世界的一切知识，他们往往把自己的体系看做是人类认识发展的顶峰。实际上，这样的体系，虽然也对当时的科学成就有所概括，但都包含着大量的主观臆测的成份，其中虽然也有许多有价值的天才的臆测，对于人类思想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有过重大的贡献，但同样也包含着许多不明确、不合理的、甚至于荒谬可笑的东西。总的来说，这样的哲学体系，终究经不起科学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的考验，它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科学的性质。这是马克思主义以前一切哲学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的共同弱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完全新的阶段。自然科学的成就，已经开始能够用确实可靠的知识来为人们描画出关于自然界发展的全貌。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发展引起的整个

社会的迅速变化，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展，以及社会历史研究领域里材料的积累，在社会生活领域里也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已有可能发现真实的联系，排除臆造的、人为的联系。由于这些原因，以前那种大部分要依靠主观的逻辑推演来构成包罗万象的体系的哲学，那种所谓“科学的科学”，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这时哲学的任务，只需要对已获得的全部科学知识及历史材料加以概括和总结，这样就能够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运动发展的基本过程和基本规律获得一个全面的了解，就能够建立一个不同于过去任何哲学体系的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它是完全从科学的研究成果中概括出来的，因此它反过来又成为指导科学研究和实践的普遍原理，成为科学的方法论。以前的哲学只是代表不同阶级的哲学家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对世界给予各种各样说明的思想体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前哲学的不同，还在于它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用来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造旧世界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绝大部分是属于剥削阶级的世界观，个别的哲学学说表现着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但它们都不能指导人民来为根本改变旧世界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使人民得到真正的彻底的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变革世界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8 页）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都不承认自己的哲学思想的阶级性，把它说成是代表全人类的。在实际上他们的哲学思想绝大多数都只是反映着少数剥削者的利益，并从属于这个阶级的政治任务，真正人民群众的思想要求和这些哲学是不相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公然地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和党性，公开宣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广大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为反对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罪恶制度服务。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在阶级剥削制度还存在的情形下，硬把某一种哲学思想说成是全人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隐蔽自己的哲学的阶级性，不但违背了客观事实，而且会模糊无产阶级哲学的实践任务，因此是非常有害的。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7页）马克思主义者要求把自己的哲学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密切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者决不空谈什么全人类的哲学，但无产阶级的哲学的确是从来未有过的真正广大人民群众的哲学。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哲学历史上所实现的一个革命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既有高度的革命性，又有严格的科学性。列宁指出："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顶峰）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什么是〈人民之友〉》，载《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5页）

上述这些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高形式，成为最彻底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法密切地结合起来，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它把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到一切知识领域，特别是社会历史研究的领域。在社会历史领域里，以前的唯物主义都不曾真正解决如何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问题，只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后，才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指导人们对一切事物进行科学研究的思想工具，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指南。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完成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但它并没有结束哲学的发展，相反地，它是在更高的基础上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像以前的哲学那样把自己看成包罗万象的绝对完成的知识体系，它是科学的哲学，它的思想体系的建立，是严格地依据着各种科学成就，依据着人类的历史斗争经验和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斗争经验的。因此，随着科学的发展，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要不断地丰富起来，不断地向前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而且在他们战斗的一生中，使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内和工人运动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本身是在斗争中发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进行的斗争中，在同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思想进行的斗争中，不断地概括了当时的科学成就和工人运动的经验，从各方面阐发了他们的理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工人阶级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逐渐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了统治的地位。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

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以及它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孟什维克等）的斗争中，恢复了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阉割了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并且根据新的历史经验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推向了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列宁在哲学上和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最腐朽的哲学潮流——以马赫主义为主的主观唯心主义潮流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并且深刻地批判了工人运动内部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列宁写了许多哲学著作（如《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天才的论述和创造性的发展。列宁的所有著作都深刻地发挥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列宁的全部思想是同国际的和俄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俄国工人阶级在列宁所创立的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给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照亮了争取解放的道路。

列宁逝世以后，列宁主义的思想继续在世界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向前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在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共同事业。1960 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指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学说的发展，都在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人民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事情。毛泽东同志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

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6页）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中，遵循着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同志从这个原则出发，进行了反对各种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制定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哲学著作，概括了新的历史经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了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六亿人民的大国已经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步的胜利，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大事。

通过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手中战无不胜的理论武器。全世界工人阶级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为团结一切进步力量，最后彻底埋葬资

本帝国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斗争。新的历史实践必将越来越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哲学的正确性，并将使它得到更大的发展。

## 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和方法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是为了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以及一切错误思想进行斗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树立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并以它为指导来观察和处理一切问题，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

马克思主义哲学给我们的一切实际工作指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为一切科学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政策的理论基础。我们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具体地分析了客观事物的历史和现状，总结了实际斗争的经验，找出了工作和斗争中的客观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制定出党的路线和政策。我们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党的路线和政策的精神，自觉地按照实际情况，正确地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自觉地科学地从工作中总结经验。

为了做好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掌握科学的方法论。各门科学是分别地研究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规律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给科学研究提供正确的方向和方法。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就能抵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而不致在总的方向和大的关键问题上犯错误。对社会的研究，只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才成为完全的科学；特别是在当前充满了复杂的阶级斗争的今天，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就不可能在社会研究中得出科学的结论。自

然科学家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必然自发地倾向唯物主义，不然他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客观规律，就不可能取得任何科学上的成就。但是，自发的唯物主义是不巩固的，列宁说："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作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作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信徒，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载《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4页）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也是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过程。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在一切实际工作中和科学研究中彻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需要经过艰苦的学习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不能自发地树立起来。就是无产阶级出身的人，也不会是天生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也必须经过学习，才能防止和克服来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各种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才能避免在重大问题上犯片面性和主观性的错误，才能使在劳动实践中产生的自发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巩固起来，并提高到科学的程度，树立起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至于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更要经过努力来根本改造自己旧的世界观和克服旧的世界观的影响。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在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还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侵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侵蚀我们的思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反复的。国际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种世界观

的斗争，也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垂死挣扎的帝国主义用它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来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相对抗。美国前国务卿赫脱说："共产党宣传他们的原则，我们必须以我们的原则与共产主义相抗衡。与马克思主义相反，我们主张世界的人道主义，我们反对唯物主义作为人类的主要精神力量，人类生活的真正的动力是神，是内部的精神力量。"帝国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代理人，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政治上迎合反动资产阶级的意志和要求，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在哲学上取消党性原则，抹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以主观唯心主义和诡辩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我们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斗争，是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也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我们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有力地抵制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彻底揭露和批判反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为了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达到正确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也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人，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同改造非无产阶级立场和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结合起来，必须坚决树立起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决心。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惟一正确的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我们要在革命实践中，紧密地联系现实生活，联系群众的斗争，才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点，又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

毛泽东同志用"有的放矢"这个比喻来指明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的实质。毛泽东同志说："'矢'就是箭，'的'就是靶，

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整顿党的作风》，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21页）这就是说，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射中国革命之“的”。也就是说，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作指导，具体地分析我们周围实际存在的客观事物，找出它们的特殊本质和固有的规律性，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实际的范围很广泛，有中国历史的实际，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革命斗争的实际，有劳动生产的实际和科学研究的实际，以及个人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等等。要解决这些方面的实际问题，都必须从具体材料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去加以分析研究。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就要注意学习如何运用，就要努力运用学到的理论来研究和说明一些实际问题，来总结工作、检查思想。只有这样逐步地做去，才能锻炼自己领会和应用哲学武器的能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变成自己的东西。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应当同学习各门具体科学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学习和研究各门具体科学，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但它并不能代替各门具体科学。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解决实际问题时，必须具备有关的具体科学知识。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有广泛的历史知识和科学知识。列宁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青年团的任务》，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4页）如果认为只要学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结论，而无须再去吸取广博的科学知识，那无疑是错误的。

为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必须反对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

认真读书对掌握理论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只停留在书本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生活和斗争，就会把活生生的理论变成死板的教条。采取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学习理论，即使把许多词句和条文背得烂熟，也还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坚决反对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只有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努力学习怎样把马克思主义观点用到实际中去，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轻视理论，满足于某些个人的和局部的经验，是违反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另一种倾向。采取这种经验主义的态度，是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工作经验是可贵的，但绝不能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做解剖刀来分析和总结各种具体经验，才能把零碎的、片段的经验提高为系统的理论。

只要我们认真地努力学习，正确地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在革命斗争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 上篇 辩证唯物主义

## 第二章 世界的物质性

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物质世界永远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动着、发展着。这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出发点。辩证唯物主义反对一切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世界硬说成是意识、精神的产物。辩证唯物主义也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后者虽然承认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但不能认识世界是永恒地运动着、发展着的过程。要把握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首先要研究世界的物质性，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的联系，以及物质运动规律的客观性。

### 一、世界是物质的世界

唯物主义肯定世界的物质性。世界上的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事物和现象，都是物质的种种表现形态。物质是不依赖于意识、精神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

列宁说："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外部世界，承认物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并且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6页）

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成果，都证明了唯物主义观点的正确性。

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都体验到外间世界的客观存在。农民种地，要和外界的土地、种子相接触；矿工开矿，要和矿山、岩石作斗争；人们为着维持生活，必须取得食物、饮料、衣服、房屋等生活资料；人们对反动派进行革命斗争，要受到反动势力的抵抗。这一切生活的实践，都使人们要和周围的事物相联系，相斗争，因而也使人们认识到在自己的主观意识之外，有着一个客观世界，这个客观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凡是没有受过系统的唯心主义影响的人，都有可能从生活实践中得到这样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唯物主义哲学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和提高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这种朴素的认识。

哲学唯物主义是和科学的发展分不开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每一新的成就，都给唯物主义的正确性提供了新的证明，都使反对宗教迷信和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赢得新的阵地。

自然科学证明，整个宇宙具有无限多样性的物质，能够依一定的规律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任何一种物质形态都是从另一种物质形态转化来的，物质是永恒存在的，物质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

自然科学告诉我们，在有意识的人产生以前，地球早已存在了几十亿年，地球有着自己生成和发展的历史。太阳系和整个宇宙天体，绝非像有神论所断言的那样，是什么和“地上世界”完全不同的“神的世界”。从哥白尼创立太阳中心说，伽利略制成第一台望远镜并用它观察天体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无情地摧毁了神创造世界的迷信思想，逐步地证明诸天体和地球同样都是不依赖于任何意识、精神而存在着的物质的东西。每个天体都有自己的生成和发展的历史，它们的存在和发展都只能用物质本身的原因去说明，用不着任何神学的虚构。

生命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它具有一些和无生物显然不同的特点。有的唯心主义者认为，只能用一种非物质的“生命力”来解释生命的存在和运动过程。其实这只是用理论的形式精巧地伪装起来的宗教迷信观点。自然科学证明，生命是自然界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物质形态，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是蛋白体在一定自然条件下不断进行新陈代谢、自我更新的过程。新陈代谢的规律是一切生物——无细胞结构的生物、单细胞生物和多细胞的有机体，植物和动物——存在和发展的共同规律。了解了新陈代谢规律，就基本上了解了生命现象，根本用不着把那种莫须有的“生命力”作为说明的依据。

达尔文根据极其丰富的材料证明，现在的一切动植物的物种，都是由单细胞经过长期发展的结果；动植物所以获得现有的特性和机能，能够基本适应周围的环境而得以维持其生存，是由于遗传和变异的交互作用，由于适者生存、自然选择的结果。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上帝的创造和智慧，只是物质自身的发展和变化。达尔文还指出：人也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

社会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个方面，也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使类人猿变成了人，这样，就出现了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归根到底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发展史。在生产过程中，人和人之间形成了生产关系，这是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是一种不由人们自由选择、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不能脱离社会物质生活而独立存在，它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这就说明：认为社会生活是由神支配的、或者是由人的精神任意创造的唯心主义观点，是极端错误的。

上面这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就，都证明了唯物主义世

界观的正确性，证明了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世界上千千万万、形形色色的现象，都是物质的各种不同形态的表现。永恒存在的物质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无数物质形态的统一体，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之外，除了千差万别的无数物质形态之外，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存在。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

唯心主义否认世界是物质的统一体，把世界的一切看做是精神或意识的产物。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世界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认为一切事物都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中。陆象山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象山全集》22卷《杂说》）王阳明说："心外无物"，"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贝克莱说："物质是观念的集合"，"存在即是被感知"。马赫说："物是感觉的复合。"杜威说："世界是我的观念，我的活动，我的经验。"事实上，自然界并不是在有了"我"的心、"我"的观念和感觉出现以后才有的，而是在"我"的心、"我"的观念和感觉还没有存在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客观唯心主义者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某种精神，这种精神在自然界出现以前就存在着，自然界是这个精神的表现，是它活动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在事先"，在宇宙形成之先有一个绝对的独立存在的"理"，这个"理"产生了物质的"气"，而后演化出形形色色的事物和现象。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绝对精神"，自然和社会不过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表现。这是用哲学语言精制了的宗教创世说。恩格斯说："……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页）不论自然科学的成就和我们的实践经验都证明，精神现象

决不能离开物质而存在，离开物质世界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力量是根本没有的。

唯物主义肯定世界统一于物质，它指出，精神现象只是某些复杂的高级的物质形态的属性，没有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力量，这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的世界观。唯心主义则相反，它认为世界统一于精神、意识，物质是精神活动的表现，这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的世界观。这两种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不可调和的。

哲学史上的二元论者如笛卡尔、康德等，想使根本对立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调和起来。二元论认为，世界不是统一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不是来自一个根源，而是来自互相并行、各自独立存在的两个根源，一个是物质根源，一个是精神根源。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第一，它肯定在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独立的精神力量存在；前面已经证明过，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第二，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是互相联系的，二元论不能不对这种联系加以说明，在说明这种联系时，二元论总是把物质说成是消极被动的，而把精神力量说成是惟一具有能动性的，并且往往把这种独立存在的精神力量和神的力量看做一个东西。因此，二元论归根到底必然倒向唯心主义。

世界统一于物质，但不是说统一于某几种特殊的物质属性、物质形态或物质结构。在统一的物质世界中包含着无限多样的物质形态，一切物质形态都依一定的条件互相转化，每种物质形态都有其特殊的属性和结构，而与别的物质形态相区别。所以，世界的统一是无限多样的统一。西欧17、18世纪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为，一切物体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物质的最简单的、不可分的基本单位，原子的某些物理学的属性——如延伸性、不可入性、具有一定的质量等，是物质惟一不变的根本属性。这种观

点不能说明无限丰富的物质现象，不能把唯物主义世界观贯彻到底。

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不同，辩证唯物主义反对所谓“物的不变的实质”、“绝对简单的实体”等形而上学的说法。客观世界是变化发展的，物质特殊的结构、属性和形态也是可变的、无限多样的。任何物质的特殊结构、属性和形态都不能成为物质的惟一不变的特性。“物质的惟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5页）列宁给物质概念下了一个完备的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同上书，第128页）这是惟一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它既反对了唯心主义、不可知论，也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物质观，整个世界是不依赖于我们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着的客观实在。不管它的特殊形态、属性和结构千变万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形之下，它都保存着这个惟一的“特性”。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关于物质具有某些“绝对的”、一成不变的物理属性的说法，是经受不住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考验的，它也抵抗不住唯心主义的进攻，不能彻底战胜唯心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物理学上发现了某些元素的放射性现象，并发现了原子中有电子等更小的微粒，推翻了原子不变性、不可分性的观念。这些伟大的发现引起了物理学的革命，一些受形而上学思想支配的物理学家却由此作出了“原子非物质化了”的错误结论。唯心主

义乘机向唯物主义发动了进攻。例如马赫主义者打着“自然科学的最新哲学”的招牌，歪曲物理学新发现的真正意义，利用自然科学理论发展中的困难，大叫“物质消失了”，“唯物主义已经被驳倒了”。然而，现代物理学的新成就不但不能成为马赫主义的依据，而且是对马赫主义的最好驳斥。物理学的新发现并不能说明物质本身会消失，只是说明以前人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界限正在消灭。列宁早就指出，绝不能把物质的特殊结构、属性和形态同物质本身混为一谈，把物质的原子的特性同物质的客观实在性混为一谈，把人们以前对于物质的认识界限的消灭，误认为物质本身的消失。“承认某些不变的要素、‘物的不变的实质’等等，并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5页）现代物理学的新发现所驳倒的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它所证实的不是唯心主义，而是辩证唯物主义。尽管电子和原子性质不同，但电子和原子一样，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不可穷尽的。在电子发现之后不久，列宁就提出了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科学预见。现代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证实了，电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只具有一定质量和电荷的质点，它的质量会随着运动状况而改变，从现代物理学理论看来，它的电荷还应有一定的分布，除质量和电荷外，它还具有磁矩和自旋。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了电子是有特殊结构的。不仅如此，电子除具有颗粒性以外，还具有波动性，这一重要发现更使我们认识到电子是一个多么复杂的物质客体。电子只是基本粒子中的一种，目前知道的基本粒子已达数十种，它们除了具有一些共同的性质如都同时具有波动性和颗粒性之外，还各具有其他特性，表现为不同的“同位旋”、“奇异性”等等。在各种基本粒子之间还发现存在着多种

多样的相互作用和转化过程。总之，物理学越发展，就越显得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已经把基本粒子（包括电子）的一切特性都认识完尽了，这样，就完全证实了列宁的关于电子不可穷尽的论断。

修正主义者波格丹诺夫曾大肆宣扬马赫主义的“物质消失了”的观点，列宁给予了彻底的驳斥。现代修正主义者如法国的列斐伏尔又来公开地修正列宁的物质定义，说什么“物质是一种‘X’（未知数）”，并且认为它在我们的论断中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实践和科学证明，必须以客观的物质世界的考察为依据，才能对问题做出正确的论断，只有对客观世界有了正确的认识（论断），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某些现代修正主义者把物质说成是不可捉摸的未知数，说成是在我们论断中可有可无的东西，其目的就是要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否认人们的认识必须以客观的物质世界为依据，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宣扬主观盲目性、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以阻挠、破坏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

## 二、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世界是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世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是物质的不可分离的根本属性，物质的任何一种形态都处于运动中，运动是物质存在最根本的形式。

科学的全部成就都证明，物质世界的一切，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中。整个宇宙从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生物界到人类社会，无一不在运动着，无时不在变化发展着。就每一个物体来说，它内部的原子在不停地运动，原子核外的电子不停地围绕原子核旋转，原子核内部的中子和质子也是不断地运动和转化的。没有这些运动，就没有原子和原子核。地球

和太阳系其他行星围绕着自己的轴心自转，同时围绕着太阳运行，太阳本身和其他恒星也在宇宙太空中不停地运转。没有这些运动，就没有太阳系和宇宙中千千万万的星系。每一个生物有机体，无论动植物机体或者人的身体，都在不断地新陈代谢。没有不断的新陈代谢这种运动，就没有任何的生物有机体。社会生活也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没有一个社会形态是永远不变的。没有社会生活、社会形态的不断运动、变化，就没有人类的历史。

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物质不能脱离运动而存在；同样，运动也不能离开物质而存在。不能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也不能设想没有运动的物质。

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必然要陷入唯心主义。说到运动，就必须要问，是什么在运动。运动必须有运动的主体，没有任何主体的运动，是不可能存在的。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就是认为运动的主体是非物质的，就必然要把某种精神力量看做运动的主体，这样就走到了唯心主义。朱熹认为，“总天地万物之理”的“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静，静极复动”（参阅《语类》，《周子全书朱子注》）从而产生出自然界来。他断言，在没有自然界之前的运动，就是“太极”的运动。王阳明的弟子钱绪山认为，主观意识是宇宙的本体，运动只是意识的运动。他说：“充塞天地间只有此知，天只此知之虚明，地只此知之凝聚，鬼神只此知之妙用，四时日月只此知之流行，人与万物只此知之合散，而人只此知之精粹也。”（《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黑格尔把世界的发展看做“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马赫主义者毕尔生说：“万物都在运动，但只是在概念中运动。”这些就是唯心主义运动观的典型例子。在前一节中我们已经指出，唯心主义者所设想的那种离开物质而存在的精神力量，在世界上是根本没有的，因此，同物质运动完全

脱离的“绝对精神”的运动，也是不能设想的。精神的运动，概念的运动，是依赖于物质运动的，它是人脑这种高级物质的运动形式，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反映。

利用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宣传没有物质的运动的荒谬观点，是唯心主义反对唯物主义的一种方式。19世纪德国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所创立、现代的物理学唯心主义者所复活起来的“唯能论”，就起了这样的作用。“唯能论”者硬说物质转化成了某种非物质的“纯粹能量”，因而，能“代替了”物质，物质“消失了”，认为能是惟一的“世界实体”。现代“唯能论”者更利用电子和正电子可以转化为光子的发现，大肆宣传“物质变成能，物质消失了。”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光子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是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这是不能抹煞的客观事实。光子具有能量，也具有质量，正如电子具有质量，也具有能量一样，这正是表现了物质和运动的不可分。“唯能论”者抹煞这个真理，设想有什么离开物质客体而单独存在的“纯粹的能”，这就是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唯能论”者宣称能是所谓“纯粹符号”，是由意识、精神决定的，这就暴露了他们的唯心主义面目。列宁说：“想像没有物质的运动的这种意图偷运着和物质分离的思想，而这就是哲学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83页）

设想没有运动的物质，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特征。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虽然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但不理解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把物质归结为它的某些特殊的属性、结构或形态，认为这些属性、结构或形态是永远不变的；他们不理解物质自己的运动，把运动看做只是由外力所引起的物体的位置移动和数量增减。这就在实质上否认了物质是不断运动、变化

和发展的过程，否认了运动是物质内在的根本属性，也就是离开运动去思考物质。不承认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就会在物质以外寻找运动的源泉，就有陷入唯心主义的危险。例如在力学方面有重大贡献的物理学家牛顿在寻求物质运动的最后源泉时，便得出了上帝是“第一推动力”的结论。

辩证唯物主义肯定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但不否认物质世界中有着某种静止状态。静止状态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只是物质运动的特殊形式。承认静止状态，并不否认物质运动的绝对性。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静止的东西。事物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和一定时期，具有质的稳定性，在这个阶段和这个时期，它的性质基本不变。例如某个生物机体在它没有死亡以前，总是这个生物，资本主义制度在它没有经过革命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以前，总是资本主义制度。这种静止是相对的、暂时的。因为，生物体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中，资本主义制度处于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不断运动中；而且生物机体总是要死亡的，资本主义制度总是要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这里的静止只是运动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是事物的运动发展还没有使它变为另一事物以前的一种运动形态。某一物体在地面上位置没有移动，在力学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处于静止状态中，可是这并不妨碍这一物体参加地球的运动以及全部太阳系的运动，也完全没有妨碍组成这一物体的分子、原子的运动、变化。这里的静止状态也只是表现运动中的某一物体和某种其它物体在空间关系没有发生变化而已。

上述这些情形都证明，事物的静止不变的状态只是相对的，只是物质运动的特殊形式。我国明末清初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船山就已猜测到了这个道理。他说：“静者静动，非不动也。”他否认

“废然之静”（《思问录》内篇），即绝对的静止。绝对静止不变的事物，只是形而上学者的错误的幻想，在客观世界里是根本不存在的。

辩证唯物主义承认永恒的、绝对的物质运动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相对的静止状态。“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主要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主要条件。”（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6页）物质所以表现为千千万万的不同形态，正是由于它们有相对静止和暂时平衡的状态。只有承认事物的相对静止和暂时平衡的状态，才能区别事物，才能认识和把握千千万万的事物的具体形态，才能分别对不同事物进行具体的科学的分析研究。否则就会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瞬息万变、无从捉摸，就会导致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错误。

相对主义和诡辩论否认事物的相对静止，即否认事物的质的相对稳定性。例如中国的庄子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庄子·齐物论》）他把生和死，可和不可之间的转化看成是无条件的，从而抹煞了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和它们之间的质的差别，得出了“是亦彼也，彼亦此也”的结论。又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底鲁认为万物只是一阵旋风，因此他拒绝给事物以名称，按照他的意见，“什么也不能说”。赫拉克利特根据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曾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克拉底鲁却修改他老师的意见，认为人甚至一次也不能踏进一条河流。克拉底鲁也是由于否认事物的相对静止而陷入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泥坑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同辩证法之间毫无共同点。列宁说：“只有诡辩家才会根据一种战争可以转化为他种战争的理由，来抹煞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通向

诡辩法的桥梁。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作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载《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2—303页）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则把静止和平衡加以夸大，把相对的东西绝对化，把特殊的东西一般化，把暂时的状态永恒化，陷入了设想没有运动的物质的错误思想。

物质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同物质不可分的运动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把物质的运动归结为只是物体的位置移动或数量的增减，归结为机械运动一种形式。辩证唯物主义反对这种简单化的运动观，指出物质的运动不仅限于机械运动。恩格斯说：运动“包括宇宙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简单的位置变动起直到思维止”（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页）。根据现代科学已达到的认识，宇宙中各种各样的物质运动可以归结为五种基本形式。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排列起来，就是：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运动形式。在每一种基本运动形式中，又包含着许多具体的运动形式。物质的运动形式和物质形态一样，是无限多样的。各门科学就是以各种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对不同的对象，要用不同的方法加以具体的分析研究，不能像机械唯物主义那样，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说明无限复杂的物质现象。

各种运动形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例如，摩擦生热、生电，就是机械运动转化为物理运动。热引起燃烧，物理运动又转化成了化学运动。在地球发展过程中，物质经过长期的机械的、物理的、特别是化学的作用，逐渐形成愈来愈复杂的化合物，出现了蛋白质，产生了生命的运动。由于生物长期的发展出现了类人猿，在

劳动中类人猿变成了人，产生了人类社会的运动。

运动是绝对的、永恒的，也就是说，运动是不能被创造或被消灭的，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物质运动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能力永远不会丧失。自然科学中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上述原理，它指出：在运动形式相互转化的前后，能量的总数是不会发生变化的。恩格斯把这个定律叫做“伟大的运动基本定律”（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9 页）。我们在科学实验室里能够准确地测定多少热能可以转化为多少机械能、化学能或电能等，同时可以用热能的单位去测量机械能、化学能或电能等，反之亦然。在生物运动中，我们可以计算出生物在同化和异化过程中所获得的能量和所放出的能量，并且可以用任何能量单位表现出来，通常我们是用热量单位来计算的。

在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中，各种物质运动形式是互相交错的。高级的运动形式必然包含着低级的运动形式，但是高级的运动形式决不能归结为低级的运动形式，因为它具有不同于低级运动形式的本质特点。例如有机体的生命运动，一刻也不能离开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过程。然而，认识了生命的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过程，并不等于了解了生命本身。要了解生命的本质，必须把握生命运动形式所特有的基本特征及其规律性，如新陈代谢、遗传变异等等。这些运动形式，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机械的、物理的或化学的过程。机械唯物主义者把物质世界复杂多样的运动形式，归结为机械运动一种形式，显然是完全错误的。现代的反动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学，如新实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新马尔萨斯主义等，都是把社会这种高级运动形式归结为生物的运动形式，例如新实在主义者霍尔特就认为，引起阶级斗争的原因

在于人们的生理情况和心理素质不同。这是形而上学的，并且是唯心主义的。

## 三、空间和时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

物质是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着的，空间和时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在空间和时间之外的物质运动是没有的。

当我们说到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时，首先要指明它在什么地方存在，它具有多大的规模或体积，这就是指事物的空间地位或它的广延性。要确定一事物存在的空间地位，必须了解这一事物同周围其他事物的空间联系，如距离、排列秩序等。当我们说到任何一事物的运动时，必然要联系到它的位置的移动，它的规模或体积的增大和缩小。总之，不论谈到任何事物的存在和运动，都要涉及它的存在和运动的空间形式。

运动着的物质也不能离开时间形式而存在。各种物质运动过程，具有一定的发展顺序和或长或短的持续性。离开了时间的形式，任何物质的运动、变化、发展都是不能存在的。

列宁说："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全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79 页）

物质是客观存在的，空间和时间是运动着的物质所固有的存在形式，因此，空间和时间也是不依赖于人们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着的。列宁指出："唯物主义既然承认客观实在即运动着的物质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也就必然要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同上书，第 178 页）物质是永恒存在的，时间和空间也是永恒存在的。

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是和唯心主义的时空观根本对立的。唯心主义否认世界是物质的世界，否认物质的客观存在，也就否认空间和时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把空间和时间看做是意识、观念的产物。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发展到一定阶段，使自己“外化”为自然，这时才出现空间形式；时间则是在“绝对观念”发展的更后一个阶段上出现的。这种客观唯心主义的时空观显然是同物质及其存在形式——时间、空间永恒存在的真理相违背的。主观唯心主义者的时空观把空间和时间看做是存在于人的主观领域的观念形式，这和它否认世界的客观存在是分不开的。康德认为，空间和时间是人类感性直观中的先天形式，人们通过这种为认识主体所固有的先天形式去感知事物，才给予事物以空间性和时间性。马赫断言，空间和时间是“感觉系列调整了的体系”，是用来整理认识材料的工具。主观唯心主义的时空观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科学证明，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就存在着，并且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发展着。

辩证唯物主义不仅反对唯心主义的时空观，而且指出，把空间、时间和运动着的物质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时空观也是不正确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时空观可以以牛顿的观点为代表。牛顿虽然也承认空间和时间是客观实在的，但他不理解空间和时间同物质运动的不可分性。他认为，空间是和物质相脱离、安放物质的不动的空框子，时间是绝对均匀流逝的和物质运动无关的纯粹的持续性，空间和时间并不是同运动着的物质内在联系着的形式。这就是牛顿的所谓“绝对的”空间和时间。

按照形而上学的观点，空间和时间的特性是一成不变到处一样的，物质的运动决不会使空间和时间有所变化。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非欧几里德几何学证明，事物的空间特性，在范围广大

的天文学计算领域内，是不同于比较狭小的普通的地面计算的领域的。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定律，只适用于后一种领域，对于前一种领域则是不适用的。狭义相对论揭示出空间和时间特性的相对性。人们在考察地上的普通物体的运动和天体的较慢的运动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考虑物质运动对空间、时间的影响以及空间和时间的相互联系；但是根据相对论，在考察运动速度接近于光速的物体运动时，静止坐标系的观察者就可以测出，随着物体运动速度的增加，沿运动方向的长度就会缩短，在它上面进行的运动过程就会减慢，也就是说，它的空间延伸就会减小，而时间的持续就会加长。空间和时间的这种变化是在一定运动速度上彼此互相对应的。这些事实说明，空间和时间是同物质的运动相联系着的。空间和时间随着物质运动的变化而变化，它们和运动着的物质是不能分离的，它们彼此之间也是不能分离的。

空间和时间同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可分性，还可以从下列事实得到说明。空间的三维性，就是物质的体积伸张的三维性，就是一物和他物的位置关系上（也就是坐标关系上）的三维性。它是指从空间的任何一点上都可以引出三条互相垂直的直线，通俗地说，也就是任何物体都具有长度、宽度和高度的广延性。离开了物和物的位置关系，空间的三维性就无从理解。时间的一维性和时间一去不复返的特性，只能用物质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变革来说明。“时乎时乎不再来”，是说事物的某种具体联系不可能绝对地重复出现。要“掌握时机”，要“当机立断”，就是说，人们要趁着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某种有利的联系条件，迅速确定行动的决心，否则就会失去时机。这又说明，时间的一维性和时间一去不复返的特性不能离开事物的具体联系而得到正确的理解。

恩格斯早就指出，把空间、时间和物质分离开来的观点是错

误的。他说："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假若没有物质当然都是无，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存在的空洞的观念、抽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96 页）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所设想的那种和物质的运动脱离的、绝对不变的空间和时间，正是主观的、空洞的抽象概念。

唯心主义者利用人们关于空间和时间概念的改变的事实，宣称空间和时间不过是人们意识的产物，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已被推翻。其实科学的新发现所推翻的，仅仅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抽象的、空洞的概念，而绝非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特性的认识将愈益深刻、丰富。物质的空间和时间的形式是随着物质本身的运动变化而变化的；人们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概念是可变的、相对的，随着科学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的；但是作为物质运动形式的空间、时间的客观实在性则是不变的、绝对的。列宁说："正如关于物质的构造和运动形式的科学知识的可变性并没有推翻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一样，人类的时空观念的可变性也没有推翻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全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79 页）

辩证唯物主义从空间和时间同运动着的物质不可分的观点出发，还肯定了宇宙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物质是无限的，物质的存在形式——空间和时间也是无限的。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不过是运动着的物质的无限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茫茫宇宙，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在空间的观察上，今天借助射电望远镜虽然使我们已经可以察觉距地球一百亿光年的星系，但是这也不是宇宙的边缘。宇宙是没有边缘的。物质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而是永恒地存在着、运动着，因此，在时间上，宇

宙的发展没有开端，也没有尽头。

整个物质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上是无限的，但每一具体的个别事物在空间和时间上则是有限的，无限的宇宙空间和时间正是由这种无数的有限的空间和时间所构成的。这就是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矛盾统一。如果只看到宇宙中每一个别事物的空间和时间的有限性，断言整个宇宙空间和时间也是有限的，这就会引导出一种荒谬的幻想，以为在这个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超时空、超现实的“神”的世界，就会陷入宗教迷信和唯心主义的观点。

在空间和时间问题上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从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的必要条件。

## 四、物质运动有它自己的规律性

物质在空间和时间中永恒地运动着，而物质的运动是有它自己的规律性的。春夏秋冬四季的依次更替，昼夜的循环，生物有机体的新陈代谢，以及社会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发展等等表明，一切物质的运动、发展过程都具有某种一定不移的基本秩序，这就是物质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就是物质运动的规律性。

唯物主义肯定规律性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物质运动的规律和物质本身一样，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物的规律性决定于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内容及其所依赖的客观条件。规律不能由人的意志任意地加以改变，不能为任何人所创造，也不能被任意地消灭。唯物主义既然肯定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客观实在性，也就要承认物质运动规律的客观性。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早已为自

然科学所证明。例如天文学发现，各个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运行的轨道，相对速度等等都服从于万有引力定律、惯性定律等客观规律。生物学揭示了物种的进化是按着“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客观规律进行的。在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中，人们对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感觉特别真切，在生产中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单凭主观愿望盲目蛮干，就将一事无成。

社会现象也有自己的客观规律。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自发的力量，在社会中起作用的则是有着自己的意志、愿望的自觉活动着的人。表面看来，在这里似乎人们的意志和愿望起着决定作用，没有什么客观规律存在。但是在以往的社会里，人们的愿望在很少的场合才能完全实现。人们所抱的目的，常常是彼此冲突和矛盾的，其中，有些是根本办不到的，也有些因为缺乏必要的条件而不能达到。社会现象并不是由每个个人的意志和愿望决定的，归根到底它和自然现象一样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不仅人们的愿望和意志是否能够实现，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而且人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愿望和动机，而不产生其他的愿望和动机，也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一定的愿望和动机的产生都是由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客观状况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全部历史事实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指出了这些规律的客观性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实践，充分地证明了社会规律的存在和它的客观性质。

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由于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人们开始能够自觉地运用经济规律为社会谋福利，但这并不是说社会发展规律不再是客观的，人们可以“消灭”或“制定”规律。斯大林说：无论是资本主义时期或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人们能发现这些规

律,认识它们,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把某些规律的破坏作用引导到另一方向,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给予其他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以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但是人们不能消灭这些规律或创造新的经济规律"。(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页)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实质上是唯心主义观点。实践证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个胜利都是严格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的结果。如果违反了客观规律,就会引起事情的混乱,使我们的事业遭受损失。

唯心主义否认规律性是物质本身所固有的,否认物质运动规律的客观性。客观唯心主义把事物的规律性的来源归于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如"上帝"、"天命"、"绝对精神"之类。宗教迷信把事物发展的必然联系硬说成是鬼神的安排。这二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则认为规律是人的意识的产物。如康德认为,仅仅由于人的理性能力的作用,才使杂乱的现象获得一定的秩序。他说:"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这是康德哲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现代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本来是没有规律性的,科学规律仅仅是人们为着暂时的利益而作的有用的假设。

唯心主义哲学家特别否认社会规律的客观性。旧的唯物主义者虽然承认自然本身具有客观规律,但往往不承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这就使他们在社会历史领域内陷入了唯心主义。

行星围绕太阳运动的规律,在哥白尼和开普勒发现以前,从来就在宇宙中发生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运动规律是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可是在他们发现这些规律以前,它们早就在人类社会中发生作用了。不管规律是否被人们认识,它总是客观存在着。规律不是由任何的精神力量所给予物质世界的,任何人要想把自己主观臆想的秩序强加于事物,是

不可能的。剥削阶级总希望永远保持统治地位，希望剥削制度永世长存，不管他们赞成还是反对，历史的发展总是要合乎规律地由一个社会形态进到另一个社会形态。不管资产阶级如何仇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一客观规律是改变不了的。

科学研究的任务决不是如唯心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把某种主观设想出来的秩序强加于事物，恰恰相反，科学研究的任务是要从客观事物中发现它本身固有的规律性。资产阶级学者臆想的“土地收益递减律”，“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加的规律”等等，当然称不得科学规律，因为它们不是客观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所以它们在社会历史和科学的发展面前一个个地宣告了破产。

事物发展的规律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们在客观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能够认识客观规律，并利用这种认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以达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伟大目的。如果人们按照客观规律行动，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果人们只凭自己的主观臆想来行动，就一定要遭受失败，达不到自己所希望的目的。人们的行动，人们的社会实践，深刻地证明了物质运动规律的客观存在，证明它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证明事物的规律为事物本身所固有；也深刻地证明了，客观规律是能够被人们认识和利用的。

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依循着物质本身所固有的规律运动着、变化着和发展着。因此，辩证唯物主义把承认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承认物质运动有它自己的规律性，当作自己的基本出发点。在一切实际工作中和科学研究工作中，要坚决从客观的实际事物出发，尊重客观规律，这是我们在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首先应该树立的科学态度和科学作风。

# 第三章 物质和意识

既然世界是物质的世界，那么，意识是什么，它的本质、起源和作用是怎样的呢？所有的唯物主义派别都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是意识的根源，意识是物质的产物。但是，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科学地解决了意识的起源问题，科学地论证了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和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从而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彻底驳斥了主张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唯心主义观点。

## 一、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

物质世界是永恒的、无始无终的，而意识则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自然科学证明，地球上曾经有几十亿年没有生物，更不存在具有高级神经系统的人类，在那时并没有意识现象。无机界长期发展的结果，产生了有机界；有机界长期发展的结果，出现了具有高级神经系统的人类。只是在有了人类的时候，才产生了意识现象。人类的思维这种精神现象，只是在约一百万年以前才出现的。这就可以证明物质在先、意识在后，物质产生意识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意识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大脑这种高度组织起来的特殊物质的机能；而大脑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同时，人类意识的产生不仅在生理方面同高级神经系统的发展密不可分，而且同劳动也是紧密相联的，就是说，人的意识不仅是自

然的产物，而且是社会的产物。

关于意识的起源和本质的问题，曾经是科学和哲学上的最大难题之一。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唯心主义者曾利用科学还不能解释物质是怎样产生意识的这个困难，来散布其荒谬的观点。唯心主义完全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的真实关系，它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不是物质产生意识，倒是意识产生了物质；它断言意识是一种不依赖于物质的、独立的本体。各个唯心主义流派都以不同的方式重复这种谬论。客观唯心主义者把人的意识归结为“宇宙精神”的自我意识和神的启示，主观唯心主义者把意识的来源归结为心灵的自由创造。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各派都正确地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历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对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提出了许多合理的命题，并作了具有科学意义的论证，向前推进了唯物主义，使得意识的起源和本质的问题逐渐接近于科学的解决。我国东汉的王充把肉体和精神的关系比作薪和火的关系，提出了世界上没有“无体独知之精”（《论衡·论死篇》）的命题。到了南北朝，范缜把这种唯物主义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把肉体和精神的关系比作“刃之与利”，就是说，精神是“心”的作用，好比“利”是刀刃的作用。在今天看来，这种观点在原则上还是正确的。18、19世纪欧洲的唯物主义者，根据自然科学的材料，对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作了若干具有科学意义的论证。例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认为，人脑中产生的表象和概念是由物质的现实派生出来的，人的肉体结构决定他们的精神生活。他嘲笑了那种宣扬灵魂不死的宗教信条。19世纪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明确地指出，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思维而客观存在的，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人

的感觉是客观世界的映象。

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由于受着自然科学水平和社会条件的限制，都没有能够科学地解决意识的起源和本质的问题。古代有些唯物主义者认为，意识是一种最精微的物质的作用，这种最精微的物质或者是原子，或者是“精气”，它们是从来就存在的。还有一些唯物主义者，虽然肯定意识只是物质的一种属性，但他们不知道意识只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大脑的特有的属性，认为一切物质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意识，得出了“物活论”的错误结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连欧洲18、19世纪的唯物主义者在内，在意识起源的问题上都没有辩证发展的观点，都不了解意识是社会的产物，他们离开人的社会性来考察意识，所以就不能科学地解决意识的起源和本质的问题，因而也就不能彻底驳倒唯心主义。

19世纪50年代欧洲出现了一种庸俗唯物主义流派，他们错误地把意识和物质看做同一个东西，把整个思维过程完全归结为大脑的机械的、物理的、生理的过程。在他们看来，大脑产生思想，就如肝脏分泌胆汁一样。这种观点混淆了意识和物质的界线，歪曲了意识对物质的真正关系，这是完全错误的。恩格斯指出：“终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和化学的运动；但是难道这就能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7页）思维的过程同大脑的机械的、物理的、生理的过程是密切联系的，但是，不能把思维仅仅归结为这种过程。意识是人脑这种高度发展了的物质所固有的特性，它和上述较低级的各种运动形态有本质的区别，它是人脑反映外部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机能和作用，而并不就是一种像胆汁之类的物质。

辩证唯物主义完全科学地解决了意识的起源和本质问题。现代科学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意识起源和本质的原理，彻底驳倒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科学证明，意识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辩证发展过程。意识这一种大脑的特性，是由低级物质所具有的跟感觉相类似的反映特性发展来的。

无机界没有感觉或意识，它只具有物理的和化学的反应。这是一种跟感觉相类似的反映特性，但这并不是感觉或意识，它只是物体由于其他物体的作用而发生的物理状态或化学状态的改变。

无机界长期发展的结果，产生了生命。随着无机物在一定条件下向有机物的转化，随着生命的出现，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产生了生物的反应形式，即刺激感应性。低等动物和整个植物界没有神经系统，它们只能对直接作用于它们的环境具有刺激感应的能力。刺激感应性已经不是单纯的物理反应、化学反应，而是这样一种反应能力：它使机体能够适应变化了的外界条件，使生物机体能保持新陈代谢的正常进行以维持其生存。这种刺激感应性已经包含了感觉的萌芽。感觉正是在刺激感应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低等动物发展为高等动物，适应愈来愈复杂的生存条件，有机体的各种组织也愈来愈专门化，产生了专门的反映机构，即神经系统。神经系统逐步发展，出现了中枢神经（包括脑和脊髓）和周围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中心就是大脑。有机体通过神经系统和环境发生联系，这种联系的基本形式是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按照巴甫洛夫的学说，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具有初步反映外界或自己内部发生着的那些物质过程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动物的心理或低级的“意识”。当然，这种“意识”还不是人

类的意识。

随着由动物界向人类的发展，产生了最复杂最完善的大脑，这是较之神经系统的出现具有更大意义的质的飞跃。人类的思维活动，不仅借助于人和动物所共有的第一信号系统，由外界物质刺激直接引起种种条件反射，而且还必须借助于第二信号系统，由言语引起另一种条件反射。列宁指出："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03 页）言语作为引起条件反射的信号，正是许多同类物质刺激的概括和标志。它使人的条件反射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为一般动物不可比拟的高级阶段。人脑在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的基础上进行的思维活动，就是意识。所以，意识不是别的，就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程度的物质——人脑的机能。现代科学证明：大脑活动的生理过程和意识过程是密不可分的，前者是后者的物质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产物。客观外界刺激了人的感觉器官，感觉器官接受了外界的刺激，通过神经系统把这种刺激传达到大脑，引起大脑皮质的活动，才产生意识现象。当人熟睡的时候，即大脑处于抑制状态的时候，就没有意识活动；而不清晰的、若断若续的作梦这种意识现象，则是由于大脑皮质没有完全抑制、有一部分还处在兴奋状态而产生的结果。这就根本驳倒了把意识看做是脱离大脑而独立存在的精神本体的唯心主义观点。

意识的萌芽和发生的历史，证明了意识在先、物质在后的唯心主义观点是荒谬的，也证明了一切物质都有意识的"物活论"是不对的。

是什么力量使得动物的脑过渡到人脑、动物心理过渡到人的意识呢？辩证唯物主义回答说，是劳动。劳动是猿变成人的决定

因素，是人的意识产生的决定因素。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起了决定的作用。人类最近的祖先——类人猿，由于生存条件的影响，它们的前肢和后肢有着某种分工，即由前肢担任了某些类似人手的工作。但即使最发达的猿“手”也本质上不同于人手，因为它不能制造工具。经过几十万年的漫长发展，当第一把用燧石做成的石斧出现以后，类人猿的“手”变成了人类的手，类人猿的活动变成了人类的生产劳动。这样，主要依靠自己生理器官来适应自然界的动物，就发展成能够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的人类。生产从来就是社会的生产。在社会生产中，思想交流是必要的，没有思想交流，就不可能有人们在改造自然斗争中所必需的协调的共同活动。这样，“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什么东西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管，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之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一定不移地改造起来了，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连续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39 页），从而就产生了语言。语言的产生使大脑能用词来概括各种感觉材料，表达抽象思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没有语言，人就不可能进行思维。

由此可见，劳动和在劳动基础上产生的语言是人脑产生和人类意识形成的主要推动力。劳动不仅在意识的产生上起了决定的作用，而且在意识的发展上也起了决定的作用。一方面，在劳动过程中，作为思维器官的头脑愈益完善化了；另一方面，劳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从而使意识的内容也日益丰富了。因此，意识是一种社会现象，它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离开了社会，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人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一开始就

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页）

综上所述，意识是人的大脑——高度完善、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的属性或机能。它不仅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且是社会的产物。这就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 二、意识是存在的反映

意识是人脑的属性，这是意识依赖于物质的一个方面。意识对物质的依赖，还表现在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大脑是意识的器官，但它不会自动产生意识；只有当外部物质世界的事物、现象通过感觉器官作用于大脑，当大脑和外界发生了联系以后，才会产生意识。

意识是人脑这种特殊物质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意识是客观世界的摄影、模写、摹本，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意识按其形式来说是主观的，按其内容来说则是客观的。没有被反映者，谈不到有反映；脱离了客观物质世界，就不可能有任何意识。这是唯物主义各派共同的基本观点，但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科学地论证了人的头脑对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形式，首先是感觉。当客观的事物、现象作用于人的感官所引起的神经兴奋达到大脑时，就产生了感觉，这是意识的初级形式。例如听觉是由于音波作用于人的听觉器官而引起的，颜色的感觉是由于不同波长的光波作用于人的眼网膜而引起的。人们每天每时都要接触到外界的许多事物、现象，因而就不断引起各种感觉。冬天的夜里刮了一夜西北风，人们第二

天外出劳动，接触到了冷空气，就会感觉到天气变冷了。在新学年开始时，当一位新的老师走进课堂，我们首先得到的是关于他的身材、容貌、衣着等等的印象，而当他开始讲课以后，我们又会得到关于他的音调、语态、手势等等的印象，这些都是感觉。只有人们的感觉器官接触到了某一个客观对象，才能产生有关这个客观对象的形状、大小、色泽、音调、冷热、干湿等各方面的感觉，各种感觉的综合形成了对象的完整的印象。人们在回忆中出现的当下不存在的对象的印象，是以往接触那个对象时所形成的印象的再现。没有客观外界的刺激，就不能产生任何感觉。

感觉对客观外界的反映有两个特点：第一，感觉是物质世界的直接反映，它的产生直接依赖于外界的具体对象，在感觉和它所反映的客观世界之间，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第二，感觉所反映的只是具体事物的一定特性，而不是许多事物的某种共性。例如它所反映的不是一般的颜色、重量，而是某种具体物体的颜色、重量，等等。这两个特点也恰好证明了感觉是客观对象在人们头脑中的直接的映象。感觉是意识的初级形式，但它却是构成一切复杂的意识现象的基础，没有感觉就不可能有认识。

感觉并不是人类所特有的，凡是具有中枢神经系统的动物都有感觉。但是人的感觉和动物的感觉有着本质的差别。人的感官不仅是生物发展的产物，而且是社会的产物。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了自己，改造了自己的感官，使自己的感官不断完善化。和动物不同，人们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感知外部世界的各种事物和现象的，这就使得人的感觉无论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比动物优越得多。恩格斯说：“鹰比人看得远得多，可是人的眼睛识别东西却远胜于鹰。狗比人具有更锐敏得多的嗅觉，可是它不能辨别在人看来是各种物件的特定标志的嗅味的百分之一。

至于触觉，猿类也不过刚刚有一点儿最粗糙的萌芽，而在人那里，则由于劳动的缘故，已经随着手的发展而首先形成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40—141 页）

感觉是意识的起点。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就是唯物主义，只有进一步承认感觉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才是唯物主义。在感觉的来源的问题上，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唯物主义认为，感觉是客观事物的一定特性的映象。主观唯心主义者则认为人的感觉是主观自生的东西；人的感觉不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倒是客观世界成了人的感觉的产物。按照这种说法，无论外界的山川、田野、草木、虫鸟，还是产生意识的器官——大脑，都成了感觉的产物。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它同科学和常识完全背道而驰。

人们对外界的反映不仅采取感觉的形式，而且采取思维的形式。思维是意识的高级形态。思维这种反映形式是人类所特有的，是人的反映的本质特点。列宁说：“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94 页）正是通过概念、范畴、规律等等，人的思维才能够深刻地反映外部世界的各种物质运动的过程，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不能科学地了解思维这种反映形式的特点，他们不了解思维对客观外界的反映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而把人对于客观外界的反映，机械地简单地了解为照相式的反映。这就给唯心主义留下了可乘之隙。唯心主义者抓住了思维不是对象的直接反映这一点，断言思维不是客观外界的映象，而是主观自生的东西。例如康德一方面认为，经验来自客观外界的刺激；这是唯物主义观点。但他另一方面又认为，思维的逻辑

范畴是先验的、主观自生的；这就是主观唯心主义了。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证明，和感觉一样，作为意识的高级形态的思维也是客观外界的反映，不过这种反映同感觉有质的不同罢了。

感觉这一反映形式是和客观外界直接联系的，是客观对象的直接反映；思维则是和客观外界间接联系的，它所反映的不是个别事物的形象，而是事物的本质，事物固有的内部联系和规律，它远较感觉更深刻地反映了客观物质世界。感觉是思维和客观外界联系的桥梁。感觉同客观世界直接联系，给思维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然后思维才是可能的。没有感觉，就不可能有思维；只有通过感觉，思维才能获得它的内容。思维这种高级的意识，是在感觉材料的基础上并对后者进行了抽象和概括而产生和形成的。尽管思维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但它仍是来自客观外界，它的内容仍然是客观的，是客观外界的反映。

巴甫洛夫学说证明了，人的意识，包括它的高级形态——思维在内，都是客观外界的反映。思维是和语言相联系的。巴甫洛夫从生理学上论证了借助于语言进行抽象思维的这一反映的特点。根据巴甫洛夫的学说，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在于他不仅具有第一信号系统，而且具有第二信号系统——语言系统。第二信号系统所借以形成的语言以及人的第二信号系统，都是在劳动中形成的。第二信号系统是人的感官的补充，它可以把第一信号系统的无数信号加以抽象和概括，使人突破了感官的局限，使人的认识能够扩大和深入到感官所不能及的种种领域。由于有了第二信号系统，人就可以不必单纯地直接依靠第一信号系统保持同外界的联系。第二信号系统是构成第一信号系统的那些事物和现象的标志，是信号的信号。这种信号的信号是代替实物的刺激物。巴甫洛夫关于第二信号系统的学说，从大脑活

动的生理过程证明了，在第二信号系统的基础上进行的思维，归根到底，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反映。

作为思维形式的概念、理论具有抽象性的特点，它是客观事物的间接反映，它不像相片那样直接反映外界对象的具体的原型，但它反映了许多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和内部联系。例如在人的思维中能够形成既不是梨又不是苹果的一般的“水果”的概念，但是在客观世界里，人们只能找到梨子、苹果等具体的水果，而不能找到一个既不是梨又不是苹果的一般的“水果”，但思维中的一般的“水果”反映了各种具体的水果的共同本质。在这里，机械唯物主义是无能为力的，它不能解释抽象的概念、理论为什么也是客观外界的反映。辩证唯物主义肯定了概念、理论确实是客观外界的反映、摹本。例如数学，这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概念体系，但它仍然是客观世界的映象。客观世界虽然并不存在抽象的数目、点、线、面积等等，但其原型仍然在客观世界之中。几何学是从客观的空间关系出发的，算术和代数学是从客观对象的数量关系出发的，这些数量和客观世界实际存在的各种物体的大小、宽窄、长短等等的区别和联系相适应。即使是微积分中所运用的各种数量（各次微分和无限小），看起来好像是任意想像的，但实际上这一切想像的数量的原型仍然是由自然界所提供的。（参阅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23—229 页）社会科学的生产关系的概念，也不外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物质关系的概括反映。总之，任何抽象的概念，它的根源无一不是客观外界。

不但科学的抽象、正确的思想是客观外界的反映，就是错误的思想，各种荒唐的玄想、宗教的迷信观点，也无不可以在客观物质世界中找到它的产生根源。一种思想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在于它是不是客观外界的反映，而在于它是客观外界的正确反映，

还是一种歪曲的、虚幻的反映。恩格斯说："一切宗教，不是别的，正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支配着人们的那种外界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间力量的形式。"（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3页）宗教中的各种神的形象都可以从人间找到它的原型。神是人造的，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出来的。各民族的神都具有本民族的人的特征。阶级社会的宗教把神分成高级神和低级神，主神和一般神，并在他们之间建立起统治和隶属的关系，这种"天国"中的等级关系，正是尘世间的阶级关系的反映。

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物，可以产生多种不同的、甚至根本相反的感觉和思想。这是由于人们的修养、知识，特别是阶级立场等主观条件不同所造成的。在反映过程中，人的主观条件是起作用的。然而，这种主观作用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这恰好证明了客观决定主观、物质决定意识，而不是相反。

综上所述，感觉直接来源于客观外界，思维来源于感觉，归根到底也是来源于客观外界；意识，无论是低级形式的感觉，还是高级形式的思维，都是人的头脑这种特殊的物质对于在人头脑之外的、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既然如此，我们必须使自己的思想不断地、自觉地去符合客观实际，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进行，不断地达到预期的目的。

## 三、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不仅认为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而且认为，意识对物质的反映是能动的，意识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反过来对物质发展进程起巨大的作用。不承

认或低估意识的反作用和主观的能动作用是错误的。

人不同于动物的特点，在于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而人的行动总是受意识支配的。意识的特点，就在于它不像镜子一样简单地消极地反映外界事物，而是能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所反映的事实材料和规律性作基础，提出一定的观点、理论、思想体系，提出一定的目的、主张、计划，来指导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斗争。以生产经验、科学技术的形式反映自然界的规律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意识，指导人们从事生产斗争，能动地改变着自然界；以社会观点、社会思想的形式反映人们社会关系的意识，指导人们从事阶级斗争以及其它社会活动，能动地影响着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意识就是这样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而反作用于客观世界，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的。这就是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列宁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28 页)

毛泽东同志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第 2 版，第 175 页) 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在客观物质条件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是普遍适用的。

唯心主义抓住了意识的能动的方面，把它加以绝对的夸大和

歪曲，把意识说成是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的本体。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却忽略了意识的能动方面，把意识的反映客观世界看做是消极的、被动的，所以就不能解释许多复杂的意识现象，不能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科学地论证了意识的能动性，给予意识的能动性以唯物主义的解释，从而把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贯彻到底。

在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这个前提下，肯定意识的能动性，这不但没有证明唯心主义的正确，恰恰是彻底驳斥了颠倒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的唯心主义，同时也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局限，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

人的行动要受一定的目的、主张、计划等等的指导。例如盖房子要先有房子的设计图，造飞机要先设计飞机的图样，做具体工作要先制定方针、计划、方案等等。马克思说过，最坏的建筑师不同于最好的蜜蜂的地方，就是建筑师在建筑什么东西之前，先要制定一个观念形式的建筑物设计图。（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2页）

先有建筑设计图，然后进行建筑，这是否同物质在先、意识在后的唯物主义原理相矛盾呢？不矛盾。因为，建筑物的设计图是以人们所认识了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是以前人经过实践所积累起来的建筑经验为基础的。这里恰恰证明了意识（建筑物计划）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客观存在的反映；它既经产生，就对人们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实践起着巨大的反作用。

人在行动之前，先产生某种动机，并为实现这种动机制定相应的计划。表面看来这好像是纯粹主观的、任意的，其实不然。人们为什么恰好产生这种动机而没有产生别的动机，为什么恰好提

出这种计划而没有提出别的计划，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这种原因只能从客观现实中去寻找。人们给自己提出的任何任务和计划，都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处于敌对阶级地位的人们会产生相反的动机，这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这种社会存在所决定的。

从人们行动的结果，也可以看出意识对于存在的依赖关系。

人的活动总有预期的目的，为什么有的人能够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有的人就不能呢？具体的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根本的原因，在于预定的目的和行动计划是否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凡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就有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否则就没有这种可能。毛泽东同志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3页）这是被现实生活一再证实了的确定不移的真理。革命的阶级或集团的行动，虽然也要经过困难、挫折和失败，但终归能够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反动的阶级和集团的行动虽然暂时也可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最后总是要遭到失败，达不到它预期的目的。这是因为，前者的预期目的以及为着实现这个目的而制定的方针、政策、计划等，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后者的预期目的以及为着实现这个目的而制定的方针、政策、计划等，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总之，意识的能动作用，不但不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相矛盾，而且，对于意识能动作用的正确解释，恰恰是证实了这一原理。不管意识的能动作用有多大，它总是受客观存在制约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客观存在所决定的。

辩证唯物主义对意识的能动性的科学解释，对于实践有重大

意义。毛泽东同志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67页）由此可见，要有效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就必须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客观情况，就必须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根据客观事实，引出符合客观规律的思想、计划、政策等等，而不能凭着主观感想办事。指导人们行动的思想、计划、政策等等，越是符合客观规律，人们就越能够在工作和斗争中取得主动地位，就越能够实现预期的改造世界的目的。

# 第四章　对立统一规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是按其固有规律无限发展着的。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不仅必须了解世界是发展着的物质世界，而且必须了解物质世界为什么会发展，它如何发展，它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唯物辩证法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是：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本质和现象、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等范畴。

## 一、唯物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

物质世界是由无数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

用的事物所形成的统一整体。宇宙间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总是同周围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相互依赖着、相互制约着、相互作用着。在自然界中，从巨大的天体到原子核内部的基本粒子、从无机界到有机界，无不处于普遍联系、交互作用之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虽然有着根本的、质的区别，但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类的出现和人类社会的形成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而且，只有在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中人类社会才能存在和发展。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也无不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国民经济的各部门是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整体，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以前者为基础的相互作用；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也相互影响着、相互联系着。任何事物都处于一定的联系之中，只有在一定的联系之中才有它的存在，才有它的发展。离开了这种具体的联系，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会成为不可能的和不可理解的东西。没有地球上的各种条件——大气层、适当的温度等，生命就不能存在；脱离了人体的手，只是名义上的手，再也做不出什么事来了。离开了垄断资本主义对于资本输出和国外市场的需要，就不能理解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侵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重工业的发展必须同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相适应；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事业的发展相适应。

事物的普遍联系，是同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紧密不可分的。恩格斯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的相互联系的总体，……这些物体是相互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页）离开事物的相

互联系就无从考察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更说不上了解运动、变化、发展的实质。某一物体的位置移动就是它和周围物体的空间联系的改变。位置就是一种联系。脱离了与周围物体的联系就不能确定一个物体的位置，也无从说明位置的变化。最简单的运动形态尚且是表现在事物的相互联系之中，复杂的运动形态就更不能离开事物的联系来加以理解。在事物内部各种力量的作用以及它和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过程中，自己本身不断地运动着、发展着，由一种状态推移到另一种状态，由低级形态发展到高级形态。事物由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由低级形态发展到高级形态，也就是一种联系，即新旧事物之间的联系。高级生物是由低级生物长期发展而来的，高级生物和低级生物之间有着历史的联系。生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又是同自然界各种条件的变化、发展分不开的。生活环境的改变，是促使类人猿转化为人类的一个重要条件。恩格斯指出，类人猿“大概首先受它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攀援时要手担任和脚不同的作用，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而渐渐采用了直立的姿势，这就是从猿到人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37 页）。由此可见，就其实质来说，不论简单的运动形态或复杂的运动形态，都是由种种事物联系构成的；运动、变化、发展也就是联系。

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人类历史或我们自身的精神活动时，在我们面前首先呈现的是种种联系和交互作用的无限错综之图画，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万物皆动、皆变、皆生、皆灭。”（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8 页）唯物辩证法所要研究的，就是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规律。恩格斯说：“辩证法就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

学。”（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页）就是“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同上书，第39页）。

从形而上学的观点看来，自然和社会只是一些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相依赖的事物或现象的偶然堆积。形而上学者不是从联系中，而是把事物或现象从世界的总联系中割取出来，孤立地加以研究。因此，他们只看到个别的事物，而看不到它们的相互联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个别事物的存在，而看不到它们的产生、发展和消灭。

科学发展的全部成就驳斥了形而上学，证明了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的观点。质量和能量的相互转化和守恒定律揭示了各种物质状态、运动状态之间的普遍联系。细胞的发现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创立揭示了生物界内部普遍联系以及生物和环境之间的联系。门德列夫的周期表揭示了曾经被认为互不联系、互不依赖的各种化学元素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揭示了各个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社会和自然的联系。

现代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们不顾科学发展已经获得的积极成果，力图推翻普遍联系的观点。存在主义者断言：“现象间的任何有规律的联系都是不存在的，可以谈的只是历史事实的偶然性和荒谬性。”资产阶级像怕火一样害怕揭示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是毫不足怪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联系，就会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结论。

既然世界上一切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那么每一个事物和现象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是受着周围具体的、历史的条件所制约的。一定的事物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产生，在一定条件下得到发展，又在一定条件下趋于灭亡。条件是十分重要的。斯大林说：“一切都依条件、地方、时间为转移。”（斯大林：《辩证唯物

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载《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695 页）离开一定的条件、地方和时间，甚至不能弄清“下雨对我们有利还是有害”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大旱之时，普降甘霖是十分有利的；而在水涝成灾之时，淫雨不止就无疑是绝对有害的了。因此，想问题、做事情都要充分估计到条件的作用，要具体地分析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离开条件去想问题，其结果只会成为没有根据的空想；不顾条件去做事情，就会成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否认条件的作用是错误的。当然，条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但人们不能任意地改变条件，条件的改变必须依据客观规律来进行。只有从现有的条件出发，正确地利用客观规律，人们才能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充分利用有利的条件，改变不利的条件，创造出为实现一定目的所必需的条件。

宇宙中一切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每一事物都这样或那样地同周围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然而事物的联系并非都是一样的。事物的普遍联系多种多样，有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主要联系和次要联系、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等等，它们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是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性。规律就是事物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列宁指出：“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61 页）

规律所表现的是现象间在一定条件下所固有的本质的、普遍的、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在相同的条件下是会重复出现的。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某种合乎规律的联系就必然发生作用。如力学中的自由落体的规律，并不是只适用于个别物体的、偶然的联

系。一切物体在排除空气的浮力和阻力等条件下，都必然以该地的重力加速度向地面下降。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动力的规律，只要在阶级还存在的条件下，它就必然起作用。

规律是现象中普遍的稳定的联系。列宁说，规律是现象中经常巩固的（保守着的）"东西"，"规律是现象中同一的东西"（《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8—159页）。例如，价值规律（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制造该商品所耗费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一切商品的一个共同的本质特性。任何一种生产只要它还是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对它就必然起作用。发现和掌握规律，就是从个别中找到了一般，从变动不居的现象中找到了相对稳定的本质。

规律比现象更深刻。它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作用，决定着事物和现象发展的总的趋势和基本过程。但是，规律并不包括现象中的一切联系，所以现象比规律更丰富。

认识事物就是要从事物的多种多样的联系中去研究事物。但这决不是说，要对事物的一切联系同等看待。要了解一个事物，就必须对事物的各种联系加以具体的分析，分清何者是本质的、何者是非本质的，何者是必然的、何者是偶然的，何者是主要的、何者是次要的，从而抓住事物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科学的任务就在于揭示事物的规律性。不做这种具体分析，只是甲乙丙丁现象罗列是达不到任何科学认识的。折衷主义者把事物或现象的一切联系和关系等量齐观。他们在说明一个事物或现象时总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又是这个，又是那个"，"这一方面，那一方面"。这种做法表面上好像是全面观察问题，在实际上，只是模糊事物本来的面貌。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为着讨资产阶级的欢喜，经常采用折衷主义的手法，使阶级斗争中一切具体的和

确切的东西都模糊起来。折衷主义是反辩证法的，它是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辩证法要求的是从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对比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载《列宁全集》第 32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80 页）

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规律，机械运动、物理现象、化学变化、生命过程和社会发展等等，都各有其特殊的规律。唯物辩证法并不研究各种物质运动形态的特殊规律。研究这些特殊规律，是各门具体科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社会科学的任务。唯物辩证法所研究的是宇宙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恩格斯说：“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45 页）

辩证法的规律是宇宙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它支配着一切事物的发展，在任何领域都起作用。辩证法的规律既是客观物质世界的规律，又是思维的规律，主观辩证法不外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唯物辩证法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它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一切科学部门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法的总原则，是我们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的正确指南。唯物辩证法是帮助我们揭示各种事物的复杂联系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有了它，才能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观察事物。

唯物辩证法不能代替各门具体科学，不能代替具体事物的具体研究。唯物辩证法不允许将它的原理当作死公式硬套在具体事物之上，而要求以它为指导，对所研究的事物进行调查研究，揭发每一具体事物本身固有的，而不是臆想的具体联系和规律。只有掌握大量现象材料，运用辩证法进行分析研究，才能揭发事物固有的联系，才能认识事物的特殊本质和规律，并从而丰富一般

规律的认识。

唯物辩证法是全面的、深刻的、毫无片面性弊病的发展学说，它教导我们要分析事物内部和各事物之间矛盾诸方面的联系，分析事物的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等各个方面的联系。

唯物辩证法包括三个基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列宁指出："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78页）列宁还把对立统一规律规定为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 二、两种发展观

唯物辩证法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指出，在客观世界中普遍地存在着矛盾，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

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它又分裂为两个既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部分、方面和趋势。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存在着矛盾。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推动一切事物的运动、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我国古代有许多思想家，包括某些唯心主义者，提出了一些关于矛盾的思想。老子说："反者道之动"，这是认为世界上存在着的相反的力量是运动的源泉。程颐说："万物莫不有对。"（《二程全书·遗书》）唯物主义者戴东原说："一阴一阳，盖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阴一阳，其生生乎？"（《戴东原集·读易系辞论性》）这是说宇

宙的变化是永远不会停息的，宇宙变化是由阴阳的矛盾斗争所构成的。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极其简明扼要地概括了科学发展的历史，深刻地说明了矛盾的客观性，矛盾的普遍性。矛盾存在于客观世界的一切领域，存在于科学研究的一切领域。

“在数学中，＋和－，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谈谈辩证法问题》，载《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407 页）

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揭示了在物质的微观结构中也充满着矛盾，有实物粒子和场粒子的矛盾，有原子核和电子的矛盾，有粒子和反粒子的矛盾等等。每一个微观客体又都具有颗粒性和波动性的矛盾。

在人类社会中也充满了矛盾，最根本的矛盾就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自从阶级出现以后，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奴，资产者和无产者，一句话：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贯串在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中。

在消灭了阶级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着矛盾，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不同罢了。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观点，创立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完整学说。他说：“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

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0 页）

每一事物的内在矛盾是这个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和旧的矛盾的发展，使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推动了社会的前进。

承认不承认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是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分歧。列宁概括了哲学史上、特别是近代哲学战线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深刻地阐明了辩证法的发展观和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的根本对立。他指出，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另一种观点“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谈谈辩证法问题》，载《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408 页）。

第一种观点忽视了事物内部的矛盾，也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的发展和运动。这种观点在实质上是把事物看做是死板的、被动的，它本身不具有运动变化的能力，事物的“发展”被认为纯粹是外力推动的结果，因此这种观点会走向唯心主义，就是从物质世界以外去找物质世界发展的源泉，把物质世界发展的源泉移到了精神世界，移到了神。既然这种观点忽视了事物内部矛盾的存在，看不到事物内部的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新的方面和旧的方面的矛盾斗争，也就不能理解通过矛盾斗争所引起的事物本身的革命变革——一事物向另一事物的转化，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

物的死亡。按照这种观点，一切事物的发展不过是同一事物在量上的增加或减少，任何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同样的事物。这种观点是在口头上承认发展，而在实质上却否认发展，因此它终归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第二种观点是辩证法的观点，它揭露了事物内部的矛盾，“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谈谈辩证法问题》，载《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8页）。这种观点指明，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只有这种观点才能说明事物的革命变革，说明一事物向另一事物的转化，旧东西的灭亡和新东西的产生。

现代资产阶级学者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害怕从矛盾的学说会做出革命的结论，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否认矛盾的客观存在。现代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悉尼·胡克说：“‘矛盾’这个词是用得很古怪的，因为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起，逻辑理论就认为，只有判断、论断、证明才可能有矛盾，事物和现象决不可能有矛盾。”克·保皮尔说：“如果我们承认矛盾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放弃任何科学活动；这意味着科学的完全毁灭。”我们必须揭穿资产阶级学者这种“维护”科学的虚伪面孔。科学发展和哲学发展的历史都证明了，矛盾是客观存在着的。人类认识史表明：任何科学所研究的，都是某一特定领域的特殊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事实和资产阶级形而上学者所说的恰好相反，离开了对客观事物本身矛盾的分析，就没有真正的科学。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矛盾，这是事物自我运动的源泉；同时也承认，事物和事物之间的矛盾——外部矛盾对于事物的变化、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正确地解决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对深入理解事物发展，对批判形而上学的、庸

俗进化论的发展观，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9—290页）这就是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

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外部原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对于事物发展的作用依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其中有些条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没有适当的温度，鸡蛋就不能孵化为小鸡。在这个意义上说，适当的温度这种外部条件，起着决定的作用。但是，适当的温度不管有多大的作用，也不能使石头孵化出小鸡，因为石头没有孵化为小鸡的内在根据。所以归根到底，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认为革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同时也肯定国际援助的重要性，国际援助为国内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但是否能充分利用这种条件取得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功，还是取决于国内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自觉努力。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8页）另一方面又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

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15页）

辩证唯物主义肯定了外因对事物发展的作用，但是指出它只是发展的第二位原因。只有这种全面而深刻的理论，才能彻底驳倒片面强调外因作用的形而上学观点。

## 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实践和科学都证明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毛泽东同志说：“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3页）

前面已经说过，不仅自然界有矛盾，而且社会中也有矛盾，不仅阶级社会中有矛盾，而且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矛盾。矛盾不仅存在于客观现象中，而且也存在于思维中。毛泽东同志说：“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做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人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4页）他又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同上）

无论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发展过程都是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的。如果只承认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有矛盾而不承认别的阶段有矛盾，例如苏联德波林学派认为过程的开始时只有差异，

没有矛盾，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矛盾，那是同事实不符的，违反了矛盾的普遍性的原理。事实上，事物发展过程开始时的差异，就是矛盾，只是没有激化而已。

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就使我们在认识和解决问题时有了一个总的方向。这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仅仅懂得矛盾的普遍性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矛盾的特殊性，了解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不同事物矛盾的各自的特点。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千差万别，各有其特殊的本质。这种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就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的特殊性。如果我们只一般地知道任何事物都有矛盾，而不研究它们各自的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更谈不上用正确的方法去处理和解决矛盾。因此，认识和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我们科学地认识事物的基础。

任何科学，都要在矛盾的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每一门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揭示自然界或社会的一定过程、一定方面的特殊的矛盾运动规律。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科学等各以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社会的物质运动形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人们要对任何一种具体事物进行科学的研究，就必须注意把握它的特殊的矛盾运动规律。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在于，把机械运动的特殊的矛盾运动规律，简单地搬用到其他部门，而不注意其他部门的矛盾的性质是和机械运动根本不同的。“生物社会学”的错误在于，不区别生物的矛盾和人类社会的矛盾，以为用生物的特殊矛盾运动规律就可以解释社会现象，抹煞社会本身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马克思、恩格斯

正是由于分析了社会本身所特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从而发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门科学。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共产主义》，参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4页）对具体事物作具体的分析，就是要分析矛盾的特殊性。

不但世界上各种物质运动形式都有它不同的特殊矛盾（如自然界和社会），而且同一运动形式中所包含的不同发展过程，各有它的特殊矛盾（如社会运动形式中的各个不同社会形态）；同一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也各有它不同的特殊矛盾（如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升阶段和垂死阶段）。要了解这些，都必须做具体分析。

一个大的事物，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相互联结，构成事物的总体。我们分析一个过程，必须首先分析这个过程所包含的各个矛盾的特殊性，以及每一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特点，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在这个总体中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然后再把这些对事物各方面的认识综合起来，这样才能认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把握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在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上，根本矛盾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而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发生了。因此，必须分析这些矛盾在其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上的变化，必须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矛盾和矛盾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综合。

以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为例：这篇文章首先分析了当时在中国社会中起着不同作用的各个阶级（买

办阶级、地主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本身的特点，又从各个阶级的相互联系中分析了各个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然后综合起来，对各阶级之间的总的关系，即矛盾的总体的特点作出结论，确定地主、买办阶级是革命的敌人，他们和帝国主义相勾结，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而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最接近的朋友，中产阶级的左派可能成为朋友，右派可能成为敌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的战略方针就是在这样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制定的。这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具体分析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矛盾特殊性的范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又注意了这些阶级矛盾变化和发展的情况，在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如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对这些矛盾和它们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从而为党制定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时期的具体的方针和政策，保证了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毛泽东同志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9页）我们具体分析事物的矛盾及其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的特殊性，就是为了找出恰当的解决矛盾的方法，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对于具体事物不作具体分析，用千篇一律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是没有不失败的。

矛盾的特殊性和矛盾的普遍性的关系就是个性和共性、相对和绝对的关系。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适用于一切事物的道理，没有任何例外。这是事物的共性、绝对性。每一事物、每一过程的矛盾都各有其特殊性质，这

就是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如果除去了一切过程的特殊性质的矛盾，也就没有什么矛盾的普遍性了。所以矛盾的特殊性和矛盾的普遍性是互相联结的。每一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例如，对于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的最普遍的原理说来，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具有特殊性，但是阶级矛盾表现在奴隶制社会中是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表现在封建社会中是地主和农奴的矛盾，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资产者和无产者的矛盾，就这些场合说来，阶级矛盾是所有这些社会所共同的普遍性的矛盾，而不同社会中的不同的阶级矛盾有着各自的特殊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阶级斗争发展历史中一定阶段的产物，对于全部阶级斗争历史说来，就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对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说来，它又具有普遍性。

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互相联结的道理，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事物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必须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既不能离开特殊性去寻找普遍性，也不能离开普遍性去寻找特殊性。

人们认识矛盾的过程，总是从具体的特殊矛盾的分析开始，概括出普遍的矛盾规律，又用这个普遍的矛盾规律进一步去研究具体的特殊的矛盾，然后又利用这种研究的成果来补充丰富和发展关于普遍的规律的认识，作为更进一步的具体研究的指导。如此

不断反复下去。这就是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无限的认识过程。我们在观察、研究和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既必须以矛盾的普遍性原理作为指导，又必须从事物的矛盾特殊性出发。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完全符合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法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由于它们的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会有千差万别的特点的；但是，不论在哪一个国家和民族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总是要遵循普遍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一些主要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从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原则。

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借口“民族特点”、“时代特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反对1957年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所肯定的一切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否认十月革命的道路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道路。他们宣称：“把任何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和形式宣布为惟一正确的，就是教条，它妨碍世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现代修正主义者片面地强调特殊，把特殊绝对化，使它脱离了一般，只不过是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性的一种手法。事实上根本不可能有离开了普遍的特殊。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所谓“特殊道路”，决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道路。

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是使矛盾的普遍性离开矛盾的特殊性。他们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他们既不能够从具体的、特殊的事物中概括出普遍原理，也不懂得应用普遍原理

到实际生活中时，必须使它和实际生活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教条主义者是思想懒汉，他们不肯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不肯根据这些特点具体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指导无产阶级的事业达到胜利。

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08页）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法，是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 四、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必须研究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这两种情形。

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同时存在，其中必有一种主要的矛盾，它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大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大资产阶级内部各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劳动人民内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又表现为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矛盾，极其错综复杂。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决定资本主义社会其他矛盾存在和发展的主要的矛盾。只有抓住了这个矛盾，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的复杂矛盾；也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才有可能逐步地解决资本

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其他矛盾。

一般说来，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在工作和生活中所处理的事情，总是比较复杂的，往往同时存在许多矛盾，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我们捉住了主要矛盾，就抓住了处理这件事情的主要关键；解决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容易解决。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第 2 版，第 310 页）

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是正确地解决革命战略策略的重要方法。在革命斗争中，各种矛盾往往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革命政党只有抓住其中的主要的矛盾，才能正确地确定主要的打击方向和工作中心，才能集中力量消灭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和解决最主要的问题。无论在政治斗争或军事斗争中，毛泽东同志从来都坚决主张在一定时间内只应有一个主攻方向，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反对"两个拳头打人"、"全线出击"等等分散目标和分散力量的错误战略策略。正因为党和毛泽东同志善于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中，捉住主要的矛盾，正确地制订了革命的战略策略，集中力量，逐个地消灭当前的主要敌人和解决当前的主要问题，才把革命引向伟大的胜利。

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工作，都不能不分主次、先后、轻重、缓急，"胡子眉毛一把抓"，而必须抓住中心环节、抓住关键，集中力量解决主要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纲举目张"，把整个工作带动起来。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工作，而且适用于一切工作。在个人的工作和学习中，也总有主次、先后、轻重、缓急，也总得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的、关键的问题，才能事半

功倍，使工作和学习更有成效。善于捉住主要矛盾和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极端重要，不懂得它，就会在复杂的矛盾面前茫无头绪，束手无策。

唯物辩证法要求善于从复杂的矛盾运动中捉住主要矛盾和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决不是说可以忽视或撇开非主要的矛盾。事物的各种矛盾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主要矛盾对非主要矛盾虽然起主导的、决定的作用，但非主要矛盾对主要矛盾也会发生影响。所以为了解决主要矛盾，我们就要注意适当地处理各个非主要矛盾。如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慎重地处理工农之间的矛盾，以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恰当地处理中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孤立垄断资产阶级，巧妙地利用资产阶级内部和各个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对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在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的时候，还必须把主次适当地结合起来。抓中心环节，还要注意非中心环节；抓纲，还要注意目；抓重点，还要注意一般。没有其他工作的配合，中心工作也不能很好地开展；丢掉了目，就无所谓纲；没有一般，也就没有重点。所以，正确的方法必须是围绕着中心工作，安排好全盘的工作秩序。毛泽东同志把这种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形象地称为“弹钢琴”。他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43页）所以，无论做什么事情，既要抓住中心，反对不分主次、轻重，又要全面安排，防止“单打一”。

研究主要矛盾，还要注意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问题。在客观过程的发展中，因为出现了新的条件，原来的主要矛盾可以转化为次要矛盾，原来的次要矛盾也可以转化为主要矛盾。无产阶级政党及时地注意主要矛盾的转化，并且预见到这种转化，就能提出新的任务、方针、政策、口号，动员和组织群众，集中力量去解决新的主要矛盾。这样，才能自觉地、有准备地把革命斗争由一个中心环节转移到另外一个中心环节，由一个阶段推向另一个阶段。

下面再谈主要的矛盾方面（或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问题。

一切过程中各种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能平均看待；任何矛盾的各个方面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也不能平均看待。在一定的条件下，有时矛盾着的各个方面似乎势均力敌，但这种平衡会被斗争所打破，为不平衡所代替。平衡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所以，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成为主要的矛盾方面；而另一方面则居于被支配的地位，成为非主要的矛盾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主要的矛盾方面所规定的。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事物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易其位。因为矛盾双方不断地斗争，在斗争中新的方面逐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上升为居支配地位的主要方面；而旧的方面则逐步由大变小、由强变弱，转变为居被支配地位的非主要的矛盾方面，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当新的方面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时，事物就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矛盾双方这种互相转化的过程，也就是事物变革的过程。新的方面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常常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有曲折、有反复、有时甚至有暂时的倒退。但是，无论如何

新的方面终归要战胜旧的方面而居主导的地位，新事物总要代替旧事物。这是在宇宙发展中永远不可抗拒的普遍规律。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永远坚决地站在新事物的一方，积极地创设条件，促成新事物的成长、壮大，使它转化为居主导地位的矛盾方面，以达到革命的目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经过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相互转化，工人阶级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时，社会的性质，就由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化成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研究主要的矛盾方面的问题十分重要，把握了主要的矛盾方面，就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主流，就能辨风向、识大局，如果颠倒主次或主次不分，就会混淆事物的性质，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 五、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矛盾着的各方面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但它们又具有同一性。矛盾就是既对立、又同一。我们研究事物的矛盾运动，必须研究矛盾诸方面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斗争的情形，即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

什么是矛盾的同一性呢？毛泽东同志指出："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5页）

在事物和过程中的矛盾着的各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存，组成一个统一体，这是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

矛盾着的每一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相反皆相成也”，就包含着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同一性的思想。矛盾的一方假如没有和它对立的另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例如，没有困难，就无所谓顺利；没有落后，显不出先进；没有冷，也就没有热；没有帝国主义，也就没有殖民地，殖民地人民的彻底解放将导致帝国主义的最终灭亡。世界上任何相互联系着的双方，都是又对立又联结，组成对立的统一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互相对立，但又互相联系，双方共处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统一体中，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当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消灭了资产阶级的时候，原来的无产阶级就成了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这时工人阶级这一概念是同国内还存在着的农民以及国际资产阶级对比而言的。当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就无所谓工人阶级了。战争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是：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有了矛盾双方的转化，才有事物的变化发展、才有革命的变革。因此，它是更重要的方面。

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孙子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孙子·势篇》)这里包含着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在孙子那里还包含着军队的治乱、勇怯、强弱的转化要有一定条件的思想；其

转化的条件就是数（部队的编制）、势（战役战斗的形势）、形（如集中我之兵力、分散敌之兵力以及选择适当的地形等等）。科学发展的历史证明，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在数学中，正可以转化为负，负可以转化为正。在物理学中，作用可以转化为反作用，反作用又可转化为作用；电转化为磁，磁转化为电。在化学中，化合和分解、氧化和还原也都会向其反面转化。在生物界中，生转化为死，死转化为生。在社会生活中，也充满着对立面的转化。例如，资产阶级的统治转化为无产阶级的统治。在一定条件下，和平转化为战争，战争又转化为和平。在工作中，困难和顺利，也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好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坏事，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好事。失败和胜利也是这样，只要有了一定的条件，胜利可以转化为失败，失败也可以转化为胜利。

研究对立面的互相转化，最重要的是认识互相转化的条件。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5 页）只有认识了对立双方互相转化的条件，才可能在客观情况许可的范围内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事物向对革命有利的方面转化。忽视了转化的条件，不但不能把握事物转化的规律，而且会陷入相对主义的错误，把一切事物看成是变化无常、毫无稳定性的、不可理解的东西。

抹煞转化的条件性，是修正主义常用的一种诡辩手法。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必须经过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新老修

正主义者否认这些条件，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种违反客观事实的荒谬说法，和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辩证的转化，毫无共同之点。

互相同一的矛盾双方永远处在斗争之中。矛盾的斗争性指的是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互相否定的趋向。有矛盾就有斗争。这里说的“斗争”，是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哲学范畴，不只是限于政治的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都是斗争；在自然界中，吸引和排斥，阴电和阳电，化合和分解，遗传和变异等对立面的互相作用，也同样包含着斗争。

任何矛盾双方都是不断斗争的，斗争的结果，最终必然导致矛盾双方的转化、矛盾的解决，而不是矛盾双方的调和。这一点，在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十分明显。其他的领域也都是如此。就拿社会主义社会中先进和落后的斗争来说，斗争的结果也不是矛盾双方的调和，而是先进克服落后、落后赶上先进。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新老修正主义者竭力鼓吹“阶级调和”、“阶级合作”，硬说“阶级合作”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谬论就是要取消阶级斗争，让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长期保存下去。

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否认矛盾、否认斗争的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庸俗进化论的观点。革命者要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就必须与一切阻挡世界前进的反动派、保守派、习惯势力进行斗

争。必须经过斗争，才能打倒旧的、建立新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8页）因此，我们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揭露矛盾，认识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坚决站在新生事物的方面和旧事物进行斗争，以促进矛盾的转化。

"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10页）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不可分割的。无论是离开斗争性来谈同一性，或离开同一性来谈斗争性，都是错误的。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是：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同一性中包含着斗争性。这是学习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时必须特别注意的重要原理。

如前所述，在客观世界中，矛盾双方的互相依赖和互相转化，都是有条件的。没有一定的条件，就不能互相依赖和互相转化。一切矛盾的同一性，又都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当统一体通过斗争发展到了某一限度，出现了新的条件时，就必然引起统一体的破裂、分解，而出现适应新条件的新统一体。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但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统一体是要破裂的，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的阶级地位是要转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是要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的。可见，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是相对的。同一性所以是相对的，还因为它是矛盾的同一、对立的同一；不包含矛盾、对立的绝对同一，在客观世界上是没有的。互相排斥的对立面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为同一。因此，对立的同一性总是相对的。

矛盾的斗争是无所不在的。它存在于一切过程之中，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促使事物由旧的过程向新的过程转化。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20页）因此，无论事物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还是处于显著变动的状态，无论是在矛盾双方共处于统一体中的时候，还是统一体破裂、分解的时候，都存在着矛盾的斗争。只有通过斗争，矛盾才可获得解决。只要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存在着斗争。在它们共同反对封建主义的时期，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和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它们之间都存在着矛盾的斗争。从这里可以看出，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毛泽东同志说：“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同上书，第321页）

对立统一的规律是客观世界的规律，又是认识的规律。列宁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谈谈辩证法问题》，载《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7页）我们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都必须应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并且要自始至终贯彻这种方法。

毛泽东同志把分析矛盾的方法通俗地归结为“两点论”，就是说要分析事物内部矛盾的双方，既要看这一方面，又要看那一方面，并且要分析其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是怎样又斗争、又同一的，它们是在怎样斗争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同一的、怎样同一的。这样，我们才能认清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

毛泽东同志分析帝国主义时说：“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0页）他指出：从战术的观点看来，帝国主义是真老虎，就是说它还有力量，还在张牙舞爪地吃人；从战略的观点看来，从长远的观点看来，它又是纸老虎，它并没有什么可怕，它正在走向死亡。因此，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就要一方面在战略上藐视它，另一方面在战术上重视它。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也是对立的统一，两者是相反相成的。没有战略上的藐视，就会不敢同帝国主义作斗争，那也就无所谓战术上的重视；没有战术上的重视，就不能用正确的方法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以取得胜利，也就不能真正有战略上的藐视。

国民经济的平衡和不平衡，也是对立的统一。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各经济部门之间保持相对的平衡，只有各经济部门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国民经济才能正常地顺利地发展。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必然打破旧的相对平衡，出现新的矛盾。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工作，就是研究新出现的矛盾或矛盾的新的发展状况，加以调整，建立新的、更高一级的相对平衡。因此，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我们要看到平衡的一方面，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又要看到平衡不断地

为矛盾的斗争所打破，必须及时地加以调整以达到新的平衡。

国民经济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它包含着许多矛盾，例如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和消费，等等。这些矛盾的双方都是又斗争、又统一。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恰当地处理这些矛盾，使它们互相促进、互为发展的条件。这就要具体研究矛盾着的各个方面之间的斗争性和统一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是处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矛盾的正确方针，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保证了国民经济发展在战略上的平衡，在这个方针指导之下去具体研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状况，就能正确地安排生产。

## 六、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矛盾斗争的形式决定于矛盾的性质及其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矛盾的性质决定了矛盾斗争的基本形式，而在不同的条件下，这种基本的形式又有具体的差别。我们必须懂得各种不同的矛盾斗争形式的区别，才能采取适当的方法，正确地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矛盾斗争的各种形式中，区分对抗和非对抗这两种基本形式，特别重要。

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基本形式。在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去解决的矛盾，都是对抗性的矛盾。如炸弹爆炸、火山爆发等等。在社会生活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矛盾，奴隶和奴隶主、农民和地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阶级利益根本对立基础上的矛盾，这是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必然要表现为外部冲突的对抗，发展为革命。

非对抗是矛盾斗争的另一种基本形式。在社会生活中，非对抗性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这种矛盾或者是由于非根本性质的利害关系而引起的，或者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分歧而引起的。这种矛盾不必通过外部冲突的形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说来，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包括某些剥削阶级。毛泽东同志说："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7 页）

区分矛盾的性质及其斗争的形式，对于正确地处理矛盾、解决矛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同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一般说来，对抗性的矛盾只能通过对抗的斗争形式来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则必须用非对抗的斗争形式来解决。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那种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它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必须通过剧烈的阶级斗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既存在着敌我矛盾，也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对于敌我矛盾，必须采取专政的办法，即打击、孤立、分化、惩办和镇压的办法加以解决。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必须采取民主的方法，即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加以解决，也就是采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

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如果看不到敌我矛盾，把敌我矛盾看成人民内部矛盾，或者看不到人民内部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都是极端错误的。

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故意混淆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矛盾。一方面，他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矛盾说成是非对抗性矛盾，鼓吹阶级合作、放弃革命，认为用不着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们硬说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人民之间存在着某种对抗性矛盾，叫嚣必须“纠正”什么“国家极权主义制度”才能解决这种矛盾。这种颠倒黑白的诡辩论的反动性就在于，彻头彻尾地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帝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阴谋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罪恶活动鸣锣开道。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条件，就不可能转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城乡矛盾、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才会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相反，在某种情况下，非对抗性矛盾也可能依一定的条件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由于人民革命力量的强大和革命政党执行正确的政策，有可能引起敌人内部的分化，其中一部分人转到人民方面来。这部分敌人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就逐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相反，人民内部某种矛盾，如果由于处理不当或者其他原因，矛盾的一方转到敌人方面，也会转化为敌我矛盾。懂得这种矛盾转化的情形非常重要。如果矛盾转化了，我们处理矛盾的方法也必须随之而转化，否则也要犯错误。

总之，区别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采取适当的方法处理这些矛盾，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把矛盾性质弄清楚了，就能认清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就能够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 第五章　质量互变规律

事物由于其自身的内在矛盾，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事物的发展和向对立面的转化，表现为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质量互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

## 一、质　和　量

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没有一定的质和一定的量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质是事物内部所固有的一种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决定一事物是这一事物而不是别的事物，把它和其他事物区别开来。世界上的事物之所以形形色色、千差万别，就是因为它们各有自己特殊的质的规定性。事物的属性是事物的质的表现，是在一事物和他事物发生联系时表现出来的质。

具体的事物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这就使事物具有多方面的质。人们不可能同时把握某一事物所具有的全部的质。在科学研究中，人们总是对同一个对象从不同的侧面进行研究，也就是研究这个对象的不同方面的质。例如对于人，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他的社会的质，医学和生理学研究的

是他的生理的质。

人们在研究事物的质时，应当根据客观的实际状况和实践的需要，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根本的质和非根本的质。例如，从人不同于动物的质来观察，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是人的社会的质，其中最根本的表现是：动物不能制造和使用工具，只能消极地适应环境；而人则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积极地改造环境。人的社会本质，在阶级社会里，最根本的是人的阶级性。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之间也有互相区别开来的质，但相对于阶级性说来则是次要的。

同一事物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它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但也有部分的质的区别。例如，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它们具有共同的根本的质即资本主义，但是，垄断资本主义以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它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它是和自由资本主义具有部分的质的区别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现阶段的农村人民公社具有根本的共同的质，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但现阶段的农村人民公社又有它的特殊的质，如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政社合一等等就是特殊的质的表现，这是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区别开来的部分的质，它较之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个更高的阶段。

对于事物的多方面的质，要做具体分析，不要在看到这一面时否认另一面；不要把根本的质和部分的质，把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同起来。

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决定于事物自己内部矛盾的特殊性。事物的根本的质就是由事物内部的根本矛盾决定的。事物的根本矛盾，不到过程的完结即变为另外的事物，是不能解决的，所以它的根本的质也不会改变。但是，在它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可能有

些矛盾缓和了，有些矛盾激化了，有些矛盾暂时地解决了，有些新的矛盾发生了，所以各个阶段又有部分的质的区别。

认识事物首先是认识事物的质的规定性。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体地分析事物的特殊矛盾。毛泽东同志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0页）因此，为了认识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在分析事物的内部矛盾时，又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还有量的规定性。量是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等等。恩格斯指出，组成物质元素的各种最小粒子在空间排列的不同也表现着量的差异，即它们"所分有的或多或少的运动的量"的差异。（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0页）量和质一样，也是事物自己本身所固有的一种规定性。例如，一座山、一个水库、一个发电站，除了它自己的质的规定性以外，还有它的大小等等量的规定性。某一个社会，除了它特有的质的规定性以外，还有它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速度等等量的规定性。

质的规定性使事物成为它本身这个样子，而不成为另外的样子。质发生变化，就是这个事物变成另一个事物。而量的规定性则不同，同一类事物可以有不同的量，但仍然是性质相同的事物；量的变化，在一定范围内，不会影响质的规定性。例如，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水的温度在0℃到100℃之间的变化，不会改变水的液体状态这种物理的质。

量和质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它们是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质总是具有一定量的质，量也总是一定质的量。数学是研究"纯粹"的量的科学，就是在这种"纯粹"的量中，也存在着质的差

别：有正数和负数，整数和分数，奇数和偶数，等等。量和质是对立的统一：一方面，一定的质决定一定的量，质规定着量的活动范围，不同质的事物具有不同的量和量的界限。这就是说，量是以质为基础的，质制约着量。另一方面，质又以一定的量作为必要的条件，它决定于数量的界限。各种事物的量都有一定的限度，量变超出了这个限度，事物的质就会改变。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质和量的统一，在"度"这个概念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

度是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数量界限，在这个界限以内，量变不会引起质变，超过这个界限，事物就会发生质变。例如，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水的度，就是0℃——100℃，超过这个度就变成冰或汽了。又例如，富农和富裕中农之间也有一个确定的数量界限，富裕中农有轻微的剥削，但是如果其剥削收入超过了一定程度，就不再是富裕中农，而是富农了。在我国条件下，党和人民政府曾规定富裕中农的剥削收入不超过总收入的25%。掌握事物的度，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指出："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43页）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说的"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就是度。认清了事物的度，才不至于混淆不同质的事物，才能够正确掌握质和量的统一，促进事物的发展。

事物在其一定的量的界限内，保持自己的质的相对稳定性，但事物的发展，总是要超出它自己的度，而变成另外的事物，这是

合乎规律的现象。革命者要善于掌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进程，不要主观主义地去超越事物的度。当有了一定的条件的时候，我们就要促进事物超出它原有的度，变成另外的事物，促进客观进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 二、量变和质变

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发展的两种状态。量变是一种逐渐的、不显著的变化，是事物在数量上的增加或减少，而不是根本性质的变革。我们日常看见的统一、相持、平衡、静止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过程中呈现的面貌。质变是根本性质的变化，是事物由一种质的形态向另一种质的形态的突变或飞跃。统一物的分解，相持、平衡、静止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就是事物处在质变过程中呈现的面貌。

事物的运动变化，总是先从量变开始。量的增加或减少，在一定限度内，不引起质的变化，即事物还保持自己的相对稳定性。但是，量的变化一超出这个限度，也就是超出这个关节点，就引起了质的变化，旧质归于消灭，而出现了新的质。这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由质变而产生的新的质，又开始表现了它的相对稳定性。新的质是同新的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在新质的基础上，又开始了新的量变过程。这是由质变到量变的转化。量变引起质变，质变又引起新的量变，由量变到质变和由质变到量变，如此不断地循环往复，构成了事物无限多样的发展过程。

量变和质变的相互转化，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在古代，人们就已经猜测到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例如，《易传·系辞下》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易传·文言》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来者渐矣。”这都包含着由量的积累引起重大变故的思想。

科学研究的成果和人类的社会实践，证明了质量互变规律的普遍性。门得列也夫的元素周期表早就说明，在自然界原子量的变化引起元素的质的变化。现代科学更加精确地断定，原子核电荷数量的变化，引起元素的质变。生物的物种演化，由旧物种到新物种的转化，是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渐进性的进化和突变式的革命变革互相交错的过程。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这时就会引起生产方式的质的根本变革，就会发生社会革命，实现新旧社会制度的更替。人的认识，由肤浅的表面的认识，进到深刻的、规律性的认识，也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

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还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定条件下，由于事物所分有的或多或少运动的量的不同，构成事物的成分在排列次序上发生变化也会引起事物的质变。有机化学可以证明这个原理。例如普通酒精（乙醇）和甲醚，它们每个分子中所包含的都是两个碳原子、六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但是由于这些原子之间排列顺序不同，就形成两种根本不同的化合物：酒精（乙醇）是液体，在78℃时沸腾，能以任何的比例和水混合；而甲醚则是气体，几乎不溶于水，酒精和甲醚的化学性质也很少相像。量变引起质变规律的这一表现形式也存在于社会生活中。例如在战争中，同等数量和素质的军队，由于集中使用或分散使用的不同，引起战斗结果的变化也是常见的事。

在一切事物的发展中，量变是质变的准备，没有一定量的变化，不可能发生质变。量的变化积累起来，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质变。事物的质变，决不是偶然地、无缘无故地出现的，而是经过量变过程有规律地准备起来的。不以量变为前

提，不可能发生质变。恩格斯指出："自然界中一切质的差别，或是基于不同的化学成分，或是基于运动（能量）的不同的量或不同的形式，或是——差不多常常如此——同时基于这两者。所以，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有关的物体的量的变化，要变化它的质是不可能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0 页）

19 世纪法国自然科学家居维叶的"激变论"认为，有机界的变化是由于突然性的灾变所引起的。这种理论是错误的。它实质上是否认事物自身的发展和变化，认为生物本身是不会发生质变的，生物物种的变化只是由于某种神迹创造的一些新物种来代替那些被突然性灾变所消灭的旧物种。

在社会生活中，无政府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认为，举行社会的革命变革，不需要有一个准备时期和积蓄革命力量的过程。他们不愿作艰苦的细致的革命准备工作，而把希望寄托在偶然的、侥幸的事件上。这种观点违反社会和革命的发展规律，在实践中必然碰壁。真正的革命者，不仅要有勇于进行根本变革的革命精神，而且在根本变革的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时，要耐心细致地进行量的准备工作。这样，才能真正促进事物的发展。

量变只是质变的准备，它决不能代替质变。量变、渐进、进化只是事物数量方面的变化，并不是事物性质的变化。只有质变、飞跃、革命才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才是事物由旧质转化为新质的决定环节。旧质限制了量的活动范围，如果不通过质的根本变革，量的变化就不能超出这个限制范围；发生了质变，才能在新质的基础上，开始进一步的量的发展。列宁曾经说过："资本主义自己替自己造成了掘墓人，自己造成了新制度的因素，但是，如

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总的状况，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载《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47页）他又说：“辩证的转化和非辩证的转化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同一）。”（《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4页）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发展，都不是一条不间断的量的渐进线，量的渐进过程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中断，即引起质变、飞跃。事物通过渐进过程的中断，才能实现由旧质到新质，由一事物到另一事物的转化。一个社会形态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化，是通过革命的急剧变革实现的。物体的物理形态和化学形态，由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转化，也是通过根本质变实现的。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变、飞跃、量的渐进过程的中断，事物就不能实现由旧质到新质的转化。因此，否认质变、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就是从根本上否认发展、否认辩证法。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把一切变化都归结为纯粹的量变。例如18世纪法国哲学家鲁宾在《论自然》中说：“石头、槲树、马，不是人，但在它们中间，可以多多少少地看到人的粗形。……在石头和植物中，可以找到同样的生命的主要原则，和在人类机体所找到的一样；一切差别是在于这些形质的组合，在于各种器官的数量、比例、排列和形状。”这种观点实际上否认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死亡。

19世纪下半期以来，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以庸俗进化论的形式和唯物辩证法相对抗。庸俗进化论只承认量变，不承认质变。它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改良主义者总是利用庸俗进化论为其反动的政治观点服务。帝国主义的奴才胡适，否认根本变

革，主张以“进化”来代替革命。他说：“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它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胡适文存》第2集第3卷，第99页）。他在中国人民迫切要求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的时期，一贯地坚决反对革命。修正主义者所贩卖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反动谬论，也是以庸俗进化论为其哲学基础的。因此，坚持质量互变的原理，对于粉碎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量变和质变及其相互转化的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新旧两个方面，当旧的一方居于矛盾主要方面，而新的一方居于非主要方面时，事物的性质暂时不起变化，事物处于量变阶段。矛盾斗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的方面就由矛盾的非主要方面转化为主要方面，它战胜和克服了旧的方面，于是事物就发生根本的质变。例如，液体的水的分子之间，具有向内的凝聚力和向外的热扩散倾向这两个矛盾方面。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水的温度由0℃增长到100℃的过程中，水分子的热能虽逐渐增长，但凝聚力总的说来始终居于支配地位，这时液体只显现温度升高的量的渐变过程。达到了100℃的界限时，水分子的热扩散作用就变为主导的力量，水就迅速地转化为蒸汽。又如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着生产资料和国家机器，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时矛盾的发展处在量变阶段。无产阶级经过长期革命准备，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取得了统治地位以后，就从矛盾的次要方面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时社会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革。

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是量变和质变及其相互转化的根源，所以质量互变的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的表现形态之一。宇宙

间矛盾运动的发展是无穷无尽的，事物循着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量变的途径，实现着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无限上升的发展过程。

## 三、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量变和质变是统一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事物矛盾运动的复杂性，事物的量变和质变不是以纯粹的形态出现，而总是互相交错的。

整个事物发生根本性质的变革之前，它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但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包含有许多部分的质变。这种部分的质变，或者表现为根本性质未变而比较次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或者表现为就全局说来性质未变而其个别部分发生了性质的变化。这种部分的质变，对事物的总的质变来说，是较小范围或较小规模的飞跃。从旧事物到新事物的飞跃，常常要通过许多部分质变才能完成。

毛泽东同志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02页）这就是说，只要事物发展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没有改变，事物仍然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但是，由于上述种种矛盾运

动的复杂情况，事物的某些局部和某些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这种部分质变的发生，使事物发展过程显出阶段性来。

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许多阶段性的部分质变，这是自然界、社会和人类认识发展中的普遍现象。例如蚕的一生，从蚕到蛾是一个总的量变过程，蛾生下来许多蚕卵，最后死了，完成了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但是，在从蚕、到蛹、再到蛾这个总的量变过程中，显然有部分质的变化。因为蚕跟蛹、蛹跟蛾都有若干性质的区别。人从生到死，这是一个总的量变过程，同时也是不断进行部分质变的过程。从童年到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这些阶段的发展，都是部分质变的表现。人死了，就达到根本的质变。事物的根本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社会生活中也是这样。例如，封建社会在其向资本主义社会飞跃以前，是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在这个总的量变过程中，由劳役地租到实物地租的转化、再到货币地租的转化，都表现出阶段性的部分质变。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这样，由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从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也是通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质变而完成的根本质变。我国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在集体所有制的根本性质上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从合作社的所有制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也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也是集体所有制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今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公社将经过若干阶段性的变化、若干部分质变，而从现阶段的三级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由于事物内部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所以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还常常表现为全局性质未变，而某些个别部分发生性质变化。由于我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在我国的民主革命中，总的量变过程中个别部分发生性质变化的情形表现得非常明显。中国人民在全国范围取得政权、消灭蒋介石以前，从全局说来是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还没有发生根本的质变。但是在这个总的量变过程中，我党却在农村建立了许多块革命根据地，并不断地加以巩固和扩大。在革命根据地内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实行了土地改革，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这和国民党统治区域里的革命力量增长的情形是不同的，因为在这里发生了社会性质的根本变化。虽然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政权不能不受着全局的制约，它和 1949 年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有着性质的不同。这是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这种部分质变，对于促进全局的质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的民主革命就是由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一个一个地夺取阵地，然后夺取了全国胜利的。

在自然界也有全局性质未变而个别部分发生质变的现象。例如，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水由 0℃到 100℃，是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达到 100℃时，水才大量地迅速地转化为蒸汽，形成根本的质变；在这以前，也有部分分子由于获得的能量较大，突破了它们同其他分子之间的凝聚力的束缚，首先汽化，这也是个别部分的质变。

部分质变对于事物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部分质变促进总的量变，并为整个事物的根本质变创造条件。当然，部分质变本身也必须有量的准备，只有量的准备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引起部

分质变。

应当指出，不能把事物的部分性质的变化当做根本质变，否则，就会犯严重的错误。前边我们指出，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是一种部分质变，看不到这一点是错误的。但是这个变化并不是像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的变化，因为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地位，丝毫也没有变化，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并没有变化。

不仅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而且质变过程中也有量的扩张。质变本身，虽然在原则上决不是量变，但在质变过程中也有量变，即：新的质大量增长，在较短的时间之内迅速地占领广阔的地盘，代替旧的质而取得支配地位。这个过程就是质变中量的扩张的过程。例如，1955 年我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是全国农村从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根本质变，这个高潮一经到来，农业合作社就在全国各地一大批一大批地连续不断地出现，这就是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张。

综上所述，事物由于自己内部的矛盾运动，表现为量变和质变两种状态。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又转化为量变；在量变中有部分质变，在质变中有量的扩张；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的基本内容。

## 四、飞跃形式的多样性

任何事物由一种质变为另一种质，都是通过飞跃即量的渐进过程的中断来实现的；但是，飞跃的形式却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多样的。恩格斯指出了飞跃的多样性，他说，质变在每一个别场合都是以严格地确定的方式进行的（参阅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0 页）。这是因为事物的内部矛盾及其外部条

件，都具有特殊性的缘故。事物内部矛盾的特殊性及其外部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必然采取某种特定的飞跃形式。

自然界的飞跃和社会生活中的飞跃是有区别的。自然界的飞跃是客观规律自发地起作用的结果，而社会生活中的飞跃，是通过有意识的人的活动实现的。

阶级社会里的飞跃和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飞跃，又具有不同的形式。阶级社会由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飞跃，所要解决的矛盾是互相敌对的阶级和集团之间的矛盾，而阻碍飞跃的反动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它拼命利用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压迫和绞杀推动社会前进的进步力量。因此，这里的飞跃，便表现为剧烈的阶级冲突，表现为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摧毁旧生产关系、建立新生产关系的革命。在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飞跃所要解决的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这里没有根本利益互相敌对的阶级矛盾，而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掌握在劳动人民手里。因此，这里的飞跃，不是表现为阶级冲突，不是表现为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不是消灭公有制；而是表现为有计划地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改变过时的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部分或方面，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提高到新的阶段，这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自上而下的领导和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相结合来实现的。但这也是规模极广阔和性质极深刻的飞跃，例如将来有了条件时农民的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飞跃，由社会主义制度到共产主义制度的飞跃。这种变革也是社会革命，不过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社会里的革命罢了。

自然界的飞跃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中的飞跃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自然界和社会的飞跃有的采取爆发的形式，有的

采取非爆发的形式。

爆发式的飞跃，通常是解决对抗性矛盾的质变形式。它是新事物通过和旧事物的剧烈的外部冲突，战胜旧事物的根本质变。自然现象中的火山爆发，热核反应等，都是爆发式的飞跃。在阶级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的解决一般地表现为爆发式的飞跃。

非爆发式的飞跃，通常是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质变形式。在这种飞跃形式下，旧事物向新事物转化时不发生剧烈的外部冲突。类人猿变为人是一个相当长期的没有外部冲突的飞跃过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而不采取外部冲突的解决办法。

实际生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这种矛盾的解决，不需要采取爆发的方式。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通常是要采取爆发式的飞跃形式。但是在我国工人阶级专政的具体条件下，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改造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可见，飞跃的形式是可以随着事物矛盾性质的转变而变化的。由于矛盾的复杂性，还往往有这种情形：一个总的飞跃过程是爆发式的，但并不排斥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个别的非爆发式的飞跃；一个总的飞跃过程是非爆发式的，但其中也可能出现个别的、部分的爆发式的飞跃。

飞跃在时间上的持续，也有种种不同的情形。飞跃和进化相比无疑是一种迅速、急剧的变化形式。爆发式的飞跃固然是这样，非爆发式的飞跃也是这样。但各种事物的飞跃时间的长短却是不同的。某种飞跃时间的长短决定于它的质变过程的特点和条件。有些飞跃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而另一些飞跃则需要相当

长的时间。列宁批评了那些认为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生活和苏维埃民主制的任务可以一下子解决的人，指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飞跃，往往包括十年或更多的年代。

事物的内部矛盾都具有特殊性，它们和外部条件的联系又是复杂的。我们对飞跃形式，必须采取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方法，不能千篇一律地看待，不能把一种飞跃形式当做一切事物的飞跃形式。在实际斗争中，认清特定事物的飞跃形式，对于促进事物的质变具有重大的意义。

虽然飞跃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无论何种形式的飞跃都是质变，都是旧东西的死亡和新东西的产生，都是革命性的变革过程。恩格斯指出，事物“从一种运动形式进到另一种运动形式的转变永远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的改变”（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67 页）。我们既要看到飞跃形式的多样性，又要在飞跃形式的多样性中把握它们的共同本质。这样才能坚持彻底革命的路线，根据客观事物固有的飞跃形式，采取适当的方法，促进事物的革命变革。

* * *

质量互变的规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这个原理的理论基础之一。量变质变的互相转化，反映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总的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的原理，进一步反映了不仅在新旧事物之间，而且在同一事物、同一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之间，都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革命也是如此，革命是不断的，又是分阶段的。不能脱离革命发展阶段论来孤立地对待不断革命论，也不能脱离不断革命论来孤立地对待革命发展阶段论，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是统一的。毛泽东同志总是教导我们，不要超越客观事物固有

的阶段性，把下一阶段才能做到的事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但又要在上一阶段给下一阶段作适当的准备，并且在发生根本质变、全局质变或者部分质变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就抓住时机，采取符合客观事物固有的飞跃形式的恰当方法，把革命推进到新的阶段，使前一阶段和下一阶段衔接起来。

# 第六章 否定之否定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进一步揭示了事物由于内部矛盾的斗争而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的规律，揭示了旧事物灭亡和新事物产生的规律，并且说明了事物发展过程的螺旋式、波浪式前进上升的性质。

## 一、辩证的否定是发展的环节

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肯定的方面是事物保持其存在的方面，而否定的方面则是促使它灭亡的方面。这两个方面作为两种对立的力量互相斗争着。这样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否定的方面战胜了肯定的方面，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就使事物转化到自己的对立面，这就是事物的否定。因此，否定就是一事物向他事物的转化，就是旧质向新质的飞跃。引起否定的根本原因是事物内部的矛盾。

任何事物都具有内部矛盾，因此任何事物都是要被否定的，都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的。《淮南子·原道训》中曾写道：“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王船山说：“乱极而治。”（《思问录·外篇》）这都是朴素地说明了事物会否定自己走到它的反面的辩证法的观点。一切事物在它产生之时，已经孕

育了否定自己的因素。新事物对于旧事物的否定，就是事物内部这种否定的因素发展的结果，而不是起因于某种外力的作用。外部的条件总是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起作用的。辩证的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例如在植物的正常发展中，种子总是要被植物所否定的，这种否定是种子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又如在社会领域中，一个社会形态为另一个社会形态所否定，这种否定是前一个社会形态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任何东西的灭亡都是转化为另外一种事物，而不能化为绝对的无。辩证法的否定决不是简单地宣布没有。数学上的“零”是对任何定量的否定，但从辩证的观点来看，它具有丰富的内容。恩格斯指出：“作为一切正数和负数之间的界限，作为能够既不是正又不是负的惟一真正的中性数，零不只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数，而且它本身比其他一切被它所限定的数都更重要。事实上，零比其他一切数都有更丰富的内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9页）

否定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环节，不否定旧事物，就没有新事物的产生。任何现实存在的东西，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因此对它所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来说，有它存在的理由，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它就会逐渐丧失其存在的理由，变成了阻碍发展的消极的东西，只有经过否定，新东西代替了旧东西，事物才能继续向前发展。在生物界的发展中，一个物种转变为新物种时，该物种的某些特征消失了。这些旧特征在原有条件下，有维持生物生存和繁殖的积极作用。当条件变化以后，它们就成为消极的方面，使生物不能适应于新的条件，它们必然要被适应于新条件的新特征所否定。一种生产关系在一定的时候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

用，等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这种生产关系就变成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消极东西，它就要被否定，为另一种适应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

新事物是对于旧事物的否定，因此，它和旧事物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是一切新事物又都是从旧事物的内部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和旧事物之间又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和旧事物没有任何联系的新事物是没有的。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是指对旧事物的质的根本否定，但并不是把旧事物内部的一切因素全盘抛弃。辩证的否定不是简单地抛弃，而是扬弃，是既克服又保留，克服旧事物，保留以往发展中对新事物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并把它发展到新的阶段。正如质变的形式是多样的一样，否定的形式也是多样的。以社会生活为例，资本主义社会否定封建社会是一种否定形式，社会主义社会否定资本主义社会是另一种否定形式。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在封建社会腹内孕育成熟。在资本主义社会否定封建社会的时候，对封建社会的制度、传统保留得很多，例如在法律方面往往“把旧的封建法权形式的很大一部分保存起来，而在这种形式中加进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在封建的名称下干脆偷偷地换上资产阶级的意义”（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3 页）。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剥削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产生。社会主义社会在否定资本主义社会时，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都同资本主义社会实行彻底的决裂。但就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仍然保留了并改造了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以往社会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一切积极成果。可见，虽然否定的形式是多样的，但是不论哪一种形式的否定都是既克服

又保留。

形而上学的否定观则与辩证的否定观根本不同,在它看来,否定就是简单抛弃、一笔勾销,其中没有任何的保留和继承。例如,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哲学就是采取形而上学的否定,当他否定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时,连同他的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也不加分析地一并抛弃了,这就好像倒洗澡水时,连盆里的婴孩也一起倒掉一样。恩格斯批判了这种简单的否定,他说:“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干脆把它抛弃了。但是宣布这个哲学是错误的,还不等于制服了这一哲学。像这样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是决不能靠简单地置之不理的办法就可以排除的。应该从黑格尔哲学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用批判方法消灭它的形式,而救出它所获得的新的内容。”(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页)马克思、恩格斯在否定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时,同时救出了它的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在否定费尔巴哈哲学的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时,又继承了他的唯物主义。只有辩证地否定,才能把哲学唯物主义推向新的阶段。

当旧事物被新事物否定时,渐进过程中断了,新旧事物之间有一条确定的界线,这就是发展中的非连续性;同时,旧事物的否定又是该事物的渐进过程发展的结果,它表现着新旧事物之间的一定联系,表现着发展中的连续性。否定就是这种非连续性和连续性的辩证统一,它既是从旧事物向新事物变革的环节,又是新旧事物联系的环节。

辩证的否定的原理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由于否定是既克服又保留,所以我们对待一切旧事物的态度,就应该是一方面同它彻底决裂,另一方面从其中吸取一切可以吸取的东西,加以革命

地改造。例如对待文化遗产就应该采取这种态度。我们要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首先必须和过去时代的旧文化决裂。因为社会主义的文化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它不能搬用奴隶制社会的文化、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但是社会主义文化在同旧文化实行决裂的同时，又必须利用以往一切时代的文化中的积极成果。因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并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如果脱离了过去时代积累起来的思想资料，它就无从建设和发展起来。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青年团的任务》，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4页）毛泽东同志在谈到继承我国的历史遗产的必要性时曾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2页）他又指出，在继承以往的文化遗产时，"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必须有区别有批判地继承，必须把过去的文化"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排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历史上每一种新的文化在实质上都不可能是对过去文化的全盘继承，也不可能是对过去文化的全盘抛弃。至于批判什么，吸收什么，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阶级，都有自己的标准。

既然批判和继承是辩证的统一，因此必须反对两种错误的思想：一种是肯定一切，另一种是否定一切。肯定一切的错误在于它根本否认了事物的发展，抹煞了新事物和旧事物之间的界限，只

要继承，不要变革。在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上，复古主义、国粹主义就是属于这种错误。持这种观点的人，抱残守阙，拾古人的余唾，对于封建性的糟粕大加颂扬，企图以此来抵制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的发展。否定一切的错误在于割裂了新旧事物之间的历史联系，只看到变革，看不到继承。对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就是属于这种错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认为一切以往的文化遗产都是糟粕，无产阶级必须完全抛弃它，在空地上建立社会主义的文化。这种观点表面上看起来很“革命”，但是如果真的按照这种观点办事，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就根本无法进行，因而实际上就是取消了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这种观点被列宁彻底粉碎。我国医学界曾经出现一种错误观点，对于我们祖先在长期和疾病作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十分丰富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极端蔑视，这也是一种虚无主义观点。这种观点遭到了党的驳斥。

## 二、否定之否定，发展的螺旋式或波浪式运动

事物的发展总是由肯定阶段走向否定阶段的。一般地说，在事物发展的总过程中，经过两次否定，由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事物的运动就表现为一个周期。否定之否定阶段是事物发展两次向对立方面转化的结果，这使它在外表上会重复肯定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用列宁的话来说，“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9页）。但它在实质上是和旧东西根本不同的、更高级的新东西。《易经·爻辞》中讲：“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易经》经上《泰

卦》）老子说："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这都包含着事物经过否定而达到周期性变化的思想。但这些思想都没有得出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爻辞"中的"复"，老子的"返"，都带有循环论的倾向。

否定之否定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地质学证明了地质的发展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旧地层不断破坏和新地层不断形成的过程。原始地壳，经过海洋、气象及风化等等的作用而碎裂，这是第一次否定。这些碎裂的物体，一层层淤积在海底，由于海水的高压又形成了新的岩层，这就是否定之否定。有些地方海底高出海面，于是又使这种最初的冲积层的一定部分，再次经受雨水、四季变化的温度、大气中的氧和碳酸等的作用，从地心冲破地层爆发出来而后冷却凝结的熔岩，也经受同样的作用。这样，在亿万年间大部分旧地层不断破坏，不断地形成新地层。这是一系列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积极结果，就形成了由复杂的化学元素所构成的、适宜植物成长的土壤。

在生物的生长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的作用。例如，麦子的生长就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麦粒被由它生长起来的植物所否定，经过出苗、拔节、开花、结实，最后又产生麦粒，麦粒一成熟，麦秆儿即形枯萎，它又被否定。又如蚕的生长也要经过一个从蚕卵到蚕又到蚕卵的过程，蚕否定了蚕卵，新的蚕卵又否定了蚕。在否定之否定阶段所出现的麦粒或蚕卵已不是肯定阶段的麦粒或蚕卵，在数量方面也多出很多倍。如果经过人工的培育，在品种方面还会大大地改进。

在社会领域中，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的作用也是普遍的。例如在原始社会时，生产资料是公有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个体生产能力的提高，就产生了占有的社会公共性质和生产的个体性质

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原始的公有制走向自己的反面，为私有制所否定，进入了阶级社会。在私有制内部，随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公共性质逐步加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社会公共性质得到高度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形成了严重的冲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又走到了它的反面，被公有制所否定。这种公有制不是原始的公有制，而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为原始公有制所不可比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公有制。这时，所有制的性质和生产过程的性质之间的矛盾得到了根本的解决，开始了社会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又如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不可能出现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是原始地结合着的，这种情形使得脑力劳动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到了阶级社会，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这是对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原始结合的否定。这种分工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它又摧残着绝大多数体力劳动者的精神才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消灭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但在长时期内还存在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各个社会成员的智力和体力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新的基础上得到了结合，这时，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矛盾才得到根本解决。这是否定之否定。

在人类思维的发展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作用，从哲学的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包括对整体的认识和对部分的认识，只有在对部分的认识的基础上，对整体的认识才可能是清晰的、深刻的；只有在对整体认识的基础上，对部分的认识才可能是全面的、正确的。这种矛盾的展开和解决，就形成了古代朴素辩证法到形而上学，再到科学的

唯物辩证法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古代的朴素的辩证法初步地反映了客观世界各种现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般状况。它在整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局部上显得十分简单粗糙，因此它对于整体的认识也是笼统的和模糊的，不足以帮助人们认清复杂的客观现象，它终于要为形而上学所否定。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虽然注意了对自然界的各个个别部分的研究，注意到了个别部分的现状，但是却割断了这个部分同其他部分的联系以及它自身的历史联系，它在局部上虽然是比较深入的，然而在整体上却是错误的。它终于又被科学的唯物辩证法所否定。只有科学的唯物辩证法才提供了对世界的整体认识和部分认识的统一的方法论。

相对于对立统一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来说，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作用要在一个较长的过程中，即事物运动完成一个周期才能显现出来。我们只有考察完一个运动周期，并且在考察这种运动周期时，对于推动这个运动的事物内部矛盾的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把握了这个过程的具体特点，才能揭示出否定之否定这一规律的作用。把否定之否定当做一个现成的公式到处乱套，是错误的。

事物的发展所呈现的周期性，并不像循环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单纯的循环运动，而是一个前进上升运动。循环论的根本错误在于把一切事物看成是简单的周而复始，实质上否认了事物的发展。例如，战国末年的驺衍把朴素的唯物主义的五行学说加以曲解，附会到社会历史的发展上去，创立了所谓“五德终始”说，即把朝代的变换看成是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把历史看成是绝对的循环，没有发展，没有进步。这是一种历史循环论。现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也有人主张历史循环论，这种理论宣扬人类必将退回到以前的时代，并且提出“回到中世纪去”，“回到原始时代去”等反动口号，它是资产阶级对

于自己即将灭亡的命运的恐惧和绝望的反映。一切循环论，无论是古代的或是现代的，虽然所代表的阶级不同，但都是片面地抓住了事物发展中的某些重复现象，夸大了这些现象，把它说成是绝对的循环，并且认为这种绝对的循环是一切事物的正常秩序。

和循环论根本不同，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在其发展的周期中虽然有某些特征、特性重复出现，但是这种重复决不同于循环。第一，它仅仅是在某些特征、特性方面的重复出现，仅仅是“仿佛向旧东西的回复”；第二，它是在更高的基础上的重复，决不能用事物发展周期中的某些重复现象来抹煞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的质的差别。否定之否定阶段不是简单地回到肯定阶段，而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了肯定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上升运动。

否定之否定规律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不断地前进上升的运动，但它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螺旋式的、波浪式的前进上升运动。这个运动的总的趋势是向上的、向前的，但是这个运动的上升道路和前进道路又是迂回曲折的。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前进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把事物的发展看成是直线式的，否认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复杂性，是错误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盲动主义，从思想方法上看，就是犯了直线性观点的错误。“左”倾机会主义者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拒绝作艰苦的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的工作，拒绝采取用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曲折的、然而是惟一正确的路线，却要发动攻打中心城市，致使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损失。在“左”倾机会主义者领导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中，拒绝采用主动退却、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灵活的战略战术，

而采取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和敌人硬拚的方针，致使革命根据地大部分丢失。“左”倾机会主义者反对战略退却的理由是退却会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毛泽东同志说：“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05—206页）直线性的观点对于革命的危害是很大的。这种观点的错误就在于，不懂得根据事物发展进程的必然的曲折性来有效地推动事物前进。

事物发展的总的趋势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上升运动、前进运动，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条件下，也会出现某种局部的、暂时的倒退现象。列宁曾经说过：“……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也是不正确的。”（《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载《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3页）事物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所出现的倒退现象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因而是相对的，而事物的上升运动、前进运动则是绝对的。

唯物辩证法关于否定之否定的原理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前进趋势和迂回曲折的途径，它是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例如德国的杜林、俄国的米海洛夫斯基歪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硬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就是黑格尔的三段式的应用，这是完全错误的。黑格尔把否定之否定当做制造其唯心主义哲学体

系的主要杠杆。他把一切事物都硬塞到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式的框框里，常常闹到牵强附会的程度。在黑格尔那里，否定之否定阶段即所谓合题被了解为矛盾的调和。黑格尔虽然是第一个猜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哲学家，并且利用了他当时所能掌握到的丰富知识来证明这个辩证规律，但他使这个规律受到了唯心主义的严重歪曲。正如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黑格尔的错误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硬加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面，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从这里就产生出整个牵强的并且常常是可怕的构造：世界，不管它愿意与否，必须符合于一种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自身不过是人类思维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9 页）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关于否定之否定的原理和黑格尔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它不是从外面强加于事物的某种先验的公式。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普遍规律，它的表现形式和唯物辩证法的其他规律一样，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只能把它当做研究的指南，而不能把它当做证明的工具。

唯物辩证法关于否定之否定的原理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既然事物的发展无论如何迂回曲折，但总的方向是不断前进的，因此，一个革命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不为复杂的现象所迷惑，不为暂时的困难所吓倒，始终认清前进的方向和革命的目标，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既然事物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螺旋式、波浪式的，因此，一个革命者又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客观发展中的各种复杂情况和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各种障碍，进行充分的估计和认真的分析，随时采取机动灵活的方法，循着曲折的道路不断前进。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一方面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总的

趋势。……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另一方面又指出：“……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关于重庆谈判》，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61—1162页）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把最坚定、最彻底的革命精神和最巧妙、最灵活的斗争艺术结合起来，所以才能在任何曲折复杂的环境中，引导全国人民绕过一切暗礁，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 三、新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一切事物都是暂时的、变动的。整个世界是一个川流不息、万古常青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旧的事物不断死亡，新的事物不断出现，反复地进行着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革命的、批判的学说。它“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消灭的理解；它对于每一个生成了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流中，就它的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二版跋”，第18页）。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之后，最终必然死亡而为新事物所代替。

所谓新生事物，就是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进步的必然向前发展的具有远大前途的东西，而旧事物则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正在日趋灭亡的和逐渐丧失其存在必然性的东西。识别一个事物是不

是新事物，不能只以出现时间的先后为根据。新出现的东西并不都是新事物。如在某一生物物种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性状，这些性状并不一定都是新生事物，都具有发展的必然性；只有那些适应于周围环境的、具有发展前途的性状才是真正的新生事物，只有它们才能经过自然选择或人工选择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那些不适应于环境的性状，没有发展的必然性，它们在自然选择或人工选择中会逐步地被淘汰。在社会发展中只有同生产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新兴阶级和社会集团才是不可克服的新生力量。凡是同新兴阶级相联系、代表新兴阶级利益的事物才是真正的新事物。反动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也常常采用一些新办法，玩弄一些新花样，如反动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法西斯化，新殖民主义，在哲学上的种种新流派，在艺术上的抽象派绘画、摇摆舞、电子音乐甚至“无声音乐”等等。这些“新”东西都是腐朽的旧事物的新表现，它们生根于腐朽的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消灭，它们也将随之或迟或早地灭亡。

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由小到大，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因此，新事物在最初的时候，总是比较弱小，而旧事物则往往比较强大。然而历史的逻辑却永远是：暂时显得弱小的、代表进步方面的新事物，战胜那些表面强大的、代表保守方面的、趋向灭亡的旧事物。斯大林说：“生活中新产生的、一天天成长的东西是不可克服的，要阻止它的前进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例如无产阶级，既然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生活中产生并且一天天成长起来，那么不管它今天怎样弱，怎样小，归根到底是会胜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成长、壮大、前进。反之，生活中衰老的、走向坟墓的东西是必遭失败的，哪怕它今天还显得是一个强壮的力量。这就

是说，例如资产阶级，既然它在逐渐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后倒退，那么不管它今天还怎样强，怎样大，归根到底是必遭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腐朽、削弱、衰老而成为生活中的累赘。”（《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载《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75页）

新事物的不可战胜性，是由客观发展过程的规律性和新事物的本质所决定的。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新事物的产生总是适应着客观发展的需要，因此，一切新事物虽然在其初出现时暂时还弱小，却有着广阔的发展余地和光明的未来。相反，旧事物则由于其日益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丧失了其存在的必然性。新事物是在旧事物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如前所述，它否定了旧事物中一切消极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吸取、继承并发展了旧事物中一切积极的因素，并且加进了一些为旧事物所不能容纳的丰富的、富有生命力的新内容。因而它具有旧事物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正因为上述这些原因，新事物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正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成语以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所形容的那样。在社会领域中，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新事物代表历史发展中的进步力量，它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总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新事物在其成长过程中总是要遇到衰亡着的旧事物的抵抗，因此，任何新事物的成长，都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一定的时期内，新事物可能遭到暂时的挫折和失败，但是不管它如何受挫折，遭失败，最后胜利总是属于它的。在社会领域中先进的阶

级常常遭到反动阶级的镇压，它在一定时期内的斗争常常失败，但是对于先进阶级来说，失败是胜利的先导。相反，旧事物不管它如何反抗、垂死挣扎，却最终不能逃避灭亡的命运。它每经一次失败，就越接近于死亡。毛泽东同志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深刻地指出了人民和反动派两种根本相反的逻辑。他说："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490—1491 页）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人民的逻辑和反动派的逻辑适用于一切新事物和旧事物。历史上第一次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尝试的巴黎公社，虽然遭到了外国资本主义和法国资产阶级的联合镇压，但是巴黎公社的旗子却并没有倒下去，而且永远不会倒。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经过多次起义失败，但终于在 1917 年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史，就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历史。反动派曾经猖獗一时，不可一世，但最终失败的不是人民，而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新事物总是要通过同旧事物的斗争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的国家，对于新事物始终采取无微不至的关怀的态度，这就为新生事物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仍然会存在着新和旧、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因此，新事物仍然必须同旧事物进行斗

争，才能得到发展。毛泽东同志说："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6 页）实践表明，无论在社会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建设中，新事物只有战胜了旧势力、旧意识的阻碍，才能得到健康的、迅速的发展。

唯物辩证法关于新生事物不可战胜的原理，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乐观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是无产阶级革命坚定性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最集中的代表和体现者。在一百多年以前，当国际无产阶级力量还很弱小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宣告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他们说："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头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504 页）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十年过程中，一贯彻底地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信心教育了和鼓舞了干部和群众。他最善于发现并热情支持在群众中涌现的一切新事物。例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河北省安平县的一个只有六户的小合作社，曾经出现了三户贫农不顾其他三户老中农的中途退社，把合作社的组织坚决保留下来的事例。毛泽东同志热情地支持了三户贫农的这一做法，并且指出，"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1 页）

新事物在初产生时总是比较弱小的，我们要善于鉴别新事物，在它萌芽的时候就发现它。新事物在刚出现的时候总会有若干缺点，我们绝不应该对它的某些缺点采取讥笑、挑剔、非难的态度，而应该细心地帮助它克服缺点，热情地关怀它和扶植它。当然对新生事物的扶植应该根据客观条件和它的发展规律，而不要采取拔苗助长的态度。对新事物始终保持锐敏的感觉和热情关怀、细心扶植的态度是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列宁说："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相当时期内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的幼芽软弱，抱着轻浮的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护'这些柔弱的幼芽。"（《伟大的创举》，载《列宁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87 页）

# 第七章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范畴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科学的各部门都有自己特有的一系列的基本范畴，如经济学有商品、价值、货币等范畴。哲学范畴是反映整个客观世界的一些最普遍的本质的概念。

一切唯心主义者都否认范畴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唯心主义者认为范畴先于自然界而存在，是客观事物的本源。主观唯心主义者把范畴看做纯主观的东西，是用来整理紊乱的自然现象的工具，在他们看来，自然现象本身是没有规律的。

哲学范畴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一经产生，反过来又指导人类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一定的范畴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一定阶段。范畴的不断丰富和日益精确，意味着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逐步深入和改造世界能力的逐步提高。

唯物辩证法的范畴是客观事物之间最普遍的辩证关系的反映，是辩证思维的逻辑形式。前面已经讲过的对立和统一、质变和量变、肯定和否定等范畴都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此外还有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等各对范畴，它们是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补充。其中每一对范畴都是对立的统一，它们各自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客观世界的联系和矛盾。

## 一、本质和现象

本质和现象是客观发展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性质及此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本质决定于事物的内在矛盾，是事物的比较深刻、比较稳定的方面。毛泽东同志指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7页）帝国主义的本质，是由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规定的。在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以前（这个矛盾的解决只能意味着帝国主义的消灭），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本质和规律性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列宁说："规律就是关系"，就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1页）。因此，认清了事物的本质，就能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只有揭露了我们

的时代的基本矛盾、本质，才能掌握住时代的发展的规律。

现象是指直接被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的事物的外表形态。现象是事物的本质在各方面的外部表现。事物的本质通过无数现象从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如帝国主义对殖民地附属国的侵略、掠夺的本质，既在政治方面表现出来，又在经济或文化方面表现出来；有时用战争的方式出现，有时又用和平的方式出现。帝国主义者有时赤裸裸地摆出凶残的面孔来镇压殖民地附属国的人民，有时摆出一副笑容可掬的伪善的面孔来进行欺骗。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其中每一现象都只是本质的某个侧面的表现。现象是比较片面的、表面的、局部的，它是多变的、易逝的。就事物的总体说来，现象比本质丰富、生动；本质比现象深刻、稳定。

现象和本质是构成客观对象的统一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任何事物的本质都要通过一定的现象表现出来；任何现象又都是从某一特定的方面表现出事物的本质。假象也是一种现象，它甚至给人一种和事物本质完全相反的印象。如美帝国主义施放“和平”烟幕，来掩盖它好战的本质。但是假象也是本质的某种表现。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美帝国主义叫嚷“和平”，是和它的扩军备战的活动相配合的。这种假象又是帝国主义极端虚伪和狡猾的本质的表现。列宁说：“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7页）

现象是十分复杂多样的。本质是贯串于各个个别的、局部的现象之间的内部联系。自然界具有无数的、多变的颜色，“五光十色”还不足以形容它的丰富多彩；但这些极其不同的颜色有着共同的本质——电磁辐射。在资本主义的市场中，商品的价格因供求关系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等复杂条件的变化而经常发生波动。

同一商品的价格常常是多种多样的。但同一商品的不同价格却是同一的本质——价值的表现。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着商品的价值。

现象是本质的个别的、具体的表现，本质是同类现象中的一般的、共同的东西（如前面所说的，不同价格的同一商品都具有同一的价值）；现象是丰富多变的，本质是相对稳定的（如表现商品价值的价格是多变的，价值是相对稳定的）；现象常以曲折的形式表现本质（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通过商品交换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现象是表面的，它直接呈现在人们的感官之前，本质是内在的、隐蔽的、深刻的，人们经过抽象思维才能认识它等等。因此，现象和本质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别和矛盾，它们是对立的统一。马克思说："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实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69页）

康德片面地夸大现象和本质的对立，否认它们的统一。在他看来，本质是"自在之物"，是处在人们认识范围以外的东西；人们只能认识现象，不能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按这种观点，人们就不可能取得对于客观世界的科学知识。现代主观唯心主义特别明显地否认事物的本质，否认自然界和社会中各种现象之间存在着合乎规律的本质联系。德国的存在主义者卡尔·雅斯贝尔斯宣称，整个世界只是一种"虚幻的假象"。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语义哲学也否认认识事物本质的可能或否认事物本质的存在。这些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它们的社会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帝国主义的哲学。中国的实用主义者胡适曾经大叫"多谈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他要人们把自己的眼光停留在表面的现象和个别零星的问题，反对人们去认识中国社会问题中的本质的东西——阶

级斗争。这种做法无非是想使广大人民不能分清敌我、辨明是非，在斗争中迷失方向。胡适把旧中国社会贫穷和落后的原因，归于“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点。他完全抹煞了事情的本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存在。

现象只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出发点，不能把认识局限于表面的现象。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做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03页）如果对事物的认识停留在表面的现象，把某些局部现象误认为是事物的全体和本质，当做普遍真理，就会被现象所迷惑，找不到正确的方向。

为了认识本质，就要从研究大量的现象和现象的各方面的关系着手。只有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并对大量现象材料进行分析和研究，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才有可能正确地把握住事物的本质。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9页）。

在事物的发展中存在着不同的趋向：主流代表事物发展中由本质决定的基本趋向；非主流不代表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向。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广大的农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事情的主流。在同一过程中，部分落后的农民不愿合作化，这不是事情发展的主要趋势，只是发展中的支流。

只有抓住事物的本质，才能在大量现象中区分主流的东西和非主流的东西。毛泽东同志说：“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

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45页）不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是极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1页）

## 二、形式和内容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内容，也有它的形式，任何事物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内容是指那些内在的要素的总和；形式是指把内容诸要素统一起来的内部结构或内容的表现方式等等。每一种化学物体都以一定的化学元素作为自己的内容，也都有一定的构造作为自己的形式。以二氧化碳为例，内容就是两个氧原子和一个碳原子，形式就是它们的结合方式。在生产方式中，生产、生产力是内容，生产关系是形式。只有生产、生产力的各种要素按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才能进行生产。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同生产资料是分离的，只有在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结合。这种结合体现着人对人的残酷剥削。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成为劳动者的财富，劳动者运用生产资料为自己和全社会的利益进行生产。这种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体现了人和人之间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在社会经济形态中，由社会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是内容；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而言是形式，它表明在经济领域中人和人（阶级社会中是阶级和阶级）的

关系，怎样表现于政治领域，表现于文艺、道德和哲学等等意识形式之中。如封建社会中的等级制，就是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政治形式；资产阶级民主制以虚伪的“平等”、“自由”的政治形式，表现着同样虚伪的人和人之间的经济上的“平等”和“自由”的内容。

事物往往具有两重形式：一重是和内容不直接相干的、非本质的外在形式，一重是和内容紧密相关的本质的内在形式。一本文艺书的形式，可以是精装，也可以是平装，这是外在的形式，它和书的内容不直接相干。而艺术形式则是同文艺作品的内容密不可分的，是它的内在形式。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第 2 版，第 871 页）不仅文艺作品如此，一般宣传品没有活泼生动的人民语言形式，“语言无味，像个瘪三”，那也是达不到宣传的目的的。在思想斗争和学术讨论中，不采取充分说理的形式，“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是没有任何说服力和战斗力的。因此，生动活泼的语言，充分的论证说理，是我们在进行宣传和学术讨论中不可少的内在的形式。在说到内容必须具有和它相适应的形式的时候，我们所指的首先是它的内在形式。

内容和形式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在一定条件下，作为一定内容的形式，可以成为另一形式的内容。思维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形式，它同时又是语言形式的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形式，它同时又是上层建筑的内容。

在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中，内容居于决定的地位。事物的

形式必须适合事物矛盾运动的内容。有什么样的内容，就有什么样的形式。例如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各种形式，是由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内容决定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在不同民族存在的条件下采取民族的形式，是由它的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尊重各民族自己的特点的内容决定的。内容决定形式并不是说同一个内容只能有一种形式，由于条件不同，它可以有多种多样形式。

正因为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首先要注意事物的内容，反对只注意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只有具备充实的内容，才可能有完美的形式。就写文章来说，“心苟未明，劬劳憔悴于章句之间，不过枝叶耳，无所附之而生”（黄宗羲：《南雷文定论文管见》）。有些人不深入调查研究，情况不明，脑内空空，写起文章内容贫乏得可怜，只得搬用一些华而不实的辞藻。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他们不了解“木体实而花萼振”（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韩愈：《答李翊书》）。还有些人，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材料，“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在文章中，“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这是一种“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这“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反对党八股》，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39页）。

虽然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因素，它对于内容有重大的能动作用。形式对于内容的反作用，有两种基本情形：当形式适合于内容时，它能够对内容的发展起强有力的

推动作用；当形式不适合于内容时，它对于内容的发展起阻碍的作用。例如，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时，生产力就得到迅速的发展；相反地，当生产关系已经同生产力的性质不相适应时，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束缚和破坏。不仅如此，当着不变更形式，内容就不能发展的时候，形式的变更甚至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所以，在注重内容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形式的作用。善于适应内容的需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选择最适当的形式，促进内容的发展，是一项重要的领导艺术。我们党采取多种形式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整风运动的形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都是运用恰当的形式以促进内容发展的生动例证。

新内容的发展，不但要求新形式来为自己服务，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应当并可能利用旧形式来为自己服务。新事物在萌芽的时候，它的内容就常常是在旧形式中发展的。在它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在一定情形下能利用旧形式的某些方面。对于旧形式中一切只能为旧内容服务的东西必须进行根本的革除，而对于其中某些可以为新内容服务的成分，又应当在改造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利用。例如，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根本废除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但同时又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和它发展的需要，保存着商品交换以及和它密切联系的货币、银行、信用等等经济形式，并对它们进行根本的改造，把它们纳入到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中来，以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利用旧形式，不是同旧事物、旧内容相妥协，而是为了更好地同它作斗争，更彻底、更迅速地消灭旧事物、旧内容，更有效地发展新事物、新内容。列宁在谈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工作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时说：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来，我们现有的工作内容(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是这样强大有力，这样富有推动力量，它能够而且应该在任何新的或旧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和征服一切形式，无论是新的或旧的形式，——这并不是为了同旧形式调和，而是为了能够把一切新旧形式都变成使共产主义获得完全的和最后的、决定的和彻底的胜利的武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4—85页)在文艺方面也是一样，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这些旧形式经过了改造，增加了新内容以后，也就可以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

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中，内容是比较活跃的、易变的，形式对于内容来说则是相对稳定的、比较不活跃的。因此，形式和内容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贯彻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在最初，形式同内容是相适合的，但这种适合只是基本的适合，而不是绝对的适合，其中仍然存在着矛盾。随着内容的发展、新内容的产生和壮大，二者就由基本上适合逐步变为基本上不适合，矛盾激化了，甚至形成尖锐的冲突。这时，形式不仅不再促进内容的发展，相反地，变成内容发展的桎梏；已经变化了的内容要求改变不适合于自己的旧形式，建立适合于自己的新形式。新形式的产生，意味着旧矛盾的解决，但在更高的基础上又出现新的矛盾。随着矛盾的发展，形式和内容又由基本适合变为基本上不适合，再一次需要改变旧形式，创立新形式。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矛盾运动，就是这样由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又由基本不适合到基本适合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列宁说："内容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载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9页）这就是形式和内容矛盾运动的辩证法。

根据内容和形式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我们应当自觉地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根据内容发展的需要，抛弃旧形式，采取为内容发展所要求的新形式，为内容的不断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不顾内容发展的要求，抱住那些过了时的形式不放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又必须承认形式的相对稳定性，承认形式在和内容相适应的时期对于内容的促进作用。因此，对于适合于内容发展的形式，要使它相对地稳定下来，并逐步趋于完善，以便充分发挥其在相当时期内的积极作用。如果忽视发展的阶段性，不顾条件过早地否定某种形式，那也是不对的，这样不仅不能有助于内容的发展，相反地会对内容的发展起阻碍和破坏的作用。对于某种形式是采取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态度，归根到底要看它是否适合于内容的性质，是否有利于内容的发展要求。

## 三、原因和结果

因果联系是客观世界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表现形式之一。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任何一个或一些现象，都会引起另一个或另一些现象的产生；反过来，任何现象的产生也都是由其他的现象所引起的。其中，引起一定现象的现象是原因；由于原因的作用而产生的现象是结果。因果联系的特点之一，是原因在先，结果在后。然而，并不是任何先后相继的现象都能够构成因果关系，如白天和黑夜等。因果关系是包括时间先后秩序在内的由一种现象必然引起另一种现象的本质的内在的联系。

唯物主义认为，现象的因果联系具有客观的、普遍的性质。任何现象都有其产生的原因，任何原因都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在

客观世界中，无原因的结果和无结果的原因都是不存在的。这一思想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即决定论的原则。与此相对立的是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它否认因果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

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对因果性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最好证明。人们在实践中，不仅重复地看到某一种现象之后必然出现另外的某一种现象，而且可以创造或改变某种现象，从而得到人们预期的某种结果。在实践的不断发展中，人们逐步认识到，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无论怎样错综复杂，它们之间都有着严格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果制约性。有些现象的原因暂时还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它一定存在，并且终究是会被发现的。海王星的发现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个行星尚未发现之前，法国天文学家莱维利叶曾经发现和考察了天王星运行“摄动”的现象，肯定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必然是某个未知行星的存在，并根据太阳系学说的数据推算出这个行星的位置。德国天文学家加勒在1846年用自己的实际观察证实了这个行星的存在。可以说，科学首先就是关于产生各种现象的原因的认识，不揭示事物产生和发展的真实原因，就没有科学的认识。

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否认因果联系的客观性。如休谟认为，因果性的观念是由于某些感觉不断重复出现所引起的，他把因果性归结为人们的心理的习惯。康德把因果性看做是人们用来“整理”感觉经验的一种先天的悟性形式，它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目的论者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联系和发展都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先安排好的目的，都是神的意志作用的结果，只有“上帝”才是一切事物的最后原因。辩证唯物主义根本反对这种错误的、反动的观点，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依据它们自己本身所固有的一定的因果联系而产生和发展的，人们头脑中的因果观念，只

不过是现实事物客观的因果关系的反映。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因果观，不给任何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保留余地。实践是对唯物主义因果观的最好的确证，也是对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因果观的最有力的驳斥。

非决定论在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中占着统治的地位。马赫宣称："原因和结果是我们思维的创造物……。"实用主义的创始人詹姆士说："关于为什么总有某种事物出现于世上，我所能想出来的惟一现实的根据，就是有人希望它出现。"许多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用唯意志论的观点来否认社会生活中的因果制约性（社会中的因果联系早已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得到论证，并为社会生活实践所证实），这是反动阶级垂死挣扎在哲学上的反映。帝国主义者妄想依靠政治上、军事上的力量随心所欲地决定经济生活的过程，决定阶级、民族和国家的相互关系。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内经济危机的深刻化，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工人运动的高涨，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巩固和强大，这一切都证明客观因果规律是帝国主义者的"意志"无论如何也抗拒不了的。

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企图从自然科学的一些新成就中寻找反对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的论据。他们认为在微观世界中，电子具有"自由意志"，没有因果制约性。事实上，现代物理学的每一步发展，都进一步地揭示了微观世界的因果规律。人们在利用原子能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对微观世界中因果关系客观性的最好证明。

物质世界是无限复杂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统一整体，"原因和结果只是各种事件的世界性的相互依存、（普遍）联系和相互联结的环节，只是物质发展这一链条上的一环"（《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8

页）。因此，只有当我们把所要考察的特定对象从普遍联系中抽引出来，才能具体地确定：某一现象为原因，另一现象为结果。由于客观事物联系的复杂性，同一现象在一种关系中是结果，在另一种关系中又是原因，例如摩擦生热，热是摩擦的结果，而热又能成为引起燃烧的原因。在一定条件下原因和结果可以相互转化，一种原因产生一定结果，这个结果又反过来影响原因。例如政治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在社会生活中，经济是最后的根本的原因，但政治反过来又会成为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的原因。

形而上学者看不到因果联系的复杂性，认为原因只是原因，结果只是结果，二者不能互相转化。这种机械的因果观不能正确地说明事物的联系。

在实际生活中，一个结果往往不只是一种原因所引起的，而是多种原因所造成的。例如农业上收成的好坏，就是自然气候的变化、耕作技术水平、人的主观努力程度等等原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在多种原因中，又有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等等的区别。同一原因，在不同条件下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同样的自然气候和土壤条件，由于主观努力程度的不同，产量就会大不相同。要研究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必须全面地揭露造成某个结果的多方面的原因，具体分析各个原因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并且具体分析因果联系中的各种条件。

正确地把握因果联系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条件。在工作中，只有正确认识事物的因果联系，善于估计工作的后果，才能正确地指导工作。在总结工作经验时，不仅要肯定成绩，发现错误，而且要找出取得成绩的原因和产生错误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在以后的工作中发扬已有的成绩，避免重复发生同样性质的错误，分析成功的和错误的原因也就是把握事物的因果联系。

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肯定我党历史上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斗争是完全应该的，同时指出在斗争方法上有缺点，缺点之一就是“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在对待党内错误问题上，“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学习和时局》,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41—942页)。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只有把握了事物的因果联系,才能通过实践消除产生坏结果的原因,实现对我们有利的结果。

## 四、必然性和偶然性

当我们深入地观察和研究因果联系时，就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必然性就是客观事物的联系和发展中的不可避免、一定如此的趋向，必然性产生于事物的内在根据、本质的原因。例如，种瓜得瓜，摩擦生热，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要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等等。与此相反，某一偶然的现象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由于非本质的原因而产生的，它对这一事物的发展过程说来，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例如，某一株农作物在它整个生长期中是否会遇到冰雹的灾害，社会主义革命在某个国家正好在哪一天取得胜利等等。

必然性和偶然性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等同的。必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一定要贯彻下去的趋势，它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前途和方向。偶然性则相反，它不是事物发展

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趋势，一般说来，它对整个事物的发展只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必然性和偶然性虽然是客观事物联系和发展中的两种不同的情形，但它们之间绝不是互不相关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对立的统一。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包含着必然性的方面，也包含着偶然性的方面。这种矛盾现象是由于事物联系的复杂性、因果关系的复杂性而产生的。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主要是由它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这种必然趋势的实现，又因为这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许多偶然的联系而发生多种多样的摇摆和偏差。地球上的北温带区，从1月到7月，气温逐渐增高，是一个确定不移的趋势，这是由太阳光对该地区从斜射到直射的变化这一根本原因所决定的。但是，在总的过程中，某一天的气温是否一定比前一天高，就具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是由当时的云层分布、气流的个别特点等复杂条件的影响所造成的。气温上升这个总的必然趋势，是在无数偶然的波浪起伏的复杂变化中实现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胜利的持久战，总的过程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是必然的，它是由敌我双方矛盾的根本特点及其变化的总趋势以及国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所决定的。但是，由前一阶段进入后一阶段的具体时日，各个阶段的具体情况，最后胜利哪一天到来等等，又具有偶然性，它受着国际国内许多复杂条件的影响。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指出："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52页）

由此可见，在事物的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同时存在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必然性通过大

量偶然性表现出来，这就使事物发展的进程具有丰富、生动的内容。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没有脱离了必然性的偶然性。凡看来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偶然性本身又始终服从于内部的隐藏着的必然性。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从偶然现象中，揭露出事物过程内部隐藏着的必然的规律性。

形而上学者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成是没有任何联系的、绝对对立的，并由此提出两种极端相反的错误看法。一种观点是把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看成必然的，否认偶然性的存在，认为偶然性只是由于人们不知道某些事情发生的原因而产生的纯主观的范畴。在这种观点看来，这一个豌豆荚中有五粒豌豆，而不是四粒或六粒，是必然的；这条狗的尾巴是五寸长，不长一丝一毫，也不短一丝一毫，也是必然的；某一个帝王的消化不良，侵略者心脏里血液的沸腾等等，和战争的发生也都有必然的联系。这是一种机械的决定论。它把事物发展中的根据和条件，本质的、主要的原因和非本质的、次要的原因相提并论。这种看法，表面上似乎是十分强调必然性，可是如果把一个豌豆荚中有几粒豌豆这一事实和能量转化、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等必然规律同等看待，就在实际上把必然性降低为偶然性。把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看成是纯粹的必然性，把事物发展中的一切细节都看成是早已注定了的，似乎人们只能消极地等待必然性的支配，这样，就把必然性神秘化而导致宿命论。这种观点对偶然性的了解是唯心主义的。事实上，偶然性是客观存在的，任何偶然的现象都有它的原因，并且可以被我们认识。在我们还没有认识某种偶然现象产生的原因时，它是偶然性，当我们知道了它的原因时，它仍然是偶然性。

形而上学的另一种观点，是把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看做偶然的，认为偶然性支配一切。例如，实用主义者胡适公开宣扬所谓

“偶然论”的观点，他把任何细小的偶然事件都看做是对于历史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原因，借此来抹煞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说：“他（即‘小我’或个人——编者注）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大小，无论善恶，无论是非，都在那大我（即宇宙——编者注）上留下不能磨灭的结果和影响。他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他也许‘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这种观点是反科学的非决定论的观点。既然一切现象都是偶然的、捉摸不定的，那么，人们就既不可能对客观事物的现状和发展前途有任何确定的科学的认识和预见，更不可能依靠这些正确的认识和预见来决定自己的行动，以达到有效地改造世界的目的。人们只能消极地服从偶然性的支配，或者依靠偶然的命运进行盲目的冒险活动。这是现代资产阶级麻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常用手法，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无政府状态和资产阶级在市场竞争中的盲目投机冒险行为在哲学上的反映。

必然性和偶然性不仅相互联系、相互依赖，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物种发展过程中，由于复杂的内部原因和外界条件的影响，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最初只是某一物种非本质的、不稳定的性状。其中有些变异，因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不断固定下来，最后使有机体发生根本的变异，产生了新的物种。原来偶然性的变异，就变成了该物种的必然性状，偶然性转化为必然性，反之，原来的必然性状在条件变化之后逐渐退化，失去必然性。它还可能出现，但已不再是稳定的，而是偶然的了，例如生物进化中的返祖现象。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转化也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中。在原始公社里，自然经济是

必然的，产品的交换是偶然的现象。随着生产的增长和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商品交换就从偶然性转化为必然性。

既然必然性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趋势，我们就必须着重认识事物联系和发展的必然规律，并且要善于根据必然规律来正确地规定我们行动的目的和计划，使我们的行动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在我们工作中抱着“守株待兔”的侥幸心理，把希望寄托在偶然事件上，是极端有害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可以不注意偶然事件。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所以，我们在认识必然性的时候，就不能不顾及偶然性，而要透过偶然揭示必然。要善于在实践活动中充分估计到各种偶然因素，利用一切有利的偶然因素来促进事物的发展，加速斗争的胜利；同时要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弱有害的偶然因素的影响，并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一切准备，做到“有备无患”。

## 五、可能性和现实性

可能性和现实性这对范畴比前面所论述的各对范畴更深刻、更全面地反映了客观世界在发展过程中的联系。

现实就是现在存在着的客观实在。现实性这个范畴并不是简单地说明个别事实的存在，而是客观实在种种联系的综合。现实是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的统一。现实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它既是过去的“现实”发展的结果，又是引起将来的“现实”出现的原因。现实之所以成为现实，是由于它内部深刻的规律性、必然性所决定的，它的某些具体特点、细节又受着偶然性的影响。

可能性是和现实性相对而言的。某种事物和现象在还没有成为现实以前，只是一种可能性。在一定条件下，它才会转变为现

实。任何必然性都是通过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过程而实现的。

客观事物的发展所以是一个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过程，是由它内在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对范畴，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更进一步的具体化。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包含着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的根据。但是，只要这种转化还没有完成，他事物的出现终究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只有在一定条件下，经过对立面的斗争，矛盾的一方克服了另一方，这种可能性才转化为现实。生物有机体内部遗传性和变异性的矛盾，决定了一种生物有演变为另一种生物的可能性。当着在一定条件下，特定的变异性克服了某一种生物原有的遗传的保守性，新物种的产生才由可能性变为现实。

可能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具有客观的根据。不可能的东西在现实中没有客观根据，它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实现的。例如，石头孵出小鸡，永动机的制造，帝国主义本性的改变，反动派会发善心、愿意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等等，都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在某一过程中某种事物、现象之所以可能出现，首先是由这一过程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没有一定的客观矛盾，就没有根据，就不可能出现。在认识和实践中，区分可能和不可能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一个人如果撇开可能办到的事不去办，硬要办那些不可能办到的事，只能是浪费精力。为了愚弄群众，资产阶级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总是力图把种种不可能的事说成是可能的；同时又把可能的事说成是不可能的。

在可能性中，我们还要分清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现阶段已经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这是已经可以提到当前的工作日程上来的问题；一种是只有在以后的阶段才可能实现的可能性，不应该把它提到当前的工作日程上来。右倾机会主义者把现在就可

以实现的可能性看成只有在将来才可以实现的可能性，甚至认为根本不可能变为现实，因而失去远大的目标，丧失革命的信心。他们不去努力设法实现现在已经可能办到的事情。这样做，只能使他们自己成为历史发展的绊脚石。“左”倾冒险主义者把将来可以实现的可能性当做目前就可以实现的可能性，要在当前就去实现将来才可能实现的东西。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这也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以及它和周围条件的复杂联系，事物发展的趋势往往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可能性，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互相对立并不断斗争着的两种相反的可能性。例如一粒种子落入泥土中，有可能生根发芽，但也有可能不生根发芽。在具备了革命形势的时候，发动革命斗争，有取得胜利的可能，但由于敌我力量和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错综变化，也有失败的可能。两种相反的可能性都是客观存在的可能性，其中每一种可能性的实现都必须具备自己特定的条件。在发展过程中对实现前一可能的有利条件就是对实现后一可能的不利条件；前一可能的增大就意味着后一可能的缩小；前一可能的实现就是意味着战胜了后一可能性。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是由各种具体的条件决定的。但是，从总的趋势和长远的过程来看，新事物必将战胜旧事物，在这个意义上，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可能性是具有必然性的；旧事物战胜新事物产生的可能性即使成为现实，也只能是暂时的。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谈到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的革命力量时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单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载《毛泽东选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03页）

在可能变为现实的过程中始终贯彻着两种对立的可能性的矛盾斗争。两种对立的可能性的矛盾斗争，在自然界中是自发进行的。社会生活则不同，社会发展规律总是通过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发生作用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个阶级、社会集团或个人总是力求使对自己有利的可能变为现实，两种相互对立的可能性往往是由两个相互敌对的阶级支持着的。因此，变可能为现实的过程，总是通过人和人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来实现的。

在变可能为现实的过程中，客观因素是丝毫不能忽视的。在客观因素已经具备的情况下，主观努力可以起决定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论战争时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76页）

为了加速新事物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过程，必须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中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以及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各种条件。在这个基础上，还要经过主观努力和积极的斗争，创设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力争实现好的可能性，防止坏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在工作中，必须同时准备两手，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这就是说，在争取好的可能性的同时，估计到坏的可能性，并为克服坏的可能性积极准备条件，这样，才有利于去同坏的可能性作斗争，并且即使在坏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时，我们也不至于束手无策，而能够有备无患，应付裕如，继续为争取好的可能性的实现而斗争。

# 第八章　认识和实践

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客观世界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为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列宁说，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论问题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并且说明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

## 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就是人们的头脑对外间世界的反映。马克思说："观念现象不过是被移置于人类头脑中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现象而已。"（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文摘录》，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35页）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出发点。人脑好比一个加工厂，它的原材料都来自客观世界，意识就是在人脑这个加工厂中对客观材料进行加工后的产品。如果脱离了客观世界，人的头脑里什么也产生不出来。这点在前面"物质和意识"的一章里已经说过了。

认识和照镜子、摄影有相类似的地方，但又有着根本的不同。人脑是社会劳动的产物，它具有镜子、照相机以及动物大脑所没有的特殊性能。它不仅能反映外间世界的表面现象，而且能深入地、正确地反映外间世界的本质和它的规律性。人脑的这种深入的、正确的反映是通过实践取得的。这样的认识反过来又帮助人类实践活动取得积极的成果。因此，人类的认识不是对客观世界

平静的、呆板的、表面的反映，而是与实践紧密相联的深刻的、能动的反映。

人们为了使自己的行动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不断地在实践中检验、修改和加深自己的认识。社会实践是历史地发展着的，人类的认识也是历史地发展着的。社会实践不仅改变着客观世界，而且改变着人的主观世界——人类认识的能力。在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的发展中，人们的知识水平不断提高，生活经验不断丰富，眼界不断扩大，人类的认识能力也不断提高。认识愈深入、愈正确，改变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就愈有成效。人类的认识是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过程。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做了扼要的说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57页）

在认识论问题上，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唯物主义的路线是从物质到意识，唯心主义的路线是从意识到物质。

客观唯心主义者认为，在人脑或灵魂以外有一个独立的神的世界或理念的世界，人的认识的来源不外是神的启示或绝对观念。如柏拉图认为，真正的知识的来源，是人的不死的灵魂对于在他诞生于尘世以前所居住的理念世界的回忆。

主观唯心主义者把认识看做是人们心灵的自由创造和想像的

产物。王阳明认为，一切知识的根源是“良知”，“良知”在人人心中，但为私欲所蔽，冲不出来，只要去掉这种障碍，知识就自然而然地出来了。从贝克莱以来，经过马赫一直到现代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者都认为，认识只是对自己感觉的整理，他们坚决否认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实用主义者胡适把认识的对象完全归结为各人自己的感觉。他说：“我们各有特别的兴趣，兴趣不同，所留意的感觉也不同，因为我们所注意的部分不同，所以各人心目中的实在也就不同。一个诗人和一个植物学者同走出门游玩，那诗人眼里只见得日朗风轻、花明鸟媚；那植物学者只见得道旁长的是什么草，篱上开的是什么花，河边栽的是什么树。这两个人的宇宙是大不相同的。”（《胡适文存》，第2卷，第106页）根据这种推论，胡适断言，意识不是客观实在的反映，实在倒是由人的主观意识任意塑造的产物。他说：“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同上）的确，由于诗人和植物学者的主观状态不同，他们对景物的感受，“心目中的实在”也可能不同。但是无论诗人和植物学者的感受如何不同，他们的意识都是同一个客观存在的宇宙的反映，只不过反映的方面、重点不同罢了。胡适抓住了认识中主观因素的作用，加以歪曲和片面地夸大，得出了“实在就是感觉”，人的感觉不同，也就有不同的宇宙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

有一些唯心主义者根据逻辑理论思维在人类认识中的重要的作用，把它加以歪曲和夸大，用来反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他们把科学看做是纯粹理论思维的产物，并且以为数学是确切的例证。他们认为，数学是从一些先验的概念和公理出发，单纯用逻辑的方法推演出来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数和形的概念不是从任何地方得来，而仅仅是从现实

世界中得来的。人们用十个指头算数目，就是说作第一次的算术运算，这十个指头可以是一切别的东西，但总不是理性的自由创造物。要作计算不但要有被计算的对象，而且还要具有这样的能力，使其在考察这些对象时，能够摆脱其他的特性而仅仅顾到数目。而这种能力则是长期的依据于经验之上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和数的概念一样，形的概念也完全是从外面世界得来的，而不是在头脑中从纯粹的思维中产生出来的。要能达到形的概念，先应当存在具有一定形状的物体，而且应把这些形状拿来比较。纯数学是以现实世界的空间的形式和数量的关系——这是非常现实的资料——为对象的。……和其他所有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们的实际需要上产生的：是从丈量地段面积和衡量器物容积，从计算时间，从制造工作中产生的。”（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7—38 页）恩格斯指出，数学是“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规律”，它“仅仅反映世界联系形式的一部分——仅仅因为如此，数学才能被一般地应用”（同上书，第 38 页）。

无论哪一种形式的唯心主义，都否认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在认识论上坚持从意识到物质的错误路线。

辩证唯物主义在坚持从物质到意识的路线的基础上，肯定客观世界是可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和各种形式的不可知论根本对立的。不可知论否认人们有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能力，否认人们有完全反映客观世界的可能。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庄子·养生主》）他片面地夸大了知识的无限性和个人生命有限性的对立，而不了解人类认识是一个世世代代的无限发展和不断深化的过程，从而引出了人们追求知识是徒劳无益的错误结论。在欧洲哲学史上，不可知论的最著名的代表，是英国的休谟和德国的康德。

休谟认为，人类的认识不能越出感觉经验的范围，在感觉以外是否还有什么外间世界存在，是无法知道的，至于对世界本质的认识，那就更谈不到了。康德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并且承认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所引起的，但是他认为，客观世界是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人们只能通过感觉认识某些现象，而不能透过现象进一步认识外部世界的本质。感觉本是人们意识和外间世界相联系的桥梁，但休谟和康德却把感觉看做是隔离意识和外间世界的鸿沟，认为感觉以外的客观世界是不可知的，或不能完全认识的。

哲学史上大多数哲学家（包括唯物主义者和一些彻底的唯心主义者）承认世界的可知性。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荀子就明白地肯定了这一点，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费尔巴哈从感觉论的立场完全肯定了世界的可知性，反对了不可知论。他认为：自然界绝不隐藏起来，对象及其属性都是可以认识的，正如空气通过口、鼻和毛孔钻进我们体内一样；“人恰恰具有使他从世界的完整性、整体方面来感知世界所必需的足够的感官”（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参阅《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4页）；我们现在没有认识到的东西，我们的后代一定会认识到。有些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承认世界的可知性。例如，黑格尔既然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看做是“绝对观念”的体现，把认识说成是“绝对观念”的自我认识，那么，在他看来世界无疑是可以认识的。因为思想当然可以认识那早已是思想内容的内容。黑格尔正是在这种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对康德的不可知论作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所谓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不过是空洞的、抽象的、设想出来的东西；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认识并不是把人和自然界

“隔离开来”而是“结合起来”。但是，在马克思以前，所有的哲学派别都不能彻底粉碎不可知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实践对驳斥不可知论的重要作用。恩格斯指出：“把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谬论驳斥得最彻底的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现象、按照这现象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于这一现象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那个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蛋了。”（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5 页）不可知论的哲学是在自然科学比较发达的条件下为宗教信仰服务的理论。列宁指出：“康德贬损知识，是为了给信仰开辟地盘。”（《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81 页）

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这是指可能性说的。就现实情况来说，自然界有很多现象对人类还是一个谜，有些谜暂时还无法解开。把这种认识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总是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在每一时代，人们的认识又是有限的。恩格斯说：在认识中遇到的矛盾是“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认为是绝对的，他方面人的思维又实现于仅仅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之中——这两方面之间的矛盾。这矛盾只能解决于无限的前进运动中，解决于连续的人们世代的系列中——这系列对于我们至少从实际上看来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也是非至上的，他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也是有限的。按其本性、使命、可能及历史终极目标来说，是至上的、无限的，按其个别实现和这一那一时候的现实来说，又是非至上的、有限的。”（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88 页）

不可知论利用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类认识是有限的这一事实，来否认人类认识的无限的可能。人类认识的历史一再地驳斥了这种观点。我们暂时撇开理论思维对认识的作用不谈，仅就人的视觉来说，在没有光学仪器以前，人类肉眼所能看到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但是感觉器官的局限性并不是人类认识的绝对界限。自从发明放大镜以来，特别是发明显微镜以来，人类的视野大大地扩大了，在人们眼前展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无限复杂的微生物世界。光学显微镜放大的倍数是有限的，但它也不决定人类视觉所能达到的终极界限。人们有了电子显微镜就能把物体的形象放大到十万倍以上，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还一定能发明比电子显微镜具有更高效能的仪器。我们决不应该抱怨感觉器官的局限性。生产实践的日益发展，人类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给人们提供了不少仪器，并且将提供更多的仪器，靠这些仪器的帮助，可以无限地提高人们感官察觉外界世界的各种事物及其属性的能力。

19 世纪德国的自然科学家赫尔姆霍茨的“符号论”和普列哈诺夫的“象形文字论”，也是不可知论的一种表现。它们虽然在认识起源问题上是唯物主义的，承认感觉是由外界物体对感觉器官的作用而产生的，但是它们不把感觉看做是外界对象的模写，而认为只是对象的“符号”或“象形文字”。列宁指出：“不容争辩，模写决不会和原型完全相同，但模写是一回事，符号、记号是另一回事。模写定要而且必然是以‘被模写’的东西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的。‘记号’、符号、象形文字是一些带有完全不必要的不可知论成分的概念。”（《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47 页）因为符号完全可以同对象不相似，而且可以代表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虚构的事物。

反映论是所有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和首要前提，它是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不可知论完全对立的。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同马克思以前的旧唯物主义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旧唯物主义把认识看成是照像式的机械的反映，看成是消极的、被动的、直观的反映，它不把人类的认识看做是由不知到知、由不深刻的知到较深刻的知的一个无限发展的历史过程。它不能辩证地理解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的界限和联系，它不能正确地解释尚未认识的东西如何转化为被认识了的东西，因而为不可知论留下了把柄。所以旧唯物主义不能完全科学地解决认识论的问题，也不能彻底地粉碎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不可知论。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不能彻底粉碎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在认识论上的进攻，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彻底驳倒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谬论。例如实用主义者詹姆士攻击反映论说："譬如墙上的钟，我们闭了眼睛可以想像钟的模样，那还可说是一种摹本。但是我们心里起的钟的用处的观念，也是摹本吗？摹的是什么呢？又如我们说钟的发条有弹性，这个观念摹的又是什么呢？这就可见一切不能有摹本的意象，那'和实在相符合'一句话又怎么解说呢？"（转引自《胡适文存》第2卷，第98页）像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按照辩证唯物主义那样，把认识看做在实践的基础上的、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就不能予以充分的有力的回击。辩证唯物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旧唯物主义不同，不是把认识看做照像式的消极的反映。照片当然不能反映出钟的用处和发条的弹性，但是人们的思维却能掌握它。钟的用处和发条的弹

性都是钟和发条本身所具有的客观属性，人们意识中的关于钟的用处和发条的弹性的观念，正是这些客观属性的反映，而决不是主观意志的任意创造。这些观念也是客观实在的摹本，不过不是直观的形象的摹本罢了。当然，人也可以随意设想钟有充饥或御寒的作用，发条没有弹性等等；但是实践会教训他们，这是和客观实在不符合的。因此，詹姆士的诡辩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我们特别要注意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只有这样，才能在认识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路线，彻底粉碎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 二、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实践性。认识是从实践中产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它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证明。人的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一切否认实践的重要性、企图使认识离开实践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强调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同以前的一切认识论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把实践的观点引到认识论中来，从而科学地解决了认识论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克服了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缺陷，彻底驳倒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实践是指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实践是社会的实践。社会实践包括许多方面，人类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向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斗争。没有生产活动，人类就不能生存，就谈不到其他活动。在生产过程中，不仅人们和自然界发生关系，而且人和人之间要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人们又结成其他的社会关系。因此，社会实践除了改造自然的活动

以外，还包括其他各种社会活动。在阶级社会里，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最基本的是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基础。除了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以外，社会实践还包括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相联系、并以它们为基础的其他社会活动，如科学实验和艺术活动等等。

唯心主义把认识看做是天赋的或者主观自生的，不看做是客观事物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当然也就否认认识依赖于人的社会实践。有些唯心主义者也提到“实践”或“行”的问题，例如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就常常提到“践履笃行”，并把“践履笃行”看做做学问的重要功夫；但是，他们所说的“践履笃行”，不过是脱离社会的纯粹个人的修身养性，并且认为，这种活动是为了实现某种先验的理性原则或道德原则。这种实践观是唯心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毫无共同之处。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正确地承认认识是对于客观外界的反映，但是，他们都不了解认识对于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的依赖性，他们把认识看做是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消极的直观。例如费尔巴哈，他虽然有时提到实践，但是并不能真正了解社会实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实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页）这就是说，费尔巴哈只是把客观对象当做感觉的对象，而不是把它当做人们用自身的活动来改造的对象，他把人的活动了解为只是消极的直观，而不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

社会生活表明，客观外界不仅是人们思想的对象、感觉的对

象，而且首先是人们的实践对象，即人们用自己的活动加以改造的对象。动物的感官也反映着客观世界，但是动物只是在生物学地适应外界的过程中感受外界，它只能消极地反映外界，它对于客观外界的反映只能停留在低级的水平上。人类不仅能够适应环境，重要的是能够改造客观外界；所以人类的认识不限于消极地直观地反映外界，而且能够在改造客观外界的实践基础上不断丰富感性认识，并且进行抽象思维，反映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又能应用规律性的知识指导实践。这是人类特有的主观能动性。

在改变自然界的生产实践中，人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自然界的各个方面，从它的外部逐步深入到内部，逐步发现自然物的各种属性，了解到自然现象之间的种种关系，认识到自然界的各种发展规律。在生产实践中，人们还在不同程度上逐步了解到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社会关系方面的活动，人们进一步了解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对社会生活本身逐渐有了认识。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实践是各阶级的实践，人们主要是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来认识社会的。

毛泽东同志说："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整顿党的作风》，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17—818页)

在阶级社会里，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一般说来，不是和阶级利益直接相关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它也会和政治斗争直接或间接地联系起来。例如，欧洲中世纪的僧侣曾经因为哥白尼的地动说不利于作为封建的上层建筑的

神学而加以反对；宗教裁判所曾经残酷地迫害自然科学家，等等。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尚且如此，对直接牵涉到阶级利害的社会关系的认识，就更不必说了。

社会实践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人类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以及概括这两种知识的哲学，也都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人类认识史表明：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认识的新课题，都是由社会实践提出来的。社会实践向人们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新的问题，才推动人们从事新的探索。没有社会实际生活的需要，便不能提出认识的任务。而且，人们也只有总结了实践经验，才能对于社会实践提出来的新问题，给以正确或比较正确的回答，产生新的科学知识。认识的历史性和社会实践的历史性，是相适应的。

自然科学的每一步发展，都以生产的发展为基础，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生产。生产进一步发展，又向自然科学提出新问题，并为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经验材料。离开生产需要和生产经验，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可想像的。例如，畜牧业和农业的需要产生了天文学，水利工程和建筑的需要产生了力学，测量土地面积的需要产生了几何学。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方面一旦发生了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数个大学更加把科学推向前进。"（《恩格斯：〈致亨·施塔尔肯堡〉》，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4页）这就是说，生产的需要是推动自然科学向前发展的原动力，大学和专门研究机关的创设，归根到底是由生产需要决定的。社会实践不仅向人们提出新的研究课题，而且还提供了供科学研究进行概括的生产经验。离开生产经验，科学发明是不可能的。例如，14世纪以后，由于欧洲手工工业的巨大发展，纺织、钟表制造、磨粉对于力学，染

料生产、冶金、酿酒对于化学，透镜制造对于物理学，等等，提供了大量的可供观察的材料，因而从15世纪后半期开始才产生了真正系统的自然科学。19世纪的英国，在农业生产中积累了培育蔬菜、观赏植物和家畜的新品种的丰富经验；为寻求工业原料和市场组成的探险队，搜集了极其丰富的动植物品种的资料。达尔文就曾经参加过探险活动，他仔细分析了这些丰富的经验和大量的材料，创立了他的物种进化的理论。

生产实践还给认识不断提供新的技术工具，加强了人的感官，帮助人们深入自然，揭示它的秘密。天文学的发展需要望远镜的帮助，人的肉眼只能看见五六千颗星，用望远镜可以看到多得多的星，包括距地球10亿光年以上距离的星体，用射电望远镜甚至可以觉察到距地球100亿光年的星系。光靠人的肉眼看不见微生物，也发现不了某些疾病的病菌；如果没有显微镜，就没有现代生物学和医学。物理学家没有强大的加速器，就不能深入研究原子核内部的运动。

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也是随着实践的需要而产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了解，虽然也在逐步地发展和进步，但是，从总的方面看来，对于社会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也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只有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了无产阶级的时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展开的时候，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人们，才能够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19世纪初期的傅利叶、圣西门、欧文为什么只能提出空想的社会主义，而不能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因，就是他们

生活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还没有充分发展。大工业在英国刚刚产生，在法国还完全没有。正如恩格斯所说：空想社会主义这种“不成熟的理论，是正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关系相适应的。”（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1页）到19世纪中叶，当社会条件具备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适应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总结了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并在这个基础上批判地吸取了前人思想的优秀成果，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使空想的社会主义变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了新的革命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也离不开实践。恩格斯说：“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2页）依靠本能适应环境的原始的野蛮人，不能把自己和周围环境区分开来。由于改变环境的实践活动，人才把自己和环境对立起来，把思维和存在对立起来，即把环境当做改造和认识的对象。同时，通过改变环境的实践活动，又把人和环境、思维和存在统一起来，即使人的认识逐步符合于客观实际，使人的行动更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在这种对立的统一的历史发展中，一方面逐步改变了环境，另一方面又发展了人类的思维能力，逐步产生了反映客观事物的各种概念和范畴，也形成和发展了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

实践的社会性决定了认识的社会性。每个人都是在社会生活中，在和其他人的联系当中形成自己的认识的。不能设想有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的个人和个人认识。表面看来，某些科学工作可

以由科学家单独进行，似乎他的研究纯粹是个人活动，和社会无关。其实，不仅他的工作所需要的材料、他所具有的科学基础知识是社会的产物，而且成为他研究对象的某些问题的提出也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辩证唯物主义不把实践看做是各个个人的孤立活动，而是看做人们的社会活动，首先看做人民群众的活动，特别是劳动人民的活动。劳动人民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的主体，他们的斗争对于人类的认识的发生和发展，起着首创的和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实践经验是一切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最初源泉。虽然他们的经验是分散的，没有系统的，需要经过综合、提炼，才能成为有系统的知识，但是，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生产经验和社会斗争经验，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不能产生。因此，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归根到底都是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社会斗争经验的总结。我们坚决反对把群众看做“不知不觉”的“阿斗”，而主张把群众看做我们寻找新知识的第一个先生。一切做实际工作的干部和科学研究工作者都必须眼睛向下，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除了实践以外，认识是不是还有别的来源呢？没有了，实践是认识的惟一来源。人们只有在变革客观世界的实践中获得丰富的经验，才能进行科学的抽象思维，达到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同志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6页）当然，这绝不是否认人们学习间接经

验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又说：“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么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来说，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277页）

接受书本上的科学知识是重要的。每一代人都是把前代人的认识的终点作为自己认识的起点，而后把自己在实践中取得的新的知识增添到人类知识宝库中去，通过语言和文字传留给下一代。如果事事都要取得直接经验，极而言之，如果每一代人都要从钻木取火开始去获得火的知识，人类认识就不可能有发展。但是，书本知识却只是知识的“流”，而不是“源”。关于文学艺术，毛泽东同志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惟一的源泉。这是惟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62页）毛泽东同志这段话，适用于整个知识领域。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书本上的科学知识，但是反对把书本上的知识当做认识的根源，因为那样就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就会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书本知识，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地接受书本

上的科学知识。

我们要重视从实践中学习，又要采取理论和实践相联系的方法认真地读书。毛泽东同志在谈到革命干部学习革命战争的规律时写道："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4页）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才可能正确地、深刻地、有批判地接受书本上的军事知识，否则就只是纸上谈兵。我们丝毫也不轻视读书，相反地，我们一向提倡多读书，但是在读书时，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地死啃书本，主张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指导下，越是多读书，就越有益。

## 三、认识的辩证过程

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的认识过程，是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革命实践的辩证的过程。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不同质的两个阶段。

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开始用感官直接接触事物，接受事物的各种刺激，这些刺激通过神经传达到大脑，形成一定的颜色、声音、冷热、软硬、气味等等感觉以及由这种种感觉形成的关于客观对象的印象。这就是感性认识。感性认识的特点，是以生动具体的形象直接反映外部世界。在感性认识阶段，人们认识的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和事物的外部联系。

感性认识是对事物的生动的直观，是对事物的直接反映。在感性认识和客观事物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环节。感性认识的可靠性就在于它直接反映现实。感性认识是认识的起点，是认识的第一步，没有这第一步，就没有往后的第二步，就不可能有理性认

识。然而，正因为感性认识是事物的直接反映，它也就有着局限性。人们通过感性认识，只能把握个别而不能把握一般，只能把握现象而不能把握本质和规律。一般、本质和规律等等不是感官所能直接感触到的。人们通过感官只能感知日出月没、星辰的位置变化以及昼夜交替等现象，而不能把握天体运行的规律。因此，认识不能停留在感性阶段，必须上升到理性阶段。

人们在实践中对于某种对象的感觉和印象反复了许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就产生了概念，从感觉印象到概念是认识过程中的质变。概念所反映的，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事物的本质、全体和内部联系。循此渐进，进行判断和推理，得出理论的结论，这时，就可能把握住事物发展的规律。例如，人们到一个人民公社去，首先接触到这个公社的许多具体材料，然后经过思索，从这些具体材料中抽出它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共同点——都是集体所有制，实行按劳分配等；又抽出它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不同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政社合一等等，逐步理解了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本质，这时，对人民公社就能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概念。我们去调查一个人民公社的情况，起初了解到各个生产队的情况和具体做法，听取了各方面的反映，这时候，人们就要用脑筋来想一想，进行判断和推理。“这个公社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个别的”，这就是一个判断。进一步研究成绩是怎样取得的，有什么经验，缺点是怎样产生的，有什么教训，以及今后怎样改进工作等等，这就需要进行推理。如果掌握的材料是丰富的、真实的，思维的方法又是正确的，就能够引出合乎客观规律的结论。在感性材料的基础上形成概念，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这就是理性认识阶段。

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理性认识的特点表现为一系列的抽象和概括、分析和综合的过程。理性认识已经不是个别事物的印象，而是综合了许多事物或各个方面的感性材料，经过思考作用，舍弃了次要的东西，从中抽出事物的共同本质和事物运动的规律。例如，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过程中，接触到外界的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等等，看到它们的不同的特点、生活习性和用途，逐步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科学家对积累起来的感性材料，进行抽象概括，舍弃了各种植物的个别的、次要的、具体的特征，概括出它们的一般的、主要的、共同的本质。这样就形成"植物"的科学概念。

由此可见，概念的形成和运用概念进行推理的过程，就是经过抽象和概括、分析和综合，从现象深入到本质、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过程。

概念、理论的抽象虽然是离开了个别的具体事物，但是只要是根据实践经验而进行的科学抽象，不是任意摘取事物和现象的个别方面，不是凭主观想像，那么，就不但不是更空虚、更不可靠的认识，而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列宁说："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81 页）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概念，并没有包括个别地主或资本家的具体活动的一切细节和被剥削阶级在每个个别场合所进行的斗争的一切具体情况，但是这个概念却深刻地、全面地反映了阶级斗争这一客观事实的本质，这个科学概念能够指导我们深刻地认识阶级斗争的每一具体现象。人们运用科学的概念，正确地进行

判断、推理，就能根据现有的知识去考察新的领域，得到新的知识，依据事物的规律性，预见未来。天文学根据天体运行的规律，准确地推算出日蚀、月蚀发生的时间，制订未来许多年的历书。地质学根据地层变化和地壳中发现的生物遗骸等等，可以确定地层的年代和成因，进而推断出矿物的蕴藏。气象学根据各地的气压、气温、湿度等等变化，可以作出天气预报。对于社会事物的认识，也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以前就预见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预见的巨大威力。

理性认识的上述种种特点和作用，都是感性认识所没有的。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事物的现象只是人们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认识的任务。

为了认识客观规律性，首先必须占有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合乎实际（不是错觉）的感性材料；然后在感性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思考作用，进行逻辑的加工。逻辑加工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

事物的现象表现着本质，个别之中有一般。感性材料既然是现象和个别东西的反映，那么，它也就包含着本质和一般的东西。但是，感性材料中所反映的东西，却是真象和假象、本质东西和非本质东西混杂在一起，是事物的各个片面和表面的联系。因此，必须开动脑筋进行思索，对感性材料作全面的分析和综合。这就要去伪存真，发现事物的真象，不为各种假象所蒙蔽；要去粗取精，抓住事物本质的东西，不要粗枝大叶，为非本质的东西所迷

惑；必须由此及彼，把孤立的材料联结起来，发现其“来龙去脉”，不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满足于片面的、零碎的了解而看不到事物的全体；必须由表及里，通过事物的外部联系探索其内部联系，不要浮光掠影，不求深解，停留在事物的外表。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

指导我们对感性材料正确地进行概括性的思索和逻辑加工的根本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辩证的规律是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我们认识了它，自觉地用它进行思维，它就成为我们科学的思维方法。只有辩证的思维，才能够真正地做到对感性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引出客观事物固有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规律性。逻辑加工的过程，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综合客观材料的过程，在每一步分析中都要用事实、实践来检验，而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把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任意乱套。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终了的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并不是自然界和人类要适合于原则，而是相反地，原则只有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4 页）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被证明完全正确的理论原则，但它并不能代替我们对具体问题的具体研究。具体问题的结论只能是进行具体研究的结果。

毛泽东同志指出：“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

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8页）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概括，充分地估计了认识特殊事物的重要性，没有对于特殊的认识，就没有对于一般的科学认识；又充分地估计了一般理论对于继续深入认识特殊事物的指导意义，深刻地揭示了认识特殊和认识一般的辩证法。

就人类的认识秩序说来，总是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然后才能进行概括，认识事物的一般的共同本质，但这决不是说只有把所有事物的特殊本质都研究过、都认识清楚了才能认识事物的一般的共同本质。在研究问题时，感觉材料搜集得越全面、越丰富，就越有利于抽象、概括的工作。然而，要把所有事物的特殊本质都研究过、都认识清楚然后才进行抽象、概括，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人们在感性认识中所接触到的对象的数目总是有限的，我们只能看到一些麻雀，决不能看到世界上所有的麻雀。但一般寓于特殊之中，“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我们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就能够认识天下所有麻雀的共同生理结构。研究麻雀如此，研究其他事物也是一样。只要我们抓住一个或几个典型的事物，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进行认真的研究分析，认清其特殊的本质，就可以借抽象思维的力量，进而认识该类事物的一般的共同本质。恩格斯指出：“事实

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完全在于我们在思维中能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提高到特殊、然后再从特殊提高到一般；完全在于能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95 页）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统一的认识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两个阶段。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没有丰富的感性认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理性认识。理性认识之所以可靠，因为它是从感性认识发展而来的，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胡思乱想、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认识开始于感性经验，这是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然而，感性认识又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感性认识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但它是不完全、不深刻的反映。只有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才能全面地、深刻地反映客观事物，把握它的内部联系和本质。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论的辩证法。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这种辩证的统一的基础是社会实践。

在哲学史上，唯理论和经验论在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关系问题上，各坚持一个片面，唯理论认为只有理性认识是可靠的，而感性认识是靠不住的；经验论则认为只有感性认识是可靠的，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

哲学史上的唯理论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派，唯心主义的唯理论者，不仅否认感性认识的可靠性，而且认为理性认识不依赖于客观事物，不包含客观内容，认为理性认识是天赋的、主观自生的东西。唯物主义的唯理论者，例如斯宾诺莎，虽然承认理性认识是和客观事物相适应的，但认为感性认识在欺骗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客观外界必须绕过感性，而仅凭理性的直观。

经验论也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派。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者，

例如洛克认为，经验是反映客观事物的可靠的知识，但否认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必要，认为理性认识不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的反映，不过是纯粹的名词而已。唯心主义的经验论，例如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马赫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都把经验看成是纯主观的、第一性的，而客观世界则是依赖于经验的、第二性的。

唯心主义的唯理论和经验论是完全错误的。唯物主义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但是它们都把统一认识过程中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两个不可分割的阶段绝对对立起来，因而在认识论的全体上都是错误的。唯物主义的唯理论，虽然承认理性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但是由于它否认理性认识来源于感性认识，也就不能解释理性认识怎样来源于客观世界的问题，当它否认感性认识的真实性时，实际上就在认识的来源问题上离开了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的经验论，由于否认理性认识的真实性，不把理性认识看做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这在认识论上就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给那种认为理性认识是主观自生的唯心主义留下了地盘。

我们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也都不理解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教条主义者犯了类似唯理论的错误。他们轻视感性经验，不了解书本上的科学知识来自实践经验，实际上把真理看成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主观自生的东西。他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指南，而是当做教条，不懂得理论必须和具体实践相结合。他们是思想懒汉，拒绝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硬要客观实际服从千篇一律的公式。这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形式。经验主义者则犯了类似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的经验论的错误。经验主义者轻视理论，否认感性认识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必

要。因而，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把片面当做全体，把现象当做本质，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他们要客观实际服从主观的狭隘经验，这种经验主义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形式。

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认识的运动是否结束了呢？没有，认识运动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么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0页）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理论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能够指导我们在革命实践中达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目的。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不付诸行动，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用的。同时，理论结论是否正确，在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运动中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认识是否正确，必须到实践中去检验。应用理论于实践，达到了预想的目的，理论的正确性才得到了证实。而且，原来的认识即使是正确的，也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估计到客观情况的全部变化，在实践中总会发现许多前所未料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必须总结在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新的感性材料，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修改或补充原来的认识，使其得到发展。理论回到实践中去，就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从认识方面说，又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

在实践过程中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如果在实践中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因而证明了理性认识的正确性，就完成了对一个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然而，就过程的推移而论，认识的运动还没有完成。因为，物质世界的任何过程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的认识也应当随着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物质世界的发展是永恒的，人的认识运动也永无止境。

在实践过程中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革命实践，循环不已。毛泽东同志写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第 2 版，第 285 页）这就是对人类认识的辩证过程的基本概括。

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形成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第 2 版，第 901 页）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就是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即形成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的过程，也就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坚持下去，就是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革命实践，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也就是从一般再回到特殊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领导者先作群众的学生，再作群众的先生的观点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结合起来，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 第九章 真 理

全部辩证唯物主义是我们寻求真理的强有力的武器。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最重要的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和献身于真理，因为真理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能够正确地认识世界和胜利地改造世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对真理的认识是一个发展过程，追求真理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改造世界。

## 一、客观真理

人们的认识，符合于客观规律的就是真理。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里的正确反映。马克思主义把我们意识里所包含的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或人类的内容叫做客观真理。

关于真理问题的观点是和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紧密地联系着的。唯物主义者承认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思维是存在的反映，他们就必然承认客观真理。列宁说："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承认客观真理；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这都是一回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8页）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思维是第一性的，存在是第二性的，他们就必然这样或那样地否认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在人的意识里的正确反映。

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把世界看成是绝对精神的体现，认为对真理的认识就是对绝对精神的认识。在宗教看来，上帝是真理的化身，真理是上帝的启示。这些观点都否认了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正确反映，因此就在实质上否认了科学意义

上的客观真理。

从贝克莱、马赫主义者到当代的实用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者等等主观唯心主义者，都用不同的方式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实用主义者主张，凡是有用的、有效果的、能给人带来利益的东西，就是真理。美国的实用主义者杜威说："既然工具本身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真假就不是命题的特性了。工具只是有效的或无效的，恰当的或不恰当的，经济的或浪费的……。"美帝国主义的奴才实用主义者胡适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它们'真理'的美名的。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真理和我手里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壶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胡适文存》第2卷，第101页）可见，实用主义者眼中的"真理"，只是能够满足他们的主观要求，给他们带来利益的工具而已。这是不折不扣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论。当然，人们掌握了真理，能够指导实践，达到预期的效果，给人们带来利益。不过，真理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威力，给人们带来利益，是因为它揭示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符合于客观实际。决不能把凡是能够满足某些人主观需要的，对于某些人有用的、有效果的、能带来利益的东西，都叫做真理。投机家、冒险者、骗子手的谎言和谬论，有时也会产生某种效果，攫取到某些利益，但是，谎言和谬论永远不会成为真理。有的反动资产阶级哲学家声称："真理就是不断重复着的谎言。"这就一语道破了主观真理论的实质，充分暴露了这种反动哲学的腐朽性。主观真理论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混淆真假，颠倒是非，把知识和迷信、科学和宗教调和起来，宣扬蒙昧主义以愚昧人民，强词夺理地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辩护的反动工具。

从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论看来，真理是因人而异的，各人有各人自己的真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真理。有些唯心主义者为了摆脱这种取消真理的必不可免的逻辑结论，提出了另一种说法：真理不是个人承认的，而是社会上多数人承认的东西。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说：真理是“社会的、全人类的经验形式”。所谓“社会的、全人类的”词句，是掩盖不住主观真理论的荒谬性的。太阳围绕地球转的偏见和宗教里的天堂、地狱、妖魔鬼怪等等邪说，曾经在一个时期比科学知识还普及得多，为社会上一般人所公认。相反，新发现的真理，常常不能立刻得到社会上多数人的承认。当然，一种意见只要是真理，迟早一定会得到公认。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在一定条件下，多数人的意见是比较客观的，但是无论怎样，一种观点是否是真理，不能以承认的人的多少作为衡量的标准。多数人的承认或者不承认，仍然是意识范围内的事情，把真理说成就是社会一般公认的东西，也还是主观真理论。

真理是客观的，它包含着不依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尽管人们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观察同一对象会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但是关于同一对象的真理，只能有一个，只有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才是真理。

在阶级社会中，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是受阶级的影响和制约的，人们总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来观察客观事物、特别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更是如此。反动阶级站在反动立场上来观察社会问题，由于它们的根本利益、根本要求和社会发展客观必然趋势相反，它们不承认，也不能认识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历史上的进步阶级，其根本利益、根本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它们对社会发展规律能有一定的认识。无产阶

级的根本利益、根本要求和社会发展规律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是认识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的根本条件。把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和认识客观真理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客观真理的学说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只有根据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去追求真理，使我们的主观认识符合于客观实际，才能使我们正确地行动，并在实践中收到预期的效果。一切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只能把人们引向失败。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从主观愿望出发，反对主观主义的态度。

我们的头脑是思维的主体，头脑之外的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人是能够改变客观实际的，不过，为了有效地改变客观实际，就必须认识客观实际，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从客观实际中寻求真理。办工业必须从资源、设备、劳力等等实际情况出发；从事农业生产必须看天看地看庄稼；进行科学研究，必须尊重事实材料，从事实材料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依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根据客观的规律来改造世界，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名言，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具体体现。任何人如果不做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不掌握大量的事实材料，从中抽引出事物的规律，他就不可能使自己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符合，就不能提出正确的意见。一个革命政党要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切合实际情况，必须符合客观规律，而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经过调查研究。同样，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也必须经过各种形式的周密调查，搜集大量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然后才能发现科学规律，形成科学理论。没有哪一种科学真理，不是经过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而轻

易得到的。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是我们根本的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也是我们根本的学风。

是否从实际出发，是否实行调查研究，是一个关系革命事业成败的大问题。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调查研究的原则，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了党在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完全正确的道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切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没有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都不重视调查研究，都不懂得正确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犯了路线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研究问题有两种根本相反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从主观愿望出发，轻视调查研究，就是主观主义的态度。主观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大敌，是科学事业中的大敌，是必须加以反对的。和主观主义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改造我们的学习》，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1页)只有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才有可能发现事物的规律性，把握客观真理。

## 二、真理发展的辩证过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理是客观的，同时又是绝对的和相对

的。从它的内容来看，真理是客观的；从认识真理的过程来看，真理是一个从相对走向绝对的逐步深化的过程。

辩证唯物主义承认了客观真理，也就承认了绝对真理。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代，人们对无限的物质世界的认识，只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人们把握客观真理的限度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在这个意义上，辩证唯物主义承认人的认识的相对性，承认相对真理。

任何真理都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没有离开相对的绝对，也不存在脱离绝对的相对。每一真理都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时代、对物质世界一定程度的认识，所以它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然而，任何真理又确实是客观物质世界的正确反映，所以它同时又是客观的、无条件的、绝对的。列宁说："从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它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图画的轮廓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而这幅图画描绘客观地存在着的模特儿，这是无条件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全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35 页）如果只承认真理的绝对性，否认真理的相对性，使认识僵化，就会使我们在走向绝对真理的道路上停止前进，甚至可能使真理转化为错误。如果只承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真理的绝对性，就会抹煞真理和错误之间的原则界线，走向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是真理发展过程中统一不可分的两个方面。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相对真理包含着绝对真理，绝对真理是相对真理的总和。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

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4页）如果把绝对真理比作一条“长河”，那么，相对真理就是这条“长河”中的“水滴”。每一科学原理接近绝对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无论古典力学或量子力学，都没有穷尽对物质客体运动规律的认识，更没有完结对整个物质世界的认识。可是，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例如从古典力学到量子力学，都使人们的认识向绝对真理前进了一步，都在这条绝对真理的“长河”中增添了新的“水滴”。人类的认识就是这样，以无数相对真理的“水滴”，汇成绝对真理的“长河”，逐步地认识永久的绝对的物质世界。

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者和相对主义者都不懂得这个相对、绝对的道理，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截然分割开来，因而走上了两个错误的极端。

独断论者夸大了真理的绝对性，否认了它的相对性。他们认为，人们一下子就能完全地、绝对地认识物质世界，把已经达到的有限的知识奉为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在他们看来，真理只是绝对的，不应当有任何的发展，他们把绝对看做是排斥相对的绝对，不懂得真理是一个从相对到绝对的无限深化的过程。

我们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是形而上学独断论的一种表现。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必须不断地总结新的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抽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结论，企图一劳永逸地按现成公式行事。他们形而上学地割裂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抓住了真理的绝对性，丢掉了真理的相对性。他们把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是最富有创

造性的，它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毛泽东同志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第 2 版，第 284 页）

相对主义者走到了另一极端，他们夸大了真理的相对性，抹煞真理的绝对性。他们把相对看做是排斥绝对的相对，否认相对之中有绝对。他们把相对和绝对割裂开来，否认绝对真理，从而也就否认了客观真理，否认了人们的认识不断地接近着客观物质世界。相对主义者认为，真理就没有什么客观准绳，"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按照这种观点，到头来就无所谓是非了。从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上帝存在着"、"资本主义是自由世界"等等谎言和骗术，都可以被说成是"真理"。唯物辩证法是承认知识的相对性的，但正如列宁所说的："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全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36 页）

现代资产阶级右翼社会党人，为了反对已经在实践中得到广泛证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常常使用相对主义的诡辩伎俩，说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即使包含真理，也只是相对的。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把列宁主义说成已经过时了。这种攻击丝毫也不能伤害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它也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要在实际生活的发展中不断地发展的，但它的每一个原理都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规律。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就其正确反映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和死亡的规律来说，是绝对真理。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在

实践中就必须遵循这个真理。现在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还存在，并且张牙舞爪，威胁世界和平，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却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已经过时，这正暴露了他们的叛徒立场。

我们从来都认为，对于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应该进行新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正如列宁所说："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同上，第 143 页)

真理的发展过程不仅是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而且也是真理同错误进行斗争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7 页)

自然科学是在同宗教迷信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是在同唯心主义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机会主义思潮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任何时候，和真理并存的总有错误的认识。真理在同错误作斗争中，虽然要经历曲折的道路，但终归要战胜一切错误，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阵地，深入人心，掌握千百万群众，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真理在同错误作斗争中，本身也不断得到丰富，得到提高，得到发展。

无产阶级要同剥削阶级的阶级偏见进行坚决的斗争，也要纠

正自己队伍中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缺点或者由于受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犯的错误。和这两种错误作斗争，对于真理的发展，都有重大的意义。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错误观点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批判，把它作为反面教材，不但可以增强自己身上对于这些观点的“免疫力”，并且可以使真理的内容更加丰富起来。无产阶级队伍中的错误是无产阶级自己可以克服的，只要我们能从错误中正确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种错误就常常是正确的先导。由于缺乏经验和思想方法上的缺点所造成的错误，不但今天会有，就是在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也会存在。因此，不断地克服错误，就是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也仍将是真理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真理和错误的斗争过程中，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对错误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批判，就能发展真理。在这个意义上说，错误可以转化为真理。反之，在和错误作斗争中，如果由于反对一种片面性把真理的某一点、某一方面加以夸大，而走到另一种片面性，也就会使真理变成错误。列宁说：“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4页）因此，在和错误作斗争中，决不能以一种片面性代替另一种片面性；只有全面地具体地掌握真理，才能克服和防止一切片面性的错误。

通过相对真理而日益接近绝对真理，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真理，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我们懂得了这一规律，就可以自觉地利用它来追求真理，促进真理的发展。

我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自觉地运用真理发展规律、促进真理发展的方针。

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和科学上的是非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服的方法，通过科学界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加以解决，而不能采取简单的、压服的方法。不让错误意见发表，它仍然存在着。只有通过正确的意见和错误意见的斗争，才能辨明是非。真理愈辩愈明，而谬误总是经不起认真的争辩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的主观认识达到客观真理，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当某一个问题的客观真理还没有为我们掌握的时候，就必须鼓励人们从各种不同方面，经过各个不同途径进行探索，进行各种不同的试验，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进行自由的争论。只有这样，才能够一步步地接近客观真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追求真理的手段。

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学术问题的争论，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固然也会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因此而害怕实行这个方针。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8 页）

事实证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完全符合于真理发展的规律，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极端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

## 三、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从来没有人作过

科学的解决。一切唯心主义哲学家总是从认识本身中寻找这种标准。或者是以已有的某种教条作标准，例如从汉代以来，作为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儒家，通常总是“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汉代的扬雄说：“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扬子法言》卷二）；或者是以自己的观念作标准，例如明代王阳明的所谓“良知”是“自家的准则”，“是便知是，非便知非”（《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法国的笛卡儿认为，概念的明白和清楚是真理的标准，这也是从认识本身中寻找标准。黑格尔虽然说过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但是，他把实践只理解为精神活动，所以也还是以观念作为自身的标准。实用主义者詹姆斯说：“凡是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并使我们获得效果的东西就是真理，这也是真理的惟一标准。”显而易见，这是公开地否认真理的客观性。

旧唯物主义者承认真理的客观性，他们以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作为真理的标准，但是他们不理解社会实践对认识的作用，也就不能科学地解决怎样去检验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完全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检验认识正确性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离开实践争论认识是否正确的问题，是一种烦琐哲学。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页）

实践为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呢？

意识范围内的认识是否符合于意识范围以外的客观事物，这在意识范围以内是决然得不到证明的，客观事物本身也并不来直接回答人们的认识是否正确。为了检验人们的认识是否正确，只能

从认识回到实践。这就是说，人们在实践中获得了关于客观外界规律性的认识以后，拿着这种认识去指导实践，如果把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等等变成了现实，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那么，这就证明了，这种认识是符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的，是正确的，否则就是不正确的。只有人们用关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作指导，通过实践去改变事物，客观事物才通过实践的结果，给人们以回答。检验认识的标准不是主观的，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人们只能通过实践的结果来判断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因此，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

凡是科学的、正确的理论都将被实践所证实，凡是反科学的、错误的理论，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拿到实践中就要碰壁。原子内部构造的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但是，人们能够用关于原子内部运动的知识，在工业和其他方面利用原子能，这就证明人们的这种认识是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它的真理性在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得到了证实。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它经受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这并不排斥逻辑的证明。判断认识的正确与否，逻辑的证明是重要的手段。某项工程设计，某一方针、政策、计划，在其实施之前，即在受到实践检验之前，对它的正确与否，应该而且可能作出一定的判断。人们可以拿已有的某些知识为前提，进行推理，来判断这个设计、这个方针、政策、计划是否正确。这里是否出现了两个检验标准呢？不是的。逻辑的证明并不是由人们的主观任意作出，它归根到底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逻辑推理中的前提必须是在已往的实践中被证明为正确的知识。逻辑推理中又必须使用正确的逻辑规则，这些规则也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且被人类社会实践所亿万次重复检验过了的。而

且有许多事情，逻辑证明还不能作出最后的判断，这是因为已有的知识有限，而在事情的发展中还可能出现不能预计到的情况的缘故。对于这些事情，在经过逻辑证明以后，还必须再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最后判定它的真理性。

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对这一标准不应该作形而上学的理解。认识是否正确，应该用而且只能用实践来检验，实践所证实的一切都是客观真理，一切谬见归根到底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因此，实践的标准是绝对的。但是实践的标准同时又是相对的，因为实践是历史的、发展的，每一历史阶段的实践都有局限性。一定历史阶段的实践不能完全证实或者驳倒一切的认识。某个历史阶段的实践所证实的某种认识的正确性，也是有限度的，超出这个限度就未必是正确的。但是，今天的实践所不能证明的，终将在今后的实践中得到证明。

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关于实践标准的意义，列宁写道："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全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42—143 页）

实践证实真理，揭示错误，人们根据实践的结果修正、补充原来的认识。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认识，还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

## 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指出，认识世界的目的，不仅在于说明世界，重要的还在于改造世界。我们追求真理，掌握科学知识，无非是以此作为行动的向导，去改造世界。我们研究自然科学，探

求自然的奥秘，掌握自然规律，是为了从事生产斗争，征服大自然。我们研究社会发展规律，是为了进行革命斗争，进行经济建设，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总之，一切认识都是为改造世界的实践服务的。

理论、知识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能够指导人们的行动。只有以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作为行动的指导，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若不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就会成为盲目的实践。

人们为了正确地行动，避免盲目性，就必须了解事物的发展进程，具有科学的预见能力。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性的，通过实践得到规律性的认识，就能预见未来，指导实践。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有科学预见。我们越是实事求是地认识事物的进程，把握事物的规律性，就越能比较准确地预见将来。一般说来，科学预见只能大体上推断出事物发展的基本进程，而不可能周全地预知到它的一切细节。科学预见越是准确、越是深远，根据它拟订的行动计划、方案就越符合于客观事物发展的过程，我们的行动就越能发生应有的效果，就会更顺利地达到行动的目的，有力地加速客观事变的进程。

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预见未来，才能有效地和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人们在实践中遵循客观规律，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统一起来，人们在实践斗争中就能够掌握主动性，行动就获得了自由。

自由是对于必然性的认识。人们在没有认识客观必然性之前，只能是必然性的奴隶，在工作和斗争中就处于被动地位，行动就没有自由。人们认识了必然性，利用必然性去征服自然，才有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建立在对必然性的科学认识之上的。自由并不

排斥必然，而恰恰是依据着必然；违反必然，就没有自由。人的自由总要受客观规律的制约，不受客观规律制约的绝对自由是没有的。所以，真正的自由和必然是统一的。

辩证唯物主义肯定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东西，人们不能任意“消灭”规律或者“创造”规律。辩证唯物主义又认为，人们能够认识和掌握规律，利用规律来为社会谋福利。当人们认识了规律的时候，必然就转化为自由，人们就能有效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成为客观规律的主人。也只有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深入实际，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客观规律性。

在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必然性和自由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片面的错误观点。一种是抽象地片面地夸大主观能动性，认为人们可以脱离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随心所欲地任意行动，这是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任何人违背了客观规律性、必然性而任意妄为，其结果必将是事与愿违，不但得不到自由，而且一定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另一种是抹煞人的主观能动性，把必然性看做对自由的否定，认为人们只能作客观规律性、必然性的奴隶，只能消极地依从客观规律，而不能利用客观规律有所作为，这是机械论的观点，人类实践的历史证明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不能把尊重客观规律性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绝对地对立起来，只承认某一面而否定另一面。只承认客观规律性，不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或者相反地，不顾客观规律性，鲁莽从事，都会使工作遭到失败。

人类从自然和社会的奴隶变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的历史，就是人们对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性、必然性的认识，愈来愈深刻的

历史。

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主观世界；改造了主观世界，又促进着改造客观世界。人类社会不断的变革，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一重又一重地打破社会历史条件对人们眼界的限制，人们的主观世界就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改造，人们的认识能力就一步又一步地提高。全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统一的过程。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人类社会开始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剥削制度和私有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所代替，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对人的统治（即生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为人对物的统治所代替了。一直作为异己力量支配着人们的社会发展规律，开始被人们所掌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自然和社会的自觉的主人。恩格斯说："只有从这时起，人们才开始充分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这时候，他们所推动着的那些社会原因，才将以极大的和日益增加的程度，给予他们以其所希望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的王国进于自由的王国的飞跃。"（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99 页）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充分的可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高度有效地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地改造世界，创造自己光辉灿烂的历史。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照耀下，正在鼓足革命干劲，奋发有为地建设社会主义，努力使我国逐步摆脱"一穷二白"的面貌，开始了从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仍然是在实践的

基础上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过程。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进一步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以求越来越深入地洞悉大自然的奥秘，越来越深入、越准确地把握社会生活的规律，越来越充分地发挥改造客观世界的主观能动作用，从而一步步得到更大程度的自由，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促进共产主义的加速实现。

共产主义时代是人们都能自觉地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的时代。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永不会完结，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永无止境。人们永远要在实践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地克服主客观的矛盾，不断地发现真理，排除谬误，不断地得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从而使人类社会被改造得更加美妙，人类征服宇宙的巨大威力得到更大的发挥。

# 下篇 历史唯物主义

## 第十章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从而把唯心主义从社会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建立了完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惟一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使得社会历史的研究第一次有可能克服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混乱和武断的见解，而成为真正的科学。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的整体。列宁指出："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全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44 页）

* * *

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意识和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是划分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惟一标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惟一标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给与了不同的解答。历

史唯物主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历史唯心主义则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在本书的前面各章，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各方面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世界，这个物质世界，是按照辩证法的规律，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曲折地向前发展的永无止境的客观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指出，这个过程不仅仅存在于自然界，而且也存在于人类社会。这就是说，不论对自然界或对人类社会，都应该用唯物主义的原理来加以理解。自然界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同样，人类社会历史也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按照本身所固有的必然规律而发展的客观过程。

列宁指出：在马克思以前，一切历史理论有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一切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发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历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8页）列宁的这段话深刻地说明了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致命的弱点。

许多抱着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理论家都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人们的思想动机，归结为个别英雄人物的思想动机。他们不能发现物质生产的发展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抹煞或忽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广大的劳动群众在社会历史上的决定作用；他们不能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社会发展看成是一些偶然事件的杂乱的堆积。按照这种理论，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

只能等待某一杰出人物的偶然的出现，等待他头脑中偶然迸发的明亮的思想火花照亮黑暗的大地。这些理论对人民群众是精神的桎梏，叫他们安于困苦不堪的生活，最好也只是叫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幸运的偶然性上。

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曾经在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解释上提出了某些有价值的论点和推测，有些唯物主义者力图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但他们的社会历史观在整体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在中国，例如春秋时代的管仲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的观点。东汉的王充发挥了管仲的这个观点。王充认为，人们的善恶行为，并不在于人的性质，而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在于农业生产的丰歉，而农业生产的丰歉则由于自然界的原因（风调雨顺或水旱成灾）。由此，王充得出结论说：“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论衡·治期篇》)王充把社会治乱的原因归结到自然条件是错误的，但是他的观点在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方面是有一定意义的，在运用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的探索上也是一个有价值的尝试。明末清初的王船山认为，社会是进化的，并肯定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因果联系，他否定意志决定论，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是由其生活环境所决定的。

在欧洲，例如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对于社会生活的起源和发展提出下面的看法，他认为，原始社会的人过着群居生活，他们没有住所、衣服和工具，他们以偶然获得的食料充饥。他们“受到需要的教训”，逐渐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在需要的影响下，“双手、智慧、机灵”就引导他们走向文明的生活。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对于社会历史，提出了“环境决定意

见”的观点。例如爱尔维修认为，不良的社会风气是恶劣环境的结果，因此要改变这种风气就必须改变环境。但是，他们在提出这样观点的同时，又提出了“意见支配世界”这个公式。这两个观点是直接对立的。这些法国唯物主义者就使自己陷入了不可解决的矛盾循环，他们仍然不得不把历史进步的希望寄托在某些能够以自己的意见代表理性和真理的先知先觉的人物的身上。

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认为社会历史是绝对精神发展的高级阶段，但他曾试图把人类历史说成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的过程。列宁曾认为在黑格尔的某些关于历史的见解中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在马克思以前，对自然界的解释曾出现过很多的唯物主义派别；而在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论领域内，唯心主义却占着完全统治的地位，因而不能产生真正的历史科学，这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同志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2页）

关于社会历史的解释直接同各阶级的利害有关，它不能不更多地受到剥削阶级偏见的歪曲。在任何剥削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剥削者拥有从事精神劳动的特权，被剥削者承担从事体力劳动的沉重义务。一切剥削者总是夸大精神的作用，贬低物质生产的意义。不同的剥削阶级以及同一剥削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它们总是或多或少地抹煞被剥削者——

劳动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其剥削的特权，总是把某种剥削制度说成是永恒的，把这种制度看成是神的意志或某种永恒的正义、人类的理性所决定的，而否认社会现象的暂时性、历史性。因此，剥削阶级总是竭力在社会历史问题上坚持唯心主义的阵地。只有现代无产阶级这个彻底革命的阶级才能够摆脱剥削阶级的一切偏见，只有这个阶级的思想家才能够创立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的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不可能产生，还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只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大机器生产才提供了科学地理解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可能。恩格斯说："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历史动因和其后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所以要研究这些动因差不多是不可能的；现在这种联系已经简单化了，谜语终于有可能解答了。自从采用大工业的时候起，即至少从一八一五年签订欧洲和约的时候起，在英国，谁都知道，两个阶级，即占有土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夺取统治权的意向，曾经是该国全部政治斗争的重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族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使人们意识到了。……而从一八三〇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都被认为是为争取统治权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如此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们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推动整个近代史、至少是上述两个最先进国家的近代史的动力。但是这些阶级是怎样发生的呢？骤然看来，把从前大规模封建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至少较近地）归于政治的原因，归于暴力的掠夺，可是这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却是不可思议的了。十分明显的，这两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纯粹经济的原因决定的。同样明显的，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与

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利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0—41 页）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使得社会阶级关系简单化、明朗化，把社会发展的经济根源明显地暴露了出来。而且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打破了地方和民族的闭塞状态，扩大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有可能把各国各民族联系起来加以比较研究，发现其共同性、重复性，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

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所以不能够在根本上摆脱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除了阶级立场和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外，还因为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有它的特殊的认识根源。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自然界的发展过程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是各种盲目的、不自觉的力量。天体运动和微粒子的运动，声、光、热、电，化学变化，以至于生物的生存演变等等，这些物质的运动变化，都没有自觉的预期要达到的目的，只是由于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表现为一定的有规律的客观过程。社会历史的情况却不同，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人，“而人是赋有意识、经过深思熟虑而行动或因受热情驱使而行动、并且抱有一定目的的。在这里，无论什么动作，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7 页）。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形式。这个特殊的形式很容易使人发生迷惑；如果人们只看事情的表面现象，而不深入研究事情的本质，就会以为社会历史的发展似乎是决定于人的主观意识，而不是遵循着历史的客观规律。历史唯心主义者就是利用了和片面夸大了这个表面现象，把人的思想、人的主观意志说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特别是把英

雄人物个人的思想和意志说成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决定力量。社会历史是通过具体历史人物所参与的具体历史事件所构成的。每个具体历史人物的性格、才智、意志都各不相同。由于不同的人物和许多其他复杂条件的影响，各个历史事件的具体状况是不会完全同样地重复出现的。被这种现象所迷惑的人，就会否认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存在着规律性，把社会历史看成是由个人意志所支配的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

为了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必须冲破笼罩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上的这种迷雾。

在社会历史领域里，一切人的一切活动固然都有其自觉的意图和预期的目的，但各个人的意图和目的，并不是一样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常常是互相冲突、互相矛盾的。这些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意图和目的，在实际生活中并不都能够成为现实。历史上，在人们还没有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并应用这样的认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的情形下，人们的主观意向，在大多数的场合下所引起的结果，都不是所预期的，甚至是和预期相反的；只在很少的场合下，人们的期望能够如愿以偿。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曾经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进行反封建的斗争，他们声称这个口号将引导人们去建立起永远合理的社会制度，但在实际上所得到的结果，只是一个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这里就有两个问题必须解答：第一，为什么同一个社会里，人们的主观意向会有种种不同甚至于互相矛盾、冲突？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中间发生这样的矛盾？第二，为什么各种不同的主观意向，有的能够得到实现，有的不能实现，有的似乎实现了，但实际的结果和所预期的并不一样？很明显，这些问题，决不是在人的主观意识本身中可以找到解答的。认为“意见支配世界”的唯心主义观点，

把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人们的思想动机和主观意图，结果就只能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上陷入一团混乱。如果不能弄清楚隐藏在人们的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就不能科学地说明社会历史。

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曾经试图有系统地答复这个问题。他认为，历史人物所标榜的动机以及真实的动力，都根本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别的动力，而这种动力是应当加以研究的。黑格尔的这个思想无疑是深刻的，但是他不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黑格尔虽然批判了“意见支配世界”的观点，但他不是从历史本身去寻找这种动力，而是从历史外面，从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里把这种动力输入到历史中去。在他看来，支配人类历史的“民族精神”无非就是支配整个宇宙的神秘的“绝对精神”的一个发展阶段。

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

恩格斯指出，在研究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的动力、研究历史发展的真正的动力的时候，所应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杰出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推动整个阶级、整个民族行动起来的动机。马克思主义证明了，人类全部历史（指阶级社会），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的根源是各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冲突，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是物质生产发展的结果。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发展的状况决定整个社会的面貌和社会意识，这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唯物主义根本原则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贯彻。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者——劳动人民的历史。

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做了一个经典的说明：“一

切历史上的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予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人的观念和思想也是如此，可以简单地完全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其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奠定在它的真正基础之上了；一个十分明显而先前一直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而后才能争取统治权，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2页）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提供了客观地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它可以使我们不为形形色色的复杂的、偶然的社会现象所迷惑，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找出它的最深刻的根源。因而它就完全打破了以往某些历史家否认社会历史领域中存在着任何重复性的观点。的确，社会现象的完全重复是没有的，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现象中却存在着共同的本质，这里就表现着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复性。列宁指出：当人们“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关系）时，始终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载《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0页）。因为这样就不能区分社会中哪些现象是本质的、重要的，哪些现象是非本质的、次要的。“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就有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只有这种概括才使我们有可能从记载社会现象（和从理想的观点来估计社会现象）进而极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载《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0页）

社会历史告诉我们，尽管各个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但从根

本上说来，除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之外，一般都经过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四种历史形态。凡是奴隶制社会，不管其民族特点如何不同，都充满着奴隶和奴隶主的斗争。无论是东方或西方的封建社会，它的基本矛盾都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说明社会中各种现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普遍的和不断重复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但它决不像资产阶级学者所污蔑的那样，似乎低估和轻视社会意识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说明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又同样科学地指出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就在于：腐朽反动的社会意识如果支配了人们的头脑，它就能够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阻碍的作用，新的进步的社会意识如果得到广泛的传播，并掌握了群众时，它就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起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进步的社会意识甚至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因素。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他又指出：“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4页）

社会意识的重大作用是必须充分估计到的，但是，它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后决定的原因。因为，当着它成为某一历史事变的原因之前，它的产生是另一更深刻的原因的结果。这一更深刻的、更根本的原因就是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最基本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而社会意识本身只是这个社会存在的反映。进步的社会意识，是社会中的新生的进步势力的要求的反映；腐朽反动的社会意识，是社会中腐朽落后的势力的要求的反映。例如中国革命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就这一点来说它有着某种决定的意义；但是引起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的矛盾。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武器，只是由于它适合于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客观需要，由于它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

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正确解决，宣告了历史唯心主义的彻底破产。恩格斯说："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他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的这个原理，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在仔细考察时便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一些最初的结论就给了任何一种甚至最隐蔽的唯心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一切对于全部历史事物的因袭惯用的见解，都为这个原理所否定了。全部传统性的政治思维体系崩溃了。"（恩格斯：《论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7页）

反动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都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还能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思想，那么，到了腐朽的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对社会历史就只能提出极其反动的解释。他们或者用新的形式重复那些早已破产了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老调，按照生物机体的结构来解释社会现

象、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混为一谈。他们或者只注意社会生活中的枝节问题，回避对社会发展中本质问题的研究。而根本否认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用各种形式宣扬非理性主义，则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主要倾向。大多数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热衷于研究个人的心理状态，企图从心理状态方面对社会生活做主观的任意解释，所有这些都是为粉饰资本主义日益混乱的秩序，为医治资本主义的不可解救的痼疾提供药方。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种历史观自然而合理地解释了以往历史中阶级统治、阶级剥削的存在是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从而说明了阶级统治、阶级剥削的现象，在生产得到巨大发展以后是必然会逐步消灭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唯物史观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得出结论：阶级斗争必然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专政本身是进到消灭任何阶级和进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从而建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今天，社会主义已不再单纯是一个科学的理想，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内已成为光辉的现实。这一事实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的无可辩驳的证明。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使研究社会生活方面的各门学问能够成为科学。社会科学的各部门，如经济学、政治学、美学、伦理学等，分别地研究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过程的具体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和各个部门的社会科学有所不同，它所研究的是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的过程和最一般的规律，而不是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具体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和一般的规律，是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起作用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能适用于社会科学各部门，为这些科学部

门提供方法论和理论基础。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一样，并不是科学之科学，它不能代替各门具体的科学，不能把它作为标签硬贴在实际社会生活之上。19 世纪 90 年代德国曾出现过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的现象，恩格斯在批判这种现象时写道："一般说来，对于德国许多青年作家，'唯物主义的'这个形容词不过是一个套语，他们用这个套语去处理各种事物，再也不花什么气力去作进一步研究，也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一切都解决了。然而，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个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一种用以按黑格尔学派方式构造体系的手段。全部历史都应该开始重新研究。首先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生存条件，然后才可试图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恩格斯：《致康·施米特》，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87 页）

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都成为完全可以用科学的方法透彻地理解的事情。依靠这种科学的认识，人们不但能够了解今天发生的事情，而且能够获得关于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预见。历史唯物主义使一切为争取解放而斗争，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人民看出了明确的前途，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并且能够有把握地进行自己的活动。历史唯物主义是领导人民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共产党的可靠的理论武器。

* * *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经典的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彼此间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本身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与他们当时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

筑所赖以树立起来而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其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和它们向来在其中发展的那些现存生产关系，或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在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会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经济生产条件方面所发生的那些可用自然科学精确眼光指明出来的物质变革，去与人们所借以意识到这种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形式，——简言之，思想形式，——分别清楚。正如我们评判一个人时不能以他对于自己的揣度为根据一样，我们评判这样一个变革时代时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恰恰相反，这种意识正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现存的冲突中求得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当它所给以充分发展余地的那一切生产力还没有展开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当它们所借以存在的那些物质条件还没有在旧社会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会提出自己所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我们仔细去看时总可看出，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0—341页）

列宁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列宁逝世以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使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下面各章将分别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 第十一章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一切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最后决定力量是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生产方式发展和变革的原因，也是整个社会形态发展和变革的根本原因。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为着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必须研究为什么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 一、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地理环境和人口的增长或减少对社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但它们不是社会面貌、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一个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个社会制度的决定因素。

地理环境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必要条件。物质资料生产的对象是自然界供给的，或者是人们从自然界取得的。人们进行生产所使用的工具也是用自然界的材料制成的。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明显地受到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马克思说："劳动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会发生影响，致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国内，会满足不同的需要量，并在其他情形相似的限度内，使必要劳动时间成为不一致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32

页）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人们生产生活必需品费时较少的地理环境中，生产的发展就会快些；反之，在人们生产生活必需品费时较多的地理环境中，生产的发展就会慢些。

但是，地理环境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斯大林说："欧洲在三千年内已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可是，在这同一时期内，欧洲境内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更，便是变更得很少很少，甚至地理学也不肯提到它。而这是不言而喻的。地理环境方面一种稍许严重的变更都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社会制度中甚至最严重的变更，也只需要几百年或一两千年就够了。由此就应得出结论：地理环境决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决定原因，因为在数万年间几乎仍旧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那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更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载《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706 页）

某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如 18 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19 世纪英国的布克尔等人，企图用地理环境来解释社会制度的更替。他们认为，地理环境（包括气候、土壤、地形等）直接或通过食物及职业类别来影响人类的生理和心理，决定人类的嗜好、气质，并通过这些决定整个社会制度。这种夸大地理环境作用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至于法西斯主义的地理政治学派（这种学派在希特勒德国和现今的美国都很流行），则是利用政治由地理因素决定的谬论，来为帝国主义的所谓争取"生存空间"的侵略战争以及公开地掠夺殖民地的暴行做辩护。

人口的因素也是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人口稀少的地区，虽然其他条件和别的地方一样，生产力的发展可

能慢一些；反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口较多可能是生产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人口的增长虽然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它也不能成为社会发展中的决定力量。因为第一，人口的密度不能说明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人口密度大的国家不一定是社会制度先进的国家；人口密度小的国家也不一定是社会制度落后的国家。第二，人口的增长或减少不能说明为什么某一个社会制度恰好由某一个新制度来代替，而不是由其他的社会制度来代替。第三，人口的增长或减少不能成为改变社会制度的革命的原因。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硬说中国革命的原因是由于人口过剩。毛泽东同志在驳斥这种谬论时说："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佛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14页）

英国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捏造出所谓"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是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规律，硬把这种"规律"说成是自然的法则，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失业和贫困的根源，不在于资

本主义制度，而是由于人口太多。他认为只有减少人口，才能解决失业、贫困的问题。这种错误的观点只是为着要掩盖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广大劳动人民贫困破产的事实。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人口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而决不是由于生活资料的生产赶不上人口增长，事实上在应用进步技术的情形下，生活资料的增长远比人口的增长要快。现代资产阶级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同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和侵略政策直接联系起来，用这种谬论来为他们发动侵略战争和掠夺殖民地的行为辩护。

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只能是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也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或者简单地说就是物质生产。

人们要从事政治、科学、艺术等活动，首先要能够生存。为了生存，必须吃喝穿住，这就是说需要有食品、衣服、住房、燃料等生活资料；为了获得这些生活资料，就必须进行生产。马克思说：“每个小孩子都知道，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工作，——不用说是停止一年，就是只停止几个星期——就会饿死的。”（马克思：《致留·库格曼》，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2页）离开了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为了生产生活资料所必需的生产工具和其他劳动资料的生产，人类就不可能生存，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生活。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

人们为了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必须使用一定的生产工具。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同以生产工具为主的被用于生产的劳动资料相结合，就构成社会的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所表示的是人们在生产中对自然界的关系。人们除了在生产过程中要同自然界发生关系外，他们彼此之间也发生一定的关系，这就是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就构成生产方式。

一个社会的面貌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阶级结构以及政治、法律、道德等观点，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方式。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没有人对人的剥削，是由于那时的生产方式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随着私有制的出现，社会才分裂为阶级，人们之间才形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并产生了各个敌对阶级的政治、法律、道德等观点。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只有随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消灭，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确立，阶级剥削的现象才会消灭，新的政治、法律观点以及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制度才能建立。

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着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当一种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时期，不得不为另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变化。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证明了这一点：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目前在不少国家中已经实现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都是为生产方式的更替所决定的。

## 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前面已经提到，生产力的要素包括：以生产工具为主的被用于生产的劳动资料，以及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

生产工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的物质标志。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形态之所以比先前的社会形态达到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归根到底是因为在生产中应用了或者能够应用更进步的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及一切劳动资料是社会生产力中的物的要素。

仅仅有物的要素还不能构成生产力，物的要素必须被人——劳动者所掌握，才能成为生产力。劳动者是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的要素。没有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工具和其他劳动资料只不过是一堆死物，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生产工具的制造和改进都是通过劳动者实现的。劳动者是首要的生产力。

前面也已经提到，在生产中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就是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说："为要从事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经过这些社会的联系和关系，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页）

生产关系的特征决定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斯大林说："生产力的状况所回答的是人们用怎样的生产工具来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问题，而生产关系的状况所回答的则是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流、矿源、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联络工具等等）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是由全社会支配，还是由单个的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利用去剥削其他的人、集团和阶级的问题。"（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载《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11页）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着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不同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而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人们的不同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又决定着产品在人们之间的分配形式。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生产关系的内容包含着三个方面：（1）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2）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和它们相互间的关系；（3）由前面两种情况所决定的产品分配形式。上述的三个方面，组成为生产关系的整体，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生产

资料的所有制是其中最基本的、决定的方面，它决定生产关系的本质。

生产关系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原始社会的以原始公社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和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都属于这一类型。在这种生产关系下，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是互助合作关系；产品分配形式，在原始社会是平均分配，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另一种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以人剥削人的制度为其主要特征的生产关系，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都属于这一类型。在这种生产关系下，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集团或阶级居于统治地位，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集团或阶级被迫处于服从的地位；由于前者占有生产资料并处于统治的地位，他们就能够以各种方式支配后者的劳动力，不劳而获地占有绝大部分的劳动果实，而劳动者只能得到仅够维持活命、甚至难于维持活命的生活资料，这样，就形成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具有对抗的性质，它表现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残酷的阶级斗争。

在构成生产方式的这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生产力是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它处在经常不断地发展变革的过程中。同生产力比较起来，生产关系则是相对稳定的，一种生产关系一经形成，就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表现为相对固定的形式。生产的变革和发展总是从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开始的，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革和发展开始的。社会生产永远不能中断，改造自然的活动永远不能停顿。由于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不断地

积累和增长，就有可能在生产关系基本不变的情形下，逐渐改进生产工具和创造发明新的生产工具；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它在生产技术上的应用，更能加速生产工具的变革过程。生产工具的每一次显著的改进，都要使人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从而把生产力提高到新的水平。

生产力是在生产方式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生产力是起决定作用的方面，每一种生产关系，都是适应于一定的生产力状况而建立起来的。生产发展的情况不同，为进行生产而建立起来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同。人和人的这种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生产才能顺利发展。任何一个社会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都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其内容，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则是生产力赖以发展的社会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必须适应于内容。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向前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

在使用石头工具的极低的生产力条件下，只能产生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以金属工具为主的较为进步的生产力，决定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产生。由于金属工具的改进，特别是冶铁技术的进步，使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力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就使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终于为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代替。从使用手工工具过渡到机器生产，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最终战胜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标志。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44 页）

这就是说，某种生产关系的必然出现，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的结果。在根本上说来，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更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变更。在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某种水平的时候，就不可能出现与之相适应的某种生产关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之一。这个原理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源泉，指出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从而也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后的决定力量，而首要的生产力——劳动人民，则是历史的创造者。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固然有着决定的作用，但是，生产关系也不是消极的东西，生产关系是生产力赖以发展的社会形式。每一个历史时期所达到的生产力，都要求与自己的发展情况相适合的社会关系，只有在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形式之内，生产力才有可能顺利地发展。当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合的时候，它就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它就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例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失业问题，技术设备能得到高度的利用，生产力的诸要素都能顺利地发挥它们的作用，生产获得迅速的发展。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冲突。在帝国主义国家，经常存在着失业大军，技术设备利用率很低，生产力各要素的正常发展受到了重大的障碍，经济危机愈来愈频繁，在一般的情况下，生产的发展是很迟缓的。

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在新的生产力出现之后才有可能，但是，历史上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总是在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之后，而不是在此以前。生产发展的辩证法总

是这样：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必须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为前提，必须是在经济生活中迫切地提出了根本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的时候，也就是生产力在某种生产关系的内部已没有发展的余地，不根本改变这种生产关系就不能使生产力顺利地向前发展的时候；另一方面，新的物质技术的大规模发展，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要求的实现，又有待于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当新的生产关系一旦确立起来，它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力量，促进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生产技术的巨大革新。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发展，一般说来，是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之后才实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的高速度的飞跃发展，是无产阶级运用政权力量，把旧的生产关系摧毁，在经济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如果忽视生产关系的能动作用，那是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原理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然而，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生产力是比较活跃易变的，而生产关系则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在生产方式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情况。在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的一定时期，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基本上是相适合的，这时候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就为生产力的发展所需要。这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但这种矛盾还处在数量变化阶段，还

不会、也不需要引起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当着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原来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就逐渐变成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陈旧的生产关系，这时矛盾就日益激化起来，就必然要提出生产关系根本变革的要求，就由量变的阶段进到根本的质变的阶段。在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实现之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不适合又转化为适合，从而又在新的基础上开始了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时期，开始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新的矛盾运动。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合到不相适合，再到新的基础上的相适合，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向上发展的无限运动过程。

生产方式由量变到质变的矛盾运动过程，是通过人们的自发活动到自觉的革命活动的过程而实现的。历史上每一代人开始生活时，必须适应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才有可能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当人们在旧生产关系内部改进生产工具的时候，并不能理解到这种行为会引起什么社会后果，他们所注意到的只是眼前的直接的经济效果。原始社会的人们，在劳动实践中，发现了从烧熔的石块中淌出来的流质冷凝后的块状物，比磨制的石刀还要锋利，于是，逐渐把石器改变为金属工具，他们完全不知道，这将会引起奴隶制的诞生；资本家为了追逐更多的利润采用大机器，他们没有想到，伴随大机器生产出现的无产阶级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当旧的生产关系已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时候，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成为冲突的时候，反动统治阶级仍然要竭力用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来维护这种腐朽的生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自觉革命活动，就不可能粉碎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

关系。这时在先进阶级中间就会产生新的思想和要求，这种新的思想和要求，一般地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生产关系根本变革的需要。在这个新的思想和要求的指导下，进步阶级和人民群众对反动统治阶级进行革命斗争，这就使历史发展由自发的运动进入自觉的革命活动，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总是通过革命来实现的。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的要求，这是客观的必然规律。为了保证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旧的过了时的生产关系必须被打破，而且也一定能够被打破。生产关系不能长远地落在生产力的后面；作为最革命的、决定的因素的生产力最终必然要冲破束缚自己的桎梏，为自己的发展开拓道路。革命阶级是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现者，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的要素，生产力的解放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趋势，是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当劳动者已经无法在旧的生产关系下继续生活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必然要行动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去冲击腐朽的生产关系。奴隶暴动冲垮了奴隶制度；农民起义动摇了并最后摧毁了封建制度；目前在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土地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推翻了资本的统治，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必将粉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的趋势终究是不可阻挡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敌的。

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曾经用臭名远扬的“生产力论”，来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他们片面地夸大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又把生产力归结为科学技术；根本抹煞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抹煞了在变革生产关系中群众自觉革命活动的重大意义。按照他们的理论，由资本主义

向社会主义过渡，似乎只是单纯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必经过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不需要通过尖锐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

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借口现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公开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并且大肆宣扬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他们说：“原子能的发现同时也标志着自发的和自觉的社会主义力量进一步发展中的新的、巨大的阶段。”（列·弗拉赫维奇：《论社会主义各种力量合作的形式》）这里所指的新的、巨大的阶段就是他们所说的“现今的世界，现今的人类社会……总的说来，已经深深地长入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了”（米·托多罗维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宣言》）。在他们看来，似乎帝国主义垄断集团已不再反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不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可解决一切问题，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为过时的和陈旧的东西了。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公然无耻的背叛。马克思和列宁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作用。但是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决不是预兆着社会革命的消失，恰恰相反，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说来，这正是预兆着新的社会革命的到来。列宁说：“……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社会财富的技术革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却使社会更加不平等，使贫富之间的距离扩大，使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无法生活，遭到失业和各种困难。”（《修改党纲的材料》，载《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34页）这就是说，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引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规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制定战略和策略、方针和政策的重要客观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求在自己的工作和斗争中自觉地掌握和运用这

个客观规律。当着生产关系（如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时，必须领导人民群众，打破过时的、腐朽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为此就必须同维护旧生产关系的一切反动落后势力，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打碎反动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当着建立了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时，就要使新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的时期内保持相对的稳定，并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某些环节上的矛盾，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地得到完善，以便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某种生产关系应当加以变革还是应当使之相对稳定，并不依赖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决定于它是否同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相适合。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第 2 版，第 1079 页）我们党之所以正确、所以不可战胜，就在于它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现者；就在于它把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最高准则；就在于它科学地把握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中包括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领导我们人民摧毁了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使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强大的发展。

## 三、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社会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历

史上五种基本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

原始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原始公社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这种生产关系是和当时极低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人们使用的是极其简陋的石制工具，如果不采取集体劳动的方式，就无法进行生产，就不能生存。这种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了它的社会形式必然是以原始公社为单位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公有制。原始人没有任何私有的观念。某些同时用做防身武器的生产工具，只是为着使用起来顺手，才固定归个人使用。原始人的劳动产品只能勉强满足生存最起码的需要，没有任何剩余，与此相适应，产生了平均分配的制度。这时还没有人剥削人的可能。

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最初是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以后又出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和产品的交换。而社会分工和产品的交换必然引起私有制的出现，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当分工渗入公社，而社员开始各自单独生产某一种产品并把这种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卖的时候，表现商品生产者这种物质上的孤独性的私有制就出现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载《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3页）同时，由于生产力的提高，金属工具的出现，劳动产品除维持最低的生活而外，还有了些微的剩余，这就造成了剥削他人劳动的可能。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只有采取最粗暴的奴隶制的形式，才能从他人的劳动中压榨出剩余产品。于是，原始社会便合乎规律地由历史上第一个剥削制度——奴隶制所代替。

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并且占有劳动者——奴隶。奴隶主可以像对待牲畜一样地买卖甚至杀死奴隶。这是一种最粗暴的赤裸裸的剥削制度。尽管如此，奴隶占有

制的出现仍然是社会发展的进步现象，比起原始社会来，它提供了较高的社会生产力。金属工具的使用，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的分工，特别是大规模地利用奴隶的简单劳动协作，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发展了生产力。古代中国、埃及、希腊、罗马的宏伟建筑和巨大水利工程，都是奴隶劳动创造的。

在奴隶制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整个社会越来越把劳动看成是下贱的、可耻的事情，奴隶受着惨无人道的待遇，体力和智力遭到严重的摧残，他们对劳动失去了任何兴趣，并以怠工、逃亡、破坏工具、暴动作为对奴隶制的反抗。这样，奴隶制不仅成为阻碍和破坏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而且危及到社会本身的存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在生产中能表现某种自动性、对劳动感兴趣的生产者。奴隶暴动动摇了奴隶制的基础，于是合乎规律地产生了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

封建的生产关系是以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劳动者为特征的。在这里，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属于地主所有。农民对地主有着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要服从地主的支配；在封建制发展的某个时期，地主还可以把农民随着土地出卖或赠予别人，只是没有任意杀死他们的权利。农民在这样的条件下，用自己的工具在地主的土地上进行劳动，劳动产品绝大部分以地租的形式交纳给地主。农民和奴隶不同，他们有着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自己的经济，他们可以把交付地租之后所剩下的很少的劳动产品作为自己所有，用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农民希望生产更多的东西，以增加收入和改善生活，这就有了积极劳动、改进技术的兴趣。这对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相当大的刺激力量。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下，农业生产特别是手工业技术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和技术，如在金属冶铸、农田水利、蚕桑业、陶

瓷业、煮盐业、酿造业等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然而，地主阶级利用人身依附关系（也叫经济以外的强制关系），对农民所进行的剥削是很残酷的。在封建剥削下，农民愈来愈贫困、破产，以至根本无力扩大生产。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愈来愈受到生产关系的严重阻碍，因此就引起了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断冲击着日益衰朽的封建制度。

在封建社会中，商品交换极不发达，在农村中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又叫做自然经济）。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逐渐分化出独立的手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日益增长，城乡之间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适应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扩大的新市场的需要，在封建社会内部就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同封建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斗争。资产阶级利用农民的反封建斗争的力量，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在这里，资本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而劳动者（工人）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无产者对资本家没有人身依附关系，但他们却为饥寒所驱使，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忍受资本家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曾经对生产力发展起过强大的推动作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蒸汽机的发明和蒸汽动力的广泛应用，在工业中实现了一个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两个世纪内所造成的生产力，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时起，就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使封建社会的个体生产和自然经济，变为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使生产资料集中在人数甚少的资本家手里。这样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家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又表现为单个企业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能力无限增长的趋势和社会购买力的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发展，使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经常伴侣，严重地破坏着社会生产力，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资料日益集中于一小撮大资本家的手中，终于形成了垄断资本。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

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组织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作用，它操纵着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市场价格，从而引起了停滞和腐化的趋势，生产力的发展遭到了严重的阻碍。垄断组织不但没有消除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没有消除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且使它们更加严重。作为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为一体的财政资本的统治以及资本输出的结果，使单纯靠“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者阶层增长起来，帝国主义国家变成叮在数以亿计的殖民地人民身上的寄生虫。为了瓜分和争夺殖民地，垄断组织还不惜一再把千百万人民投入世界大战的血海。总之，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正如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的开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民族解放运动在广大地区的胜利和发展，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就进一步走向崩溃，帝国主义的地盘越来越小了。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经济不稳定性更为增长，生产无政府状态更为加深；经济危机的周期更加缩短，生产停滞、开工不足成了经常性的现象，国民经济军事化给劳动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一小撮垄断组织同广大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帝国主义者拚命使用各种手段，妄图保持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加紧扩军备战，到处玩弄战火。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加剧了。这一切都表明，帝国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发展到了极为尖锐的程度，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世界上所有的革命力量——社会主义体系，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以及广大人民的民主、和平运动，等等，正在汇合成为一股冲击和摧毁帝国主义体系的伟大革命洪流。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

帝国主义的矛盾，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并企图挽救其垂死的命运，凭着其日益集中的经济势力，大大加强了对国家的控制，把垄断组织力量和国家力量合为一体。帝国主义的辩护士根据这种变化大肆喧嚷，硬说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已被“有计划、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所代替。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竟无耻地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形式”（米·托多罗维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宣言》）。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事实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建立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只不

过是在客观上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更成熟的物质条件，它本身决不可能使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由垄断组织代理人所组成的资产阶级政府只能是垄断资本的驯服工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过是垄断资本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一种新形式，它决不能缓和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只能使它们更加深刻化和尖锐化。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对抗性矛盾，决不可能由它本身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是注定了的。代之而起的只能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一定要胜利，这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等五种生产方式的循序更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但在肯定这个一般的社会进程的时候，还应当估计到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在具体历史过程中，有一些国家和民族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而可能超越一定的历史阶段向前发展，或者在某一时期出现几种生产关系并存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例如，旧中国没有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曾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引起了我国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正确地运用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中，把革命的领导权坚决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因此在民主革命获得全国胜利后，在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之后，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就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运用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建立了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实现了我国社会的巨大飞跃，并为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 四、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在人类历史上出现，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是这个新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只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对私有经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等个体经济——进行了革命的改造，才能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建立起来。

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把各种私有制经济改变为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首先没收垄断资本的企业，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对一般的资本主义企业，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根据资产阶级对待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采取排挤、没收的方式或者"赎买"的方式，或者两种方式并用，把它们改变成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对农民和手工业者，则是根据自愿原则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基地，个体生产者时刻向着贫富的两极分化。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页）所以只有实现了对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在中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就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

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如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在商业方面是经销代销）、个别行业的公私合营、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等一系列阶梯；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等一系列步骤；对个体手工业也经过合作化的道路，有步骤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1956 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标志着我国统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是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对两种性质不同的私有经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建立起来的，由此就产生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不论采取排挤、没收的办法还是“赎买”的办法，都是要使它们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经济。个体的农民和个体的手工业者虽然是私有者，但他们是劳动者，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对他们采取剥夺的办法来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必须经过合作化的道路使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的经济。

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属于全民所有制，而农业、手工业合作社属于集体所有制，我国由高级农业合作社联合组成的农村人民公社，也属于集体所有制。此外，在农村经济中，还存在附属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小规模个人所有的家庭副业，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和助手。

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比起集体所有制来，是高级的公有制，它是和较高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可以直接由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按照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作统一的分配，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则不能做到这一点。在我

国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内，集体所有制是与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相适合的，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的时候，它们才有可能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是一个空前伟大的革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不再相脱离，而是直接结合起来；生产资料不再属于资本家私有，而是属于劳动者的国家所有或劳动者集体所有。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生产的目的、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关系等等，都起了根本的变化。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剥削和利润的要求，而是为了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劳动者不再为剥削者劳动，而是为全社会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而劳动，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不再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而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是按劳动的质量和数量来分配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以前一切生产关系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为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有计划按比例的、高速度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根本特点。这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反复不断的经济危机和生产停滞，恰成鲜明的对照。从1949年到1959年，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02%，平均每年增长13%；资本主义体系的工业总产值，在同一时期仅增长47%，平均每年增长4.4%（资本主义体系的工业在此期间所以有某些增长，主要是靠扩军备战、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刺激取得的）。

苏联从1945年到1959年的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了10.7%；美国在同一时期的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仅仅增长了1.7%。从1950年到1959年，工业发展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中国为29.2%；美国为5%；英国为3.1%。社会主义各国的科学技术也有了巨大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被用来为人民谋福利，不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把它用来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进行侵略战争。在一系列的科学技术部门，苏联在全世界已处于领先地位，特别在宇宙航行方面，苏联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开创了人类征服宇宙的新纪元。

一切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就开始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来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对于原来经济落后的国家说来，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任务，也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制造生产资料的重工业，能够为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提供现代化的技术基础，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能够不断地提高。国家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不断增强的保证。但是社会主义工业不能离开农业孤立地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归根到底取决于农业能够提供出多少商品粮食和原料，取决于社会除了从事必要的农业以外，还能提供多少劳动力。正确地安排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才能促使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度地发展。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结合起来，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根本方针。

原来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俄国，在十月革命后，经过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强国。我国人民也正在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

主义国家而努力。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都以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发展，充分表明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各国的经验都证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的动力，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又是促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取得完全胜利和巩固起来的保证。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并不等于说它和生产力之间已不存在任何矛盾，两者之间在某些方面和某些环节上还会不断地发生矛盾。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2 页）。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性质与旧社会根本不同，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不像资本主义的矛盾那样必须经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才能解决，而是完全可以经过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不断地得到解决的。

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由于公有化的水平不同，纳入国民经济计划的程度和办法不同，因而存在着某些矛盾。在工作中，需要经常注意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加以调整，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处理和解决，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

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的矛盾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工农业产品的交换问题。由于农民的生产是属于集体所有制，农业劳动产品是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而不是属于全民所有，因此在进行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交换时，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斯大林说：“为了保证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

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惟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10页）

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形式，也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我国，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一般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将来还要过渡到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表现为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但在国家所有制中，某些具体的关系，例如中央和地方在生产的管理体制上的关系，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经营范围划分等，也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进行一定的调整。

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这里不存在阶级社会里的那种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抗性矛盾。但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也是要在不断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存在着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企业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矛盾。对于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矛盾，主要依靠在不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适当地安排工农业之间以及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适当地安排积累和分配的关系，来加以调整；上面所说的在产品交换方面必须遵循等价的原则，也是调整这些矛盾的根本方法。对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矛盾，以及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企业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不断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技术水平，另一方面经常注意使脑力劳动者同工农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并参加必要的体力劳动；同时，在企业管理和行政工作方面适当地采

取各种必要的调整措施。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通过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大力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技术水平，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措施，对于调整和逐步解决这些矛盾、保证人们之间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能够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还不能达到实行“按需分配”的水平，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才能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着正确实施这个原则，又必须随着生产的发展对分配中的具体问题（如劳动定额、工资制度等等）适时地予以解决。为了使工人和农民意识到必须把目前的、个人的利益和长远的、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还必须对劳动人民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把政治工作和物质保证结合起来。

在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中，经常出现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就能使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长远利益和暂时利益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解决，而利于生产的发展。

调整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还必须通过对生产力的诸要素进行合理的调配、使用、改进和提高，来加以实现。开展劳动竞赛，推行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逐步实现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合理地配置生产力和合理地安排劳动力等等，对于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着重大的意义。

共产主义的实现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平，那

时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了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将为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代替，“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将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所代替，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飞跃，就将得到实现。

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为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而努力。其他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朝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

# 第十二章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社会的基本矛盾，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外，还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发展和变化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制约；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解决，又有赖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解决。为了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还必须进一步分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

## 一、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

前面已经说过，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相互矛盾方

面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形态的发展和变革,起着最后决定的作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迟早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变革,从而引起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变革,也就是引起整个社会形态的变革。但是,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性质,并不是直接决定于生产力的情况,而是决定于生产关系的性质。例如,美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很高的,但美国还没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而也没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它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也是由资本主义思想占着统治地位,从而美国的整个社会形态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的总和,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的总和,其中包括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在生产中资本家与工人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等。

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与它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政治关系和一定的思想关系。政治关系体现在各种政治制度中,体现在政权、法制、军队、警察、法院、党派团体的组织活动等全部国家机器和政治结构中。社会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政治观点、法权观点、道德、哲学、艺术、宗教观点等等。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是有机地互相联系着的。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都是以一定的社会观点、思想体系为指导并与之相适应地建立起来的。例如,一定社会的法律制度,就是按照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法律观点建立起来的,它直接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各种思想观点、意识形态,也总是要求有一定的制度、机构和设施同它相适应。在阶级社会里,无论是政治的和文化的机构、设施通常都是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里,或者主要掌握在他们

手里，因而他们的意识形态能够得到最有力、最广泛的传播。这保证了他们的思想成为统治的思想。

上层建筑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政治处于主导的地位。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不但反映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且还受到政治的制约，从属于政治。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之间意识形态的斗争，直接地或间接地贯串着政治斗争的内容。

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彼此间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本身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与他们当时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赖以树立起来而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其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0—341页）

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的统一，构成了特定的社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把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区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由此出发就能够对人类社会的构造及其发展规律做出精确的科学的说明，就能够根据一定的经济基础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情况，来把握这个社会的全部构造及其运动发展的规律。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古至今，人类社会已经出现过五种基本的社会形态，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它特定的经济基础和特定的上层建筑。任何经济基础以及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都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一切社会形态都不是永恒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是与资产阶级社会学关于"一般社会"的抽象议论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这种抽象议论的实质就在于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

时性，为资产阶级的统治作辩护。

现实存在的具体社会形态是复杂的，在每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里，都有着某一种生产关系占居主要的地位，它规定着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一般的主要特征，也规定着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整个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同时，在这个社会形态里，还会存在着曾经孕育过这个社会形态的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旧的政治、思想的残余，也会出现即将产生的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新的政治思想（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物质前提，而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些复杂情况的存在，又使这个社会形态表现出自己的具体的历史特点。列宁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时指出："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会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小市民意识或其他某种东西掺杂其间。"（《第二国际的破产》，载《列宁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12 页）因此，要想正确地认识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必须对这种复杂的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既要首先找出在它里面占统治地位的主要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又要注意到存在于这个社会内的旧制度的残余或新制度的萌芽。具体地分析每一个社会形态的复杂情况，对于把握特定社会形态的具体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在这个矛盾的统一体中，经济基础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成为真正的基础，而各该历史时代的法权制度的、政治制度的，同

样，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当由这个基础来说明。”（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5 页）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在经济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也就以剥削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为其主要内容。这是一切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般的特点。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在经济生活中占居统治地位，与此相适应，就产生了以地主阶级的专政和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主义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就产生了以资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任何社会的经济基础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表现在上层建筑领域中，表现为政治上、思想上的矛盾和斗争。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基础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与此相应，上层建筑领域中也包含着阶级对抗的内容。

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当着旧的经济基础让位于新的经济基础之后，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迟或早地必然为新的上层建筑所代替。即使在同一社会里，当经济基础发生某些局部的变化时，也会引起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由于上层建筑各部分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对的独立性，各有其本身的形成和发展的相对独立的历史，它们并不都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或消灭而立即变化或消灭。但是，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迟早必然要引起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则是确定不移的历史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肯定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同时，它又指出上层建筑不只是消极地反映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产生，就是要为经济基础积极服务的，它必然对经济基础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上层建筑作用的性质，取决于它所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

质。当它为新的先进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它就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前进的进步力量；当它为旧的落后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它就成为妨碍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力量。例如，处在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与生产力的发展基本上相适应的，它的经济基础还是先进的，为这个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如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和民主思想等），曾经对社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时，为这种腐朽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如帝国主义国家的法西斯统治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等等）就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极端反动的力量。

上层建筑是怎样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怎样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呢？

上层建筑能够帮助经济基础形成、巩固和发展。在阶级社会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就在于：统治阶级要依靠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来巩固和发展自己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更具体些说就是，统治阶级通过自己的国家政权，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通过自己的宣传教育文化等机关，大力地宣传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其他阶级的思想观点进行斗争，以保证自己的思想统治。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是建立、巩固和发展经济上的统治地位的保证。反之，如果统治阶级不能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与教育文化机关的影响，来确立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那么，它就不能克服被统治者的反抗，它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就要动摇，它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必将加速趋于崩溃。

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矛盾斗争情形是密切联系着的。经济基础中存在着一定阶级的统治，存

在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对立，那么上层建筑领域中也就有着这个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有着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的对立。统治阶级必须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及其思想影响，战胜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反抗和政治、思想影响，它才能巩固自己在政治和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才能继续维持它所依赖的经济基础；相反地，如果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力量和思想影响能够发展和强大起来，以至发动革命，夺取政权，战胜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和思想影响，那就必然要引起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例如，在封建社会里，当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没有被推翻的时候，即使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仍然占着统治地位，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不可能发展起来。只有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和情绪日益高涨，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的影响日益扩大，并终于引起了资产阶级革命，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取得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才能取得统治地位和顺利地发展，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才得到巩固。

在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已经衰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比较强大的国家机器，能够继续维持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如果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宣传还能够欺骗人民群众，那么，资产阶级就仍然能够在一定的时期之内维持它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暂时不至于崩溃。所以，要摧毁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必须通过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广大劳动群众，发动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建立无产阶

级专政，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并进一步在思想上取得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最下层，它如果不摧毁压在自己头上的、由那些组成官方社会的阶层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腰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7页）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这种辩证关系的理论，进一步揭穿了修正主义者所宣扬的"生产力论"。"生产力论"在否认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的同时，还否认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由此引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政治结论：否认推翻旧的上层建筑的必要性，即否认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上层建筑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但是，上层建筑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地、绝对地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新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总有某些不完全的地方，总不可能立刻就充分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而且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不断变化的，即使在相对稳定的阶段，也会发生量的变化和某些局部的质变，经济基础中的这种变化，并不会立刻就在上层建筑里得到反映。这样，就会不断地出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在某些方面不适应的情形，使两者之间要经常发生某种矛盾。只有对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部分适当地加以调整，使之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情况，才能够充分发挥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

当社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根本不相适应的时候，当经济基础已经濒于灭亡的绝境的时候，反动阶级在上层建筑方面的调整和修补，虽然能暂时延缓一下腐朽的经济基础的寿命，然而无论如何都不能挽救它的死亡。因为反动的上层建筑同经济基

础的变革要求之间的矛盾是一种根本性的矛盾。只有根本摧毁反动的上层建筑，才能解决这种矛盾。

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发展过程中，基本性质虽然不变，但发生过由自由竞争阶段到垄断阶段的重大的变化。在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就政治制度来说，主要是采取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形式。这同当时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已不能成为保证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有力工具。资产阶级就要把它的上层建筑加以若干改变，使之适应于经济基础的变化。这时，资产阶级采取了更野蛮的形式来镇压愤怒的劳动人民，以求在风雨飘摇之中暂时维持自己的统治，从而延长其经济基础的寿命。这就是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都露骨地或者隐蔽地趋向法西斯的统治方式的根本原因。

法西斯的政治统治延缓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这只是暂时的情形。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已走上发展的顶点，只有根本地变革生产关系，社会才能前进。垄断资产阶级的以法西斯统治为中心的上层建筑，竭力维护腐朽的经济基础，阻碍它的变革。经济基础必然并且正在走向崩溃，而上层建筑却要求它永世长存，这种极端反动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之间发生了根本的矛盾，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种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解决。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完全摧毁反动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代之以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才能解决这个矛盾。

##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同于一切以剥削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它

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产生、形成以及两者的矛盾性质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点。正确地理解这些特点，对于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是社会主义的各种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在政治法律制度方面，最主要的是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和法制。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就是这个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是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在旧社会内部自发地产生，而只能在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后，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自觉地建立起来。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前提。在这里，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积极作用表现得特别明显。无产阶级首先必须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并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才能求得经济上的解放，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建立起来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般规律的一种特殊表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是由经济上的原因决定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冲突的结果。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已发展到相当集中的程度，使得无产阶级专政在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就能从大资产阶级的手里，把有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各种企业接收过来，把它们改造成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从而初步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时，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虽然还没有形成，但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已经居于领导地位，能够给无产阶级国家以强有力的经济上的支持。在这样的条件下，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改造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日益巩固和逐步地完备起来。

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经过一个改造多种经济成分的过渡时期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渡时期的国民经济中既有社会主义的成分，又有资本主义的成分，也有其他的经济成分（主要是个体经济成分），其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运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力量，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一步步地战胜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改造其他经济成分，以便使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要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充分发挥这样的作用，还必须在上层建筑方面进行斗争，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经济方面有着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的矛盾和斗争，那么，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在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中，也就必然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已经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抵抗不但表现在经济上，并且也表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总是要利用它的政治和思想的影响，进行各种活动，力图动摇和破坏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借以阻碍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在进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还必须在上层建筑方面对资产阶级展开坚决的斗争，还必须继续进行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在上层建筑方面进行这样的革命斗争，就不能保

证上层建筑适合于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就不可能有效地运用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来帮助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和发展。

从多种经济成分到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形成的过程中，在经济上有着两种性质的矛盾和斗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个体经济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许多中小资产阶级分子有可能明了大势所趋,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他们就不需要对抗的斗争，而对于一部分坚决抵抗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斗争不能不是对抗的。经济上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和斗争,也必然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中。这就是说，在政治思想上，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观点和资产阶级观点的斗争，包含着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斗争。为了使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日趋完善，保证它能够充分适合于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和发展的需要，无产阶级必须善于分析不同性质的矛盾，并采取不同的斗争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

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方面的决定性胜利，统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标志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过渡时期的结束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它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适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杠杆，而且是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强有力的工具。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强大力量的来源之一，是它的民主集中制。它对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行着集中统一的领

导，又使广大劳动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权利。只有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和高速度地发展，才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劳动组织日益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和发挥着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强有力的工具。共产党领导着国家政权和群众团体等社会组织，它是团结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根本保证。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起着巨大的积极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使党和国家能够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自觉的指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启发着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在党和国家的指导和教育下，人民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新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风尚的形成，促进着群众的创造精神和主动精神的发挥，加速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以往的文化、教育组织活动的阶级内容和工作方向。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社会主义文化日益繁荣和发展。

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帮助它的经济基础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这说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它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但是在适合之中也还存在着不适合的方面，也就是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某些矛盾。这是因为：第一，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不可能一旦建立起来就达到十分完善的程度，而总不免在某些环节上有不完善的地方。第二，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使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已经被消灭之后，也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

继续存在，它们当然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而且由于它们的影响，也会造成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缺陷。第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不是绝对不变的，虽然在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前，它是相对稳定的，但仍然有着不断的量的发展和某些部分的质变。所以，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对于它的基础总是处于又适合又矛盾的状态，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正是在这种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的过程中发展的。

在谈到我国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时，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2 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和旧社会的其他坏思想和坏习惯的残余存在所引起的矛盾，其中，人民大众同坚决反抗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在人民内部由于受到某些旧思想和旧习惯的影响而形成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存在的。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本身某些局部缺点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完全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

是一个极其伟大、极其艰巨的崭新的事业，为着实现这个事业，人们必须在各方面积累经验；人们的意识往往落后于客观事物的发展，经过实践，人们才能发现和解决一个个的问题。在没有获得足够的实践经验之前，人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不免要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实践经验的增加，人们能够在继续巩固和发展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及时地纠正上层建筑中的某些局部缺点，使之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

上述这些矛盾的不断解决，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断地互相适应和向前发展。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对于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有着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

我国在 1956 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使社会主义生产力得到了大解放。接着在 1957 年又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同时还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中进行了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样，就在上层建筑方面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健全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跃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58 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的制定和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都是在我国的条件下具体运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规律的结果。我们还将继续运用这些规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改进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逐步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进一步创造条件，准备在将来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

过渡。

## 四、家庭、民族

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性质，决定着整个社会形态的特征，也规定着家庭和民族等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和社会共同体的特点。

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是在原始公社末期私有财产发生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个体家庭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道路。从最初的原始群中，由杂交发展为实行各种形式的群婚，逐渐形成了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母系氏族公社。这是由于早期氏族公社生产力稍有发展，男女在生产中开始有了自然的分工（男子从事狩猎，妇女从事采集，初步种植植物），妇女的生产比较稳定可靠，并在原始公社生产中占居比较重要的地位等等原因而产生的。原始公社的生产由狩猎向畜牧和农业进一步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生产主要由男子负担，于是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母系氏族公社便为父系氏族公社所代替，并逐渐出现了父系家长制的家庭。畜牧业和农业生产力再向前发展，生产已有可能不依靠群体的共同劳动来进行，而由较小的个体单位来进行；同时，由于私有制的出现，也自然而然地要求形成各自独立的经济单位。这样，就逐步地产生了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

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在阶级社会里，是建立在男性支配和奴役女性的基础上的，这里的一夫一妻制的义务，实际上只是片面地要求女方遵守。掌握财产所有权的男子方面的多妻生活和社会上的卖淫制度，成为剥削阶级家庭制度经常的补充。这种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形式，是私有制生产关系的必然的产物，是为私人的财产占有权和财产继承权服务的生活组织形式。它是以

血缘关系为其自然基础，又以私有制为其经济基础。它既担负着繁衍后代的职能（对劳动者家庭来说，是劳动力的再生产的职能），又是私有财产占有的单位。就后一种意义来说，它也是一个经济单位。个体生产一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这种家庭是生产的单位。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条件下，工人都在资本家的工厂里进行生产，家庭就成为单纯的消费单位，而不再是生产的单位。工人的家庭不论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单位，或者是作为消费的单位，对于资产阶级来说，都只是提供剥削的源泉。由此可见，家庭的性质、职能，都是随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

家庭的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伦理观点和法权观点，也是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例如，与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产生了封建的家长制度和家庭内的尊卑等次——父子、兄弟、夫妇的不同地位，以及维护这一制度的国法家规和道德观念。在封建家庭里，族权、父权、夫权控制着一切。农奴阶级的家庭，对于封建主阶级处于从属地位。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69 页）。资产阶级的法律和道德，实质上是把这种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圣原则”。在工人家庭中，由于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发展，把妇女吸引到生产劳动中，使妇女开始从宗法制度和家长制度束缚下解放出来，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和社会上的地位。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剥削制度的消灭和公有经济的日益发展，男女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妇女成为自由的、具有平等权利的社会成员。只

有到了这个时候，一夫一妻制对于男女双方才都是现实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家庭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人们才有可能摆脱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家庭制度以及和它相联系的伦理观点和法权观点，建立真正平等、团结、和睦的社会主义新家庭。

总之，作为社会的生活组织形式的家庭，既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特点，也反映社会上层建筑的特点。它同整个社会形态，首先是经济基础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的联系。它的职能、性质、形式、结构以及和它相联系的伦理道德观念，迟早都会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变革。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家庭制度。在不同阶级间，家庭关系也有所不同。生活方式决定于生产方式，家庭关系决定于经济关系。家庭关系的变化，归根到底可以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变化中得到说明。

民族这一种社会共同体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有密切的联系。民族的形成主要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要使人们打开各个地区闭关自守的界限，在广大的地域里结合为民族，这首先要在各地区之间发展交换关系，扩大商品流通，使这些地域的居民之间形成经济上的密切联系，才有可能。除此而外，要形成民族，还需要这样的条件：共同的语言和表现在共同的文化特点上的民族心理。这样，民族这种社会现象，是既包括一定的经济关系，又包括一定的思想关系的综合形态，但在构成民族的各种因素中，物质生活、经济关系则处于主导的地位，它决定着民族文化的实质，决定着整个民族的根本特性。

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是两种类型的民族，它们有本质上的不同。

在资本主义民族中，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不同的思想感情，以至于不同的文化。在文化领域内，同一个资本主义

民族里，可以产生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资产阶级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劳动人民的民族文化传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决不会因为属于同一民族而有所减弱。不过，由于民族在生活习惯、思想传统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这使得同一民族中的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保持某些共同的文化特点和共同的民族感情。这种民族共同感情在一个民族受到外来的侵略时就特别强烈地表现出来，而成为被压迫民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思想动力之一。尽管如此，在共同抵抗外来侵略的时候，不同的阶级在实际上仍然有着不同的态度，坚决反抗侵略、保卫民族利益的是劳动者阶级，而剥削阶级则很容易趋向于妥协和投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被压迫民族反抗外来侵略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积极作用，但是不论在压迫民族或者被压迫民族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总是夸大共同的民族感情，以此来抹杀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巩固资产阶级对于本民族劳动人民的统治。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联系日益密切起来。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但造成了民族内部的不平等，也造成了民族之间的不平等，造成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罪恶现象。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不同民族的劳动人民之间造成互相歧视、互相对立倾向，破坏各族劳动人民的团结。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压迫弱小民族的过程中，它成为民族侵略的思想工具。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方面要求重视民族的特点，尊重各民族的民族感情、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另一方面又要求用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来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民族关系上，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又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消灭了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形成了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各民族的社会政治面貌和精神面貌逐步得到改变，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形成和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族之间的关系，由于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歧视的经济根源，形成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的民族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各民族文化发展和繁荣的经济基础，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以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相结合的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得到不断的提高和发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处在低级发展阶段的民族，由于国内先进民族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可以超越若干历史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提高到先进民族的发展水平。各民族的繁荣和兴旺、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是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使世界各民族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在各民族的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一个长久的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合作，逐步地达到民族界限的消亡。

由此可见，民族、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归根到底是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着的历史现象。

# 第十三章　阶级和国家

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都必然引起阶级斗争。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上层建筑中最主要的东西。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都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们有着自己的发生、发展和灭亡

的规律。

## 一、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阶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阶级的存在是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在人类最早的时期——原始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没有剩余产品，人们只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才能免于饥饿和死亡。这时没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没有人剥削人的可能，从而也就没有任何阶级的存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剩余产品，提供了剥削的可能性，也就有了产生阶级的可能性。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促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

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发展，各个氏族和家庭之间财产不平等的现象便发展起来。氏族内部分化出了氏族显贵，如族长、酋长、军事首领、祭司和其他担任公共职务的人员，他们利用自己职位的方便，侵占一部分公共财产，并利用氏族、部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的机会发财致富，甚至形成了以战争为专业的集团。财产不平等的现象日益发展，在氏族中逐渐出现了一批剥削者，这就是最初的奴隶主。

奴隶主阶级的剥削对象——奴隶，开始时是由战争中获得的俘虏来充当的。战争和暴力对阶级的产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它加速和加深了财产不平等的现象。但是战争和暴力不是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原因。掠夺不能创造财富，它只能把财产从一个所有者的手上转到另一个所有者的手上。把俘虏变为奴隶只有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成为可能。在社会生产力极低，没有任何剩余劳动可供剥削的时候，俘虏通常都要被杀掉，只有在生产可能提供剩余产品的时候，才被用作被剥削的对象。使用奴隶的制度

进一步发展以后，奴隶的来源就不再以战争的俘虏为限了。本部落里穷困的人常常被迫成为奴隶，而富有者则成为奴隶主。这样，人类社会便由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原始社会进入了第一个阶级对抗的社会——奴隶制社会。

可见，社会划分为阶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任何企图离开社会经济本身的原因去解释阶级的起源，都是错误的。

人类历史的发展经历过三个对抗性的阶级社会，即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三个特定的社会形态里，各有两个基本阶级，即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各基本阶级内部的各部分人之间还有某些具体区别，例如，封建主阶级中有贵族领主和一般地主的区别，农奴中有依附于地主庄园的农奴和佃农的区别，等等。这些基本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各个社会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表现。在各个阶级社会中还存在一些非基本的阶级和集团。例如，在奴隶制社会里，有不是奴隶主也不是奴隶的从事劳动的“自由民”，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有依靠自己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的个体劳动者。有些非基本的阶级属于旧生产方式的残余或新生产方式的萌芽。例如，在封建社会初期存在一些奴隶主和奴隶，在晚期出现了资产者和无产者。在阶级社会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通常依附于剥削阶级，因而在一般的情形下，他们大多数都是为剥削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在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知识分子在生活和思想上发生剧烈的分化，其中一部分知识分子会走向劳动人民方面，为劳动人民服务。因此，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特定的阶级，而是可以分属于不同阶级的社会阶层。他们的阶级地位分别属于其所服务的阶级。

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

以前的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如18世纪、19世纪初叶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法国历史学家，已经初步认识到了。但是他们都不可能对这个事实做出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揭示了阶级的本质，提出阶级是与特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在经济上处于不同地位的各个社会集团。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伟大的创举》，载《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82—383页）

各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不同的地位，主要地就是在经济上的统治和服从的地位、剥削和被剥削的地位。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的地位的不同，就在于前者在经济上处于统治和剥削的地位，后者处于被统治和被剥削的地位。这种地位的不同，首先是因为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资产阶级占有全部或大部分的生产资料，而奴隶阶级、农奴阶级、无产阶级则不占有或很少占有生产资料，所以前一部分人就能够利用自己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劳动人民实行经济上的统治，从而占有他们的劳动，对他们进行奴役和剥削。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又决定着各阶级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不同。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既然占有他人的劳动，因此就能在生产中居于指挥地位或者脱离社会的生产劳动，从事生产劳动以外的活动。人数众多的被统治、被剥削者不得不全力从事繁重的、折磨人的体力劳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

以及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的不同，又决定着各阶级取得它们所支配的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少也截然不同。例如，资本家能够占有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而增殖其财富，工人只能获得勉强能补偿他的劳动力价值的工资。

阶级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范畴：社会阶级的矛盾和对立也表现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上。但是，社会各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特点，归根到底还是决定于它们的经济地位。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思想家常常根本抹煞社会阶级的存在，有的虽然承认阶级的存在，但却歪曲阶级划分的原因。有的人杜撰出一些生物学的、种族的、心理方面的、个人能力方面的以及其他非经济的原因来解释社会阶级的划分，借以证明阶级的存在是永久的、合理的现象。有的人虽然接触到经济问题，但只是孤立地从经济现象的某一方面来解释阶级。例如，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组织论”者硬说阶级的出现是由于人们在社会生产组织中的职能不同而分为“组织者”和“执行者”的结果。这种观点是企图这样来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资本家在社会生产中有着“组织者”的职能，因此就应该永远居于统治者、生产领导者的地位。其实这是把事情说颠倒了。事实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对社会生产有着组织者的职能，才在经济上占有统治者和领导者的地位，相反地，他们只是由于占有了生产资料，在经济上居于统治的地位，所以才成为生产中的组织者、领导者。“分配论”者则把阶级之间的区别归结为收入来源和收入多少的不同。其实，经济上的分配关系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的，收入来源的不同决定于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地位的不同。按照“分配论”者的说法，似乎只要把分配方式改变一

下，无需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就可以改善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这显然是错误的。

剥削阶级思想家还常常把阶级和等级混淆起来。旧中国的某些资产阶级学者把封建等级制度和阶级混为一谈，硬说中国只在古代社会有“阶级”（如王、诸侯、大夫、士、庶人），到了现代就没有什么阶级的区分了。这种说法的目的，显然在于抹煞阶级的区分。其实，在奴隶制社会或封建社会里出现过的那种等级制度（如贵族和平民的等级）的特点，主要是在法权上、道德上所规定的等级差别和一部分人的特权制度。但是等级不等于阶级，阶级是根据人们不同的经济地位来划分的。同一阶级中可以分为不同的等级（如中国古代社会的公、侯、伯、子、男），同一等级也可以包括不同的阶级（如西欧封建社会末期的第三等级包括资产者、无产者、农民和城市贫民等），因此决不能把等级和阶级等同起来。资本主义社会一般在法律上取消了等级制度，但是阶级仍然存在着。

马克思主义指出，自从阶级产生以来，“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65 页）。剥削阶级为着维护和加强他们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使其剥削的要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实现最大限度的剥削是剥削阶级要求的一般的趋势），必然要用一切方法，首先是政治统治的方法，来压迫被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为了摆脱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不能不起来进行斗争，不能不起来反抗剥削阶级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个斗争总是对抗性的，它集中地表现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尖锐冲突。这样的阶级斗争贯穿着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各阶级在阶级斗争中会形成集中地代表自己利益

的政治集团、政治组织。这样的政治集团和政治组织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就是政党。政党是阶级中最积极的、最有组织的一部分。政党的斗争最集中地表现了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在阶级社会里，当旧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时，就会发生最尖锐的阶级冲突。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总是想尽办法去维护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为它服务的上层建筑，从来没有一个剥削阶级自动地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退出历史舞台。只有依靠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促使新的生产方式建立和成长，才能使一种过了时的社会形态为另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

阶级斗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不仅突出地表现在阶级社会更替的质变过程中，而且也表现在同一社会形态发展的量变过程中。被剥削阶级为着反对统治阶级日益加强的压迫和剥削，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斗争，每一次斗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打击剥削阶级的统治，迫使其做出某些让步，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农民革命斗争时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19页）

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对社会发展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奴隶反对奴隶主、农民反对封建主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奴隶的革命暴动，如罗马帝国斯巴达克所领导的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动摇了奴隶主统治的根基。中国封建社会从秦朝的陈胜、吴广起

义，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国，大小数百次的农民战争，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奴隶和农民在他们所处的社会结构里，都不是和新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他们不能在自己的斗争中提出建立一个较进步的社会形态的纲领，因此他们的斗争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但奴隶、农民的起义和他们的革命战争，对于破坏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起着决定性作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阶级的革命斗争，总是要依靠或者利用农民群众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断进行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跟过去的奴隶、农民不同，无产阶级是作为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现者而出现的先进阶级。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无产阶级能够提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正确的战斗纲领，制定正确的阶级斗争的战略策略，能够通过革命斗争使自己和全体劳动人民得到解放。

全部阶级社会的历史，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性。毛泽东同志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491 页）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右翼社会党的领袖和修正主义者竭力鼓吹阶级合作，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以至抹煞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他们说什么阶级斗争是社会的病态，是互相残害，说什么只有阶级合作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阶级合作是一切机会主义

者的中心思想。列宁曾经指出：机会主义论调的基本错误，“在于它们实际上是用资产阶级的‘共同的’‘社会’进步的理论来代替阶级斗争是历史惟一的实际动力这个社会主义的理论”(《再论杜马内阁》，载《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页)。修正主义者以阶级合作和阶级利益调和的谬论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资本主义制度效劳。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还努力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加以百般的粉饰，硬说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民主以及普选制已经把阶级斗争的根据消灭掉了。这些说教者在口头上反对阶级斗争的存在，实际上却正是在全力帮助帝国主义、反动资产阶级来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进行阶级压迫。

阶级斗争贯串在阶级社会的始终，贯串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如果不能把握社会现象的阶级本质，就不能正确把握社会运动、社会生活的脉搏。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去分析社会现象。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找出规律性来。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9页)把这种理论用来分析社会历史现象，就是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社会历史的根本方法。只有了解各阶级的经济、政治情况，了解各阶级的历史变化和动向，了解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才能对革命斗争的形势做出正确的估计，才能在革命斗争中分清敌友，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 二、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国家和阶级一样，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国家随着阶级的产

生而产生，也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

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没有分裂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的阶级，没有供一个阶级专门用来统治其他阶级的政权机构。这样的机构必须有一系列的暴力组织（武装部队、监狱、及其它强迫他人服从暴力的工具）作为自己的核心，必须有成批的为阶级统治服务的专职人员——官吏，才能保证真正具有统治的力量。这一切在原始社会里都是不存在的，并且也是不需要的。原始公社里为全体成员共同利益而服务的组织，不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机构，这些组织包括氏族、部落的议事会，和具有最高权力的氏族、部落成员大会等等。氏族、部落议事会的成员都是经过选举产生，并且不脱离生产劳动的。在这里，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也依靠族长和首领所享有的威信。原始社会不需要用特别的武装组织来维持社会内部秩序，仅仅在和其他部落发生冲突时，才由全体成员共同进行武装活动。

在原始社会解体后出现的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为着保证对奴隶及其他劳动者的经济上的统治和剥削，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治上的统治。奴隶主是少数人，而奴隶和其他劳动者则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的极端野蛮和残酷的剥削，不能不引起奴隶阶级的强烈的反抗，不能不引起奴隶反抗奴隶主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从奴隶制社会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为着镇压奴隶的反抗，为着有可能压迫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强使他们遵循不违背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秩序，奴隶主就必须使用有组织的特别的暴力工具（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奴隶主掌握了这个有组织的暴力工具，就掌握了对于奴隶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权，来保持为其所需要的社会秩序。这

个有组织的暴力工具，就是国家。

可见，国家是在阶级出现之后才产生的。表面上看来，国家是整个社会的代表，但实际上，它不是超乎各阶级之上使各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的力量，而是统治阶级对其他阶级施行压迫的力量；它不是对各阶级一视同仁地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构，而只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保证他们能对社会进行政治统治的机构。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社会陷入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中并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方面而又无力摆脱这种对立情势的表现。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彼此经济利益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互相消灭而使社会同归于尽，于是一种表面上似乎驾于社会之上而用以缓和冲突，使这些冲突不致超出'秩序'范围以外的力量，就成为必需的了。这个由社会当中产生出来，但使自己驾于社会之上，而日益跟社会脱离的力量，便是国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16—317 页）列宁说："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论国家》，载《列宁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35 页）

在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都是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的一整套的有组织的暴力机构。剥削阶级运用国家机器压制被剥削阶级，把阶级之间的斗争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以保证剥削阶级的统治。这就是剥削阶级的国家的最基本的、主要的职能。国家除了这种对内的职能以外，还有对外的职能。剥削阶级的国家保卫本国的利益不受他国侵犯，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对外实行侵略，损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在国家机器中，军队是特别重要的部分，历史上一切善于代表统治阶级掌握政权的人物和集团，没有不注重掌握军事力量的。

随着国家的出现，出现了大规模的专门的武装部队。这种武装部队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力的最重要的手段。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和阶级的冲突，国家和国家的冲突，以至同一统治阶级中的不同集团为了争夺权力而发生的冲突都会发展为战争。剥削阶级的国家在执行它的对内、对外职能时，有时采取和平的手段，有时采取战争的手段，有时这两种手段同时并用。战争是一定阶级的政策的继续，是为这阶级的政策服务的。在有了阶级、有了国家以后，战争成为一种不可避免地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分析历史上的各种战争时，根据战争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的不同而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剥削阶级国家为掠夺其它国家人民所进行的侵略战争和为镇压本国人民革命所进行的国内战争是非正义战争。人民的革命战争和被侵略的民族、国家反抗外来侵略的自卫战争是正义的战争。

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消灭阶级为自己的中心任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样也是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对于反抗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它也要进行暴力专政。不过，它的性质和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根本不同：它不是少数剥削阶级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及其他阶级的工具，而是广大劳动人民统治少数被推翻了的剥削者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有一整套有组织的暴力机构，那是掌握在人民手中的不可缺少的武器，国家的军队是人民自己的军队。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对内职能，除了要镇压那些不甘心被打倒和不愿意接受改造的剥削阶级的反抗之外，还要组织人民群众全面地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和思想教育工作（包括对那些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剥削者的思想改造工作）。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向外扩张和向外侵略的需要，但是在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时候，它还具有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职能，必须加强国防力

量，并且在帝国主义如果一旦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就要用正义的自卫战争来消灭这种非正义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关系上，还要发展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要支持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要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为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

同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和统治阶级的需要，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政权组织或政权构成形式，例如同样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采取议会民主制的形式，也可以采取法西斯专政的形式。但是，不管采取哪种政权形式，它始终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者和政治家，一贯夸大政权组织形式的区别，来掩盖国家的阶级实质。他们把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硬说成是所谓“民主”“自由”的国家。其理由是这些国家里存在着议会民主制。为着揭穿这种诡辩，需要把“国体”和“政体”两个范畴加以区别。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69页）；而政体，“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同上书，第670页）国体问题表明这个国家究竟掌握在哪一个阶级的手中，这个阶级又联合哪些阶级去统治、镇压哪些阶级。历史上没有超阶级的国家，所有的国家都是某一特定阶级专政的国家，或者是奴隶主专政的国家，或者是封建主专政的国家，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现代则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根据不同的国体来区别各种国家，才能把握各种国家的真正的性质。至于政体，只是一个国家的政权组织

形式。如果仅仅依据政体的不同来区别各种国家，就会使人忽视各种不同国家的阶级实质。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家的诡辩，正是利用议会制这种虚伪的民主形式，把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渲染成似乎是代表全体国民的“自由”“民主”国家。所以，把国体和政体加以区别，着重根据国家的阶级内容区别各种国家的性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以揭露和粉碎资产阶级在国家问题上的诡辩的一个重要方法。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非常复杂，但本质是一个，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国家总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与革命》，载《列宁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00 页）

国家问题直接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历来的剥削阶级及其思想家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加以解释，把国家问题弄得混乱不堪。在国家的起源和实质问题上，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有所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书经·泰誓上》），和“君权神授”等说法，假借所谓“天命”或“上帝”的旨意，掩盖他们的阶级统治的实质。在中国古代也有与此相对立的、在当时有进步意义的思想，认为最初的君主是杰出的人物，为人民办了好事，由人民拥戴而产生的。例如战国末期的韩非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韩非子·五蠹》）但韩非的这种说法也未能正确地解释国家的起源。法国 18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把国家说成是由于人们相互约定而形成的。这种思想是反对“君权神授”的国家学说的，它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从封建主手里夺取政权的要求，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对于国家起源的解释则是错误的。资产阶级获得政

权以后，特别是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它的国家学说就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十分反动的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自然学派，崇奉斯宾塞的反动的“社会有机论”，硬把生物的有机结构用来比拟人类的社会组织，企图以此来给资产阶级国家和整个资产阶级统治涂上一层“合理”的油彩。社会学中的心理学派认为，社会上的各种集团是由于这些或那些“心理刺激”的作用而建立起来的，而国家就是社会上各种不同的集团和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的调和者。至于社会学中的神学派，至今仍然胡说什么国家政权是从神那里产生的。所有这些观点，都脱离社会本身的物质条件，脱离私有制和阶级对抗的事实，来曲解国家的起源和实质，把国家说成是“永恒的”和“超阶级的”，掩盖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的本质。

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而资产阶级辩护士却把它说成是各阶级利益的“调节者”，是“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体现者。资产阶级在革命年代里，曾经举起“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旗帜，反对封建地主的统治，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同封建主义的国家比较起来，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是一种进步。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消灭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它只不过是以雇佣奴隶制代替了农奴制；它也没有消灭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压迫和统治，而只是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了封建主阶级专政。在资产阶级专政下面，“民主”、“自由”对于劳动人民，都是骗人的空话。在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事实上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什么“平等”和“博爱”的。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从虚伪的民主转向公开的反动。这

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国家发展的总的趋势和特征。

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国家是管理整个资本家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那么，到了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国家则已成为财政寡头追求最大利润的工具。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垄断组织对国家生活的统治，把垄断的力量和国家的力量合为一体。"随着垄断集团对国家机器控制的加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已经或者正在抛弃以往的虚伪民主的遮羞布，走上公开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帝国主义者执行着最反动的内外政策：对内实行法西斯恐怖，残酷镇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外疯狂地执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反动的军事官僚机构，特别是军队、警察、特务组织等反革命暴力机关，发展到了空前庞大的地步。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统治者规定了许多新的法规，在实际上剥夺了美国宪法所承认的那些公民权利；按照史密斯法或麦卡伦—伍德法，可以任意逮捕那些根据美国刑法不能构成任何罪行的人。逮捕他们只是因为他们拥护自由、民主、和平。

现代修正主义者南斯拉夫集团为了美化帝国主义，说什么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日益监督资本，并剥夺私人资本所有者在经济和社会中的某些职能"（《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又说什么"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某一阶级的机构了，它不再反映和维护这一阶级的特殊利益了"（尔·伊：《资本主义变了吗?》，原载南斯拉夫《我们的实况》杂志1956年10月号）。他们故意颠倒黑白，把垄断集团日益直接控制国家机器这个事实，说成好像是垄断资本集团服从于某种超阶级的国家。因此，他们大肆宣扬：只要对资产阶级国家"不断施加压力"，争取在这种国家机构中"取得决定性的影响"，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他

们的这种谬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的公开背叛。

## 三、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对于社会发展起着史无前例的巨大作用。它是阶级斗争历史上的“最后的斗争”。这个斗争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其它一切剥削制度，建立以前奴隶和农民的斗争所不能实现的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利用这个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由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肩负起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是由于：它是同大生产相联系的劳动者阶级，是新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现者，它不像小生产者那样将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趋于衰落，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日益壮大，它是最有前途的阶级。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它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所以它在革命斗争中没有什么可顾虑的，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4页）无产阶级只有消灭了一切剥削形式和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解放一切劳动者，才能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大工业生产的条件，使无产者联合起来，养成他们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使他们有可能在斗争中锻炼成极坚强的战斗队伍。由于无产阶级具有这样一些特点，所以只有它才能把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领导他们去摧毁资本主义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

无产阶级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同资产阶级展开了斗争。贪得无厌，无止境地追逐利润，永远不能满足发财致富的欲望，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这个本性驱使它以无情的手段来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贫困、奴役的枷锁一开始就套在无产阶级颈上，而且越来越沉重。无产阶级为了摆脱这种沉重的枷锁，不得不进行反抗，而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这种反抗总是进行残酷的镇压。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根本利益上的对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初只是采取经济斗争的形式，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处于自发的阶段。经济斗争是工人为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向厂主进行的集体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产生了无产阶级的最初组织——工会。经济斗争有许多形式，罢工是经济斗争最重要的手段。

无产阶级的斗争，并没有停留在经济斗争上，而逐渐发展成为政治斗争。例如，19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法国里昂的织工起义，英国的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都是无产阶级早期的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过程中，不仅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和其他职工组织，而且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的出现，终于建立起自己的先锋队伍——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有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便从“自在的”阶级发展为“自为的”阶级，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便从自发的阶段进入了自觉的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成为无产阶级的各种斗争形式的中心环节。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包括

政治罢工、示威游行、议会斗争、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革命等等。政治斗争的主要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列宁在驳斥自由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时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载《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7页）

在经济斗争中，只是个别企业、个别行业的无产者反对自己的剥削者，而政治斗争则是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在经济斗争中，无产阶级保卫的是眼前的、局部的利益，而政治斗争所追求的则是整个无产阶级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经济斗争不管取得多大的胜利，它最多只能暂时减轻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不能根本取消这种剥削；只能暂时改善工人出卖劳动力的条件，不能根本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只能起"止痛剂"的作用，而不能"铲除病根"。只有彻底进行政治斗争才能彻底消灭剥削制度，使一切劳动人民得到解放。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斗争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完全必要的。经济斗争的必要性，不仅在于它可以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使工人得以生存下去，而且还在于它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发展过程中必经的阶段。通过经济斗争，可以使无产阶级受到锻炼，逐步使他们提高觉悟，为进一步走上政治斗争阶段准备条件。在无产阶级已将政治斗争提到议事日程的首要地位的时候，经济斗争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无产阶级如果局限于经济斗争，那就只能养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只看到自己的职业利益。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把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才能使广大的无产者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资产阶级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而且在他们中间散布资产阶级思想，用一切方法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对他们进行精神上的奴役。因此，无产阶级为着政治斗争的胜利，又必须和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方面的斗争。思想斗争的任务在于揭露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欺骗宣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帮助他们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思想斗争的中心环节，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才能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指出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把斗争引向胜利。

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工人运动中的表现。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最狡猾的形式：它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否认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否认无产阶级的斗争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领导。它的作用就在于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解除无产阶级的思想武装，要求保存或者恢复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莫斯科会议的宣言》，人民日报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1 页）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以南斯拉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起着帝国主义和右翼社会党所不能起的反动作用。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是无产阶级战胜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必要条件。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三种斗争形式，互相联系、缺一不可，而政治斗争是主要的，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斗争，为政治斗争服务。工人运动中的一切经济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都企图使无产阶级的斗

争永远局限在经济斗争范围内，使政治斗争永远局限于议会斗争和合法斗争的范围内，永远不去触犯资产阶级政权和资本主义制度。

无产阶级要能够正确地确定革命的战略策略和运用各种斗争形式，把自己很好地组织起来，在斗争中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组成自己的政党——共产党。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组成的，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为指导，依据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它能够结合每一个国家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为本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提出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战略、策略。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它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它有为全体党员所自觉遵守的纪律，它能够经常应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克服自己在工作和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它把全体党员组成一个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所团结起来的统一部队。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一切组织中的最高组织形式。它能够和本阶级以及其他劳动阶级的广大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它不仅应该领导，而且能够领导其余一切无产阶级组织。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和战斗司令部，它能够实现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最坚强的领导，把这个斗争引向一个总的目标——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同一切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政党，是有根本区别的。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右翼社会党，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资产阶级政党。其上层分子是工人贵族，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都否认共产党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领导作用。要不要共产党领导的问题，也就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是马克思

主义和机会主义斗争的根本问题之一。

## 四、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最终必将导致阶级的消灭。马克思说：“（一）阶级的存在仅仅是跟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进到消灭任何阶级和进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致约·卫登麦尔》，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2页）。

阶级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而又发展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当生产力高度发展之后，阶级剥削制度的继续存在就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就出现了使阶级消灭终于不可避免的物质前提了。恩格斯说：“只有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才有可能把劳动分配于社会的无例外的所有成员之间，这样就能把每人的工作时间如此地缩短，使人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那些关系全社会的理论的实际的事务。所以，仅仅现在，任何统治的和剥削的阶级，才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直接障碍；仅仅现在，统治的和剥削的阶级，无论它拥有多少‘直接的暴力’，总是被无情地消灭。”（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8页）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提供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的可能性，创造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极其尖锐的地步。资产阶级对于生产资料和生产品的占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对于教育和精神指导的垄断，成为经济、

政治和知识的发展的严重障碍。资产阶级的垄断统治妨碍了生产力的充分利用，妨碍了科学知识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相联系的侵略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加深，毁灭着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因此，推翻资本主义和消灭人类社会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正如过去阶级的产生曾经是历史进步的现象一样，阶级的消灭也终于成为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

阶级的产生是自发的过程，而阶级的消灭却是人们自觉地进行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阶级的必经途径。和剥削阶级相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是为了永远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而是为了消灭一切阶级（包括无产阶级自己本身），并使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机器归于消亡。

列宁指出："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向匈牙利工人致敬》，载《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52页）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页）

消灭阶级，不但要消灭地主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而且要改造个体小生产者的私有制，这个任务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比消灭剥削阶级更为复杂的。无产阶级的政权要通过说服教育和示范的办法，把广大小生产者引上集体经济的道路。这样，也就消灭了

剥削制度赖以滋生的经济基础。

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因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并同社会主义制度相抵触。在这样的情形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还会影响到经济生活方面。因此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将继续存在，斗争将像波浪的起伏一样，高一阵，低一阵，有时候尖锐，有时候比较缓和。只有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阶级斗争才会完全熄灭。

为了彻底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不仅要消灭阶级对抗，而且还要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消失。无产阶级国家，一方面，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为这些差别的消失创造物质条件；另一方面，还必须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这些工作做好了，上述的三个差别都消失了，这时，只有这时，才能进入彻底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消灭以后，国家也就随之失去作用，国家的消亡和阶级的消灭一样，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列宁说："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国家与革命》，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88页）在阶级消灭以后，政党也因为没有存在的必要而消亡。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论人民民主专政》，载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3页）

在没有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和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时候，国家的消亡是不可能的。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却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现在的条件下就归于消亡。他们声称，不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党这样的“政治垄断因素”逐渐消亡，就会导致“官僚主义的国家极权主义倾向”，就会“妨碍社会主义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批判了国家消亡问题上的反动谬论，阐明了国家消亡的条件。国内反动派的彻底消灭和阶级的消灭，是国家对内职能消亡的必要前提；消灭了帝国主义，铲除了爆发战争的根源，才能消灭战争，实现永久的和平，这时国家的对外职能才会消亡。在国内外反动派没有消灭和阶级没有消灭以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但不应该消灭，而且在一定的时期之内还应该加强，否则就不能对付这些反动派的疯狂挣扎，就不能粉碎有时还会特别增强起来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捣乱、破坏活动，不能制止或粉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所以，国家的国内镇压职能和反对国外反动派的职能，只能经过长期的过程才能完全归于消亡。任何脱离上述条件而空谈国家消亡的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恰恰是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为了在将来完全消灭阶级和使国家归于消亡，目前还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正是革命的辩证法。

# 第十四章 社会革命

人类社会的发展表明，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具有暂时的、历史的性质，都有其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每一种社会形态都

将为另外一种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而一切社会形态的更替都要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彻底实现。在阶级社会里，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在我们的时代，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全世界人民解放的根本道路。

## 一、社会形态的更替必须通过革命的变革

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矛盾发展的结果。社会革命的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要求这一客观的必然的规律。社会革命要变革经济制度，即消灭过时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而为了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顺利地建立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就必须改变旧的上层建筑，使它成为与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

在阶级社会，改变经济制度的斗争，必然要集中地表现为革命的政治斗争，表现为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就这一点来说，政治革命在整个社会变革中具有决定的意义。列宁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论两个政权》，载《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页）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乃是实现革命变革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反动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之下，被压迫阶级为了实现革命任务，通常都不得不经过暴力革命。马克思说："暴力是一切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产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49页）列宁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预言》，

载《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4页）1789—1794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了一系列的起义、内战，粉碎了封建主阶级的统治才取得了彻底胜利。美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经过了1776—1781年的独立战争，而且经过了1861—1865年反对奴隶制的国内战争，才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德国、日本等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妥协，使社会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走着改良的道路，但是，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彻底的；并且在新旧阶级取得妥协之前，仍然经过了或大或小的国内战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经过武装起义而取得的，并经过三年国内战争和粉碎外国干涉的战争，才得到巩固。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通过22年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战争才取得了胜利。

先进思想与革命理论的创立和传播，对革命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革命的一般进程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创立和传播先进思想、革命理论，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揭露旧制度的腐朽性，造成社会舆论；夺取政权，建立革命阶级的政治统治；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飞跃地向前发展，推动社会形态走上更高的阶段。

革命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发生和取得胜利的，只有当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所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形成了全国性的（既牵动被剥削者又牵动剥削者的）危机的时候，即革命形势成熟的时候，才会爆发革命。列宁说："只有当'下面'不愿照旧生活而'上面'也不能照旧统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6页）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除了有客观的革命形势以外，还需要主观条件的成熟，这就是：革命阶级的觉悟

程度和组织程度大大提高，形成足以摧毁反动政权的强大革命力量。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说来，主观条件成熟的集中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熟。只有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发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失时机地领导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使革命走向胜利。

社会总是在和平发展与革命变革的交互更替过程中前进的。和平发展时期总是比革命变革时期长得多，但革命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强大的促进作用。在革命高涨时期，尖锐的阶级斗争激发着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热情和理想。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革命的变革越是深刻，人民群众的发动就越是广泛；同时，人民群众发动越广泛，革命的改造也就越深刻。劳动群众积极参加了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革命进程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次法国革命成为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中最彻底的一次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中，人民群众的发动最广泛、最充分，他们的伟大创造作用得到了空前的发挥，涌现出自己创造历史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智慧。历史上的一切革命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发动了人民群众，发挥了他们创造历史的主动性、积极性，起来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摧毁腐朽的旧制度，使社会的发展实现飞跃的进步，所以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1848年至1851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9页）

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右翼社会党人都企图以改良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他们认为，只有和平的进化才是社会发展的"正常"途径，而革命则似乎倒是"反常现象"，应当用所谓"和平抵抗"来代替阶级斗争，用所谓"和平斗争"、"民主手段"来代替革命行动。改良主义者力图用小恩小惠来分裂工

人队伍，欺骗工人群众，引诱他们脱离阶级斗争。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腐蚀和软化无产阶级的工具。列宁曾经指出："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几个争论问题》，载《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7页）右翼社会党人正是提出某些资产阶级所容许的、粉饰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例如充分就业，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障和收入、财产的"公平"分配等等)，作为他们实现所谓"社会主义"的纲领，借以反对共产党人的革命主张。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般地拒绝改良，并不反对无产阶级为争取日常的改良而进行斗争。但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改良只能使旧制度发生一些小的、量的变化。日常的改良只不过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副产品。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压迫，决不能经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质变，经过革命来实现。谁如果只把改良当作自己的惟一任务，就必然要堕落到充当"资本主义看护妇"的地步。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是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因此，争取改良的斗争必须服从于革命根本任务的解决。改良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辅助方法。无产阶级把改良作为积聚革命力量、发展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

历史上有过各种类型的革命，有反对奴隶主阶级的奴隶革命，有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由于革命所解决的社会矛盾各有其特殊性，所以这些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不同，革命的对象、动力也各有不同。谁是革命对象，谁是革命动力，决定于社会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而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又决

定于他们在社会经济制度中所处的地位。在旧经济制度中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要反对革命的，所以他们成为革命的对象；在这个经济制度中处于被压迫和被剥削地位的阶级，他们就会起来革命，或赞成和拥护革命，就成为或可能成为革命的动力。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要正确地指导人民的革命运动，就必须对社会经济的状况和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确定当前社会的性质。并以此为根据，确定革命的性质，规定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提出指导革命的纲领、路线和战略策略。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人类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社会革命的终结，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将仍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仍然是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不过，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将消灭一切剥削一切压迫，将消灭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将再不会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了。

## 二、民主主义革命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 17 世纪到 19 世纪中叶，先后都经过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是反对封建农奴制度的革命，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的革命。当时革命的动力，包括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由于当时无产阶级还没有完全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革命中不得不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而农民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革命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确立统治地位。

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进入腐朽的、垂死的阶段。这

时，在一些封建地主阶级还占着统治地位的国家，还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历史时期发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1905—1907年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17——19世纪西欧各国的革命有着根本不同的特点。1905年的俄国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已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展开，资产阶级趋向于和封建势力妥协、甚至直接投入反革命营垒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俄国资产阶级已失去了17——19世纪中叶西欧资产阶级的那种积极作用，它已不能够领导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变化和阶级矛盾的变化，使得无产阶级必须而且能够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联合农民，孤立自由资产阶级，彻底破坏沙皇制度和地主土地所有制，才有可能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得到真正胜利。

在指导1905年革命的过程中，列宁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列宁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对资产阶级有利，而且对无产阶级也是极其有利的。资产阶级需要革命进行得不坚决、不彻底，以便他们可以依靠旧制度的某些残余来反对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却需要把革命进行得十分彻底，因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就愈有保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载《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页)。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成为这个革命的领导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然以有利于农民和无产者的形式来实现，必然要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并且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这些思想对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帝国主义时代，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还有广大的殖民地

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残酷压迫，阻碍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发展。为了便利其无止境的掠夺，帝国主义一方面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部的封建势力相勾结，保持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并使封建地主阶级成为自己侵略和统治这些国家的支柱；另一方面,又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豢养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作为其直接统治人民的代理人。在许多国家，大买办阶级发展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垄断着一国的经济命脉，来为帝国主义服务。解放前的旧中国就是这样。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结合一起，成为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不推翻这三座大山，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得到解放。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买办资本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基本矛盾。随着这种矛盾的发展，就必然兴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十月革命终结了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开始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斯大林说:“战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再论民族问题》，载《斯大林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85 页）

毛泽东同志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它使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威胁帝国主义生命的前线，从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制度,而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所支持。在由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时代,“任何殖

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61页）

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斗争中必须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人民联合起来。不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人民联合，不支援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在事实上帮助了帝国主义，就会损害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口头上讲社会主义革命，却不肯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侵略罪行，不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人民结成战斗的同盟。列宁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最紧密地全部团结起来，那么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8页）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也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发展，就是与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分不开的。苏联的支援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援，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大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力量而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使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力量的巨大发展，鼓励了战

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的大发展。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每一斗争，都给予了一切可能的支持和援助，这就更加便利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促进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争取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猛烈发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濒临全面瓦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除了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外，还有许多国家由于进行了长期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而取得了政治独立或部分独立地位，成立了民族主义国家。但是，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获得独立，是不甘心的。美帝国主义力图采取更加狡猾的新殖民主义政策，来实行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并取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新殖民主义不是用赤裸裸的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方式，而是以“援助”为钓饵，通过经济控制、政治收买和军事条约的束缚，达到旧殖民主义所要达到的同一目的。新殖民主义在表面上允许被侵略国家保有形式上的“独立”，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骗作用，它比旧殖民主义更为危险。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为着帮助推销新殖民主义，竭力美化帝国主义的所谓“援助”，说什么不能“把帝国主义形式的‘资本输出’同对不发达国家的有组织的国际援助混为一谈”，说什么这种“援助”可以促进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卡德尔：《社会主义与战争》）。被压迫民族从自己切身的经验中体会到，帝国主义的所谓“援助”就是一种资本输出，这种“援助”是为了加强对受援国的侵略、剥削和控制，攫取最高利润，是为了使受援国在经济上、政治上永远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因此，已经取得独立和正在进行斗争的被压迫民族，为了保持斗争的成果，进一步争取民

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正在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所采取的各种侵略手段作坚决的斗争。

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革命的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这个理论。中国人民革命具有许多具体的历史特点，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完全相同。但是，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彻底胜利的革命来说，中国革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中国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就获得了新的性质，毛泽东同志把它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它并不要求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所以其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它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代表它们利益的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动力，主要是占全国人口 90%左右的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即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因而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而无产阶级则是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根据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311 页）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个革命阶级，组成了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为主力军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反动统治者进行了一个长时期的革命的武装斗争，终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领导权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民族民主革命能否彻底胜利的关键问题。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把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资本的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全民族的完全独立和彻底解放。

无产阶级对于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相联系的。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时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买办资本的束缚，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有矛盾，因而他们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和反对买办资本的革命运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代理人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他们又具有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当着无产阶级发动了广大农民，进行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运动时，他们就会害怕革命，甚至有时还可能叛变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又会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而变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程度，取决于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取决于阶级矛盾的变化。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3页）中国革命的历

史经验，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某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条件下虽然也领导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运动，取得某些胜利，但是最后仍不能彻底解决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实现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农民一般占人口的多数，现代无产阶级人数较少。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一个特别艰巨的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第一位，应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在党内进行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改造了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党员的思想，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坚强地团结起来。这样就解决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小资产阶级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农村环境，如何把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强的战斗组织的问题。

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领导农民的问题，是工农联盟的问题。

农民问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包括贫农和中农的广大农民，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能不能领导农民革命乃是能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标志。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基本上就是因为它不能放手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它常常害怕和反对农民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坚决支持农民的革命要求，深入农村，进行艰苦的工作，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和领导他们最彻底地实现自己的要求。无产阶级也只有和广大农民群众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

领导农民革命，就是要领导农民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实现土

地制度的根本改革。毛泽东同志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51页）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民的问题上曾经同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进行过斗争。右倾机会主义者否认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不但放弃无产阶级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而且反对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起来进行彻底的反封建斗争。"左"倾机会主义者否认有联合包括中农在内的全体农民的必要，结果也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使革命失去了可靠的同盟军。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都使革命受到严重的挫折。

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壮大革命势力，孤立反动势力，无产阶级还必须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同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力量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有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无产阶级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是：一方面要在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他们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资本的革命；如果不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区别开来，不注意联合他们，就会犯"左"的错误。另一方面，又要同他们的妥协性进行坚决的斗争，如果不在斗争中坚决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反对工农群众和反对共产党的倾向，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就会犯右的错误。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错误的。

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敌人。但是，无产阶级也可以根据“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论政策》，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62页）的原则，在可能和必要的时候同他们之中的某些势力，建立暂时的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经和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共同抗日这一点上建立了统一战线，同时和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方面，反复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包括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势力的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必须积极地发展革命力量。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主体，只有充分发展这个主体的力量，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阻止中间力量的动摇，把它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从而不断地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动势力。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在反对革命的敌人时，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斗争形式，包括合法的与非法的、和平的与武装的等各种斗争形式，而武装斗争常常成为主要的形式。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互相勾结对人民实行极其残暴的统治，对人民的解放运动采取武装的残酷镇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不可能经过合法的斗争取得真正的解放。为着使民族民主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人民必须在可能的地方和可能的时候，建立一支被共产党所领导的、善于和敌人作战的人民军队，以及这支军队所借以活动的根据地，并使敌人统治地区的群众斗争与武装斗争相配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是这样。毛泽东同志说：“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共产党人〉发刊词》，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00—601页）

在中国革命中，武装斗争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和农民土地问题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把这三个方面概括成为“工农武装割据”的观念。“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农民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主要阵地，把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走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道路。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以革命的乡村包围城市的新观念，创造了从建立小块的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大块的革命根据地，从农村包围城市到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首先在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地区上摧毁了反动政权，建立了革命政权，进而在全国范围内打碎了反动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取得了革命的彻底胜利。

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的标志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及其代理人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中国革命的全部经验，集中到打碎反动阶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人民的国家这一点上。他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5页）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就使革命由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展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发展

前途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46页）处在20世纪的今天，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前途，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前途。

##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在内的以往的一切革命，不过是以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却是要消灭一切剥削、一切压迫，创造条件，使阶级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社会。

为了实现这种极其深刻的历史变革，需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至今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者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7页）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发动和吸引广大劳动群众来参加。由于根本利益的一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作为革命领导者的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结成长期的巩固的联盟。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作了系统的分析研究之后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历史证实了列宁的科学预见。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第一次取得了这个革命的胜利，开辟

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的历史时代。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至少是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同时实现。后来，他们又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个别国家爆发，但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各国资产阶级容易采取联合行动把单独一个国家发生的革命镇压下去，社会主义革命单独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新的历史特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一国首先胜利的新原理。

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的研究证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帝国主义时代具有更尖锐的性质。由于这个规律的作用，某些原来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以跳跃的速度赶上和超过某些原来比较先进的国家，因而帝国主义各国为争夺殖民地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便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各种矛盾就极端尖锐化起来，其中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的发展削弱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使得这个体系的某些地方可以出现特别薄弱的环节，从而使得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利用时机，突破这个最薄弱的环节，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最薄弱的环节不一定是工业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也不一定是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存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但是各国发生革命的先后，并不是由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的。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革命条件并不一定就是最成熟的。在某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取得超

额利润，并且培植了“工人贵族”，分裂工人运动，革命力量的成熟就受到了阻碍。确定某一个国家革命的客观前提是否成熟，不能仅仅看这个国家内部的发展程度，还应看它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它是不是帝国主义体系各种矛盾的焦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统治是不是在这里已经摇摇欲坠。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是在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作斗争中产生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抹煞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宣传所谓“超帝国主义”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否认帝国主义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否认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从而实际上否认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胜利的可能性。他们硬说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高、无产阶级还没有在全国人口中占多数、无产阶级还没有造就足够的管理国家的干部的时候，便不能夺取政权。列宁痛斥了这些谬论。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武装了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使其在条件成熟时能够主动地去冲击资本主义制度，而不致消极地坐待革命的“总爆发”。

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夺取政权、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只是适合于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官僚军事机构，而根本不适合社会主义的需要。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只是夺取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而不打碎原有的国家机器，这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无产阶级革命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马克思强调地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二稿，载《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9页）列宁把无产阶级革

命问题集中到这样一点上："不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载《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9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在存在着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一般都要经过武装斗争，但是并不排斥在特定的条件下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即使是革命和平发展，也必须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无产阶级能够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对人民最有利的。只要有这样的可能，不管它实现的机会是怎样微小，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是重视的。从资产阶级掌握着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国家机器这个客观事实出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革命和平发展是"革命史上千载难逢的机会"（《革命的任务》，载《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0页），这种机会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是在阶级力量形成某种特殊对比的情况之下出现的。共产党人一旦遇有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时，总是紧紧地抓住它，努力利用它来实现革命的目的，但同时又要准备，一旦这个时机逝去了，就仍然要用武装斗争来夺取革命的胜利。

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内存在着"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当时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力量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巩固起来，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这时，列宁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但是，不久以后反革命武装力量很快地组织起来，破坏了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白匪军用暴力镇压了工人士兵群众的和平示威。于是列宁宣布，革命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已

经开始走上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论口号》,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5页)俄国工人阶级通过武装起义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中国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有了很大发展,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人民都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曾经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并且在1946年同国民党达成了一个实行国内和平的协议。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撕毁了这个协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国的大内战。这就迫使中国人民不能不进行革命的战争。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没有放松警惕,没有放弃人民武装,而且做了充分准备,所以战争没有吓倒人民,反而使战争的发动者自食其果。

如果某一个资本主义小国已经处在社会主义国家包围之中,或许有较多的可能出现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反动统治阶级仍然可能采取“困兽犹斗”的行动,因此也绝不能认为革命和平发展是惟一的可能性,而应当同时估计到革命非和平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

1957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指出:“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这样,阶级斗争的剧烈程度和所采取的形式,与其说是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愿意不愿意进行和平的变革,而在于资产阶级和反动统治者能不能接受这种和平的变革。无产阶级决不能片面地、没有根据地把自己

的方针和全部工作建筑在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而必须同时准备两手，就是既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又准备革命的非和平发展。

为了实现夺取政权的武装起义，无产阶级一般地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积聚力量的过程，不能设想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轻率地发动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同志指出："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战争和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30页）在积蓄力量的过程中，无产阶级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包括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的形式，是完全必要的。

现阶段，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形成了极其尖锐的对立。这种情况就使得无产阶级可能在下述的一些民主任务的号召下来团结各阶层人民，组成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这些民主任务就是："争取和平；争取民族独立；保卫和发展民主；争取对最重要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和管理民主化；争取把整个经济用于和平目的，以满足居民的需要；争取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争取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争取保护农民的利益和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使他们免受垄断组织的危害。"（《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页）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在一起，坚决为实现这些任务而进行斗争，这不但适合于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也能加强无产阶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提高无产阶级的威望。但是，争取民主任务的斗争，还仅仅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斗争，这些任务即使实现了，也并不能使无产阶

级和劳动人民得到真正的解放。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觉悟的无产阶级决不以此为满足，而要把民主运动引向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改良主义者的根本区别。《1960 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指出："改良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改革看成是最终目的，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信，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在日常斗争的过程中将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他们的真正出路。"

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进一步改造旧经济，建设新经济，彻底消灭阶级，并进到无阶级的社会。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无产阶级只有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才能逐步地完成这个任务。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1 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的根本观点。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者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分水岭。列宁指出：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载《列宁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99 页）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之所以成为可耻的叛徒，主要的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以南斯拉夫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继承了第二国

际修正主义的衣钵。卡德尔说："整个说来，没有一点疑问，通过正统的欧洲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政治机构来实现向社会的演变过程，对于一系列的国家说来，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现实的事实了。"（卡德尔：《社会主义的民主在南斯拉夫的实践》）他们无耻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散布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就彻底地暴露了他们的叛徒立场。

帝国主义反动派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独裁"，是"极权主义"。针对着反动派的攻击，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对于反动派的革命专政，同反动派对于人民的反革命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因为只有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才能够真正得到翻身的机会。如果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人民，不能坚持这一项对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放弃或放松了自己的革命专政，反动派就会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受天大的灾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英勇尝试的巴黎公社，其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对阶级敌人过分仁慈，对反动势力没有实行彻底的镇压。1956 年，丧失了政权达 11 年之久的匈牙利资产阶级反动派，曾经一度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实行反革命的复辟，也是由于过去匈牙利没有充分应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对国内反革命势力予以足够的打击。只是当匈牙利的无产阶级政权，在苏联的援助下，采取了坚决的镇压措施之后，才平定了叛乱，保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所以，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的反动派还存在，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借以镇压反动派的一切破坏活动和复辟阴谋，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

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不仅千方百计图谋复辟，而且还有力量

进行反抗和复辟活动。因为剥削阶级被打倒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保留着某些财产，保留着某种知识上和技术上的优势；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剥削阶级的政治影响还会长期存在；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会长期存在；特别是，在国际上帝国主义还存在。帝国主义绝不甘心社会主义的胜利，它们时刻企图扼杀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破坏、颠覆活动，与国内反动剥削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反抗，是互相支持的。由于上述这些情况，过渡时期就不能不存在着极其复杂的、有时还是很尖锐的阶级斗争。所以，无产阶级专政是必不可少的。

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实行国家领导的政权，坚持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巩固联盟，也就没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农两个阶级在所有的国家中都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也主要是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除了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外，还存在着劳动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这两个联盟就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后一个联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无党派进步人士等等，它团结了劳动人民以外的一切人民的力量，动员他们来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事业服务，帮助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进行自我改造。这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很重要的。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最广大的人民反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战斗的联盟。专政是对付敌人，对付国内外反动派的武器。对人民自己，对联盟内部，则不能实行专政，而只能实行民主。对于反

动派的专政必须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强有力，所以能够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担负起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正因为它一方面是劳动群众对反动剥削阶级的专政、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而另一方面又对于广大人民实现了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实现的民主。它能够充分发挥千百万劳动人民以及一切社会进步力量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把他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能够战胜一切的伟大力量。毛泽东同志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0页）

社会主义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比拟的。资产阶级民主是供极少数人享受的民主，供富人享受的民主，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根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社会主义民主由于它是对绝大多数人、对劳动群众和一切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人们的民主，所以它标志着民主、自由的空前巨大的扩展。它从政治上和物质上保证一切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也保证除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民享有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在中国，各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宗教集团都享有民主权利，他们的代表人物还参加了政权机构。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方面，一方面是共产党被公认为领导党，另一方面，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则。

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并不是无政府状态。这种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为了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力量，有力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加强人民队伍的组织性、纪律性。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毛

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是人民的政治权利，同时也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手段。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等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此外，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

一般地说，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更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去解决。毛泽东同志说："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页）人民有了自己的国家，就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逐步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摆脱旧社会的坏习惯、坏思想的影响，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同志把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说得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

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种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在中国人民内部，长期行之有效。

毛泽东同志明确地区分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两类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两个方面——对反动派的专政和对人民的民主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处理问题联系起来。这就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社会主义国家在执行国家的任务时，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别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这样就能团结最广泛的人民力量，对敌人的破坏活动给予最有力的打击，就能最有效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如果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用错误的方法去处理这两类矛盾，就会犯右的或“左”的错误，就会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损失。

无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后，就可以利用这个政权的力量，继续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在经济战线上，工人阶级国家的任务，是要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并且对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结束，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为着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党和国家还必须领导全国人民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把全国经济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并造就一支强大的工人

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

无产阶级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在国内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依靠工农联盟和各族人民的团结；在国际上还必须依靠国际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和互相支援。

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总会有某些不同的特点。但是，从根本上说来，每个国家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又必然遵循着一条共同的道路。这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1957 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对这些规律作了科学的概括。宣言指出："这些共同的规律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工人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联盟，消灭基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建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消灭民族压迫，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兄弟友谊；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不让它受到国内外敌人的侵犯；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

宣言对于近一百年特别是近四十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所作的理论概括，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给各国无产阶级指明了解放自己的康

庄大道。

## 四、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

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的任务是要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为了达到这个总的目的，必须经过一系列的互相连续的革命发展阶段。无产阶级政党在指导革命的时候，必须把各个革命阶段的不同的性质加以明确的区别，在进行前一个阶段的革命斗争时，不过早地执行下一个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又力求使革命的前后两个阶段紧密地连接起来，在革命的前一阶段，根据客观可能积极地为下一个革命阶段准备条件，以便在前一个阶段的斗争胜利后，使革命不停顿地发展到下一个阶段。

当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时候，在某些国家里，它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暂时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明确地回答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应该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这个革命对发展无产阶级的斗争是有利的。但是，在这个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坚持自己独立的政治方向，以便在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之后，立即就开始斗争去反对资产阶级。《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502 页）

1850 年 3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改良主义要求时，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思想。他们说："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

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92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列宁在俄国 1905 年革命期间所著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发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思想，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须争取革命的领导权，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便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使革命有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列宁明确地提出了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理。列宁说：“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载《列宁全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21 页）

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了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的理论的正确性。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曾经是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之一。

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现过像俄国的孟什维克一样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否认不断革命论，在本来互相衔接的民主革

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隔上一道资产阶级专政的“万里长城”，否认这两个革命之间的相互联系，否认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有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的前途。他们说什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主张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革命胜利后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中国还出现过“左”倾机会主义者。他们否认革命发展阶段论，混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要在民主革命阶段内消灭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都曾经使中国革命遭受过很大的损失。

毛泽东同志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的原理，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两个阶段互相区别和互相衔接的问题，批判了和纠正了上述两种错误路线。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46页）毛泽东同志一方面坚持了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原理，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严格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坚持了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的原理，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衔接起来，不容许在两个革命阶段中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他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一定要由无产阶级坚决掌握领导权，以便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上去。

为了正确地把握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区别和联系，在思想工作上，毛泽东同志还指出，要把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同当前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99页）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一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两个不同的阶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因此在各方面，即在经济、道德和智慧方面都还保留其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页）而共产主义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更成熟、更发展的高级阶段。马克思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当那奴役人们、迫使其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后；当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已随之消失后；当劳动已经不单单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已成为乐生的第一要素时；当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在各方面的发展而增高，一切公共财富泉源都尽量涌现出来时，——只有那时，才可把资产阶级式的法权的狭隘眼界完全克服，而社会就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同上书，第23页）

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如何区别又如何衔接的问题，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6 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的原理，要求我们掌握革命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而不要把这二者割裂开来。右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到革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看不到前一个过程和后一个过程之间的联系，因而认为革命应该停顿在它的某一个发展阶段上，不再继续前进。"左"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到革命必须分阶段、有步骤地前进，因而混淆不同质的发展阶段，企图超越某些必经的过程，而跳入那些目前还不能达到的阶段。认识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的原理，正确对待各个革命阶段的区别和联系，克服和防止右倾和"左"倾的错误，才能把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一步步地推向前进。

# 第十五章 社会意识及其形式

为了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不仅要正确了解经济、政

治的现象，而且要正确了解社会意识的现象，正确了解社会意识及其形式的特点以及各种形式的社会意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 一、社会意识的一般特点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人们对于自己周围环境、社会关系、社会过程的认识。社会意识的内容，不管它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甚至是纯粹出自幻想的，都是现实的反映，都可以从社会存在中找到它的来源。社会意识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政治思想、法权思想、道德、科学、哲学、艺术、宗教等形式。

社会意识依赖于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的内容是由社会存在、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生产发展的水平不同，社会意识也就不同。社会意识的发展不是脱离社会存在而绝对独立的。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应的社会意识，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社会意识也必然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在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生产资料和产品都归原始公社全体成员所有，人们共同生产，平均分配劳动产品，每个人都完全依赖于集体。当时人们的这种生活状况，不可能产生私有观念，而只能有朴素的、原始的集体观念。随着私有制、剥削和阶级对立的出现，就产生了私有观念和发财致富的欲望，并出现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意识的对立。随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私有制和阶级剥削最后消灭，公有制经济的高度发展，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就逐渐成为全民的意识。不仅如此，即使同样是阶级社会，在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等不同的社会形态里，社会意识也各不相同。社会意识是具体的、历史的现象，没有抽象的、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社会意识。

一定的政治思想、法权思想、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观点的总和，构成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超阶级的、统一的意识形态。由于人们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不同，在同一个社会关系里，会形成不同的思想感情、愿望要求、习惯风尚和道德观念，会有不同的以至根本相反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同志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80页）

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对立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思想上、精神上也必然居于统治地位，而被统治阶级的思想则处于被压抑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写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页）

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说成是全民的超阶级的，他们提出意识形态超阶级、无党性的观点。这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他们需要在劳动人民面前掩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本性。其实，无党性的说法正是资产阶级党性的表现。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曾经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反对封建主义，他们认为这种思想是全民的思想，他们自认为是全人类利益的捍卫者。这些口号在当时的确曾经起过动员群众摧毁封建制度的进步作用。但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现实表明，"自由、平等、博爱"这种思想所要求的实质

上是剥削和竞争的自由，是虚伪的形式上的平等，是掩盖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纯粹金钱关系和相互倾轧的空话。因此，“自由、平等、博爱”从一开始就不是超阶级的东西，而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早已成为反动的社会势力，它们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化。它们的思想代表所说的“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只是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意识形态，他们所说的“全民”利益只是少数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根本不同，它公然申明自己的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党性的，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表现。无产阶级的利益同社会发展的方向完全一致，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无产阶级不需要掩盖自己意识形态的阶级实质。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又是客观世界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反映。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才真正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它将是全人类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时又肯定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某一种社会思想和理论，当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根本改变之后，还可能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候，并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这种意识落后于存在的现象，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一个表现。与落后的社会意识相反，先进的社会意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它对于人们的社会实践起指导和动员的作用。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杰出的启蒙主义者，以特殊的方式预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19 世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图景已做了某些臆测，虽然带有极大的幻想的性质，但也具有一定的合理的成分。马克思主义全面

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社会发展的前景作了科学的预见。这些都表现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旧的社会思想和理论不可能在它的物质基础消灭之后长久地存在下去，新的理论只有在社会存在的发展已成熟到能够提出新的任务时，才可能产生。

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还表现在它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都同先前这方面的思想成果有着继承的关系。每一时代的思想家、艺术家在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时，都要利用前人所创造的成果和遗留下来的思想资料，把它们加以改造发展，使社会文化向前推进一步。每一民族的文化，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而具有自己的特点。继承了春秋战国儒家传统的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和继承了古罗马基督教运动传统的欧洲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各有着显然不同的特色。但是社会意识归根到底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对文化遗产的继承不会是无条件地原封不动的接受，而是对以前文化遗产的加工改造。怎样进行加工改造，摈弃哪些，发展哪些，这在根本上也是由社会存在的现实情况和思想家们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先进阶级的意识形态继承了的是历史上优秀的文化成果，反动阶级的意识形态则继承了历史上落后的、反动的东西。无产阶级文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切最优秀文化成果的集大成，它绝不是在世界文明发展大道以外产生的，而是人类过去伟大思想发展的继续。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青年团的任务》，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4页）

各种形式的社会意识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不估计这些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企图单纯地用社会经济条件来说明社会意

识的发展，就不能正确地了解各种社会意识的特点。这也表现了社会意识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例如，不了解欧洲中世纪宗教的作用，就不能了解那个时代哲学发展和斗争的特点；脱离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无从说明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和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不估计中国封建时代哲学、政治思想的影响，就不能完全了解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学艺术的许多特点；在今天，不看到无产阶级政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艺术发展的作用，就不能了解革命文化发展的规律。但是各种形式的社会意识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同政治法律的相互作用，归根到底是受经济基础所制约的。

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还表现在社会意识的发展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历史上有许多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思想领域内却超过了经济上先进的国家。如18世纪末法国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超过了经济上先进的英国；19世纪中叶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分裂的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19世纪末经济落后的俄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产生这些思想的国家里的阶级矛盾在当时特别尖锐，使它们成了革命的中心。18世纪末法国是欧洲革命的中心，19世纪中叶革命中心转移到了德国，19世纪末革命中心又转移到了俄国。这种思想发展对经济发展水平的独立性也只是相对的。因为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归根到底还是经济矛盾的表现，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尖锐化的结果。经济落后国家在特定条件下所以能够出现先进的思想意识，仍然是以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为前提的。假如德国和俄国在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达到一定的水平，没有相当成长了的无产阶级，那么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产生是不可能的。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坚持唯物的、辩证的观点，既反对夸大社会意识的作用，把社会意识的

相对独立性绝对化的唯心主义，又反对否认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它的能动作用的机械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决不是说社会意识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消极的结果。相反地，社会意识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这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突出表现。

某种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究竟起什么作用，是促进还是阻碍社会的发展，取决于它所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也就是说，取决于它所反映的是社会先进势力的要求，还是落后势力的要求。先进的社会思想理论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因为它正确地或比较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是先进阶级、先进的社会势力的精神武器。它一旦掌握了群众就能发挥伟大的动员、组织和改造的作用，就能形成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的物质力量。列宁说得好："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怎么办?》，载《列宁全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36 页）与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相反，反动的社会意识形态同历史发展规律背道而驰，它反映着腐朽制度和反动阶级的要求，歪曲现实，散布各种要劳动人民安于受压迫、受剥削地位的迷信说教，因而起着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反动的思想、理论决不能长期地蒙蔽广大人民，阻挡先进的思想、理论的伟大解放作用，它最终必将被先进思想战胜，必将随着旧制度的消灭而逐步归于灭亡。

各种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有不同。它们的作用大小，归根到底取决于它们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程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先进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例如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由于受到狭隘的阶级眼界的限制，都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反映当代历史发展的前进趋势，不能全面地认识社会运动各方面的客观过程及其规律性。它虽然在一个

时期内能帮助先进阶级动员人民起来摧毁腐朽的旧制度，但终归不能成为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精神武器。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完全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能够掌握最广大的群众，最广泛、最深入地动员人民群众，形成无坚不摧的物质力量。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所以能够发挥特别巨大的作用，这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分不开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成了新社会的主人。同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社会地位的变化相适应，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也改变了在旧社会的被压抑、被排斥的地位，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人民由于政治地位的根本改变和经济上的解放，他们更深刻地体验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各种社会意识形式，越来越深入人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以能够发挥特别巨大的威力，还由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着国家机器、生产资料等实现自己的理想的物质手段。

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人民群众思想觉悟的提高，也不可能是自发地实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习惯势力的存在，都阻碍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人民群众思想觉悟的提高，阻碍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的发挥。因此，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同资产阶级思想展开不调和的斗争，在人民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加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是共产党的经常任务。

## 二、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

社会意识有政治思想、法权思想、道德、科学、哲学、艺术、

宗教等具体形式。不同形式的社会意识，是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来反映社会存在和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同时，它们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 （一）政治思想和法权思想

政治思想和法权思想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政治思想和法权思想是经济基础的最直接、最集中的反映。它们同阶级的利害关系最为密切。

历史事实表明，在一切社会经济形态中，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思想和法权思想，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法权思想除了表现为理论形式以外，还体现在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政策法令当中。它直接维护着现存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统治。

被统治阶级在阶级斗争的发展过程中也会形成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法权思想，这种思想是为破坏现存的社会制度，夺取国家政权，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服务的。

在封建社会中，农民虽然不能形成自己的系统的政治思想和法权思想的理论，但代表农民利益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提出了一些和封建统治根本对立的政治观点和法权观点。如东晋的鲍敬言就提出了反对封建统治的“无君论”思想，我国在历代农民运动中出现过平均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对农民起义曾经起过动员和组织的积极作用，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实现。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法权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随着无产阶级走上阶级斗争的政治舞台，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法权思想也产生了，它起着动员劳动人民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重大作用。但是，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

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时，它才能取得统治地位。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法权思想能够指导劳动人民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这种根本改造，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已经成为现实。

政治思想和法权思想是思想上层建筑中阶级性最强烈最鲜明的部分，它们比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对社会经济基础起着更直接的作用。政治、法权思想在意识形态中占着主导的地位，它给予其他一切社会意识形式以重大的影响。

## （二）道　德

道德在历史上比法权产生要早，在原始社会里就已经存在。道德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规范和法权不同，它不是由国家强行制定和强制执行的，而是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依靠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的力量来维持的。人们以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等道德概念，来评价人们的行为，从而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比法权还要广泛，它对人们行动的支配，有时显然是法律所不能做到的。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行为，就是道德观念起作用的表现。但是，道德没有法律上的强制作用，要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单靠道德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法权的作用。道德和法权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往往是相互补充的。道德和政治、法权一样，也是生产关系的比较直接的反映，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和法权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经济基础的变化或迟或早地引起道德的变化。道德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也是比较直接的。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道德理论都是离开社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来考察道德规范的。它们或者认为人们的道德规范是上帝规

定的，或者认为道德规范是合乎人类不变的自然本质的，就是说道德规范是永恒不变的。例如，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他所说的道，实质上包括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封建的道德规范。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正像他们把资产阶级的法权说成是永恒的、合乎人性的一样，把道德也说成是超历史的、超阶级的、永恒的。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正确地揭示了道德的本质及其产生发展的规律性。它认为，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的。永恒不变的、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荣誉和耻辱等等的道德规范，是根本没有的。任何道德规范都具有历史的性质，在阶级社会里，道德规范具有阶级性。恩格斯说：“所有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当时经济状况的产物。而因为直到现在社会是在阶级对立之中发展，所以道德总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是为支配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是当被压迫阶级足够强大之时，它表现对于这个统治的抗争，而代表被压迫者的将来的利益。”（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96 页）

在原始社会里，虽然还没有形成道德理论，但人们却有着公共的道德标准。由于生产的发展，人们第一次感到公社成员的义务和权利的统一，这时，最初的道德观念就产生了。在氏族和部落内部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爱同胞、服从集体决议、为同胞复仇和为部落英勇作战的义务，这都是他们的道德标准。在某一时期，杀死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和战争俘虏在道德上被认为是允许的。这样的道德标准，是由生产关系的公有性质和生产力的水平极其低下所决定的。

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社会中就没有统一的道德，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念。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把

体力劳动看做是最大的耻辱，把买卖、鞭打，甚至屠杀奴隶的行为看成是合乎道德的，把奴隶的逃亡和暴动看成是极不道德的；与此相反，要求解放的奴隶则把逃亡和暴动看成是合乎道德的。在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在西方是基督教的道德，在中国则是封建礼教。所谓“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被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说成是天经地义、永世不变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是维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等级制度的。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受着封建道德的严重压迫和束缚，同时农民在劳动中也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念，例如勤劳、勇敢、艰苦朴素、济困扶危、互助友爱等。

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形成了资产阶级的道德。资产阶级道德的基本原则是个人主义。它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曾经以要求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的名义，推动人们起来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起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以资产阶级的财产私有权为基础的个人发财致富的要求的反映。它在结束了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之后，就只是要求把个人的利益建筑在别人受痛苦的基础之上，它表现为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尔虞我诈等等。资本主义社会把人和人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金钱是资产阶级的真正的道德标准。马克思说得好，资产阶级可以这样对自己说：“我是一个恶劣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这就是说，它的持有者也是受尊敬的。货币是最高的善，这就是说，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此外，货币使我免于作不诚实者的麻烦，——所以事前就认为我是诚实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41页）这是对资产阶级拜金主义道德的极深刻的揭露。目前，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日益腐朽相适应，现

代资产阶级在道德上已经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穷奢极欲、虚伪、奸诈、诲淫、诲盗、谋杀等等现象充斥整个社会，它甚至公开提倡非道德论。

现代资产阶级伦理学完全否认道德的社会基础和客观标准，它以个人或一定集团的情绪、愿望、爱好和利害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道德观，实际上是抹杀道德的非道德论，是为着替极端个人主义的行为作辩护，企图为帝国主义的罪行做出“合乎道德”的解释。

在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都以自己的道德观念评价别人的行为。但是，道德是有客观标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历史上，人们的行为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就是合乎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

马克思主义肯定道德规范的历史性和阶级性，并不否认道德本身的发展和继承。先进的阶级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他们的道德观念总包含有一定的积极内容，这些内容被以后的先进阶级所继承和发展。劳动人民的优秀道德品质，是在他们世世代代的劳动和解放斗争中培养起来的，是人类宝贵的财富。

资产阶级的伦理学者歪曲马克思主义承认客观规律对人们行动的决定作用，诬蔑马克思主义否认对人们行为作道德的评价。

马克思主义不承认人们有意志的绝对自由，却承认人们有意志的相对自由，就是说在客观规律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范围内，对几个可能的行动，有主动地选择其中某个行动的一定的自由。人们的这种选择是自觉的、有目的的。因此，人们对其行为是要负道德责任的。坚贞不屈的革命者和变节分子、革命叛徒在道德品格上截然相反，这是因为他们在相同的情况下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列宁说："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由意志的身上。"（《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载《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9页）

马克思主义绝不排除道德和道德评价，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对人们的行为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马克思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道德观，它要求客观地历史地去评价人们的行为。马克思主义者对过去劳动人民中所表现的勤劳、朴素、勇敢、友爱互助等美德，对一切献身于社会发展进步的事业、反抗侵略、反抗压迫、关怀人民的优秀人物的道德行为，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予以充分的肯定。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些美德，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形成了共产主义的道德。

共产主义的道德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反映，它是人类道德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最高尚的道德。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道德观根本相反，共产主义道德的实质，就是集体主义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毛泽东同志说："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纪念白求恩》，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54页）刘少奇同志说：无产阶级与共产党员，"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是在努力于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与全人类的解放斗争中来解放自己，来消灭少数人的特殊权利，这就是共产党员的高贵、伟大与被人尊敬的基础，共产主义的道德

的基础”。（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94 页）

共产主义道德是为团结全体劳动人民，反对一切剥削制度和私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服务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道德只是无产阶级中最先进的分子所具有的品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消灭了剥削阶级，形成了人们根本利益的一致，共产主义道德随着社会发展，逐步地成为多数人的行为的准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道德就会成为全民的道德。

培养全体人民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彻底克服剥削阶级的道德观点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必须采取各种有效的办法，特别是通过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实践，对广大群众进行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同剥削阶级的道德影响进行坚决的不断的斗争。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巨大的作用；对于将来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 （三）科学和哲学

科学是人们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科学是应人们的实践的需要、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科学是以概念和逻辑的形式来反映世界的。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由于客观世界的发展有不同的阶段，表现为不同的运动形式，而每一门科学通常都只是研究世界发展过程的某一个阶段或某一种物质运动形式，因此就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科学部门，但归纳起来不外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哲学是

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科学的发展表现着特别明显的继承性。后一代人的科学研究必须以前一代人已经达到的终点为起点。不能把现代科学同过去的研究成果割裂开来。天文学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占星术，化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炼金术和炼丹术，近代原子论也和古代的原子假说有联系。不仅自然科学要批判地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也批判地继承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不同。自然科学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经验，即生产经验的总结，并且是为生产服务的，因此，自然科学的发展直接取决于生产的发展。

自然科学反映的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任何阶级的人从事生产活动，都必须遵循这些规律。这就是说，自然科学的规律，如像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规律，可以为各阶级的人们所发现、掌握和利用。因此，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

但是，在阶级社会里，自然科学怎样被利用，为什么目的服务，这是由掌握它的阶级所决定的。从而，它的发展也就受着阶级利害的严重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利用自然科学来提高生产技术，使自然科学成为增加利润和剥削劳动者的工具。在帝国主义国家里，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更是直接为帝国主义的反动政治服务的。正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别了，司徒雷登》，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9页）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科学技术掌握在劳动人民的手里，用来发展生产、为人民谋福利

和为世界和平事业服务。由于没有资产阶级那种狭隘利益的限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科学技术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自然科学的研究也要受到哲学的影响。自然科学家研究问题总是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支配下进行的。恩格斯说："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总还是在哲学的支配之下。问题只在于他们究竟愿意某种坏的时髦的哲学来支配他们，还是愿意由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绩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形式来支配他们。"（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73 页）在自然科学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须有某种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与之相适应。这种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唯心主义观点则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例如，在欧洲，神学和经院哲学曾经严重地阻碍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唯物主义哲学则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着伟大的解放作用，尽管当时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但与当时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情况相适应，因为那时自然科学主要还是搜集材料、积累材料、分门别类进行整理的阶段。近代（特别是 20 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日益深刻地揭示了各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它要求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作指导。近代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则起着促进作用。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它是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本身，虽然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发展规律的作用，是同阶级利益、阶级斗争直接联系着的，因此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就必然以阶级利益为转移。社会科学是人们对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它的发展不是直接取决于生产的发展，而是直接取决于社会经济制度和阶级

斗争的发展状况。某一剥削阶级当它还是进步的社会力量的时候，它的利益和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一般地还没有抵触，能够多少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就是在这个时候，它也受到它的阶级私利的限制。当它取得统治地位走向反动的时候，就再也不能对社会发展规律有正确的认识了。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取得政权以后，“科学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之丧钟，敲起来了。从此以往，成为问题的，已经不是这个理论还是那个理论合于真理的问题，只是它于资本有益还是有害，便利还是不便利，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的问题。超利害关系的研究没有了，代替的东西是领津贴的论难攻击；无拘束的科学研究没有了，代替的东西是辩护论者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恶的意图。”（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页）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根本不同，它是最革命、最进步的阶级，它的利益是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完全一致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正确地全面地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建立真正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哲学和科学一样，也是用概念和逻辑的形式来反映世界的。但是，哲学对现实的反映更概括、更具有普遍性。哲学在全部意识形式中起着方法论的作用。一切意识形式都不可能离开哲学思想的影响，不与唯物主义哲学的观点相联系，就要与唯心主义哲学的观点相联系。在阶级社会里，哲学是有强烈阶级性的，任何哲学都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彻底粉碎形形色色的现代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战斗任务。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哲学和科学的研究，要逐步地清除资产阶级的偏见的影响，因为这种偏见妨碍人们对于事物客观规律性的认识。但是，不能把反对资产阶级偏见的问题同学术性质的是

非之争混淆起来。人类对于事物的客观规律的认识要经过艰苦的摸索过程，许多问题不经过反复的讨论，就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学术性的是非之争，并不一定都受到阶级观点的影响。有些不同的意见，是由于研究的角度和方面不同、掌握的资料不同和认识的深度不同而引起的。特别是自然科学，由于研究的传统不同，观察的自然界的方面不同，研究资料的来源不同，可以形成不同的学派，这种不同的学派的争论，就更不能看做是不同的阶级立场和不同的世界观之间的争论。对于科学和哲学的研究，必须容许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学派展开充分的争论，才能有利于认识客观真理的目的，才能有利于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在学术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根据科学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而制定的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

## （四）艺　术

艺术和社会意识的其他形式一样，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不过，艺术不是像科学那样用概念和逻辑的体系来反映世界，也不是像道德那样用道德规范来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和评价人们的行为，而是通过生动、具体、感人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的。

艺术的产生和人们的社会生产活动是分不开的。它在原始社会的早期阶段就开始出现了。随着劳动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活日益丰富，艺术逐渐成为精神活动的一种独特的形式。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建筑、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等等形式。

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艺术理论家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的精神本性”，或起源于动物界的“自然美”，如鸟类的啼啭，美

丽的羽毛和动物的嬉戏等等。这些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社会劳动。原始人最初的歌唱是他们的劳动“号子”。原始艺术中的舞蹈、壁画、雕像等，是原始部落劳动活动的再现。艺术在原始部落中不过是生产实践的美化形式。在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艺术和生产的联系复杂起来了，往往不再是直接的联系。在阶级社会中，主要的是社会经济制度、阶级斗争、政治直接影响着艺术的性质及其发展，宗教、道德、科学、哲学等意识形式也给予艺术的发展以一定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说:“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惟一的源泉。这是惟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第 2 版，第 862 页)

艺术在阶级社会中总是反映阶级关系和一定的社会力量的要求的，它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各个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阶级斗争，不仅要有政治、法权思想等武器，而且还要有艺术这种武器。艺术是有阶级性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在阶级社会里，存在着先进阶级的艺术和反动阶级的艺术。先进阶级的艺术反映社会生活中的进步要求，起着推动社会前进的

作用。它或者揭露旧社会的丑恶和黑暗，鼓舞人民群众对旧制度的反抗；或者歌颂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和高尚的品德；或者唤起人民对新生活的向往。先进阶级的艺术，揭露了现实社会生活的矛盾，表达着健康的、高尚的情感。它通过对活生生的形象的描绘，帮助人们认识社会生活和历史的规律性；并以它的感染力培养人们的良好品质，鼓舞人们的乐观主义和进取精神；同时使人们得到健康的娱乐和美的享受。反动阶级的艺术则起着阻碍社会前进的作用，它鼓吹敌视社会进步、敌视劳动人民的思想，使人们消极颓废、精神堕落，追求低级趣味。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呈现出一片阴暗、颓废、没落的景象。在那里，进步的文学艺术受到迫害，反动的文学艺术到处泛滥。最典型的是美国，诲淫诲盗的影片和文艺作品、荒诞的抽象主义绘画广为流行，甚至把黑猩猩奉为“画家”。这一切腐朽透顶的“艺术”，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现代资产阶级用“艺术是超阶级的”、“艺术与阶级斗争无关”等谬论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中国过去“新月派”的代表梁实秋等反动文人宣扬“文学一概以人性为本，绝无阶级的分别”，“文学家并不会有固定的阶级观念，更不会有为某阶级利益的成见”等谬论。现代修正主义者也跟着资产阶级大讲其抽象的“人性论”、“人类之爱”，否认艺术的阶级性。他们把人类心理的某些共同属性片面夸大，硬说“共同的人性”、“人类之爱”是艺术的“永恒的主题”，否认阶级社会里“人性”的阶级本质和艺术的阶级本质。他们的说教在实际上是力图把资产阶级的人性说成是全人类共同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根本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泽东同志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

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71页）同样的，在阶级社会里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普遍的“人类之爱”，人的爱和恨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地主、资本家不可能爱农民、工人，而农民、工人也不可能爱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资本家。“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72页）

艺术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艺术有阶级性，这是就艺术的一般的社会本质来说的，但是艺术本身还具有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性。每一个时代的好的艺术作品，都能够用生动的、典型的形象集中地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矛盾关系，用精炼的形式和技巧，鲜明地表现出某种思想和情感，使千百年以后的人们还能从这些作品里面认识到当时现实生活某些方面的逼真的面貌，还能深深地受到作者的思想情感的感染。它的美的感染力在长久以后还能发生作用，它的进步的思想内容还要被后代的艺术家加以继承和发展，它的形式和技巧还要成为后代的艺术创作的借鉴。

今天，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许多优秀的古典艺术作品仍为广大群众所喜爱，为艺术家所借鉴，为党和国家所珍视。但是，任何杰出的古典艺术都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并且有不少作品是精华和糟粕混杂在一起的。因此，必须批判地继承这些文化遗产。无产阶级批判地继承这些优秀的文化艺术遗产，是为了创

立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文艺。

无产阶级的文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它必须为千千万万的劳动者服务，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无产阶级文艺是教育和鼓舞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武器，是反对各种反社会主义倾向的武器，是整个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

无产阶级的文艺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政治上有害的作品，即使是有相当高的艺术性，也不是好的作品。政治上愈反动的作品，艺术性愈高就愈有害，愈应加以排斥。而缺乏感人的艺术力量的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无论其政治思想内容怎样正确，也是没有力量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又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

无产阶级文艺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同时又要求在风格、形式、体裁、题材等等方面开辟最多样、最宽广、最富有创造性的新天地。劳动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是十分广泛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发展，人民群众在精神生活方面也要求丰富多彩。因此，艺术风格、形式、体裁、题材的多样性，是无产阶级文艺的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精神生活的客观需要。艺术风格、形式、体裁、题材的自由发展，是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作家和广大群众的艺术才能的必要条件。只有不同风格、不同形式互相借鉴、互相补充、共同提高，社会主义文艺才能繁荣和发展。

党和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方针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需要的，是繁荣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方针。毛泽东同志说：“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5 页）

## （五）宗　　教

宗教也是现实世界在人们主观意识里的一种反映，不过，它是一种虚幻的、颠倒的反映。恩格斯说：“一切宗教，不是别的，正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支配着人们的那种外界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间力量的形式。”（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33 页）

唯心主义不能科学地解释宗教的起源和实质。旧唯物主义者对宗教作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若干有科学意义的见解。但是，他们把宗教产生的原因，或者归结为群众的愚昧无知和僧侣的欺骗（如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或者归结为人和人之间的某种情感上的联系（如费尔巴哈）。这些都是离开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从主观上来找宗教的根源，实际上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宗教并不是社会的永恒现象。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逐步产生的。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们对自然灾害无法抵抗，对自然界千变万化的现象不能理解，对自己身体构造和梦境无法说明。这样，人们便产生了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形成了最初的宗教。

当社会出现了阶级对立，人们除了受自然力量的压迫外，又加上了社会力量的压迫。这种社会的压迫往往比洪水猛兽、瘟疫

等等自然灾害更为惨重。劳动人民为了摆脱这种压迫和剥削，在历史上曾经进行过无数的艰巨斗争。但是以往劳动人民的斗争，都没有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斗争的结果，最多也只是摆脱了旧的枷锁而又带上了新的枷锁。因此，人们对社会压迫和对自然压迫一样，感到难以理解和难以捉摸。列宁指出："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社会主义和宗教》，载《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2页）在阶级社会里，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是宗教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根源。统治阶级总是极力地培植、支持和利用宗教，把它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精神武器。

人们的宗教观念和宗教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氏族社会的较早时期，存在着图腾崇拜（崇拜一定的动物和植物等等）。随着氏族公社联合为部落，就出现了部落的神，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神。到了奴隶制社会，在国家形成过程中，从部落神中分出了至高无上的神，其余的神都从属于它。人间有了等级，神也就有了等级。单一的、全能的神，只是伴随着君主专制的大国出现而创造出来的。一神教的出现是和地上的君主专制的产生相适应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三大世界性的宗教，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们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例如，在西欧，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基督教就发生了相应的改革。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虽然有了高度的发展，但是宗教依然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消灭宗教存在的社会根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经济危机、破产、失业、饥饿和贫困，时刻袭击着人们，从无产者到资本家都

充满着恐惧心理，这就是宗教继续存在的条件。

由此可见，宗教是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产物。宗教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经济状况、经济关系所决定的。

在历史上，奴隶和农民有时也曾利用宗教来联合自己的力量，进行反对奴隶主和封建主的斗争，在这里，宗教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阶级社会里，宗教终归是反动统治阶级压迫群众的工具。宗教使劳动群众迷信神灵，而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宗教要人们顺从和忍耐，把希望寄托在天国和来世，安于自己被奴役的命运。这种精神麻醉的作用对于统治阶级是很有利的。马克思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3页）

反动资产阶级和以往一切统治阶级一样，把宗教作为维护剥削制度、麻痹劳动人民的工具。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到处维护反动制度。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在他的"圣论"中宣布：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是符合上帝意志的制度，而"工人应毫无怨尤地接受天意恩赐给他的地位"。天主教会的中心——梵蒂冈，是一个拥有大量资本和许多分支机构的、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政治组织。它曾经公开支持希特勒和莫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现在仍然为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势力服务。梵蒂冈和其他同帝国主义勾结的宗教组织一起，都充当着垄断资产阶级的精神棍棒。垄断资产阶级不仅利用宗教奴役本国人民，而且以宗教为幌子进行罪恶的侵略活动。美帝国主义每年都要化大批美金，雇用"传教士"渗入别的国家，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种种阴谋破坏活动。我国解放前后，美帝国主义曾通过梵蒂冈和美国教会控制中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对中国人民革命进行过疯狂的破坏活动。

宗教和唯心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所不同的是，宗教采取感

性的、通俗的形式来宣扬上帝，唯心主义则采用理论的、逻辑的形式来宣扬上帝。唯心主义是精制了的宗教，而宗教是最粗鲁、最拙劣的唯心主义。

科学和唯物主义是宗教的死敌。科学的每一发现，都打击着宗教迷信。科学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和所谓“神的意志”的宗教教义根本对立的。因此，在欧洲中世纪，许多坚持真理的科学家遭到教会的残酷迫害，甚至被活活地烧死。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教会力图把科学和宗教教义“调和起来”，并且用各种办法迫害正直的科学家。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曾经遭到过和科学家同样的命运，但他们一直进行着不屈不挠的反宗教斗争。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如王充、范缜等等，很早就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驳斥了对于鬼神的迷信。18世纪的西欧唯物主义者，如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都是战斗无神论的坚强战士，他们在反宗教的斗争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最彻底的无神论，它揭示了宗教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指出了宗教的反动作用和克服人们的宗教偏见的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一个历史现象，随着宗教产生的根源的消失，宗教将必然消亡。对广大人民进行无神论的教育是必要的，但是宗教的消亡需要首先根本改变人类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列宁指出：“如果认为，在一个以无休止的压迫和折磨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社会里，可以用纯粹说教的方法消除宗教偏见，那是愚蠢可笑的。如果忘记，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那就是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限制。”（《社会主义和宗教》，载《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5页）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普及，无神论越来越多地占领阵地。但是，只有在消灭

了资本主义实现了共产主义以后，人类才能最终地从宗教偏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消灭了剥削制度，摧毁了宗教的社会基础，大部分劳动者摆脱了宗教偏见。但是宗教的长期影响在某一部分人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还没有最后消灭，而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自然灾害有时还能造成相当大的困难，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仍然存在，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水平还没有得到极大提高，所以宗教偏见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中仍然存在。克服宗教偏见的斗争，仍然是长期的任务。

克服人们的宗教偏见是一个耐心教育的过程，要依靠群众自己的觉悟，而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手段。毛泽东同志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4—35页)

马克思主义者要宣传无神论同宗教偏见作斗争，和在政治上联合宗教教徒为争取和平、民主、社会主义而斗争是两回事，我们不能因为前者而在政治上排斥宗教徒，同样，也不能因为后者而放弃无神论的宣传，调和宗教和科学。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把政治的分野提到首位，不能把宗教的分野提到首位，否则就会使某些工人阶级和民主派忽视阶级斗争的迫切任务。无产阶级政党要耐心地努力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使宗教渐渐消亡，而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克服群众中的宗教偏见首先是要依靠群众自己的觉悟。

我国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所谓宗教信仰自由，包括两个方面：每个公民有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同时，也有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有相信和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决不是允许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而是要求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的反革命活动，给予坚决彻底的打击。我国的这一宗教政策得到爱国的宗教徒的热烈拥护。

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任务之一，就是要大力宣传无神论，向宗教迷信作坚决的思想斗争。随着社会阶级的彻底消灭，随着社会生产和文化科学的高度发展，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教育的深入，人们头脑中的宗教意识，必将逐步消亡。

# 第十六章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观点出发，肯定人民群众对于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同时承认个别人物在历史上也有重大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人民群众和个别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这对于正确地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重大的意义。

##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否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斗争的根本问题之一。

历史唯心主义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基本观点出发，否

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它有时表现为唯意志论，把个别人物的作用夸大到了极端，认为少数英雄人物的“非凡的”智慧和意志，可以随心所欲地左右历史的进程；而人民群众则不过是“消极的”、“被动的”东西，是“惰性的物质”，是这些少数英雄人物的“盲目追随者”。它有时又表现为宿命论，认为决定社会历史的是神秘的精神力量，如“上帝”、“天命”、“宇宙精神”等。在宿命论者看来，英雄人物是“上帝”命令的执行者或“宇宙精神”的体现者，而人民群众只能俯首听从这种精神力量的支配。

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从根本上说来，都否认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某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认为“治国”就是“牧民”，即把人民群众看做应该是被他们任意驱使的牛羊，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梁启超说：大人物“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饮冰室合集》十六册《历史研究法》）。

19世纪英国的托马斯·卡莱尔说过：“照我看来，世界历史，即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完成的历史，实质上是那些在地球上辛勤劳作的伟大人物的历史。”19世纪末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露骨地表示了极端仇视人民群众的思想，他把人民群众看成“不过是供实验的材料，一大堆多余的废品，一片瓦砾场”。现代帝国主义的反动思想家们，极力喧嚷尼采的所谓“超人”哲学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抹煞人民群众伟大作用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来为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进行辩护，妄图破坏被压迫人民为解放而斗争的信心，瓦解他们的斗志。

与历史唯心主义根本相反，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方式新陈代谢的历史。从这个根本观点出发，必然得出社会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样一个结论。这是惟一符合历史实际的

科学观点。

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阶级社会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包括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例如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农民和无产阶级组成的第三等级，属于人民的范畴，而国王、贵族和僧侣，则是人民的敌人。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但是，在任何时候，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都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是劳动者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是社会的一切活动的基础，人们不首先取得生活资料，就不可能从事政治的、科学的和艺术的活动。劳动者在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不但创造出物质资料，而且不断地改善生产工具，积累生产经验，而生产力的不断向前发展，又是引起生产关系变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即使群众在政治上还没有觉醒起来，反动统治阶级还能够阻碍着社会的前进速度，就是在这种时候，推动社会前进和最后决定历史进程的也还是人民群众的劳动活动。

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劳动群众的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是科学文化发展的惟一

源泉。

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的创造性活动，对于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他们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文化的积累和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们的作用在于对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作了概括和总结。科学的理论把人们的实践经验概括成系统的规律知识，文艺作品以集中的、典型的形式表现着人民的实际生活。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创造性的劳动成果，对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有着很大的提高和推进的作用。掌握前人已经达到的文化科学的成就（这些成就也是在过去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能够创造出新的成果的重要条件。但是，他们的创造和发明的最后源泉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没有人民群众的实践作基础，就不可能有科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历史上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伟大作品，是直接依据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素材、并对这些素材进行整理和提高而成的。例如，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楚辞，就是吸收了当时大量的民歌民谣写成的；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也都是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精华发展而成的；《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小说都是在民间口头文学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的。科学的发展也是这样。我国古代的著名的《本草》，就是由历代的药物学家、医学家，总结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农业科学方面汉代的《氾胜之书》、南北朝的《齐民要术》、元代的《王祯农书》、明代的《农政全书》等，也是直接总结了劳动群众的农业生产和饲养经验编写成的。

历史唯心主义者，特别否认人民群众对科学文化发展的决定作用，他们把人民群众诬蔑为“没有高尚理想和智慧”、“智力有限”

的、“低贱的物质的东西”。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在阶级社会里，由于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由于剥削阶级对科学文化的垄断，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受到摧残和压抑，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劳动群众中也出现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人类最初关于天文、地理和数学等等的知识，丰富多彩的建筑、雕刻和绘画，民间流传的音乐、舞蹈等等，无一不是劳动人民的天才创造。历代有许多闻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出身于劳动人民。中国宋代发明活字印刷的毕昇，近代欧美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发现电的作用的佛兰克林，发明电灯、电影、留声机等的爱迪生，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兹根，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罗蒙诺索夫，世界大文豪高尔基等，他们本人都出身于劳动者。

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和突出。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实质上都是劳动人民自己起来摧毁那些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斗争。在一定历史时期或一定阶段，有的剥削阶级和集团虽然也能参加这个斗争，有时甚至还是这个斗争的领导者，但是，劳动人民终究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力。当奴隶制度已经过时，封建制度已经萌芽的时候，是奴隶的英勇斗争动摇了腐朽的奴隶制度的基础，没有他们的斗争，封建制度就不可能战胜奴隶制度。当封建制度已经过时，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兴起的时候，起来结束封建制度的决定力量是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以及殖民地的人民群众革命运动，是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和殖民主义制度的决定力量。帝国主义者胆战心惊地惧怕群众，也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个原理，对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时代是普遍适用的，决不会有什么例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有人说："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社会关系中发生了难以理解的现象，即个别人和个别集团可以决定把核能用于军事目的，就是说他们可以决定人类的命运。"(铁托:《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国际局势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内部发展中的任务》)这种欺人之谈，表明了他们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决定历史的原理。帝国主义的战争狂人时刻想发动核武器战争，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以及爱好和平的人们团结起来，对美帝国主义和其他战争狂人进行斗争，核战争是可能防止的；即使帝国主义的战争狂人竟敢发动核战争，其最后结果也只能是帝国主义制度的彻底灭亡。归根到底，决定人类命运的，不是核武器，不是帝国主义的战争狂人，而是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力量。但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这种作用发挥的情况是有所区别的。

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他们经过斗争，虽然能够动摇以至于摧毁当时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因此他们在实际上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力，但斗争的果实，总是落到剥削阶级手里。奴隶暴动的结果是封建主代替奴隶主成为统治阶级；农民起义最后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取得统治的阶级却是资产阶级。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新型的劳动者阶级——无产阶级。他们是新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不但能够摧毁旧的社会制度，而且能够领导一切劳动人民，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的社会制度。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民群众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都遭受种种压迫，他们创造历史的作用，受到了压抑和限制，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全体劳

动群众永远摆脱了一切形式的社会压迫和剥削，掌握了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劳动群众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下，深知是在为自己的幸福生活和所有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而进行斗争。这就使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作用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并具有全新的意义。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人民群众充分发挥自己的革命创造性和主动精神开辟了新的纪元。苏联人民在四十多年的建设过程中，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发挥了高度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劳动人民也同样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以高度的自觉性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英勇奋斗，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充分发挥自己的革命创造性和积极性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毛泽东同志早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说过："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0页）事实正是这样。解放以后仅仅十几年的时间，我国的面貌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高度的自觉性组织起来，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发挥着伟大的创造作用，从而使工农业生产迅速地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正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

社》，载1958年《红旗》第1期）目前，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照耀下，中国人民正在昂首阔步地前进。

## 二、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前提之下，承认杰出人物的活动对于推动历史的发展进程具有重大的作用。把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和个别杰出人物的作用绝对对立起来，否认个别杰出人物的作用是不对的。

杰出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对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上一节已经提到了，下面着重说明政治上的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历史表明，当先进阶级及劳动人民为了解决新的历史任务和衰朽反动势力进行革命斗争时，必然会产生出一些领导运动的杰出的领袖、政治家和思想家。列宁指出："历史上，取得统治地位的每一个阶级，都推举出了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载《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1页）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选拔自己能够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先进代表，就得不到统治。

杰出人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任何杰出人物也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他们自己却是顺应着历史发展的趋势出现的。杰出人物，由于各方面的条件，能够比其他人看得较高较远，他们的思想能够及时地集中反映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反映当时条件下人们的某些进步愿望和要求。正是这个特点，使得他们对于历史的发展和前进能够起重大的作用。

任何一个时代，人民群众要对腐朽的制度进行强有力的斗争，都必须在一定的共同思想指导之下动员起来和组织起来，有了共

同思想的联系和鼓舞，有了相当的团结和组织，人民群众就能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就能打败那些腐朽的统治者。人民群众的斗争所需要的这种共同思想总是由某些杰出的人物首先提出的。人民群众的斗争总是由少数人发起和组织的，杰出人物则起了发起者和组织者的作用。我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所出现的农民运动领袖，如陈胜、吴广、樊崇、张角、窦建德、黄巢、宋江、李自成、洪秀全等，都对组织农民运动、指挥农民战争起了巨大的作用，从而对历史的进程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推动我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起过杰出的不朽的作用。在我国周秦以后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统治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如周公、秦始皇、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清代康熙皇帝等，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统治者、压迫者和剥削者，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前进趋势，他们也利用自己的权力，在某种方面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说的杰出人物，是指的对于社会发展起某种进步作用的代表人物，他们是社会的先进势力的代表。至于历史上的反动阶级和集团的首领，当然不能算杰出人物。反动阶级首领是没落的、腐朽的社会势力的代表，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必然违背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对社会历史发展起着消极的阻碍的作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活动可以使历史发展进程多少延缓下来，但这种局面决不会支撑很久，迟早会被人民群众的力量所打破。

不同的杰出人物，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不相同，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一般地说，在客观方面，杰出人物的作用的限度，取决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他们所代表

的阶级。在主观方面，某个杰出人物在推动历史发展上所起的作用的大小，则取决于他们认识社会发展趋势和反映人民群众要求的正确程度。他们个人的品质和意志的强弱，也对他们所起作用的大小有一定的影响。政治上的杰出人物都是一定阶级的代表和领袖，杰出人物的面貌是由阶级所决定的。他们对阶级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不能决定阶级的面貌。杰出人物的思想和行动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需要的正确程度，他们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取决于他们是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

过去历史上所出现的杰出人物，由于受到他们的阶级地位和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能够科学地、全面地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某些剥削阶级的杰出人物，为了借用人民群众的力量夺取统治地位，虽然在一定时期能够与群众保持一定的联系，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也不能充分发动群众。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后，他们又为了自己的狭隘的阶级利益而压抑群众，和群众逐步疏远，最后走到完全脱离群众，以至走到与劳动人民对立的反动立场上。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领袖的思想和行动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反抗封建统治的强烈要求，但也反映了农民阶级的狭隘性和散漫性，甚至还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给予农民的某些影响。他们虽然能够率领广大农民起来暴动，严重地打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生产力所受的束缚，因而多少推进了社会的发展，但不能领导农民求得彻底解放。

无产阶级的领袖和过去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根本不同，他们所代表的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他们是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成长和锻炼起来的。只有无产阶级的领袖，才能站在彻底革命的立场，科学地、全面地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给人民群众指出正确的斗争方向。只有他们才能把终生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工

作看做是自己的最高职责，一贯地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斗争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站在人民群众之中，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和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他们站在革命的集体之中，强调集体领导的作用，正确地把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结合起来。因此，他们能够成为团结全体劳动人民的核心。他们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以往任何杰出人物都远不能比拟的。斯大林曾经把列宁和彼得大帝作了一个比较：列宁是大海，彼得大帝则不过是“沧海之一粟”。

无产阶级的许多杰出的革命领袖是最坚强、最勇敢的革命家和组织家，同时又是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总结科学的全部成果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创立并不断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给了工人阶级以战无不胜的理论武器。无产阶级不能在没有革命理论作指导的情况下，依靠自发性的斗争达到彻底解放自己的目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也不可能在工人群众中间自发地产生。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使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他们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领导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使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开创出一个全新的局面。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人物对革命事业都起了重大作用。

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是我国无产阶级最杰出的代表。几十年来，他始终站在中国人民革命的最前列，领导

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根据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缔造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并且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步胜利。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四十年来的革命斗争表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保证，毛泽东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我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从自己的实践斗争中深深地体验到这一点。中国人民对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无限热爱，是从中国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和他们的切身经历中自然形成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反对和厌弃资产阶级的庸俗的个人迷信。个人迷信把个别人物神化，否认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是极其有害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反对低估和否认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伟大作用。否认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作用的观点是一种自发论的观点，这也是极其有害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的威信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自然形成的，是建筑在同广大人民密切联系的基础之上的。革命领袖的威信就是党的威信、阶级的威信、人民的威信，它是人民群众的最宝贵的财富。人民群众对无产阶级领袖的热爱和个人迷信根本不同，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爱护在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个人的神化。

## 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和党的群众路线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力量

和智慧是无穷无尽的。人民群众的敌人，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才能打倒；人民群众的解放和幸福，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和争取，才能获得和巩固。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革命的群众运动，旧的社会制度就无法推翻，新的社会制度也无法建立，社会就不能发展，历史就不能前进。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区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根本问题。

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总是把人民群众的首创作用放在首要地位，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大胆地充分地放手发动群众。他们始终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热情地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把群众的愿望和意志集中起来，以明确积极的方针，实事求是地领导着群众前进。

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相反，一切资产阶级革命家，不是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的工具，而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资产阶级从事反封建的斗争时，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曾不得不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推翻封建制度；但当群众的革命运动超出他们所许可的范围，触犯到他们的阶级利益时，他们就千方百计地限制和镇压群众运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当民众还是保守的时候，是不免要害怕民众愚钝的，而在民众一旦变得革命的时候，却又害怕民众觉悟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3页）

毛泽东同志指出，对待群众运动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3—14页）第一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第二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第

三种是反革命的态度。

资产阶级革命家竭力夸大群众运动中某些局部的、暂时的、个别的缺点，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段，非难革命的群众运动。与此根本相反，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相信群众的创造力和智慧，相信群众有能力克服运动中的偏差和缺点，并积极地帮助群众克服这些偏差和缺点，而克服偏差和缺点的正确办法也是由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而得到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群众运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是由两种根本相对立的世界观决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是由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出发的，也就是由唯物史观决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是从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错误观点出发的，也就是由唯心史观决定的。

群众运动必须和革命政党的领导结合起来。人民群众包含着先进的、中间的和落后的部分。必须使全体群众跟着先进部分的方向走，而不是跟着落后部分的方向走，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的事业才不会走错路，才有可能获得胜利。无产阶级是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间的先进部分的人所组成的战斗队伍，它的中央领导机关是由最有斗争经验的、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自己国家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领袖人物和干部集团所组成的。人民群众的斗争，需要这样的党来领导。无产阶级只有在自己的政党及其领袖的领导下，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列宁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页）

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毛泽东同志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60页）近百年来，从鸦片战争经过太平天国、义和团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革命斗争，结果都失败了。只有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了中国，和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切身经验中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要实现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除了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外，还要正确地处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用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党和群众的关系、党领导群众的方法做了一系列的规定，把它们概括起来，通俗地称为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

正确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是群众运动健康发展的保证。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首先在群众中进行一点一滴的、细致的、艰苦的工作，没有这样的工作作基础，不可能有真正的群众运动。

党的群众路线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是：第一，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认为任何恩赐和代替群众斗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第二，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无产阶级政党把自己作为人民群众的工具，而不是把人民群众作为自己的工具。第三，

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对人民负责和对党负责是一致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第四，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群众的知识和经验是最丰富最实际的，群众的创造力是最伟大的。只有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先作人民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作群众的先生。只有作群众的好学生，才能作群众的好先生。

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深刻地全面地阐明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99页）

在任何工作中，必须把一般的号召和个别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是，如果只有一般号召，领导人员不找一个地区或单位具体地直接地组织和从事所号召的工作，就无法检验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号召的内容和用最具有说服力的生动事例去动员群众响应号召，就有使一般号召落空的危险。

在任何工作中，还必须形成一个以主要领导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组成的领导骨干，并把这些领导骨干的活动和广大群众的活动密切结合起来。如果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的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

应用上述的方法时，领导者必须掌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

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01页）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正确领导的根本方法，是群众路线的根本方法。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都必须以这个根本方法为基础。例如，在采用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要从许多个别的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又拿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去付诸实践，从而检验和丰富一般意见，这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具体运用。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深刻地全面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质。它正确地处理了实践和认识、感性和理性、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它使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实际工作和斗争的时候，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些基本公式变成行动的指南；这些公式就是：认识运动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回到实践，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再由理性更深刻地抓住感性，由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的循环往复、无限上升的过程。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党的具体工作方法熔为一体的杰出典范。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同群众观点是统一的，是不容分割的。没有坚定的群众观点，就不可能在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单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而无正确的领导方法，也不能把工作做好。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要反对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了群众的觉悟程度，害了急性病；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害了慢性病。既要从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实际需要出发，又要放手发动群众，积极领导群众前进，这是群众路线所要求的基本原则，离开这个原则，必然要犯错误。

党的群众路线体现了党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群众的正确关系，体现了党以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对于群众的领导作用。党在贯彻群众路线的时候，对人民群众中的各个阶级和阶层经常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把群众中最革命最积极的阶级和阶层作为斗争的主要依靠，同时坚持团结中间的阶级和阶层，努力争取落后的阶级和阶层。党的群众路线也就是党的阶级路线。

在一切工作中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几十年来，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的一切事业中，一贯地坚持群众路线。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我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充分地体现了群众路线的精神。每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动员、鼓舞了我国亿万劳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使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地取得辉煌的胜利。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

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7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哲学，它在群众斗争的实践中为自己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旦掌握了群众，就形成了巨大无比的变革世界的物质力量，就能把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引向胜利。




ISBN 7-01-005015-5
定价:600.00 元(共八卷)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艾思奇全书　第7卷　1957-1961
作者=艾思奇著
页数=896
SS号=11796000
DX号=
出版日期=2006.10
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目录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1957）
一、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期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四、抗日战争时期
对“ 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的一些意见（1957）
哲学要为实际工作服务（1958.4）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1958.6）
工人和哲学（1958.7）
一、应不应该学哲学
二、能不能学好哲学
三、怎样才能学好哲学
哪里找根据？（1958.7）
改革规章制度，充分解放劳动人民的创造力（1958.8）
关于民主与专政问题（1958.9）
一、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
二、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
三、关于共产党的领导问题
努力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规律（1958.11）
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1959.1）
认识客观规律，鼓足革命干劲（1959.1）
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1959.2）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哲学问题（1959.6）
一、关于目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的问题
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以及两个过渡的问题
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的问题
四、关于否定之否定改变为肯定之否定的规律问题

五、关于五个并举是方针还是规律的问题
关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问题（1959.7）
纪念斯大林诞辰80周年（1959.12）
关于否定之否定的规律（1959.12、1964.6）
一、辩证法规律之间的联系问题
二、辩证法意义上的否定问题
三、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问题
四、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问题
关于自然辩证法研究班“学习计划”的说明（1960.2）
学习列宁，保卫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而作（1960.4）
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1960.7）
党史引言报告（1960）
一、学习党史的中心环节问题
二、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的问题
三、坚持彻底的辩证法的问题
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辩证逻辑（1960.7）
一、辩证逻辑和认识论
二、研究辩证逻辑的原则
三、辩证逻辑的概念
四、辩证逻辑的判断
五、辩证逻辑的推理
关于编写《自然辩证法提纲》的讲话（1960.9）
一、关于要不要编写《自然辩证法提纲》的问题
二、关于如何写“导论”的问题
三、关于如何写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的问题
四、关于如何写“分论”和工农医的问题
社会主义学院讲课提纲（1960）

一、哲学的任务是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二、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辩证的发展过程
三、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
进一步学习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笔记（1961.3）
一、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胜利
二、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精神的统一
三、分析矛盾，分析阶级
四、把握社会的基本矛盾
五、人民观点，群众观点
在“61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61.9）
一、关于举办“61班”的目的和任务
二、关于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进行教学的问题
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
四、关于个人自学和集体学习的关系问题
五、关于语文学习和作文的问题
社会发展史引言（1961.11）
一、前言
二、从猿到人
在布置“60班”历史教学计划时的讲话（1961.11）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主编）（1961.11）
第一章　绪论
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二、哲学史上的两军对战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和方法
上篇　辩证唯物主义
第二章　世界的物质性
一、世界是物质的世界
二、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三、空间和时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
四、物质运动有它自己的规律性
第三章　物质和意识
一、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
二、意识是存在的反映
三、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
第四章　对立统一规律
一、唯物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
二、两种发展观
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四、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五、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六、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第五章　质量互变规律
一、质和量
二、量变和质变
三、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四、飞跃形式的多样性
第六章　否定之否定规律
一、辩证的否定是发展的环节
二、否定之否定，发展的螺旋式或波浪式运动
三、新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第七章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一、本质和现象
二、形式和内容
三、原因和结果
四、必然性和偶然性
五、可能性和现实性
第八章　认识和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二、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三、认识的辩证过程
第九章　真理
一、客观真理
二、真理发展的辩证过程
三、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下篇　历史唯物主义
第十章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
第十一章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一、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三、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四、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第十二章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一、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
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四、家庭、民族
第十三章　阶级和国家
一、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二、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三、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四、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
第十四章　社会革命
一、社会形态的更替必须通过革命的变革
二、民主主义革命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四、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
第十五章　社会意识及其形式

一、社会意识的一般特点
二、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
第十六章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二、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和党的群众路线
封底